

## 目录

目录.....	1
第一章 土地改革与农村民主.....	4
一、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	4
二、旧中国农村的缩影.....	5
三、第一次土改.....	5
四、土地复查与整党.....	7
五、十里店不同阶层的不同反应.....	7
六、十里店土改运动的成绩和问题.....	9
七、结语.....	11
第二章 巩固人民政权.....	13
第一节 镇压反革命与剿灭土匪.....	13
一、猖獗的反革命活动.....	13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动.....	14
三、谨慎收缩，处理积案.....	16
四、政策与文件.....	17
五、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	18
第二节 抗美援朝——伟大的人民战争.....	24
一、抗美援朝时国内外的形势.....	24
二、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援朝作战.....	25
三、抗美援朝时期的群众宣传.....	26
四、人民的战争——参军、支前、劳动生产竞赛.....	28
五、典型的例子.....	30
第三节 “三反”“五反”运动.....	31
一、“三反”运动.....	31
二、“五反”运动.....	36
三、对“三反”、“五反”运动的认识和总结.....	40
四、几个具体实例.....	41
五、补充材料.....	46
参考资料.....	49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	2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2
一、总路线酝酿和历史背景.....	2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2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3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4
一、改造的历史逻辑.....	5
二、改造的时机与条件.....	6
三、团结加教育的改造政策.....	8
四、几个公私合营的例子.....	10
五、总结.....	12
第三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2
一、个体手工业的生产特点.....	12
二、手工业走向合作化.....	13
三、手工业合作社与出现的问题.....	14
四、常州的例子.....	15
参考材料.....	16
第四章 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的历史进程.....	17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农业经济集体化的思想和实践.....	17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和决定.....	17
三、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张庄为例.....	18
1、土改后张庄的基本情况.....	18
2、四大自由.....	19
3、组织起来.....	20
4、互助组.....	20

5、初级社 ..... 21

6、高级社 ..... 22

7、曲折、反复和斗争 ..... 24

8、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 26

第五章 整风反右 ..... 28

一、1956 年的中国 ..... 28

二、整风前奏 ..... 28

1、社会主义的矛盾 ..... 28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29

3、发起整风 ..... 29

三、整风运动 ..... 30

1、整风开始 ..... 30

2、转向反右 ..... 31

四、反右 ..... 32

1、反右初期 ..... 32

2、反右中后期——深入挖掘和扩大化 ..... 32

五、后记 ..... 33

第六章 三面红旗大跃进 ..... 35

一、大跃进的发动 ..... 35

1、大跃进前的国内形势与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视 ..... 35

2、毛泽东与大跃进的发动 ..... 37

二、“左倾”错误与纠“左”的努力 ..... 42

1、官僚主义与“左”倾错误 ..... 42

2、刘少奇与“左”倾错误 ..... 45

3、纠“左”的努力 ..... 47

三、庐山会议 ..... 50

1、庐山会议的过程 ..... 50

2、庐山会议后的形势 ..... 52

3、庐山会议的评价 ..... 53

四、调整阶段 ..... 54

五、大跃进的评价 ..... 57

六、中国人民的伟大跃进 ..... 57

1、农民在跃进 ..... 58

2、工人在跃进 ..... 66

3、市民在跃进 ..... 77

4、妇女地位大解放 ..... 80

5、科教文卫事业在跃进 ..... 81

第七章 “1962 年的右倾”与四清运动 ..... 83

一、1962 年的右倾 ..... 83

1、1961 年的调查研究 ..... 83

2、七千人大会的分歧 ..... 83

3、右倾之中央 ..... 84

4、右倾之地方 ..... 85

5、毛泽东的不满 ..... 86

6、北戴河会议的反击 ..... 87

7、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重提阶级斗争 ..... 88

二、四清运动的发动 ..... 89

1、“双十条”的制定 ..... 89

2、“双十条”的宣讲与“四清”的铺开 ..... 90

三、四清运动的高潮 ..... 90

1、桃园经验 ..... 90

2、《后十条》修订 ..... 92

3、大寨的四清 ..... 93

4、张庄的四清 ..... 94

四、四清运动的转折 ..... 96

1、《二十三条》的制定 .....	96
2、毛泽东对刘少奇认识的变化 .....	98
五、资产阶级法权、官僚主义、群众运动这与走资派辨析 .....	98
1、资产阶级法权 .....	98
2、《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	101
3、官僚主义、走资派与资产阶级法权 .....	101
4、群众运动与资产阶级法权 .....	103
第八章 中苏论战及其历史意义 .....	105
一、中苏论战过程 .....	105
二、中苏论战的历史意义 .....	106
三、中苏论战对中国的影响 .....	109
第九章 波澜壮阔的文革运动 .....	110
一、1966-1968 年的群众运动 .....	110
二、1969—1971 林彪集团的兴衰 .....	116
三、1972-1976 四人帮的兴衰 .....	119
四、文革的历史意义 .....	122
第十章 武汉的文革运动 .....	125
一、分歧的根源，1949-1966 年 .....	125
二、旧游戏与新牺牲者，1966 年 6-7 月 .....	126
三、新游戏与新玩家，1966 年 8-12 月 .....	127
四、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 年 1-4 月 .....	130
五、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 年 5-7 月 .....	133
六、造反派之间的街突，1967 年 8-12 月 .....	137
七、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8 年 .....	138
八、1969-1973 年间的派别斗争 .....	139
九、1974-1976 年间的派别斗争 .....	140
第十一章 1976-1978 的转折年代 .....	144
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结束 .....	144
二、工业新政 .....	144
1、利润、管理与物质刺激 .....	144
2、发展速度？ .....	145
三、农村集体农业的瓦解 .....	146
四、教育再革命 .....	147

## 第一章 土地改革与农村民主

### 一、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1</sup>

在旧中国，地主和农民就形成了这样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忍受着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因而，解决农民问题，就成为解决中国问题最重要的任务。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这样一场改天换地的革命，其主要任务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并为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 1、新中国建立时农村的阶级状况

1950 年左右，除台湾等少数地区之外，共产党已经夺取了全国的政权，从政治领域上结束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在政治上结束地主阶级的统治，并不代表着已经消灭了地主阶级，也并不意味着已经消灭了压迫亿万农民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还有  $\frac{2}{3}$  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在大约有 2.9 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体来说，在全国土改前，“占农户总数不到 7% 的地主、富农，占总耕地的 50% 以上，而占全国农户 57% 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 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也就是说，大多数的农民仍然承受着严重的地租剥削。在大多数农民尚未翻身的时候，新生的政权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着的生产力也不可能得到释放。

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也就是说，夺取政权，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只有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新生的政权、解放农民的生产力。

#### 2、农村土改的过程

1950 年 6 月 30 号，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

从 1950 年冬季开始，展开了历时两年、规模浩大的土改运动。土改运动“首先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然后是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最后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

1952 年底，土改基本完成。在土改完成之时，整个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占农村人口 92.1% 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91.4%；原来占农村人口 7.9% 的地主富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 8.6%。”<sup>2</sup>

土改运动，最重要的是怎样唤起农民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进而为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整个中国底层民众的解放而斗争，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键问题。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其中关键的一环。要实现这个目标，恩赐、包办代替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唤起每一个农民，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获取胜利果实。尚未觉悟的农民往往把自己痛苦的根源归结为某个具体的地主，而不是归结为某种制度<sup>3</sup>。农民会毫不犹豫的控诉某个地主，谴责他们“在收租、放债时使用的种种欺骗手段”；“任意糟蹋农民的妻子、女儿，把她们霸占为妾，或者先奸后弃”。他们也会谴责地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例如“给地主接送亲戚，办喜事时抬轿子，过年送礼等等”<sup>4</sup>。但是一涉及到封建土地制度本身，就开始犯迷糊了。农民本能的认为，“如果地主的土地是合法购置或祖上传下来的，就应当交租子”。“要不是地主把土地租给我们，我们就得挨饿”。<sup>5</sup>土改运动，只有唤起农民的觉悟，才能真正胜利，也因此，土改运动就是农村的民主运动。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的国家进行的，历时 30 年之久，其艰苦卓绝、波澜壮阔，无法通过这样一篇短文介绍。我们这里以两本关于中国土改运动的著作《十里店》（一、二）为例，介绍中国农村土改与民主运动的过程。

本书的作者大卫·柯鲁克夫妇是英国和加拿大的共产党人，他们于 1948 年受中国共产党邀请，参加了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的土地复查与整党运动。<sup>6</sup>在十里店期间，柯鲁克夫妇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后来他们据此写成了《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书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运动以及十里店农民在土改中的不同反应和心理变化都进行了详细、深刻的描述，里面所提到的土改运动的成绩和遇到的问题在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实际上可以说是当时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写的：“我们把十里店及其附近村庄看成一个小溪，那么，整个解放区就是一条大河，这小溪就是大河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十里店是一个缩影，她的这十年历史代表了中国革命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sup>1</sup> 《伟大的创举》，见《列宁选集》第四卷。

<sup>2</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00 页。

<sup>3</sup> 这和没有觉悟的工人一样，把自己的苦难归结为某个坏老板，而不是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sup>4</sup> 《翻身》，北京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144 页。

<sup>5</sup> 《翻身》，北京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版，144 页。

<sup>6</sup> 大卫·柯鲁克，1935 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曾参加西班牙内战中的国际纵队英国旅作战。1940 年在中国成都与生于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硕士伊莎白相识相爱。随后二人在伦敦结婚，伊莎白加入英国共产党。1948 年，应中共方面邀请，柯鲁克夫妇留在中国帮助培养外语人才，成为参加创办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最早的外籍教师。

## 二、旧中国农村的缩影

十里店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农村村庄，位于河北省武安县（现武安市，属邯郸市管辖），北京以南约 470 公里。

十里店过去有大约 5000 亩的土地。1917 年的一场洪水将 1000 亩土地冲毁，使这些良田变成了多石的河床。村里的 1500 人都靠这 4000 多亩土地过活。实际上绝大多数土地都属于地主、富农所有。20 个最富裕的家庭，其土地平均每人近乎是中农家庭人头的 2.5 倍，或者是贫雇农家庭的 7 倍。土地占有分三类情况：佃户只从地主手里租种土地，交一半的收成给地主；另一类，地主不仅提供土地，还提供农具、肥料和牲畜，佃户交 70% 的收成给地主。还有一类，土地的占用由比较大的地主所掌握，佃户交固定的租子给地主，不管收成如何。在歉收的年成里，收获的粮食只够交租子，自己什么也剩不下。

那些家境十分贫困的人，其遭遇是：要么在饥荒年饿死，或者被迫迁居；要么被贫穷逼得卖儿鬻女或者勒死自己的亲生孩子；要么因饥饿被迫加入军阀或土匪的部队；要么因交不起税款而被关押或者因还不清债务而失掉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阶级的不同，决定着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十里店姓王、姓傅和姓李的家庭占全村 95%”，十里店被这几个主要家族分而治之。

十里店每 10 个人才有一头牲口，但是绝大多数牲口只属于富裕的地主和富农，大多数农民连一根驴毛都没有。还有另外一种重要的生产工具，纺织机，大多数属于地主或富农。也就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资本的男男女女，每年都有几个月时间被迫无事可干。

大多数地主和富农除了依靠地租剥削来压榨穷人外，还通过经商或放高利贷的手段补充他们的收入。靠警察武装力量作后盾所发放的高利贷产生出的利率比从事生产性的企业所得到的利率高得多，这就成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最实用的手段。

在封建社会，妇女除了要忍受压迫外，还要忍受封建夫权的压迫。在每个阶层里，妇女的地位都是十分低下的。一旦结婚，她们的社会生活就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家庭的小圈子里，范围再大点，也只不过和左邻右舍两三家妇女相接触。许多儿媳妇认识到，在家庭的斗争中，唯一的希望在于得到丈夫的帮助。可是，有些儿媳妇连在丈夫耳边吹风诉苦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村子中许多年轻已婚男子离家出走了。

在十里店，整个治安机构如警察、民兵组织、部队或民政机关，由地主把持着，他们有权强行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或在债务拖欠的情况下实行抵押品的没收。十里店的地主还有自己的社团组织，如家族委员会，宗庙委员会。这些社团组织也是地主阶级统治贫苦农民的工具。一句话，基层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地主阶级手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十里店的贫雇农，往上溯二到三代，大多数都是家境比较富裕的富农或地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穷人因为过于穷困娶不起媳妇，往往没有下一代。而以前比较富裕的家庭，则逐步破产，下降成为贫雇农。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农村的败落、破产，这是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的压迫也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这些情况在旧中国并不是个别现象。可以说，十里店的土地状况，阶级状况，社会发展状况，是苦难旧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 三、第一次土改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侵入当地。日本军队曾经在一次“扫荡”中路过十里店，做过短暂停留，焚烧了许多房屋，杀死了十几个村民，但是从来没有占领该村。因为存在这样的缝隙，国民党的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相继在这个地区开展了活动。

共产党在这个地区的兵力是很微弱的，活动的规模也很小，但是生命力很顽强。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烧杀掠强，无恶不作。共产党在组织抗日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农民的精神几乎完全崩溃，这是因为国民党军队的欺凌和侮辱以及毁灭性的苛捐杂税所造成的恶果。农民沉痛地认为国民党军队在某些方面比日本人还狠毒。

国民党将当地县城让给了日本侵略者之后，很短时间八路军就在武安县边境之内展开了活动。共产党在武安县的第一个活动步骤是领导农民开展抗击苛捐杂税的运动，这些苛捐杂税不是用来驱赶日本侵略者，而是肥了国民党军官的私囊。随着这个运动的展开，共产党在武安县的影响逐步扩大，1939 年，共产党成立了“抗日县政府”。随后，1941 年成立了民兵组织。1942 年，整个太行地区约 1/5 的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旱灾。由于将农民组织起来，十里店成功抵御了这场大旱灾。与十里店毗邻的河南省北部，则遭受非常严重灾害，人口大量死亡。

共产党还在当地将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坚壁清野以抵抗日本军队的掠抢，还开展了减租减息，组织农会，组织互助合作，组织妇女协会等活动。共产党领导的这些活动有效地支持了抗日战争。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从抗战初期共产党进入该地区活动，到抗日战争胜利，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土地政策是不动地主、富农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对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是非常必要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这个地区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土改的目的一是摧毁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土改的纲领文件是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土改运动大致经历了查“黑地”，割封建尾巴，划定阶级成分，挖防空洞等几个过程。

### 查“黑地”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在当地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城乡联合斗争。12 月，共产党领导的数千农民开进县城，清算居住在城里的地主，在乡下也同时进行清算地主的斗争。到 1946 年春天，整个武安县再也找不到一块租种的土地了。

随着共产党控制该地区，十里店的地主富农也窥测方向，采取各种花招逃避税收。主要办法有：与承租户签订假

抵押合同，这样他可以照样收租，而不必缴纳税赋；签订假的赠送、出卖合同，地主虽然名义上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但仍然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另外，一些农民也担忧有一天国民党会打回来，因而仍然维持以前与地主的那种关系。因为全部土地应缴纳的税收是预先确定的，这样税负就被转嫁到中农头上。土改的第一步就是发动群众，清查地主所有的被漏掉的“黑地”。

首先，村干部得到农会的帮助，着手丈量全村土地。到1946年春天，克服了重重困难，大量的黑地被查了出来。

下一步是核查土地合同。根据抵押合同，所有在在抵押的基础上已经耕种的土地，将所有权授予耕种者。赠送、出租，以及出卖土地的假合同，也同样处理。查“黑地”获得的家具及其他物品被公开拍卖。拍卖收入及罚款现金被分配给全村的贫雇农。

查“黑地”不仅仅是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全村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中农、贫农、雇农成为一个阵营，地主富农成为另外一个阵营——即“斗争对象”。此后的斗争就在这两个阵营中展开。

查“黑地”运动的主要成果是剥夺了地主的土地、房屋、牲畜及其他生产资料，严重打击了封建主义势力。

### 割封建尾巴

1946年5月中央发布《五四指示》后，各级政府召开了多次会议学习这个文件。9月，会议结束后，村干部回到村子，带回的口号是：“争取每个男子有土地，有房，有马！”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的方法是，“挖拱包补窟窿”，直白说就是把富人的东西分给穷人。

前一阶段的查黑地运动分配了大量的斗争成果，但是斗争成果的分配并没照顾到贫雇农，而最受益的是中农。中农有能力买下“斗争对象”因付不起罚款而降价处理的土地、房子及牲畜，而贫雇农只领取了所出售财产的现金收入。

地主富农土地已经被剥夺，无法填补贫农的窟窿，自然只能靠中农来充塞了。

有两种类型的中农，经过查黑地运动之后，家境变得很好。一类是，有些中农雇用了劳动力把土地转租给佃户或者把钱按高利贷的形式借出去。另一类是，在贫农和中农中，特别是中农，有的是地主富农的儿子或孙子，这些人的家产、田地和牲畜，是继承他们的父亲或爷爷的财产而得到的，他们的父亲或爷爷以前是靠压榨贫民才使家庭繁荣兴旺起来的。

区干部认为，这两种类型的中农都是从剥削中得到的财产，要么是他们的父亲或爷爷在封建社会进行的剥削，要么是他们自己进行的剥削。十里店的村干部同区里的干部协商之后，带着“割封建尾巴”的口号回到村子。封建尾巴的意思是，某人占有生产资料，而这些生产资料不是通过他自己的血汗或他父辈及祖父辈的血汗得到的。这种人叫“封建尾巴”。这样，就要把全村25%的家庭纳入到“斗争对象”范围内。

要确定谁是“封建尾巴”，村干部采取民主的办法，召开了多次群众会议，对村子的各户逐一加以讨论。经过艰难的讨论，确定了一批“封建尾巴”。十里店村再次召开群众大会，“尾巴”家庭也参加会上对“尾巴”家庭的财产来源进行审查，一旦认定是剥削得来，即加以没收，然后分配给穷人。

割封建尾巴运动的一个后果是，每个人都成为邻居的怀疑对象。因为要追溯三代，很多人都非常担心。原因很简单，多数穷人的上二代或三代都是家境比较富裕家庭。穷人的儿子因为娶不起媳妇，根本不会有第三代。

另外一个后果是，妇女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已经嫁到封建尾巴家庭的妇女，包括刚刚结婚不久的，也被划为斗争对象。她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因为害怕今后成为斗争对象，劳动积极性也大受影响。

根据中央的政策以及实际效果可以确定，割封建尾巴运动是一场错误的运动，错误地打击了中农，同时还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一些中农为了逃避打击，开始出售土地与牲畜，生产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出现这样的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干部的政策水平较低，另一方面也是受小农极端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错误在一年以后的土地复查与整党运动中得到了纠正。

### 划定阶级成分

划定阶级成分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土地改革和民主运动。在1947年以前，十里店已经有了一系列的阶级划分，每次划分都比前一次细致、精确。一般来说，在接二连三的运动中，阶级关系越来越明朗化了。

1947年夏，划分阶级成分比前几次更加详尽复杂。村里制定了一个调查表，然后通过互助各组组长向各家各户发放。根据调查表反映的情况，对每家每户进行划分。阶级被划分为两大类：“基本群众”和“斗争对象”。基本群众划分为五个阶层——贫农、下中农、新中农、新中农、和上中农。“斗争对象”也分为四个阶层——“降为贫农”、“降为下中农”、“降为老中农”、“降为上中农”。村里组织了多次群众控诉大会，但是由于划分阶级的复杂性，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少数情况下，又远远超越了限度。

超越限度的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公报私仇，利用自己的权力将与自己有仇的人划为斗争对象。另外一种情况是四个“斗争对象”在村民中引起的强烈不满达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群众难以抑制愤怒的心情，将四人押到河边用石头活活砸死。这种情况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 挖防空洞

经过一系列的土改运动，仍然有许多敌人保留着他们以前的财产。他们的土地、房产、牲畜、生产资料已经被斗掉，但是他们还有一些财产隐藏起来了。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埋在地下；二是秘密地拿到一些朋友或放在新社会中其社会地位比自己可靠的男方亲戚中。这种隐藏财产的方式谓之防空洞。

为了剥夺剥削阶级的财产，也为了把这些闲散资本投入到最能有效使用它的人手里，1947年夏天，与划定阶级成分运动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挖防空洞”运动。村子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运动目标。

“挖防空洞”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一部分贫雇农，以前曾经做过地主富农的帮佣，因为内心愧疚未能揭发地主的隐匿财富。运动起来后，这些人很快响应号召，交出隐藏的财产。第二种方式是，各互助组召开全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之后，派人查访已经确定是防空洞的家庭。被查访家庭一般都能配合交出隐藏财产。对极个别情况，村民对顽固分子进行了多次审问，未达目的，后对其进行了拷打。

挖防空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采取严刑拷打的方式是不恰当的，其中包含了两种不良因素：使用暴力和过分强调隐藏财富。

### **第一次土改的成就**

经过第一次土改，十里店村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封建土地制度被打倒，新的土地制度确立。土地已从地主富农手中夺了过来，分给了贫农和中农。由于各项改革的结果，村庄大约占总户数 1/3 的家庭已经从贫农和雇农的地位上升到了新中农。地主富农现在所拥有的土地只是他们过去的 1/6。在十里店靠剥削其他劳动力过活的人已经不存在了。

到 1947 年，村子的经济状况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好。村子里面组织起了互助合作组。由于互助组的作用以及政府的信用贷款，十里店轰轰烈烈地开展贸易、运输和村办工业。全村的资本和劳动力全部得到了有效应用，这是史无前例的；生产速度一日千里，所获得成果的分配与昔日相比更加公平合理。

社会和经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家庭必须由家长管理和支配的封建思想观念正在逐步地被民主家庭新观念所取代，在这样的家庭里，常常举行会议讨论经费安排以及开展什么活动，如：家庭预算资金应拿多少出来购买一头驴或一台新播种机或一张犁；为了纺织，在棉花方面应该投入多少资金，或投入多少资金购买改进的纺线车和织布机；今年冬小麦应不应该种，玉米和棉花应种多少，……卖儿鬻女的现象不存在了。宗族和家族委员会现在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崇拜祖先和关心老祖坟不再是村子中的普遍习俗了。

### **四、土地复查与整党**

十里店 1947 年的土改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还有很多贫苦农民还没有翻身，其次是存在的领导干部大包大揽、命令主义，损害了群众的利益。鉴于这种情况，1947 年 11 月，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决定派工作组进入十里店，进行土地复查和整党，纠正前一次土改中存在的极左错误。工作组由《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组成。

首先，工作队走访贫雇农以“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如何以及党的干部是怎样对待他们的；进一步向他们宣传土地法和共产党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发动那些还没有翻身的农民。”与此同时，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工作分两个阶段也展开了：“第一个阶段要使他们看到自己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是怎样形成的，哪些严重，哪些不严重。第二个阶段，要改组党组织，执行土地法。”“第一个阶段又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关门整党’，党员将和冷冰（引者注：工作队成员）在一起开 13 天的会；第二步是‘开门整党’，党支部开会要吸收群众参加。然后，党员和非党员群众将在一起解决问题，互帮互学。”作者详细描述了评议党员的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党员心理上的波动。

其次，划分阶级，将贫雇农组织起来，建立贫农团。划分阶级采用的是“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方法，也就是“各人先在小会上自报家庭经济生活情况，由大家按规定的条件评议是什么阶级成分；然后张榜公布，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张榜以后大家再讨论，把大家同意的、不同意的都写出来，再出第二榜。大家对第二榜再提意见，绝大多数人都同意了，就定下来，出第三榜。三榜后有人还不同意，还可以提到人民法院去裁决。”对于这一过程，作者记录了许多人的发言、议论和意见，真实地再现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以及共产党工作队的指导作用。

再次，查窟窿找补丁，分配果实。找窟窿和补窟窿的实际工作，是由贫农团、农会和村政府的一个联席会议领导群众进行的，工作队只是对此进行了指导。他们通过自报、公议、审核、征求意见等步骤较为圆满地完成了这个工作。

### **五、十里店不同阶层的不同反应**

乡村社会本就不是一个团结融洽的共同体，其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冲突。宗族之间的冲突、家族内部的纠葛、邻里之间的矛盾、多年相传的世仇、村庄之间的纷争，利益之争、权力之争、荣誉之争，都使传统乡村社会充满了裂痕。这可以说是乡村社会阶级意识尚未萌发时的写照。其后，共产党及其领导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使这一切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同样要明确依靠力量和斗争对象，这也就决定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对土改会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 **（一）贫雇农的反应**

贫雇农是农村中的贫困阶层，在我们的印象中，土改能够为他们带来众多实质性利益，能够极大地改变他们的境遇，为此，他们会欢欣鼓舞，会积极响应和参与。然而，事实与想象并不完全一致。贫雇农并非于土改伊始就积极响应和拥护，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从犹豫、不安到慢慢觉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疑虑、犹豫心理和宿命论、经验论等原有观念的许多论述，应该说，他们一开始对土改抱有一种试试看的态度，他们心中的种种顾虑以及原有的一些消极观念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这与我们过去的关注重心有所不同。

#### **1、贫雇农的疑虑、犹豫和不安心理**

万事开头难，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一开始亦是非常艰难，正像一本回忆录中所说：“发动群众有一个过程，是十分艰苦的工作。开始还不能分田地，因为一则情况还不了解，二则群众也不敢要。”“我们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他们



多半都不理睬；把财物分给他们，他们摇摇头，拱拱手，谁都不接受。”从这种不敢接受的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顾虑和担心，他们害怕地主富农会在日后采取报复行动。对于这一心理和行为，作者在书中有多处论述：“由于国内战争还在继续，许多农民头脑中必然存在着潜藏的恐惧和担忧：过去的日子可能会卷土重来；他们通过几年辛勤劳动和斗争得到的一切成果，他们及孩子对新生活的希望，有可能不知不觉从他们手中被夺走和失去，只要还有这类坏人存在，这些事情就有可能发生。”一些贫雇农“由于害怕报复而在过去的斗争中表现消极，或者出于对宗族的忠诚而站到了地主或富农一边。”在双减运动后期，“有些农民看到地主参加会议仍然忐忑不安。在第一次座谈会上，有些佃户自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而恭恭敬敬地把他们的临时座位让给地主，……”“有的村子，最大的问题就是佃户害怕这样的情况出现：即要是他们不付过去的旧税率，地主就可能拒绝再为他们提供租赁的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村干部和支部成员迫切希望让农民从这种状况中解放出来，以便加快双减的步伐。然而，这却反而使担忧的农民对减租减息产生了半信半疑或不愿意的态度。“干部的这种过分热心，结果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一大批谨小慎微的农民把白天干部帮他们夺得的胜利果实，在半夜三更又悄悄地归还了地主。”……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农民潜藏心底的对未来的不确定和对可能遭受报复的恐惧以及对现存生活状况怀有的不安全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行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因此，只有“让群众从他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中理解问题”，只有从实践中逐步消除他们的不安全感，增强他们的信心，才能有效地一步步提高群众的觉悟，逐步提高农民有组织的独立开展活动的的能力。

## 2、贫雇农所固有的宿命论和经验论

宿命论和经验论的消极影响自不待言，在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下书中对此的论述：许多世纪以来，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往往习惯于把自己的命运看作是郁闷无知、卑劣下贱的人。这很好地描绘了当时的农民尤其是贫雇农的一种普遍心态。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可想而知土改运动中发动、组织他们起来争取自己权利的困难性，“农民为了争取获得自己的权利，即便在新政府的领导下，也不是一蹴而就、顺畅无阻的事情。他们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老农始终谨言慎行，唯恐地主恼怒反击。根据他们自己以及父辈一生的经历，他们认为，新政府可能是短暂的，而地主永远是存在的。”另外，一些贫雇农从一代代前辈的经历中获取了一个这样的经验：自古至今没有一个政府真正关心我们这些贫苦的人。由此他们对宣传、发动、组织等工作自然而然地会抱有一种漠然的心理，不信任，不积极参与。这也可以说是现实需要遭遇传统经验的一个常见反应；另一种反映便是知足常乐：“一些老贫农对土改和干部就感到很满意了，因为他们还没有去掉在旧社会养成的宿命论观点。这些农民觉得，他们能生在分给自己土地的时代，就已经是相当幸运的了，只求能让他们安安稳稳地享受这点福气。他们根本没有奢望想再多得到一些什么”，这种容易知足的心理在那个特殊的情况下并不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由于它对现实缺少更多的需求，从而限制了那些人的行动能力和行动积极性。

## 3、慢慢觉悟而增加参与积极性

广大群众慢慢地对运用“群众路线”有了反应，“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权利的作用，正在学习通过联合起来斗争，可以免遭日本人的侵害并且还能减轻地主富农对他们的压迫。他们还意识到他们自己既不是孤立无援的命运受害者，像佛教徒所声称的：前世没做好事，后世应得的报应；亦不是像道教徒所具有的品格：认为人生好比旅途，是波动起伏、曲折向上的，必须耐心等待。”“他们的命运实际上在顺利地向前发展，这并不是靠什么神秘的诀窍或念什么咒语才有了变化，而是共产党将税收制的改变与其他方面的经济改革结合起来的缘故。”贫雇农的觉悟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为团结和组织起来共同争取应得的权益奠定了思想基础。

### （二）中农的反应

中农介于贫农和富农之间，他们占有一些土地，拥有一部分牲畜和劳动工具，在那个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很少数的可以上升为富农，大部分会沦为贫农。也正是基于对自身利益和未来命运的担忧与考量，他们起初是土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作者在书中是这样写的：“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彻底改革，显然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毫无疑问，正是贫农与中农才最紧密地团结在新建立的地下党组织周围，而且，党在以后领导的历次改革运动中，也正是从他们之中吸收了新鲜成分。”他们的积极性由此可见一斑。另外，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新中农”作为一个新阶层出现了。所谓新中农指的就是“由于共产党推行的各项改革，从贫雇农上升到中农的那些人”“在这些人中，有敢于用新的兑换价格偿付旧债的，有加入互助组并能参加到贸易运输远征队的，有在开垦荒山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还有在纺织方面创全县记录的那些妇女们。”这些新中农理所当然地“是共产党推行的各项改革最坚定的支持者。”

然而，当土改运动在推行过程中危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相应发生改变。书中有以下细节对此有过描述：“在对过去的银币和晋冀鲁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冀南钞票进行兑换的过程中，许多中农回避新的兑换价格，这类人早先对共产党推行的其他方面的改革以及抗日运动曾经是忠实的支持者，现在回避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将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借给了比他们更穷的邻居。由于害怕受到一些损失，因而他们有点偏向地主富农的言论。”在割封建尾巴运动中，由于错误地把斗争范围扩大到中农，使得村民形成了严重的分离。“这不仅在富人与穷人之间产生了对立，而且‘基本劳动群众’自身也陷入到了灾难性的分离状态。”“运动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每个人都变成了邻居的怀疑对象”：“中农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威胁，甚至那些未被触动的中农也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还有，为划阶级定成分而进行的一系列“控告会”和“诉苦会”，“为那些有意报私仇或者沉迷于了结个人怨恨的人提供了一定的机会。甚至人们知道有些控告是假的时，也很少有人敢揭露那些泄私愤报私怨的人。他们害怕挑起事端，惹祸上身，对自己不利，因为在中农之中甚至贫农之中也有些人存在着一种不安全感。”这样的后果是“基本群众”中的一些成员也挨了斗争，从而加重了他们的不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与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有关，领导方法或路线上的错误使中农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产生担忧，担心有一天运动的斗争矛头会指向自己。鉴于这



种状况，为了打消中农的恐惧心理，一条崭新的标语出现在十里店北大门的门洞上方：“贫农和中农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借此表示与中农团结的决心和愿望，以打消中农的顾虑和担忧。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农在土改开始的时候热情较高，但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以及贫雇农觉悟和政治水平的进步，贫雇农的热情被激发和调动起来，而中农尤其是老中农则显得落后了。随着划阶级以及后来贫农团的成立，一种新的对社会管理的阶层结构预期逐步变成现实：贫农为上，新中农为中，老中农为下。这种阶层结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运动的态度。

### （三）地主、富农的反应

地主、富农属于农村中的富裕阶层，他们占有村里大部分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存在剥削、压迫他人的现象。这不可避免的使他们成为了土地革命的对象。由此，我们可想而知他们对于土改运动的态度。

#### 1、想方设法规避对其不利的改革措施

改变农村中存在的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状况，启发贫雇农的政治、阶级觉悟，调动他们的生产、斗争积极性可以说是当时土改运动中采取众多措施的一个初衷或曰目标。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就意味着地主、富农财产、地位、权力等的部分或全部丧失，所以面对着这些对自己不利的改革措施，他们便会想出种种办法来逃避或减少措施实施所带给他们的损失。对此书中写道：对于共产党采取的只向富人征税的新制度，“30%确已纳税的家庭也受到了刺激开始行动起来。王邦延从他的四个儿子之中选了一个他最讨厌的送去参加八路军，因为军属家庭不但在纳税方面享有特殊照顾，而且在耕种土地方面亦可以得到帮助。其他的人另谋计策，如若不是为了逃避纳税，起码也是为了防止落到下等阶层中去。”比如，有的在新税制生效之前分家，从而使得财产处于累进税中比较低的等级之内，有的出卖土地以对付累进税，有的偷税漏税……之，“这类人绞尽脑汁、别出心裁如此这样办且成功率那么高，一直到几年以后新的村政府大权完全被广大群众所掌握时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 2、以物质实惠讨好掌权的新中农干部

地主、富农对于土改运动的这种反应也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在面临不利场景时，人们往往会有一些应激反应，这些反应既可以是害怕逃避，也可以是积极应对。在这里，地主、富农为了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除了规避之外，还会以一种较为主动的态度采取一些手段行贿干部。对此书中是这样写的：“地主非常心甘情愿地花费一些东西想讨好新干部的欢心，他们的目的就在于：起初，想减少他们的累进税，后来又想在偿还债务运动中逃避新的兑换价格的落实。虽然处于危若累卵的关头，但地主富农仍颇富裕，并且还有许多贵重物品大大方方地拿出来讨好……相应地，“干部们过去常常在地主守财奴家吃肉馅饺子”则是新中农干部对地主富农阴险、有目的的拍马屁行为而坦然接受的证据表现。

#### 3、恐吓、破坏、对抗

除了上述两种反应外，最为常见的也是我们最为直观想象到的便是地主、富农的恐吓、破坏和对抗反应了。当十里店的佃户、雇农等贫穷的家庭团结起来，组成农会以保证应有的权益时，“在事情逐渐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如坐针毡，开始发起了一个攻势：胁迫农会会员停止活动。”他们甚至公开恫吓到：“如果国民党再返回来，农会会员都免不了一死。”他们还举行了一个精心炮制的宗教仪式——烧香求神，祈祷神仙保佑国民党返回。“他们仍然留恋过去的统治制度，纯属旧制度的虔诚之徒，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采取措施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有的甚至加入由逃亡在外的地主富农组成的“地主还乡团”，发誓要使共产党领导的村子再重新归于他们的手中。

另外，他们还采用渗透法，混入到党支部，进行秘密的破坏活动。“利用区党委在日本人面前开展工作有困难的不利条件，并且充分利用涉及生死存亡这个大问题的秘密党组织，王邦延和傅守良（王，十里店第二大地主；傅，中农，地主狗腿子。引者注）趁机摇身一变，以爱国者的态度，表示弃邪归正。这就使他们曾经一度在村党支部成员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达到了他们破坏党支部工作的目的。”而当贫雇农成立的互助组如雨后春笋般地在村子里普及开来时，一些地主富农便“想通过组织和领导全寨共 90 多家的大互助组来满足他们的一定欲望，即起码可以挽回已失去的一些土地”，从而与贫雇农的互助组形成一种对抗的态势。

总之，村子里各个阶级的人们，其阶级觉悟并不是平衡发展的。新中农干部之间阶级觉悟提高得最快，这些干部曾经领导过一系列改革运动，在运动过程中，他们既改善了自身条件，又改善了村民条件，尤其是改善了与之同等的新中农条件。贫农（即还未“翻身”的人）正在改变其思想观念，但有些人对此仍然很冷淡，其他人起码有点渴望效仿比较先进而且精神比较充沛的老同伴。老中农在历次革命运动中阶级觉悟有了明显提高，一直到割封建尾巴运动为止，才受到了阻碍，这个运动使他们的觉悟发生了变化。运动已经把他们的感觉搞得一塌糊涂，不能完全确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也不能确定作为“基本群众”成员的具体位置。至于地主富农以及所有的“斗争对象”，他们反而对他们的阶级归属有非常敏感的意识，因为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们在村子中的地位和与村子新机构的关系，这些机构是：农会、妇女协会、互助组、民兵组织、村政府委员会以及最后一个但决不是不重要的村党支部。

### 六、十里店土改运动的成绩和问题

十里店经过几年的土地改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无论是农村状况还是农民状况，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这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只是，在关注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土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 （一）十里店土改运动的成绩

##### 1、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首先，农民物质生活有了较大改善。这个可以通过一组强烈对比来体现：“在各种改革开始之前的 1937 年，村里

70%的农民的生活都是极其悲惨的，一年里大部分日子靠树皮、野菜和‘稀得可以照出月亮’的稀粥糊口。”“灾荒年间，死亡或逃荒的，因贫困无力抚养子女而不得不把他们弄死或卖掉的，为饥饿驱使而到军阀队伍里当兵的，因交不起租而坐牢或因欠债而丧失自己微薄的家产的，都是穷人家里的人。灾荒对于地主和富农来说，正是趁机占有抵押品和夺得土地的极好机会。”现在，虽然贫农仍然占全村总农户的  $\frac{1}{3}$ ，但他们都有了土地。尽管财产很少，生活大大低于普通标准，但是，他们总算可以生活下去了。而且，债主或地主家的狗腿子上门夺走他们仅有的门板、被子、饭锅或瓦罐等等的威胁也不再存在了。原先的地主和富农，如今只占有他们自己过去占有的土地的  $\frac{1}{6}$ 。在十里店，再没有靠剥削他人生活的人了。“过去的经济是两极分化：地主富农为一个极端，贫农和雇农为另一个极端，而现在这种状况犹如长江之水，一去不复返。现在，农村人口主要由中等规模的土地占有者组成。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空白已经填平。”

其次，妇女在一些领域获得了进步。在旧社会，妇女地位低下，但随着妇女协会的成立以及妇女运动的开展，妇女在一定程度上已不被仅仅局限于家里，而是也参与了生产劳动，并得到了普遍响应。“抗日战争结束时村子呈现出的局面是妇女在生产方面创造了优异记录（正如她们曾经打破全县纪录所表明的那样）。她们的经济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要求迅速提高文化水平和政治地位的基础已经奠定。”

在工作队到达十里店后，妇女们参加了各片的贫农组，并参加了划分阶级的工作。其中，“80名妇女成为贫农团员，4名被选进了贫农团委员会。这些妇女又成功地发动了许多妇女加入了农会，使农会会员中有300多名女会员，而且有3名妇女被选进了农会委员会。”虽然她们的政治活动意识并不强，且实际参与也不多，但这种形式上的参与相比过去也应该看作是一个进步。

再次，封建主义遭受沉重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将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牲畜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分配给贫雇农及中农，广大群众从中受益，“使十里店更进一步向独立的中农团体方面发展”，这使得封建主义势力受到了极大地打击。另外，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家族委员会和保甲制度被打破，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 2、农民一步步觉醒

首先，摒弃旧有的宗族等封建意识，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会。在过去，家族委员会和保甲制度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阶级意识尚未萌发。随着一系列改革的进行以及阶级的划分，农民开始用新的阶级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一些旧风俗，不是正在消失，就是发生了很大变化。祭祖不再是村中常见的活动了。封建家长制正在被削弱。由村政府收税，村办小学开课，新成立的互助组解决农忙季节老乡缺少劳力和牲口的问题，以及在农闲季节筹集副业资金的问题，因此，宗族组织再也不能标榜自己的作用了。对宗族的忠诚开始让位于阶级的团结。这不仅明显地表现在农民对旧的权力结构的憎恨上，而且表现在对领导他们摧毁旧势力的共产党的坚定信赖上。

其次，对压迫者的仇恨由针对个人发展到针对整个阶级。在过去，百姓受苦，生灵涂炭，他们痛恨压迫者只能采用一种徒劳无益的个人冤屈和仇恨的形式流露出来，而未用阶级意识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共产党“使农民对阶级斗争有了清醒的认识，把斗争引导到建设的轨道上来”，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建国的关键所在，组织阶级斗争也是中共乡村组织工作的主要特色，它减少了农民的消极情绪，消除了阻塞党与村庄联系的障碍，帮助党实现了引导农民参加国家建设和消灭竞争对手的基本目标。

再次，初步培养了农民的合作意识。伴随着土地所有制的改造，进行了深刻的社会与政治变革。通过互助组的形式，劳动力初步得到了有效的利用。农民受到鼓励，一组一组地自愿结合起来，共同劳动，共同使用农具和牲口。在十里店，为发展农业生产，组织起了互助组；为当地土布着色而开设了染坊；并在村边半里路的地方烧起了石灰窑，等等。所到之处，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合作的办法所产生的热情，以及它对生活的其他地方如社会、政治和教育所产生的有益影响。

## （二）十里店土改运动存在的问题

### 1、某些干部觉悟不够高

群众对某些干部或党员之所以会产生不满情绪，导火索往往是利益纠葛，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其中，以权谋私，以权压众往往又是矛盾的焦点。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觉悟跟不上，正如书中所写：“新干部也自然而然地易受过去遗留下来的其他不良习俗所影响，这就是历代当政者内心所遵循的一个古代训谕：应从老百姓那里得到实惠。”“一些新干部在过去因贫困一直是单身汉，而现在则利用权势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朋友，或者为那些愿意给他们适当报酬的人娶到老婆。干部不仅被邀请去参加婚宴，而且还常常收到适当的红包。”另外，新中农干部们“也没有与传统的被当作执法手段的暴力行为作彻底的决裂”，这可以从他们对待犯错误人的行为中窥见一斑，如在脸上画眼镜（眼镜是地主的标识），强迫像牲口似的拴着铃铛、套着缰绳游行，或捆起来打一顿。这些处罚措施，残留着深刻的封建意识痕迹。

### 2、发动群众不够充分，存在赐予现象

党与群众的联系不仅仅是与群众中积极分子的联系，而是也包括那些尚未觉悟的群众。由此，党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不能以积极分子的态度来代替所有群众的态度。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的速度。”“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然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多数干部都表现得非常勇敢和刻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包揽一切，而不是“发动群众”……他们过分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只就拥有土地的面积来说，很难说村里谁还没有翻身；以前的斗争果实确实在贫农和无地农民中分配了。然而，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经济上的翻身是赐予的，而不是赢来的。落后的农民本应该觉悟起来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现在却消极地等待分给土地。

### 3、错误路线导致某些政策波动

由于党缺乏一定的经验，党内心理发展不够成熟，尚未形成一种持久的、共同的意志和心理倾向，这使得党在领导土改运动的过程中存在着某些政策不够稳定的现象。以 1947 年发起的“割封建尾巴”运动为例，在从地主或富农那里已经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就从还有土地和财物可分的农户中人为地划分出了一个叫做“封建尾巴”的新“阶级”。结果，在许多村子里，几乎 25%的中农因此而像地主、富农一样被划为“斗争对象”。这实际上把中农排斥出革命阵营，后来这一错误路线得到纠正。但是由它带来的危害则不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的，“那些指望从被错划为‘封建尾巴’的农户手中获得土地的贫农感到失望，有些人感到被新的村干部欺骗了。而在另一方面，中农感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威胁，甚至那些未被触动中农也人人自危，担心有一天会整到自己头上。”“中农又把破衣烂褂穿了起来，并且，注意在人前不吃白面，而只吃糙小米和玉米。有一个新中农，因为害怕有一天自己的驴子会被‘斗争’走，就把驴子卖掉，而用自己的肩膀往地里背粪。别的中农则很少往自己的地里施肥，担心土地早晚会被收走分给贫户。生产，不可避免地下降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面对政策不稳定而产生的疑虑、不信任心理，这种对政策、政权或许不能持久的担忧深深地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土改运动的深入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 七、结语

土改的过程是农民逐步觉醒的过程。几千年来，农民一直承受着封建主义的压迫。对十里店的每一个农民来说，这种压迫是与生俱来的。从农民自身的历史经验来看，从来没有过真正关心农民利益的政府，因而，一开始他们对共产党领导的土改并不相信，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冷漠的。同时，他们对今后的局势并没有把握。他们不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究竟能支撑多久，害怕国民党有一天卷土重来。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土改的过程中，一开始是迟疑的，犹豫的，他们配合地主富农的两面做法，私下与地主签订假租赁合同、假买卖合同。村干部和党支部成员采取措施以推进土改，反而使农民产生半信半疑或不愿意的心态。甚至一大批谨小慎微的农民把白天干部帮他们夺得的胜利果实，在半夜三更又悄悄地归还了地主。因而，农民的“不觉悟”，首先是由于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压迫，即封建“治绩”，其次才是农民的“落后”。只有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从实践中逐步消除他们不安全感，增强他们的信心，才能一步步提高农民的觉悟，逐步提高农民有组织地独立开展活动的的能力。这种运动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群众路线，而不是包办代替，运动群众。

共产党领导农村的这种群众运动，其基层领导只能是本地农民中的积极分子。毫无疑问，这些农民仍然具有极强的小农意识，同时，他们对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完全理解，也没有开展群众运动的经验，加之上级领导也会出现偏差，这样，工作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会犯下种种错误，甚至罪行。他们工作作风可能比较粗暴，可能会以权谋私，侵犯他人利益，等等。这是十里店的第二次土改，即土地复查和整党运动要解决的问题。

十里店的第二次土改较好地贯彻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工作组采取的办法是依靠和发动贫下中农，不断提高农民的觉悟，带领农民斗争，最终实现农民起来为自己的前途而斗争。这是农民阶级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必然过程。工作组尽力将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交给广大农民。土地复查与整党的全过程，选举贫农团发起人，成立贫农团，重新划分阶级，整党，成立村政府和村人民代表大会，查窟窿找补丁，分配果实，斗争犯错误的前村干部，都是如此。每一个过程都要召开一系列的群众会议，先是较小范围的党员会议，贫农团发起人会议，然后是全村村民会议。农民在这些会议中一步步提高觉悟，斗争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在第二次土改中，同样出现了第一次土改中出现过不敢斗争的问题。有了第一次土改的经验教训，以及工作组的不断指导纠正，很快就克服了这些困难。解决了不敢斗争的问题，又出现否定第一次土改成就和前任领导工作成绩的倾向，以及极端民主化倾向。这些问题依靠上级党组织的指导，和农民不断的争论、斗争，和运动实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

土改的过程，也是农民不断学习、实践民主的过程。数千年来，农民的命运从来就掌握在地主富农等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手里。第一次土改历时二年多。农民第一次起来斗争地主富农，分配地主的土地、房屋和生产资料。由于缺乏经验，这次土改不可避免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对农民来说，这是几千年从来没有过的大变革。第二次土改，从 1948 年 2 月 25 日工作组到达，到 1948 年 4 月 14 日召开全村总结大会，只有短短 48 天。如果说第一次土改部分存在包办代替等缺陷的话，群众则是第二次土改运动的主体。这 48 天中，农民开展了帮助党支部整党，划分阶级，选举村政府、村人民代表大会等权力机构，调整土地，分配土改果实等重大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这都是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的，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民主。一天等于二十年——对十里店的农民来说，这 48 天发生的变化比以往数千年的变化还要大。

土改并未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似乎农民从此就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生活。但是，土改之后的土地所有制仍然是私有制。单家独户的农民基本没有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市场经济中的弱势者。部分家庭由于缺乏劳动力、生产资料，由于自然灾害，或家庭成员生病等原因，将不得不出卖土地。条件较好的家庭，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土地。土地将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农村将不断分化。也就是，土改并未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如果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的结果将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化：少数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演变为农业资本家；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农业雇佣工人，或者流落城市，成为城市雇佣工人。

毛泽东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 885 页）农村的集体化，首先是通过互助组，解决部分农户缺乏生产资料、劳动力等问题。互助组这种集体化形式仍未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同时还存在分散经营，生产力低下等问题。这都是农村集体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内在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有

两条路线：一条是向后退，其结果就是农村的资本主义化，矛盾将以另外一种方式展现：大量农民破产，极少数农民致富；另一条是将集体化推向更高级的形态。自然，新的形态也会不断出现新矛盾，矛盾不断推动合作化向更高的形态发展。这样，中国农村的发展，形成了经由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逐步实现农业的工业化这样一条道路。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千百年来，农民深受封建压迫之苦，要农民站起来斗争是不容易的。但是，一旦农民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他们将可以爆发出无限的力量。这股力量可以极大地改变社会。这一论断已为其后波澜壮阔的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所证实。

**主要参考资料：**

柯鲁克,十里店（一）——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柯鲁克,十里店(二)——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

初春华.《新中国成立前土改运动的一个缩影——<十里店>中的土改印象》

## 第二章 巩固人民政权

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刚诞生，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就面临着三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对内，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残破的局面下，以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对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争取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友好同盟关系。

从多年的战争中获得了解放、自己掌握了政权的劳动群众，自然是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条件发展生产。因此，国民经济能否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极度严重的经济困难能否尽快渡过去，这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维持和巩固的根本问题，也是共和国建立之后的中心工作任务。对此，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明确地指出来了。他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此时，人民政权遇到的困难有：政治上，新的社会制度正在建立中，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工厂中的民主改革任务还没完成，有些党员干部认为革命到头了，开始贪图享受，走向腐化；社会治安上，各地存在众多的**敌特分子，封建势力依旧猖獗，还有许多旧社会的残留需要破除**；经济上，资本主义企业和生产关系还大量存在，一些资本家妄图恢复过去为所欲为的时代，并开始拉拢新政权中的干部，同时许多城市中还有许多失业或无业人员需要安排工作，而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是当务之急；军事上，抗美援朝战争要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以保证胜利，新解放地区还有大量的匪患需要剿灭。

### 第一节 镇压反革命与剿灭土匪

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前，在大陆上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有的上山为匪，有的潜伏下来当特务，有的混入人民政权内部，有的还继续压在人民头上继续为非作歹。反动势力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无时无刻不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人民和人民政府进攻，企图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明显地猖獗起来。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美国人就要打过鸭绿江来，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纷纷冒出头来，在各地制造谣言并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彻底推翻封建势力，国民党政府也代表了大地主的利益。因此，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中国大地上还遗留着封建社会的许多反动组织与分子，如会道门（如一贯道）、封建把头、地主豪绅等等。他们在旧中国是国民党政府的帮凶，在新中国是人民的敌人。

土匪原本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在旧社会中的土匪多是失地农民或无业者，他们的行为本身是反对当权者的。但是，他们客观上破坏社会生产，是反社会的，有害于普通的劳动群众。老话说“官匪一家，兵匪一家”，统治者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也经常利用土匪的力量。国民党败退大陆后，就有许多散兵逃进深山当土匪，也有一些军官借用当地的土匪力量妄图东山再起。

以上这些反革命分子经常破坏工厂、铁路、仓库，阴谋破坏抗美援朝的军运工作和经济建设。他们杀人放火，烧毁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大规模的社会混乱。他们甚至袭击、围攻县、区、乡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一九五〇年这一年，在新解放区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有三千多干部被杀害。同时，美国情报机构也派遣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内地，积极发展组织，刺探情报，并企图暗杀中国领导人。

这些都对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改造旧有的生产关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因为这些人要么是对现有的生产秩序造成破坏，甚至妄图回到已经被推翻的生产关系中去，要么是想利用手中的武器直接占用社会劳动产品的腐朽寄生虫。

#### 一、猖獗的反革命活动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新解放区还是老区，自从中共开始夺得政权以来，就不断地遇到局部的，但却是相当激烈的反抗。以下仅举几个例子说明。

1949年8月华北局的报告反映了老解放区此类案件之严重。报告称：“一、纵火。天津、安新均发生弹药库爆炸，林县焚毁仓库两处，北平电车被焚五十余辆……二、杀人。冀鲁豫26个县3个月内统计共杀人55起，死人88名，大部为匪特反革命分子所杀。自元月至今合计约有288人（被杀），这些人命案件大部与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有关。”1950年3月西南局的报告则反映了新解放区情况之严重。报告称：“二月五日在成都西南龙潭寺地区近万土匪暴乱，杀害我一七九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闻讯前往增援部队五十多名干部战士……成渝、渝黔等重要公路，渝泸等水路都被土匪掐断。”

北平（后改称北京）解放初期，敌情相当严重，治安秩序非常混乱。突出的问题是“五多”，即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多。敌特分子及反动会道门中的骨干分子，利用人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社会上一部分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制造谣言，蛊惑人心。自1949年初至1952年间，城内外不断发现谣言，严重地破坏和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生活秩序。一贯道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和利用的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北平的一贯道始自1933年，至1946年前后中层以上坛已达1360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20余万人，成为北平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北平和平解放后，一贯道即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其特点是：佛堂家庭化，道徒工商业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其“师母”孙素珍和道长张五福还经常以“喻、训、条”等形式向城郊各坛发指示，传播谣言。1949年至1950年间流传于北京城郊的大量反动无稽的谣言多数来源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于密室，企图整

顿组织，等待时机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1950年反动的一贯道总坛造谣：“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蛊惑道徒门：“别参加工作，都起来干，能文用文，能武用武。”1950年8月，每当夕阳西下，鼓楼顶端就出现大团乌云状的东西，好似冒烟，引来不少围观者。有些迷信的人，以为是大蟒成精，喷气作祟。反动会道门借此造谣说：“鼓楼冒烟，八路军要颠儿”。朝鲜战争爆发后，一贯道又有人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有原子弹，足以对付四、五个苏联。”还说：“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他们阻止道徒参加农会、妇女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等。

土匪在南方地区，如广西、四川、云南等地十分普遍。云南地处边陲，山岭众多，集结了国民党的许多败兵残将及地主特务武装。他们乘解放军初到，地方工作尚未展开的空隙，即以“抗粮抗税”、以及“配合三次大战”等等反动口号为号召，在全省大部地区组织叛乱，攻占新建立的区、乡政府，捕杀干部，劫夺公粮税款。一九五〇年五月中旬为匪焰最盛时期，股匪多达二百六十股。这不仅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且严重的阻碍着囤粮、税收、生产以及巩固国防等工作。

1950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登了一封群众来信，举报混入党政军内部的地主分子杀害当地村长的案件。河北正定三区西河村地主房洛雨，是该村唯一的地主。他的儿子房黑狗和本家孙子很早就混入中共内部，并在军队和村委会内占据要职。因此，房洛雨自称是军属、拥护共产党。一九四七年冬实行土改时，该村群众都很害怕他，不敢斗他，只分了他家一些东西。一九四九年阴历七月初，他儿子房黑狗从察哈尔军区卫生部回来结婚，并和他爹阴谋杀害了村长康玉环，并打伤数人，因为村长是贫农，土地改革中的积极分子。该村支书和县司法科的干部因受了房家的贿赂，替房家遮掩案情，马虎了事，很快释放了房洛雨，给房黑狗轻判。

建国前大足的匪患在重庆地区是数一数二的。国民党曾多次派兵进剿，也并未能彻底铲除。建国初期当地土匪与国民党溃兵同流合污，社会环境显得更不安宁。而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土改的进行，共产党歼灭的大足土匪共计近2万人，并枪决了一批匪首恶霸（如大足县枪决了段西铭、黄庆云、张妙山、杨绍、张荣海等人，龙水也枪决了胡代仁、李国卿、杨俊德等人），大足境内的土匪被完全肃清，当地的社会秩序得到了安定。

##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发动

在反革命分子日益猖獗的情况下，一些地方的领导部门和干部却存在着严重的和平麻痹思想和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工人气愤地质问干部：“看！我们竞赛（指生产竞赛）几个月，特务放一把火就完蛋了；再不镇压，说什么我们也不竞赛了。”

为了伸张民气，巩固政权，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不可避免的，是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继续。

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公安部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据此在许多城市开展了敌特党团分子的登记工作，通过警告、群众检举等上下结合的方式，逼使原国民党特务机关人员及其国民党和三青团骨干分子主动交代身份，以便摸底排队，掌握城市中敌对分子的状况。与此同时，各相关部门领导人亦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呼声和要求。

据中央政府委员彭真的报告，政法委员会派出两个工作组前往察哈尔省的宣化及河北省的唐山两个专区进行了司法调查，发现“在正确地纠正了‘乱打乱杀’的偏向之后，现在不少地方宽大政策又偏差到‘宽大无边’，宽大到‘灭自己志气，长匪特威风’，宽大到助长匪特气焰，脱离人民大众的程度了。”彭真的报告成为此后大规模镇反运动开展的一个重要的根据。《南方日报》1951年3月9日的社论中就写道“在去年秋冬以前，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很少治罪，于是反革命分子越发大胆，公开说进监狱就是‘住旅馆’，‘住招待所’，出来后照样作恶。甚至发生过匪首八擒八纵，最后还是跑了的事。”社会经济生产的恢复和人民镇反积极性受到了很大影响。

1950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他鲜明地肯定了镇压反革命的极端必要性，但同时他也明确告诉与会者，当前一切工作的重心，还是在“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为什么不能把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当作重中之重？他做了详尽的解释。他说：第一，“我们已经在北方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今年秋季，我们就要在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这样广大的地区开始土地改革，推翻整个地主阶级。在土地改革中，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

第二，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再加上战争已经带来了很多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尤其是“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而因为战争破坏和经济改组所造成的失业的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也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包括一部分农民也不满意我们。

因此，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城里“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同时“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来改善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通过举办各种大学和使用知识分子，使他们不反对我们。而在农村，则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总之，“就是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不是不要搞镇压反革命运动，而是要分清轻重缓急，“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这其实也正是毛泽东在军事上所擅长的“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的一种运用。

但是，在几个月之后，随着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不得不准备出兵，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引起国内特务的大规模活动。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美国及其联合国军队的大举卷入，原本就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心理。特务分子以及各种不满中共政权的旧势力散布的各种谣言，更是在许多偏远地区和农村，造成了民众的惊恐不安。由于各地农村都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基础，结果自然也就便利了国民党地下潜伏及派遣人员的反



抗活动。在10月前后，仅华北地区就发生各种暴动十余起。规模较大的就有：河北武安县“黄兵道”武装暴动事件、山西稷山县国民党流散官兵袭占五区公所及县府事件、河北省通县“全佛大道会”暴动事件等。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还对我军后方的安全与军事行动的秘密，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于是，毛泽东对镇压反革命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彻底清除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时机。10月10日，他亲自主持通过了新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

十月十六日，公安部召开了全国公安高级干部会议，具体部署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反指示。随即，一场以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和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一些地方按照“双十”指示的要求，公开判决，发布消息，声势搞得较大。但这却又引起了中共中央某种程度上的担心。这是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屡次发生肃反运动扩大化的情况，再加上1947年华北土改和1949年进城后一些地方发生过乱捕乱杀的现象而不得不加以纠正。因此，运动刚发动一个多月，刘少奇就开始紧急部署适度降温，又强调要注意策略。刘少奇在干部会上明确提出：“镇压反革命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即是要有计划、有重点的去进行宣传工作。对重要案件，必须发布重要新闻，并配合以通讯、短评、社论等进行系统的报道，以一儆百。但对一般案件，则不必亦不应件件报道。在报纸上过多地宣传杀人，亦恐产生副作用。”

这个时候，运动不过刚刚开始，除北京、天津和少部分基层外，多数地区尚未真正行动起来，动员、宣传和教育群众的声势都尚未造成，有些地方的领导人对这项工作认识不足，优柔寡断，行动不力。

这时，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放手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送来的综合报告。报告反映，在湘西地区的镇反中，先是存在着不敢“开杀戒”的问题，在开了杀戒以后，又出现了杀人过快过多的问题。报告对这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复电黄克诚，肯定湖南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并对全国镇反运动提出了指导方针：“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在“稳、准、狠”这三个字中间，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准”。只有打得准，才能做到稳，也才能打得狠。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他看了中共中央中南局转报的湘西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一批匪首、恶霸、特务的报告，立即转发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充分肯定四十七军的做法，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脱离群众。”“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广西镇反报告时又指出：广西军区在剿匪工作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宽大无边，“以至匪祸猖獗，达于极点，土匪越剿越多，人民受害极大”。后来他们纠正了这种错误，“情况就完全改变过来，匪焰大降，民气大伸”。

毛泽东认为，镇压反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仅要在共产党内有清楚地认识和了解，还要向知识分子、工商界、宗教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作广泛的解释。黄炎培是党外人士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亲自向他作解释工作，并且送一些镇反材料给他看。

在一九五一年一月，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胜利结束之后，毛泽东的注意力从朝鲜前线的军事斗争转到了国内的镇反工作。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起草了一二百份这方面的批语和文电。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重要事项。在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决议要点中，对镇反运动作了五项规定：“一、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二、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三、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四、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五、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从此，镇反就分为外、中、内三层区别进行。外层，指社会；中层，指军队和政府机关内部；内层，指党内。

镇反运动在向纵深发展。三月十三日，一个严重事件在山东军区发生了，军区政治部主任黄祖炎在一次会议上被惠民军分区政治部的一名副科长刺杀。经查，这个副科长在历史上曾向敌人告密出卖过两名共产党员，镇反中被群众检举，因而行凶报复，并当场自毙。

这一事件，在党内引起了震动。这样的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为过去所少见，在建国后更是首例。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要求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务必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要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毛泽东及时而周密地作出部署，这对于保证党政军首脑机关和公安部门在镇反运动中的安全，十分重要。自此以后，再没有发生像山东军区那样的事件。

毛泽东在指导镇压反革命这场重大的斗争中，十分注意研究各地方各部门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他写的批语，态度鲜明，政策明确，语言尖锐，而又十分讲究分寸。对于各地各部门的镇反工作，凡做得好的表扬之，做得不力的催促之，做得不对的纠正之。雷厉风行，一抓到底，不抓出成效决不罢休。提出任务时，有具体要求，有时间限制，有时还指定由哪个人具体负责。拖延不办者，立即通报批评。为了准确掌握运动的发展情况，他还要求全国二千多个县委和市委的书记都向他写一个报告，与他直接通信一次。

由于镇反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捕杀地方恶霸，以及惩处那些历史上曾经危害共产党人的分子为重点，间接取缔打击任何可能结成团伙的社会黑恶势力，藉以发动社会上的积极分子，组成联防及居民治安小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

据开封老工人回忆说：镇反时，开封发现了许多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和老兵，一个月都会审判枪毙好几批。当时政



府发动群众举报，通过居委会了解可疑人的情况，进行登记信息，派出所加强巡逻。工人们自发参加护厂队，组成缨枪队，不分男女，轮流看守工厂。目的是防火防盗，防特务破坏，防坏人造谣，防迷信和“一贯道”。镇反时也有一些冤假错案发生。当时是对罪大恶极的才给予处决，罪行小的进行批评教育并继续安排工作，并由群众监督。1951到1952年，社会上的反革命势力比较强大。

镇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各阶层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一大批匪首、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受到惩处。

但是自3月以来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结果，是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由于多数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况，无法完成千分之零点五至千分之一的处决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强凑数，加上各地都没有足够的公检法机构和人员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审理如此多的杀、关、管案件，结果是多数案件都未能经过严格审理。相当多的人犯只是基于历史上有所谓“劣迹”，量刑的标准已远远超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的规定，自然更不重视“现行”与否。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

湖南衡阳茶市以刘伯禄为首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因多数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组干部靠“逼供信”怀疑当地有“反共救国军”，因此相信以刘为首的当地党组织和其所领导的青年团、农会和励淬学友会等组织，即系“反共救国军”及其外围，进而将刘定为“匪特头子”、“恶霸地主”。结果200余人受到株连，许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枪毙，5人被判刑，4人被开除公职，1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活动，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并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同样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之中。

正因为担心自己的命运，镇反开始后，沿海地区就不断发生内地居民纷纷偷渡逃难到香港和境外的情况，影响所及，至今余波未尽。

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及时提醒各地注意。

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劲头不足和草率从事的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四月二日，他再次强调：“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

4月20日，他专门致电各中央局书记称：虽然2月中央会议决定先规定杀人数以人口千分之零点五为准，但“现在西南已达千分之一，中南和华东的某些省区亦达到千分之一，个别地方且已超过。一般地看来，华东、中南、西南三大区似乎均须超过千分之一的比例才能解决问题。但是，超过太多似乎不妥……应将许多犯人列入为无期徒刑，离开本县，由国家分批集中，从事筑路、修河、垦荒、造屋等生产事业……”

### 三、谨慎收缩，处理积案

从一九五一年五月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为实行这一方针而采取的首要措施，是收回原来下放给下级的捕人批准权和杀人批准权。为实行谨慎收缩方针而采取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

在前一阶段镇反工作中，逮捕并迅速处理了一大批犯有死罪、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群众拍手称快，对嚣张一时的反革命破坏活动起到了震慑作用，有效地维护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但是，杀人多了，即使都是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也总会在社会的一部分阶层中引起不安，甚至会丧失社会同情。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政策，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死缓”，是毛泽东结合实际的一个创造。

五月八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

毛泽东估计，这个政策的实行，可以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而对其中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

毛泽东上述两项重大而有力的措施的提出，从根本上防止和纠正了镇反高潮中曾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乱捕乱杀的“左”的偏向，从而保证镇反运动的健康发展。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提出的两项重大措施，一九五一年五月十日至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规定：关于杀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内，农村不应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一般应低于千分之一，一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严格掌握捕人和杀人的批准权。对于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大部实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认真清理反革命罪犯的积案。抓紧对外国反革命分子的打击。普遍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

然而，除对少数地方外，这并不足以根本解决捕杀数字过大的问题。特别是对收缩方针和死刑缓刑问题，不少地

方都发生了思想混乱的情况。

用华北局的说法就是：“各地在传达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后，曾引起一部分群众以至中下级干部的怀疑、不满与情绪低落。”

一向高度重视群众情绪的毛泽东，不得不转而发出指示强调：“‘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

中央在5月16日决定：自即日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

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匪祸，曾经使旧中国的历代政府大伤脑筋，其中尤以湘西、鄂西和广西的匪患为甚。解放初期，全国有二百万土匪，杀人放火，残害人民。经过剿匪、镇反，这些盘根错节的匪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根除。而长期在城市中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百姓的黑社会势力，也在镇反中被摧毁，销声匿迹。社会秩序空前安定，人民群众交口称赞，说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功德无量。

与此同时，一批潜入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国外敌对分子，也被逮捕法办。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情报机关陆军战略情报处的潜伏组织，在天津被破获。八月十七日，图谋在一九五〇年国庆节炮击天安门检阅台的主犯李安东（意大利人）、山口隆（日本人），在北京被处决。在上海、南京、重庆、太原、石家庄等地，还相继取缔了国际性秘密反动组织“圣母军”，并将首要分子依法惩处。

在镇反运动中，一批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者欠有血债的重要反革命罪犯，也被捉拿归案，得到应有的惩罚。消息传来，民心大振，显示出人民民主专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巨大威力。

镇压反革命，采取了大规模政治运动的方式，集中解决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及各种匪患、黑社会势力等等。这是在新中国刚刚建立、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法制基本没有建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要选择。在这次群众运动中出现过一些偏差，包括错杀、错捕等。这些偏差一经发现，便及时地加以纠正，基本上保证了运动的健康进行。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总结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的时候，郑重宣布：“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

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2620000余名，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000余名，关了1290000余名，先后管制了1200000余名。捕后因罪恶不大，教育释放了380000余名。”以被处决人数71.2万这个数字来计算，它已经达到当时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了。

#### 四、政策与文件

##### 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写的几段指示。

一

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激烈的和复杂的斗争。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凡是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凡是大体上遵照了这个路线，但没有完全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大体上正确但不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这个工作路线是继续深入镇压反革命工作和取得完满胜利的保证。在今后镇反工作中必须完全遵守这个工作路线。其中最重要者为严格地审查逮捕和判处死刑名单，和广泛地做好宣传教育。做到了这两点，就可以避免犯错误。

二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迅即执行。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此外还应明确地规定：凡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三

为了防止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发生“左”的偏向，决定从六月一日起，全国一切地方，包括那些至今仍然杀人甚少的地方在内，将捕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地委专署一级，将杀人批准权一律收回到省一级，离省远者由省级派代表前往处理。任何地方不得要求改变此项决定。

四

对于“中层”和“内层”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加以清查。决定遵照中央指示在今年夏秋两季，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其目的是弄清情况和处理一些最突出的问题。其方法是学习镇反文件，向着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号召他们中间有问题的人(不是一切人)用真诚老实

的态度，交清历史，坦白其隐藏的问题。这种坦白运动必须由首长负责主持，采取自愿原则，不得施行强迫。每一单位时间要短，不要拖长。其策略是争取多数，孤立少数，以待冬季的进一步清查。对于首脑机关、公安机关及其他要害部门，则须首先加以清查，并取得经验，以资推广。在政府系统、学校和工厂中进行此种清查工作时，必须有党外人士参加此种清查工作的委员会，避免由共产党员孤立地去做。

## 五

全国各地，必须在此次镇压反革命的伟大斗争中普遍地组织群众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此项委员会，农村以乡为单位，城市以机关、学校、工厂、街道为单位，经过人民选举组织之。委员人数少者三人，多者十一人，必须吸收可靠的党外爱国分子参加，成为统一战线的保卫治安的组织。此项委员会受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的领导，担负协助人民政府肃清反革命，防奸、防谍，保卫国家和公众治安的责任。此项委员会，乡村须在土改完成之后，城市须在镇反工作开展之后，有领导地进行组织，以免坏人乘机侵入。

### 五、群众运动与群众路线

国家机关、军队不是独立于社会各阶层群众之外的存在，是为统治队伍维持统治服务的工具。当人民掌握了政权，人民就需要用政权的力量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革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势力、组织形式、习俗等等。镇压反革命、清剿土匪等运动，是人民维持正常生产、保证安定生活的需要；运动的进行，是党和群众相互教育的过程；运动的成功，是群众充分参与的结果。

### 人民手中的新北京

#### 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

1950年上半年，北京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反把”斗争。这是解放后最早的一次工人群众反对封建把持势力的运动。

当时的搬运行业，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和排子车。全市搬运工人共有21263人。他们完成全市的货运量的80%，在货物运输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北京解放后，党和政府把搬运工人从苦难深渊中拯救出来，但在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势力还很严重，仍在压榨、剥削广大搬运工人。

北京解放前，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势力有3种。一是“搂包”，由于国民党当局在各火车站设卡收税，旅客的行李、货物都要几经检查，为了避免麻烦，旅客往往托人力夫代为搬运，办理检查手续，后来就称这些人力夫“搂包”。时间一久，车站的搬运业务逐渐由“搂包”头子所控制，搬运工人被“搂包”支配。这种封建“把头”与关卡人员、警察相互勾结，货物行李可以不经车站检查。二是“锣车”，是敲诈、拐骗旅客的又一种恶势力。三是“猴车”，是专门敲诈嫖客妓女的流氓，专为帝国主义分子凌辱中国妇女搭桥引路。

解放以后，一些罪大恶极的“搂包”头子跑了，有的假装进步钻入工会，继续控制工人，有的公开把持一方，挑动工人互斗，造谣中伤，辱骂共产党，无恶不作。“锣车”在解放后仍继续作恶，盘踞在车站出口、中航公司门口及旅馆门外，“搂包”勾结，欺骗旅客。而“猴车”仍集中在东单、王府井、米市大街一带，成群结伙，霸占地段，为暗娼嫖客搭桥引线。据调查，当时全市共有“搂包”、“锣车”、“猴车”三四百人，他们压迫剥削搬运工人，坑害顾客，败坏社会风尚，不废除这种封建把持势力，搬运工人就谈不上真正翻身。

1950年2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搬运工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设立搬运公司废除各地搬运事业中封建把持制度向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参加此次会议的北京代表回来传达大会精神后，广大搬运工人纷纷要求对北京搬运事业中的封建把持势力开展斗争。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成立了搬运工“反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市委秘书长顾大川、市总工会搬运工作委员会主任彭思明和市公安局领导同志组成。在各级政府的协同和支持下，领导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

从2月份开始，“反把”领导小组分期分批举办工人训练班。前门东、西车站共有排子车工人450人，大车工人96人，车站装卸工人50人。该车站地处闹市区，工人集中，又是封建把持势力的大本营。北京搬运工人的“反把”斗争，首先是从这里开始的。通过举办工会干部和工人积极分子短期训练班，召开控诉会，不到10天，仅前门西车站就揭发出27名“搂包”，其中罪恶重、民愤大的有7名。“反把”领导小组于3月10日拟订《为控诉大车、排子车、装卸工人中的封建搂包的请示》上报市委。3月17日由市公安局主持，在前门西车站（前门箭楼西侧正阳门市场）召开控诉“搂包”头子李明、金广泉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前门车站排子车、大车和装卸工人445人，各区、各门头、车口的装卸、大车、排子车工人代表399人，各区干事19人，其他群众近1000人，连同围观群众达3000人。这次大会，在工人中影响很大。从3月下旬开始，“反把”领导小组举办了包括搬运工会34个分会干部和积极分子参加的全市性的工会干部训练班，参加人员达170多人。同时抽调29名干部，组成4个工作组，分别帮助4个区开展“反把”斗争。在各区委直接领导和市“反把”工作组的帮助下，广大搬运工人在很短时间内就揭发出“搂包”137人。经市委领导彭真、刘仁批准于4月5日在前门西车站召开了全市搬运工人公审“搂包”头子李明大会。对李明这个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搂包”头子，市公安局接受工人的强烈要求，依法判处死刑，当天执行。广大搬运工人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从此“反把”斗争推向高潮，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摧垮了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共逮捕了罪大恶极的“搂包”头子43人。在“反把”斗争中，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罪恶轻重和悔改自新程度，“搂包”分子进行了分别处理。对罪大恶极的由公安部门逮捕，法院宣判处刑。对一般把头只要低头认罪，经工人认可，允许他们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北京搬运行业在取得“反把”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由下而上逐级建立三轮车工会、排子车工会、装卸工会。1950年4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废除搬运行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建立搬运公司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搬运公司筹备处。5月4日筹备处组成，1950年8月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搬运公司。从此北京搬运工人在党的领导下，

在搬运公司的具体组织下，成为首都建设大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 取缔一贯道

一贯道是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掌握和利用的工具，是欺骗与陷害落后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北平的一贯道始自 1933 年，至 1946 年前后中层以上坛已达 1360 余个，家庭佛坛无数，道徒 20 余万人，成为北平地区最大的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

北平和平解放后，一贯道即转入地下，隐蔽活动。其特点是：佛堂家庭化，道徒工商化，言语现代化，行动群众化。其“师母”孙素珍和道长张五福还经常以“喻、训、条”等形式向城郊各坛发指示，传播谣言。1949 年至 1950 年间流传于北京城郊的大量反动无稽的谣言多数来源于此。同时他们还策划于密室，企图整顿组织，等待时机进行反革命武装暴乱。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心取缔一贯道，镇压少数首恶分子，挽救广大受骗道徒。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自 1950 年 1 月 19 日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一面采用专案侦察等手段与一贯道等反动会道门的造谣破坏活动作斗争；一面派出人员组成专门小组，有重点地对一贯道作系统深入的调查摸底工作。1950 年 6 月 7 日，市公安局采取果断措施，将活动猖獗、有明显罪行的一贯道首要分子刘燮元、穆肇增等 11 人捕获归案，狠狠打击了该道的嚣张气焰。当年 10 月，市公安局拟定《北京市处理一贯道计划》（草案）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一贯道布告》。经市委审定后于 12 月 3 日报中共中央、华北局审批。

《计划》提出了对一贯道的处理原则：（一）点传师以上之重要分子及其他有政治破坏行为者逮捕法办。（二）点传师以下坛主以上（含三才）勒令登记，加以甄别，实行管制，监视改造。（三）对一般道徒号召退道，凡脱离组织、停止活动者即宽大处理，免予究办。《计划》还对逮捕、登记及宣传等项工作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注意事项作出详尽规定。

1950 年 12 月 18 日夜至 19 日晨，市公安局及所属各分局全面出击，将全市 130 余名一贯道重要道首（除孙素珍、张五福等少数道首事前闻讯潜逃外）一举抓获。并当场搜出大量反动罪证：日伪及国民党特务证件、潜伏活动计划、手枪、刺刀及埋藏的大量金银资财等。其惨淡经营了十几年，遍设机关暗室的兴华寺总坛被查封。同时，由北京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也在全市大街小巷贴出。19 日，《人民日报》及首都各报均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和逮捕反动道首的消息，并发表了社论和短评。

为使登记和退道工作进行顺利，由党、政、群众团体抽调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在市委统一安排下，于取缔当日分别深入到有一贯道徒的工厂、矿区、村庄、街道，向群众做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市郊各区、县也分别由派出所或区、县委召开工商、妇女、学生、居民等各类积极分子会或群众大会，号召登记、退道。有的还深入居民院进行宣传演讲，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避免了因大批逮捕而使市民、特别是广大道徒产生不必要的恐慌。

在强大的舆论配合下，市公安局下属各分局在管区内设若干登记点，组成登记小组，负责登记、谈话、记录及整理证物工作。对那些毫无悔过表示，抗拒和破坏登记，或登记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者，市局则采取果断行动给予严厉制裁。这样，前往登记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人是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实际人数比原掌握数字庞大得多。

为了最大限度地唤醒受骗道徒，孤立少数反动道首，使之从组织上、思想上彻底土崩瓦解，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方法：（一）利用报纸、电台发动舆论攻势。（二）召开各种群众大会动员宣传，揭发控诉一贯道罪恶。（三）举办一贯道罪证展览。（四）动员道徒索还道歉、诈款及被霸占财产。

北京市取缔一贯道工作历时两个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役先后逮捕反动道首 381 人；枪毙王钟麟、张承忠、刘翔亭、穆肇增等重要道首 42 人；登记点传师 720 人，坛主 4775 人，三才 663 人；声明退道者 178074 人；封闭大小坛 1283 个；发现并摧毁了其隐蔽的核心组织“号”、“善”、“里”等；没收道产 23 处（房 9 所、工厂 3 所、商号 11 所及义地、果园等）；633 名道首退出道费约 50 亿元（旧币），五分之二退道者受益。

经过这场斗争，一贯道从组织上和思想影响上被彻底摧毁。从此全市治安情况明显好转，谣言显著减少，十几万退道群众将佛坛取消，开始安心生产，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气焰则被压了下去。

1951 年 2 月 28 日，中共中央将北京市委取缔一贯道报告批转全国，并在批示中对北京的经验给予了高度评价：“关于摧毁一贯道，北京的经验是很成功的。（一）是长期侦察布置，不是仓促举行；（二）是临事向群众宣传，孤立道首；（三）是布置展览会；（四）是与反迷信分开。以上各项可作各地参考。”

### 消灭社会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

解放初期，北平的治安秩序非常混乱。突出的问题是“五多”，即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多。

市公安局根据中共北平市委提出的“安定社会秩序，消灭混乱现象”的指示，结合入城后复杂的社会情况和严重的混乱现象，确定了治安工作的方针是：“有计划地集中力量，消灭混乱现象，建立革命秩序”。总的作法是，肃特与治安工作密切结合，同步进行。市公安局以抓肃特为主，但不放松治安管理工作；各公安分局以治安工作为主，但又配合进行肃特工作。市公安局统一领导部署全市的肃特和治安工作。

根据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指示，在市军管会领导下，由平津前线卫戍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副主任：徐冰；委员：谭政文、张廷楨、李青川、张迺青、张明河、赵苍璧、武创辰等。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发布了《关于治安运动的指示》，重点是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游勇、收缴枪枝武器为中心的治安运动。同时，各区也都成立了由警备部队、纠察队、区公安分局局长、区委书记等参加的区治安委员会，加强对治安工作的领导。

1949 年 2 月 5 日，北平市军管会颁布了《关于收缴非法武器的布告》。2 月 12 日，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发布了《关

于责令国民党宪兵十九团官兵限期报到、登记，交出武器、证件的布告》。2月16日，北平市警备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卫戍部队、市公安局组成了“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发布了《通告》及《北平市流散国民党官兵登记收容办法》的布告。“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下设3个分会，各区均设有收容所。

经过收容、抓捕、打击几个步骤，散兵游勇被清除了。市公安局直接清查、收容流散军人10789名，收缴长短枪4799支、各种子弹425042发、手榴弹9578枚、地雷140余箱、炸药91箱及其它军用物资。

市公安局根据北平市军管会关于《严禁银元在市面流通买卖》的布告和市委关于“必须严厉打击银元犯”的指示，制订了《处理银元问题的方案》，3月3日至10日，全市集中力量开展了打击“金鬼子”，取缔银元黑市的工作。市公安局采取一面秘密侦查，一面发动群众检举的方法，对首要分子侦捕法办，对一般的群众进行教育。全市共查获倒卖金银案1522起，抓获人犯2640人，缴获黄金81662克、白银2683两、银元48928元。

5月23日，市政府召集各区摊贩代表座谈会，彭真、叶剑英亲自到会并讲话。次日，市政府公布了《北平市人民政府管理摊贩办法》、《北平市人民政府处理棚户办法》，组成了由刘仁领导的整理摊贩指挥部，开展全市整理摊贩工作。各区也相继成立了整顿摊贩委员会。至6月13日，全市共登记摊贩50029户。根据“择地迁移”和“就地整顿”的原则，将46229户摊贩分别集中到13个新市场和不妨碍交通的街道上营业。从而，使混乱的交通秩序也得到整顿。

5月27日，市政府又颁布了《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并组成了由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人民法院、纠察总队和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等单位参加的“收容处理游民乞丐委员会”，收容乞丐、小偷，对其实行强制劳动，使其走上正路。在此期间，公安局共抓捕小偷2102人，收容乞丐248人。其中，年轻力壮者260人被送劳动大队，参加修治黄河或送至察哈尔开荒种地；老弱者516人被送安老院从事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176人被送往习艺所加以教育、改造、学习生产技能；93名妇女被送去学习缝纫技术；69名幼童送至育幼所学习。通过以上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小偷、乞丐的生活出路问题，社会盗窃现象明显减少，治安秩序趋于好转。

### 组织劳动生产大队，改造城市无业游民

北平和平解放后，全市无业人口有40至50万。这部分人成份复杂，既有乞丐、小偷，也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如何解决这部分人的劳动就业问题成为十分棘手的事情。北平市人民政府根据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聂荣臻1949年4月16日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扩大会议上的提议和市委书记彭真针对无业人员提出“需要疏散就业，能劳动的动员下乡生产”的方针，逐步将这些人收容起来，通过劳动，启发他们的觉悟，使其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5月25日，北平市首批由这部分人组成的劳动生产大队离平南下到冀鲁豫河西县黄河管理委员会第四修防处报到，全队共450余人，其中有乞丐、小偷121人，流散军人326人，由130名荣誉军人担任生产大队的各级领导，由民政部荣军管理处副处长刘敬修负责，另有随队医生2名。

在对这些人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劳动、改造、教育、团结”的方针。劳动生产大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大队长到班长都和队员们生活在一起，而不采取监工的态度；劳动生产大队内部发扬民主，允许队员们选举自己的伙伴充任副班长，自己管理自己。劳动生产大队的分配办法，贯彻以工代赈的原则，以挖河时的土方多少计算工资；队员调动工作或因自然条件不允许做工时，仍能得到伙食的供给；对无衣被者，由政府先行贷给，而后从其工资中偿还。这些办法得到被改造者的拥护。

这与国民党时代抓劳力做苦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北平市人民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城市无业游民这一阶层的问题，得到了包括这些无业游民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也为其它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提供了改造城市游民的经验。

## 广州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是运动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贯彻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惩办“浮”在面上的反革命分子。其中3至5月中旬形成了高潮，镇压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1951年4月25日，广州市在中山纪念堂广场召开控诉反革命罪行大会，5万多人参加，73万人收听有线实况广播，会后，198名罪恶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被处决。群众对此拍手称快，还有不少受迫害的市民专程跑到小北市郊观刑。在短短3天里，市民寄到市政府的支持和检举反革命信件就达3万多封，掀起“人民齐镇反”的高潮。广州公安机关在文化公园将抓获的特务游街示众，向市民进行反特宣传。

## 天津的镇反运动

根据中共中央的“双十指示”，天津市委、市政府在以后的两个月内，通过各种渠道，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宣传活动。10月25日至12月16日，天津市公安局在第八文化馆举办了“肃特展览会”，参观展览的群众达10万余人。许多人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观后感，纷纷要求政府严厉镇压反革命。

与此同时，还相继在各工厂、企业和街区召开控诉、揭发大会200多场，参加的干部、群众达40多万人次，深受迫害的群众纷纷上台揭露控诉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西楼街居民郑洪奎义愤填膺地控诉了人称“阎小鬼”的恶霸阎玉田的滔天罪行。他说：“‘阎小鬼’为霸占我的妻子，想把我害死，我只好离家外逃，忍饥挨饿，省吃俭用，熬了8年攒了点钱回来养家糊口，可到家一看，我哪还有家呀！老婆被‘阎小鬼’霸占后，妈妈被气死了，哥哥、弟弟得了伤寒病也都死了，一家子都完了！可‘阎小鬼’还不放过我，又让特务来抓我，我只好四处流浪，害得我无家可归，有冤难申呀！今天才有申冤的日子，我要求政府给我报仇。”听了他的控诉，全场群众齐声高喊：“枪毙‘阎小鬼’，为被害人报仇！”

在经过反复侦查、掌握充分罪证的情况下，1951年3月13日晚，天津专区集中了公安干警、军队、民兵、机关干部和各界群众近万人，对全市范围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一次突然性的大搜捕。搜捕队带着公安机关开具的拘票，凭



票捕人，拘票上写明了被捕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住址，避免乱抓人、抓错人的可能性。这一经验不久就成为“镇反”运动中的规范化典型，并在全国推广开来。

大搜捕后，为了大造“镇反”声势，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3月29日在民园广场召开了万人的群众大会。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转播了大会实况，收听的群众约50万人。黄敬市长、许建国副市长在会上讲话，受害者及家属进行了控诉，各界代表相继发言，一致声讨反革命分子的罪行。这次大会在全市引起强烈反响。会后两天，电台收到各界群众来信1252封、接到电话3000多次，群众一致拥护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强烈要求枪毙那些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为百姓申冤，为受害者报仇。

依据中央指示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1951年3月至7月，天津市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分别在小王庄、中山门外、小孙庄、西营门和墙子外等5个刑场，分3次集中处决了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

3月31日，是天津人民值得庆贺的一天。在得知今天就是为老百姓申冤报仇的日子后，激动的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这一令人兴奋的消息。一大早，刑车从监狱中缓缓驶出，车上的反革命分子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威风，个个面无表情地耷拉着脑袋，他们在向人民低头认罪。一路上挤满了观看的人流，所到之处，老百姓们使劲地拍着巴掌，高呼着“坚决镇压反革命”、“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等口号。万名群众也跟到了小王庄刑场，有人自发地维持着秩序，附近的居民还挑来水，泼洒在大街上。在现场召开公判大会后，一个个反革命分子就地伏法，清脆的枪声在天空中回荡。

当场被处决的有国民党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伪国大代表、黄色总工会常务理事苑宝璜，有解放前独霸天津脚行业的总把头巴延庆及长期把持“六号门”的马文元，还有企图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反动会道门头子王紫泉、李桂荣等193名反革命分子。解放前儿子被巴延庆活活折磨致死的老太太，亲眼目睹了巴延庆的可耻下场后，一下子跪倒在地上对上苍高喊着：“儿啊，你看见了吗？是共产党为你报仇啦！”激动的人们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

这天，许多家庭都包饺子、吃喜面，以示庆贺。这天，是津城人民扬眉吐气、笑逐颜开的一天！

4月29日和7月10日，又先后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其中有解放后仍秘密串连、发展组织、阴谋推翻新生政权的反动一贯道的道主王义、道首邵百禄，有为日本人卖命的汉奸市长温世珍，有开设妓院、奸淫妇女的恶霸窑主李凤歧，还有帮助日寇一次残杀我1200多名同胞、制造了“潘家峪大血案”的汉奸朱世荫。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全国公演的话剧《六号门》是天津搬运工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编自演的，剧中的脚行把头马金龙的原型就是十恶不赦的马文元。马文元依仗官府势力，残酷剥削搬运工人，他规定“三七”劈账，而实际上是他独得三成，另七成由车主与工人（每车两人）均分，即车主得两份（车一份、牲畜一份），两名工人各得一份，但车和牲畜又都是他的；此外，工人还要担负鞭子钱、车油钱及沿途警察勒索的“车底钱”，工人实际收入只占全部运费的10%。为争夺地盘，他还命令工人与其他脚行发生火并，工人郭四就是在与季家楼脚行的械斗中丧生的。不久，郭四年迈的母亲因悲愤过度而自杀身亡。装卸工人屠老蔫在工作中受伤，马文元不但不予救治，还不许其他工人管，致使屠老蔫不治而死。

津门巨奸温世珍在“九·一八”前就与日寇勾结进行卖国求荣的活动，天津沦陷后，又出任汉奸市长，先后组织“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对全市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为了支持“大东亚圣战”，他在全市强制实行粮食统配制度，老百姓吃着霉烂变质的“杂合面”，抱病街头，无人问津；1939年天津遭遇特大水灾，他借防汛之名，抢购大宗麻袋，经过勒索回扣及虚报进价等方法，大发救灾财达60多万元。

这次处决的还有参与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刽子手、“军统”特务吕一民。1934年11月9日，在“军统”特务天津站站长陈恭澍的指挥下，吕一民伙同王文、吕问友和杨华庭等4名匪徒，在天津国民饭店二楼45号，企图刺杀吉鸿昌将军，“二吕”持手枪闯进房内，同时向屋内的4人开枪，当场将吉鸿昌的左臂击伤。行刺后，吕一民潜逃至北平，在西单某饭店暂避风声。1935年戴笠亲自将其提升为“军统局”直属天津情报组组长。“如虎添翼”的他，到处搜集情报，陷害革命志士，残杀无辜群众。天津解放后，“二吕”拒不登记，隐瞒特务身份，继续造谣破坏。但是天网恢恢，“二吕”终于被我公安人员逮捕归案。

### 老太太小学生齐上阵抓特务

沉默了许久的人们终于发出了正义的呐喊，随着一排排枪声，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恶霸、特务们纷纷陈尸荒野。欠有血债而尚未归案的反革命分子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四处奔逃躲藏。但他们哪里逃得了，哪里藏得住？

西站附近的一个大杂院里住着一位姚大娘，她家对面是被管制分子杨法章的家。西站派出所的同志找到姚大娘，要她监视杨法章的行动。此后，姚大娘白天经常去杨家串门，夜晚姚大娘把灯熄了，也不挂窗帘，坐在炕上监视着对面的动静。

1951年3月9日夜里2点多钟，姚大娘看见杨家的灯忽然亮了，屋内有人影来回走动，她马上警觉起来。一会儿，从杨家溜出了一个扛着大铺盖的人，慌慌张张地开了大院的门就往外跑。姚大娘马上意识到：特务要跑！她忙披上衣服追了出去。在院里碰上正上厕所的13岁小学生黑昭明。姚大娘喊住他，让他马上到派出所去报告，自己顺着特务逃的方向追了下去。因为姚大娘缠着足跑不快，直到西站才追上。她上前去一把揪住杨的衣服就往回拖，狡猾的杨法章对姚大娘说：“您老还不知道吧，我改造得好，派出所已同意我走了。”但姚大娘不听他那一套，仍然死死抓住他不放，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抓特务呀！”杨一见事情败露，穷凶极恶地要挣脱，与姚大娘撕扯在一起，正在这时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共同将杨押回了派出所。

经查，杨法章系国民党员，解放前曾任保警队队员，解放后混入革命大学，因特务活动而被捕。在审查期间，他

伪装进步，“主动坦白”，于去年 8 月被释放。此后，他仍不思悔改，继续从事特务活动，这次他又携带特务机密文件图谋潜逃，但万万没有想到竟落在了一个老太太手里！

同年 5 月 6 日，一区中心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胡承志、何永森在中心公园玩，看见两个中年男子坐在围墙处鬼鬼祟祟地四处张望。两位同学一边佯装做游戏，一边设法靠近他们。隐约听见他们说“放火”、“杀掉他”的话，引起两人的高度警惕。回到学校后，他们把这件事告诉了班长程绍贵等同学。第二天同一时间，胡承志等 7 名同学一起来到公园，果然看见那两个人又来了，而且还听见他们说“到北京某大学去，那有咱们一块儿的，找他一块放火，杀共产党员，多造谣言”的话。后来其中一人拿出一沓钞票说：“先给你 100 万当本，事成之后还给你大数。怕啥？今天晚上就干，干好了多给钱，你要不干，可得小心你的脑袋！”同学们听后，急忙派人到派出所去报告，剩下的继续监视。一会儿，那两人站起来要走，同学们见公安人员还没到，就跟踪在他们后面。在公园出口处与及时赶到的公安人员一起将他二人抓获。这两个曾多次纵火并继续企图作案的反革命分子——一贯道罪犯王金龙、沈子哲就这样被捕获了。

继姚大娘、7 个小英雄抓特务之后，又涌现出三轮车工人、家庭妇女、工商户等协助公安机关抓特务的许多英雄事迹。

天津镇压反革命运动从 1950 年 10 月开始，至 1953 年 8 月结束，历时近 3 年。由于“镇反”运动肃清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天津市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安定局面，股匪纠合抢劫案件从此绝迹。当时八区的“鸟市”、十一区的“鬼市”、七区的南市“三不管”和四区的“新市场”一带，都是解放前土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道门头子横行霸道，地痞、流氓、骗子进行坑蒙拐骗的罪恶场所，是劳动人民备受践踏、不敢抬头的地方。“镇反”运动后，那些社会渣滓被彻底清除了。

### 张家口龙关县、赤城县

中共龙赤二县县委为了搞好镇反工作首先抓了宣传工作，增加宣传工作力度，先后下发了加强《关于镇压反革命宣传的指示》、《关于进一步加强镇压反革命宣传的指示》等一系列文件。要求整顿和利用一切宣传力量，与生产自救抗美援朝中心工作结合起来。首先在各级干部中进行认真学习讨论，以《惩治反革命条例》有关《人民日报社论》及镇反政策为学习的主要内容。结合群众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并要求结合当地的具体典型事例，采用多种多样宣传形式。并强调指出当前群众对镇反工作的错误认识，即 1、过去宽大今天又镇压，党的政策变了。2、封建反动社会道门是迷信组织，不是反革命。对以上错误思想认识必须扭转。一定叫群众知道中央政策没有变，从来没见过只宽大不镇压，或只镇压不宽大。封建会道门特别一贯道，是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服务的。现在造谣破坏，扰乱社会治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镇压不行。

镇反运动开展之时，恰遇龙赤二县遭受严重的连年自然灾害。还必须开展抗美援朝，支援志愿军援助朝鲜打击美帝。鉴此，首先解决广大人民群众吃饭问题，开展生产自救，保证不饿死一个人。这成为当时中心工作。但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地富反动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相互勾结、串连、共同行动，造谣、破坏、扰乱治安，搞得人心惶惶，社会秩序混乱，群众难以安心生产。因此县委要求结合中心工作，双管齐下，做好镇反工作。要求干部进村开会、布置、安排生产救灾工作。同时也要发动群众学习、讨论、揭发一切反革命分子，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县委决定对反革命分子中的罪大恶极者，反动会道门人员进行严重破坏者，严重向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地富分子，统统予以坚决镇压。龙关县为配合运动镇压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于化龙、岳梓、王忠诚、于斌、刘志华等一大批。还处决了一批一贯道反革命道首王占、李福俊、刘彦。赤城处决了王荣、李荣等一批。对破获的地、富分子反攻倒算案件。根据罪行也做了不同程度处理。

政府部门利用各种形式进行大宣传、大揭发，利用各种会议进行了宣传布置。如县人代会、县直干部会、区书记会、区长会、各部门会。在广大农村则利用群众会、座谈会、控诉会。并利用读报组、广播筒、黑板报。有条件地方还利用各种文艺形式，如演节目、说快板、秧歌队、活报剧、幻灯、图片、展览。由于采用各种形式，进行了大规模宣传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空前提高，有的地方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有的地方开展揭发反革命分子、反动会道门、反动地、富分子罪行。一场大规模检举揭发在全县范围内展开。通过大小会揭发，向各级治安委员会报告，向投书箱揭发。群众发动起来，一场大检举大揭发群众运动很快形成了高潮。这就将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暴露出来。

镇反运动开展之际，1950 年秋，正是反革命传播“割蛋”谣言猖狂之时。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人心惶惶。不少村子群众，寝食难安，并户并炕严重影响生产和社会秩序。为了安定群众恐怖情绪，肃特追谣，尽快稳定社会治安。县委采取有力措施，组织县区干部大批人马进驻重点村落，与群众同甘共苦，采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带头领导民兵巡逻站岗。叫群众安心生产，并安心睡觉。在龙关县的东山庙、田家窑一带重点村很快扭转了混乱局面。群众开始了生产自救，谣言肃清了，社会秩序稳定了。

### 广西剿匪

1950 年 11 月接到毛主席限期在 1951 年 5 月以前要消灭广西全省股匪的指示，在此号召下，全省党政军民均莫不振奋万分。目前，全省一百零二个县（包括钦廉县）尚有股匪活动的县份为融县、罗城、天峨、凤山、乐业、凌云、西林、西隆、西田等九个县，总共股匪人数已不到一万人。基本上是完成毛主席给予“五·一”前消灭全省股匪的任务。

此次广西剿匪收效如此之速与胜利如此之大，主要是由于组织了重点进剿，动员党政军民财各方面力量的有力配合，发扬了部队高度为广西人民剿匪除害的革命英雄主义。再就是我们采取了坚决镇压、反霸、收枪、减租退押、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在全省有了一个普遍高涨的群众参加的剿匪运动。如群众配合军队行动，群众自动报匪抓匪，组织民兵防匪，几万人民的搜山确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加上军队积极行动，这就使得广西土匪很难以挣扎存在下去，所



以广西土匪很快为我们消灭了。现在全省已出现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安定，人民群众情绪高涨，城乡交流畅旺，工商界繁荣的局面。全省人民现正结合生产与抗美援朝，继续搜捕潜匪与检举反革命特务分子，对广西反革命势力我们一定要做到彻底消灭的地步。

## 福建的反霸斗争

随着东山岛解放，全省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以及剿匪、反霸、减租和各项社会改革的展开，彻底废除保甲制度提到中共福建省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1950年6月30日，中共福建省委向党内发出了《关于废除保甲制度，建立乡村人民民主政权的指示》。同年9月23日，又将这一指示在《福建日报》全文刊登，从而在全省展开了废除保甲制度、改造乡村政权的运动。废除保甲制度和改造乡村政权涉及全省农村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各地在展开这项工作时一般都首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也先后向全省介绍了闽侯、古田等县的典型经验。这些经验说明，废除保甲制度和改造乡村政权，决不是简单的撤换几个保甲人员，而是一场发动群众，打倒地主阶级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因此要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揭露保甲制度的罪恶，使人民群众认清保甲制度是地主阶级剥削与统治人民的工具，由人民选举产生自己的基层民主政权，才能为人民谋利益。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通过召开农民代表会议的方式，发扬民主，进行充分的酝酿和协商，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选举产生乡和村级的基层人民政权。这些新成立的乡村政权，很快获得各阶层民众的拥护。

古田县是较早发动反霸斗争的地区，1949年12月就在全县各区斗争12名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特别是该县第一区曾任国民党联保主任和乡长的恶霸叶宝云，在乡中作威作福，无恶不作，杀害人命12条，勒索民财和侵吞公谷达1100余担，号称“南路霸王”，民众恨之入骨。大会斗争时，群众600余人情绪激愤，20多人上台泣血控诉他的累累罪行。与此同时，永泰、建瓯、南安、福安、罗源、惠安、霞浦等县都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反霸斗争。1950年5月26日，同安县人民临时法庭公审恶霸叶金泰，公布其横行闽南28年、46条残害人民的罪行，判处其死刑。听审群众5000多人，拍手称快。此前不久，林森县(后改为闽侯县)远洋村3000多名群众集会，斗争杀害群众11人的恶霸孙亨梧；厦门市禾山区公审并枪决了勾结日寇和反动派霸田千亩、杀害人命4条的大恶霸陈宝琦。恶霸分子在经过群众揭发斗争、清算罪行后，有的交群众管制，有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许多罪恶昭著的恶霸分子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 云南的剿匪斗争

江横人民日报 1950年10月

云南地当西南边陲，西界缅甸，南接越南，为西南国防上的重地，美帝国主义走狗蒋匪帮残余势力，利用这个复杂的国防边界及深山峻岭，策动其败兵残将及地主特务武装，进行武装暴乱，从今年四月中旬以后，这些匪特武装便乘我大军初到，地方工作尚未展开的空隙，即以“抗粮抗税”、以及“配合三次大战”等等反动口号为号召，在全省大部地区组织叛乱，尤以某些腹心地区曾一时发展较为严重，匪特四出攻占我区、乡政府，捕杀我干部，劫夺我公粮税款；甚至啸聚数千人，一度陷我易门、新平等地。直到五月中旬，为匪焰最盛时期，股匪多达二百六十股。这不仅直接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且严重的阻碍着国粮、税收、生产以及巩固国防等工作。

针对这一情况，云南军区及滇西、滇南工委，为了保卫祖国国防，曾于四月中旬，先后召集了各级干部会议，明确了“剿灭匪特，安定社会秩序，乃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先决条件”；同时，“参加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又是彻底肃清土匪的有效办法。”全军区指战员以及地方工作干部，便在“巩固国防，保卫和平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号召下，展开了英勇的艰苦的剿匪斗争。

就在这种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剿匪立功热潮下，云南军区部队，日以继夜，爬山越岭，忍饥挨饿，不避风雨，站在国防线上，进剿匪特；在剿匪中，并实现了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号召。

从四月中旬到八月中旬四个月来，全军区指战员，在剿匪战斗中，曾经发扬了解放军光荣的传统，创造了无数英勇善战的范例。如：滇西某团接到追歼西逃残匪顾介侯、张桐森部的任务后，一部残匪已渡过金沙江二百六十里了。某团便逾越上下数十里的高山峻岭，连夜追击，睡不上觉，吃不上饭，喝不上水，鞋子烂掉了用手巾绑腿裹着脚走。追了几天，追到金沙江边，船只又被残匪打沉，他们便连夜以一百二十里的急行军，绕到河门渡口，在群众的热情帮助下，这才渡过天险金沙江。经过十天九夜百余里的连续追击，终于把这一千余人的股匪，全部消灭在平川和姜营街。另一个故事是，曲靖分区部队，进剿平彝县富村傅重华股匪时，傅匪逃在石柱子一座怪石林立的山峰上，妄图顽抗。山峰耸立，周围都是峭壁悬崖，绝难爬上去。一直等到天快黑了，连副王天才便急中生智，带领战士抓着树藤，像打秋千一样的荡过两丈多宽的断崖。但又遇见第二个难关，有一丈高的峭壁根本没有树藤，只好抓着尖石角往上爬。爬上去后又是密林丛石，枪子儿打不着，喊话又不缴枪，“怎么办呢？”。“扔手榴弹！”一阵混战后，才把这些顽抗的匪徒消灭掉。像这样顽强战斗的事例是很多的，有的在十天中连续夜袭八次，有的十三天吃不到油盐菜，而战士的情绪则愈战愈旺盛。他们都表示“不剿灭土匪不收兵！”“敌人逃到那里，追到那里！”他们歌唱着：“……我们都是英雄汉，坚决剿匪不怕难，那里有匪那里去，不怕趟水爬高山！早把土匪消灭净，建设新云南！”

这些站在国防线上的人民解放军，不仅做到了从军事上主动进剿，并且在一元化的全面剿匪政策下，积极发动群众、展开政治攻势，做到了三者的密切结合。由党政军组成的工作队或部队宣传小组，在“人人宣传，个个开口”的口号下，都在各地普遍地召开了匪属、保甲、群众大会等，向群众宣传了人民政府各种政策，通过广大群众去争取与瓦解土匪，并从而发动群众自动起来进行防匪自卫。譬如：滇西某团由于正确执行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半个月中向该团投降的土匪即达二百七十名。又如，很多剿匪的部队，从实际帮助群众生产劳动来发动群众，使其自觉自愿组织起来，协助剿匪防匪，而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某团二连驻在某地时，普遍展开帮助

群众担水、扫地、割麦、锄地，感动得群众纷纷传告：“真是老百姓的好队伍！”老乡胡风义不但缴出自己的一支捷克式步枪，并经他的帮助，又缴了五支枪。在小龙街帮助群众拾柴后，老乡李宗德一天动员规劝胁从分子缴出二十六支枪。某团追剿顾、张残匪，路经大小凉山、大雪山时，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感动得彝族同胞自动配合解放军到处搜剿残匪，并从高山上赶下牛羊、鸡鸭来慰问部队，他们说：“你们和红军一样的对我们和气，真是毛主席的队伍！”峨山中心区溢安乡、中和乡的群众，更组成民兵联防，配合部队积极肃清流窜的土匪。这在在表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对剿匪工作的贡献。

总之，四个多月以来，由于云南军区部队，地方武装及地方工作人员，在执行“坚决剿匪，发动群众，加强统战工作，执行政策，克服命令主义”的方针下，都尽了热爱祖国，保卫国防的最大努力，因此，曾先后彻底歼灭了流窜滇西的残匪顾介侯、张桐森部、伪滇西纵队侯茂祺股匪，滇南伪“人民反共自卫军滇总联军”金绍云部，滇东北伪“滇东军政长官”及叛匪王耀云等匪部共达一万六千余人。……而伪滇南纵队邱振声等匪部则均先后向我投降。云南封建势力遭此严重打击后，这就迫使全省匪焰迅速下降，除边防若干地区外，腹心区股匪已被基本扑灭，从而扫除了农村改革及建设新云南的主要障碍。

但因云南地处国防边疆，匪特仍图死力挣扎，经常派遣零散土匪，结合地主特务，隐蔽腹地，暗杀我干部，袭击区乡政府。所以，现在云南军区正号召各地区村建筑碉堡，发动群众实行村村联防，以彻底消除匪患。

### 中南区农村基层政权已建立废除旧保甲制度 纠正某些干部不纯作风，为秋征及土改打下基础

人民日报 1950 年 10 月 19 日

中南区广大农村的基层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建立。该区各省除广西省小部分和湘西几个匪患未肃清的县以外，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农民协会的日益发展壮大，乡村的基层政权机构均已经过初步改造，封建的、反动的保甲制度已被废除，以农民协会为基础的乡人民政府已经建立起来。农村基层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农村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了农村的革命秩序，有力地镇压了农村中美蒋余孽土匪特务的活动，并为秋征工作和秋后的土地改革工作打下了基础。

河南、湖北两省改造与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的工作进展较快，据统计：该两省的农村基层政权已经比较健全的有一万二千九百八十个乡，经过初步改造的有一万三千四百三十六个乡，还未经过改造的只有湖北的少数乡村，还不到湖北全省总乡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河南省许昌、南阳两个专区，已有二百多个乡召开过乡人民代表大会，以普选方式，选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委员会。其他各省凡经过减租运动，农民协会组织比较健全的乡，乡政府也都经过初步改造。

中南区各省人民政府在开始发动农民时，即已普遍注意建立新的农村人民政权的工作。特别是今年夏天以来，各省在整顿乡农民协会同时，更普遍整顿了乡政府。如湖南省长沙专区各县农村，在七月份整顿农民协会后，立即就召开乡农民代表会议，会上并吸收农村各个民主阶层的代表参加，选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从六月份起，湖南省除湘西以外，大都采用这种方法开始进行乡村政权的建设工作，到八月底都已接近完成。湖北省改造乡村政权机构的工作，是从今春减租运动中开始的。到今年夏天，全省百分之九十的农村，就都已废除了旧保甲制度。目前该省正在结合整顿农民协会的工作，深入地进行整顿农村基层政权机构，以纠正某些乡村干部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

在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农民协会培养出来的大批干部，就是各省新的农村政权干部的源泉，是建立新的乡人民政权的基础。如长沙一个专区的农民协会就培养出五百多干部。这些干部大都是为农村人民所热烈爱戴的群众领袖。他们获得拥护，是因为他们热心为人民为国家办事，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江西省分宜县簪龙乡妇女会主席黄淑贞，在减租运动中苦口婆心地发动妇女，夙夜奔走，热心办事，现在已为该乡人民选为乡长，湖北蕲春县大河口村农会主席吕渭梅、礼山县沈家城村农会主席黄光盛、湖南益阳县青石乡农会主席卜晓余等，在工作中都曾多次拒斥地主的贿赂，表现了严正的人民立场和廉洁的高尚品德，现在都被选为乡政干部。各地都很注意对农村干部的培养工作，除在工作中培养外，各县都办有轮训班。农民踊跃参政，这是农民觉悟提高的结果。如河南在去年反恶霸减租运动中开始改造乡政权时，老实农民还多不敢出头办事。他们认为自己从来是被管的，不会办，怕办错。后来农民觉悟提高，他们看见一部分不能改造的旧的乡政人员贪污浪费，不能为人民和国家办事，他们才自己出来了。此外，农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等，则是乡政干部的另一个来源。

## 第二节 抗美援朝——伟大的人民战争

“连长，给！一个苹果。”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片断。

“大娘，停住您送别的脚步吧！”这是中朝两国人民难忘的记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对个人来讲是激动人心的话，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工人流过的汗、农民流过的泪、战士流过的血。抗美援朝亦是中国的劳动群众在追求自身解放而不懈奋斗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与镇压反革命并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三大运动。这三大运动是紧密联系的。

抗美援朝并不只是一场军队与军队之间的较量，这次战争是一场全中国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这是中国人民为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团结一致反对外敌入侵的伟大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各个方面。这场胜利是中国人民团结的胜利，是中朝两国人民团结的胜利。

### 一、抗美援朝时国内外的形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时，经历过几十年战乱的古老民族以其欣欣向荣的精神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还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新解放区刚经历长时期的物价飞涨，生产萎缩，民生困苦，甚至基层政权尚未掌握在群众手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需要恢复；还有相当面积的国土未解放，还要肃清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旧有的社会秩序需要整顿。从哪个方面讲，饱受战乱之苦的劳动群众

在刚刚翻身了之后，十分渴望和平与建设。

从《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sup>[7]</sup>等文献中可看到当时党中央确定的一个方向。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规定：“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应在 1950 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

1950 年 6 月 30 日，标志着中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正式开始的文件——《军委、政务院关于 1950 年复员计划的决定》——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中央复员委员会正式下达；而那一天，也是新中国土地改革法令下达的日子。也就是在这一天，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历史就是如此地丰富而扣人心弦。

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是美国与苏联两国的军事分割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世界范围内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朝鲜半岛也成了二战之后，两大阵营角力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继续在军事上援助蒋介石的国民党势力，同时扶持韩国、南越等政权，建立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1950 年 1 月以来，在苏联和美国相继撤出在朝鲜和韩国的驻军后，朝鲜政府与苏联领导人密切协商，斯大林同意金日成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金日成自信地认为美国不会冒险干预，因此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人民军南进作战，朝鲜战争爆发。韩国军队在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不得不向美国等盟国求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和利益，立即出兵干涉。6 月 26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6 月 27 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同时，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向安理会提交了动议案，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帮助韩国抵抗朝鲜军队的进攻。“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其他 15 个国家也派小部分军队参战。

6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

7 月 5 日美军参加了第一场对朝鲜的战役。7 月 6 日，周恩来再次发表声明，指出联合国安理会 6 月 27 日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为非法，中国人民坚决反对。7 月 10 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在 14 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波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于 7 月 13 日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 13 兵团及其他部队共 25.5 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后又调第 9、第 19 兵团作为二线部队，分别集结于靠近津浦、陇海两铁路线的机动地区。

这时的朝鲜人民军正处于节节胜利，先后发动了汉城战役、铁原战役、大田战役和洛东江战役，占领了韩国 90% 的地区和 92% 的人口，把韩、美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区。8 月 31 日，又发动了釜山战役，先遣部队打到了北纬 35 度线上，但是此后战局处于胶着状态。9 月 15 日，美军第 10 军于朝鲜半岛南部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后退。

9 月 30 日，周恩来发表讲话，警告美国：“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认定中国不敢出兵与美国对抗。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美军于 10 月 1 日越过北纬 38° 线，19 日占领平壤，企图迅速占领整个朝鲜，并公然声称：“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丹东地区，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

10 月 8 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0 月 19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0 月 25 日，志愿军打响了驻军朝鲜后的第一仗，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开始的消息在社会当中广泛传开，引得国内的地主、资本家和特务们都摩拳擦掌，准备在美蒋军队重新打回来时东山再起。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面临着新的战争考验。

## 二、中国为什么要出兵援朝作战

多数史学家认为以下三点是当时中国出兵朝鲜的主要原因：

1、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入侵朝鲜，并向朝中边境推进、轰炸中国丹东地区，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这是中国出兵朝鲜最主要的原因。

2、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对中国的国内统一战争进行武力干涉。

3、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

对于第一个原因，事实很清楚。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于一九五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再度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出美国侵朝军队军用飞机在十月十三日到二十五日的十三天中，侵入我国领空并实行扫射轰炸的次数的增加，证明美国扩大战争的罪行已经继续向我东北发展，这是中国人民所绝不能容忍的。周外长要求安理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侵朝军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入我国领空的罪行，并立即撤退美国侵朝军队，以熄灭战争扩大的火焰。

关于第二点原因，有人质疑说是中国军队参加抗美援朝，所以影响了解放台湾的进程。事实上，从时间来看，是美国入侵台湾在先，中国抗美援朝在后。在美国有预谋地出兵台湾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当时的条件下，解放台湾短期内根本不可能。周恩来总理后来总结说，我们当时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什么地方？这个既取决于帝国主义，也取决于我们自己。三个战场：朝鲜、台湾海峡、越南。哪个战场最有利于发挥我们的优势？当然还是在朝鲜。发挥陆军的优势。美国先向我们发起挑衅，甚至先入侵我中国领土台湾，我们要反击的话，只能选择在最

<sup>[7]</sup>1950 年 6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利发挥我军优势的地方，就是朝鲜。

对于第三点原因，还要从历史上寻找更深层次的背景。

中国与朝鲜半岛地理相连，文化相通。据史书记载，自周朝以来，中国长期作为朝鲜的宗主国，两国的科技与文化交往十分密切。

在 1879 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之后，日本已经积极向朝鲜扩张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势力，并且企图侵略中国。1894 年，中日之间就朝鲜问题爆发了甲午战争。1895 年 4 月，在日、美的胁迫下，李鸿章代表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卖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同朝鲜半岛国家的关系完全停止。1910 年日本吞并大韩，中日边界划到了鸭绿江边。1931 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很快就占领了中国东北。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朝鲜作跳板，最终发动侵华战争的这段历史，对新中国领导人下决心抗美援朝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周恩来在一次会上就曾指出：“美帝国主义在东方实行麦克阿瑟的政策，继承日本帝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不过日本帝国主义是用 40 多年的时间逐步进行的，而美帝国主义则要在四五年内来完成。”

1950 年 11 月 4 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声明中说得更清楚：“今天的情势已经十分明显了。美帝国主义者正袭用着当年日寇先侵略朝鲜随后侵略中国的故伎。谁也知道，朝鲜是一个较小的国家，但其战略地位则极其重要。美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的目的，主要地不是为了朝鲜本身，而是为了要侵略中国，如像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所做过的那样。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相关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持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教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持朝鲜人民。”

中国决策抗美援朝除了以上久远的历史原因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与朝鲜劳动党之间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的深厚友谊。

中国共产党人与朝鲜共产党人的关系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8 年，旅俄的一些朝鲜革命者成立了共产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包括韩人社会党。后来，韩人社会党的大部分成员到了中国上海并在那里开展活动。1921 年 10 月该党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改称高丽共产党，后来成为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1929 年依据共产国际“一国一党”的指示，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解散，其全部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尤其是东北，活跃着许多朝鲜共产党人，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北朝鲜重要领导职务的崔庸健就曾经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并且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广州起义。“九一八”事变后，金日成作为东北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之一，先是在中国境内然后在苏联境内领导抗日游击战。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一批朝鲜共产党人到了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后来担任北朝鲜政府内务相的朴一禹就是其中之一。在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期间，大约有 10 万名朝鲜人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在中国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军事较量的主要战场。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东北的大城市并控制了交通线，给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以极大的压力。而对这种形势，1946 年 6 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把北朝鲜作为东北部队的战略后方与供应基地。当年 6 月，东北局委员朱利之和肖劲光赴平壤，在北朝鲜建立了东北局特别办事处。其主要任务是：把伤病员和重要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通过北朝鲜维持中共北满与南满军队之间的交通与联络；从北朝鲜寻求援助及采购战争物资。1946 年 7 月，南满的中共军队把大约 2 万吨的战略物资转移到北朝鲜。1946 年冬，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实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方针，以绝对优势兵力向南满解放区连续进攻，先后占领了安东、通化等城市。南满共产党军队为了集中兵力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又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所以，解放区逐步缩小，到 1946 年底只剩下临江、抚松、长白等县，其他都变成了游击区。国民党军队于 1947 年春继续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在中共东北野战军的南北夹击下，终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东北战史上说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指这时的情况。在这期间，南满共产党军队的家属都不得不撤到朝鲜北部，这些人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临时政府的照顾。而且在中共“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下，朝鲜又成了东北战场同关内交通联络的重要通道。

不仅如此，北朝鲜还为东北中共军队提供物质与人员援助。许多北朝鲜的志愿人员参加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在人员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中的 3 个精锐师（一五六师、一六四师和一六六师）主要由朝鲜战士组成。在物资方面，1946 年至 1948 年，北朝鲜向中共提供 2000 车皮日本人留下的战争物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即于 1949 年 10 月 4 日电告周恩来外长，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周恩来于 10 月 6 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和同意。中朝遂定 1949 年 10 月 6 日为建交日。

正是由于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中朝两党有着并肩作战的传统友谊，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大家就出兵援朝摆了许多困难之后，毛泽东说了一段非常有份量的话：“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不管怎么说，别人要亡国了，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经过中共高层会议的反复讨论，最终大家争取到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毛泽东当时的一番形容很形象：“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问题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 三、抗美援朝时期的群众宣传

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各行政区、省市先后成立分会或将原有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合并改组为抗美援朝分会。11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4日至11日，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人民团体分别发表宣言，拥护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11月27日，全国政协与各民主党派举行联席会议，于12月1日发出《关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新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

1951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发出电文，号召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地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努力普及深入抗美援朝的实际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这个爱国教育，都能积极参加这个爱国行动。”此后，抗美援朝运动进入了更加普及和深入发展的阶段。

高层决策从来都是基层社会政治需要的集中反映，基层的诸多认识也通过高层的争论反映出来。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提得很响亮的口号是否深入人心？刚刚获得解放，急切想着恢复生产的普通劳动群众是否都响应并支持这场正义战争？面对美蒋新的战争威胁，社会各阶层的人各有何想法呢？

当时百姓中的认识情况仍然是参差不齐。1950年，中国的劳动群众，尤其在妇女中，多数是文盲，有的甚至不知道朝鲜和苏联，因此对中国帮助朝鲜作战不理解。《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一文对当时的各种心态做了比较细致的分类：畏惧求安心理；漠然无谓心理；恐美、崇美、亲美。《杨得志回忆录》里面记得比较清楚：“革命成功了”，“可以歇一口气”的念头，在当时并不单单是个别同志的想法。“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比较普遍的想法在部队中颇为流行<sup>[8]</sup>。老百姓中，“群众的恐惧不安情绪还较严重，对美国的错误认识及反动思想遗毒还深，羨美特别是怕美、怕世界大战的恐惧心理还较大，不愿打仗，苟且偷安的心理还存在着，仇美与以积极斗争抗美援朝的情绪不够高。”<sup>[9]</sup>再加上是解放初，还有反革命分子等的存在，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各地情势“突现紧张”，世界大战的谣言“甚嚣尘上”，有少数地区甚至爆发了新的暴乱<sup>[10]</sup>。

当然，除了这些消极情况，更多的是群众昂扬向上的力量和决心。尤其是东北和沿海地区，由于美国军事力量的挑衅，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当时的《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报告》反映，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市展开的初期，工人、学生和干部“一般对美帝侵朝非常激愤，在若干工厂、学校已经形成反美高潮。……石景山钢铁工人咬破指头签名上书毛主席要求出兵，河北高中学生半夜起来锻炼身体准备参战。……女一中学生在看到美帝下令向中朝边界火速进攻，和人民日报所登日寇侵华历史图及美帝认为鸭绿江并非确定边界的新闻，又听了东北籍学生报告九一八后亡国的惨痛生活后，全班愤怒痛哭，现在很多工人学生干部要求到朝鲜参战”<sup>[11]</sup>。

西北劳动模范代表刘玉厚说：“在国庆的前几天，咱又见到了毛主席，真是高兴。过去，咱吃糠咽菜，连高粱米也难得吃到，日子真难过！现在生活可好啦，尽吃好的，又一次次要我代表大伙到北京来参加会议，想想还不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呵！咱这次回去以后，一定更加虚心的向大伙学习。咱关中地方今冬要搞土地改革，咱还得与地主狠狠地打一仗，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让咱农民来一个彻底大翻身。”这时，刘玉厚忽然睁大了眼睛，重重地拍了一下大腿说：“眼下咱老百姓的日子是过得不错啦！但是，美帝国主义又想来侵略咱中国的土地，不让咱老百姓过好日子，让美帝国主义来看看吧，咱们是不会饶它的！咱中国的前方有着千千万万的战斗英雄，后方有数不尽的努力生产、支援前线的劳动模范。美帝国主义还想来冒险，真是自己找死！只要咱中国四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咱老百姓的好日子就不会被美帝国主义抢去！”这时，劳动模范王德彪坐在旁边笑咪咪地直点头，不言语，在这激奋的气氛中，他终于开口了，他镇静地说：“国庆那天，让美帝国主义来看看咱中国人民的力量吧！”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又说：“咱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但是，咱懂得应当怎样领导农民努力生产。只有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挑衅行为，咱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谢谢参加这次会议的各地劳动模范代表们的宝贵经验，谢谢这次沿途热烈欢送、欢迎我们的首长同志们。咱要把这次大会得到的东西全部带回去，让大伙也知道新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sup>[12]</sup>

为了普遍提高人们的觉悟，共产党也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组织工作，让群众进行自我宣传和教育。

在妇女界，妇联同当地的公会、团委等群众团体开展各种活动。逐渐地，有妇女走上街头并渐渐关注到抗美援朝的事情当中来。当时北京的女三中成立了许多家庭访问小组，走村串户进行宣传；各地区还有学习小组、夜校等形式。通过广泛深入的活动，群众中涌现出很多的典型<sup>[13]</sup>。比如，北京长辛店的一位老大娘，说着自己编的快板进行宣传，跑了二十几个车站。人们问她为什么这样，她顺口一段快板回答：“从解放，到如今，我前后好像两个人；共产党领导的好，我55岁还不老。”西城区二龙街高玉泉、张杨氏两位老大娘，用白布剪成和平鸽的图案，连同写着“反对美帝侵略台湾、朝鲜签名运动”的字条一起缝在身上，拿着钢笔、墨水瓶、签名册子，带着干粮，到大街、胡同、学校、公园去宣传动员。从7月27日起，一个星期内她们征集到8234人的签名。有人问签名干什么？她们理直气壮地回答：“签一个名，就等于一个子弹，我们用它来打垮帝国主义的侵略。”她们的行动集中体现了北京广大妇女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对和平生活的无限向往。再比如一个大妈的学习心得：“过去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知道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现在想通了，如果国家需要，我可以丢下孩子献身祖国。因为没有祖国的孩子比没有妈妈的孩子更痛苦。”

<sup>[8]</sup> 《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1页

<sup>[9]</sup> 《陕南区党委关于群众时事宣传工作的报告》（1950年11月22日），《党内通讯》第62期，西北局党内通讯社1950年编印，第12页

<sup>[10]</sup> 《中南局关于开展大规模的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1950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文件辑存》第4卷，中共中央中南局办公厅1954年编印，第2280页

<sup>[11]</sup>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

<sup>[12]</sup> 只有打败了美帝的挑衅行为咱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第11版

<sup>[13]</sup> 《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北京妇女》



学生向来更为敏感于政治，上海学生看到抗美援朝相关报道后，基层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就自发地行动起来。上海虹口中学一些同学高唱“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敬业中学的十二个团员同学“抑制不住地高兴”，宣誓“为加速国防建设，坚决参加军事干校”，并影响身边的同学。川高校中如复旦大学也涌现出一大批积极响应者，学生们纷纷表示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心。12月4日，复旦学生会与团委会号召大家“大胆地暴露思想，严正地和正确地考虑自己的态度”，团组织青年团员以分支为单位，展开讨论，也邀请非团员同学参加。团工委还组织了一些教员座谈，鼓励教员要尽到人民教师的责任，支持同学参加军干校，并在座谈会上通过了《为拥护军委会、政务院动员青年学生参加军事干校的号召告同学书》。上海中学朱琪琪等七位同学组织“金日成战斗队”，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战斗队成立，“战斗队”向团员、广大同学提出“挑战”号召，带动大家参加战斗队和军干校。（此段摘编自《抗美援朝初期上海市动员学生参加军事干校述评》，马圣强）

放到一个全国的大背景下，开展宣传活动主要从1950年6月开始，标志性的事件为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随后成立各种反对美国侵略的组织。1951年初开始，宣传运动更为深入，并推进到农村。大体有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三大活动。

#### 四、人民的战争——参军、支前、劳动生产竞赛

抗美援朝不仅有将士在前线激烈的作战，也有后方群众提供的坚强的经济保障。可以说，战争是在两条线上同时开展起来的。

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先后发出重要通知、通告、号召、声明和负责人谈话等30余次，具体指导抗美援朝运动每一阶段的工作：在全国开展以“仇视、鄙视、蔑视”（简称“三视”）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动员参军、参战、支前；组织全国人民捐献武器；三次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发起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写慰问信、缝制慰问带活动；并开展拥军优属、订立爱国公约活动等。

抗美援朝初期，共产党首先动员青年学生和积极分子参军，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和广泛宣传的基础上，发动农民群众参军支前，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彻底粉碎美蒋反攻大陆的计划。青年党团员在参军支前中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在重庆市大足县，“董光明弟弟头次不愿去，这次见到江开文报了名，才知道参加志愿军是保卫祖国，快去报名吧，恐怕不好了”，“郑光福的老婆刘义禄，马云超老婆等，始终不要男人报名参军。后经过优抚工作，同时贯彻了参加志愿军光荣可爱的爱国主义教育，得到非常满意(原文如此)。如郑光福后来报了名，临走时刘义禄还送到邮亭”。这里的江开文就是共产党培养的积极分子，董光明的弟弟和刘义禄属于典型的农民大众。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期间，仅东北地区就动员了近40万人参军……就在广州，也出现了大、中学生入伍的高潮，据记载，“两万两千多人报名参加军干校，被批准录取的有3338人，分别输送到陆军、空军、通信兵、铁道兵等兵种……”

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了4次参军参战热潮，补入志愿军的新战士达80余万人。在当时人口仅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多万农民要求报名参军，以至于老百姓称：“参军比考秀才还难！”3年间，先后赴朝的铁路员工占全国铁路系统员工总数的80%以上。正如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文中所述：“我国人民已有80%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本扫除了美帝国主义的百余年来对中国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和怀柔、欺骗所遗留下来的‘亲美’、‘崇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错误心理；树立了仇视美帝国主义、蔑视美帝国主义、鄙视美帝国主义的心理；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败美国侵略的决心。这是我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在思想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彻底击败美国侵略的物质力量。”

在大批优秀青年参军之后，他们的家庭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首先，当时军人家属在土地的分配中可以得到照顾。复员回乡的军人，均可得到照顾安置——除了给以土地房屋（或安排工作）外，还会发放优待粮。其次，军属家庭不必考虑因家里强劳力参军而无法耕田的问题，政府会让人代耕其土地。这使农民在送子参军上更没有顾忌。再次，军属还有一些特殊的优待。重庆龙水地区有人就这么说：“现在毛主席的办法想得真周到。我儿子去当兵，村上的人这个送我米，那个送我盐”，如果是没有房屋居住或是生病了，政府还会设法解决。参加志愿军的家庭还可以得到县政府专门发放的优待粮。如果子弟在部队里立功，其家庭能得到专门的荣誉和照顾。子弟如果在部队受伤或阵亡，家属还能得到相应的抚恤和优待，不必为生活发愁。

全国有70余万人组成了大车队、担架队，还有汽车司机、铁路员工、医务人员等四万五千人，担负战场勤务。在东北，有更多的工人、农民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工作，入朝出战勤的支前军工总计达60万。《论抗美援朝战争中“钢铁运输线”的保障奇迹》（陈兆仁，高维康/文，《军事交通学院学报》第13卷第2期）高度赞扬了中国志愿军、中朝军民手里的“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曾说过：“志愿军的运输工作在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中占40%的地位。”

在全国范围内，工人和农民纷纷开展热烈的劳动竞赛，为前线捐献各种急需的物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到抗美援朝的运动中来。

如在爱国竞赛运动中，工人们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刀枪”的口号，积极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农民们发出：“努力生产多打粮，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誓言，踊跃缴纳爱国公粮；工商界人士也提出“爱国不落人后”，普遍进行集体纳税；宗教界人士也纷纷举行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示威大游行，声讨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开展捐款捐物活动。全国开展增产增收、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后，人民群众立即响应，积极捐款。广大工人每月捐出1-6个工作日的工资，捐出部分或全部奖金，还参加义务劳动和加班生产作捐献；农民靠节衣缩食、进行农副业生产等办法作捐献；

工商界捐出营业额的 1%-2%，有的捐出 4%-5%；小学生将父母给的零用钱捐献出来；大中学校的学生利用假期勤工俭学进行捐献；作家捐出稿酬的一部分或全部；艺术家开展义演、义卖（字画等）、义展等活动，将其所得全部捐献。据吴敌（《缅怀那些最可爱的人——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估计，全国人民支援朝鲜前线的捐款可折合战斗机 3710 架，各种作战物资达 560 万吨，这些物资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种战争政治参与程度是此前任何时代都难以企及的。

从 1950 年 10 月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到 1951 年 9 月，北京各级工会发动、组织国营企业职工群众在“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武器”的口号下，开展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生产竞赛的开展，促进了生产的提高，北京 1951 年的全年生产总值比 1950 年增加 169%，从而加强了抗美援朝的物质力量。在爱国主义生产竞赛中，各级工会普遍重视厂矿中的班组工作，引导职工把抗美援朝的政治热情与生产任务结合起来，在班组中订立爱国公约与个人增产节约计划，把爱国公约作为组织劳动竞赛的基本形式。据 20 个较大的工矿企业的统计，订立爱国公约的班组达 4039 个，占班组总数的 95%；参加的职工共 53169 人，占职工总数的 98% 以上。其中一些先进班组，如石景山发电厂的刘德珍小组、京西煤矿的李书和小组、石景山钢铁厂的侯德成小组等成为生产竞赛活动中的骨干与核心。

在 1951 年五一劳动节上，北京举行 80 万人参加的“五一”劳动节游行大会。大会开始前，各厂工人队伍全体立立，一致举手通过了《北京市职工爱国公约》，这个《爱国公约》也就成为工人的行动纲领。比如福民农具铁一厂加工生产军锹，其中大军锹 1000 把，小军锹 2000 把，材料全是用炮弹皮制作，军锹质量受到有关部门的好评；北京同益水泵厂响应市总工会的号召，把超定额奖金捐献出来支援抗美援朝。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克服单纯增加劳动强度的倾向，各级工会大力推广先进工作法，使劳动与技术进一步结合。北京机器厂等试行高速切削法的单位，车床效率一般提高了八九倍，有的达 13 倍；清河制呢厂学习了郝建秀工作法后，倒筒机每天回丝由 6 两多减到 2 钱，合股机每天落纱由 15 次增加到 18 次；面粉行业 30 个工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改进了机器粉路与磨滚平筛等，产量一般提高了 30%。在竞赛中合理化建议活动也有了较大发展，据统计，1951 年北京职工群众共提出合理化建议 4213 件，被行政采纳执行的达 2747 件，创造价值 25.7 亿多元。其中石景山发电厂 6~9 月份的合理化建议即达 253 件，被采纳 106 件，仅就能计算全年价值的建议统计即可增产节约 964.9 万元。

先进工作法的推广和合理化建议活动的普及，推动了生产的迅速发展。截止到 1951 年 9 月，据 20 个较大工矿企业的统计，增产节约总值达 21957100 万元，北京铁路分局、北京邮政局、燕京造纸厂、琉璃河水泥厂、石景山钢铁厂铸造部、电车公司修造厂等单位提前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1951 年 10 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后，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进一步发展为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

安东靠近前线，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发挥可谓一个典型<sup>[14]</sup>。1950 年 10 月份前，省工业厅在安东的 28 个企业，迁出 16 个，留下的 12 个中有 9 个在生产。广大工人坚守岗位，努力生产。表现突出的是安东造纸厂，在敌机不间断轰炸的情况下，一面坚持支前，一面坚持生产，产量提高 4%，质量提高 2.8%，消灭了三等品。因支前、生产有功曾受到中央轻工业部的奖励。

进入 1951 年，市营工业逐渐恢复了瓦斯工厂、永华工厂、光华制造厂和公和染织厂的生产。国营商业积极组织货源，保证军需和民用生产资料的供应。第一季度，各专业公司卖钱额达 2381 亿元，收购额达 642.5 亿元。4 月份，安东机械厂提前八天完成全厂生产计划。安东造纸厂五月份的产量比四月份提高了 49.36%，质量也逐月提高。6 月 15 日，全市工商界发扬爱国热忱，在 4 分钟内交齐 4、5 月份营业税 9.6 亿元，创造了集体纳税新纪录。

农业方面，由于全力支援战争导致的农村劳力减少。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互助组。到 1952 年，还试办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截至 1953 年春，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农业总户数的 80%。广大农民积极响应政府提出的“每亩地多打五升粮”的号召，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努力扩大耕地面积。1952 年水田面积比 1949 年增加 22.7%；旱田面积增加 13.5%。粮食单产比 1951 年增加 105.8%，总产量超过年计划 84.3%，比 1951 年增长 98.7%。柞蚕茧产量达 99360 千粒，比 1951 年增加 68.2%。

在抗美援朝斗争中，安东职工积极参加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完成和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据 1950 年 9 月至 1951 年 4 月统计，全市有 5 万多名职工投入劳动竞赛，涌现出新纪录创造者 2285 名，先进班组 57 个。进入 1952 年，全市的企业与企业、厂与厂、车间与车间、班组与班组之间开展了争夺巡回流动红旗劳动竞赛。其中国营安东造纸厂 1952 年上半年全厂职工提出合理化建议 479 件，采纳 385 件，奖励 58 件、130 人，提前 18 天 14 小时超额完成国家计划 111.18%，补上一季度缺额后，还超 6.59%。一等纸超过国家规定数的 13.98%，成本降低 3.1%，利润超额完成计划 103.6%。地方国营漂炼厂发动工人改革设备，大大提高生产效率。过去用手工过酸，笨重落后，5 月份，工人们革新制造了一台平面过酸机，提高工效一倍多，工程师路野改进压光机以代替平光机，提高产量 1.3 倍。自开展竞赛以来，全厂实现 7 项设备革新，第二季度产量完成计划 125.56%，比第一季度提高 16.66%，质量完成 105%，成本降低 25.82%，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计划 39.42%。

当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地位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必将能够从更高层面、必将从更为主动的主人的角度看待社会，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劳动果实。老解放区的群众基础好，政治动员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同时已经掀起了生产建设的高潮。而在新解放区，配合着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等运动，抗美援朝运动也开始轰轰烈烈地展开。

<sup>[14]</sup> 《抗美援朝时期安东人民在工农商业中的贡献》赵宝红，《兰台世界》2008.4 上半月



## 五、典型的例子

### 福建省抗美援朝运动始末

抗美援朝开始后，中共福建省委随即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召开 1950 年第六次省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抗美援朝工作，决定把抗美援朝运动作为首要任务，并以此推动各项中心工作的深入开展。接着，各地（市）委和绝大多数县委都订立了抗美援朝工作计划，派出工作组，检查抗美援朝的广度和深度，组织了开展工作的突击力量。

8 月 1 日，有 3 万军民参加的福建省、福州市纪念八一建军节暨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大会在福州市体育场召开。揭开了福建抗美援朝运动的序幕。

8 月中旬，全省各地发起在要求缔造和平公约的“和平呼吁书”上签名的运动。8 月 16 日，《福建日报》专门为此发表了《争取全省 500 万人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的社论。8 月 31 日，中共福建省委及省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抗议书，抗议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罪行，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加紧准备解放台湾，粉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11 月 7 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福建分会（亦称“抗美援朝福建分会”）成立，共有委员 94 人，主席陈绍宽、副主席陈辛仁、王亚南，以加强对全省抗美援朝运动的领导。此后，全省各地陆续成立了各地（市）的“抗美援朝分会”。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福建分会的领导下，全省普遍掀起了爱国主义的时事教育和学习热潮，通过专题报告、小组漫谈、控诉会、出快报等方式，启发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和蔑视”。随后，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把控诉运动从机关、团体、学校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并在学习宣传及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基础上，召开各地（市）县抗美援朝代表会议，订立爱国公约，号召各阶层人民用实际行动做好当前工作。

在福州市，抗美援朝福建分会举办了 21 次大讲座，省文联组织了 8 次抗美援朝晚会，每次听众观众均在 1200 人以上，印发了学习、文艺材料 50 余种 40 余万份，组织了以学生为主的宣传队 2800 余人，深入各街道居民中进行宣传。继而开展了大规模的控诉运动，以居民委员会为单位召开的控诉会有 21 次，以居民小组为单位召开的 436 次。全市工人在 11 月至 12 月这 1 个月中召开了各种抗美援朝会议 466 次，参加者 27942 人，内有 12942 人组成了 430 个经常性的学习小组，全市 17 个教会学校普遍举行了反对奥斯汀无耻谰言的控诉会、座谈会，发表宣言，坚决为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实现政务院的决定而努力。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英华等三校联合组成了反美爱国运动代表团，协助全市接受外国津贴的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反美爱国运动。12 月 13 日，全市各界人民举行了 5 万人的庆祝平壤光复的示威游行；工商界举行了 7000 余人的示威游行。在厦门市，运动于 11 月底即全面展开，11 月 29 日一天即出动了千余人的宣传队；大多数商店的玻璃橱窗上都贴上了抗美援朝标语、漫画等各种宣传品，并把抗美援朝标语、口号印在包货纸上，使宣传工作通过各种方式，深入到群众中去。

随着全省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农村中的抗美援朝运动也逐步地开展起来。各地普遍组织了下乡宣传队，其中以晋江规模最大，全专区组织学生下乡宣传队达万余人，单泉州一市（9 所中学）就有 3000 余人参加宣传队下乡宣传。龙溪专区除开展一般宣传外，还在 267 个村举办了夜校，建立了 49 个屋顶广播台和组织了 25 个读报组，成为农村中宣传抗美援朝的有力阵地。闽侯、南平等专区通过各种代表会议进行深入教育，推动了农村中抗美援朝运动。

1951 年新年后，福、厦、漳、泉四市及平潭、建瓯等 7 个县先后召开了抗美援朝代表会议。2 月中旬以来，全省抗美援朝以转人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为中心，开展了广泛的示威游行。据统计，在 36 个县、4 个市、7 个重点镇共举行了 101 次示威游行，参加人数计 545800 人，其中妇女示威游行有 39 次，参加人数共 18 万人，工商界 18 次 6.2 万人。建阳专区在春节前后，全区共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集会与游行达 395 次，参加集会、游行群众有 496400 人。至此，抗美援朝运动已经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起来了。

通过上述各种宣传教育，全省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普遍提高，开始建立了“仇视、鄙视、蔑视”帝国主义的思想观点，并澄清了在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初期曾经一度发生的混乱思想。全省工人、农民纷纷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青年学生纷纷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工商界则订立爱国公约，提出诚实经营、踊跃纳税，以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1951 年 1 月底，抗美援朝福建分会推举该分会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倪松茂代表福建人民参加“中国人民慰问团华东分团”，赴朝鲜慰问中朝人民军队。省市各界为之举行了盛大欢送会。与此同时，全省人民发动慰劳中朝人民军队、救济朝鲜难民的运动。截至 1951 年 3 月底止，共捐献 1,630,029,948 元，全省共收到慰问袋 830 个及日用品 13,253 件，和慰问信 65,000 余封。至 1951 年 5 月底，全省签名拥护缔结和平公约及投票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人数，据不完全统计，已增至 7,064,515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有的地区如永安专区签名投票人数已占全区总人口的 76%，同安县签名投票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 85%。

1951 年 6 月 19 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关于开展捐献运动的指示》，号召全省人民争取在半年内捐献战斗机 40 架，支援抗美援朝。此间，抗美援朝福建分会相继发出了《关于贯彻普及和深入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通知》《关于执行总会推行爱国公约展开捐献运动的通知》《关于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通告》和《为继续加强抗美援朝运动的通知》等，领导和组织全省人民开展增产节约和捐献运动。福建省总工会发表《告全省工人书》、福建省农民协会发表《告全省农民书》、福建省青年联合会、团省工委、省学生联合会联合发表《告全省青年书》、福建省妇联筹委会也发出有关通知，号召工、农、青、妇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开展增产节约和捐献运动，推动捐献运动猛烈兴起。《福建日报》也发表《捐献运动必须结合增产》的短评，指导捐献运动的正确、健康开展。各地、各单位及个人纷纷订立增产节约及捐献计划，在增产节约基础上的捐献运动迅速形成热潮。据截至 1951 年 3 月 10 日的统计，全省人民共捐献的钱可购买 81 架飞机和一门高射炮。

福建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福建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 战争中的儿童

儿童经历着这场战斗，也茁壮地成长起来。当时美军对安东地区不断进行骚扰、轰炸，各学校都备有防空壕或防空洞，一有空袭警报，孩子们都在老师的率领下，有秩序地钻进防空壕或防空洞，蹲在那里照样学习。防空警报一解除，再回教室上课。孩子们都知道：“坚持好好学习，就是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孩子们从教室跑进防空壕里去躲避的时候，总是撅着小嘴说：“学习好好的，为什么不叫我们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呢？这都是美国鬼子害我们的！”八道完小初二年级15岁的女孩子曲美英，1950年寒假疏散期间，带领她的学习小组5名同学，在自家的院子里挖防空壕，在严寒的雪天，冒着敌机频繁的空袭，她们每天从早晨8点到12点，一直在防空壕里坚持学习。开学后，她们的学习小组被学校评为“模范学习小组”，曲美英被评为“模范儿童”。

现实的教育往往很深刻，1951年4月12日早晨，中央区完小三年级学生刘相良领着弟弟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临走时，爷爷送到门外，嘱咐说：“走道别贪玩啊，到学校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用心念书！”奶奶从屋里追出来，特意告诉孙子说：“放学要早点回家来，奶奶在家等着你们！”那天，老师领全班同学到镇江山讲算术课，同学们正听得有兴趣的时候，警报笛响了。老师领着同学们钻进树林里隐蔽起来，从树枝间隙中看着敌机一队又一队地侵入我们的领空，把一颗颗炸弹扔在我们的土地上。孩子们气愤极了，齐声痛骂：“这些该死的狗强盗！”防空警报解除时已经是11点半钟了。同学们各自回家去。刘相良回到家一看，早晨还是好好的房子，现在竟变成一片瓦砾，眼前横摆着血肉模糊的四具尸体，一时哑咽说不出话来！爸爸对他说：“孩子，咱家叫美国鬼子给炸没了，亲人也都给炸死了，咱们要报这个血仇啊。”在4月7日、12日敌机两次轰炸三马路时，刘相良、郭兴隆等30多名小同学的亲人被炸死，60多名小同学的家被炸毁。清真小学刚满10周岁的王口东4月7日被炸死，全市少年儿童个个义愤填膺，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一道深深的血痕：“美帝国主义太残暴了，非消灭它不可。”孩子们把这种强烈的复仇火焰融化到爱国公约里，一面继续坚持学习，一面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许多学校的孩子们，每天放学后，自动到街道去进行各种宣传。新安完小学生刘志梅一个人就宣传动员170名叔叔阿姨们在世界拥护和平理事会宣言上签名，决心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为配合政府镇压反革命，仁忠完小的同学们晚间放学后，挨门挨户进行镇压反革命的宣传。他们自己画了100多幅镇反宣传画，在街道两旁墙壁上张贴，向过往行人宣传讲解。那时，每当夜晚敌机来袭前，经常有敌特分子打信号弹，孩子们最恨打信号弹的特务。每晚空袭警报一响，好多孩子就从家里跑出来，在门口、在道旁，密切监视着敌特的活动一天晚上，新安完小学生宋子禄，在街上看到一个特务正在打信号弹，他马上追上去捕捉，只因人小未追上，把他气得不得了。金汤完小三年级学生连桂秋家里开小铺，有一天，一个人买完东西说了很多反动的話，她判断这个人很可能是特务，于是就跑到公安派出所报告，经过公安人员严格审问，那人果然是个特务。连桂秋受到公安部门的表扬。安东县龙工庙完小马庆昌、王振惠两位同学也抓到了一个特务。他们的爱国行为，在《安东日报》发表后，全市各学校都热烈地开展了向马庆昌、王振惠学习的活动。《安东日报》开辟了“讨论马庆昌、王振惠爱国主义行为”的专栏，各学校师生踊跃参加座谈会讨论，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的爱国主义思想。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中小学生给志愿军叔叔洗补衣袜4500多件，写慰问信2万多封。

战争，当然带来的是生产的破坏与人员的牺牲，但是经历了这场战争，广大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看透了；群众的自我组织程度加强了，不同阶层在共同的目标下更加团结。劳动群众觉悟性和组织性的提高，实际上促成社会的进步。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取得了广泛的胜利。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劳动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国内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动人局面；也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统一财经和增产节约等有力措施，到1952年底，只用了3年多一点时间，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77.5%，比解放前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中国的经济建设并没有推迟。对有些人来说，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它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从1953年起，中国便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大规模建设事业。”<sup>[15]</sup>

当然，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广大农民也承受着巨大的生产压力。中央政府不得不增加农业税，农民负担大为增加。加上部分地区的干部片面要求以爱国棉取代粮食作物，不合理的种植制度对一些地区的农业生产造成破坏，更加造成农民粮食紧张。抗美援朝运动的组织虽然很为成功，但也暴露出来一些官僚主义作风，这也是共和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焦点问题。

### 第三节 “三反”“五反”运动

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三反”、“五反”运动是从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两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其过程与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 一、“三反”运动

##### 历史背景

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的通知》，通知指出：“在这个革命潮流高涨

<sup>[15]</sup>金冲及.抗美援朝中的两大奇迹，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11月

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革命的党变成腐化的党，就会被群众所厌弃，所以，必须坚决地清除这些腐败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1941年5月，毛泽东亲自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郑重提出，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的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论述，要求全党同志，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在对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进城教育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一进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3月23日上午，从西柏坡动身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都应当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并再次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是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在执政前夕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的坚定信念，也是向全党再次敲响了预防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的警钟。

具有新中国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1949年11月，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1950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为加紧对党员的教育，遏制腐化现象的蔓延，1950年下半年，党即开展了整风运动。它以克服党内，首先是克服党的干部中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惩处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的现象为重点。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整党，对党员进行“做一个好党员”的教育。1951年夏，整党运动开始进行。尽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但还是有小部分意志薄弱者在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的腐蚀、拉拢下，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腐败、蜕化、变质下去。但是，正如1951年12月4日，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所作的一份请示报告中所写：对于本市工作人员中的贪污现象，我们曾于前年和去年进行过两次普遍检查，并分别给予各种贪污分子以刑事、行政或党纪制裁，“但因为缺乏大张旗鼓地充分发动党内外群众并当作一个中心工作和群众运动来进行，同时，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坏分子又不断向我们的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侵蚀和引诱。目前，贪污现象仍然相当严重地存在着，必须更系统地进行大规模的检查和斗争”。

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全国共有违反党纪的干部4.8万多人，其中省级党员干部32人，地、市级的党员干部407人，县、团级的党员干部2711人。毛泽东意识到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及时领导、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并把反贪污受贿与反行贿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整党整风。在整党整风中，对于那些解除思想武装，被糖衣炮弹击中的腐败分子，不论他们的职位有多高，革命经历有多丰富，处理起来毫不手软。如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刘青山、石家庄地区专员张子善因贪污腐败被处决了。这些运动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党迅速担当起执政建国的新任务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反”运动的开始

“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下半年后，抗美援朝战争处于边谈边打的局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正在并肩抗击“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而全国经济财政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而战争的继续使得财政支出巨大（约占年度财政支出的50%），同时国民经济建设又刻不容缓，这就给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资金从哪里来？出路又何在？只有增产节约是一条康庄大道。为此，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采取精兵简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措施，以落实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同月23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也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要立即开展一场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内经济建设。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都揭露出了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

东北地区自1951年9月开展增产节约和反贪污腐化、反官僚主义运动。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向中央报告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报告在总结了东北地区在这方面的经验之外，还列举了被揭发出来的一些丑恶现象。如沈阳市仅在工商局所属各单位中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达五亿人民币（这里指人民币旧币，下同）。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报告总结了开展这一斗争的经验，提出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反贪污腐化斗争；必须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带头层层做自我批评；组织工作组深入下去检查督促等。

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竟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说明党内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党中央对东北局的报告极为重视，于11月20日转发省（军）级党政军以上各级党委，并严肃指出：“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展开这个运动和这些斗争之后，每一部门都要派出必要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情况，总结经验，向上级和中央作报告。”这是中央第一次提出开展“三反”斗争问题。

很快，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三反”的报告陆续不断地送来。

11月25日，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西南地区将把反贪污反浪费当作1952年的重要任务之一。11月30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在转发西南地区报告的批语中说：“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

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11月29日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三书记刘澜涛向中央报告了刘青山、张子善严重贪污的情况。这更加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并于第二天转发各地，毛泽东在转发的批语中尖锐指出：“华北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从中央转发三个大区的报告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中央发动“三反”运动的决策已酝酿成熟。

毛泽东转发高岗的报告，是向全党发出进行“三反”斗争的第一个号令，紧接着转发这两个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斗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以防止党被腐蚀的极大危险。

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全国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据1952年1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的报告：从1951年12月10日以来的一个月中，据不完全的初步材料，在政府系统27个单位中已发现的贪污人数达1670人；浪费现象也相当惊人，仅军委后勤系统和铁路系统1951年一年内因管理不善，就损失汽油7000余吨；纺织工业部所属经纬纺织机器厂，国家投资4000多万元，因计划不周，施工马虎，工厂建筑尚未完工，所有厂房的289根柱子中已有280根不平衡下沉，造成巨大损失。工业部将730亿元的钱款化大公为小公；重工业部领导则有下属厂假造开支503亿元的问题。官僚主义问题也很严重，贸易部向苏联订购牲畜防疫药时，将3吨误写为300吨，将出口订货单中的“米茶砖”误译为“黑茶砖”，各级领导审批时都未发现问题，造成损失62亿元。根据1951年12月27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报告说：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恶劣作风在许多地方已侵入到党政军机关里面，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1月到11月在华东一级司法及监察机关已处理贪污案件179起，贪污金额达288亿元。据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1950年6月至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1242亿元。上海国营各纺织厂从1949年6月至1951年6月因产品不合格、管理不善而造成浪费1500亿元。1951年上海粮食公司因领导存有严重官僚主义，造成1000多万斤粳米霉烂变质。另据平原省（时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等6专区，共辖56县、1矿区、5城关镇。1952年11月15日建制撤销，所辖专区分别划给河南与山东省）1951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处理的违法乱纪干部中，贪污受贿者占65%。

建国之初，“三害”的大量存在和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解放后党政军民机关留用了为数众多的旧人员，由于他们长期为旧中国官贵民贱、奢侈浪费、贪污腐化之风所浸染，积习颇深。解放后虽经教育但尚未得到彻底改造，所以一有机会便旧病复发；有些人虽身在人民政府，但不思悔改，我行我素，利用各种方式肆意盗窃国家的财产；有些则是混进或受不法资本家派遣打入机关内部的“坐探”与“内线”，里通外联，狼狈为奸，时刻寻机进行破坏和捣乱。据统计，从建国到1951年11月的两年中，在发现的贪污案件中，旧职员竟占贪污人数的99%。其次，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许多不法之徒往往采取阿谀奉承、请客送礼、金钱美女引诱等手段，对党政干部进行腐蚀拉拢，使一些意志薄弱者成为糖衣炮弹的俘虏。第三，革命胜利后，共产党从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城市，由在野党成了执政党。一些共产党员以“打天下”的功臣自居，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该享受了！”因而“坐衙”当权，疏于政事，玩忽职守，官气十足，脱离群众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滋长，或羡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铺张浪费甚至贪污盗窃、蜕化变质。另一方面，群众监督机制尚未完善，同时经过了多年战争的考验，群众对共产党十分爱戴和相信：这使得掌握行政权力的党员干部，客观上有了贪污的条件和可能。曾震动全国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突出的典型。刘、张二人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他们进城之后，在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下，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利欲熏心，腐化堕落，蜕化变质。他们利用职权，侵吞公款；勾结奸商，投机倒把；私设“建筑公司”，非法牟取暴利；甚至盘剥民工，克扣灾区救济粮款，共贪污171亿元巨款，供其挥霍，由革命的功臣堕落为人民的罪人。由此可见，“三害”在党政军民机关也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警觉。

### 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

十二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指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甚至估计，“全国可能须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过分严重的估计。根据安子文1952年10月25日关于结束“三反”运动和处理遗留问题的报告，在“三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的贪污分子共42人（内有杀人犯5人），死缓9人<sup>[16]</sup>。

毛泽东亲自主持这项运动，他每天批阅大量来自各省市，各大军区，中央各部，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三反”报告，择其重要的批转全党、全军，把他们的经验及时地加以推广，并对这些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和要求，借以推动运动的开展。他特别指出：“军事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后勤部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情况极为严重。很多党员，甚至负责干部，沉埋于事务工作，政治思想极不发展，党内生活极不健全，因此许多人陷入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泥坑”。针对一些地方三反成果不大的情况，他认为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

<sup>[16]</sup> 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386页。

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西南局关于开展“三反”斗争报告批语，手稿，1951年12月17日。）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毛泽东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三反”斗争的一周通报的批语，手稿，1951年12月30日。）他愈来愈认定，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已极为严重而又普遍存在，不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猛烈的运动，就不足以使贪污浪费之风早日停止。

全国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了这场运动。首先，各级机关、全体党员都接受群众监督。《共同纲领》规定：“人民和人民群众有权向人民监察机关或人民司法机关控告任何国家机关和任何公务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1951年底，腐败问题初露端倪，中央便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大张旗鼓”地开展“三反”运动。1952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如果有人阻碍群众运动，无论他的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他的上级都应该坚决把他撤职。如果是因为他自己手上不干净所致，则还应受到法律制裁。2月，中央又要求，县以上党员干部均须在一定会议上作一次深刻的自我批评，检讨不深刻的还要再作一次。这样，人民监督不仅获得法律制度的支持，还得到各级领导干部实际行动的鼓励。群众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促使运动向纵深发展。各地纷纷以群众大会的形式进行动员，并以可能的各种方式进行运动的政策和成果的宣传。

北京市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于1951年12月28日又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市长彭真再次到会动员，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会后，代表彭真市长与广大市民群众见面的“市长代表工作组”成立。这个工作组由923人组成，分为253个小组，分赴全市各区派出所管辖的警界，登门入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务使“三反”运动家喻户晓。仅仅4天时间，“市长代表工作组”就召开群众大会300余次，各种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了7000多户家庭，直接受到宣传的市民在30万人次以上。工作组还收到检举和坦白材料10986件，经甄别，属于“三害”范围的有9800多件。

中国人民大学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在校门口挂了一个密告箱，“号召大家检举大领导、特别是三位校长的‘罪行’”。这么一来，年轻学生的情绪就上来了，校园里出现了不少大字报。

1952年1月8日公安部的报告说：“各个单位这几天实际上都停止了一切工作……每天开会开到大半夜，有的单位群众自动要求通宵开会，群情激奋，空气紧张……火力十分旺盛，出现了公安部机关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在这些大会上，有人“从人丛中上台，从衣袋中拿出金镯等公开坦白他几年的贪污情形”，“有几个贪污分子当场坦白，痛哭流涕，或痛责自己无知，或追悔自己陷入泥坑”（华东军区党委1952年1月13日的报告）。以至于一些犯过小错误的人也都进行了自我检讨，如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成仿吾检讨自己用公家信纸写私人信件。虽然这种情况现在看来有些夸张，但也正好说明了当时的政治风气下，人们对贪污、浪费现象的痛恨和反思。

其次，群众的监督渠道保证畅通并能及时反馈处理意见。1950年4月，党中央指出，“报纸对于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经济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应负批评的责任。”“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运动中，各类报刊媒体不仅及时宣传中央方针政策，还登载许多群众的举报和批评意见、相应机关和个人的处理或反省材料。当时的《人民日报》等党报每天都有两到三个版面专门登载全国各地的群众来信，检举各种问题（当然这些文化宣传单位也是三反运动的重点）。媒体的参与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设起一座连心桥，保证了每一名普通群众都有检举权和知情权。同时，监察部门也专门设立通讯信箱接受人民来信。根据各地统计，人民来信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是控告或批评干部的。如辽西梨树县1951年137件人民来信中，即有107件是控告干部的，其所占比例远较人民代表会议提案中批评案件的比例为多。

再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严惩打击报复者。对群众的批评，党的态度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监察部门和报纸编辑及时将群众来信反馈给相关部门和个人，并要求“如（检举或批评）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立即在同一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立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行为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如果群众对当事人的自我批评或表态不满意，当事人需要再次深刻反省，再做自我批评直到获得通过。这表明中央把走群众路线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思想落到实处。党中央在“三反”运动中进一步强调，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要求事实上是拒群众于千里之外。当时，最典型的案例是“纪凯夫事件”。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因涉嫌贪污失职，被纪凯夫检举揭发，该市市委领导不仅没有调查核实，反而偏听偏信，命令公安局将纪凯夫逮捕，并使用肉刑和疲劳审讯。因这起严重案件，武汉市委被改组，引起全国震动。此后，人民来信激增，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民主等丑恶现象进一步被揭露出来，推动了各地的“三反”斗争。

党中央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各级领导的层层检讨，打消了群众的一些顾虑，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信批评党和政府及机关干部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偏向，提供改进工作的意见。1952年1至8月，上海市区两级领导机关即收到群众有关的来信30.4万多件、重庆市1952年上半年收到人民来信35万件以上。在群众的支持参与下，大量“三害”问题包括一些大案要案被揭露出来。党对群众揭发出来的问题，在查有实据的情况下，敢动真格，毫不姑息。据统计，参加“三反”运动的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中，因严重贪污被判刑的共10060人。从1951年3月至1953年6月底，共有32.8万余人被清理出党。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



我的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8页。）

### “三反”运动的性质

1951年10月22日的《人民日报》在短评中说道：“渎职贪污，都是剥削阶级特有的丑恶行为；剥削阶级的统治机构就是庞大的贪污吸血机器。目前依然存在的贪污渎职现象，乃是旧社会的‘该诅咒的遗物’。……国家财产多被盗窃者侵蚀一分，就削弱了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的一分力量。一切革命工作人员，必须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同时还应积极参加反贪污的严肃斗争，保卫国家人民的每一分财产，不许任何人进行盗窃！”

11月底，在收到各地的运动报告后，党中央已经决定将“三反”运动当作一次“全党的大清理”的“整党”运动。1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停止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运动。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段批语里说：“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的成绩。”<sup>[17]</sup>

1952年元旦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元旦祝词，号召全国人民一同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些旧社会的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在全国“三反”运动进入集中力量打“老虎”<sup>[18]</sup>的新阶段时，毛泽东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全国的群众舆论普遍认为国家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造成国家财产浪费的重大原因，是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最大敌人。贪污、浪费是在盗窃国家财产；官僚主义作风，给党与人民政府的威信以极大的损害，是对人民的不负责，客观上也浪费了许多资源并给贪污分子提供了空子；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是对人民的犯罪，是有害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抗美援朝的胜利。因此，当时的群众在给报纸写的信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三害的批评和痛恨，另一方面号召大家提高觉悟，努力于增产节约运动。

在运动进一步扩大和深入之后，北京市委发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四十）、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百分之十七）、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警员，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有些市民对若干派出所尚有顾忌，因而不敢检举。我们已决定把作风不好的所长集训，并号召有贪污勒索行为者坦白。此外，为了便于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并派妥人负责。”

问题如此严重，“有些共产党员比国民党还坏”，毛泽东认为共产党已经走到变质的边缘，而一些党政领导人对运动却仍不积极，这让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转发了北京的这一经验，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待。”

因此，“三反”运动连同之后开展的“五反”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这次运动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国家究竟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要走向资本主义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

### “三反”运动的结束

由于自上而下地压“打虎”指标，而且有层层加码之势，一些地方出现了偏差，甚至用逼供信的办法打出了一些假“老虎”。毛泽东很快就发现问题，并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个别单位“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2月22日，他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全军打虎战斗已达高潮，“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鉴于贪污在旧币1千万元以下的中小贪污分子占全体贪污人数的95%至97%，中央曾规定，对其中情节不严重者，一般应免于刑事处分，有的还可以免于行政处分。这样，大约85%以上的中小贪污分子可以免于刑事处分。这个规定便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这一批人，以利开展“三反”斗争和建设工作的。同时，毛泽东觉得对很多的小贪污分子的行政处分还可以更宽一些，在中央已规定的撤职、降级、调职、记过这四项外，再加一项最轻的处分——警告<sup>[19]</sup>。这样，很多小贪污分子（约占全体贪污人数的70%上下），只须给以警告就可以了，“使大多数小贪污分子减轻对抗情绪，利于团结改造”。

<sup>[17]</sup>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sup>[18]</sup>这是当时人们对贪污犯的称呼，贪污旧币一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一亿元以下一千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

<sup>[19]</sup>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行政处分共六项：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

一方面，对一般的贪污分子，尽可能地从宽处理，甚至不划为贪污分子，把绝大多数的人尽快解脱出来，以利于团结和教育更多的人；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深挖“老虎”，特别是“大老虎”，这是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后期的一个指导思想。

在“打虎”高潮中，不少机关主要是财政部门，业务工作受到严重影响，有的已经停顿工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与陈云、薄一波研究后，于二月十五日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的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每个机关各级领导干部中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专搞业务，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毛泽东阅后立即回复周恩来：“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请速予调整。”（毛泽东复周恩来的信，手稿，1952年2月16日。）十七日，毛泽东电告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在运动紧张期内必须指定一部分得力干部负责日常工作，维持正常财经工作的进行，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在当地‘三反’运动正式启动一个月至多一个半月后，就应逐步增加领导日常工作的干部，这点很重要，请各同志注意。”（毛泽东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手稿，1952年2月17日）

从1952年3月起，“三反”运动开始进入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处理阶段。毛泽东特别强调的是：“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五月十日他在中央转发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4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语，对于纠正“三反”中的错案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关于结束“三反”的报告，“三反”运动宣告结束。“三反”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严重斗争在党内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一次痛苦却有效的自我清洗。这场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共10万余人，约占参加“三反”运动总人数的2.7%。经审理定案，绝大多数免于处分，部分给予行政处分。判处有期徒刑9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缓9人，死刑42人。

## 二、“五反”运动

### 开展“五反”运动的原因

进入1952年春天，“三反”运动的热潮就渐渐退却了，而由此促生的“五反”运动逐渐开始。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拉拢有密切关系，党员干部的“三害”现象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行动上的表现。1951年11月1日东北局的电报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12月20日华东局的报告提出：“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由非法商人从外部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1952年1月5日，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中说，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赂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西南局的报告同样反映了贪污分子与奸商相勾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事实。

“五反”运动揭发出来的问题，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用投机手段骗取志愿军购药款项达三亿元，竟然将失效药品供应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沈阳裕兴源油房经理与同业串通，在为国家加工豆油时，抬高成本，降低出油率。三年来，仅抬高成本，就牟取暴利十五亿元；降低出油率，使国家每月损失三万斤豆油。在工业比较集中的重庆地区，私营钢铁机器业的不法资本家利用“星四聚餐会”的形式，进行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他们先后拉拢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西南工业部经理处科长等，垄断了重庆地区国家委托加工订货的分配权，对上蒙骗国家，对下挤垮、吞并中小企业。成渝铁路动工后，又以同样手段腐蚀西南铁路局机务处副处长，包揽铁路器材的加工订货业务。仅在制作三十一副道岔的工程中，就通过抬高工价、多报用料等手段，牟取暴利七点四亿余元<sup>[20]</sup>。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还过高估计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上要同国营企业平分秋色。这些要求，显然是违背《共同纲领》的。

因此，在“三反”运动已经走向高潮之际，针对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势在必行，并且只要这样才能巩固“三反”运动的斗争成果，进一步从组织上打击资产阶级，以壮大无产阶级的力量。事实上，反对不法资本家的斗争，其时早已在各地展开了。在许多城市里，这个时候发动的是一场“四反”运动，即所谓“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税”。上海即于1952年1月中旬通过全市工商界代表扩大会议，向大小工商界人士发出了开展“四反”运动，以响应政府“三反”运动的号召。上海的大小工商业者都被动员起来坦白和检举各种违法行贿及偷漏税行为。

1952年1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一个指示中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违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违法行为……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同时，“在这个斗

<sup>[20]</sup> 《新华月报》1952年3月号，第21、27页。



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并不是把‘五反’运动仅仅看作一场经济斗争，也是把它看作一场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政治斗争”。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就在全中国迅速展开。指示说：“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于是，已经开展“四反”斗争的城市在2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转向“五反”运动。

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回忆说：“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反而不利。”<sup>[21]</sup>

### “五反”运动的群众参与与工人组织的成长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掀起了高潮。

在“五反”运动中，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活动，揭露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同时，进行调查情况，搜集材料，对私营工商业户分类排队，确定重点。各级政府抽调国家干部和工人、店员中积极分子组成“五反”工作队，进驻私营厂店，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争取和团结守法的资本家及其家庭，组成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包括守法资本家在内的“五反”统一战线，向不法的资本家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在党的有关政策的震慑和教育下，在声势浩大的群众攻势下，大多数不法资本家坦白交待了自己的“五毒”行为。在运动中，中共中央及时地纠正了一些城市发生的逼供信等偏向，并对具体方针和政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上海，2月5日，副市长潘汉年出面做“五反”动员报告，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随后，《大公报》发表消息，批评上海工商联对前期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上海市军管当局公布汉口路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的各种罪行，以揭发上海不法资本家的罪恶，激起社会义愤。此后，工商联及其大小资本家均威信扫地。各报纸如同对镇反和“三反”运动一样，开始铺天盖地地猛揭猛批资本家的“五毒”罪行。与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时同样的大会、小会，同样的检举、揭发，伴随着上海市大张旗鼓地逮捕“工厂经理11人，本市商店经理4人，外部商店老板2人，本市行商掮客2人，本市职工4人（内学生一人），外部职工11人。传讯9人，提讯14人”，工人、店员迅速被发动起来，资本家包括小业主们顿时都成了过街老鼠。

“五反”运动发动后，私营工厂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工人们再不必顾及什么“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了，许多工厂的工人都开始向资本家清算几十年的剥削账。工人店员不仅纷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如上海大中华火柴厂劳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命令资方代表：“我们工资比别厂低，被资方剥削了三十年，现在要翻身了。即使有困难，也要你们资方去想办法。”又如，开封市政府派工作组进厂宣传政策，对资本家划分界限，分为民族资本家（不参与政治）、开明资本家、反动资本家（曾经是无恶不做的）和官僚资本家（先前是官员，参与政治），对不同的资本家有不同的政策和办法。工作组组织工人参加“打虎队”，查处偷资本家税漏税现象。工人是运动的主力，工作组作指导。工人监督资本家，成立了一个劳资代表都有的委员会，检查账目和税收。对资本家分为大老虎（包括工厂主、经理等大资本家）和小老虎（账房和报税的等帮手），对他们讲明政策，要其交待清楚并指明出路。开会时，让资本家交待，一度有工人昼夜轮流看守经理等人，查出问题的，让其认错、补交税款并保证不再犯，然后给他恢复自由。同时要求资本家给工人提供劳保。有的资本家三两天就供出来了，有的则因为过度害怕上吊自杀了，后者是一种比较过激的现象。工会主席由工人们选举产生，通常的要求是出身好的贫下中农、思想觉悟高（热爱党，愿意为大家服务）。资方一个月至少需要向工会汇报一次，开除工人也需要经过工会。

由于私商私企的名声大降，他们一方面资金上借贷无门，另一方面商品买卖也出现困难。加上工人要求提高待遇的压力，众多私人企业主纷纷选择停工。但这个时候多数私企对员工除了发放工资以外，一般还实行包伙制，工厂停工即意味着工人不仅可能失业，就连饭也将没得吃。因此，工人的要求就迅速从提高工资、改善福利，转变为抗议资方停止生产，不发或欠发工资，停止或减少伙食。运动开始之后，资本家的威信与力量大为受挫。

而另一方面，工人则在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并壮大了自己的组织。其一，国营企业工会组织的整顿有了显著的成绩。1952年3月下旬，天津市国营企业工会组织，在党组织和节约检查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在工人群众中普遍地开展了“洗澡”运动。经过这次群众的自我教育运动，工人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一步，和资产阶级划清了思想界限，自觉地清除自己身上沾染的旧社会的恶习，树立当家作主保护集体利益的劳动态度。过去，有些工人羡慕资本家的生活，有人甚至打算开铺子；运动之后，大家都说：“过去总看着资本家有钱、阔气。今天，我们认识了他们的钱是压榨剥削咱们工人得来的。还是咱们工人阶级光荣！”过去，工厂中有的工人常从工厂里拿工具器材回家。在这次运动中，大家把解放前后从工厂拿的东西，献交给工厂。大家都说：“过去总怕失业没有饭吃；现在不会失业了，还留着它干吗？交给工厂就增加一份力量。”天津纺织机械厂在这次运动中，有三百四十多个工人献交了二万八千八百多件器材工具，价值一亿二千多万元。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了，在生产上和对贪污分子追赃定案中的劲头也都更大了。各厂将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继续整顿工会组织，加强工会工作。

其二，私营企业工会整顿组织的工作，也收到显著的成效。其中的店员工会，过去是工会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

<sup>[21]</sup>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8月。

是违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进攻的主要对象之一。因而，该类工会组织不纯的情况相当严重，许多店员的阶级觉悟不高，很多工人和资产阶级划不清阶级界限。“五反”运动开始后，各大城市的党委和工会领导机关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采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广泛而深入地对工人店员进行了阶级教育。哈尔滨市截至1952年3月中旬为止，曾举行了五千多次大大小小的报告动员会，全市职工平均每人受到十次以上的教育。继之，全市又组织了三千多起回忆会、控诉会，用职工的切身经历，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在运动中间，又不断地依靠群众纯洁了工会组织，坚决地清洗了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派进来的坐探，和那些被不法资产阶级分子拉过去的、而又屡教不改的坏分子，同时放手提拔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积极分子。北京市总工会在“五反”斗争中，抓紧每一个战斗的间隙，通过各行业的职工代表会，进行整顿队伍的工作。到1952年5月，私营行业的工会会员大为增加。工会组织正在进一步地解决工人、店员的生活福利问题，并组织工人团结和督促资方搞好生产。在天津，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反”运动中有将近300个私营工厂新建立了基层工会组织，有2万多职工参加了工会，其中店员有近1万人。在这批新的工会会员中，大部分是职员和徒工。过去，不法资本家欺骗、愚弄职员，压迫徒工，不让他们参加工会组织。在“五反”运动中，他们认清了不法资本家的阴谋，也认清了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因而毅然丢开所谓“多年宾主”的情面，拒绝或抛掉违法资本家的所谓入股、分红利等等可耻诱惑，划清阶级界限，参加检举斗争。尤其是一些高级职员，知道资本家的许多违法事实，所以击中了违法资本家的要害，使他们不得不缴械称降。也有一些高级职员参与过违法事件，但政策规定只要他们决心“洗手擦黑”，回返到工人阶级的队伍，就不加追究。上海市私营企业中的六十万职工经过教育后积极投入“五反”斗争，单只3000多个高级职员的检举材料就达一万多件。大家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给资本家“排队”、分类，认真地审查他们的坦白书。天津市的7万店员经过“五反”斗争的锻炼，其中95%以上的店员都参加了斗争，检举违法资本家罪行84000多起，检查出违法所得在1亿元以上的违法资本家达1028个。这场运动，提高了工人和店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阶级觉悟，他们在认识到工人阶级光辉灿烂的前途后更有信心地参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又如济南市，“五反”前参加工会的工人店员占总数的77%，现在已增加到90%以上。沈阳、上海、重庆、大连、西安、武汉等城市，也都在“五反”运动的过程中，不断地纯洁并扩大工会组织。

在整顿工会组织时，各地大都同时放手提拔积极分子做工会干部，并放手扩大工会组织。在整顿组织中，工会把坏分子的罪状交给职工，让职工自己讨论，并提出处理意见。通过这些讨论，职工们就更加爱护自己的组织，更加懂得了整顿组织的必要。所以，整顿组织的过程中，职工的阶级觉悟都进一步提高了，工会的组织更加扩大，战斗力也更加提高了。

现在有观点认为群众运动与司法程序是相悖的，其实不然。1952年4月3日，北京市处理“五反”运动中违法工商户案件的人民法院举行第一次会议。审判长、副审判长、全体审判员，以及各区分庭及郊区分庭的审判长一起讨论了人民法院的工作和审判方式等问题。会议决定：人民法院的工作必须充分贯彻群众路线，在每一案件定案之前，必须广泛地征求本厂、店职工、检举人、检查组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将每一案情切实查对清楚；处理时，一般可采取分批集体宣判的形式。为了处理人民法院的日常工作，会上决定立即成立人民法院办公室。

### 运动的发展与形势变化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给不法资本家以很大震动，不少人纷纷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这对于方兴未艾的“三反”运动是有力的配合。但是，“五反”运动也一度造成社会上的紧张气氛，资本家惊惶不安，私营企业生产下降，市场清淡，税收减少，失业工人增多，基本建设项目纷纷推迟。

比较早地反映这些情况的是中共天津市委。他们在二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华北局、中财委并彭真的请示报告中说：自“三反”以来，内外交流、城乡交流停滞，批发商业成交减少一半，银行不贷款，私人不买货，工业生产开始下降，税收显著减少。一部分直接受到影响的劳动人民已在叫苦。如不采取措施，经济上的萎缩现象还要发展，时间过长，则元气损伤过大。天津市委认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必须兼顾经济工作。

2月上中旬，“五反”运动在上海发展得轰轰烈烈。但是，进入到2月底，许多工厂工人和商店店员的热情却明显地降温了。因为，不管军管会下达了怎样不许停工、停业、停伙、停薪的命令，资本家在现有形势下，终有撑不下去的时候。搞垮了资本家和店主，工人和店员就没有饭吃。这个时候，因为停工歇业，已经造成整个上海13万职工失业，比1950年“二·六”轰炸所造成的失业工数还要多。而且经济和生产形势还在进一步恶化中；据劳动局3月上旬报告你，建筑、五金、医药用品、食品、轻工业和手工业，包括搬运等行业，都发生严重失业的情况，许多工人、店员需要紧急救济。因此，尚有工可作的今多工人和店员都不得不开始为保住自己的饭碗打算。原来天天喊话的店员宣传站也消失了，有些工人则把工会张贴的军管会规定干脆撕掉。一些职工公开讲：“现在五反，反得我们吃饭都成问题，还是不反的好。”“五反”运动明显地陷人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种种情况说明，在城市中，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搞“五反”，开展同资产阶级违法行为的斗争，远比在农村中搞土地改革，铲除封建土地制度，要复杂得多，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也大得多，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对守法的工商户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对有些小问题的工商户尽快得出结论，归入守法户，使守法户的面扩大一些。守法的和半守法的这两类工商户加在一起，据毛泽东估计，占全部工商户的95%左右。他说：“城市中在处理了占95%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因此，毛泽东提出：“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必须在适当时机用主要力量放在处理前述两大类资本家方面。”

不久，毛泽东又根据实际情况，将初期规定的四类工商户（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增为五类，增加基本守法户这一类。根据北京市的情况，守法户占10%左右，基本守法户占60%左右，半守法半违法

户占 25%左右。这样，争取和团结的工商户仍占 95%左右。尽量扩大争取、团结和保护的工商户人数，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严重违法资本家，是运动后期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调整运动部署，缩短“五反”运动的时间，实行更稳妥、更谨慎的工作步骤。首先，推迟全国工商业资本家最集中的上海的“五反”运动。其次，提出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五反”分步骤进行。

由于采取上述两项重要措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困难和不正常状态较快地有所缓解和改善，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

运动一步一步地深入，经验一点一点地积累，人们对“五反”运动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毛泽东在总结前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这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全党对“五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更加自觉地领导这场斗争。这八条，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它使“五反”运动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国家发展的方向息息相关。做到了这八条，就可以实现毛泽东所希望的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正如他所说的，搞“五反”运动，“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

从一九五二年五月起，毛泽东开始着手部署结束“五反”的工作。早在四月初，他就提出“五反”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他说：“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我们已经对资产阶级打了一下，现在可以在新的基础上和他们讲团结了。”因为，在建国初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包括“五反”在内的一切工作，都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 “五反”运动的性质

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后作过明确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共同纲领》也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发动“五反”运动，是不是要改变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改变《共同纲领》的规定？当然不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从回顾进城三年来中国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曲折历史中，说明了发动“五反”斗争的必要性。他说：“这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警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急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需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警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

“五反”运动，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击的是违法的资本家。运动一开始，中央就特别强调各地要十分注意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政策，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掌握好区别违法与不违法的政策界限。在斗争策略上，强调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大中小资本家，组成“五反”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极少数的反动资本家。在工作部署上，强调要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准备不好，就不要动手，决不能盲目进行，只许做好，不许做坏；在县、区、乡三级一般不开展“五反”斗争。因此，这个运动并不是要一下子就消灭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工人阶级的基层组织还未广泛成熟，整个工人阶级还不能完全自己来掌握社会生产的时候，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生产方式对于促进社会生产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在恢复国内经济的同时打赢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

战争是头等的大事。

即使是在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党和政府对资本家的态度也还是教育、引导和改造，让他们走上公私合营的道路，并给资本家个人以出路，让他们也走上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社会主义大道，同时又将他们的原有资产进行了适当的补偿。在“五反”运动后期，中央提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这即表明当时对于资本家还是本着团结的态度，以发挥他们在生产上的积极性；工人提出的各种要求，也在现有的可能条件下得以部分实现，避免影响资本家维持正常的生产。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随着对资产阶级“五毒”行为的揭发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一种“左”的情绪。这种情绪反映到理论战线上，表现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一九五二年第一、第二、第三期上发表的带有原则性错误的文章。这些文章实质上否定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认为资产阶级现在只有反动的腐朽的一面，而没有积极的一面。因此，中宣部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为此作了检讨。

### “五反”运动的结束

“打击要适可而止，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远，就要发生问题。”1952年5月，中央决定结束“五反”运动，“五反”进入定案处理的关键时刻。

5月9日，毛泽东及时地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问题的指示，为胜利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中说：“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上海大资本家比较多，对上海工商户（特别是其中大的工商户）的处理如何，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全国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荣毅仁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对他的处理，更加引人注目。荣家的企业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应该划到哪一类？经过薄一波和陈毅反复商量，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处理意见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

对“五反”运动的定案处理，主要不在于从违法资本家那里搞到多少钱，而是有更深远考虑，着眼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着眼于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着眼于对民族资产阶级关系的正确处理。

“五反”运动以打击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开始，但它的实际结果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它的直接结果，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如一九五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的：通过“五反”运动，“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这为以后用和平的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6月6日，在“五反”即将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sup>[22]</sup>这预示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将有一个新的变化。

“五反”运动的最终处理是比较温和的，据统计，参加运动的工商户有999707户，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占总数的1.5%。其中，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行的仅19人，占判刑总数的1.26%，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的，共占工商户总数的97%以上。这就安定了人心，粉碎了“‘五反’就是政府要钱”等种种谰言；“同时又结合着加工订货、银行投放、城市物资交流与召开工商联会议等工作之推行，迅速做到了恢复市场、活跃经济。”

### 三、对“三反”、“五反”运动的认识和总结

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一月相继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是继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之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它们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贪鄙奢靡风气，树立起艰苦奋斗、勤政廉洁的优良作风，移风易俗，起了积极作用，为国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反”、“五反”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了群众运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毛泽东始终注意维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力求把群众运动对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注意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保障了各地负责人能够及时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运动中出现的缺点和偏差。作为最高决策者和指导者，党中央时刻关注各地的报告，并倾心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意见，集中全党智慧，肯定和推广好的经验，同时实事求是地纠正运动中的偏差，改正错案。“五反”结束后，又立即调整工商业，使一度萧条的市场重新活跃起来，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评价的：“‘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

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没有自己的私利，所以就敢于发动群众监督批评自己的干部，敢于依靠广大的群众来打击敌人。我党的历史一再证明，紧密联系群众是党的工作的一大法宝。两场运动成效显著，它的成功得益于群众运动这种大民主的形式。“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我们发动群众斗蒋介石，斗了二十几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运动，农民群众起来斗地

<sup>[22]</sup>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手稿，1952年6月6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1页。

主阶级，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sup>[23]</sup>

“我们不能要求群众百分之百的正确，这种要求事实上是拒群众于千里之外。”当大多数的群众一起参与了运动，由于群众觉悟和组织程度的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斗争在局部地区的扩大化和偏差、暂时的生产受影响等。但是群众能在运动过程中进行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从而提高觉悟，增加组织性。从土地改革到农业合作化，从工厂民主改革到后来“鞍钢宪法”的出现，无一不证明了群众运动一旦真正起来了，能够产生多么巨大的力量。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规定解决党内和干部中的贪污等问题，不再采用群众运动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不适应在和平条件下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现代化建设，不利于规范地解决问题。此后，强调加强法制建设，干部贪污腐败问题由检察机关专门的反贪污机构依法办理；要求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也就是老百姓们只要在领导的指挥下好好劳动就行了，不用去关心领导干部们所从事的政治工作。

#### 四、几个具体实例

##### 北京市：全国“三反”运动的表率

原题为：“三反”运动为何从反贪升级为残酷的阶级斗争

摘自《反腐风暴》作者：王少军张福兴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

北京市是率先动员群众广泛参加“三反”运动的地方之一。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北京市如何开展“三反”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要求各单位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系统深入地检查，并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进行广泛检举，使“三反”运动能够迅速在全市展开。

12月20日，北京市委、市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彭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贪污浪费现象仍很严重，不仅一部分旧工作人员贪污恶习仍然存在，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我们反贪污、反浪费的具体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同时，彭真还提出了开展运动的具体办法：第一，市和各单位都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首先检查本单位，然后在上下级和同级间进行互相检查；第二，动员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坦白、自动检讨，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党员干部到非党员干部，不得例外；第三，普遍动员全市人民，首先是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举。

12月21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任主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和蒋光照、张鸿舜、傅华亭等市领导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的“三反”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2月28日，北京市又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彭真再次到会动员，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

为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北京市成立了代表彭真市长与广大市民群众见面的“市长代表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923人组成，分为253个小组，分赴全市各区派出所管辖的警界，登门入户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务使“三反”运动家喻户晓。仅仅四天时间，“市长代表工作组”就召开群众大会300余次，各种座谈会2000多次，访问了7000多户家庭，直接受到宣传的市民在30万人次以上。工作组还收到检举和坦白材料10986件，经甄别，属于“三害”范围的有9800多件。对工作组取得的成绩，彭真十分满意，他还专门写信向全体市民表示感谢。随后，北京市成立了由副市长吴晗和市公安局副局长冯基平负责的处理委员会，根据有问必答的原则，处理群众检举的问题。北京市的“三反”运动就这样紧锣密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党群机关干部多、党员多，也是最容易出现贪污、浪费、滋生官僚主义现象的地方。北京市委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把党群机关作为开展“三反”运动的重点部门，首先确定在市委机关、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北京日报社、人民艺术剧院、市文联、文艺处、美术工作室、市中苏友好协会等11个单位开展运动。这11个单位有工作人员2771人，其中干部1952人，工人281人，勤杂人员440人，战士41人，学生37人，保育员16人；党员887人，占32.01%，共青团员473人，占17.07%，民主党派七人，占0.26%，群众1404人，占50.66%。

充分发扬民主，召开群众大会，揭露贪污分子或促使其坦白，是开展“三反”斗争的有效方法之一。共青团北京市委所属青年服务部的青年补习学校，账目混乱，其负责人马钧拒不接受群众的检查，也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团市委节约检查委员会就重点对受马钧指使、被迫制造假帐的会计王云霞进行说服教育，终于使她主动坦白，交待了所有问题，并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举揭发了马钧的贪污行为，马钧被当场逮捕后，接着就有六七个人上台坦白了自己的贪污问题。北京市人民艺术剧院在群众大会上逮捕了贪污分子杨林后，立刻有人上台控诉了贪污漏税、压制检举的艺术工厂厂长刘岷和他的妻子、厂行政科长王卓君。这种群众性民主大会影响非常大，效果也很显著，既动员教育了群众，同时也给贪污腐化分子以强烈震慑，极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

经过发动群众，首长带头检讨，普遍开展坦白检举，进而检查、调查、查账、算账，开斗争会以及反复交代政策，北京市在党群机关的11个单位中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有贪污错误者527人，这些人共贪污12亿多元。在这527人中，从政治面貌上看，共产党员74人，占14%；共青团员50人，占9.4%；民主党派4人，占0.7%，群众399人，占75.7%。从职务上看，局、处长以上干部四人，占0.7%；科长38人，占7.2%；一般干部360人，占68.3%；普通工作人员125

<sup>[23]</sup>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人，占 23.7%。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最为典型的贪污腐化分子是秦其芳和张春久。秦其芳原是北京市妇联生产部代理副部长兼挑花厂厂长，此人早在 1948 年任石家庄大兴纱厂合作社主任时，即假造和私立账目，违反政策骗购棉纱卖给奸商投机倒把。1950 年去四川购买生产原料时，又用重报和多报账等方式，贪污货款 8200 余万元。张春久是原北京市总工会店员工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他不但贪污受贿 400 余万元，还帮助奸商盗窃国家资财。

北京市党群机关在揭发出一些贪污、浪费现象，并清出一批贪污腐化分子之后，机关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现象也充分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机关内部长期缺乏正常的民主生活，群众的意见和诉求没有通畅的渠道反馈，造成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一些隔阂。贪污浪费问题的存在又与官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加引起群众的愤恨。北京市委因势利导，在深入清查贪污腐化分子的同时，在党群机关展开了反官僚主义斗争。

按照市委的要求，党群机关各单位的领导必须当众检讨，检讨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铺张浪费、不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缺乏全面观点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的行为；二是缺乏民主及群众观点的工作作风问题；三是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和理论业务学习领导不力的问题。

北京市党群机关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得比较严厉，领导干部几乎是要“人人过关”。开始时，有少数单位的领导，缺乏自我批评的勇气，躲躲闪闪不敢与群众见面。但是，群众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且越来越高涨，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抛开面子，向本单位的群众进行检讨。少数领导干部因群众对其检讨不满意，甚至检讨了三四次。领导主动检讨，群众敢于批评，由此大大推动了“三反”运动向纵深发展。北京市还率先把运动推向了对腐蚀干部负有重大责任的工商界。北京市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在工商界方面，主要是贿赂和勾结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在一个多星期中，各行业开会已达 3125 次。……现在公务人员和公营企业员工中，已有 7000 余人坦白了有贪污或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其中贪污公款在 100 万元以下者 7171 人，100 万至 500 万元者 362 人，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者 31 人，1000 万至 5000 万元者 33 人，5000 万至 1 亿元者三人，1 亿元以上者两人。工商界已有 1659 户坦白并检举了 2923 人有贪污或行贿行为。”

北京市委还发现“斗争的内容和规模，比运动开始时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和大得多”。“在公务人员方面，有各种侵吞、盗窃、骗取公家财物、吃‘回扣’、吃‘底子钱’和贪占公家小便宜的行为；有私设工厂、商店、假公济私，利用公家各种条件图暴利的变相盗窃行为；有利用职权地位敲诈勒索，占老百姓便宜的行为；有各种接受贿赂、勾结包庇商人盗窃骗取公家财物的行为；有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浪费和违犯制度、化大公为小公等行为。……贪污现象最严重的是税务人员(已坦白者约占总人数 40%)、合作社人员(已坦白的约占总人数之 17%)、贸易机关和各种采购人员。敲诈勒索的，主要是公安部门的下级员警，敲诈对象主要是被管制分子和反动会道门道徒等。”

鉴于以上情况，北京市委在报告中提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第一，继续号召坦白和检举，最近几天主要是号召坦白。针对工商界最怕坦白后无限制地追缴漏税和罚款，宣布凡坦白者，除补缴 1951 年漏税外，不再罚款；否则，查出后将追缴解放以来全部漏税，并照章罚款。第二，号召全体市民和一切工作人员大量检举。为方便群众检举，在全市设接待站和检举箱。第三，从严法办一批贪污行贿分子，并公布一批各种类型的贪污案件，以推动坦白运动的开展。第四，继续逮捕抗拒、破坏“三反”运动的贪污、行贿分子。第五，各区召开代表会议，并召集街道和村民大会，进行动员宣传，使“三反”斗争家喻户晓，群起而检举。

对于北京市的这一经验，毛泽东当即批转各地，要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办理。“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来看待。此种部署应当是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业）同时进行，领导机关和法庭密切配合，报纸和广播则大力宣传，并注意组织机密消息的内部通报。”

##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三反”运动中的反贪污斗争

康文清

1951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12 月 8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当时隶属中共察南地委领导的蔚县县委，根据地委的批示精神，于 1952 年 1 月领导全县开展了“三反”运动，其中反贪污斗争是此次运动的重中之重。蔚县的反贪污斗争经过了学习发动、检举与坦白、追赃、审查处理四个阶段，于 1952 年 6 月结束。

### （一）

蔚县自 1948 年 3 月解放至 1951 年的三年中，从整体上看，干部队伍是廉洁奉公、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但是干部队伍中确有一部分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较为严重。在贪污方面表现为：有的干部假公济私、公私不分；有的利用公款放高利贷；有的和私商勾结，利用公款作投机买卖；有的借工作之便吃贿赂，勒索民财；有的开大头支票，焚毁和涂改单据，以少报多；有的竟组织团伙，相互勾结，明目张胆地进行集体贪污。在浪费方面，根据县委检查，在解放后的三年中也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在县直机关和经济企业部门，浪费国家财产问题相当惊人，浪费形式也是让人难以容忍的。如有的机关干部搞大排场、讲阔气；有的生产业务部门对国家财产保管不严，马虎大意，不负责任；有的部门计划不周，积压货物、积压资金，有的建筑部门盲目施工，使国家财产遭到不应有的损失。而这些现象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官僚主义的存在是密不可分的。鉴于上述情况，蔚县县委认为在全



县所有国家机关和经济企业部门、事业单位中开展一个声势浩大、雷厉风行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

1952年1月3日，经县委讨论，中共蔚县县委成立了节约检查委员会，由县委正副书记和县政府两个正副县长以及其它各部门负责同志分别担任该委员会正副主任和委员，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始领导蔚县的“三反”运动。节约检查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县的“三反”运动。

1月初，县委召开了全县县、区、乡干部“三反”运动动员大会，会上县委向全体干部报告了《关于在县、区、乡干部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意见》。报告分析了当前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并强调指出了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性，并批评了一些同志对于开展“三反”运动的片面的、错误的看法，解除了不必要的疑虑。会上还对这次运动的开展做了全面部署。

为使“三反”运动有个良好的思想与组织基础及群众基础，从1951年12月中旬，蔚县县委就组织机关干部学习了“三反”运动的有关文件，开始进行思想发动和组织发动工作。同时也在全县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三反”运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了宣传员，报道员，并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反复向群众讲明党和政府的反贪污决心，进而通过广泛发动群众，形成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运动开始后，首先县委和县政府有关领导分别在召开的全体干部大会上进行了自我检查与剖析，全面地揭发了在领导方面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之后，其他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分别向本部门的干部和群众作了检讨，并欢迎自下而上的批评。由于有关领导带头检查，进行了自我检查与剖析，摆出问题，让群众评论，这样就大大启发了其他同志的思想觉悟和检查的决心，同时也大大地启发了相互开展批评的自觉性，使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三反”的热情激发出来，为“三反”运动，尤其为反贪污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在组织学习及思想发动过程中，县委通过组织讨论“三反”运动的意义、产生贪污与浪费的根源以及“三反”运动的政策，及时了解与掌握干部在“三反”运动中的各种思想动态。如在讨论中，来自南山三个区的干部认为自己平时生活就很艰苦，没什么贪污与浪费现象，此次是抱着看其他区的干部挨整的态度来的；一些干部自认清高，站在运动之外漠不关心；一些领导干部对“三反”运动认识不足，自认本机关无问题，虽经批评，仍发牢骚；还有的干部因自身有问题怕受处分而精神紧张。针对存在的这些问题，县委及时采取措施，通过召开党员报告会、小组讨论会以及与一些对“三反”认识不清的领导干部谈心，使上述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广大干部积极投身到运动之中。

## （二）

从1月16日起，蔚县“三反”运动中的反贪污斗争开始了坦白、检查、检举阶段。工作安排先后分两批进行，采取的是先党政、政法部门而后经济部门的办法，共有1366名县、区、乡干部参加了运动。

第一批参加“三反”运动的干部共646人，经近10天的学习、讨论与坦白、检举，除一些尚未交待清楚问题的干部继续参加第二批外，其余全部返回工作岗位。此间，参加运动的各部门普遍开展了检举运动，通过个人对个人、机关对机关、下级对上级、具名不具名等多种检举形式，揭发贪污行为。此外，还设立了检举箱，来收集群众的检举意见。到1月20日，已有12个机关、312名人员被检举出来有贪污行为，具名检举他人有贪污问题的检举人达109名。在充分发动干部积极参加检举的同时，蔚县县委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促进运动的开展。首先召开了打“老虎”动员大会，讲清政策，消除顾虑。在动员大会上当场就有3名贪污在百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进行了坦白，得到了从宽处理。会上并经民主提议，对3名死不坦白、压制民主的贪污分子其中（<1名贪污款项1亿元（旧币，下同）以上>）当场予以逮捕。之后，又先后召开了坦白斗争大会、检举大会、宣判大会，对一些能主动交待贪污行为的贪污分子宣布了从轻处理，对拒不坦白交待者从严处理。体现了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对贪污分子形成了威慑力，迫使那些有贪污行为的人员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此外，为进一步发动广大工商户参与运动，县委在此间还抽派了一批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分头深入到八大镇及各区，通过召开商户大会、工商联会，广泛发动工商户进行检举，仅蔚县城、代王城两地的工商户就检举出19名贪污分子受贿物品119件，款项1100万元。

由于措施得力，蔚县在此阶段取得了较好成效。此间共揭发出贪污行为的人员174人，其中确定为中、小“老虎”的13人，贪污款24212万元，其中贪污款在100万至500万的57人，500万至1000万的2人，1000万以上的2人。

从1月30日，蔚县开始了第二批“三反”运动中的反贪污斗争，主要是经济部门人员及第一期未交待清楚问题的人员。此阶段，针对企业部门抱有“软磨过关”和认为“我们单位没啥事”的思想，县委领导加强了工作力度，一方面组织了打虎队，一方面抽调党政、团体骨干48人，对有问题的部门包干负责，限期完成。同时为了打破贪污分子的“攻守同盟”，蔚县还与阳原县制定了“包打包剿”、“专案专人”、“组成基干野战军”等办法，并通过召开坦白大会，从轻处理主动交待者，逮捕拒不交待者，首先坦白并能检举别人者可以主动赎罪等措施，使坦白、检举工作顺利进行。仅春节期间的4天中，就从粮食公司、土产公司等企业单位检举出5个大贪污案，涉及24名大、中、小贪污犯，贪污小米20多万斤，贪污公款35200万元，布66匹。就此察哈尔日报发表了题为《蔚县在企业部门围剿大贪污犯》的文章。截止2月2日，已检举揭发出有贪污行为较重的人员29名，已接近完成地委下达的捉住30名“老虎”任务。从贪污人员来看，主要是集体贪污问题，集中在粮食、盐业、土产等部门，贪污款达4亿多元。如土产公司6人集体贪污白麻34000斤，折款达2亿多元。在所确定的29名“老虎”中，贪污在1000万至5000万的27名，贪污在5000万至1亿的2名，赃款合计6亿5千多万元。

在取得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县委在当时全国一起打“老虎”的大形势下，过于严重的估计了全县的情况，又迅速召开了会议，作出了目前仍有许多贪污分子，尤其是粮食、供销、商业等部门中的一些贪污分子未被揭发、检举出来的判断。会后，县委专门向地委汇报，要求追加45名捉“老虎”任务。就此地委专门发了通报，对蔚县取得的成绩及

采取的措施予以了充分肯定。之后，蔚县县委在2月3日再次召开了誓师大会，对工作进行了布置，当夜又捉住“老虎”11个。到2月9日，“老虎”数已增加到57名。需要指出的是全县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盲目追求指标、扩大化倾向，所追加涉及15个单位45名捉“老虎”的任务并没有认真逐人调查核实，存在硬性确定任务的倾向，这一倾向在以后的甄别工作中马上就显现出来。

到2月底，蔚县共认定大中小贪污分子591人，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3.2%。其中因贪污数量较大而被定为“老虎”的98人。揭发和交待贪污款41亿元。

### （三）

进入3月份，蔚县的反贪污斗争转入追赃阶段。追赃工作初期，县委及县政府8名主要负责干部亲自指挥，并对有关材料与事实进行认真分析、研究，使追赃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3月4日，召开了“老虎”退赃大会，当场就有2名“老虎”退出了一批赃款，同时也影响了十几个“老虎”，他们在2天内退出了赃款5千多万元。到3月12日，已追回赃款赃物折合1亿5千万元。接着全县又召开了坦白斗争大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一些能够彻底交待贪污事实并能及时退赃人员当场宣布了从轻处理，对顽固抵赖的贪污分子当场逮捕法办。此间，还开展了甄别工作。至3月24日，经甄别，贪污款项在百万元至千万元的人员数量减少了10%，另有68%的有贪污行为的人员被免于处分。由于措施得力，有力地推动了追赃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仅3月12日、13日两天，就从私商的商号里追出贪污分子存款、股金23000万元。截止3月27日，已追回赃款60060万元。

进入追赃工作后期，蔚县的追赃工作发生了严重的盲目性。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是被前段所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对一些贪污分子所交待的情况材料未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研究，盲目相信，盲目追赃，致使一些守法工商户因被贪污分子诬咬而陷入困境，出现挨饿、自杀的问题。如西合营一木匠被贪污分子诬陷存有赃款300万元，他把锯及其它工具卖掉60万元后，陷入无法维持生计以致挨饿的地步；吉家庄一小商户被一贪污分子诬陷800万元，在被迫交出200万元后上吊自杀，后被及时发现未死。此外一些贪污分子也乘机散布谣言说：“现在共产党是用‘老虎’咬工商业家，消灭资产阶级，给五反打基础，为国家积累资金，给社会主义扎根，上级要多少‘老虎’就有多少‘老虎’”等。而一些存有贪污分子赃款的私商就此也拒不交待问题。二是在发现假材料后，又草率“纠正”，把已追回的1亿5千万元赃款又退给工商户，并向其道歉，但事后发现在所退回的款项中确实存有贪污分子的赃款。至此，蔚县的追赃工作陷于真假难辨、束手无策的混乱局面。察南地委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就此于3月27日向全地区发出了通报，指出了蔚县县委在领导上的盲目性，并提出了纠正的具体办法。之后，蔚县县委及时采取了诸如召开“老虎”坦白大会、召开工商户大会以及加大对贪污分子交待材料的分析力度、重新组织追赃工作队等措施，才扭转了不利局面。仅8天就追出赃款27000多万元。

### （四）

四月初，蔚县反贪污斗争进入处理阶段。处理方针是：凡是主动彻底交待，贪污行为较轻者可免于处分；贪污严重者可从宽处理，又能揭发检举他人者，还可将功折罪；此外，凡拒绝坦白而被别人检举者，则从严处理。据察南地委4月3日发出的通报称：蔚县对贪污款在百万元以下的297人都宣布了处理决定，并对贪污款项在百万元的258人、千万元以上的2人宣布了处理意见。在处理过程中，县委认真贯彻上级有关政策，以此来教育干部，推动退赃工作的开展。同时进一步加强了甄别工作，加大了有关材料分析与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力度，严格把握了处理工作中的政策界限，尤其是对确定为“老虎”的人员，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做到处理恰当。如对2名贪污在千万元以上能坦白彻底、退赃积极的贪污分子处分由刑事处理改为行政处理，使其深受感动，说：过去我感到问题严重，交赃不交赃一样，反正要坐大狱，这回上级对我们处分这样轻，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将赃款退回国家。截止4月13日，已追回赃款167000万元。

其间，县纪委介入对有贪污行为的党员干部的甄别工作中。甄别前被确定为“大老虎”的3人，“中老虎”的2人，“小老虎”的51人。经甄别后，由“小老虎”升为“大老虎”的4人，由“小老虎”升为“中老虎”的2人，由“小老虎”降为千万元以下的14人，计贪污款项在1亿元以上的7人，5千万至1亿元4人，1千万元至5千万元的31人。数字上升的原因是过去交待不彻底，集体贪污问题未交待，在甄别与追赃中，又发现了新问题。从整体看，政法部门是下降的，企业部门是上升的。

经甄别复查后，蔚县对贪污分子都作了重新处理。受党纪处分的73人，其中党内警告15人，留党察看13人，撤销党内职务6人，开除党籍39人；受政纪处分的60人，其中降职10人，撤职41人，记过8人，开除1人；受刑事惩处4人，其中：机关管制1人，劳改2人，判刑1人。

综观蔚县反贪污斗争的全过程，县委遵照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安排部署，领导全县人民进行了反贪污斗争。这是一次我党在建国初期，针对当时的党内外斗争形势和党员干部、人民群众进行党风廉政建设需要的成功尝试。在运动进行过程中，蔚县县委及时地纠正了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指标而发生的过火行为和扩大化等不良倾向，取得了反腐败斗争的丰硕成果。这次反贪污斗争使蔚县各级党政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廉洁奉公教育，普遍提高了抵御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廉洁自律、勤政廉政的威信，为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回忆陕西省白河县的“三反”、“五反”运动

○廖启文

新中国成立以后短短的三年时间，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在此期间，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违背《共同纲领》，用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同时拉拢腐蚀国家干部中

意志薄弱的人，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次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预料的那样：“因为胜利，党内骄傲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有一部分人认为“船到码头车到站，该享受了！”毛泽东洞察一切，于1952年元旦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时，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团结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斗争。紧接着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在白河县税务局工作，任外检员。白河县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是1952年2月初（农历春节刚过），最集中的时间是两个月左右，加上内查外调，退赔处理等，共计半年左右的时间。现就我记得的情况回忆如下：

### 一、“三反”运动

当时，中共白河县委委员会由4人组成，县委书记李顺天（原名史景成）。委员有：陈建华（县长）、曹汉龙（组织部长）、王巨才（公安局副局长）。“三反”运动由县委直接领导。参加“三反”运动的范围，主要是县直属党政机关、政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划分三大片进行。税务局、新华书店、盐务稽征处划为一个学习组。“三反”运动进程大致分四个阶段，即：宣传动员、提高认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落实政策，退赔处理；改进作风，完善制度。

“三反”运动中，我听过三次报告。地点均在文庙（即现在的县委大礼堂处）的小院内，听报告的人席地而坐，做报告人站在台阶上，没有桌椅、板凳。听报告的大约200人左右。第一次是李顺天作动员报告，他紧扣主题，从“三反”运动的伟大意义到方法步骤、方针政策，大约讲了两个小时。他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把党中央的政策讲得非常透彻，与会同志听了个个精神振奋。报告中特别引用了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话：“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经不起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接着他讲到人们的生活欲望无止境，“一个人他今天买一顶新帽子，明天又想买一套新衣服，后天又想买一双新皮鞋……”同时引用列宁著作中的一段话，大意是资产阶级最大的愿望是获取高额利润，为了获得高额利润，有时迫不及待，有时不怕违法，甚至铤而走险于生命不顾。接着列举了一些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

李顺天做的第二个报告是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领导带头作检查，干部人人过关是“三反”运动的特点。李顺天作完报告后，主动检查自己的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并当场要求与会同志给他本人和县委领导提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条意见，一是县妇联会的同志向李顺天提出：“李书记你爱人占公家便宜，几次将馒头坯放在机关伙食笼格里蒸！”李书记立即回答：“我平时对家属管教不够，从现在起立即改正。”另一条是一位女同志向县委委员、公安局副局长王巨才提出：“王局长，你身上穿的皮大衣哪里来的？”王巨才立即站起来回答道：“这件皮大衣是委托XXX买的狐皮，又请回民计XX削的皮张，后请缝纫师傅郑凯缝制的，一共花了XX钱。”接着王巨才又介绍了他和爱人姚芬（县妇联干部）每月薪金多少钱，有根有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会后，各单位组织学习李书记报告、《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次全会上的报告等文件。学习讨论了一段时间后，首先是各单位领导作自我检查，同样征求大家意见，然后是人人“过关”。个人检查叫“洗手洗澡”，人人“过关”确实是“过关”，个人检查交待，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一次通过的，至少也是两次。绝大部分同志“过关”以后，运动转入重点——“打老虎”（揪大贪污犯）阶段，一时间形成面对面揭发，背靠背检举，集中围攻有问题的人，毫不留情。

“三反”运动在白河税务局干部中没有发现贪污问题。但存在着生活细节不检点，抽商人递支烟，吃商人一顿饭，买商人的便宜东西等问题。1951年冬，我随局长去白岩村定税，因当日回不了机关，在一家商行吃了一顿饭，我在会上做了检查交待。局长高姿态，在总结我的检查时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责任在我。”

“三反”运动第三个报告是曹汉龙作的，中心是落实政策，退赔处理。“打老虎”阶段既猛又狠，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操之过急，往往不够准确，冤枉了一些人。后经中央指示，白河县和全国一样也纠正了过“左”的行为。在执行退赔处理时，认真执行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我知道的有三件事。一是安康盐务局白河稽征处主任XXX，开始组织上就怀疑他受贿，但没有证据，起初动员他主动交待，他拒绝了。后经周密调查他与盐商XXX有嫌疑。经过政策攻心，他分几次作了交待，共受贿200多元。组织上最后还是认定他交待问题较主动，处理决定是撤销职务，退出全部受贿款。二是县政府金库警卫员XXX（郧西县人），监守自盗金首饰若干件。在核实金库时发现短少，组织上怀疑他，开始他拒绝交待，后经李顺天亲自向他做工作，说只要交出赃物，可免于处分。他考虑再三，提出要人跟他去取，李顺天派了两名警卫员随他到家，取回了金首饰。交出金首饰以后他决意不再回机关，从此离开了革命阵营。三是县财政科副科长刘近仁自杀。他是用手枪自杀的，当时震动很大，究竟贪污多少钱，我不知道。

“三反”运动到了后期，主要是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搞好本职工作，增加财政收入，厉行节约，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巩固“三反”运动的成果。

### 二、“五反”运动

“三反”运动开展不久，“五反”运动开始。兹简述如下：

#### （一）“五反”运动时白河县工商业发展情况

白河县位于秦头楚尾，有汉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商贾往来辐辏，素有小汉口之称。是竹山、竹溪、郧阳、郧西、旬阳等县周边地区山货土特产集散地，是生产资料、生活用品转运地，每日汇集到白河县城的挑夫数百人，大小木船数十只。源源不断地将桐油、皮纸、龙须草等农产品运出去，又将钢铁、粮食、陶瓷、布疋等生产资料、生活用品运进来，码头装卸货物日夜不停。农村油坊、纸厂星罗棋布，龙须草满山遍野都有。由于桐油、皮纸、龙须草三大产业的发展，带动起其他相关产业随之发展。竹编油篓、草绳加工、皮纸检验、贸易商行比比皆是。商业店铺以及饮

食、旅社、茶馆、浴室、理发等服务行业鳞次栉比，从上河街头的探马沟口一直排列到下河街尾的白石河口。白天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晚上服务行业几乎是彻夜灯火通明。

## （二）“五反”运动的领导和方法步骤

白河县“五反”运动具体领导是县长陈建华、税务局长高俊长。“五反”运动办公室设在商会，由民主人士衷侠生负责。抽调金师端（税务局外检员）负责调查、查账等。廖启文（税务局外检员）负责收集整理检举、揭发材料等。

“五反”运动大致分三个阶段：宣传动员，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重点打击；定性处理，守法公约。

“五反”运动开始时，县政府在河街街口沙滩上搭台，召开群众大会，由县长陈建华作动员讲话。当天晚上，由税务局长高俊长在商会召开工商界代表人士会议，进行“五反”动员，到会约 200 人左右。会上主要讲国家大好形势，讲资产阶级两面性，肯定爱国守法纳税成绩，揭批偷税漏税行为，列举了一些不法经营的案例。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号召广大工商业户向“五毒”开战。特别强调运动的大方向是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只要自查自纠，补交偷漏税款，一律本着坦白从宽处理。会后分行业划分学习小组进行学习讨论，学习《人民日报》社论，讨论领导报告对照自己谈认识，联系实际表决心。学习逐步深入，不断有人主动到税务局补交偷漏税款。

木船运输业由于流动性大，只有分期分批组织学习动员。一批船到岸以后，白天要装卸货物，为不影响生产，税务局长高俊长利用晚上时间，找一只大船集中船工、船老板进行“五反”动员。发动面对面揭发，背靠背检举，每次大致五六天时间。通过“五反”运动的洗礼，对消除封建把头、维护船工合法权益、打击偷漏税均起到一定作用。

“五反”运动步步深入，通过第一阶段发动群众，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检举揭发材料，有条件转入第二阶段。我根据领导指示，将大量的检举揭发材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同时将从武汉、长沙、九江、芜湖、南京、杭州等城市反馈的大量发货票，按企业名称、商品种类、数量、营业总额、应课税额等，分年分月加以整理。这两部分材料全部交给金师端，由金师端组织查账、对账，从中发现问题。由于证据确凿，使几个大商行的偷漏税情况真相大白。群众检举的桐油兑米汤，食盐内掺砂子的案件亦相继告破。原来企图蒙混过关的不法工商户，许多投案自首。

## （三）“五反”运动成果

“五反”运动和其他运动一样依靠工人阶级、依靠广大群众。通过“五反”运动的普遍教育，重点打击，“五毒”行为有所收敛，爱国守法观念大大提高。从国家税收角度看，白河县 1952 年工商税收总收入较 1951 年增收 8.22%，这在当时增长幅度是比较高的。增收的主要原因是工商业户自查补税和税务机关检查补税、罚款。从市场上看，原来真假难分的“南盐”不见了，代之以四川的雪花盐，新疆、青海的大青盐。桐油的纯度、皮纸的质量都显著提高，短斤少两、克扣群众的现象少了。工商业户经营作风普遍好转，市场秩序井然有序，给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巩固“五反”运动成果，运动后期及时改选了白河县工商联会（简称工商联）。改选后的工商联主席是陈伯琦（西药业代表），副主席王锦星（中药业代表），卫其厚（百货业代表），成员还有手工业代表、饮食服务业代表等等。工商联是工商业户自己的组织，团结教育广大工商业者爱国守法、积极纳税，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为抗美援朝捐献，为国家建设认购公债等等。在改选工商联的同时，成立了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评议委员会，由工商联主席、副主席领导，各行业主任参加。通过民主评议，张榜公布，群众监督，使工商业户的税收负担基本合理。为了提高工商业户的纳税主动性、积极性，普遍动员工商业户订立《爱国守法纳税公约》，以便互相监督，共同维护国家法律法令。毛主席说：“未有经济不发展，而使国家财政充裕的。”为了保障供给，必须发展，培养财源。因此，税务干部只搞控、管、征的片面思想，转变为关心企业生产经营，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有目的、有重点的培养税源，以增加国家税收收入。

“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伟大的运动，意义是深远的。时隔半个世纪，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确实触及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那不是口号，那是事实，毛主席的号召变成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虽然没有订立廉洁自律的具体条文，可在国家、社会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活动中，自觉贯彻了一条准则：不取不义之财。

## 五、补充材料

### 关于“三反”、“五反”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九五二年三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些重要指示。

一

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二

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三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

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八日）

#### 四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这种统一战线，在一个大城市中，在猛烈展开“五反”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就可以形成。只要形成了这个统一战线，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 五

一、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一九五一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望各级党委在“五反”中掌握这几条原则。

二、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后二类约占百分之五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中等城市则和这个比例数字相差较大。

三、这五类包括资产阶级和非资产阶级的独立手工业户及家庭商业户，不包括摊贩。各大城市可以暂时不去处理摊贩，但对独立手工业户和家庭商业户最好给以处理。各中等城市在“五反”中最好对独立工商户及摊贩均给以处理。不雇工人、店员（但有些人家带了学徒）的独立工商户在我国各大中城市数目很大，他们中许多是守法的，也有许多是基本守法部分违法的（即有小额偷漏税，即所谓有小问题的），也有少数是属于半守法半违法即偷漏税较大的。我们既要在此次“五反”中处理一大批小资本家，给他们做出结论，也应尽可能努力将和小资本家数目大略相等的独立工商户加以处理，给他们做出结论，这对于目前的“五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都是有利的。这两种工商户一般无大问题，给他们做结论是不困难的。做了结论以后，我们就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但个别城市如认为先给其他工商户做结论，而将独立工商户的结论放在后面去做较为方便，也是可以的。

四、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我们决定将过去所定的四类工商户改为五类，即将守法户一类改为守法户和基本守法户两类，其他三类不变。在北京五万工商户（包括独立工商户，不包括摊贩）中，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十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半守法半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严重违法户约占百分之四左右，完全违法户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将完全守法户和有小额偷漏税的基本守法户分开，又将基本守法户中偷漏税较少的和偷漏税稍多的分别对待，这样做，可能发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五、各大中城市中，有些市委，对于各类工商户的情况极不明了，如何分别对待这些工商户的策略观点又不明确，工会和政府工作队（或检查组）的组织和训练甚为潦草，便仓卒发动“五反”，引起了一些混乱，望这些市委提起注意，迅速加以克服。此外，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又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立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康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六、县、区、乡现在一律不进行“三反”、“五反”，将来何时进行及如何进行，中央另有通知。个别已在县城试做“五反”、在区试做“三反”者务须严格控制，不得妨碍春耕和经济活动。中等城市也不要同时一律进行“五反”，而要分批进行，并须在严格控制下进行。

（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 六

在此次“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我们必须达到下述目的：

（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情况不明，是无法进行计划经济的。

（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走狗。各地工会均发生此种走狗及动摇于劳资之间的中间分子，我们必须在斗争中教育并争取中间分子，对于有严重罪行的资本家走狗则予以开除。

（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们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

（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的人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各部分资本家的秘密结社，例如“星四聚餐会”<sup>[2]</sup>等，则应设法予以解散。

（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



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

（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

（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

（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的工人、店员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 注释

[1] “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2] “星四聚餐会”，是重庆一些资本家的秘密结社，它进行了一系列严重违法的地下活动，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和取缔。

## 中共历史上的四次“三反”运动

王文鸾

2011年05月26日人民网——《人民论坛》

提起“三反”运动，大家都不陌生，但若问起党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三反”运动，恐怕不少人都知之不详。其实，以“三反”命名的运动共有四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的50、60和70年代。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三反”运动，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反腐倡廉的主线。

### 侧重反贪污的“三反”运动

早在1948年底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刘少奇就在《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指出：“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并断言：“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他的这一预见很快被随后的历史所证实。

建国后不久，一些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官僚主义现象就不断发生。尤其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贪污、挥霍、盗用公款高达196.7万元的严重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1952年1月4日党中央下达了限期发动“三反”运动的指示，全国县级以上的机关单位，动员干部和全体工作人员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自我坦白，检举贪污行为。一场群众性的“三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高潮。为推动运动的发展，党中央及时抓住典型重大案件严肃处理。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判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对七名大贪污犯进行宣判，其中两人被判处死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判决，对刘青山、张子善执行枪决。

公审之前，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通过薄一波向毛泽东转达意见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不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机会。”毛泽东拒绝道：“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处决刘、张的枪声一响，举世震惊。对此案的处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和气概。

“三反”运动于1952年10月结束，据统计，被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无期徒刑的67人，死刑立即执行的42人，死刑缓期执行的9人。

### 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运动

1952年11月17日，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这份报告反映的基层组织存在的诸如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乱捕乱押、打击报复、包庇反革命分子，甚至强奸妇女、逼死、打死人命等一些违法乱纪现象，令毛泽东十分震惊。他认为“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并亲自起草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该指示由中共中央于1953年1月5日发出，从而开始了全国范围的“新三反”运动。

“新三反”运动从山东开始推向全国，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采取“边反、边防、边建”的方针，基本方法是“抓两头、带中间”，即一头由各级领导机关及负责干部自上而下地检讨官僚主义作风，层层带动下级同志进行自我检讨；一头抓突出的坏人坏事，大张旗鼓地加以处理。从1953年3月开始，中央部委机关组织了100多个检查组深入基层。华北、西北及华东地区的许多省市领导也组织检查组，对下级机关进行工作检查。另外，运动还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鼓励群众检举揭发党员干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问题，各地都严肃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如湖南安化县五区的村干部曹春生，因活活打死提意见村民，被判处死刑。

“新三反”运动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矛头直指官僚主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与“三反”运动不同的是，它是在检查和落实中心工作的过程中进行的，而没有单纯去搞运动。这场运动历时半年之久，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 农村基层的“三反”运动

“新三反”运动尽管颇有成效，但因对官僚主义根源的认识局限在“反动作风的残余”上，而没有从制度层面上解决问题，对反贪污、浪费也只是附带进行，加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庐山会议后再次“大跃进”对干部作风的严重影响，以致“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比如，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大队长，50天喝了70斤酒，并以每月45元的工资专门雇人为他捕鱼吃。还有



一个公社专门开一间小吃部，供公社干部吃喝。

在这种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0年5月15日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农村基层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运动原则是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紧密地结合生产、利用农事间隙时间来进行，不论什么人，不论贪污、多占、挪用的数量大小，都必退必赔。为了正确开展“三反”运动，中共中央监委召开会议制定了具体政策：对贪污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必须给予必要的处分，凡贪污1000元以上的定为大贪污犯，给予刑事处分，是党员的开除党籍；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主要是进行教育，但对不负责、丧失职守且造成恶果者，给予撤销职务和其他处分；对犯有严重铺张浪费错误而造成重大损失的干部，应追究责任，必要时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这次会议还规定对犯错误干部的处分控制面应大体占参加运动干部的3%，其中受撤职和开除党籍处分的占1%。

农村基层的“三反”运动特点在于把经济上以至政治上的纠“左”与整顿干部作风密切结合起来。这对纠正农民反映最为强烈的五风，改变干部作风，推动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 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

“文革”期间，毛泽东针对革委会成立不久就产生的铺张浪费、财政失控的状况，及时发出“节约闹革命”的号召。196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1968年2月18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与此同时，中苏关系也日趋紧张。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8月13日，又发生了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事件，中苏边境形势全面恶化。

鉴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对散布战争恐怖、盗窃国家机密、秘密串连、乘机翻案等破坏行为“必须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2月5日，中共中央为遏制“文革”以来的干部腐败势头，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重申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正是上述文件吹响了“一打三反”运动的号角。

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虽然也处理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对铺张浪费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也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 参考资料

#### 文献

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7月出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抗美援朝战争运动战若干问题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美]I·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吴信泉.朝鲜战场1000天.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江拥辉.三十八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杨得志.为了和平.长征出版社1987年出版。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报告（1953年9月12日）.见《彭德怀军事文选》。

陈云.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1950年11月15日、27日）.见《陈云文集》。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央档案馆原件存档。

周恩来.关于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的声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见《周恩来外交文选》。

毛泽东.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

毛泽东.抗美援朝的胜利和意义（1953年9月12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杨勇.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1958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扩大的联席会议总结报告。

杨奎松.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5-30

李新.人民大学“三反”记.百年潮1998年第1期:50-53

张家芳.“三反”运动中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及“左”的偏差.史苑论坛

福建省志•人民政权的建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

石维行.毛泽东周恩来与“三反”“五反”运动

段炼.农村“三反”运动的进程及其特点.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的文献》

#### 文学作品

巍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巍巍散文《再见了，亲人》

巍巍长篇小说《东方》

和谷岩长篇小说《三八线上的凯歌》

巴金小说《团圆》

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朝鲜战争》

杨塑小说《三千里江山》

### 电影

《飞虎》《上甘岭》《长空比翼》《友谊》《三八线上》《烽火列车》《奇袭》《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长空雄鹰》《心弦》《心灵深处》《战地之星》《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神龙车队》《铁血大动脉》《北纬三十八度》《三八线上的女兵》等。

《六号门》《斩断魔爪》《徐秋影案件》《前方来信》《铁道卫士》《慧眼丹心》等。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 纪录片

《较量》《半个世纪的回响》《鸭绿江边的记忆》《没有铁丝网的战俘营》《跨过鸭绿江》等。

### 歌曲

在抗美援朝时期创作的有关歌曲及后来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电影中的歌曲有：《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来一个歼敌的大竞赛》《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志愿军高射炮兵》《消灭细菌战》《全世界人民团结紧》《转盘枪和手榴弹》《抗美援朝进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

一九五二年，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三反”、“五反”运动业已结束，面临“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历史性的问题。一九五二年夏秋之交，中国社会经济超出预料的大发展使得毛泽东作出新的理论思考和决策，改变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步骤的提法，即从现在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会主义过渡。斯大林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一九五三年初，毛泽东批评了“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和新税制“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提法，陈云对新税制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在六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毛泽东分别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及其表现进行了批评。批评右倾表现的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

总路线可以概括为“一化三改”，其中工业化是基础。早在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零五年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当政以来的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 一、总路线酝酿和历史背景

关于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原来是这样设想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里，首要任务还不是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工业化建设，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形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为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这就是说，先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待条件成熟后，再视情况，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进入社会主义。1950年，毛泽东认为，中国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将来”。他说：“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949年春，刘少奇在天津蹲点的讲话中说，到社会主义的时候，由国家下个命令，资本家将企业交给国家或由国家加以收买，就可以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然而到1952年夏秋之交，在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一些超出原来预料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1951年军费开支占全年财政开支的50%以上。1952年比重略有减少。），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奇迹般地提前完成。在新中国建立刚刚三周年之际，传来了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的喜讯，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而原先的估计是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恢复国民经济。第二个变化是，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产值比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生产总产值的公私比例是，国营占43.8%，私营占56.2%，到1952年9月，国营上升到67.3%，私营下降到32.7%，国营经济已经超过私营经济。经历“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已经开始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出现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在工业和商业流通领域中，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第三个变化是，在土地改革以后，农村中的互助合作事业普遍地发展起来，主要是互助组，也有一些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有极少数集体农庄。继土改之后的一场更加深刻的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也在悄然兴起。

一九五二年六月，在“三反”、“五反”行将结束、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时候，毛泽东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再加上他对国际局势的估计：世界战争大体上十年到十五年打不起来，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能的（此时，朝鲜战争接近尾声）。这样看来，过渡时期是可以到来了。

一九五二年十月，趁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去参加苏共十九大的机会，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就中国用十年到十五年进行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的看法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看了刘少奇的信，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刘少奇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手稿，1952年10月26日。）

1953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他在湖北孝感等地视察时，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逐步过渡”的思想。在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又指出：“所谓逐步者，共分15年，一年又有12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周恩来也说：“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场革命，但可以采取逐步的和平转变的办法，而不是在一天早晨突然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要使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地增加。”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总路线的具体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还在讲话中指出：“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现在基本建设、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都有急躁情绪，比如急于要多搞合作社，‘五反’后对资本家进攻没有停止，使

工人阶级自己处于进退两难地位。”

这是批评“左”的，然后着重批评右的。他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接着，就着重批评他认为是右倾表现的三句话。

一个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1951年3月，刘少奇在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现时党的奋斗目标，这句话又写在周恩来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向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的政治报告稿里。原话是：“以上这些成就（指建国三年来各条战线上取得的成就），说明我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已经确立。”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句话。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要确立是很难的。“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

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

1953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电报中指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将来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的提法，是不妥当的。”应改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的时期。”

### 三、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

“一化三改”的基础，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宣传提纲指出：“社会主义工业是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吸引、改组和代替资本主义工业，才能支持社会主义的商业，改造和代替资本主义商业，才能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才能最迅速地扩大生产，积累资金，造就社会主义的建设人才，培养社会主义的习惯，从而创造保证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前提”。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他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又说：“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为中国工业化扫除了政治障碍后，尽早实现工业化便成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考虑的中心问题。

1944年8月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提到了他对大工业的认识：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毛泽东写这封信的时候，中国还处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还没有获得政权，但他从理论上已十分明确地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机器工业（也就是大工业）为基础。没有大工业，就不能胜利，就要失败，就要灭亡。

总结世界各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大概有三条：一条是欧、美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先通过对内剥夺农民、对外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然后投资轻工业，待进一步积累资金后，再来发展重工业，一般花了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第二条是德、日等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用国家的力量，对外加紧进行争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战争，对内加大税收，较快积累充足资金，用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再一条是社会主义苏联的道路，通过国内已有一定基础的工业，加上国家的统一计划，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只用十几年就实现了工业化。

1951年2月，中共中央鉴于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和抗美援朝战局趋于稳定，决定着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把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这是编制计划之初就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引经据典地进行过探讨，把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作过比较，提出过不同的设想。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

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根据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包围和侵略威胁）和国内实际情况（几乎没有重工业，交通运输极不发达，轻工业虽有一些，开工还不足，而且得不到新装备的补充和改造），毛

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一九五三年六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听取编制五年计划情况的汇报时讲到：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我们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把建设重点放在重工业上，以增强国防力量，向社会主义前进。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形象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实现工业化，就是为了尽快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维护国家独立，使我国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时，中国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除了缺少资金、物资外，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技术力量和先进的工业设备。资金、物资缺乏，自己尚可解决；而技术力量和工业设备的缺乏，要在短时间内解决，非得到先进工业国的援助不可。因此，当“一五”计划轮廓草案制定后，党中央立即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援助的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

经过争取，苏联同意对我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建设在给予全面援助。1952年7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拿出了“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和准备请苏联支援“一五”计划的有关材料。随即，中央书记处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在工业资源勘察、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及派人来苏留学和实习等方面援助中国的五年计划。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一五”计划方针任务，周等人汇报了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并于1954年9-10月访华，确定156个援华项目，并同意在原子能方面帮助中国。

优先发展重工业，决不意味着忽视其他事业的发展。中共中央1952年12月22日发出的《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要“集中力量保证重工业的建设”，但“决不能理解为可以忽视轻工业的发展、农业和地方工业的发展、贸易合作事业和运输事业的发展及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以至放松对这些事业的领导。如果那样，显然也是错误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从哪里来？主要来自农业的积累。这是由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不可能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从掠夺殖民地来取得资金，也不可能取得很多外援，而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总值，1949年是68.4%，1952年是57.7%，直到“一五”计划最后一年的1957年，还占到46.8%<sup>[1]</sup>。这自然成为中国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照顾农民的利益，国家采取缩小剪刀差的办法，使工业发展得到的一部分利益返回到农民身上。但毕竟还是要较多地取之于农民，否则就没有工业化可言。对此，在一些人们中间，包括共产党内的人和党外的朋友持有异议。有的人还认为，由于建设重点在工业，“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sup>[2]</sup>。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认识水平出发，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才能统一调度全国的力量，把有限的资金和各种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建设；只有把私营企业逐步改造成国营企业，基本实现工业的国有化，才可能有效地实行计划经济；只有把农民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基本实现农业的集体化，才可能使农业大幅度增产。而这些已经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而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了。这样，原来关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以改变。

下面两段话体现了当时中央对工农业剪刀差和重工业建设的思考和认识：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9月12日）

重工业需要的资金比较多，建设时间比较长，赢利比较慢，产品大部分不能直接供给人民的消费，因此在国家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期间，虽然轻工业和农业也将有相应的发展，人民还是不能不暂时忍受生活上的某些困难和不便。但是我们究竟是忍受某些暂时的困难和不便，换取长远的繁荣幸福好呢，还是贪图眼前的小利，结果永远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好呢？我们相信，大家一定会认为第一个主意好，第二个主意不好。

——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1954年5月23日）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底以前，实行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将它们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第二阶段：1954年至1955年下半年，实行单个企业公私合营阶段。私营企业利润分配实行“四马分肥”原则，即按国家（税收）、企业（公积金）、职工（工资福利）、资方（红利）四方面进行分配；由国家派遣干部参与管理企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家掌握了领导权、生产资料变为公私共有、工人已开始成为企业主人。

第三阶段：1955年冬至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即按行业，不分企业大小同时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将生

<sup>[1]</sup>《中国农业年鉴》（1980），农业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373页。

<sup>[2]</sup>梁漱溟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草稿，1953年9月11日。

产资料交给国家，国家通过清产核资定股给资本家支付定息。这种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资料支配权完全属于国家、生产经营直接纳入国家计划、工人成为企业主人，因而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经济。

## 一、改造的历史逻辑

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及其他一切私有制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并进而在全世界实现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共产主义。真正的共产党人不仅从来从不隐瞒自己的这一政治观点和政治意图，而且始终在脚踏实地地努力实践着，为达此目的而奋斗。

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建立起来的人民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空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也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根据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建构起主要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这五种成分构成的国民经济秩序。与之相应，当时中国的民族企业亦形成国营、集体这种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企业与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劳动者合作经营的企业、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企业以及个体经营企业等多种形式并存的结构。当然，无论是宏观上的各种经济成分，或者是微观上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其相互之间又都非毫无主次之分。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以及由之而带来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民族企业结构，不仅与我国长期以来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状况相适应，而且更适应着久经战乱的中国亟需休养生息、恢复并进而发展生产，广大民众渴望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生产劳动，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也谋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现实需要。

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要从多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经济成份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还指出：“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单位，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根据必要和可能，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又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对民族资本家“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据此，党不仅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而且还真心实意地对之采取了保护和扶助的政策。如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的职工和店员长期生活在资本家剥削之下，他们在成为新中国主人以后迫切要求政府这种状况，故而不理解党和人民政府对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家所实行的政策，不时出现一些经济民主方面的过高要求，甚至要对资本家采取过激斗争。而党和工会根据当时确定的“劳资两利”的方针，深入广泛地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及时调整劳资关系，大力推行建立劳资协商会议、签订集体合同等制度，使劳资关系得到健康发展。如朱德同志指出：“正因为工人阶级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不仅在政治上领导着资产阶级，而且在经济上也经过它所领导的国家政权与国营经济来领导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使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之下，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服务。我们必须限制私人资本主义，使之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向着有益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方向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内存在和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是当前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不仅应该把国营经济看作是自己的财富，也应该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自己所领导的国家的社会财富。”“新民主主义国家国营企业中的职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解放，他们已不再受人剥削，已不是为资本家做工，而是为国家、为人民、为工人阶级自己做工了。”至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受到限制，而不能消灭。但这些企业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只能依照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所规定的轨道运转。因此，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在经济上要自觉地接受劳资两利的政策。这种容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实行劳资两利政策的方针，在一个长时期内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把新中国领导得好，建设得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然后才有可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这就是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为此目的，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就是以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服从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我们共产党员，工会工作者，必须以这样的精神来教育工人群众，领导工会工作。否则，我们会陷入经济主义与尾巴主义的泥坑，我们就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正确地组织并领导工人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任务，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私营企业中，是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应该坚定不移地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不等于无限制地增加工资，无限制地改善生活。如果是这样，那就是经济主义者的路线，是落后工人的情绪，而不是真正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会，也必须教育工人，使之懂得工人阶级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在劳资两利的原则下发展生产，并在生产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当然，在私营企业中，要实现劳资两利，光靠政府的法令和监督是不够的。资本家是有种种办法力求克扣工人、加重剥削的，要经过工人一定的适当的斗争，才能实现劳资两利。在工人与资本家的这种斗争中，工会应该是坚决代表工人的。”“这是不是说，工会不应该争取工人阶级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与工人福利呢？不是的，党和工会，首先是人民政府，必须保证工人阶级之最低生活，并争取



工人阶级的生活之可能的改善。但是工人阶级生活之改善只有在发展生活中才有可能。”总之，“革命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生产。”“作为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工会，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它的任务首先应该是面向生产。在私营企业对资本家之必要的斗争，也是为着实现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在国营企业中则更应该是团结全体职工，克服官僚主义，完成生产任务。”<sup>[3]</sup>这就为资本主义工商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这是因为刚刚建国，在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各方面，还存在着十分紧迫的任务，因此党和政府暂时还无法集中力量解决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同时经济的恢复与生产的发展还需要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工作。

又如 1950 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曾出现暂时的严重困难，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等等。党和人民政府并未坐视不管，而是及时、主动地调整决策，主要是把国有企业的一部分生产和销售让给私有企业，实际是向民族资产阶级让利。经过调整，商品滞销情况全面缓解，全国城乡经济全面活跃了起来。因此，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赢得自其出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好发展时机。

但是社会历史终究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毛泽东，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同时，资产阶级的本性并没有因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帮助其摆脱困境而有所改变。尽管受大势所趋，资产阶级也曾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的拥护，但本性决定其不仅不会致富思源，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同党和人民进行斗争。从建国初到 1956 年间，在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息的情况下还进行了三次较大的较量。

第一次发生在建国初期，资产阶级利用国民党政权遗留给新中国的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大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控制粮食、纱布等人民生活必需品以牟取暴利，先后在全国各地掀起几次物价暴涨风潮。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稳定市场，平息物价，保障供给，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取得了被史家称为“第二次淮海战役”的胜利，以事实表明共产党有管理城市、领导经济的能力。

第二次发生在 1952-1953 年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扶持下摆脱困境并有所发展，而资产阶级却利用国家为抗美援朝、保证重点建设和经济恢复而增产节约之机，唯利是图，大搞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严重破坏国家经济，影响抗美援朝，腐蚀国家干部。党和国家不得不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再次挫败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同时整肃了干部队伍。

第三次发生在 1954 年，国家逐步推进对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这本是公私两利的，但一部分资本家进行抵制，甚至搞违法活动，主要表现是：变生产资料为生活资料，抽取资金、分散物资；控制企业领导权，在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强化董事会权力，收买职员，拉拢腐蚀干部，尽力把企业中的人、财、物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故意制造混乱局面，企图逼政府遇难而退等等。他们还用提高职工工资、增加福利，挥霍资本等手段，造成企业经营上的困难。个别资本家更进行破坏设备等活动。这样，“五反”后一度减少的“五毒”行为又重新抬头。面对这些进攻，党和政府在继续深入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正式提出党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开始以和平赎买的方式实行对私有企业进行改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容许其存在发展并同时加以利用、限制、改造的过程中，必将遭遇到资产阶级的反对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点早有预见。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形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建国以后不断出现的斗争，尤其是上述三大较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这使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妨碍着我们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发展是互相对立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更加显著和尖锐起来。……有人希望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长时期地在一个国家里并存，希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或者现在还不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认为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相反的生产关系，在一个国家里互不干扰地并行发展是不可能的。”（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样的认识是随着斗争的展开与发展而逐步形成的。1952 年，经过建国后头三年的实践，经过“三反”、“五反”，党开始认识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不可能像原来设想的那样在革命胜利以后，经过一个“相当长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政治地位显著提高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也改善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更加向往，这就能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举实行私人企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的集体化，将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过渡阶段和平地、渐进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

## 二、改造的时机与条件

当时，私营企业的设备大多已很陈旧，管理又很落后，市场方面还受到种种限制，再加以不仅企业内部受到来自工人群众的严格监督，而且工人群众更热切向往着社会主义所有制。在私营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从来就十分向往在国营企业工作的阶级兄弟，“同样是工人阶级，为什么待遇会不一样呢？”所有这些因素使不少私营企业渐感困难，资本家感到难以为继。而在国家开始接受一些私营企业公私合营以后，由国家派遣干部加强管理，投资进行扩建、新建，企业职工亦得到进一步解放，当家作了主，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使企业生产迅速发展，利润增加。以平均每人劳动生产率来说，1950 年为 100，公私合营后的 1955 年则为 314，增长了两倍多，而纯私营企业为 158，仅增长了半倍多；合营企业私股分得的红利也比纯私营时期的利润多得多。公私合营的优越性由此而得到体现。更为重要

[3] 朱德.关于工会工作的几个问题.见《朱德选集》第 261-266 页，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的是，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私营工业。国营工业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计划管理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民主管理，改善了职工生活，加强了社会主义教育。职工真正当家作主，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劳动竞赛、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先进单位。国营企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使私营企业相形见绌。这样，通过比较，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不少人感到不能再照旧生活下去了。他们虽然内心不甘，但又深怕落后吃了亏，心里“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很不安宁。工人阶级更是再也不愿照旧生活下去了，迫切要求实行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为自己和本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生产劳动。阶级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变革与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解放。

经过国家几年来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到1954年，资本主义工业的大部分已经转变为各种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据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统计，北京、天津、沈阳、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八大城市私营大型工业一九五四年第一季度的总产值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产值占百分之八十六点四。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中级形式，国家逐步地加强了对大部分资本主义工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控制，在不同程度上将它们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着它们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破坏作用，发挥了它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经过这些形式，一部分企业中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人组织对于生产的领导和监督加强了，或多或少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各项改革。经过这些形式，企业中工人群众的劳动主要是为国家建设和社会需要而生产，只有一小部分是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这就使工人群众对自己的劳动感到有兴趣，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因此提高了一步。经过这些形式，企业中的资本家不仅能够分得合理的利润，并且更为直接地受到爱国守法和服从国营经济领导的教育。

但是，资本主义工业在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以后，企业仍是资本家所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因此，公私矛盾、劳资矛盾和其他许多矛盾都不能获得更有效的处理。在公私关系上，虽然有一部分资本家在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下能够服从国家的利益，在完成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任务的过程中表现了他们的积极性，但有很多资本家则不是采取这种态度，而是采取唯利是图的态度。他们虽然接受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但不按照国家的要求，也即是不按量、按质、按时间完成任务。同时，他们不关心经营管理的改善和技术的改进，以致产品质量很低，成本很高，浪费十分严重，有些在自销的时候是名牌货的，在国家包销以后，竟因质量变低成滞销货。还有许多资本家继续进行偷工减料，以坏顶好、虚报成本等违法活动。部分资本家用增加工资的办法笼络少数落后职工，并借以提高工缴利润。部分资本家甚至采取各种方法进行抗拒和消极抵制。此外，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妨碍着国家对于企业生产能力的统计和利用，因此，一方面使企业的生产潜力不能得到适当发挥，另一方面又造成生产上的某些盲目混乱。在劳资关系上，资本主义的腐败的经营管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工资制度、工时制度的混乱状态，日益成为提高职工群众的劳动热情和生产革新精神的严重障碍，并且对这些企业的生产起着很大的消极作用，对国营工厂的工资制度、工时制度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等方面，也发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限制了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限制了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的教育和改造。这样，便需要将这些工业由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逐步发展为高级形式，即公私合营形式。

当国家资本主义中级形式或者一般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的时候，企业的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更重要的变化。首先是企业由私有改变为公私共有，社会主义成分在企业内部同资本主义成分合作并且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合营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再采取资本主义方式，而将逐步向国营企业看齐，完全以发展生产、保证需要和国家计划的要求为指导方针。许多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根本改变了经营管理方针，使企业的生产符合国家需要，并使企业状况得到重大的改进。其次，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改变了，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结合在一起居于企业的领导地位，因此，职工群众对待企业采取了主人翁的态度，劳动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在筹备公私合营的过程中，许多企业的职工和技术人员欢欣鼓舞地用自己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迎接企业的合营。例如上海信谊染厂的工人为迎接公私合营，以九天的时间重建了大炉（以前拆砌一次大炉要三个月的时间），技术人员也试制成功抗结核菌的药品。天津北洋纱厂在筹备合营过程中，工人群众月月都超额完成生产计划，并且积极协助财产清估工作；为了使国家投资增装的八千八百枚纱锭早日投入生产，他们更加发挥了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提前完成了安装工作。再次，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得到公方直接、经常的领导和教育，得到职工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因而有可能在实践中学习新事物和新思想，逐步改造自己，正确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和积极作用。

合营企业发挥了社会主义成分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作用，就能正确地团结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效地教育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接受经营管理的改革，就能提高产品的质量、降低产品的成本、并且根据国家的需要和可能增加产品的数量，同时也就使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使职工生活获得必要的改善，而且也使资本家有合理的利润可得。国家对企业实行公私合营，要投入必要的资金，这就同私人股份形成一定的公私股份比例，但社会主义成分在合营企业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以及这种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不断增强，不是取决于国家投资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取决于企业中公方代表同职工群众的结合和他们对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取决于这种领导能够确实地推动企业向前进步，至于国家投资多少，则要根据国家的计划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决定。

在公私合营企业中，两种所有制即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间的根本矛盾还没有完全解决。公私合营是便于进行双重改造的形式，即便利于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并使两种改造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的形式。在合营企业中，将不断地改造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贯彻国家的计划，更好地发展生产，供应需要，不断

地提高职工群众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不断地教育、改造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循此前进，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将不断增长，为从容地和妥善地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准备条件。

### 三、团结加教育的改造政策

资本主义工商业并不是由人民政府没收，而是主要采取和平赎买的方式，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点与直接没收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有本质的不同。

从1953年至1955年夏，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初级形式的阶段，主要是在工业中采用委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商业则是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形式国家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各种合同在原料供应、产品的生产计划、销售及价格上被国家控制，企业的性质不变，内部的劳资矛盾依然存在，但在企业利润分配上则实行“四马分肥”，即所得税占30%、工人福利占15%、企业公积金占30%、资方股息红利占25%，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所减轻。

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阶段。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有两种，一是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一是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前者是由国家投资并派干部同资本家共同经营，企业的生产资料由私有变成了公有，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在企业内部联系与合作，社会主义成分占居领导地位，利润仍按“四马分肥”原则进行分配，但资本家只能按私股所占比例取得红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红利转为国家所有。这种公私合营企业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后者是按地区每个行业所有私营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组成一个大的企业单位，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一管理生产，统一调配物力、人力、财力，统一计算企业盈亏，并按清产核资所确定的股份实行“定息”的制度，资本家不再参加利润的分配。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企业的99%、私营商业从业人员的85%分别加入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就基本上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另一方面，资本家们并不都是自愿接受改造的。对此，中国共产党早有预见，对此做了许多教育和劝说工作，争取资本家的主动配合。

1953年9月8日-18日，连续举行全国政协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周恩来在这两个会议上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步骤，以及资本主义工商界的前途问题。9月7日，即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的前一天，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了10位党外人士谈话，他们是陈叔通、黄炎培、李济深、章伯钧、程潜、傅作义、章乃器、李烛尘、盛丕华、张治中。周恩来、陈云、陈毅、李维汉等参加。

毛泽东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他说：“有了三年多的经验，已经可以肯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共同纲领》第三十一条的方针，现在应明确起来和逐步地具体化。所谓‘明确起来’，是说在中央及地方的领导人物的头脑中，首先肯定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无论在共产党和民主人士方面，都还没做到，此次会议的目的，应当做到这一点。”

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毛泽东还说：“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

毛泽东在同党外人士的谈话中，专门讲了一下“一视同仁、有所不同”的方针。他说：“一个是领导者，一个是被领导者，一个是不谋私利者，一个是还要谋一部分私利者，等等，这些是不相同的。但私营工商业（是指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就利润分配上说，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因此可以和应当说服工人，和国营企业一样，实行增产节约、劳动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提高数量质量，这样对公私、劳资都有利。”又说：“现在多数公私合营厂的缺点（主要是资方无权和不发红利）必须改正，否则将阻塞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学民生公司的榜样。”民生公司是一家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航运大型企业。

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先进的资本家。他说：“需要继续在资本家中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此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一部分眼光远大的、愿意和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靠近的、先进的资本家，以便经过他们去说服大部分资本家。”

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传开以后，在广大工商业者中间引起了波动，普遍感到震动和不安。一部分人存在严重抵触，说“上了贼船”。有的大资本家在大势所趋下，为了保持其资本主义阵地，宁愿拿出一个企业抵债，而不愿实行合营，说“宁砍一指，勿伤九指”。少数人则以“三停”（停工、停伙、停薪）、抽逃资金、破坏生产等手段抗拒社会主义改造。

针对这种情况，1953年10月-11月，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了。李维汉在会上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经过学习和讨论，大多数人受到教育，程度不同地、勉强或不勉强地接受了总路线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许多人感到“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不犯五毒，接受限制，加强学习，欢迎改造”。黄炎培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只要接受改造，将是“风又平，浪又静，平平安安到达黄鹤楼”，“到社会主义都有一份工作，有饭吃”。黄炎培的发言，博得许多代表的赞同。许多代表开始认识到，只要遵循国家的总路线，将来可以稳步进入社会主义。许多人的情绪由原来的疑惧、怕挨整而转变为比较开朗。会议闭幕时，李烛尘致闭幕词欢呼“毛主席万岁”。经过这次会议和会后的集中学习讨论，资产阶级中间涌现出一批拥护总路线的进步骨干，并在以后几年中日益增多，成为协助中国共产党

顺利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1955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加快的时刻，为了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也为了稳定私营工商界的人心，毛泽东亲自出面做工商界的工作，打通思想，消除忧虑，指明前途。10月27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座谈会，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等应邀出席。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他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三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十五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在这里仍然强调，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地做，生产关系、生活方式的改变要逐步地进行。

最后，他提出怎样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来鼓励大家。他说：“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毛泽东文集》第6卷，P488-491）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召开第二次关于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有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等，范围比较大。座谈会先由陈云讲话，着重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接着毛泽东讲话，开门见山，主题是如何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他针对私营工商业者“七上八下”的普遍心态，提出要安下心来，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共同努力。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毛泽东还着重地讲到，要在整个工商界加强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宣传教育工作。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的赎买政策。他说：“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地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十五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

他接着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一九四九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十五年、十八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方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11月，毛泽东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科学地阐述了对资产阶级要作正确评价。他说，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业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毛泽东说，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好相反。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末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1月24日）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策的一段十分重要的论述“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代价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决议》特别强调，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采取教育的方法。一种是像“五反”那样的群众斗争的方法，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而当基本打垮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以后，就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讲演、上课、开座谈会、办学习班以及引导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

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另一方面，《决议》又指出，改造私营工商业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遇到资本家的动摇或反抗。但是，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就能够减少他们的动摇或反抗，并能防止党内右倾的发生。

《决议》最后提出要同时防“左”和防右：“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P440-443）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原来没有合营的分散落后的私营中小企业，在大企业相继合营后，在生产和经营上都感到有许多困难，也纷纷要求早日实行合营。最初，毛泽东还“泼了点冷水”。他觉得，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已经解决，工商业改造的速度问题也已解决，为稳妥起见，似乎无需再来一个工商业改造高潮，或者说，现在提高潮还不是时候。但是高潮竟然来了，而且来得那样迅猛。这是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但他又十分高兴。他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5日）

1956年1月，北京工商业者首先发起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很快波及全国，各地工商业者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

1月15日下午，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冒着凛冽的寒风，热烈庆祝实现全市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笼罩整个北京城。在随后的几天里，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兴奋之中。

#### 四、几个公私合营的例子

##### 山东南定玻璃厂

（改编自《公私合营那天我跑着喊“万岁”》，原作者沙红翠谭壮飞）

山东南定玻璃厂，是由十家联营玻璃有限公司经过公私合营而成的，当时一共有玻璃制作工人115人。在健在的事2位老人的回忆中，他们说在他们心中，公私合营来了，就等于光明来了，就等于社会主义来了，就等于好日子来了。

淄博工矿区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从1949年开始有重点地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政策。1954年初淄博工矿区确定以博山慎昌铁工厂为首户公私合营试点。紧随其后，1954年10月15日，首家玻璃行业公私合营的十家联营玻璃有限公司开始实现公私合营，正式挂牌“（公私合营）博山玻璃厂。”

公私合营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分步骤进行。王长庚老人1948年参加工作，他回忆说，1949年有了工会，1951年就有了工作组，而他们的“身份”也在悄然发生着变革。

“1951年11月1日，泰成炉、泰顺炉、启新炉、东记炉、西记炉、鸿升炉、仁和炉、仁和成炉、同心炉，志新炉十家玻璃炉开始联营，就叫十家联营玻璃有限公司。”王长庚老人的记忆力特别好，已经过去近60年的事情，每个重要日子他都清清楚楚。

1954年10月15日，在博山玻璃厂，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打着旗子，有人举着横批，还有的人跑前跑后奔走相告。“公私合营万岁！公私合营万岁”。老人说，那天他们特别兴奋，跟着游行队伍高声喊着口号，老人说当年不管哪个单位实现公私合营，都唯恐天下不知，每次都会有很多人上街游行，搞庆祝大会。

说起当时心里的真实感受，王长庚说了5个字：“心里格外恣（意为舒服）”。王长庚说，现代人也许不理解他们当时的疯狂，但在那代人眼里，公私合营，就等于社会主义来了，光明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大体上经过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公私合营两个阶段。老人回忆说，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后，博山华泰炉、复印炉等只要是干玻璃的，都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后的最大变化就是我们工人开始是人。”刘绍华老人说，作为玻璃工人，要说感触最深的变化当属公司合营后增加了降温设备。

玻璃工人的工作环境恶劣，在各种行业都排得上号。王长庚老人说，他们那时候使用的是朝天炉，炉内气温达到一千多度，而工人就在一米之外的地方干活，身体所接触的温度都在40℃以上。“可那时候没有降温设施，而且没有休息时间，资本家剥削劳动力也不会让机器闲置，所以只要原料熔化了，我们就得连轴转制作玻璃。”常年在高温下炙烤，老人们的手都有些变形。

1954年公私合营后，新厂第一时间就增加了降温设备，刘绍华描述说：“设置一个隔热壁，上面有水管，不停地有冷水循环，这种降温设备就叫水幕，除此之外，工人身后还增加了风扇。”

还有其他四大变化分别是：从睡炉前草包到分职工宿舍、从人工气泵到空气压缩机、从没白没黑干到一天八小时、从被剥削的工人到主人翁。

孙迎芳老人说，当年给资本家的私人玻璃炉干的时候，每人睡一个草包，没有被褥。分为三等饭，一等是细粮，资本家吃，二等是煎饼窝窝头，资本家亲属吃，三等则是地瓜、高粱面等，工人吃。



“工资涨了，我跟资本家干的时候，每月发7斤小米，按1.1毛钱折价，联营后我一个月的工资是33元钱，还实行四马分肥，我记得有一个月，我的工资拿到70多块钱。”说道这里，王长庚老人脸上露出孩子般的自豪。王长庚“多了的工资”就是依靠超产费等挣出来的。

五大变化中，“从被剥削阶级到主人翁”是最根本的变化。老人说公私合营后，他们从地上睡到床上，还有了职工宿舍，心里很恣。

当记者问起在资本家玻璃炉和（公私合营）博山玻璃厂干活的最大区别是什么时，老人们说，那时给资本家干，被动；现在给自己干，主动。

公私合营的另一个重要群体资本家（小企业主）对公私合营又是怎样的感受？王长庚老人说，那时候国家吸收有威望的资本家担当国家重要职务，对公私合营的进展起了很大的稳定军心的作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除定息外，开始和原来自己的工人一起劳动，并在其中逐步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4年公私合营后的博山玻璃厂，因为工艺、设备落后等问题，厂子效益很不好，1955年一年，基本是干5天休息5天。但是当家作主人后的工人能够正确面对遇到的困难，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并依靠集体的力量解决。

时任厂长的张省每日睡不着觉，如何才能把厂子的效益提高、为国家上交更多利润的问题时刻盘绕在他的脑海。当时他面对的矛盾很多，要提高效益就得让工人加班加点研制新产品，而刚刚实行公私合营又不能“剥削”工人。

“有风险，我也豁出去了，不能这样下去！”果断的张省最终选择了严格生产制度以提高生产效率。他对玻璃厂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每个工人进厂前都必须穿着工作服而且必须扣好纽扣。而从公私合营的狂喜中渐渐冷静下来的工人，开始为自己工厂的未来考虑，主动加班加点研究、琢磨如何制作更好的玻璃制品。“那个时候我们制作半斤酒瓶子，质量要求是‘上三线下三线’，就是酒瓶子的重量是9两，重不能超过9.3两，轻不能轻过8.7两。而当时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一个班组8个小时没有一个正品。”王长庚老人说，因这个事玻璃厂还有了流传至今的“砸瓶子事件”。心急如焚的张省厂长对全厂说，没有正品就制作一个砸一个，直到有正品出现。张省厂长和工人自愿的加班加点终于有了收获：厂子的产品质量获得苏联专家的肯定。

1957年初，山东南定玻璃厂开始建设后，博山玻璃厂的工作人员陆续进入山东南定玻璃厂，1959年1月2号博山玻璃厂整体并入南定玻璃厂。老人们说，山东南定玻璃厂几起几落，曾经辉煌，全国各地来学习，今日破产，更待后人作前车之鉴。

#### 开封卷烟厂

1955年底，开封市开展公私合营。1956年烟厂进行公私合营，先后合并了开封地区的正义、义丰、龙华、振兴、益中等九家私营烟厂后，改称“公私合营开封（卷）烟厂”。当时是先清查各私营资本家的资产，约定给付20年的定息进行赎买，同时还安排资本家做厂里的副厂长，抓生产，厂里的书记和厂长由政府另外委派。当时的资本家迫于形势压力都自愿申请进行公私合营。当时对资本家的认定标准是：有2000元以上的资产或雇佣3个以上的工人，资产30元以上的算小业主。以地方国营开封烟厂为主，其他小厂为辅，党委设在主厂，其他厂设支部。小厂的土地后来交还国家，设备人员和材料搬到大厂。

工厂的行政运行正规化，按生产计划走，资本家当副厂长实际上没有权力。

#### 四川民生轮船公司

原文为《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范例》，人民日报（1953.10.11）

新中国四年来，发展了许多公私合营企业。这些企业在合营之后，大都改善了经营管理，提高了生产，发展了业务，并且都获得了盈余。民生轮船公司的情况，就是这些企业中的一例。

民生轮船公司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私营航运业。过去由于机构臃肿、经营不善，以致年年亏损。解放后，人民政府虽不断贷款维持，但因公司本身没有从根本上加以改革，仍然没有能够扭转一直赔累的局面。去年秋天公私合营之后，国家派遣干部参加了经营管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整顿了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召开了职工代表会，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得到高度发挥，生产效率也就迅速提高起来，企业经营也很快转亏为盈。私股十数年来第一次分到了股息，职工的生活福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这些成绩的获得，是与国营经济的领导，企业中公股的领导分不开的；是与国家在技术、资金、原料、设备供应等方面的大力扶助分不开的；是与职工劳动态度的转变，高度地发挥生产积极性分不开的。

这也充分地说明了：私营企业中由于加入了社会主义成份，便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转变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使生产力获得了广泛的活动场所，迅速地获得提高。这就是公私合营企业优越性之所在。

其次，我们从民生轮船公司合营后业务发展的过程中，还得出如下一些经验：第一，必须在政府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民主改革与生产改革，把旧机构遗留下来的经营落后、生产浪费、机构臃肿等致命病根，比较彻底地加以革除，并新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进步的制度，尤其是民主管理的制度，树立为国家建设与人民需要服务的新的经营方针。这些改革，是前进的起点，都是十分必要的。第二，企业成立了新的董事会，公私代表都应尊重双方权益，发挥董事会的职权，对企业的重大问题，恰当地采取了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不但提高了私股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公私双方在国家政策与计划之下，协力合作，依靠职工，搞好了业务。第三，合理地分配盈余，既可保证生产事业的正常发展和照顾职工的生活与福利，也使投资人有利可得。这就具体而生动地体现了国家公私兼顾的经济政策，因而提高了私方经营的信心。

#### 上海的公私合营工厂

来自《人民日报》1954年3月13日

上海有十三家规模较大的私营工厂在今年一、二两个月内先后实行公私合营。

这十三家工厂是：上海机器厂、大同铁工厂、华成电机厂、新安电机厂、统益纱厂、崇信纱厂、新裕纱厂、恒大纱厂、鼎新染织厂、正泰橡胶厂、中南橡胶厂、江南造纸厂和顺风搪瓷厂。这些厂的产品和国计民生有很大关系。全国知名的正泰橡胶厂，每月可产汽车轮胎一万一千付，力车胎六万三千付，各种胶鞋七十五万双。拥有六万三千枚纱锭的统益纱厂，每月所产的纱如织成布，可供九十三万人各做一套衣服。华成电机厂和新安电机厂，能制造工业建设用的各种规格的电动机。

这十三家工厂，在合营前都是接受国家加工订货的，几年来生产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正如统益纱厂总经理董春芳所说：“统益在国家扶持下生产虽有发展，但总不及国营和公私合营厂先进，主要的道理，就是旧的生产关系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统益纱厂自接受国家加工订货以来，是有盈余的，但和其仅有一路之隔的公私合营信和纱厂比较，就差得很远。信和纱厂一九五三年平均一万纱锭盈利三十亿元，机器设备比信和纱厂优良的统益纱厂，一九五三年平均一万纱锭只盈利十九亿元。再如工业劳动模范计浩然在江南造纸厂实行公私合营前设计了一种自动铡草机，想代替二十个女工吃力的手工劳动，但该厂资本家认为有了这种机器，二十个女工的工资仍要支付，得不到多少利益，就不肯采纳这一合理化建议。生产的提高因此受到影响。上海机器厂接受国家加工订货后，虽然改变了企业的瘫痪状态，维持了生产，但对于国家的加工订货屡次不能按期完成任务，企业本身也负有债务。

自从广泛宣传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来，上海许多私营工厂向政府申请实行公私合营。政府在考虑了必要和可能等各方面的条件后，首先批准了这十三家私营工厂实行公私合营。在合营过程中，公私双方经过充分协商，处理了合营中的各项事宜，公平合理地清估了企业资产，人事安排也做到了量才使用。因此，部分资本家原来怕估低企业资产、怕合营后自己无职无权等顾虑，都已消除。

目前，十三家合营工厂的 23000 职工正为庆祝工厂的新生而努力生产。统益纱厂的工人提出在生产上要向国营厂看齐，要生产更多更好的布供应人民。上海机器厂工程师归霖最近设计了一种新的水泵，作为对实行公私合营的献礼。

## 五、总结

长期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有两面性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有两面性。我们党正是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个特点出发，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通过赎买政策，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果党不是采用这样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改造的政策，或者资产阶级不接受这样的政策，1955 年冬天敲锣打鼓申请公私合营的场面就不可能出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篇章就不会写得那样顺手。

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自己使用多年的一件器物忽而不归自己所有，在情绪上都要发生波动；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产生一定的痛苦，是不难理解的。周总理 1955 年 1 月 16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谈到荣毅仁先生时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两种情形都存在，都是真实的。这种又接受和平改造，又感到痛苦的表现，如实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心态。如果交出工厂，如弃敝履，没有一点痛苦，那就不是资产阶级了。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进程中，不可避免也有缺点和偏差。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总是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毛病和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也受到一些“左”的情绪的影响，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把一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和只有轻微剥削的小业主一起带进合营企业，对他们同对资本家一样地改造，混淆了剥削者和劳动者的区别；对小企业和商业网点实行大并大裁，造成人民生活的不便；实行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后，有些产品质量下降了，花色品种减少了，等等。

尽管如此，中国终究成功地走出一条独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进一步实现国家工业化、以至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中国历史，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伟大的社会变革。

## 第三节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一、个体手工业的生产特点

手工业，就是主要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和服务业。我国解放初期的手工业，就其与农业分离的程度来说，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从属于农业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家庭手工业，如自制农具、衣服等；二是农家兼营的商品性手工业；三是独立经营的个体手工业；四是雇工经营的工场手工业。按照有关规定，作为三大改造之一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主要是第三类，即个体手工业，但也包括着第二类中以经营商品性手工业为主的兼业户和第四类中雇工不足 4 人（学徒不算雇工），本人参加劳动而且是手工劳动出身的工场主。至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中以农为主的兼业户，都归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第四类中雇工超过 4 人的工场主，一般归入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范围。

个体手工业同个体农业比较，就其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来说，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这主要是：（1）都是分散的、小规模的经济。据 1952 年对 16 个城市的调查，城市个体手工业户平均每户劳动力不到 3 人，农村大多只有 1 人。1954 年调查，城市户均 2 至 2.5 人，城市绝大部分 1 户 1 人。从布点方面来说，农村手工业往往比农业更分散，如有些农村甚至十里八里还找不到一个木工或裁缝。（2）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户中的中农贫农一样，既是劳动者，又是

私有者，他们都自食其力，不剥削别人，而且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包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

(3) 生产不稳定，容易发生两极分化。农业有季节性，不少手工作业受农业季节性影响，也时断时续。以铁匠作业为例，通常是：“三月（农历）菜花黄，铁匠称霸王”，过了“小满”，就是“苦五、绝六，淡七月”，过了七月，又进入了“八活、九金、十银”的旺季。

和小农一样，手工业者一方面是劳动者，另一方面又是私有者。手工业生产是分散的、落后的、保守的、盲目的，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改变它的生产关系，就不能把它的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就不能把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为近代的生产方式，并提高其生产力，也就不能把手工业者由穷困的状况引到富裕的境地。个体经济本来是脆弱的。由于天灾、人祸、市场竞争和生产季节性影响，使个体手工业者同个体农民一样，很容易发生两极分化。

#### 个体手工业不同于个体农业的特点主要是：

1. 没有多少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比农业还低。个体农民种地，一般需要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而个体手工业者却只需要简单的工具。据 1953 年对北京、武汉，广州、重庆等城市 86811 户个体手工业户调查，平均每户资金 851 元，而其中 90% 以上的户，资金不过 300 元左右。在这些资金里，家具工具占 50% 以上。一部分手工业者基本没有生产资料，主要凭手艺吃饭。因此，手工业者常把自己的双手比喻成“十亩良田”。所谓“手艺手艺，无本生利”，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2. 个体手工业经济是小商品经济，它的生产活动离不开市场，通过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同其他经济和消费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供销关系一断，生产就无法进行。这一点，同个体农业主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显著不同。

3. 行业众多，经营灵活。在分工不发达的古代，人们就通称手工业为“百工”，随着分工的发展，今天手工行业就更多了。按其产品用途来划分，大部分属消费品手工业，一部分为生产资料手工业（如采矿、烘炉冶炼、建筑、农具和车辆制造等），另一部分为服务业（如农具和黑白铁修理、交通运输、理发等）。同一行业的手工业，往往城乡兼有。据 1954 年统计，按全国商品性手工业总产值计算，城市和农村的比例为 42.9: 57.1。由于行业多，规模小，兼跨城乡，因此经营方式十分灵活，有的坐店设厂，有的走街串巷，许多手工业者常常频繁往返于城乡。有些加工性的手工业户，则通过传统的“领原料、交成品”的方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同城市现代工业联成一体。例如建国初期，上海有一家行销全国的毛巾工厂，它自己有一套整染设备，但织机却只有四十几台，它的生产基础是上海县和川沙县的几千户手工作坊、个体手工业者或兼业农户。它通过“发原料、收成品”的方式，同分散在城乡的手工业者联系起来。北京市著名的戴月轩、老胡开文毛笔店，自己都不制造毛笔，他们的毛笔都是广大分散的手工业者用领来的原料按照严格的规格质量代为加工的。

4. 技术传授主要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由于市场竞争，手工业者时刻面临着失业的威胁，因此，手工业技术是不轻易传人的。传统的传授方式是拜师学艺。某些“绝招”还有传子不传女的陈规陋习。

## 二、手工业走向合作化

手工业从小生产发展为大生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有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资本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资本主义的道路是少数手工业者发展成为资本家，大多数手工业者受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榨取，成为大工业发展的牺牲品，因而穷困、破产，沦为无产阶级，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使手工业者逐步从分散生产到集体生产，逐步改变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成为合作社的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帮助下，逐步改变手工工具生产为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使手工业者由穷困走向富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

解放以前，手工业者因资本小，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都有困难；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控制着他们的原料供应和产品推销，使他们不能摆脱穷困、破产的道路。解放以来，凡是与国营经济、合作社商业发生联系，脱离了这些剥削控制，从供销入手，组织了合作社的手工业，就出现了新的面貌。

从建国初的情况来看，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手工业的需要都是很迫切的，首先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其次是各地居民所需要而大工业目前还不能制造或生产不足的消费品；第三是农业生产品的加工业；第四是服务于大工业的修理业和小型制造业。因此，手工业还有着广泛的作用和远大的前途。所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迅速进行的同时，通过走合作的道路改造个体手工业，也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让这些手工业者自身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从 1950 年起，我国即对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手工业的方法和步骤，是从生产过程中最困难的供销环节入手，“联合起来，凑合股金，建立自己商业的和生产的组织，去推销自己的手工业产品，并购买原料和其它生产资料”，“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组织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即由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由手工业者自愿联合组成，绝对不能强迫入社。社员必须直接参加劳动，不能只以资金入股。改造手工业的方针，是积极领导、稳步前进；贯彻自愿互利原则。

(一) 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这是由独立手工业者或家庭手工业者通过国营经济、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供给原料，推销成品的加工订货方式组织起来的。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还没有改变原有生产关系，仍然是分散生产的；师傅、家长、业主入生产小组，他们的妻、女、学徒、助手虽也参加生产，但还不能入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小组摆脱了工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和控制，与国营经济、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建立了联系，获得了供销上的扶持，解决了淡季生产的一定困难，增加了产量，增加了收入。

(二) 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这是对手工业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形式。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领导着若干生产小组，这些小组有的是由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接收过来的，有的是供销生产合作社自己组织的。这种合作社是生产小组的扩大，主要有四类小组组织形式：

第一类，社员直接领原料交成品，分散生产，组长只管通知事情，召集开会和对组员的教育工作；

第二类，组长统一领原料交成品，分散生产；

第三类，生产过程的部分环节开始集中生产，其余环节仍然分散生产；

第四类，小组内实行简单的分工协作。

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后，政府首先要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的前途教育，生产合作社章程、原则的教育；组织类似产品评议委员会的机构，民主规定产品的标准、规格，作到参加生产者一律入社（和手工业者一起参加生产的妻、女、学徒、助手等也吸收入社）。使社内生产者在政治上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把第一、第二两类小组的家长、师徒关系改变为一定程度的合作关系。

接着，进行“剥削别人不光荣”的教育，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做到稍许增加助手、学徒的工资，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但因技术和生产资料在业主、师傅手中，使业主、师傅比过去所得也要多些。同时进行尊师爱徒的教育，订立师徒教学合同，并以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公积金购置部分生产工具，以便把生产过程的部分环节改变为集中生产。这就是第一、第二两类小组的剥削关系和生产过程有所改变，增进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相互之间的团结互助精神。

之后，按小组为单位进行简单的分工协作的教育，以改变手工业者原有的生产单位。为了做好这一点，要注意社员的自愿结合，把手工业的主要劳动者和辅助劳动者适当加以组织（不能只要劳动者，不要辅助劳动者）；根据技术高低，主要劳动和次要劳动，实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由于实行了专职生产，这就可以提高质量、增加产量；由于实行了分工协作（虽然工具还是私有），已把个人生产品改变为集体生产品，因而社员个人就无权出卖生产品，这就可以阻止社员淡季来旺季走，好的产品自己卖，不好的产品交给合作社的自发趋势的发展；从而也就密切了社员与合作社的关系。

完成了这些方面的改造后，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就可以过渡到生产合作社。过渡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某一供销生产小组的改造较快，发展壮大后，从供销生产合作社中成长为生产合作社；另一种是各个供销生产小组的改造工作大体齐头并进，供销生产合作社全部改变为生产合作社。

（三）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这是手工业者集体生产的合作工厂，它把手工业的私有制最后改变为集体所有制，把手工业小生产者引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一种是由手工业工人自愿联合起来，凑集股金，租借生产工具，集体生产，在国营经济、供销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帮助下，逐步壮大，人数多了，规模大了，积累了公积金，成立起来的；一种是个体手工业者自愿联合，经过供销生产合作社的改造转变过来的。

生产合作社首先把手工业者由分散生产改变为集体生产。只有集体生产，才有可能实行分工协作，改进手工工具，提高技术，逐步实现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增加社员收入，积累更多的公积金，扩大再生产。只有这样，才能最后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手工业的生产情况不同，不能不加区别地没有步骤地实行集中生产。有的可以一下子全部集中生产；有的可以一部分集中生产，一部分分散生产，待条件成熟后再全部集中生产；有的可以主要部分集中生产，次要部分巡回生产；有的可以任务大时集中生产，任务小时分散生产；有的可以分几个地点集中生产。但凡是能够采用半机械化或机械化的手工业，也必须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实现全部集体生产，只有集体生产才能给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生产的大规模社会化铺平道路。

### 三、手工业合作社与出现的问题

根据中央指示，手工业者合作运动的初期，一方面，在一些同国民经济关系最密切并有发展前途的行业中，选择觉悟较高又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劳动者，重点试办合作社；另一方面，对一般个体手工业者，从他们最困难的供销上给予帮助，采取从供销入手，组织加工定货，给予银行贷款等措施，支持和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进行生产自救。建国之初，全国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为 585 万人（另有农民兼营性手工业者 1200 万）。恢复时期的三年，经过重点试办，手工业合作组织由 300 多个发展到 2700 多个，社（组）员人数从 8 万多人增加到 25 万多人。

1953 年，我国进入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7 日，全国合作总社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到会作了题为《把手工业者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讲话。他主张，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应该从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绝对不要规定一个格式。会议提出：手工业合作组织必须根据生产需要和手工劳动群众的觉悟程度，采用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式，由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坚持“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1954 年 11 月，国务院成立了手工业管理局。12 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朱德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要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办好》的讲话。陈云同志也到会讲话，指出：“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以对主要农产品和某些工业品实行统购统销、统购包销，手工业的原料供应遇到了困难，个体手工业者困难尤大。会议确定 1955 年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心任务是：继续摸清主要行业的基本情况，整顿、巩固、提高现有合作组织，在此基础上，从供销入手适当发展新社。1955 年 5 月，中央在批转会议报告时指出，对手工业供产销和手工业改造，要同时考虑，要贯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

到 1955 年上半年，手工业合作组织已发展到近 5 万个，人数近 15 万人。

1955 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步伐加快，随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进入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手工业改造的步伐也急剧加快了。同时，手工业者要求组织起来的情绪也十分高涨，建社速度也明显加快了。据统计，

1955年6月到12月半年内，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从4.98万多个发展到6.46万多个。社（组）员从143.9万多人发展到220.6万多人，增加了53.5%。195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并说：“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

12月5日，刘少奇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同时，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少奇同志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12月20日，少奇同志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的汇报，提出：手工业改造不应比农业慢。与其怕背供销包袱，还不如把供销包袱全部背起来好搞些。他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在1956、1957两年搞完，说“时间拉长了，问题反多”。

到1956年6月底，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已占手工业者总数的90%。同年底，全国组织起来的手工业合作社（组），经过调整为9.91万个，社（组）员达到509.1万人，占全部手工业从业人员的92%。至此，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转变基本完成。新成立的手工业合作社，有一小部分是经过生产小组的过渡形式发展起来的，大部分则是改造高潮中直接组织的。1956年产值比1955年增长15.61%，其中集体手工业产值比1955年增长2.68倍。至此，中国手工业基本上实现了从个体经济到集体经济的伟大变革，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社会主义集体工业经济。从总体来看，发展方向是对的，成就是主要的。

由于在后期，一些地方不顾具体情况过快地发展合作社，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给合作运动带来一些偏差和失误，对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一定的困难。如过早地集中合作，经济上统一核算，带来一系列问题：（1）群众不方便了；（2）原来分散经营的供销关系割断了，因为等待生产合作社的统一经营，原个体手工户不接受零散定货，而合作社的统一经营一时又建立不起来，致使生产停顿；（3）吃“大锅饭”，出“大路货”，产品品种减少，质量降低，某些传统名牌产品失去了原有传统风格；（4）合作化后，不管师傅和徒弟大家都是社员，原有的师徒关系淡薄了甚至割断了，这对技术传授是不利的；（5）由于盲目集中，缺乏厂房和生活服务设施，一时造成混乱，使手工业者本来就不多的财产受到损失。毛泽东同志一向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他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在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情况时所作指示中，主题说的是要加快对手工业的改造，但同时也指出：“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而且特别重视保护特色手艺，“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但是，在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下，对保留一部分手工业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补充的积极作用也认识不足，把一些本来可以不组织的个体户，也组织起来了。结果在改造高潮中集中合并过多，使一些产品减少，留了很多“空白点”，于是所谓“地下工厂”即自发的手工工场和手工业户乘虚而入。据统计，上海市1956年底手工业自发户达到4236户，从业人员14773人，从事90多种行业的生产。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察觉到高潮中出现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中心是解决过多地集中生产和统一经营等问题。经过调整、整顿，继承和发扬了手工业的优良传统，促进了合作经济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使工作未受重大损失，并初步显示出合作化后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只到合作化就算完，而要继续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这是早就确定了的方向。1956年3月5日，毛主席在听取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汇报时指出：“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了。你们努力快一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他肯定“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是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1958年7月25日到8月4日，中华全国合作总社召开省市自治区联社主任会议，集中研究了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会议向党中央、毛主席作的报告中认为：“我国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发展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新阶段”，“党中央在1955年底就已经指出了这个发展方向”。合作经济是“过渡性”的经济，“从个体经济到合作社所有制过渡，再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然的发展规律”。过渡形式有两种：一是过渡到联社经营的合作工厂；二是直接转变为地方国营工厂。由于联社的财权已经完全归地方党政机关掌握，因此“合作工厂实际上也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这个报告经中央批发后，全国城乡出现升级过渡高潮。到1959年5月止，全国10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500多万社员中，已经过渡为地方国营工厂的占37.8%，转为合作工厂的占13.6%，转为人民公社工厂的占35.3%，继续保留合作社形式的只占13.3%。

#### 四、常州的例子

解放前的常州手工业，因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低下，就像漂泊在惊涛骇浪里的一艘破船，随时都会倾覆淹没。特别是在反动阶级的统治下，承受着官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操纵、剥削和压榨，过着朝不保夕、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很多从业者辛辛苦苦劳作一天，连稀饭都吃不上，肚皮都填不饱。手工业中曾流传着很多谚语，如“篦箕屑屑，没有出息”；“清明布，铺大路”（意思是过了清明节土布已买不出去）；“竹子节节空，不够吃和用”；“西北寒风起，做藤佬吊死在茅坑里”；“旺季忙死，淡季饿死，债主逼死”，等等，这都是他们当年真实的生活写照。

解放后，常州的手工业迎来了发展的曙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压在他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新成立的常州专署生产建设处合作科（后改常州市合作总社）为帮助手工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想方设法帮他们解决资金短缺等问题，同时还为他们组织物资生产原料，扩大加工订货和销售渠道，改变了他们解放前那种朝不保夕、奄奄一息的现状，使手工业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1951年，常州手工业户数由解放前的4540户增加到5794户，从业人员由6826人增加到9032人，产值由200多万元增加到700多万元。



随着手工业的稳定好转，常州市合作总社鉴于他们原始落后的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从源头上帮助他们加快发展，将分散落后的个体手工业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由分散生产向集体生产迈进。

1951年，常州开始合作化探索。将具有悠久历史的梳篦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合作化对象，从300多户梳篦业中，组织部分失业并愿意合作的手工业者开展生产自救，成立梳篦生产社；同时，鉴于常州土织布比较发达的现状，还成立棉织生产社。这两个社是常州最早诞生的手工业合作社。以后为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支援农业为重点，又在铁木业中组织合作试点，成立了生产犁头、钉耙等的铁业合作社和木器合作社。在政府资金、原料供应、购销等扶持下，合作社生产出现了蓬勃发展势头。到1952年底，有1013名手工业者参加合作社，虽然社员数量只占全市整个手工业者的十分之一，但产值却超过了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合作社的生产力明显提高，使原来一些不想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者看到了合作化的美好前景，为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1953年，全国开始大张旗鼓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总任务的一部分，明确在组织上，由个体、工场手工业逐渐向手工业生产小组、生产合作社转变；方法上，从供销入手，实行生产改造；步骤上，由小到大，由低级向高级转变。多数手工业者看到政府推行的政策非常有利于自身的发展，纷纷要求入社，合作化运动出现快速发展态势。到1955年，全市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38个，其中手工业合作社14个，供销社3个，生产小组21个，社组成员发展到4525人，比1952年增加了3521人，完成产值866万元，占手工业总产值的39.6%。合作社不仅壮大了社会主义经营阵地，还成为大工业的有力助手，并且对分散户起到吸引示范作用。如4个老社之一的铁业合作社，刚开始组织成立时，只有6个社员，1台螺丝车，入社时所规定的社员股金都缴不出，资金由上级部门为他们垫付了1300元钱，只能做些犁头、钉耙之类的农具，3个月产值不到1000元，社员每月人均工资25元。到1955年，该社已发展到154人，增添了钻床、刨床、车床、冲床、马达、鼓风机等生产设备，不仅能生产农用工具，还能生产螺丝、锻件、机器零件、切削机件等配件产品，年产值猛增至56万多元，3年积累资金12万元，人均每月工资提高到35元以上，比组织起来时，增加近40%。社员还享受劳保、公费医疗等福利，拿到1000多元劳动返回金，集体生产组织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那些没有入社的手工业者通过对比，普遍感到加入合作社要比单干有前途，加上社会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舆论宣传，逐渐认识到只有组织起来，才能改善落后的生产方式；只有依靠政府扶持，才能生存发展，摆脱贫困。因此，单干的手工业者开始醒悟，迫切要求走合作化道路。

1956年春，全市的合作化运动进入了高潮。印刷、酒酱、纸业、漆业、铜锡、皮件、五金电料、编织、木器、打铁、制帽、缝纫、镜箱、钟表修理、豆腐、度量衡器、竹藤柳器、雨伞等70多个行业、万名以上的手工业者，争先恐后打报告，递决心书，要求入社和全行业合作化。一年中，全市手工业从业人员有10658人参加了合作社，占到调查归手工业改造人数的92%。到年底，全市已组织起100个社组，基本完成了改组改造工作。全市实现手工业总产值2188万元，比1949年增长58倍。一些小作坊或小工场逐步壮大起来，晋升为后来有影响的企业，如常州梳篦厂、常州人民印刷厂、常州酿酒总厂等。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常州的手工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为常州今后的轻工业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参考材料

### 文献

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5

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90-97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第七章、第八章

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历史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3期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1955年全国职工人数构成与分布的概况》，《新华半月刊》1957年合订本第87-89页

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一九五四年九月二日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

汪溪.三十年和五年——唐山华新纺织公司公私合营前后.人民日报1954年1月10日和1月11日

孙代尧.20世纪50年代中国急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工业化背景分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4.2：45-49

列宁.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程子华.关于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若干问题.《人民日报》1954年8月8日

### 一、新中国建立之前农业经济集体化的思想和实践

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的出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必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除少数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外,大量的破产农民会随着同一过程而转化为雇佣工人。但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小农经济还要不要经历这个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显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不然的话,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夺取政权之后的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中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的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sup>4</sup>恩格斯也认为,“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sup>5</sup>恩格斯在1894年写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应用暴力方式剥夺小农,而应采取示范和提供帮助的方式使小农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共同占有。恩格斯还认为如果农民还没有下定决心变为合作社的占有方式,就要给农民一点时间,向农民解释合作社占有方式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使农民逐步理解合作社的占有方式。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设想具有了实现的可能。在1918年,苏俄颁布了《关于土地社会化》的法令规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减少个体经济,农业机器及种子都由苏维埃政府垄断,粮食贸易由国家垄断,土地首先交给为公共利益劳动的人使用。1919年苏联颁布了《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条例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认为私人使用土地是陈旧的形式,应实行由私人使用土地向集体使用土地过渡。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联建立了大量的国有农场,并有大量的农民被组织到农场劳作。此时实行的粮食政策是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有效地保证了战争中军队粮食的供给,促进了国内战争的胜利。但由于余粮收集制部分侵犯了农民的利益,发生了农民暴动,粮食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1921年3月,苏联改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实行新经济政策。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于1923年口述了《论合作社》一文,阐述了通过实行合作社把农民引导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列宁指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sup>6</sup>,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事业。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基础》中提出:“列宁在论合作制的论文中正确地指出了我国农业应当循着新道路去发展,即循着通过合作社吸引多数农民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循着把集体主义原则逐步应用于农业。”<sup>7</sup>1927年联共(布)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后,苏联加快了农业集体化的步伐。联共(布)十五大认为,农业集体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应全面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1929年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指出:“目前集体农庄运动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现象,就是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一批一批地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了。……这就是说,中农加入集体农庄了。”<sup>8</sup>斯大林充分肯定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发展。到1929年末,苏联开始由限制富农的政策变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全面消灭富农。当然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现象,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产力。为此,斯大林写了《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文,认为不能用暴力去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劳动组合仍是农业集体化的重要形式。但此时期苏联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仍是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运动,鼓励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到1934年,苏联“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占全苏联总农户数的3/4左右,集体农庄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90%左右。”<sup>9</sup>

### 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集体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争论和决定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内首先就“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这个提法发生了争论。毛泽东认为:“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是变动很剧烈很深刻的时期。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武装斗争还要深刻,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资本主义绝种。‘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另一个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说“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再一个是“确保私有财产”的问题。毛泽东说:“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总之,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自然不会让革命维持在一个对资产阶级最有利的阶段上停留下来,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经过了长达一年的讨论之后,于1953年9月正式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际上,在中央明确要对农业就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在1951年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就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指出:“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经济的方向发展。这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根本原因。必须要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引导它走向更高一级的形式。所谓新因素,就是指要在互助组内部增加公共积累和加大按劳分配的比重。而更高一级的形式指的就是初级农业合作社。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sup>5</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5页。

<sup>6</sup>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sup>7</sup> 《斯大林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235页。

<sup>8</sup> 《斯大林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208页。

<sup>9</sup> 罗平汉著《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但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中的观点，5月4日，华北局在该报告中批复：“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也批评了山西省委的报告，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6月3日，又进一步指出，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认为农村的阶级分化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强调农业集体化要等先有了机器，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刘少奇的想法概括说来是这样的，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再发展一段时间，富农经济也让它发展，这样有利于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等到国家工业化建设能提供大批农业机械的时候，可以依靠政权力量，下个命令剥夺它，一举实现集体化。

刘少奇的这种意见，当时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但毛泽东知道此事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赞成和支持山西省委的报告。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争论中涉及两个根本问题：第一，能不能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来实现个体农民向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第二，能不能在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之前，根据农民自愿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苏联的经验是在实现了一定的机械化之后依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地消灭富农阶级，一举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中国要不要走苏联的路子，要不要在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之下简单地重复苏联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要回答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与农民建立了比较紧密、比较信任的关系，党在广大农村有强大的各级党委组织，这是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一段时期所不具备的条件。因此，依靠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各级组织，发动贫下中农，就可以摆脱富农经济对农民的诱导，在富农经济获得优势地位之前就通过农业集体化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由中苏之间不同的国情和党情所决定的。

在经过党内的争论之后，于1951年9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形成了《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草案分析了农民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产生的两个生产积极性，一方面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劳动互助的积极性。决议强调：“要使广大贫困的农民能够迅速地增加生产而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就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劳动互助的积极性。这种劳动互助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民私有财产的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决议还总结了各地农业互助合作的经验，提倡了大体有三种形式，1，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2，常年互助组；3，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前两个主要是不触动私有制前提下的换工互助为主，即以“共工”为特征，后一种则具有了初步“共产”的性质，从共同劳动逐步过渡到共同所有，即触动了个体农民的小私有制。

1953年2月15日，在中共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3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从1953年秋季开始，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同时还实行了两大举措，一个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切断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另一个是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这是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为进一步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确定了方向。这三件事标志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全面展开，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3年冬的14000多个发展到1954年春的90000多个。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4年4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6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这次会议的报告时做了这样的修改：“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毛泽东虽然破除了苏联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的过渡道路，开辟了一条中国农业社会主义的改造新路，但毛泽东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个矛盾的，仅仅有合作化、集体化还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工业化和机械化才能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成果的巩固。认为农业合作化可以长久地建立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是不对的，必须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并举。只有从以手工和耕畜为特征的小农经济过渡到了社会主义机械化大农业，才能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终完成。

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党在农村的依靠阶级上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土改依靠贫农，生产依靠中农”；有人认为，新中农不能依靠，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上升了，思想上就要抵制社会主义，有人主张以“依靠新中农”来代替“依靠贫农”的口号；又有人主张“贫农和新老中农都应成为合作化的依靠”，等等。最后经过讨论和毛泽东的指示下，确定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新的阶级联盟，即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决议明确了“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包括全面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在内，这样，贫农占农村人口总数百分之五十到七十），巩固地团结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sup>10</sup>

### 三、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张庄为例

#### 1、土改后张庄的基本情况

张庄是一个老解放区，1946—1948年就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建国初张庄一共有农民250户共960余人。贫雇农

<sup>10</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30页。

169 户共 605 人，分到 2078 亩地，其中贫农 29 户共 82 人，人均占有土地 5.1 亩。贫农不可能通过重新分配土地而变成富农，因为土改后其耕畜、马车、农具、住房都不够；贫雇农中另外 140 户地稍多，人均 5.8 亩，发展成为新中农。旧中农 76 户共 341 人，人均占有土地 6 亩，他们在耕畜、马车、农具、住房方面要好些。地主、富农 12 口，人均 4.6 亩。土改后普遍出现了中农化趋势，1951 年长治地委对张庄附近地区 5 个村庄的调查显示新产生和原有的中农占 95.02%，富裕中农 2.2%，土改后发展的富农占 0.6%、雇农为 3.84%，其它 0.44%。土改后 5 年期间，其中 96 户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 284 亩土地，有 99 户农民买入耕地。单干户中遭遇严重困难的占 37.7%，但其中只有一半人认识到问题所在，愿意逐步用合作化办法自救；单干户中 42% 情况稍好，还愿意继续单干下去。很多原来革命时期的党政干部接受了“革命成功论”而成为新富农。张庄村民委会主席李全忠就是一例，李全忠一家 5 口人，土改后分到 30 亩地，跟另外一户共同拥有一头驴。李全忠家后来又购置 6 亩地，拥有了 2 头牲畜、6 间房，李全忠开了磨房，雇佣雇贫农申水生在磨坊干活。申水生家里孩子多、劳动力少，为了全家喝上小米粥只能出来打工。富农还会雇佣雇贫农做其他工作，例如拉煤，干一天给 3~4 升谷物。1950 年长治地委对 15 个村庄共 3394 户农民做的另一项调查显示：13.7% 农民卖地，9.6% 出卖劳动力，靠剥削别人劳动增加收入的新富农占 1%；3 个县的农村手工业情况调查表明有 50 户手工业家庭雇了 142 名工人，虽然每户平均不到 3 名雇工，但也足以说明他们已经靠剥削雇工的劳动来增加收入，而不再是靠自己的劳动了。

## 2、四大自由

1948 年张庄土改后，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就对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占用方面创造了基本的平等关系。但接下来，他们就要做出一个选择，是个体单干还是组织起来？个体单干无疑是以小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因此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继而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集体经营则可以通过共同劳动、共同所有在集体内部消灭一部分商品交换关系而建立其集体经济从而朝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刚解放后百废待兴，因此一句“发家致富”的口号暂时掩盖了这个分歧。另外，刚分到土地的农民当时也只能依靠自己，因为他们没有“铁饭碗”，没有“口粮配给”，甚至没有任何退路。过去能借给他们种子、租给他们农具的富农以及能赊给他们一季口粮的地主或贷给他们应急用钱的财主都已经被消灭了。因此，这个时期的小私有制在农村成为压倒性的产权制度。党也重申了新民主主义的“四大自由”，即租赁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四大自由”极大地调动了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对当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号召每一个人都“发家致富”和这“四大自由”显然是矛盾的。“发家致富”只能是一部分人，因为富裕的农民只有通过雇佣别人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富起来，也就是说必须通过成为剥削者才能发家致富。这种发家致富的方式不外乎通过租赁、雇工、借贷和贸易。要把一定的生产资料租出去，那么就必须有承租人支付租金；要雇佣他人来为自己劳动，则必须有被雇者出卖劳动力；要把一定的货币贷放出去，则无疑需要贷款人支付利息；而要购买一定的生产资料如置地则必须要有人因经济困难甚至破产而不得不去卖地等。总之，这四大自由不仅以两极分化为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两极分化。因此，能够发家致富的只能是少部分人，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必然以另外多数的人变得贫穷为基础。那些在解放后不仅没有富起来而且还变得穷了起来的人该怎么办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出路是“组织起来”。

但当时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组织起来”，许多人包括一些党员都有意无意地接受了“革命成功论”，满足于土改后的国家形势，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斗争和改造了。土改结束也就意味着革命的完成，以后的事情就是埋头生产、发家致富、享受生活。比如张庄有 3 户农民在 1948 年以后就开始一心搞生产从而日子过得非常好。在这 3 户农民中最富裕的是师家兄弟，老大师方元，是八路军退伍军人，张庄党支部领导成员；老二师福元，也是共产党员，1947 年以后一直是区委干部；老三师二则，在家里种田。土改前，他们都是中农，但也受尽了压迫和剥削，都怀着仇恨和冤屈与张庄的地主进行了斗争和清算。方元和福元解放前都是张庄的积极分子，他们入党很早，一直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政治上的优势，他们在财产分配时分得了较多的财产，土改后他们有 70 亩土地、两头驴、两辆车。农忙时节，特别是秋收时，他们雇人干活。只要身体健康，肯吃苦，这哥仨就一定发家致富。还有一个富裕户叫李全忠，人称“李胖子”。他很早就参加了民兵，当过小队长，1949 年入党，之后当了村民委会主席。李全忠小时家里曾在灾荒时卖了一个儿子只换了几升粮食。他自己还把 4 亩地卖给了富农郭春旺，这地还是他来种，不过得给人家交租。1942 年粮食灾荒，他交不了租，郭春旺便把他家的粮、布和其他物件统统拿走了。但是，在土改运动中李胖子的情形翻了个个儿，5 口人分得了差不多 30 亩地、半头驴，正处壮年的他辛勤劳作，不久，他就攒钱从一个林县人那儿买了近 6 亩地，这个林县人卖了地要回老家。后来不久，李胖子又买了一头骡子，后来又把另外半头驴也买了过来，这样，他就有了两头耕畜。他为别人拉煤取暖，为街坊邻居犁地种田，许多人欠下了他的债，所以，在他地里需要帮忙时，那些欠他债的人总愿意来为他干活，以此抵债。他的办法是每次下雨后都叫 8—10 个人来为他干活，趁土地松软、野草易锄，24 小时内就把地锄完了。他总是很快付给报酬，干一天活给 3—4 升谷子，人们在他地里干活时，总能吃饱吃好，因此，他要找人帮忙是没有问题的。他当了干部，威望和权力对他更有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发现很难拒绝干部们提出的任何要求。李胖子还办起了一个磨坊，继续增加其收入。农忙季节他雇贫农申水生白天在磨坊干活。申水生家人口多，土改中分得的土地不够养活全家，所以不得不出来当雇工，为了“老婆孩子吃得上小米咸菜”。很清楚，如果没有像周增福、申水生这样，光景不好，不得不出卖劳动力的人，就不可能有富裕和兴旺的人。

使得一些家庭兴盛而另一些家庭逐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耕畜的所有权。一个拥有两头好耕畜的农民根本不用劳动就可以维持生活，他只需饲养和照料牲口，然后把它们租出去就可以从别人那儿换回足够的劳力来耕种他所有的土地。以上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牲畜的畜力要比人的体力在生产某些环节中更有效率一些。一个男全劳力劳动一天可以挣 4 升谷子，租一头牲口犁一亩地要出 5 升谷子，两头牲口一起一天能犁 8 亩地，所以要出 40 升谷子，如

果靠人力来犁地，不论是谁必须劳动 8—10 天才能完成同样的工作。这样每收一季，光犁地就得花去全部收获的 5%。耕畜的所有者占的便宜还不止这些。由于耕畜相对不足，在春耕和秋收农忙季节他们还能从其它方式的交换中得到好处。

因为农民和工人不一样，他们不挣钱，只是以劳力换劳力，但是劳力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交换要对等一直成问题，农忙时帮工和农闲时帮工，重活和轻活，不同的季节工钱大不相同的。这样，一个没有牲口的贫农，如果愿意付出劳动为别人犁地来挣固定的工钱，那他付出的将比得到的多很多，特别是当以小时计算时。很明显，牲口干活的要价比人工高，特别是在农忙季节。这是由于耕畜暂时的缺乏造成的，而缺乏又是因为常年战乱造成的，结束战乱也不能很迅速就能够增加牲口的数量。然而，即使牲口数量不断增加，即使繁育成本和牲口价格在逐渐下降，买一头牲口仍是一笔不小的投资。

因此，土改后一些人兴旺了，一些人衰败了。张庄有几个农民干脆就放弃了自己种田，干起了小各种各样的买卖、租赁和信贷等，从而彻底脱离了生产劳动，仅仅依靠手中已有的一点生产资料就开始了发家致富的资本积累过程了。

### 3、组织起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以个体耕作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必将逐步发展到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它使得分工合作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有力杠杆。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换的进一步扩大，劳动力本身也就变成了商品，此时，资本就登上了历史舞台。资本出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购买劳动力，然后组织劳动来进行社会生产。在组织劳动的过程中剥削劳动，这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同于以往剥削方式的特征。为了摆脱资本的剥削，就只有在资本组织劳动之外，由劳动者自己组织劳动。而这后一种组织劳动的方式就是毛泽东所号召的“组织起来”的真正涵义。因此，“组织起来”不只是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向旧的生产方式挑战的新的劳动组织形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它的胜利与其说是给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不如说是给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这样，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劳动人民的斗争目标便从三座大山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毛泽东这时就已预见到将会有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会比从前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更长久更复杂、也更能把握更难取胜。新中国建立伊始，毛泽东就警告说，阶级分化的条件仍然存在，如果党和政府任其过快发展，那么严重的阶级对立在所难免。如果党和政府奉行无为而治，继续推行“四大自由”政策，那么阶级分化将会愈演愈烈。这种分化的结果只能是产生出一个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新的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这时，那个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的农村资产阶级必然要求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而农村无产阶级由于其深受剥削而无法富裕起来同样也会对党和政府不满。此时，共产党在农村的领导权也就不稳固了，这样资本主义就会上演一出新的农村包围城市，继而共产党在城市里的统治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因此，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加强共产党对社会生产方式改造的领导，必须建立其新的阶级联盟。依靠城市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联盟，走农业合作化道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一方面缩小和防止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把农民也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去。

### 4、互助组

“组织起来”的第一步是成立互助组。农民自发的互助合作形式由来已久，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它却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一开始并没有谁来号召，农民之所以愿意用这种互助合作的形式来开展生产建设，纯粹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要求。刚刚经过土改，人们把地主老财的生产资料重新分配给每个农民，但却并没有足够的驴、牛、耩、车用来平均分配。因此，有些人有了牛，却未必有车。因此他们必须互助合作，不然就只有租借别人的，这样的话就又要受那些有实力的旧中农和开始富裕起来的新中农的摆布。

在张庄，互助组里最成功的是杨忠盛小组，这个小组有 22 户组成，耕种 480 亩土地。这个小组之所以能够兴盛起来，是由于执行了毛泽东制定的互助合作原则。这个原则被总结成了三条：一是自愿；二是以工换工，等价交换；三是实行民主。这个互助组还避免了三个常见的缺点：什么都互助；互助组过大；组织太复杂。由于互助组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张庄，以至在整个华北都不断地发展壮大起来，最后发展到具备条件的全国各地。不过，互助组内部也存在许多矛盾。

首先，互助组不能阻止两极分化。互助组的原则是以工换工，只有对等的人才能组织在一起，例如强劳动力家庭和强劳动力家庭组合，老弱病残组合。完全按照以工换工原则，强劳动力是不愿意和老弱病残组合在一起的。山西大寨原是一个“三穷五多”的地方，即人穷、地穷、村穷，羊倌多、雇农多、乞丐多、卖孩子的多、自杀的多。实行互助合作以后，村民认为“兵对兵、将对将”是理所当然的。因此，12 个青壮劳力家庭组成好汉组；4 个无儿子的老人家庭和 6 个只有小孩的寡妇家庭组成老少组。如果没有陈永贵，两类互助组的分化是必然的，关键在于陈永贵出于阶级感情推翻了以工换工原则。陈永贵原是游击队员，他的一些战友在战争中牺牲了。陈永贵看到这些孤儿寡母，认为解放后不能把她们撇在一边，于是从好汉组退出参加了老少组。陈永贵参加老少组以后，马上成为老少组的核心，所有成员都围绕在他周围一起劳动，劳动后大家也都端着碗去陈永贵家，边吃饭边聊生产。到 1953 年底，生产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时老少组经过吸收新成员一共达到了 49 户，亩产也达到了 230 斤，几乎是过去的 3 倍；而好汉组的亩产却仍然只有 100 斤。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好汉组各自为政，仅在春耕时集体劳动，夏秋都是各顾各；而老少组始终都联合在一起，平时就可以在土地上投入大量劳动。即好汉组是临时性、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而老少组则是常年互助组。正是由于老少组比好汉组在互助合作形式上高一个层次，因此才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好汉组，青壮年之间是要彼此交换劳动力的，甲在乙的土地上劳动一天，同样甲也会要求乙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对等的劳动；在老少组，陈永贵没有让孤寡为自己付出对等劳动，不实行以工换工，所以充分的调动了大家的劳动热情，并获得了成功。当然像陈永



贵这样的例子，在互助组中仅是少数。在大范围内，以工换工是一个通行的原则，例如张庄师才元的互助组就不接纳老人户。互助组不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部分人拥有大量生产资料，有些人只拥有少量生产资料，有些人则根本没有生产资料，拥有一定生产资料的人仅愿意跟条件对等的人交换劳动力和交换使用耕畜、农具，因此互助组无法根本改变两极分化的局面。此外，互助组也没有办法抑止投机钻营者的影响，比如大寨就有一户老地主，土改后不靠农业劳动，主要靠长途贩运发财，他雇了6人、12头驴从邢台货栈运1440斤棉花回来卖。陈永贵等人日夜兼程辛辛苦苦运棉花，却看到这个老地主住在客栈里，睡到天大亮才起床，然后卖棉花时还往棉花里浇水充份量，陈永贵非常气愤，想为什么解放了农民还要受这样的剥削。

其次，互助组也阻碍生产工具的改进，这一时期长治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尝试就遭遇到挫折。一是长治地区引入水车，一头驴或几个人绕着井口推动水车，提水量大大超过肌肉力量，但农村没人愿意买。因为一台水车虽然可以大面积灌溉，服务范围远超过一户农民或互助组的土地面积，但其成本和耕畜、劳力投入却不是一个互助组能够解决的。为了促进农民买水车，长治地区的人来到张庄，招集每家每户开会，会议开到晚上还是没人买，于是不让睡觉继续开，还是没人买。到第二天终于有人受不了，买了几台，水车是通过向国家贷款8000元买的，这笔钱后来也没有还，实际上是白要了，但水车还是没用上，荒废在那里了。二是联合工厂生产出单把犁、靠沼气的小型气体发动机、马拉双铧犁等新型农具，耕作范围都超过互助组的土地面积，同样没人愿意买。即便是靠上面下达的命令也无法使农业机械在互助组里推广开来，当然也就不能使互助组恢复活力并体现出集体经济的优势。

最后，互助组还造成了很多人民内部矛盾。比如雨后先种谁家的地或赶谁家的牲口干重活这样的小问题。一个好的组长会说：“最后种我的。”但有些组长就会摆出一付很抱歉的样子说：“我家的地最近，还是先种我家的吧。”等轮到最后一块地时，土已经全干了。种子在干泥块里是不易发芽的，这时，这块土地的不幸的主人就会要求全组给他的地里浇水，可这意味着，在最后一块土块上付出的劳动比第一块土地要多得多，因此，常常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于是就引起了争端，于是互助组因此而分裂，于是各人又不得不走自己的路，靠自己的劳动去耕作，和自己的老婆孩子一起从天亮干到天黑。在大范围内，问题在于有些人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有些人只拥有少量的生产资料；有些人则根本没有生产资料，而互助组又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况，特别是耕畜的占有状况。那些有牲口的，特别是拥有整头牲口的人仍然可以利用其他人的劳动。实际上，只要出租牲口，不管是以公开的还是隐瞒的形式都能换回了大量的劳动。同时出租牲口也同样引起了很多矛盾。如果赶牲口的人不是牲口的主人，在坡道上他就会用鞭子抽赶牲口，一天要干那么多的活儿，他只能这样。但如果被牲口的主人看见了。他就会提出抗议：“他妈的！你打我的骡子干什么？你不花钱你不心疼噢。”这种抗议引起的必定是一场争吵，这种争吵动摇了互助组的稳定。然而，对于那些没有牲口的人来说，互助组确好处，那些仍旧很穷的贫农加入了互助组后，日子总比不入互助组靠自己单干时好过了。

总之，如果这些问题协调不好，就常常会发生争端，互助组也就面临着解散的危险。正因为互助组面临这些问题，因此要么遵从富农的意愿，回到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上，要么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下，由国家创造外部条件，鼓励先进分子联合起来走进一步合作化的道路，进一步解放劳动生产力。

## 5、初级社

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实际上是由互助组内部的矛盾所导致的。互助组只是“共工”而没有“共产”，大家只是共同劳动，而不是共同所有。因此，在活劳动与劳动工具等生产资料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即合作劳动和小私有制发生了冲突。因此互助组的前途有两个，要么回到从前，从合作劳动退回到私人劳动，满足小私有制的要求。要么再进一步，从小私有制发展到集体所有制，满足集体劳动的要求。初级合作社的成立就是向后一步迈出的关键一步。

成立合作社的第一步就是合并土地。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土地问题。把分散的农民小块土地集中起来，交给合作社，这比成立互助组要困难得多，因为它触动了农民的小私有制。但是互助组不得不在合作社和私人经济之间做出抉择。无论转变为哪种经济形式都是困难的，因此互助组内部会产生不同的意见分歧也就很正常了。那些在互助组里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农民，当然不愿意把生产资料交给合作社所有，而那些在互助组里占有生产资料较少，投入劳动较多的农民也就自然很愿意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了。因为前者是迎合了小私有制的要求，后者是迎合了集体劳动的要求。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显然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她本身就是“共产”的，所以很自然地支持了把互助组提高为合作社的要求。

因此，中共中央首先于1951年12月在总结5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验基础上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几个月内全国出现1.3万个合作社。长治市成立宋家庄、紫坊两个合作社，乡党委书记王京和动员所有党员带头加入。成立合作社，要对中农进行补偿，因为中农拥有农具、牲畜较多，而贫农缺少劳动工具，所以必须团结中农，对中农作出一定让步；还要对单干户进行反击，贫农加入初级社后善于投机钻营的富农找不到给他们打工的雇工，也找不到租赁他们农具的承租人和借贷他们资金的债务人，挡住了他们发家致富的道路，因此，必然散布各种初级社要解体的舆论。为了团结中农，初级合作社不仅在经济上对中农进行补偿，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比例上土地等生产资料占60%、劳动占40%。而且在政治上也对中农做出让步，领导权实行“三三制”，即贫农、中农、党员一起分担领导权。入社后农民的劳动回报不是以工资的形式获得，而是开始赚取工分。工资制和工分制的区别就在于工资是事先给定的，最后的产品收益与劳动付出无关，只与出资人和经营者有关；而工分制就不同了，在农业收成中依据每个人所赚取的工分来分配劳动成果。宋家庄合作社开始尝试发工票，但一开始农民对工票持怀疑态度，加之单干户散播工票是废纸的言论，合作社一度只剩6户农民。在合作社最低谷的时候，党员干部发挥中坚作用，党干部郭全德说：“谁把合作社搞垮就开除谁的党籍。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带两户，今天做这一户的工作，明天做那一户的工作，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底！”1953年秋张庄也建立了“前进社”，但70%是党员干部，合作社一开始都是党员干部带头加入的，所以被称

为“老虎社”，谁都不服谁，“我们每天晚上都吵架”。县里也对合作社进行扶持，派来工作队，对经营、会计进行指导，工作队中的申双富是个老会计，对形成合作社章程的起到很大作用。

另外，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政权实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更进一步支持了合作社，使合作社在大范围内成为可能。1953年秋天，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因此，农村中善于投机钻营、不依靠农业劳动的人便失去了收入来源，切断了他们与城市资产阶级的联系。同时合作社的生产优越性日益体现，粮食亩产量远超过单干户。所以张庄原来净说风凉话的地主、富农都转而说合作社好，要求加入合作社，还埋怨合作社的干部说为什么不早让他们加入进来。王京和这样评价统购统销政策：“这就创造了一个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增加收入的唯一办法就是多出产品。统购统销断了个人发财的路，参加集体组织没有什么牺牲，除了参加集体，别无选择。从农村政治的观点来看，统购有利于重建阶级团结和与富农阶级对抗的基础。它以这种形式为迅速的集体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者。”实行统购统销后，很快80%以上的农民都入社了，只剩下以前的地主和富农，他们也派人过来问能不能入社。

总体上看，在较为平等分配土地的基础上，小农经济的自发趋向仍会产生新的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剥削。互助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雇工，但生产资料还不是公有，互助组之间差别也很大。自发发展下去缺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互助组将不得不求助于富裕的互助组，以工换工原则仍会导致新的剥削。初级合作社给贫苦农民找到不用打工的出路，实行土地入股分红，根绝了土地出租和兼并的可能，富农想要雇工也越来越困难。除了农村中贫苦农民的合作化要求和党干部对此进行的动员和示范外，国家政策的支持是合作化的重要外部条件。国家政策包括几方面：一是建立信用合作社和政府低息贷款消灭了高利贷等生息资本的盘剥，小农遇到意外风险时可以通过国家帮助渡过难关，而不必借高利贷并因此被弄得破产；二是统购统销杜绝了粮食投机倒把，使得原本靠买卖粮食的农民不得不依靠生产粮食来增加收入；三是国家相关部门如农机站的机械工具和农技站的生产技术也对合作社进行了一定的支持。正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帮助，农业合作社的所有优越性都显示了出来，个体单干变得越来越困难。当时的干部们说合作化是：“挡资本主义的路，堵资本主义的洞。”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合作社如果挡不住个人发家致富的路，也就迈不开集体经济的步。

但合作社内部也并不是没有矛盾的。在初级社阶段仍然存在着大生产的要求与小私有制的矛盾，但这一矛盾主要是在分配方面集中体现了出来，即表现为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之间的矛盾。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劳动组合，但土地等生产资料仍以个人私有权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这就需要对这些生产资料给予一定的分红。从大多数缺少生产资料的贫下中农立场出发，必然要求将生产资料收归集体所有，减少按资分配的比重。

因为如果把合作社看成一个大集体，一个小社会，从组织上看，它仍是初级阶段，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它的内部像在互助组内部一样仍然存在剥削现象。合作社把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合并了起来，根据耕畜和主要农具的使用来分配劳动日，这样即使所有的社员都在一起干一种活，他们的收入也会大不相同，这是因为土地的股份基金不同。事实上，在初级合作社阶段，一个人不劳动就可以生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如果他的土地股金很高，或如果他有两头好牲口，他完全可以不劳而获。在大寨，成立了合作社的贫下中农们抱怨说，一旦合作社发展到了全村规模，他们还会受那些土地大户的剥削。大队在付了土地股金、耕畜租金、马车费、农具费等费用以后，剩下的供劳力分配的已经很少了，那些土地少、农具少、没有耕畜的社员看着自己的邻居依仗他们的“铁饭碗”变得越来越富了，而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最后就像剥了皮的高粱秆——光剩下芯了。因此，在初级社阶段，在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所占的比例方面就开始了矛盾运动。以张庄“前进社”为例，最开始牲畜归社员所有，后来合作社买回牲畜；开始土地报酬占40%、劳动力占60%，不久以后改为土地报酬占20%、劳动力占80%，到高级社则取消土地报酬，由合作社买回了全部土地。初级合作社在收入分配上，每年总收入扣除生产费、预留公积金和公益金后实行土地分红，最后再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面的矛盾也必然会使初级社面临两种发展的可能，要么扩大按资分配的比重，满足生产资料私有者追逐利润的要求，把按劳分配转化为雇佣劳动，即以劳动力的价格来购买劳动，实现出资人和劳动者的二分化，即合作社是由多个出资人共同筹建，劳动者只是合作社的雇工，合作社给劳动者发放货币或实物工资。初级合作社的这种发展前景就是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初级社的另外一种发展前景就是扩大按劳分配的比重，用按劳分配得来的劳动成果来购买原先以入股方式加入合作社的生产资料。也就是买断生产资料所有权，逐步缩小按资分配的比例。这样也就要求把初级社进一步发展到高级社。

## 6、高级社

合作社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一是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矛盾，二是工分制自身的矛盾。在从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时，主要由前一个矛盾所推动的，但在高级社阶段，第二个矛盾就凸现了出来。

尽管初级社根绝了土地出租，但初级社并没有消灭不劳而获，如果入社土地、牲畜和工具多，仍然有可能靠分红生存，甚至富农凭借土地、牲畜获得的分红收入可以高于贫下中农的劳动收入。贫下中农辛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发现富农没怎么参加劳动，分得收入还比自己高。因此，大寨合作社贫下中农抱怨，合作社发展到全村规模，还会受到土地大户的剥削，大队支付了土地股金、耕畜租金、马车费、农具费后，剩下供劳力分配的已经很少了，那些地少、无工具的社员看到自己的邻居依仗他们的“铁饭碗”越来越富，于是产生不满情绪，仅凭这种不满去推断合作社搞早了是错误的，解决这种不满恰恰需要限制按资分配、推动合作社向更高阶段发展。于是陈永贵又带头做了一件同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相反的事情，陈永贵主动要求去降低了土地股金，这让那些光想着发家致富的人大跌眼镜，合作社的会计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陈永贵是不是要求提高土地股金。在陈永贵的带动下，其他人也都纷纷降低了土地分红，于是按劳分配部分增加了，满足了贫下中农的要求，合作社得到巩固和提高。

从1955年秋，张庄开始大规模合作化，向高级合作社迈进。11月上旬，张庄开大会对牲畜、马车和大农具进行估

价收归集体所有。在这一过程中，中农需要作出一定让步。中农的牲畜、生产工具很多，如果按高价买，对于刚刚开始经营的合作社，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赵根则有一匹大骡马，在长治地区都是最好的，他的这批骡马相当于别人的 8 头驴，开始时很多人都说这匹骡马要值 1000 多元，后来长治市委找他谈话，赵根则主动把价格降到 800 元卖给合作社，由于他的骡马是最好的，所以长治地区其他人的牲畜都要按照最高 800 元来折算，为成立高级合作社节约了一大笔资金。由于分配上的矛盾，人们都愿意把合作社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在高级合作社，土地不计股金，所有耕畜、大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被合作社买去，只根据计算工分来分配收入。

因此，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就解决了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的矛盾，逐渐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但按劳分配本身的矛盾，即工分制的“死分活评”的矛盾逐渐显露了出来。以张庄为例，从县里派来的申双喜在第一次召集合作社预备社员讨论示范章程草案时强调：合作社第一按照土地分红，第二实行多劳多得，“如果你生产的多就卖得多，就存的多，就能吃得更多”。土地分红好办，丈量一下土地就可以了。可对于多劳多得的部分，工分该怎样计算？中国的农民创造了“死分活评”的办法。开始时每晚开碰头会，首先由每个农民上报自己的劳动量，然后大家坐在一起共同评价每个人一天的工作量，最后给每个农民登记工分。合作社发展到 90 户后，就每周干部、会计开一次会登记。可即便是“活评”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死分”就比较难确定了。比如，张庄合作社把每天分成 5 段来考察社员工作，耕地一天标准 1.2—1.5 亩，垄数也可以计算，所以工作任务是可以计量的。但土质不同耕地的难度不一样，牲畜质量不同耕地付出劳动也不一样，每天完成同样垄数或同样面积的劳动量是不同的。最难考察的是送粪，土地距离粪源有远近，运粪的牲口质量也不同，粪车大小也不一样，简单按照每天运几趟粪计量工分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光为了赚工分，社员可以有很多办法做足“面子功夫”，例如粪车装粪少些、每天多运几趟，或者耗竭性地使用牲畜，超载拉送大件，这样就可以多记工分，但对高级社长远发展却是非常不利的。开始时张庄社员制定了 70 多种标准，50 年代末发展成 160 多种标准，但仍然问题重重。因此，张庄积累多年经验后，便总结了“工分挂帅”的 8 点不足：一是把工分而不是政治觉悟放在首位，人们只能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的长远的目标；二是只奖励体力劳动的完成，日工作量的完成，不奖励创造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和合作化思想；三是最初标准只考虑数量、不考虑质量，人们只重工分、只重表面工夫、不重实际效果；四是为了工分加重了牲畜负担，长远对生产不利；牲口、农具集体所有，人们不爱护、瞎糟蹋；六是制定标准，检查工作，调解纠纷占用干部事件太多，有些实际上靠政治觉悟就可能解决的问题，白天黑夜拴着干部，到头来谁都不高兴；七是不管标准有多周到，总有不合适的地方；八是记工分的工作太复杂，普通人干不了。张庄前任支书张兴发说：“工分挂帅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是消极的，被动的……为了挣得一天的工分他们经常为怎么干，干多少而争吵”，“为什么每次整风运动群众对干部都有那么多意见？因为工分制把群众变成了对立面，当然双方都有难处，干部们有干部们的难处，群众经常骂他们工作作风坏，是工分制迫使当‘恶人’，遇到懒汉他们只能用标准来威胁，不按标准做就不给记工分，这就是‘管、卡、压’，可没有别的办法。”这些问题导致了领导干部频繁变动，1948—1958 年张庄 9 次更换 7 位党支部书记。所以如果高级社继续发展，必然否定工分挂帅，而实行政治挂帅，按照大生产的要求，在考虑长远利益、爱护集体农具和牲口的前提下实行“死分活评”的工分制。

合作社除了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外，还有一个高级社所特有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实质还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集体化程度不高之间的矛盾。相对于个人而言，集体所有是一种公有制；但相对于全民而言，集体所有又是一种私有制。这个集体所拥有的财产是以否定其他集体对该集体的所有权为前提的。也就是说集体与集体之间仍然存在差别，互相承认对方对他自己所拥有财产的所有权，互相否定对方对我自己所拥有财产的所有权。因此随着生产力进一步的提高和交往的进一步扩大，集体与集体之间在共同开发和利用某些自然资源的时候也会存在原先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

首先，从所有制方面来看，当时这个矛盾的集中体现就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土地虽然已经归合作社所有，但在农业生产方面，不仅仅有土地问题，还有水利问题。因此首先在改造河道和兴建水库方面就需要几个合作社来共同劳动，这种共同劳动也就必然要求共同所有，即这些河道和新修的水库归几个合作社共同所有，同时也由几个合作社的共同劳动来完成。不然的话，由富合作社来雇穷合作社集体为自己修建水利工程，修建好了之后穷社如果要使用这些水利工程则必须向富社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么这样就会在合作社之间引起两极分化，导致富社越来越富，穷社越来越穷，发展到最后也会引起富社和穷社本身的解体。

另外，从劳动分工合作方面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导致一部分劳动可以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这部分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也就不能从土地上提高粮食产量，要么转移到兴修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要么转移到其他劳动部门，而这都是高级社内部所不能完成的，特别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使产品越来越丰富，也会使交换在合作社之间扩大起来，这时就必须使农村集体经济从单纯的农业扩大到其他产业，一旦合作社除了从事农业劳动外，又发展出多种产业的话，那么合作社本身就要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果高级社的外部环境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话，那么高级社的发展前景就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乡镇企业。农田水利设施可以雇他人来做，自己则专门从事商品生产以换取货币就可以了。合作社内部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劳动力也可以发展其小商品生产，从事各种各样的副业。这种情况有点类似于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的部落或氏族，商品经济在合作社之间发展起来。除去都生产粮食外，这个社成为了专门加工麻布的，那个社成为了专门加工棉布的，然后社与社之间，社与外部经济之间进行商品交换。这样久而久之，合作社的解体过程将会与原始公社的解体过程一模一样。但如果合作社的外部环境是社会主义的话，即在合作社集体经济外面占统治地位的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形式。那么合作社的另一个发展前景就是人民公社，然后再通过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 7、曲折、反复和斗争

张庄的合作化从小规模的、季节性的互助组发展到全村规模包括 7 个小队的大队(6 个小队搞农业, 1 个小队搞副业), 相对而言, 发展还是较平稳的。村里的合作化从小到大平稳发展, 每达到一个新水平, 生产就会上一个新台阶。到 50 年代中期粮食亩产量几乎是上党盆地传统亩产量的 2 倍, 住房、教育、文化、保健、商业、私人财产和储蓄一年比一年发展。人们回顾一下过去, 对 10 年来的进步感到满意。但从整个国家来看, 合作化的发展并不十分顺利, 解放后的 10 年, 尤其是从 1953 年到 1957 年, 在高级合作社的要求和发展速度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和斗争。毛泽东一再催促加快合作社的建立和由低级向高级形式的过渡, 而其他领导人, 最著名的有刘少奇和农业部长邓子恢却多次强调要放慢速度, 暂停下来巩固一下已取得的成就, 甚至要把一些较弱的社砍掉, 因为运动超出了群众的觉悟水平、人民的支持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数单干的贫下中农的贫穷上, 他相信, 合作社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并警告说, 除非共产党帮助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 不然他们就会对共产党丧失信心, 这种信心的丧失会破坏工农联盟。(工人和农民两大阶级被认为是新社会的政治支柱)。而刘少奇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有较多土地和财产的中农身上, 在合作化的优越性尚未显示出来之前, 他们会对共产党丧失信心, 这样会从另一方面破坏工农联盟。

毛泽东很清楚这个问题, 他不仅反对硬拉中农入社, 而且一再告诫要给他们一段考虑的时间, 让他们自愿入社。但同时, 他又怀疑他们的政治立场, 因为带头搞资本主义经营的富裕中农无论如何也不会高兴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怎样也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除非走资本主义道路”。

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 毛泽东强烈要求合作社要“上马”, 大胆向前奔; 刘少奇则极力主张要小心、谨慎, 有些合作社应“下马”, 至少是暂时“下马”, 免得摔跤。

“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 毛泽东说, “一个要下马, 一个要上马, 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

1953 年, 中国有近 14000 个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 有些党组织按照刘少奇的主张, 以不稳定、不巩固为借口解散了几百个合作社。据说, 大批的社员是在压力下入社的, 现在想退社。1955 年, 各级党委组织的几十万个合作社又一次遭到了大幅度“坚决收缩”的厄运, 人们按照上面的指示解散了几万个新成立的合作社。

1955 年 7 月, 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坚决收缩”的方针, “在全国农村中, 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来临。”他说,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小脚女人, 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 可是埋怨旁人说: 走快了, 走快了。”

毛泽东批评党落在群众运动的后面, 强烈要求党的干部要迎头赶上, 带好头, 通过建立合作社, 来学会怎么建立合作社, 不要解散它们。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是大多数农民有在农村建立合作社的愿望, 他强调指出, 党有能力领导这样一个运动走向胜利, 运动过程中的错误、困难、疑问和退却都不是问题的主流, 不是主要的方面。确实, 这些问题不容忽视, 应该逐个加以解决, 但不能把它们当作眼下工作的中心内容。

为了增强大家的信心, 指出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亲自从全国各地收集和整理了许多关于合作社(包括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性质)是如何成功地组织起来的报告, 这些报告中有积极的和反面的例子, 告诉人们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但主要讲了如何调动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 还有那些干得很出色的合作社所得的宝贵经验。

毛对遵化县王国藩合作社的评论可以说是所有报告的典型精神。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 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 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 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 在三年时间内, 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 上那里参观的不少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 由于自己的努力, 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有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不是回避问题, 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 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回避问题”是许多党的干部在遇到合作社的复杂问题时新做出的反应。”自己不懂, 怕人问, 就“绕开社走。”毛泽东写道“所谓‘坚决收缩’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 也是‘绕开社走’的一种表现。不过他们不是消极地避开, 而是索性一刀‘砍掉’(这是他们的话)多少个合作社, 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罢了。他们手里拿着刀, 一砍, 他们就绕开麻烦问题了。他们说合作社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据说简直困难到了不堪设想的地步。”

“坚决收缩”没有影响到张庄。潞城县的领导从来没有派干部下来要求解散以张兴发为领导的合作社, 但长治市委却动员在市农工部工作的王京和解散掉他帮助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当他 1971 年回忆起这件事时, 仍感到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上面要求建立合作社时, 我们都决心好好干, 努力做好工作; 上面要求解散合作社时, 虽然心情十分沉重, 但我们还是遵照领导的指示去做了。如果有人提出疑问, 我们总是回答说: “难道领导不如你懂?” 只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党的任务, 我们就会自觉地尽力去完成。”

解散合作社是“反冒进”运动的结果, 现在要我们去告诉那些当年被我们动员要带头成立合作社的党员要带头解散合作社, 市委要当年充满热情在宋家庄成立合作社的郭全德负责解散那个合作社, 郭全德拒绝了, 他说: “我不能一张嘴说两路话。成立合作社时, 我们没明没夜地给人们讲合作社如何如何好, 现在又要我去告诉人家解散合作社, 我不去, 我不能这样做!”

由于郭拒绝了, 市委又决定派肖权去。肖权是个会随机应变的人, 总是迎合上级领导的喜欢, 领导要求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可是, 使市委领导感到吃惊的是, 肖权也拒绝了, “谁成立起来的, 谁去解散”, 他说。但因为老郭不想去, 市委站在他这边儿, 肖权只好去了。他硬着头皮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 去当解散这样宋家庄合作社做准备工作。

回来以后，他汇报说所有必要的工作都做完了。但事实上，合作社的社员们拒绝了他，他们保留了生产的公积金，这是合作社的心脉。表面上他们解散了合作社，可实际上仍保留着。

平顺县委也给劳模李顺达的西沟合作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们把合作社分散开，分成较小的规模，李顺达的合作社 1955 年已经发展到了包括南寨在内的那么大的规模了。省里派来的一个工作队要求他们重新组织，李顺达不在家(到北京开会去了)，工作队就给当地的干部施加压力，但两沟的干部和群众都拒绝放弃他们已经成立起来的大规模的合作社，“我们是自愿组织起来的”他们说，“如果分开也得自愿，谁也不能强迫我们。”

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李顺达从北京回来了，他带回了毛主席 7 月的报告，报告要求发展而不是减缩合作社。西沟和南寨的社员没有解散而把他们的合作社从较低的水平变成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集体。

在中央，关于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速度和规模的斗争实际上只是关系到整个革命进程的最根本斗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国革命究竟走到了哪一步这个根本问题上意见就不统一。刘少奇认为，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在解放区发展起来的，1949 年以来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长期的阶段，甚至要 10 年，也许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然后集中力量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他预见，公有的混合经济、公私合营、集体和个人所有制还会存在许多年。由于这个原因，为了使中国摆脱封建主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政治联盟已经形成。他设计了一幅在新民主主义框架里迅速振兴经济的蓝图——国家的工业化和机械化。一旦实现了工业化，公有和私有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在城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条件就会成熟，这将是一个建立在新技术稳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这是刘少奇著名的观点，至少对于农业来说要“先机械化再合作化”。

新民主主义将在解放后长期存在的认识在政治上好像没有什么分歧。但经过这段时间，国内阶级状况的逐渐改变和阶级矛盾的逐渐凸显后，毛泽东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打败国民党的胜利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决定，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和帝国主义支持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

1949 年军事上的胜利彻底解决了这些矛盾，毛泽东说，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已告结束，现在一个新的矛盾占了主要矛盾的位置，这个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直是第二类矛盾，这就是中国人民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尽管出于必然，允许搞一段时间“四大自由”，允许私人企业家发展自己的工商业，但最终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一定要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将开始买进资本家的部分集团企业，最终将全部买进，吸收他们为国家所有的国营经济。在农村，尽管土改后个人生产占统治地位，国家允许农民发家致富，但是很快国家就必须发动群众运动以使农业经济集体化。这样，不仅有可能使现在仍在受穷的 70% 或者更多的农村富起来，而且还会保证生产发展保证粮食市场有更多更充足的粮食，这是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在中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小生产者，如店员、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一定时期内他们也要搞合营，这样才能完成经济的社会主义化，发展一段时期以后，社会主义经济将有能力为农业更新提供技术和机械，这样就可能开始农村的第三次革命——机械化。这是毛泽东的著名观点，“先合作化再机械化”。

这两种观点强烈分歧，它们反映为了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法，落实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这里所讨论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们是否有阶级性。这两种意见是代表了两个对立阶级的阶级观点？还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采取什么步骤最好的意见上的不同？几十年后，中国给出的答案是前者。

直到最近党的文件在提到 50 年代和 60 年代的历史时还说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将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激烈斗争。文件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说这是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的一场决战，还说这两股阶级势力已经形成了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一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件还说刘少奇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号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对演讲，而毛泽东要求迅速变革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号召是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篇章。

毛泽东死后和“四人帮”被捕以后，在对以上问题的重新评价中，党的文件开始对毛、刘两人分歧的阶级性提出疑问。当然，所有的人都承认，1949 年中国农民和全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个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从理论上讲，一旦分了土地，中国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允许放任自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在乡村一级得到很快的发展，最终占统治地位。如果中央派出精明强干的人员，逐渐地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介绍给人民，一个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也可能在中国开花结果。

在这点上让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刘少奇的观点，他号召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号召搞资本主义，有的人现在仍坚持认为刘少奇提出的，如果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得以延长、混合经济得以发展，也许会比毛泽东提出迅速完成的各种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有利于振兴生产力，创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从长远的观点看，农民们必须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之间进行选择，但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许并不像毛泽东的和那些紧跟他的人们认为的那样，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必须马上就社会主义合作化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

现在的批评家们说，毛的政策强调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本主义复辟”对农村来讲毫无意义，因为资本主义在农村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而忽视了有关封建主义的问题。封建制度统治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该怎样从行政管理、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根除封建制度？土改运动在乡村一级摧毁了封建的经济关系，但仍有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如，怎样保障农村各级组织的自治，如何运用市场的力量去刺激生产，如何保证民主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在国内的敌人是封建主义，在自 1949 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敌人变



成了资本主义，但经过近 30 年“反对各种资产阶级倾向”的斗争，许多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前进道路上最大的绊脚石仍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异常膨胀的搞瞎指挥的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家长作风还有等级、特权等。“文革”中在造反派的影响下，这些因循守旧的封建主义的残余发展到了惊人的地步。官僚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是“民主”，即中国人民的“公民自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它们只是一种萌芽，非常脆弱的嫩芽，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公民自由”开花结果，使人民的创造性能量得以释放。

所以，应该研究一下新民主主义阶段是否需要延长的问题。把注意力集中在彻底摧毁封建主义的问题上，也许并不是更有效的办法。在中国的变革过程实际发生的、迅速把目标转向社会主义，把中央的计划和权力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的作法是积极的，即使因此产生过一些副作用。

对于这些问题，今天中国新的领导人倾向于刘少奇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四大自由，放宽富农经济，家庭承包和物质刺激在过渡阶段有积极作用。由于大量的棘手问题依然存在，由于农业粮食生产人均产量仍维持在 30 年前的水平，这些领导人已经在很多方面将国家政策带回到过去的起点，并正忙于对合作化进行“坚决的收缩”。

看一下中国现在的情况，你就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对的。土改运动给了互助和合作化巨大的推动力，使过去的贫农和雇农得以在全国农村建立起新的集体生产关系。毛泽东抓住历史机遇完成了这场运动，如果他不这样做，农村就注定要出现目前又一次猖獗起来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分裂。现在的领导人曾预言，单干一段时间以后，富裕起来的农民还会重新选择合作化，但已经下马的合作化很难恢复起来。打碎的瓷器无法复元，集体农业也是同样。

五十年代中期对合作化前途及价值的怀疑并没有使人们的热情衰退。毛泽东 1955 年 7 月的讲话《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发表以后合作社得到了惊人的发展。毛的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尽管刘少奇“收缩”、“清理”了 200 000 个合作社，但 1955 年又有 550 000 个新的合作社相继成立，到年中就达到了 650 000 个，到 1956 年发展到 1 300 000 个，虽然 1958 年报道只有 740 000 个，但合作社的规模从平均几十户发展到平均 160 户，这意味着中国所有的汉族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合作化运动起步较晚），选择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如此，到 1958 年这些合作社中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半社会主义的、土地合股协作的合作社了，而成了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合作社，所有土地、牲畜和大农具归集体所有，所有收入按劳分配。

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世界历史上生产方式的一场规模最大的革命。在从 1953 年到 1958 年的短短的 5 年中，几亿农民放弃了他们古老的个体生产方式，参加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总的来说，这场革命没有流血，没有任何财产遭到重大破坏，而且从未停止过生产。

农村的集体化与小企业、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等行业的大规模的迅速集体化是同步的。到 1958 年，除了少数偏僻地区以外，在中国已很少有私营经济和个人生产，正是这种特殊的、迅速的、成功的但仍然不太巩固的社会主义变革为 1958 年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大跃进作了准备。

## 8、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从高级社向人民公社的过渡，直接的推动力是农田水利建设和兴修水利工程。1957 年 9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后，许多地方开始突破合作社的规模，试图通过并社解决统一规划和集中劳力、物资、资金等方面的问题。因为修建比较大的水利工程不仅需要投入大批的劳动力和资金，也要求站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角度，对工程进行安排和规划。同时，考虑农业机械投入和农村工业，也只有在相当大社的范围内才能兴办。于是从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公社开始，全国农村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 年 8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说明几十户、几百户的单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村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到 1958 年 10 月底，全国农村基本实现了公社化，原有的 75 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为 26000 个人民公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 99% 以上。

不同于原有的合作社只是一个生产组织，人民公社还取代了原先的乡政府，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人民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又分为若干个生产队，实行三级管理。人民公社统管全社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只是一个具体负责组织生产的单位。在分配制度上，人民公社也突破了原有的按劳分配，具有了一定的按需分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当然，一些地方由于超越阶段地对按需分配过于强调，甚至干脆取消了按劳分配，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在经过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挫折和反复，1961 年中共中央制订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规定了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体制逐渐稳定下来，中国农村的发展总体上开始比较平稳地稳步发展。“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农业生产仍然处于小生产水平，尚没有达到规模经营的要求，所以在生产队水平上联合劳动就足够了，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独立经营，组织生产；一些在生产队的范围内难以容纳的生产经营项目，如水利的兴修和管理、农村工业的发展、大型农机具的使用和管理，以及发展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事业等种种，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在大队和公社的层面上来加以解决。1964 年毛泽东又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农田水利与农业生产条件产生质的飞跃，改变了靠天吃饭的面貌，上世纪 70 年代基本结束“大旱大涝必大灾”的历史。同时，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也逐步加大，从 1957 年到 1978 年，国家对农业投资占全部国家投资的百分比从 7.8% 上升到 12.5%，对农业工业投入品生产的投资占全部国家中工业投资的百分比从 3.0% 增长到 11.1%，而农业税占全部国家收入的百分比从 9.6% 下降到 2.5%。农业与工业产品的交易价格也比逐步向有利于

---

农业的方向改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逐步缩小。加之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农民转变身份为公社社员，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也逐步缩小。

人民公社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虽然稳定下来并稳步发展，但是却并不稳固。除去部分公社领导的官僚主义以及敌对分子的蓄意破坏外，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矛盾是农业机械化的水平没有跟上农业集体化的要求。除部分地区外，许多地方仍然以手工劳动和有机化肥为主，机器耕地、收割，科学播种、施肥等都还没有大规模地推广开来。因此，人民公社由于其生产的物质客观条件所限，一开始就存在着单干的要求。在某些地方，特别是比较穷的人民公社，加之部分农民的落后意识，必然要求把人民公社的田地分给每户农民实行单干，有些地方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实行分田到户，但也开始偷偷尝试着包干到户或包产到户。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满足农民的这一要求，中共中央改变了农村政策，明确支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又由于化学工业的产品已投入使用，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农业生产在短时期内获得了大幅提高，农民也增加了收入，中国农村焕发出另一种新的活力。这一活力激发了中国农民的积极性，农村居民不是进城务工就是进城务商。除少部分农民通过合法经营提升了自己的经济地位外，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化身份，成为了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农民工。

## 一、1956年的中国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刻开展了抗美援朝、土改、镇压反革命这三大运动，通过这三大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底层的广大群众第一次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到1952年，全国范围内的土改已经完成，这标志着困扰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彻底的解决。封建制度的问题，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也不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土改的完成，同时也随着对官僚资本的没收，以小农土地所有制为标志的小农经济、国营工商业（没收自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以及占据工业生产总值的20%左右个体手工业<sup>11</sup>，形成了当时中国经济的主体。自此，中国社会的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怎样才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呢？1953年起，一直到1956年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为核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全面推行。所谓工业化，就是以既有的苏联模式为模板，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所谓三大改造，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1956年底，一五计划接近完成，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初见雏形；小农经济几乎销声匿迹，96.3%的农户加入合作社（初级社8.5%，高级社87.8%）<sup>12</sup>，手工业合作社发展到10.4万余个，从业人员占全部人员的91.7%<sup>13</sup>；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力度更强，到1956年1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相继宣布实现全市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这年年底，全国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sup>14</sup>。

什么是社会主义，列宁曾经形象的说过，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上电气化。这句话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社会主义需要相当的工业化基础；第二，社会主义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实现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

1956年底，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下完成了所有制的改造。所谓革命，就是一种所有制消灭另一种所有制，因此，虽然中国的工业基础尚未巩固，中国共产党确有充分的理由在其八大上骄傲的宣称，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1956年，一个特殊的年份。即使没有波匈事件，即使没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它也注定要被世界历史所铭记。在这一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旧的矛盾已经解决，新的矛盾即将展开。

## 二、整风前奏

### 1、社会主义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工业化大生产，但1956年的中国，工业化程度很低，生产力尚不发达。因此要巩固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这一点在八大的报告中表述如下：“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落后的生产力会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八大很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八大的问题在于，他把这个矛盾看成了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并且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之后的历史雄辩的证明，八大在这两个问题上是错误的。

经济领域中的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灭，而是以某种更为隐蔽的方式展现出来。

1956年是多事之秋，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全国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在城市，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在农村，出现请愿、退社风潮<sup>15</sup>。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里面提到过一个强制拆迁的例子。1956年左右，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没有给农民妥善的安置，也没有说清道理，就使用性质手段强制拆迁。

农民不服气，对地方官员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

这个例子不是孤立的，当时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这样。比如，1957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职工罢工请愿情况的报告》里面就提到，“某些企业领导干部对工人生活漠不关心，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引起工人罢工请愿。例如太原石膏厂从雁北调去的工人，在9月份就向行政提出盘热炕和挂布门帘的要求，行政也答应了，但一直拖到11月份天气已经冷了仍未解决。同时该厂食堂管理不善，工人常吃冷饭，引起工人不满。在工人罢工以后，领导上才急忙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工人反映：‘火小时他们不救，火大了他们着急了。’有的企业行政作风极不民主，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威胁工人。如河北定县制砖厂变更劳动组织，不同工人商量。工人提出意见，行政干部不加考虑反而粗暴地威胁

---

<sup>11</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34页。

<sup>12</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344页。

<sup>13</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346页。

<sup>14</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第十二章。

<sup>15</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426页。

工人：‘谁不上工，就扣谁的工资’。引起该厂 34 名工人罢工半天。”<sup>16</sup>

那么对于这些事情毛泽东是怎么看的呢？他认为，“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而且，“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sup>17</sup>更有甚者，毛泽东曾经非常激烈的批评党内的这种官僚作风，“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sup>18</sup>

在毛泽东看来，这些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矛盾，而是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是干部的官僚作风造成的。联系之前在发生的波匈事件，毛泽东认为，应该以波匈事件为借鉴，从整顿党风入手，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问题。

今天再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在 1956 年的时候，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作风是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两者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前，他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事实上，毛泽东在 1965 年就曾经说过：“官僚主义者（编者：更确切的，是官僚特权阶层，或者走资派）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从这些话来看，很难说毛泽东还认为官僚特权阶层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 2、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经过长期思考，毛泽东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他认为，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解决国内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一切问题的总方针。因此，他要在全党、全社会进行广泛宣传，造成舆论，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外人士）都能懂得，都能接受和掌握它<sup>19</sup>。为此，毛泽东于 1957 年 2 月 27 日到 3 月 1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会议规模空前，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一千八百多人。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

讲话一共十二点，最重要的是第一点（两类矛盾）和第八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在第一点里，毛泽东沿革区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简单来说，利益根本冲突、不可调和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比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工人工资上涨，资本家利润就降低，无法调和根本冲突，这属于敌我矛盾，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根本解决。而在利益没有根本冲突，仅仅是由于作风、习惯、私人恩怨等引起的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

在第八点里，他再次强调了双百方针，并重申了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既然社会上还有矛盾，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压是压不住的，压不住就要放出来。那万一出现了反马列主义的论调怎么办呢？比如出现了唯心主义的思想怎么办呢？毛泽东觉得，这不可怕，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斗争的过程中长大的，温室里面长不出来马列主义。

## 3、发起整风

毛泽东这次讲话，从 27 号下午一直讲到晚上，期间他体现出来的大度、豪迈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自信，深深的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毛泽东是一个务实的人，深深的知道长期的思维和习惯不是一两次讲话就能改变的。双百方针和互相监督等口号 1956 年就正式提出了，但是执行效果并不好。党内很多干部根本不理解，反而对之大发牢骚，“百花齐放，放出的都是毒草、野草”，“革命几十年都没有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叫人监督了。”<sup>20</sup>更有甚者，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负责干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直接和毛泽东的双百方针唱对台戏。这些事实表明，对“双百”方针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者并非只是个别人。

所以，为了落实本次讲话，毛泽东觉得必须加大宣传力度。他主要通过三个途径：

首先，通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3 月 6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而且破例地邀请党外人士参加<sup>21</sup>。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的《正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

其次，通过政协会议。3 月 5 日至 3 月 20 日，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召开，会上大力宣传毛泽东的讲话。

最后，通过沿途讲话。3 月 17 日开始，毛泽东途径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最后抵达杭州，一路上，毛泽东每到一个地方，就召集当地的党政负责人，宣讲其双百方针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sup>16</sup>转引自网文，<http://www.langsong.net/lstd/wxshk/htm/xiandai/xiandai2/zl/1957/001.htm>。

<sup>17</sup>《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sup>18</sup>《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4 月第 1 版，第 313--329 页。

<sup>19</sup>《毛泽东传（1949-1976）》，第 16 章。

<sup>20</sup>《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426 页。

<sup>21</sup>会议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约一百六十多人，占了全部与会者的五分之一。

讲话里面谈到了双百方针，谈到了人民内部矛盾，谈到了官僚主义问题，也谈到了整风。毛泽东说，“共产党正在准备整风。中央作出决定，准备今年就开始，先搞试验，明年比较普遍地进行。党外人士自愿参加。整风的目的，就是要批评几个东西：一个叫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第二是宗派主义；还有一个是官僚主义。现在的情况是官僚主义相当严重。整风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在小组会上，是小小民主。要和风细雨，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打死的方法。在整风中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习推进一步。我们不应该限制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已经讲过的范围，应该按照他们的基本方针、基本方向有所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定要发展的，它不能停止的。停止了，就没有生命力了。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违背基本原则就是修正主义。停止不前就变成教条主义。”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行动，全党整风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毛泽东下决心向党外人士敞开大门，认真搞好整风。

但是，共产党内部高级干部中不赞成“双百”方针的是多数，赞成的是少数。而且对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也多有抵触，“许多党员干部认为自己出身工农，与人民群众有天然联系”，怀疑人民内部有矛盾，更不接受“人民内部矛盾大部分表现为人民群众与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不少党员干部认为，“天下从此多事，工作不好做了。”<sup>22</sup>因此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号召并没有积极响应。最让毛泽东无法忍受的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和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一声不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主党派人士，对毛泽东的讲话反应热烈。

章诒和后来回忆，在看到毛泽东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讲话，储安平甚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编四期九三学社‘社讯’，陆续刊出《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贯彻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座谈高等学校的领导制问题》、《目前工程技术人员的几个问题》等大块文章。”<sup>23</sup>民主党派之所以反应热烈，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有一种政治的渴望，希望能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承担。之前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使得这些知识分子慢慢远离政治中心，对国事缄口不言。而毛泽东的讲话，“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sup>24</sup>

鉴于此，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说，“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sup>25</sup>

此时，毛泽东已经开始担心共产党自身跟不上形势了。他觉得共产党的行动，“落后于党外人士要求共产党转变思想、转变作风日益高涨的呼声，以致陷入被动局面。他觉得现在已经形成对党政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sup>26</sup>因此，毛泽东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

现在一种常见的论调认为整风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引蛇出洞”，是一开始就准备好了秋后算账、整知识分子的帝王心术，然后从上述史实来看，这个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 三、整风运动

#### 1、整风开始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这个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党整风正式开始。指示规定，整风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示发布后，各级党委就开始部署整风工作。

共产党非常重视党外人士参加运动，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认为，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包括对共产党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有利于党改正错误，提高威信。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指示对当前整风的总体部署作出规定：先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对共产党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待共产党整风成功，再推动社会各界整风。“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sup>27</sup>

从5月8日开始，直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受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民主人士帮助整风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地方、高校和机关也开始部署整风。为了落实整风，各大报刊开始集中刊登对共产党的提出批评意见的文章。

毛泽东邀请民主人士提出批评，是真诚的希望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共产党自身的一些毛病。但是，这是有底线的，任何批评都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如果批评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是不能容忍的。由于当时

<sup>22</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435页。

<sup>23</sup> 《往事并不如烟》。

<sup>24</sup> 《往事并不如烟》。

<sup>25</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章。

<sup>26</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章。

<sup>27</sup>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6、247页。



的共产党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的力量，如果批评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毛泽东也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从5月8日开始，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批评越来越厉害。座谈会上，批评也开始不断升级。从最初批评共产党“以党代政”，到之后要求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要求高校和工厂等单位里面取消党委，再到提出“政治设计院”等等。5月15日，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共产党有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sup>28</sup>。

地方和机关里面，也陆续召开类似的座谈会。随着整风的进行，报刊上面对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也越来越尖锐。

前几年，《南风窗》记者采访王绍光，曾经问到：“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王绍光回答说：“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sup>29</sup>

事实上就是这样，仅就单个的言论而言，除了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言论外，绝大部分言论虽然很尖锐，却很难说他越界。也很难说他就是直接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共产党的领导。但是，由于整个舆论铺天盖地全是负面的消息，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共产党出了大问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问题。似乎，“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sup>30</sup>

与知识分子相反，当时工农群众对整风非常不理解。“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等等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有些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sup>31</sup>

毛泽东希望知识分子帮他整风，结果整风放出来的言论却是知识分子要整垮这个党。对毛泽东而言，共产党是保障社会主义制度，进而保障工农群众利益的最重要的力量。要把这个力量搞垮，就是要把工农重新打翻在地，这是他无法忍受的。他对知识分子的信任，换来的却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的背叛，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

## 2、转向反右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构思写一篇文章，题目为《走向反面》（后来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从文章里面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有些右派份子借共产党开门整风之机，大肆向共产党进攻。虽然在文章中，他仍然肯定大部分意见是恰当的、中肯的，但是他“用严厉的措词对当时整风鸣放的形势和党内外思想政治状况作出分析，对一些言论进行批驳”，而且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右派猖狂进攻的问题，目的是要党内对反击右派进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sup>32</sup>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这个指示，一方面肯定了党外批评意见的主流，另一方面，对如何对待右派言论作了部署：“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一些人所说的“引蛇出洞”的策略<sup>33</sup>。

由于中央的看法并没有公开，因此社会上对共产党的批评继续升温。之后被大肆批判的“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以及“党天下”的言论，就是在5月16日之后发表的。

相对上面的情况而言，高校的情况就更为恶劣。5月19日，北京大学贴出第一张大字报。20日，大字报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5月23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甚至有人公开在高校号召罢课，号召串连工人，鼓动工人罢工。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很紧张，不断派人去高校看大字报，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怕中国再次出现匈牙利事件。事后毛泽东会议，“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五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sup>34</sup>当时，中共内部很多干部以及许多普通党员都非常着急，对那些煽动性的极端言论非常不满。

5月20日，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要求各省市党委“孤立右派，争取中间”，研究右派言论，准备伺机反驳。5月21日开始，中央书记处联系召开会议，紧锣密鼓的布置任务，研究右派观点，准备反击。

这之后，各种座谈会照常召开，但是风向已经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6月3日，李维汉就在统战部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说，座谈会上的批评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sup>35</sup>。

<sup>28</sup> 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sup>29</sup> 《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王绍光访谈录》

<sup>30</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章。

<sup>31</sup> 《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

<sup>32</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章。

<sup>33</sup> 《毛泽东传（1949-1976）》，第17章。

<sup>34</sup>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29日。

<sup>35</sup> 《回忆与研究》下，李维汉，第835页。

6月6日，毛泽东起草《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明确指出，要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伺机动员群众反击右派，在思想领域和政治领域，打一场大规模的胜仗。

至此，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已经完全变质，开始转向反右。

#### 四、反右

##### 1、反右初期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以此为标志，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按毛泽东的设想，右派份子的猖獗进攻被打退后，整风就可以继续进行。因此，最初并没有想到停止整风，进行大规模的反右，而是希望把反右斗争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6月19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添加了一段话，作为判断批评意见的标准。这段话一共六条，核心思想是批评的言论不能脱离社会主义的路线和共产党的领导。

6月29日，中央发表《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试图进一步控制反右斗争的范围。指示提到，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所高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到了7月9日，毛泽东对需要点名的右派人数的估计，就从4000人变到了8000人。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撰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式》，提到整风有四个阶段，即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学习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毛泽东在文章中说，反右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并且，毛泽东分析，“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至此，反右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来。毫无疑问，反右斗争开始之时，受到了绝大多数干部和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邓力群回忆，当时“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sup>36</sup>

由其是干部，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被骂了几个月，受了几个月的“窝囊气”，终于可以一舒胸中恶气了<sup>37</sup>。

在此背景下，反右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深入挖掘阶段。

##### 2、反右中后期——深入挖掘和扩大化

8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里面提到，对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应该适当增加，“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对这一部分人的登报批评必须坚持，不要犹豫。但是在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此处毛泽东说的比例，并不是每个单位的比例，而是需要登报批评的人占右派的比例。他在指示里面也明确反对按单位下达比例指标的。但下面在执行的时候，没有按照此指示执行。从后面的情况来看，压指标、给每个单位划比例的情况非常普遍。

毛泽东还提到，“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但是这一点根本没有落实，有些地方甚至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尧山壁回忆说，反右的时候，上级传达文件指示，“党小组长听不大懂文件，只带回来一个指标。他听着‘右派分子’和‘积极分子’差不多，反正都是‘分子’，交给大家选举吧。选来选去推出一个小伙子，手脚勤快，又正在说媳妇，正需要添彩呢。”<sup>38</sup>

8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sup>39</sup>《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全市有极右分子1257人。毛泽东之前的估计是全国需要点名的右派只有8000人，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毛泽东最初的估计。

8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这个十万的数字，指的是全国的右派，而不仅仅是需要点名的右派。但不论怎么说，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之前的估计了。

毛泽东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搜集的材料估计一个数字，下面在执行的时候超出这个数字，然后报给毛泽东，毛泽东

<sup>36</sup> 《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 1-7》。

<sup>37</sup> 王绍光在接受《南风窗》的采访时说，“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sup>38</sup> 《反右轶事》，[http://www.xtrb.cn/epaper/ncwb/html/2011-04/22/content\\_255347.htm](http://www.xtrb.cn/epaper/ncwb/html/2011-04/22/content_255347.htm)。

<sup>39</sup> 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是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与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一起主抓反右工作。

再根据汇总的材料估计出新的数字，下面再执行，以次循环。反右就在这种循环中不断的扩大。

9月20日至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做《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报告中强调，关于反右斗争，要继续深入，不能草率收兵；报告总结了5月份以来的反右斗争，并对今后的反右斗争的工作做出了部署。

到9月20日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6万余人。为了解决前期随意乱划右派的问题，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规定了划分或不划右派的某些参考标准，比如通知里面提到，“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这个标准总体看来操作性不强，自由裁量的范围较大。因此，虽然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防止多划右派分子，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但用处不大。而且，但是的干部多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对政策的掌握往往是偏左的。

随着形势的发展，“一些单位还规定了划右派的具体数字指标。”而下面的官员为了表明自己紧跟中央，在执行的时候，“上面的指标在下面一些单位也被突破了。”<sup>40</sup>

玉溪反右的时候，上面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要达到4%-5%，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了15%，甚至20%。时任玉溪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右派，说他反对共产党，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右派了。”<sup>41</sup>不换脑筋就换人。

当时，中央下达的右派分子的指标是5%左右，但是，各地的干部都愿多抓几个，谁也不愿用“百分之五”约束自己。例如，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于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复旦大学600多个教师中……右派只占8.5%。”但是，如果加上1958年“反右补课”补充的右派，其总数则超过了10%。而吉林省各高等院校，1957年7月初，讲师以上的教员中已经有7%—15%被定为了右派。<sup>42</sup>

在这样的环境下，反右派斗争迅速的扩大。在1958年夏季结束时，全国共划右派55万。

被划为右派的大多数人，按照前述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都很难认为是右派。有些人是思想认识比较模糊，被划成了右派；有些人是单位领导为了完成指标，找出各种牵强附会的理由，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些是由于在整风期间对领导提出了某些尖锐的意见，结果到反右的时候被打击报复，划成了右派。而真正的一心想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其实并不多。

至此，整个反右运动的框架就比较明朗了，这场博弈的参与者并不仅仅是目前主流描述中的中共一方和知识分子一方，而是包括了毛泽东、党内官僚集团、普通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高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内的各方力量，最终党内的官僚集团成功的利用了高级知识分子们在政治上的愚蠢和毛泽东对于官僚集团的依赖，将运动方向从针对官僚集团的整风运动转变为镇压敢于挑战官僚权威的普通工农群众和底层知识分子。

## 五、后记

反右扩大化中，毛泽东究竟需要负多大的责任，邓小平或彭真又需要负多大的责任？对我们而言，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大。将历时的变迁归结于某个具体的个人，是简单易行的，但也是流于肤浅的。个人的影响再大，也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影响历史的进程。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个人在反右扩大化中的历史责任，而是不同的集团在反右扩大化中的表现。

反右扩大化的具体执行者，是整个共产党的干部集团。他们有些出于报复的目的，有些由于认识的偏差，有些是上级压指标而不得已为之，但不论怎样，他们是反右扩大化的具体执行者，由于整个集团的行为，反右运动才产生了扩大化的结果。

当我们提到共产党的干部集团时，常常用到一个词——“官僚”。时官僚集团在反右运动中起到了负面的作用，从而造成了扩大化的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官僚的阶级属性，然后才能明白他们的行为，进而才能找出解决的方法。

首先，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当时中国官僚特权集团的阶级属性。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机器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的特点是消灭机器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属性。

但是仅仅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个人所有制或资本家集团所有制，并不代表就消灭了资产阶级本身。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国家的名义占有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此时，资产阶级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不再以单个或集团的资本家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国家干部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在生产领域中，高级干部对生产资料有非常大的处置的权力，可以直接安排生产；在分配领域中，高级干部享受的福利和工资远远高于普通工人，直接分享社会的剩余价值。其实大家想一想现在的垄断国企就明白了，垄断国企的领导，并不一定拥有该企业的股权，但是他对企业的运行享有极大的权利，同时分享大量的剩余价值。而企业本身存在的目的也是直接服务于资本的增值，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就不再表现为单个的拥有某企业的股权的资本家，而是表现为国家的高级干部。

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以国家的名义占有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但不同的是，政权的属性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国

<sup>40</sup>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435页。

<sup>41</sup> 《褚时健的德与能》，[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2/21/837810\\_58019570.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002/21/837810_58019570.shtml)。

<sup>42</sup> 《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0页。



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在理论上，其占有的生产资料不再服务于资本的增值，而是服务于劳动者本身的需求。

1956年的中国，建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以国家的名义占有了几乎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农村中是集体经济），并且在分配领域极大的限制了其资本主义的属性（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工资差别很小）。

但是这远远不够。毛泽东曾明确的说过：“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sup>43</sup>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要无产阶级管理企业，甚至管理国家？因为当时的中国，在生产领域以及政治领域中，仍然残存着很明显的资本主义属性，如果无产阶级不能参与管理，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限制或者消灭这些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属性。

为什么说在这些领域中仍然残存大量的资本主义属性呢？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或者处置权，因此工人只是生产的被动的接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参与者。在生产领域，当时的中国就在相当的程度上体现出这个特点。从不同人群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言，当时的中国工厂领导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比工人更密切。干部可以更大程度的参与生产的管理、计划，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凭借自己的意志处理生产领域中的事物，并且他们这方面的权利往往受不到工人的监督，而工人在相当程度上是被排斥在管理领域之外的。也就是说，在生产领域中，工人还没有完全成为生产的主体，更多的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

在政治等上层建筑中更是如此。政治本身就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由其明显，政治的事务往往就是对经济的直接计划、管理以及对生产资料的处置。而工人在这个领域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不可能有效参与国家管理或者监督国家干部在这方面的事务。

因此可以说，在生产领域以及由归根结蒂受生产方式限制的上层建筑领域中，仍然残存着大量的资本主义属性。

其次，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反右运动会出现扩大化的后果。

反右是对整风中出现的偏差的纠正。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大部分的批评意见都是有益的、中肯的，只是一部分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借机造势，妄图夺权。反右，就是要纠正这一部分人越界的行为。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大部分提出中肯意见的人也被打成右派。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从整风的性质分析开来。整风表现出来的是与官僚主义的斗争，而其实质是要在生产领域本身以及归根结底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上层建筑领域中限制资本主义的属性。就像罢工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一样，整风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只不过在整风中，知识份子一定程度上也在为工人代言。知识份子的批评针对的是具体的官僚作风，而没有提出要无产阶级参与工厂和国家的管理。但是他们的批评，在客观上已经限制了生产领域及政治领域中官僚集团的权力。因此，必将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的反抗。

反右的目的是反对右派，是反对那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试图回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和言论。但是在具体的执行中，一切试图限制官员权力的批评，都有可能被视为右派的言论。在执行的官员看来，你批评了某个共产党的干部，就是批评了共产党本身，你就有可能被打成右派。

这和某个官员的个人素质或善良与否没有太大关系，这是由官僚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受制于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关系本身。为什么有些官员明明知道压指标有问题，还努力的在本单位寻找右派？因为在他们看来，上级比群众更重要。这是由于上级官员在社会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归根结底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处于主导地位。

那么，怎么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呢？怎么才能根本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下出现的官僚作风的问题呢？甚至说得更远一些，怎么才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呢？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当时既有的整个社会关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就是在生产、管理领域享有更大权力的干部。改革开放的政策只是强化了干部在生产和管理领域的权力，并将之延伸到了分配领域。而社会主义的整个过程，与之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逐步弱化工人和干部的差别，让工人参加生产领域及上层建筑管理工作，从而在根本上限制干部的权力，解决官僚作风的问题。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到，“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这就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光是把旧有的官员剔除，代之以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也不光是改变既往的官僚主义的作风；更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产生官僚主义作风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必须要让无产阶级参加到国家和工厂的管理中，逐步缩小工人和干部的差距，这个差距不仅仅是指分配领域的，更重要的是指生产领域本身的差距。

<sup>43</sup>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 275-276 页。

### 一、大跃进的发动

#### 1、大跃进前的国内形势与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视

时间转到一九五八年。

到这一年，中国农村的合作化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一九五六年底，全国有百分之九十六的农户入了社，加入高级社的农户高达百分之八十七。农业合作化使农民第一次摆脱了小生产者的狭隘，从此走上社会主义的大道，从此中国农民开始异常积极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一名农民以这样的笔墨写道：成立初级社当天“社员们家家户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人人穿着新衣裳，挂着红布条，作为社员的标志。真是喜气洋洋，热闹非常！”“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干部们白天带头劳动，晚上又加班熬夜地讨论社里的工作”，“各种农作物产量都比往年高。又由于分配比例也是地和劳力各占一半，对土地多、劳力少或者土地少、劳力多的农户都能比较合理的照顾到了，在号召扩社时，西北村未入社的农户就积极响应”。<sup>44</sup>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上那里参观的不少人都感动得流下眼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有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城市的公私合营也已经基本完成。公私合营极大地激发了原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内的工人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正如前面提到的，“博山玻璃厂，有人敲锣打鼓，有人打着旗子，有人举着横批，还有的人跑前跑后奔走相告。‘公私合营万岁！公私合营万岁’。老人说，那天他们特别兴奋，跟着游行队伍高声喊着口号，老人说当年不管哪个单位实现公私合营，都唯恐天下不知，每次都会有很多人上街游行，搞庆祝大会。说起当时心里的真实感受，王长庚说了5个字：‘心里格外恣（舒服）’。王长庚说，在那代人眼里，公私合营，就等于社会主义来了，光明来了。而‘最大变化就是我们工人开始是人。从被剥削阶级到主人翁了。’”<sup>45</sup>

但是，在所有制方面取得极大胜利、公有制处处战胜私有制的同时，社会主义却并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场所都能够激发起工人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社会上仍然存在着“动口不动手的官气，安于现状的暮气，怨天怨地的怨气”<sup>46</sup>。工厂里仍然存在着诸如这样的现象：“党支书，真是棒，拿着沙发当了炕，工作时间把吨打，睡的呼呼真是香；有人叫他睁睁眼，迷迷糊糊又一场，身为领导这样做，全体干将怎样？”<sup>47</sup>解放初期，提到供给制、老革命、艰苦奋斗等等，人们认为是光荣的，短短几年后，一些人开始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有些人开始大讲“物质利益的原则”，很多人认为“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甚至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sup>48</sup>。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不会满足于这种情况，在一九五七年发动了整风反右运动。整风运动极大激发了劳动群众的热情，“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变化。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舒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整风以前我们许多干部有两条：一条叫官气较多，二条叫政治较少。不是要反五气吗？五气的头一气就是官气。经过整风，没有整好的还有一些，但是大多数人是以前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跟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人们感觉跟国民党时期确实不同了。过去不是的。因为有一部分干部，在工人看来，他们神气不对，是在做官，跟国民党没有分别，还是压在他们头上，所以有些工人工作就不那么积极，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是为手表、自行车、钢笔、收音机、缝纫机等五大件而奋斗，就是为个人奋斗。那个时期许多人不觉悟，积极分子只是一部分，落后分子相当多。因为共产党批判了三风五气，他们也就自我批判了：我们这个五大件也是为个人的，不为社会，也不对呀。工作就积极起来了。农民也是这样，因为合作社干部，县、区、乡干部搞试验田，跟他们打成一片，一股热潮就起来了。冬季很冷也要搞水利，他们知道是为谁来干事情，是为他们自己，为集体，为全国。”随后的反右运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仍取得了极大的胜利，打击了右翼势力搞资本主义轮流做庄的企图，更好地教育了群众，“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右派）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sup>49</sup>。毛泽东总结到，社会主义内部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右派、中间派与工人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另一种是劳动者内部关系。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有“五气”，不是平等关系，不是普通劳动者的关系，是官与民的关系。在这一点说来，同国民党一样。……而整风反右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反了右派，也批评了干部，干部整改，解决了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关系问题。使工人觉得真解放了。工人生产情绪大增。过去是为官做工，“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和国民党一样，为五大件奋斗。工人觉悟都大大提高。”<sup>50</sup>

<sup>44</sup> 陕西合阳县农民侯永禄《农民日记》1955.12

<sup>45</sup> 《淄博晚报》。《公私合营那天 我跑着喊“万岁”》[http://www.zbnews.net/zbnews/tuwenbaodao/2009\\_7\\_7/837981.shtml](http://www.zbnews.net/zbnews/tuwenbaodao/2009_7_7/837981.shtml)

<sup>46</sup>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sup>47</sup> 工人大字报集锦（上集），工人出版社，1958

<sup>48</sup> 《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sup>49</sup> 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南风窗-威虎网

<sup>50</sup>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插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到了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但是主要的，侧重从所有制的关系去解释，另外两个方面，是不重视的。进行社会主义探索中的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发现了这一点，在所有制问题已经解决的地方，工人农民却并不能始终保持积极的工作热情，而在通过整风反右去改变这一现状的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sup>51</sup>“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

进一步的探索表明，“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视，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发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为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卓越贡献。从此，围绕着抑制还是继续发展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两条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大跃进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直至文革运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用生动的语言解释资产阶级法权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重要性。

“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为什么要刮胡子呢？一年剃四次头，刮四次胡子不是很好吗？湖南省委书记周惠说，在县工作时，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在地委工作时，还能接近群众，到省委三年，干部和群众就不好找了。去年整风发生了变化。过去我们成百万的人，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成为群众拥护的共产主义战士。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华东老根据地搞过地道战，北方都经过战争锻炼，那个地方生长的干部生活习惯就有些不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也出坏蛋，如××、××。××的意识非常落后，很隐蔽，摸不透他的心思，看来监察委员会不起作用，高岗，饶漱石都没有‘监察’出来，无非是检查湖南、湖北的‘青森五号’（梗稻），真正起作用的是军委这次一千四百人的会。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列宁写过一篇文章，十月革命前夕。他到过工人家庭作客，这个工人找不到面包，后来找到了，非常高兴，‘这回到底把面包找到了！’列宁从这里才知道面包问题的重要。我们的同志一年劳动，与人民打成一片，对自己的精神状态会有很大影响。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sup>52</sup>

“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

<sup>51</sup>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sup>52</sup>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sup>53</sup>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赫鲁晓夫来了，就是只说国家搞多少粮食。不讲生产多少，我们就是讲生产的。人们知道我们反正是为了他们，积极性高。有人说“大国人多难办事”。看什么办法，只要办法对头，再有十亿人也好办。我们的方法，反正是大鸣大放，自己管理自己。我们是服从真理的，真理在下级的，上级就服从，兵高明军官就服从兵，学生编教材，比教员先生编得好，先生就应该服从学生。编教材要党、学生和教员中的积极分子“三结合”。一门一门的科学来清理，资产阶级霸占的情况必须攻破。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赵承嘏，他会提炼一种治高血压的药（蛇根草），始终不向别人讲，青年科学人员不服气，苦战了几天，也就搞出来了。因此，要抓研究员青年人，使这些教授孤立起来。这种斗争很激烈。因此还要几年。

“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sup>54</sup>

发动大跃进，在另一方面，则是发展生产的切实需要。到一九五七年，工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四十亿元增加到七百八十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每年百分之十八点四的增长速度，超过计划中原定的百分之十四点七的速度。这是一个很高的而又很扎实的速度。其中，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五百三十五万吨；煤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千二百万吨，增加到一亿三千一百万吨。农业总产值，从一九四九年的三百二十六亿元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六百零四亿元，在“一五”计划期间保持着百分之四点五的年增长率，超过原定的百分之四点三的增长速度。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从“一五”计划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一·五（一九五二年）提高到结束时的百分之五十六·五（一九五七年），超过一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冶炼、高级合金钢冶炼等，也在这一时期内从无到有地相继建立起来。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不很高。第一强国美国的年平均增长率不过百分之三点七，英国只有百分之二点九。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以这样的速度发展的确是很快的。在“二五”计划开局之年，应当采取怎样的发展方针，这是毛泽东首先考虑的问题。

因此，在生产关系上要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充分调动群众生产热情，另一方面由此也必将带来更好更快的生产的发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刚刚结束，毛泽东就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

## 2、毛泽东与大跃进的发动

大跃进的最初定位，是一场技术革命。毛泽东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sup>55</sup>实际上，大跃进的实际影响远远超出来了技术革命的范畴，群众的热情一次又一次地给了人民领袖新的动力，从而一步一步推动了运动的前进。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是后来继续革命思想的萌芽。

不破不立，大跃进的发动，是从反对“反冒进”开始的。

毛泽东首先从抓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入手。他概括出两种领导方法：一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一为又少、又慢、又差、又费。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成为毛泽东当时批评右倾保守、批评反冒进的主要武器。

1955年夏，国务院开始着手编制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五年远景规划及“二五”计划轮廓。十月，毛泽东看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对设想中的发展速度不满意。12月，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从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转到经济建设领域，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反对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很快，就出现各部门、各地区不顾实际条件，纷纷提高计划指标、追加基建项目的浪潮。

1956年6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付出很大力量压缩预算和计划指标，形成“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的指导思想，并得到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的赞同和支持。根据这个精神，中央宣传部起草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定，在六月二十日发表。到九月中共八大通过关于“二五”计划的建议，反冒进取得了效果。毛泽东对反冒进和这篇社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他在收到刘少奇送来的

<sup>53</sup>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sup>54</sup> 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

<sup>55</sup>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49—351页。）

社论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1957年9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时候，经济形势发展得比较好，群众的建设热情高涨起来。在毛泽东看来，一九五六年夏到一九五七年春的反冒进恰恰是对群众的积极性泼了冷水，毛泽东便把反冒进作为一个严重问题公开提出批评。

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并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

1957年12月底和1958年1月初，召开了两次杭州会议，杭州会议实际上是南宁会议的序幕。毛泽东的两次讲话，着重讲了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敌我与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问题，以及不断革命、技术革命等。并再次批评反冒进，还第一次点名批评了周恩来等人。毛泽东一共谈了十七个问题，这可以说是《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雏形。

### 南宁会议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央在南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南宁会议。会议发了三个反面材料：李先念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关于一九五六年预算报告中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报告的节录。这三个文件一发，会议的气氛就紧张起来了。毛泽东以鲜明的态度批评反冒进：

“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最怕的是六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对柯庆施的报告大加称赞，说：“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本主义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答：“我写不出来。”毛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他拿着《人民日报》关于反冒进的那篇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这篇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高潮》序言提出批评。社论提出的方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的空气，挫伤了积极性。这是没有料到的。”《人民日报》社论在引用毛泽东写的《高潮》第二个序言一段话的时候，只引用了前半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而没有引用后半段：“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做自我批评，刘少奇也对社论做了自我批评。1月21日，毛泽东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六十条，形成正式文件时提名《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毛泽东还提出一个在他看来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叫做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他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说一个和九个指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

经过南宁会议，毛泽东的主张，在中共最高领导层被一致接受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关键，但又远远不够，还必须把他的主张推广到党内外更大的范围，推广到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去。

### 继续推广大跃进

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要改掉官气，官是可以做的，但要打掉官气。最好根绝官气。我们都是做官的。都有点官气，官气是一种坏习惯，不是好习惯。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感到和他们平等，我们自己说平等靠不住，要使对方感到平等。改掉官气不是很容易的，有官气就要改掉，先从共产党起，民主党派也可以逐渐改掉。湖北红安县的领导干部过去就有官气。世界上有个中国，中国有个湖北省，湖北省有个红安县，过去这个县叫黄安县，因为黄字不好改为红安县，这个县的干部以前官气十足，农民看不惯干部，还有三多，说皮鞋多，大鳖多，自行车多，是否还有打扑克多。后来他们改了，穿草鞋到乡下去，农民很欢迎。现在干部下乡，山东的老百姓讲，‘八路军又来了。’可见这六、七年来官气十足，做了官有了架子，因此要整风，要整掉官气，民主党派也要整风。”<sup>56</sup>

2月1日，开始了十天的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会议提出了1958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增长17.8%，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增长6.1%，工业总产值增长14.6%，钢产量拟定为624.8万吨，增长19.2%。同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继续批评右倾保守思想。

<sup>56</sup>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2月份，毛泽东开始东北调查。

1958年2月28日，在颐年堂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恰好是春节。毛泽东说，今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叫“团拜会”。他以高昂的情绪大力称赞生产高潮的到来。他说：“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一九五六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讲话结束时，又回到反冒进问题上来，但口气缓和了许多：“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都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这是毛泽东的一贯做法。当他认为党内出现了重大错误或偏差的时候，大声疾呼，在犯错误的人背上击一猛掌；待他们作了自我批评，他又加以鼓励，继续委以重任。一九五三年八月全国财经会议上是如此，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是如此，此次南宁会议上又是如此。在以后的党内生活中，类似的情况还出现过多次。

### 成都会议

3月4日，中央在成都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此时，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正在掀起一个生产高潮。一个空前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高潮看起来已在各行各业普遍出现。

在会议的十九天中，毛泽东一连发表六次讲话，广征博引，谈古论今。考虑到当时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情况，毛泽东还提出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论点。他说：“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sup>57</sup>

在指标方面，从原来的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现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薄一波曾经说：“十五年赶上英国，就钢的总产量来说，也不能算是冒进。”

对于一些地方提出的太离谱的高指标，毛泽东还有所顾虑。比如，辽宁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毛泽东就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这么个快法，我有点发愁。可以提得活动一点，留有余地，再看一看，以免被动。”

一九五七年冬和一九五八年春兴起了大搞水利运动，在许多地方，已经冲破了现有合作社的规模，要求并社。经过毛泽东的肯定和倡导，可以预料，并社和扩社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发展起来，这就是后来人民公社运动的出现。在社员家庭副业方面，毛泽东采取慎重和保护的政策。他说：苦战三年，不要减少自留地 and 个人的养猪。三年内增加合作社积累。

3月22日，毛泽东第四次讲话。毛泽东的精神越来越兴奋，情绪越来越高昂，思想越来越活跃。这次主要讲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为此他提议把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以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说：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他还讲不要怕教授，说进城以来相当地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他说，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的这个思想，在南宁会议上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展开，这次大大地发挥了，举出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何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二十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清为目的。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二十岁，死时才才三十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二十二岁。颜渊死时只三十二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毛泽东还提出“六不怕”：“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他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难道可以牺牲真理，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精神振作，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在发言中，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对毛泽东说了一些赞扬的话。有的说：我们的水平与主席差一截，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作为一个高级干部来说，不只是跟上的问题，而是要有创造精神的问题。主席的作用不是当不当主席的问题，不是法律上名誉上的问题，而是实际上的领袖。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主席的许多优点是不是可以学到呢？应当说，是可以学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但是主席有些地方我们是难以赶上的，像他那样丰富的历史知识、那样丰富的理论知识、那样丰富的革命经验，记忆力那样强，这些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学到的。有的提出：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有的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sup>58</sup>

<sup>57</sup>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10日

<sup>58</sup> 成都会议记录，1958年3月25日

成都会议是继南宁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在发动“大跃进”的道路上，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 武汉会议

在4月1日到4月9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开始压缩空气。会议每日只开半天，连续九天从未间断。汇报中，各省讲了整顿后的新情况和“大跃进”的新形势，纷纷拿出更高的指标，相互攀比，都不甘落后。吴芝圃汇报，讲了一年翻一番的根据，以及一年完成三年规划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sup>59</sup>毛泽东劝告安徽省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他还提到报纸宣传问题：“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需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

##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一个月后，5月5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大二次会议<sup>60</sup>。这次会议上，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步入高潮，并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会议的工作报告确认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即：“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

5月8日，毛泽东讲话：他说：我们的同志有几怕。第一种怕教授，第二种怕马克思。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爬上楼去。我看，楼下的不要怕楼上的人。列宁说的、做的，许多东西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里出理论。我们干成功了，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来就是理论。

他说：“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我们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一百多年。它们总是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封建主义又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夫子。对外国人来说，我们不行。对孔夫子来说，我们也不行。”“总之，这都是迷信，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他再一次引用大量事例，证明自古以来，大学问家、发明家，开头都是年轻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受压迫的人，或者学问比较少的人。他说：“我们的同志不要被大学问家、权威、名人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劳动人民蕴藏着的创造性、积极性很丰富，过去就是上层建筑——党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够，压制住了，没有爆发出来。现在开始看见劳动人民、六亿人口的这种创造性。去冬今春才开始爆发出来。我们现在的办法就是揭盖子，破除迷信，让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都爆发出来。”他说：我也不懂工业，可是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开始不懂，学几年也就懂了，没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十五年赶上英国，赶上美国，差不多。照李富春同志的话，稍微多一点时间，比如二十年，那是尽够的。但这个不发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要变。“不要改变我们的口号，不要加上一个什么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赶上美国。但是高级干部、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应当知道这个方向。”毛泽东还讲到，要学习列宁，敢于插旗子，敢于标新立异。插旗子不要有空白，要把资产阶级插的拔掉，换上无产阶级的旗子。要“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sup>61</sup>

5月20日，毛泽东再一次就破除迷信问题发表讲话，还讲了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外行领导内行、插红旗辨风向等问题。去掉官气，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个问题，从南宁会议一路讲下来，并写进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把它提到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度，加以提倡和强调，同时严厉地批评使人厌恶的官气。他说：“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末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还说到：“凡是有人的地方总要插旗子，不是红的，就是白的，或是灰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红旗，就是资产阶级的白旗。……现在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合作社、机关、部门、车间、连队、学校、企业，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在毛泽东的积极调动下，大会的发言都是充满激情的，有不少豪言壮语。中央一些部门负责人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人，纷纷提出各自部门和各自地区的生产高指标。“十五年赶上美国”的口号特别令人振奋。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原规定十二年完成)，也是一些代表发言的主题。冶金部门提出，1959年钢产量计划1200万吨，1962年3000

<sup>59</sup> 黄河、秦岭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达到800斤，简称“四、五、八”。

<sup>60</sup> 唯一一次二次会议即全体代表大会，八大时确定每年一次代表大会

<sup>61</sup>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5月8日。



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000万吨。化工部门提出，我国化学工业也能在十五年赶上美国，而且群众可以用土办法办化学工业。铁道部门提出，在今后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当时全国共有三万公里)，等等。这些高指标，是在不断批评反冒进，批评教条主义，大力倡导破除迷信的过程中，人们的头脑越来越发热，一步一步抬起来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总路线和这一系列口号被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就标志着经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一步一步地发动“大跃进”的重大决策最后确定，全国“大跃进”已经进入高潮。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代表们给予高度评价。

### 工业跃进

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sup>62</sup>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超英的时间就由十五年改为两年。

6月19日，毛泽东决定钢产量在1957年的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关于这个过程，毛泽东说：“开始是六百万吨，第二本账是七百万吨，第三本账是八百万吨，争取九百万吨。我说你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

### 人民公社的开始

8月初，毛泽东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在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看到人民公社的牌子，点头称赞：“人民公社名字好。”书记处书记史向生说，他们参观浙江诸暨县农场以后，给各省试办的公社起了一个“共产主义公社”的名字，后来根据第一书记吴芝圃的意见，定名为“人民公社”。毛泽东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 北戴河会议

8月17日至8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这次会议，毛泽东一方面生动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法权，另一方面对于钢产量和人民公社进行了解释。

此时，毛泽东感到1100万吨钢产量的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但他仍想再努一把力一定使它完成。因此，他提出要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6月19日，即毛泽东决定钢产量翻一番的那一天，和8月16日这一天，就被有些人称为当时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上的“两个伟大的日子”。

关于人民公社，毛泽东说：“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日大二日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8月21日，毛泽东再次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并讲话。他说：“保证重点，明年搞2700万到3000万吨钢，三十万台机床，完成这些就是胜利。……二十四号开工业书记和市委书记会议，看有没有把握。三令五申，凡有铁不拿出来者，要执行纪律。……我看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六月间，我问王鹤寿，钢是否可能翻一番？问题是我提出的，实现不了，我要作检讨。有些人不懂得，完成1100百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他要第一书记“右手抓工业，左手抓农业”。信心在哪里？靠什么呢？用他的话说，就是靠党的领导和人民的共产主义精神。他说：“人民的干劲为什么这么大火呢？原因就是向人民取得少，我们不要义务交售制，和苏联不一样。我们与人民打成一片，人民拥护我们。整风以后，人民更是和我们一条心。”

关于平等，毛泽东比较关心又比较担心的是干部子弟。认为他们有优越感，脱离群众，担心将来会变成贵族阶层。所以，对他们包括他本人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让他们多接触群众，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同时又提出，不要马上废除工资制度，将来再取消。他说：“进城以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我们历来讲，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要说服而不是压服，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

他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会议作出两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一是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二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翻一番的伟大任务》，指出这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一个举动。满山遍野的小土高炉，一到夜晚，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片一片的火光。

<sup>62</sup> 毛泽东关于向军委扩大会议印发薄一波报告的批语，手稿，1958年6月22

同时，在全国农村立即出现了一个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完全突破了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先做试点的范围，突破了他关于明年春天实现公社化的规划，他和刘少奇再三讲的暂不实行“吃饭不要钱”的意见也不算数了。其来势之迅猛，远远超过当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到九月底，9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人民公社。全国成立了二万三千多个公社，平均每社近四千八百户，还出现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取代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为中国农村唯一的生产组织，同时又具有基层政权的社会管理职能。

至此，大跃进已在全国全面发动，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合起来被称为“三面红旗”。

## 二、“左倾”错误与纠“左”的努力

### 1、官僚主义与“左”倾错误

回忆起大跃进，许多后来的人想起的，不是那个人人当家作主、奋发向上的年代，而是一个浮夸风、共产风盛行，人人说假话，连最好的科学家钱学森也写亩产万斤的文字<sup>63</sup>的年代，一个丑恶的年代。在有些人看来，“左”的错误的主要的，而且是罄竹难书，直至饿死数千万人。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主要表现为“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sup>64</sup>，而“共产风”、瞎指挥风的最为普遍，危害最大。这里，我们不纠结具体饿死了多少人这一老话题，来看看“左”倾发生的过程。

陈永贵讲起的“浮夸风”刮到大寨时的一些情况<sup>65</sup>：

“大跃进”在大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秋天，地区招集全区的先进单位开会，我代表大寨参加了这次会议。1958年，大寨的粮食亩产增加了200斤，1958年比1957年总增产150,000斤，平均每人比57年多产粮食500斤，大寨人都非常激动地送我去开会。去了才知道，会上的“浮夸风”刮的很厉害。收100斤就报1000斤，大寨人尽了最大的力每亩收成才达到540斤，可全县的亩产却超过了1000斤，于是有人就说：“你们大寨人说你们是先进，可你们亩产才540斤，这根本上不了数，你们不能当先进，你们没啥先进的东西。”

有一个“卫星”大队亩产量就报了33,000斤，亩产1000斤的县，亩产10000斤的公社比比皆是，大寨确实上不了先进的数。“谁理你那540斤？”

老地委、老县委们想尽力帮助我们，他们劝我把数字改成亩产2000斤。我想，我是个农民，会不知道行能产多少粮吗？如果把数字改了，我们就可以拿到“先进大队”的红旗，可如果把数字改了，我们村的阶级敌人——地主、富农将怎样看我们？

县委的人发火了，他们说：“如果你不改数字就不能当先进！”我说：“如果你们报了假数字，即使当了先进，你们早晚要垮。”于是县委要我去向那些“先进”单位学习学习，可我由于有情绪就什么也没问。有一个玉米“卫星”说，他们每亩种3000棵，收33,000斤，每棵产量超过11斤。我想，这种事儿，不管你怎么学，怎么研究，就是把自己杀了也收不了那么多呀。他们批评了我，看我不向人家学习，说我太骄傲。

所有的“先进”大队都得了“特等奖”，县委奖励了12辆卡车，亩产数字更高的还得到了拖拉机，这些单位还要派代表去北京参加英模大会，所有得到“特别奖”的单位都要派代表去，多光荣啊！可是我们没当上先进，觉得灰溜溜的，我多想见见毛主席，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老人家，可是他们却把我留下了。我们县西寨公社的领导因为亩产燕麦3,800斤去了北京，他们带着“燕麦大王”的称号到北京开英模大会去了。为了安慰那些被留下的“后进”单位，县委领导组织了一次“工农联欢”，他们选我当农民代表团的团长和工人们一起联欢，我不想去，我想参加那个到北京去的代表团，去见毛主席。但我们的成绩太少，资格不够，我只有返回大寨去做出更大的成绩将来才有可能见到毛主席。我非常失望。

1958年随着“浮夸风”的刮起，“命令风”和“瞎指挥风”也刮了起来，陈永贵讲述了他们的遭遇：

1958年，我们和公社的领导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公社领导要修建一个占地14亩的万头猪场，修建这个猪场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可公社根本没有一头猪，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各大队调，所以养猪的大队都向公社交了猪。大寨大队养了300头猪，他们向我们调30—40头，我们不同意，后来他们又来调粮食，因为有了猪还需要粮食喂呀。公社一级又不种粮，所以只能从各大队调。那次，我不在家，后来我及时赶了回来，回去后就去找贾承让，在门口听见他正在打电话，他说：“明天我们一定送去。”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就剩我们一家没交喂猪的粮食了。”我抢过话筒说：“我们一斤也不给！我们已经把粮食卖给了国家，公社无权再多要我们的粮食。”

“陈永贵同志不应该这样顽抗，”在一次支部会上有一名支委说，“他不应该这样与公社对着干，这样会给大队招来麻烦。”但是在这次斗争如如果我们态度不坚决，就垮了。其它大队按要求做了，他们把公社要求交的猪和粮都交了，可我们没有，我们没交一头猪一斤粮，这是符合政策的。公社是一个大集体，下属的是大队或更小的生产机构——生产队，大集体不发展生产只是从小集体要，从小集体调拨财物，我们必须反对。

因为我们拒绝交猪交粮，公社领导说：“大寨的干部们骄傲的不得了，没人能领导得了，他们谁的话也不听，尾巴翘到天上去了，没人敢摸。”

<sup>63</sup> 《南方周末》2011年3月3日刊载了叶永烈的《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叶永烈在为钱学森写作传记时，采访了诸多当事人，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钱学森早在人民日报放第一颗“高产卫星”之前，就已开始研究粮食亩产问题，发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针对农业发展远景所做的科学展望或理论推算，将钱学森的理论推算与“高产卫星”联系起来、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并非钱学森亲笔所写。在调查过程中，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钱学森保存的关于“万斤亩”的剪报以及1993年钱学森谈论“万斤亩”的一封从未公开发表的信件，这封信表明，钱学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坚持他当年对粮食亩产的推算。

<sup>64</sup> 《彻底纠正“五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sup>65</sup> 韩丁《深翻》

他们向上级做了汇报，说我们不服从领导。

这些人根本不懂得生产，却到处瞎指挥，发号施令，把事情搅得乱七八糟。他们说把切碎的玉米杆和种子搅在一起播种能夺取丰收，并在全县推广这种经验。那几天我正在阳泉开一个干部会，我们大队派同志把我叫回去，他说：“如果你不回去，我们可顶不住，上面要我们在限定时间内用这种办法播种 200 亩，如果我们不照办，人家就要敲锣打鼓来把咱的红旗拿走。县里的干部说在这项任务上我们已经落了后，所以要我们派 300 个人把红旗给别的大队送去。”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沿路的人正在播种，他们正把切碎的玉米杆和种子一起种在地里。他们说：“上头命令这么干的。我们又不象你们大寨人。我们不敢违抗命令。”回到大寨，我们的人也在这么干，我让生产立即停止。我们不得不重新返工，结果我们按老办法把地种上了。我告诉大家，有些干部在瞎指挥命令，我们一定要动脑筋，不能盲目服从。

后来才知道我一离开会场，阳泉的一位干部就打电话给我们公社的领导，要他们赶快亲自去把大寨的红旗拿掉，他们害怕我自己会把红旗拿上送到另一个大队去，所以等我到家时，大寨已经没有了红旗飘扬了。

然而，当这种错误的指示被否定后，还是那些干部又批评别的大队当时不象大寨一样顶着干。

真是官僚！

“浮夸风”并不是从下面的农民中刮起来的。1958 年 8 月，省地领导又批评我们说：“你们也不看看报纸，全国各地到处都有‘卫星’上天，可你们却无动于衷。”下面的人说：“不敢轻易相信。”可上面的人说：“我们看到了人家的丰收并参加了人家的收割，报道还能有错？”

从上面来的干部到较先进的大队去煽风，“浮夸风”因此越刮越厉害。那些“先进”大队的人盲目听从他们的指挥，对他们的指示言听计从。

拿“燕麦大王”为例，我姐姐就住在这个大队。我问她亩产是否真有 3,800 斤，她说：“没有，恐怕连 380 斤也没有。”又说成立合作社前她有一块地是靠近河滩的一块好地，亩产才只有 200 斤，如果你能产上 240 斤那就相当不错了。可上面来的人刮了一夏天的“浮夸风”，他们汇报时说多少多少地产了多少多少粮，汇报一次加一次，每次汇报都比前一次多，全是无耻的浮夸。开始他们要说亩产 5,000 斤，可公社领导说那太多，最后只说了 3,800 斤。

另一个办法是省委一些干部下来找一个“先进”单位，在报纸上登出他们产量的假数字，然后人们就会说：“他们能干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干？”于是他们就开始绑了一个“跃进马”，越绑越大，大到一辆大车都拉不下，以此来表示“一马当先”。

这股风不是从上面刮下来的，那是从哪刮来的？他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他们报的粮食根本不存在，全是空数字，国家整个的计划都给搞乱了。工厂和其它单位要依靠真正的粮食来发展生产，不是靠纸上的数字。为什么最后在 1959 年上面又进行了全面清查？因为他们下来看实际上没有什么粮食，然后他们不得不做一番调查了解，粮食都哪去了？

那些抛出浮夸数字的人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他们鼓吹水稻密植，说种植的密度要稠到一个人从地里长着的水稻上走过去掉不下来；他们还说麦田的密度要调到一颗鸡蛋放在地里长着的麦穗上掉不到地上为止。这种宣传不会来自下面，下面是老百姓，他们知道实情，他们怎么会说出这种话？只有官僚说出这样的话。下面讲求实际人决不会想出或决不敢说这样的话。在大寨发生的桩桩件件也充分说明这是上面刮下来的。我们的亩产是 540 斤，可他们要我们说成 2,000 斤，还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改动数字，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浮夸风”是从上面刮下来的吗？下面的群众反对浮夸，可上面的人太官僚，他们不关心下面的情况？只有粮食短缺了才下来了解实情，可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用呢？

“浮夸风”只有坏处，一点好处也没有。

有些人害怕丢了自己的官位，不敢维护真理，反对错误，所以“瞎指挥风”就顺顺当地刮了下来。“学习先进经验，每亩播种 500 斤”，下面的群众表示反对，不照办，于是上面就批评他们，当官的告诉他们不要太保守了，“每亩种 500 斤是件好事。如果你种了 500 斤种子，即使每斤收回 3 斤，每亩还能收 1,500 斤哩。”

这股风刮得这么厉害，我们也有一点摇摆。我们没有坚决反对，因为我们挨的批评太多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所以我们也按这种办了种了 1/5 亩。按老播种法，我们每亩用种子从来没超过 200 斤，更不用说 500 斤了。所以我们耕了地，把种子倒了进去，在我们面前的好像是露天粮库。我们还密植了 1/10 亩麦子，这种密植法每亩需种子 200 斤，可秋后我们的收成是每亩 90 斤。开始我们想这次下个大赌注，可现在事实告诉我们，这些人至少根本不懂农业。

简单地看，我们只能怀疑他们的能力，但如果从其它方面去看，人们就会问，他们那么傻？是不是有人故意这么干？

有意思的是，陈永贵和修建红旗渠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这两位后来非常受毛泽东、周恩来器重的基层干部，在当时都是抵制共产风和浮夸风的。反而是在更后面，陈永贵被撤职、杨贵被批判，大寨的集体化道路不让走了，修好的红旗渠没人修了。

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是与官僚主义紧密联系的。再看看河南信阳的例子。

总体上，信阳 1958 年生产还是增长的，是丰收年，只是因为人都去大炼钢铁，所以部分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没人收，信阳地区就损失了 10% 的粮食。真正饿死人，是在庐山会议五风再起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其中河南、安徽等地是重灾区，以信阳事件为例，可以清晰的看到官僚主义者的做法和作风，及其产生的严重后果。

在 1958 年，毛泽东多次批评吴芝圃的“左”倾错误。3 月成都会议上就说“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吴芝圃向中央提出，河南三年可以实现四化，毛主席在武昌会上批评说：“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落实”。两次郑州会议期间，针对吴芝圃坚持大队为基础，毛主席又亲自给吴芝圃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他：“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

但吴芝圃对毛主席的批评置若罔闻。根据文革期间吴芝圃的回忆<sup>66</sup>，在1958年7、8月间，“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都说刘少奇也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吴芝圃在1958年全省抓了20万“小潘复生”，使得基层干部人人自危，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说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大刮起来。于是在58年夏秋，河南省开始相继出现亩产3000斤、7000斤甚至更高的“卫星”，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先后报道。信阳地委路宪文让张树藩等人去参观，谁要是说亩产几千斤是假的就挨批斗，全区1.2万人次挨批。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这样的宣传鼓动把浮夸风越吹越大，甚至出现了鸡公山公社浮夸亩产万斤水稻。但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没有出现大问题。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百年不遇的旱灾，农业歉收，但庐山会议后反右，“左”风再起，信阳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59年比58年丰收，继续提高征购指标。张树藩反对高指标，58年全区粮食产量56亿斤，认为59年也就30~40亿斤，但路宪文等人坚持将达到72亿斤，河南省委也将张树藩定为严重右倾分子。按照72亿斤的产量，征购量定为16亿斤，于是秋收刚完就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群众逃荒可以减少死亡现象，但逃荒将揭穿59年是“大丰收”的假相，地委认为这是破坏大跃进，在各县市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起来了，于是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张树藩到西平、遂平县，不仅没有反出瞒产，反而开仓放粮，动用征购粮安排群众生活，后来遂平县基本没有饿死人。但其他地区情况不同，群众处于死亡线上，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杀牛的现象，公检法也开始以“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审判杀牛的农民。从59年秋收到60年2月，是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59年底，在大量死人情况下，路宪文才向省委要了粮食，60年2月以后饿死人问题总算制止了。

在国务院派人调查后，省委不仅未对信阳地委进行处理，吴芝圃还给路宪文打气，说不要害怕，省委是支持你的。60年7月，省委在鸡公山召开全省地委扩大会议，继续肯定“大好形势”，捂盖子。在中央给信阳事件定性以后，派来六七百人全面改组信阳地区各级领导班子。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吴芝圃对张树藩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而此前给张树藩戴上右倾帽子，恰恰是省委批准的，吴芝圃给张树藩定的罪名都是张树藩向上反映的意见。

“信阳事件”败露后，吴芝圃不但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反而继续搞“左”的做法，将责任全部推到下面，把大批基层干部打成反革命。在陪同李先念、陶铸到信阳地区的第二天，吴芝圃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革命”，并将其逮捕。杨守绩在1959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一个报告，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将杨守绩打成反革命，显然是为了继续掩盖省委错误。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委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委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20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sup>67</sup>。

从以上事实中，可以总结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官僚主义者在大跃进中的基本行为特点：一是运动开始宁“左”勿右，大放卫星，猛挂共产风；二是一旦问题出现，千方百计掩盖错误，甚至不让农民到外地逃荒，致使大批饿死；三是事件败露后转移责任，对中央假装自己不知情，对基层干部打击一大片。在1962年吴芝圃给中南局的检讨中承认：“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sup>68</sup>

如何看待官僚主义？这里先给出两个毛泽东本人的两个论述。

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信阳事件的定性是，“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毛泽东对这一事件的定性同四清、文革时都不同，这时他认为信阳事件是需要补“民主革命”的课，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1960年12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插话中，对全国县、社、队的情况和干部队伍情况作了一个分析。他认为，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在坏的中间，有若干单位领导权被人家拿去了。他把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取酬、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此时，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被毛泽东列为敌我矛盾。

12月27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又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

<sup>66</sup> 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1966.11.23）。文革网

<sup>67</sup> 张树藩.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02/69668.html>

<sup>68</sup> 何立波. 吴芝圃与大跃进运动. 党史文苑, 2006（23）



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讲到糊涂人，毛泽东说了一个故事。楚庄王当皇帝，三年不管事。有一个大臣向楚庄王说，有一种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楚庄王听了这话，觉悟了，开始振作起来。可见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这一时期对官僚主义分子，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是不是到了四清运动时期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呢？既是又不是。说是，是毛泽东认为一部分官僚主义者已经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这种变化，从大跃进后期的资本主义的回潮中有典型的反映；说不是，是因为官僚主义者并非一个科学的概念。也由此，毛泽东本人在后来只少数几次用过这个概念，而基本都采用了走资派的概念。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曰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曰当权派。当权派概念将矛头对准上层的一小部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则更聚焦到最核心的矛盾。用苏联的例子或许会方便理解，苏联当时内部存在许多官僚主义者，许多政府的类似股长、科长、小科员级别的人，都会利用职权，为自己捞取利益，但这些人并非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更非当权派，对他们搞严厉的反贪污的教育，并不能拯救苏联；恰恰是苏联党内的高层的一些当权派，反对搞群众运动，迷信私有制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同时私有化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最紧密相关的，所以这些人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国家被这些当权派瓜分。

因此，官僚主义者内部，有一部分是思想落后的，有一部分是体制本身造成的，对于这些人，重要的让他们参加劳动，推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就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官僚主义风气；但对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也许也是所谓的官僚主义者，但他们是当权派，而且坚定地要推行资本主义，那么就只能先夺权，后改造了。二者的差别，在四清运动部分会更详细的论述。

## 2、刘少奇与“左”倾错误

谁都不能否认，大跃进是栽了大跟斗的。为什么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同时，又栽了这样巨大的跟斗？“左”倾错误是如何形成的？

邓小平在过了二十多年以后，说过这样一段话：“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

其实这段话依然是委婉的话。《毛泽东传》的主要执笔人李捷说过：“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sup>69</sup>李捷所说的对“现在有些人”不利，主要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这方面的资料较多，此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材料，可以同《还清白于毛泽东》相互印证，一是 58 年前后的人民日报，刘少奇的讲话都是发在上面的；二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这本书是为刘邓辩护的，但也不得不承认是毛泽东最早冷静下来开始纠“左”的，当年刘邓等人都很“热”；三是上面提到的《毛泽东传》；四是吴冷西的《忆毛主席》。

大跃进期间，一线的“操刀手”是刘少奇，不是毛主席。1953 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1956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在接见外国友人的时候说，这次党代表大会他是跑龙套，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大跃进时期，主要的经济工作已经由刘少奇负责，宣传工作交由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负责。但国际国内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毛主席仍需出来主持，大跃进中的纠“左”就是毛主席屡次开会促成的。1962 年“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1958 年 5 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刘少奇向会议作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论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正在兴起的“大跃进运动”，并号召争取在 15 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

对 1958 年开始的浮夸风、共产风等做法，刘少奇起了很坏的作用。1958 年 6 月 14 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成员谈话时，刘借谈妇女解放问题之机，建议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他并且大胆预言：“可以搞很多的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的，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完全可以设想，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sup>70</sup>从上面的言论可以看出，刘少奇把托儿所、公共食堂当作共产主义萌芽，认为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有戏院、电影院、图书馆，小孩子多大年龄上什么学，这就是共产主义了。刘少奇是从唯生产力论的视角去理解共产主义的，这同邓小平的理解差不多，邓小平 1958 年 11 月 4

<sup>69</sup> 李捷. 毛泽东对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2)

<sup>70</sup>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 111 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 年 6 月 14 日)



日同贵州省委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吗？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农村建居民点，将来都是两万五千人的居民点。城市有的，北京、贵阳有的，居民点也要有。什么电视机啦，冰箱啦，每家都有。至于高跟鞋、口红、旗袍之类的，更不在话下了。大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们说，到了共产主义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保育员的待遇要比大学教授还高。其次要属做饭最重要紧了。将来每人每年有六十斤猪肉，每天半斤苹果，还可以喝二两白干。”正由于对共产主义的庸俗理解，所以刘少奇才会产生几十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想法。既然一段时期以后生活会有很大改善，到那时“爱吃什么就吃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那不就是共产主义了吗？1958年6月30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说：“我看三、四十年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农村现在合作社是生产分配教育单位，城市里是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现在是单打一。北大只读书，石钢只炼钢。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sup>71</sup> 1958年7月5日，在同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工人座谈时，他预言：“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人口等于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上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的很。”“搞共产主义，大家好。英美不算什么，要超过美国。我们人口等于四个美国，工农业发展起来也要等于几个美国。”“报上不讲二、三年赶英国，七、八年赶美国，是因为帝国主义一听十五年赶英国就害怕，等我们搞起来了再讲有什么不好？他们议论说我们超不过他们，等超过去了，那时他们就更吃惊了。”<sup>72</sup>

刘少奇不仅要求尽快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还对“共产主义”的内容进行设计，发明了“家庭革命”、吃饭不要钱等做法。1958年7月14日—18日，刘少奇在山东寿张县视察，有报导说：少奇同志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少奇同志说：现在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刘少奇对当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大加赞赏，说这是“压倒了科学”，“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刘少奇在江苏常熟县视察时，一个乡的党委书记告诉他稻谷亩产1万斤，刘少奇反问道，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958年7月19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农业，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1958年8月6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刘少奇于1958年9月10~11日到徐水视察，作指示说，应按照《礼记》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刘少奇和邓小平审定的《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论。社论要求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能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1958年9月19~28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个条件“男女换班，老少换班”作为实行“家庭革命”的具体举措，认为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具体做法是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群众对此很反感。刘少奇在江苏常熟视察时说：“实行粮食供给制以后，将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9月27日，他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这样的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说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1958年10月3日，他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总体上，刘少奇搞共产风的模式有几个特点：一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二是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宣布实行全民所有制；三是刮“共产风”，穷富拉平，剥夺农民；四是否认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实行直接地物质分配。这些特点都是同刘少奇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直接相关的。

当然，如果说“左”倾错误完全是刘少奇一手造成的，不是科学的说法。甚至夸大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也并不是正确的思考，二人的主要分歧，是在大跃进开始回潮的1961年左右才开始发生，此时，围绕如何看待

<sup>71</sup>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12 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80日)

<sup>72</sup> 批判资料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13 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

大跃进和总路线，二人的分歧极具增大，直至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的爆发。而在大跃进正在进行中时，在当时，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初建社会主义事业，通过大跃进鼓动群众热情如此高涨后，几乎都产生了一定的头脑发热，只是说，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是头脑发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理论上对于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分不清，对于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分不清，因此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毛泽东虽然也犯过一些错误，主要体现在高指标和几个“大办”，但是他最早发现了这些错误，并迅速地纠正这些错误。这里举刘少奇的例子，并不是要贬低刘少奇，而是想说明，大跃进是一个新生事物，任何人在认识新生事物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左”或右的偏差。在发生偏差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一方面，新生事物是不是主体取得了胜利，这恰恰是目前一些人所忽视的部分；另一方面，当发生偏差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及时地注意到了，并开始调整。

### 3、纠“左”的努力

在中国共产党内，大跃进的发动，主要的应该归功于毛泽东；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应该归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而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的纠正，则主要地应该归功于毛泽东。这些纠“左”，主要地体现在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以及如何正确看待计划经济与商业的关系、看待社会化生产与家庭的关系等等，这在当时，都是主要的错误。

#### 批评高指标

从大跃进发动之初，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一方面要破除迷信，另一方面要注重客观条件，不能任主观主义发展。1958 年 3 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提出报纸宣传报道上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于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毛泽东强调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吴冷西回忆说自己听到了这些话，但并未足够重视，很快就随大流了。在 4 月武昌召开的部分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sup>73</sup>

1958 年 8 月 17 日—30 日，在北戴河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 1070 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 400 万吨，到年底还有 4 个月，4 个月能生产 700 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

#### 反对浮夸风、共产风，区别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期间，针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做法，毛泽东讲人民公社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在目前还是以集体所有制为好”。《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明确规定，人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要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渐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灭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

从 1958 年 10 月，毛泽东派吴冷西和田家英率领调查组到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调查，派陈伯达去河南遂平县嵒嵒山卫星人民公社调查研究。陈伯达回来向毛泽东宣传取消商品交换，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之所以出现浮夸风、共产风，根源在于很多干部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是错误的。毛泽东说：“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说。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的助手也这么办。”

10 月 21 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他之前派去徐水做调查的刘子厚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例如：一亩白薯产量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让人参观，弄虚作假；在宣布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听到这些，毛泽东明确表示反对。关于浮夸风，毛泽东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

10 月 29 日吴冷西田家英到修武县，从调查中了解到，这个一县一社是由原来 245 个合作社合并而成的。全县统一收支，生产资料全归公有，由公社（县）统一调拨，生活资料的日常消费由公社供给，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干部都说，他们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男女老少都实行低水平的供给制，办了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由于大办钢铁，地里庄稼没人收，只见低年级的小学生在拾谷穗。地里的棉花大部分没有摘下来，只有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些小孩摘一点点。财贸干部对吴冷西说，本该收籽棉 900 万斤，到 10 月底只收到 159 万斤。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当然大家高兴，但好几

<sup>73</sup> 吴冷西《忆毛主席》，第五章 鼓足干劲与压缩空气

位老人都在发愁，说：“这样吃法长不了。”11月1日，在新乡调查了兴宁人民公社，发现实行军事化，全公社编成了15个营，50个连。尤其特别的是，实行房屋公有，搞集体住宿，社员男女老幼分开，按连、排编制集中居住。我们具体的调查了东郭大队，这个大队共有224户，开始时有150户男女老幼分开住，现在仍有60户集中在8个地方，男女各住4处，实行礼拜六制度，回家度周末。据大队干部说，这是公社统一布置的，大多数人意见很大，只有少数夫妻不和或婆媳不和的愿意分居。

### 第一次郑州会议

经过调查研究，毛主席开始明确纠“左”，先后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1958年11月2日，毛主席召集了第一次郑州会议。在会上指出：必须分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不能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在社会主义时期，商品生产还要大大发展；废除商品，对农产品实行调拨，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11月6日，吴冷西、田家英到郑州向毛汇报，毛主席评论：一是一县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会损害富社的积极性，还是要搞“按劳分配”；二是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三是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谓全民所有制，只能叫集体所有制，不能把两者混同一起；四是“把夫妻分开搞集体住宿，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了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人大、中、小结合的好”；五是指标过高，“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怎么得了？”

### 武昌会议

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对刘少奇鼓吹“穷过渡”进行了批评。毛主席说：中国是个大国，是个大穷国。今年大跃进，即使根据现在报的数字，全国农民年平均收入也只有70元上下。全国工人每月平均工资也只有60元左右，现在有些县委（按：指刘少奇做过指示的山东寿张县）不知天高地厚，说什么苦战三年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不是发昏说胡话？说是“穷过渡”，马、恩、列、斯哪里说过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很穷的呢？要“穷过渡”，这样的共产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和吸引力呢？毛泽东又说：现在人民公社搞的供给制，不是按需分配，而是平均主义，中国农民很早就有平均主义思想，东汉末年张鲁搞的“太平道”也叫“五斗米道”，农民交五斗米入道，就可以天天吃饱饭。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同志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这非常危险。北戴河会议规定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条件，哪一条也不能少，缺一条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谈到这里，毛泽东很动感情地说：反正我不准备急急忙忙的过渡。我今年65岁，即使将来快要死的时候，也不急急忙忙过渡。毛泽东强调，过渡要有物质条件，精神条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具备条件宣布过渡也没有用。要划清两条线：一条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一条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不要轻易宣布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更不要轻易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批评刘少奇“吃穷饭”，指出：“现在就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要犯冒进主义错误。”刘少奇立即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彭真也插话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批判了高指标，说：我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500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亿土石方，多了三倍。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死5000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明年3000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胡琴的弦不能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危险。11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第二次讲话：我们的脑筋正在这里压缩空气。恐怕明年2700到3000万吨难于办到，我们是不是可以的，你打我通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说我才能服。你们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不仅要搞机会主义，我已经是机会主义，我就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为此而奋斗，不牵累别人，将来算起账来的时候，不打你们，打我。因为我在这里反冒进，以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泽东还讲到尊重科学与破除迷信的关系：破除迷信，现在有些人把科学破除了。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学一定要保护。毛泽东说：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力越好。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又在武昌主持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主要强调了三点：一、企图在条件不成熟时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二、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

过渡必须以生产力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基础；三、坚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保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社员的个人财产永远归个人所有。

### 第二次郑州会议：基本核算单位退回高级社

1959年2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1959年2月27日，毛主席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并同步召开了河南省6级干部会议。与前二次会议主要是纠正共产风的错误不同，毛主席敏锐地从农村的混乱现象和紧张的关系中，发现了人民公社的症结问题是公社在所有制方面走得过远了。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这次会议中强调了所有制方面的整顿，提出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叁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将基本核算单位退回到生产队（此时生产队代指生产大队，到1962年之后生产队概念明确为生产小队），即原来高级合作社的水平上。简言之，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听到这些论述，给当时整体头脑发热的共产党猛的一击。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记载，很能反映一些与会者的心态和思想变化过程，摘录如下：“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去谈，从下午四时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的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就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二号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的对面。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看来主席抓得很紧。”后来薄一波回忆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毛主席讲，从1958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无偿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1000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为了引起大家重视，在3月5日的发言中，毛泽东严厉的批评说：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把“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冒险主义。他批评说：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期间，毛泽东连写三封《党内通信》给各省市区委第一书记，商讨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可见心情之急切。郑州会议后，各省市也迅速召开5、6级干部会议，目的是将毛主席纠左的指示一竿子插到底，直接传达到生产队长。

1959年3月25日—4月1日，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注中改变了第二次郑州会议关于救赈“一般不算”的规定。指出：不对，应改为救赈一般要算。算赈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1959年4月2日—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会议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 党内通信

随后，中央发现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的缺粮情况。毛泽东在4月29日，他又提笔写了一封《党内通信》。这封信很特别，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一直通到最基层。他在信里提出了六个问题：第一，包产问题；第二，密植问题；第三，节约粮食问题；第四，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第五，机械化问题；第六，讲真话问题。

这六个问题，看起来不是什么大的理论问题，却是当时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关键问题、要害问题，是针对“大跃进”以来在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提出来的，贯穿着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包产问题，他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关于密植问题，他说：“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密植问题，是当时干部、群众中争论很大的一件事。越密越好的观点，那个时候相当流行，还很顽固，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一条，对农业生产影响极大。

对粮食问题，他说：“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关于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是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口号，实践证明这是不现实的。在这封信中，他改而提出“播种面积要多”，确定“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党内通信》中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讲真话问题。这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尽管在某些地方，受到过某些领导人或领导机关一时的封锁，但终究是封锁不住的。这封信来的时机也很好，南方正在插秧（不少地方还在那里就密植问题争吵不休），北方也正在春播。毛泽东见事早，抓得也早。这封信把许多人从盲目性中解放出来，对当时的农业生产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两个重要文件，一是《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一是《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两个文件出台了两项重要政策：明确家畜家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规定“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

### 降低钢产指标

在农业出现春荒的同时，工业方面的问题也突出起来。

从四月份的生产情况看，上海会议拟定的第二季度分配钢材二百五十万吨的方案，肯定要落空。毛泽东便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陈云认为 900 万吨，冶金部担心会泄气。主要领导陆续发表意见。

6 月 13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对基本建设项目也作了较大幅度的压缩。毛泽东就高指标等问题讲了话。他说：“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一些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比如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了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同志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于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于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转得比较主动些。但是要转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转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农业方面）他说：“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亿斤，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过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

到 1959 年 6 月，共产风、浮夸风等做法已经得到有效的遏制。

应该看到，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过程中，是完全地破除，还是限制，还是任由发展，这是三种不同的方针。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探索的过程中，以陈伯达、刘少奇为代表，是要完全地破除，即消灭商品生产、消灭货币，混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混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这是“左”的倾向；另一些人，则是任由资产阶级法权的自由发展，直到少部分人迅速通过市场、货币积累原始资本并最终使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这是右的倾向；而毛泽东努力避免了“左”的和右的倾向，初步探索出了不消灭资产阶级法权也不任由其发展，而是一定程度上限制其发展。在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总结出这样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总结，已经到了 1975 年。

## 三、庐山会议

### 1、庐山会议的过程

#### 庐山会议的前期

1959 年 4 月，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卸去国家主席的职务。6 月，毛泽东回韶山探亲。7 月 1 日，毛泽东到了庐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纠“左”数月，共产党、浮夸风已得到有效遏制。相应地，国内外对三面红旗、对总路线的批评却越来越多了。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共产党“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似乎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与此同时，赫鲁晓夫 1959 年 7 月 18 日在波兰波兹南省“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讲话讲到公社问题时说，对中国的人民公社很不屑：“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的觉悟。...许多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他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以此污蔑中国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7 月 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

会议的主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



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朱德在华中、中南小组会上的发言，1959年7月6日。），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7月10日毛泽东着重讲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地提出的不同意见已表现出不满，并且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先要思想统一。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得的是什么？失的是什么？比如说，为什么大跃进之后又发生市场大紧张。不要戴帽子，不要骂一顿了事。”

他对人民公社的评价是这样说的：“现在证明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问题的实质，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看法。毛泽东警告说：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

### 彭德怀的信

7月16日，毛泽东突然提出延长会期，重新编组，从北京调一些重要人员来参加会议，这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举动，但当时与会者们并不知底里。除了几位中央常委，连各组组长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事实上，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而促使毛泽东下决心采取这些步骤的，是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长信。

一九五八年八月以后，彭德怀曾到东北、西北和湖南湘潭等地视察，了解到不少真实情况。这次开会，他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直言不讳地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彭德怀想：“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7月14日，彭德怀交上信。7月16日毛批示转发，未表达意见。

信中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但是，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教训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但主要地是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实际上，从党内正常的程序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并不违反组织程序；而彭德怀的信中间反映出来的问题，也基本是确有其事。但是，第一，当时毛泽东已经带领中国共产党纠“左”数月之久，彭德怀所提的问题多是毛泽东自己在纠“左”过程中就已经注意到了的，而彭德怀在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纠“左”时没有参与，却在纠“左”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时，提出这一问题；第二，在纠“左”的过程中，国内外对大跃进、对总路线的质疑风生水起，党内的每个干部都经受了极大的考验，一方面要继续纠“左”，另一方面需要反右来保障社会主义路线，这时候，彭德怀的这封一边倒地批评的信就更加不合时宜了；第三，彭德怀在之前的发言中已经说了许多不应该的话，联系到当时的背景以及彭德怀刚刚在1957年11月访问了苏联，更加使人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正如王光美所说的：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sup>74</sup>由此，会议再次召开了大讨论。

还是围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会议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议定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对此，《纪录》主要起草人之一胡乔木说，《纪录》对成绩说得不够，主要是受字数的限制，绝不是因为起草的同志在看法上有什么分歧。然后，他把话题一转：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会议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希望研究经验的空气能有所增加。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7月20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他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

<sup>74</sup> 黄铮。王光美访谈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7月21日张闻天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的会上，毛泽东发言，主要从正反两个方面讲：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用了一个多月工夫，三、四两月间把风压下去了，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这一个多月的教育、算账有好处，在极短的时间里，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收款’是不行的。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这次他们不讲冒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毛泽东这篇讲话，引起很大震动。黄克诚后来回忆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我对主席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彭德怀负担更重，我们两人都吃不下晚饭；虽然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毛泽东这次讲话，是一个转折，庐山会议的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随后，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在8月1日的八届八中全会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sup>75</sup>并在会上批评了彭德怀的错误。

8月2日，在庐山继续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要反右的问题；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小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小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小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周惠、李锐交待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

通过这次会议，毛泽东认为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随后，张闻天、黄克诚和彭德怀分别给毛泽东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毛泽东都回信，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和热切的期盼。

## 2、庐山会议后的形势

庐山会议后，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导致“左”倾错误严重恶化。其中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〇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1960年1月，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庐山会议以后很灵，生产月月高涨，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基本上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把人民进步起来，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会议认为，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八年的总目标是，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要基本上完成集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也在纠正“左”的错误，但是由于同时在进行反右，所以实际上效果不好。

1960年3月的天津会议上，一方面，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刮“共产风”，提出不要破坏社会原有的经济秩序；发展小洋群炼钢铁，必须在有煤、铁资源的地方；不要把“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绝对化等等。另一方面，又有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中后退的地方，比如，要求城乡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此外，还提出一

<sup>75</sup>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

些新的东西，像在工业中试办托拉斯，资源综合利用问题，农业综合发展问题等。

1960年6月，上海告急，纱厂停工，因为已经没有棉花可以供应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所没有过的，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年初没有料到的。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在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粗略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到了1960年10月，“共产风”和其他几股歪风，对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对农村经济以及人民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和严重后果，大量地暴露出来。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〇年的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7年减少26%以上。问题已经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在10月召开的四大区党委负责人会议上，讨论了问题严重而暴露比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信阳事件，大家十分震惊。会议对他进行批评，指出他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反“共产风”问题，这是第二次郑州会议以后的第一次。历史似乎在重演。但一九六〇年刮起的“共产风”，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超过了一九五八年。

随后，中央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11月3日，中央的紧急指示信下发全国。《十二条》开篇即提出：从1958年大跃进以来，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个战线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越来越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人民公社在同连续两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做斗争中，越来越表现出无比的优越性。当前的整个形势是大好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农业遭灾歉收所带来的困难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在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是违背人民公社现阶段政策的，是破坏生产力的，并且妨碍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更好发挥，中央和毛主席从一九五八年冬季以来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一部分地方和社队确实纠正了，基本上没有再犯；大部分地方和社队纠正的不彻底，有遗留问题，或者在去年冬季以后又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方和社队，“共产风”一直没有认真地纠正，继续刮，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

《十二条》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问题的一段时间的经验总结，其中十二条分别指出：（一）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二）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三）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四）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五）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六）少扣多分，尽力做到百分之九十的社员增加收入；（七）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八）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九）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十）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十一）认真实行劳逸结合；（十二）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十二条》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一方面坚持了集体经济，另一方面反对了“左”倾错误，在对农村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随后，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1961年1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阶段。

### 3、庐山会议的评价

庐山会议集合了各种因素，信由彭德怀提出，而彭德怀长期与高岗等人有联系；信在党内已经正确纠“左”数月后提出，而当时国内外质疑大跃进的声音不断，这势必在党内也会引起类似的争论。

参考1962年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讲话：“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庐山会议直接导致了共产党由纠“左”转向反右。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推动的，当时党内的许多干部，都是支持、甚至比毛泽东本人更加热衷于批判彭德怀的。其中就包括刘少奇等人。从纠“左”还是反右的角度，庐山会议是一次失败的会议，这次会议的转向，导致了前期的纠“左”成果无法得到巩固，而反“右”则大大损坏了毛泽东努力倡导的基层干部群众讲真话的风气，从而重新引起五风。

1961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问题作了反思，他说：“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240亿斤，他们说有400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的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3

月到6月只反了4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看来十二条下去以后，现在我们比较摸底了，粮食产量也落实了。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各省都注意安排生活了，那时就提出低指标、瓜菜代的方针。可是有些省就抓迟了，如安徽就抓迟了，山东就抓迟了，河南就抓迟了，甘肃就更抓得迟了，结果问题就多。这些省都抓得太晚了，对自己本省的问题估计不足。”<sup>76</sup>

实际上，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的作风的影响，党内不少人对彭德怀是有相当大的意见的。相反，毛泽东本人是持积极的欢迎态度的，可以说，是党内对彭德怀比较关心的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表示“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1965年9月11日，中央决定彭德怀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9月23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sup>77</sup>

关于庐山会议，还有这样的说法。1965年9月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时，说到“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sup>78</sup>也有人说，1966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1959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sup>79</sup>这些说法，引用的材料目前尚未证实，可作一家之言。

#### 四、调整阶段

从1961年1月开始实行八字方针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到1962年8月毛泽东北戴河会议期间重提阶级斗争，这段时间是大跃进运动进入调整的阶段。其中，由于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于形势的判断、对于大跃进运动的得失开始发生分歧，此后1962年的调整工作不仅没有进展，反而引起了严重的右倾单干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愈发扩大，并成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开端。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右倾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章节详细介绍，这里侧重论述调整部分的内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一个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是这么介绍调整时期的经验的：1960年中央发布农村整社工作十二条起，一九六一年提出了农村工作六十条以后，接着，又发出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和调整农村负担的指示，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sup>80</sup>1962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期间这么评述调整阶段：两年调整，彻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做得不那么好。以农业为基础，讲了三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实际上没有实行。中央的东西，有些没有下去，有些成了废品。所谓没有实行，就是没有认真做，个别做了，或者做得很不好。<sup>81</sup>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一方面调整阶段的几个关于农村的文件是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的，取得了成绩；另一方面，调整阶段实际上又没有完全起到调整的效果，比真正希望达到的目标尚有距离。

##### 中央工作会议

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议程有三项：（一）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二）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关于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关于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开始插话说：就全国来说，按县、社、队为单位，大体是三、五、二的比例，即百分之三十是好的，百分之五十是中间的，百分之二十是坏的。干部分成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第四类，情况不明，头脑不清；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共产风”很少或者没有。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前三类在湖北占百分之三，问题严重的地区甚至占百分之几十。对于坏人，要夺权。有些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但大多数人是好的。但在第二次汇报时，毛泽东说：官僚主义者是人民内部矛盾，大办太多不好容易搞共产风。毛泽东肯定县、社、队的干部百分之九十基本上是好的，百分之十是坏的，包括打进来的、变质的和死官僚。关于死官僚主义分子，上次听汇报时，毛泽东把他们列入敌人；这次改了，说他们同一、二类有所区别，是人民内部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即认为是文革前奏的《二十三条》），毛泽东也提到：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因此，官僚主义者的多数也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只是因为认识的问题或者工作方法的问题，犯了错误，这些人属于

<sup>76</sup> 《毛泽东传》（1949—1976）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章节

<sup>77</sup> 张树德. 毛泽东与彭德怀. 中国青年出版社

<sup>78</sup> 张树德. 毛泽东与彭德怀. 中国青年出版社

<sup>79</sup> 老田. 1959年庐山会议与彭德怀这个人

<sup>80</sup>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 即《前十条》

<sup>81</sup> 毛泽东.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

人民内部矛盾，与走资派的性质不同，走资派往往是认识清楚、用人得当、工作检查有力的，只是每一步的方向，都走向资本主义。

关于退赔问题，毛泽东再次强调：一定要坚决退赔。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副食品基地，我们都同意过。几个大办一推行就成了一平二调。县、社干部不满意不要紧，我们得到了农民群众的满意。不痛一下就得不到教训。痛一下，才能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等价交换这个原则。退赔兑现了，干部作风才能转变。

关于自留地，毛泽东希望多留一点；养猪问题，毛泽东重申要实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方针。会议上，毛泽东也做了自我批评：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要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毛泽东这篇讲话，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随后的调整的一年，实际上也是调查研究的一年。

随后中央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八字方针：一九六一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轻工业部门，应当努力增加生产，尽可能地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重工业方面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速度，采取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 调查研究

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毛泽东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后来听取田家英汇报浙江嘉兴的一个较差的生产队情况时，田家英反映五风破坏严重、生产队规模太大、食堂人们不喜欢。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这里所说的核算单位，应当是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这个问题的真正解决，是在过了一年以后的一九六二年二月。

对于三类队的情况，毛泽东再次指出：三类队不完全是敌人，有的是坏人当道；有的是‘五风’严重，加上‘三风’、贪污多占等等；有的是能力太弱，糊里糊涂。要按情况办事。

随后的几次讲话中，毛泽东几次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但不直说是他的意见，而是说有人提出的疑问。毛泽东似乎在有意地启发对方，然而，在浙江也好，在湖南也好，都没有人作出反应。在讲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意见：第一，公社的规模，特别是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要划小，分别恢复到原来的乡和原来的高级社的范围。第二，生产小队的权力要扩大，把它作为一级重要的核算单位，甚至是基本核算单位。第三，生产小队与生产小队之间存在平均主义。这是毛泽东首次提出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3月5日，毛泽东在广东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总结了庐山会议时间以来的历史：“在庐山会议之前，我们对情况的了解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在庐山会议之后就不大清楚了。因为庐山会议之后一反右，有人讲真实话，讲困难，讲存在的问题，讲客观实际情况等等，都被认为是右的东西。结果造成一种空气，不敢讲真实情况了。相反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不讲实际了，例如河南本来粮食产量只有二百四十亿斤，他们说有五百多亿斤，这都是反右反出来的。右是要反的，也不得不反，不反，对我们工作就不利。庐山会议是要反右的，但是接着就在群众中反右，这就坏了。郑州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左’。凡是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比较彻底的省，工作就比较实一些。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的‘左’，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谁知道彭德怀在中间插了一手，我们就反右。右是应该反的，反右是正确的。但是带来一个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这个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这件事也教育了我们，反‘左’中间插了一个反右，在群众中间一反，结果就反出一个浮夸风。庐山会议反右这股风把我们原来的反‘左’割断了。”

毛泽东总是这样，当他抓住一个在他看来带有战略意义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时，他就必定是全神贯注，锲而不舍，非抓出成果不可，别的在他看来次要的工作可以暂时搁在一边。他认为，这时的农业问题、公社问题就是这样性质的问题。

### 广州会议

随后，从3月11日开始，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分别开会，讨论人民公社体制问题。前者通称三北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后者通称三南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主持。后来又合并为**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解决两个平均主义（生产队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并讨论通过了《六十条》草案。

会上毛泽东印发了几个材料，有一个是三北会议印发过的河北省委关于调整社、队规模的意见。河北主张生产队改为大队，生产小队改为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印发时，在标题下面注明“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醒目。还有一个是陕西省委关于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泽东印发这些材料，想引起与会者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

1960年3月22日，会议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共六十个条文，故称“六十条”。六十



条巩固了前一阶段调查研究的成果。从“六十条”起，当时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一级一律叫生产大队；过去的生产小队，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与六十条同时发出的还有面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同志的信》，信中指出，在农村人民公社方面，有以下五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一，在分配上，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都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现象。第二，公社的规模在许多地方偏大。第三，公社对生产大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生产大队对生产队，也一般地管得太多太死。第四，公社各级的民主制度不够健全。第五，党委包办公社各级行政的现象相当严重。这些问题，是调查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六十条”就是要着重解决这些问题。

广州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用毛泽东的话来评价，这是公社化以来中央同志第一次坐下来一起讨论和彻底解决农业问题。广州会议的主要成果就是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广州会议和“六十条”草案，从纠“左”的程度来看，超过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历次会议和文件。“六十条”的制定，在重新纠“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但并不是人民公社所有问题都已得到解决，供给制、食堂这两个直接影响群众积极性、关系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但是，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作了一定的准备。

### 继续调查研究

毛泽东显然没有满足于广州会议。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毛泽东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六十条时，毛泽东提到：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

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这个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领域。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在调查中，根据胡乔木湖南调查组的最新的情况，毛泽东基本明确了对食堂问题的看法，即食堂可办可不办，由群众决定。

此时，刘少奇也在做调查。他深入到湖南农村，先后在宁乡、长沙的几个生产大队，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刘少奇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可以说从1961年这次湖南蹲点开始，桃园经验（在四清运动章节详细介绍）的模式就已经具备。4月12日刘少奇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18天，天华大队本是合作化运动的典型，但刘少奇蹲点后，完全推翻了这一结论。也是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逐渐显现，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调整已经逐渐起到效果，大跃进的成果得到巩固，而刘少奇则认为大跃进的问题远未解决，从而越来越纵容单干风的出现、纵容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污蔑。二人的分歧，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正式显露。

### 北京中央工作会议

5月21日至6月2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

会上，毛泽东对郑州会议以来的历史再次做了回顾和总结，这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讲得更加系统而深入。第一，庐山会议后应当继续反“左”，反右错了。（但庐山会议关于彭、黄、张、周的错误决议是正确的。）第二，反右把许多好人、说老实话的人，整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犯了错误。对一切受了冤枉的，都要平反。第三，郑州会议精神、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基本上是正确的，关于食堂和供给制的问题是不正确的。第四，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再度泛滥。第五，强调普遍反对“五风”特别是“共产风”。整风整社，开始主要整三类县、社、队，强调夺权斗争。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农村中主要的普遍的问题是“五风”问题。第六，总的说来，现在大家解放思想了，对社会主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经过这些调整，农村的问题，除了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 基本核算单位下到队

随后，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央在庐山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工业问题，但毛泽东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在会见蒙哥马利后，毛泽东北上路经河北邯郸时，听取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的汇报。汇报更坚定了他对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认识。

9月29日，毛泽东回北京后，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说：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10月6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10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在十月下半月和十一月上半月内，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经过调查，受中央委托，田家英12月12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

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于1962年2月13日发出。以后，以生产队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泽东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农村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着。

## 五、大跃进的评价

今天，我们依然面临着庐山会议同样的议题，如何看待大跃进，如何看待总路线？是一片黑暗，还是成绩伟大？

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生产运动。大跃进中，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让广大工人、农民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生产实践中来，广大群众的热情得到完全的激发，他们战天斗地、不怕困难，创造了惊人的成就。

大跃进是一场伟大的中国人民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大跃进之前，“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社会风气日盛，大跃进恢复了共产主义的作风。人们以主人翁的意识参与到集体建设，供应制一定程度得到恢复，领导干部的脱离群众的习气得到有效遏制。在工厂，取消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中，彻底否定了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掀起了取消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的浪潮。据统计，195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企业取消计件工资制的有230万人；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工人占生产工人的比重由40%下降到14.1%；到1960年这一比重降至不到5%。同时，生产奖励制度被认为是“钞票挂帅”、“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产物，许多奖励制度在“要社会主义，不要钞票挂帅”的口号下被取消了，有些奖励制度虽未被宣布取消，如劳动竞赛奖、创造发明奖和合理化建议奖，实际上也停止执行或只给荣誉奖了。在农村，人民公社试行了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增大分配中的供给制部分，缩小甚至取消工资制，后来在纠“左”过程中，供给制部分缩小。

大跃进发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在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基础上发生的问题，是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忘记了大跃进的成绩，也就无法正视大跃进的问题。大跃进的问题，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坚持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没有很好地贯彻总路线的方针。随后的几年里，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发生，由于对大跃进看法的分歧，党内的逐渐发展成为两条明显不同的路线。一条道路，是要巩固总路线，在农村继续走集体化的农村道路，在工厂继续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生产，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力和主人翁意识，同时，注意发生极“左”的倾向，注意区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另一条道路，则是放弃总路线，在农村搞三自一包分田单干，在工厂贯彻一长制，否认工人的群众运动能够促进生产。正是这样两条路线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后面20年的走向。

正如后来有人总结的这段历史：阶级斗争一个方面之一看生产有成绩还是失败。如果生产质量下降了，那么骂娘的就多了，他不仅骂你一个工厂，他要说：“……搞糟了，糟得很。”58年、59年上海轰轰烈烈大跃进，那是一场大革命，是一场思想革命，先有思想革命，然后带来文化革命，这样好的形势到60年后就下去了，就是因为自然灾害、苏修破坏，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应该记得，60年到64年，资产阶级攻击，三面红旗多厉害，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包括那么许多无耻的反动言论，什么“蒋介石不好，但是就是有大米饭，”……人家就是抓了我们经济上困难，来攻击我们的革命，要资产阶级复辟，包产到户，解散人民公社，工厂里原来大跃进里破坏的制度，有很多都恢复了，不该恢复的，也恢复了。<sup>82</sup>

## 六、中国人民的伟大跃进

今天的许多人们回忆起大跃进，似乎就是亩产万斤，小孩子坐在沉甸甸的稻子上的时代，就是一个人人炼钢，生产极度混乱的时代，就是一个人人盲目崇拜领袖，人人浮夸，人人疯狂的时代。够了！这远不是大跃进！大跃进，是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满怀豪情壮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如《毛泽东传》所说：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科学技术也有了可喜的发展，尤其是在某些尖端科技领域填补了一些空白。

下面这段文字或许更为准确：

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没有剥削压迫；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劫匪盗贼；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吸毒贩毒；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懒汉二流子；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那是一个火红的时代：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主动性，聪明和才智最充分地调动起来了，人们作到了应该做到的一切；贡献了可以贡献的一切；完成了能够完成的一切；是一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火红的世界。那是一个人们的思想真正获得解放的时代：一切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美国月亮比中国圆的洋奴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一切传统的陈规陋习，洋人的匡匡教条统统被打破；根据中国的实际开创自己的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古为

<sup>82</sup> 1966.11.16 苏州铁路中学录音笔录

今用，洋为中用；人人学点辩证法，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特征。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都有一个观念，凡与上述相悖的思想，被人们称为右倾保守或“左”倾冒进。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是抹不掉的！<sup>83</sup>

## 1、农民在跃进

如果不是毛泽东热情的赞扬，农民的跃进恐怕并不容易发动。我们看看农村当时的反对声吧。在贵州省沿河县甘溪区，有一个乡长叫蒋玉昌，提了一个建议书，建议书的题目是“对改建农业生产管理和商业活动的建议”。“改建”农业生产的基本点，就是将一切生产资料，包括土地、森林、水利、基建和大型农具，“分别租管到生产户”，由各生产户按年或按作物期，向国家或集体交纳一定数额的产品。“实行各生产户经营自治，盈亏自负”，除此以外，建议书还包括解散集体食堂，提倡雇工自由，改变现行的分配制度等。他还说，这不是主张倒退，不是主张恢复单干。其基本点是主张“开放自由市场”，恢复私营商业。“取消一切限制、封锁，发展零购、零销商”，“既促使生产者、运输者的积极性”，又“减轻国营商业部门在购销环节上的负担”，恢复私商是“发扬历史传统习惯，购销兼营、农商兼营、工商兼营”。<sup>84</sup>可见，许多人是反对农村的集体化的，而没有集体化带来的集体主义，就更不会有“大跃进”的发动了。但是，一旦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开始了跃进，其中迸发的热情，一切反对这股潮流的势力就像螳臂当车一般渺小了。

看看韩丁的史诗般的纪实著作《深翻》中，是怎么描述山西的张庄农民对“大跃进”的感受吧。这位从来用平静客观来记录现实的美国人，也不得不为“大跃进”所感染。韩丁说：毫无疑问，这是1947年土改到1966年“文革”期间他们生活的至高点。为了让读者有个更生动的感触，这里，我们就不吝大段地引用吧。

### 张庄伟大的大跃进

“那真是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农民技术员赵东旺说，“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特别高兴。那时我才21岁，多么伟大难忘的日子，那么多的人来到一起，他们的纪律性是那么强，每个人都能按时出工。大家怀着同一个愿望来到了一起，没有村与村的界限，不分你我。以前我们从没见过炼铁，可这次是我们自己亲自炼铁。”

“在等待铁水流出的时刻，大家都异常兴奋。我的任务就是看柴油机，它正常工作时，我就可以离开到别处去看别的炉子。这样，我在几个炉子间来回转游，把所看到的東西都装在了脑子里。有一天，我在沙滩上浇铸了几个大字“全民大炼钢铁”，然后把铁水灌满这几个字的每个笔划，铸成了六个大字，我们把它挂了起来。”

“当我们要第一次步行到西营的大坝上去劳动时，许多人都不想去，我们想象着这是一个又远又累又要挨饿的地方，所以和亲人、朋友告别时，大家都哭了。”堂支书张贵才说，从一踏进西营村开始，那里的人就对我们很好，他们让我们住进他们最好的窑洞，每天小米饭管饱，每三天吃一顿羊肉。伙食那么好，和那儿的人相处得那么好，等该走的时候，谁也不想回家了。”

“在西四河大坝上劳动的有10万人，到处是飘扬的红旗，晚上工地上的电灯泡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把整个工地照得犹如白昼。所有的干部都下来和人们一道劳动，每个人的决心都很大，干劲都很高。”供销社主任师才元说，“10万人分三班轮流上工，到处都是人。如果你站在山头往下看，简直是一片人的海洋。”

“在铁路建设工程中每个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争当英雄，谁也不甘落后。人们士气高昂，所以很好领导。每次我叫开会，大家都来参加，那时候当干部也容易。”五队菜园领导五文则说，“我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有一个从天市来的妇女叫苗文英，她能推着装1000斤石头的平车上下坡。男人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干活，因为她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劳动上。有时，我们展开速度竞赛，一个公社对一个公社，看谁往路堤上运的土多。苗文英用扁担挑两个大筐，没有哪个男人能比得过她，就连总在男人当中当冠军的老汉赵大元也比不过她，她与10个男人比赛，一次一个，都把他们给赢了。最后，我自报奋勇与她比试比试，大伙都说我不行，可我坚持要试一试，结果也败在了她的手下。”

### 张庄大跃进的发动

张庄发动大跃进也并不容易。

张庄宣传队的王京和是作为市里的干部被派到集中点——黄碾工作。干部们用了5天的时间鼓励人们发表意见，委员会从那些提意见的人当中选出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意见引出了新旧社会的对比。一个是过去的伪区长，他公开攻击新社会，说：“猪落在杀猪人手里就没法活了。”第二个是一上中农的儿子，他声称自从入了合作社他就没吃过一顿饱饭；第三个以前是共产党员，讨过饭，解放后，他的两个哥哥都在壮年时去世了，他对这事感到很伤心，并怨恨合作社的纪律太严，他抱着怀旧的心情向所有的人回忆他“自由自在”的乞丐生活。

委员会让这三个人在群众大会上讲，人群聚集在街上，一面听他们讲一面驳斥他们。

那个中农的儿子没有赢得一个听众的同情。那年黄碾的人均口粮是450斤，可他说不够吃，

“解放前，我可以随便买，可现在才分了这么点儿。”

“什么？你的意思是说不够吃？”有一个人问。

“500斤够不够？”另一个问。

“不够！”被批判的年轻人说。

“800斤呢？”

“800斤？800斤还凑和。”

这马上引起了公愤，每人分450斤粮食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已经有剩余了。确实，一个人也许需要500斤，但还有

<sup>83</sup> 张宏志。还清白于毛泽东。

<sup>84</sup> 《人民日报》1959-12-31

自留地的其它食品和收入。要求 800 斤粮食就更没有道理了。在众人的驳斥面前，这位年轻人再也坚持不了了，2 小时后，他“投降了”，承认他错了。

那个曾做过乞丐也当过党员的不太容易对付，大家和他辩论了五天。事实证明这种辩论很重要，因为他说出了一少部分老实人的心里话，这些人对新的合作化确实有看法，对为了使人们在一起能更好地劳动而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有看法。

这个人首先讲了他的家史，他和他的两个哥哥是如何一起长大的。他说，他们有时做工，有时讨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兄弟三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哥哥参加了八路军，牺牲在战场上；另一个当了国家干部，工作很辛苦，后来得了病，死在了家里，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过去的社会好。

“当兵要了我大哥的命，过度劳累要了我二哥的命，只留下了我自己。要在旧社会，我大哥不会去当兵，二哥也不会累死。另外，我觉得当一个雇农比有了自己的地好。我为别人割麦子时，一天能吃五顿饭，可现在我只能吃三顿。五顿饭吃的是什么？早晨起来吃玉面圪塔，半上午主人把馍馍送到地里，中午吃面条，下午又是馍馍，晚上是米汤配菜。就是讨吃也不赖，饿了就去要点吃，不饿就躺在树底下睡觉，活得挺自在。我躺在那儿看蚂蚁上下树，那时候想吃的东西都能搞得到，只要你有钱，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可现在，咱们有什么？他给什么就只能吃什么。”

人们再也听不下去了，他刚一说完就问他“在旧社会，你真的想吃什么就有什么？那会儿有鱼翅、燕窝、海参、鱿鱼，你吃过吗？”

“我没有钱，如果有钱就能吃上。”

“那你为什么没有钱？”

他不吱声了。

“说，说呀！”人们冲他喊。

“因为我没有挣上钱。”

“可你不是说一天吃五顿饭吗？”

“是呀，可那是在收割季节，割麦子的时候。”

“那，地主为什么不平时也给你五顿饭吃？”

“收割的活已经干完了，为什么还要给五顿饭？”

人们很容易就驳倒了这个人所说的旧社会吃得好的论调，但对他想睡觉时就能躺在树下睡这个事实人们却不得不承认。他的主要论调是宁在旧社会当雇农不在现在的合作社里当主人。

“我想干活就干，不想干活就坐着什么也不干。”

“既然旧社会什么都好，你怎么还去讨饭？”

“农忙时干活，农闲时没人雇我了，就只好去讨饭。”

“有活干时，你干多长时间？”

“每天都干，从早到晚。”

“你怎么不坐着？”

“不能坐呀。不干活就没有钱，没有钱就吃不上。”

“那你现在一年劳动多少天？”

“200 天。”

“也就是说你能休息 100 多天了？”

“我想是。”

在人们的追问下他退却了许多。又有人开始追问，

“在旧社会让你提意见吗？”

“我怎么能提意见，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旧社会你得过病吗？”

“得过。”

“你得了病有医生给你看病吗？”

“没有，我去哪儿找医生呀？”

“他们怎么把你抓去当兵的？那会儿你能拒绝吗？”

“不能。在那会儿也没有多少人当兵。”

“可当兵的都是穷人，对不对？他们都象我们一样穷。”

“是的，他们只抓穷人。”

一次又一次的提问把他逼到了墙根儿。

“现在你一年只劳动 200 天，每天有吃的，可以说你想说的话，生了病可以去看医生，部队又不抓人，你觉得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比起旧社会如何？”

“说，大声点儿，让大伙都听听”，人群呼喊起来。

“这个人太顽固了。他忘了本，我们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他。”有几个人说。

干部们把他当作混淆了是非的贫农对待，讨论继续进行。

最后，这个人说：“我不再争辩了，我输了。我会认识到做一个合作社社员是有些好处的。”

第三个靶子，过去的伪区长作为阶级敌人站在了群众面前，他的“猪落在杀猪人手里就没法活了”，意思是说“共产党会伤害人民”。党支部高让他站在一个高凳子上，好让所有的人都看见他。

1958年全县都在进行这种辩论，它可以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因为组织者划了一条清楚的界限，把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坏分子与头脑里有怀疑，老实人区分开来，所以这个运动团结了绝大多数愿意发展合作化的人民，孤立了极少数愿意搞单干的顽固分子。

张庄的辩论紧跟在黄碾之后，主要集中在李家三兄弟身上，他们是李全忠（绰号李胖子）和他的残废复员军人弟弟李太平，还能小弟弟李继顺。

这兄弟仨过去都是贫农，现在都是共产党员。李全忠现在是管辖着12个村包括张庄村的马厂乡政府的干部，太平是张庄村的干部，继顺仍是党支部委员。我在前面已讲过，这兄弟仨在土改后都成了新富农，也讲过他们是如何在加入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后，凭着自己的大股额捞取邻居的好处的。1957年与他们同一个合作社的社员们批评他们越来越骄傲了，谁也不敢反对他们。不用说群众，就是他们的同事也常挨这兄弟仨的骂，他们不光骂自己的干部同事，什么人都骂，都教训。现在人们贴出了大字报，“在旧社会，地主老财骂我们，欺负我们，现在为什么你们也欺负我们？解放前，你们谦虚、勤劳，现在为什么这么傲慢？”

李家兄弟真正的问题当然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践线问题，是他们所走的那条道路的问题，他们总想自家捞好处，总想着自己的利益，总是想法设法从合作社里外捞私利。但人们看得最清楚的，最感到不满的却是他们的态度，大家只能通过批评他们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来接触他们真正的问题。

在批评的强大火力下，李胖子毫无防备，无言以对，他蹲在屋子后面一声不吭，邻居们一个挨一个在数落他。

辩论中还揭发出另外两个社员是反革命分子。一个是林和顺，他曾在阎锡山军阀部队里当过连长，他在合作社的工作是开豆腐坊，但他总是漫不经心，社里吃了豆腐清明明显长肥了的猪死掉了许多头，这个豆腐坊老是赔钱，社员们骂他毁了合作社的财产。

这次大辩论搞清了一些新与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为“大跃进”的到来做了准备。

### 张庄大炼钢铁

东风公社的史书记也和大家一起日夜奋战在高炉旁，他们的口号是 炼铁也炼人。

如果没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我们就不会有漳泽水库，因为大炼钢铁搬掉了人们离家外出的障碍。在这以前，人们一般是不想离开家的，但如果是要他们出去炼钢铁就什么都变得可能的。到处新建了各种工程、大工程。

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我们的伙食很好，即使半夜也有馒头和面条吃，高炉附近就有大锅供应面条。谁也饿不了，工地上还有宣传队，敲鼓队，还演电影。那会儿，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全没了。

“那真是些难忘的日子。”张庄第一个参加炼铁的赵东胜说。1957年到太原学习小型柴油机的使用和修理技术，1958年8月13日，在他的保护下用马车把柴油机拉到了店上大队，这个大队在张庄以北20多里，那儿的人们已经修起了高炉，这个小柴油机能带动吹风机加大高炉的火势。赵东明是这样讲述这一段往事的

这儿聚集着来自各个大队的2—3千号人，他们来的时候带的有马车、箩筐和扁担。开始我们先用2—3个高炉冶炼，后来不知又修了多少高炉。起初修高炉是用砖从地面往上垒，后来我们就象挖窑洞一样在黄土案上挖了许多高炉，反正高炉的形状都差不多——又低又圆，高炉修好后，我们把煤和矿石交替着一层一层地装进高炉。我们还展开了大规模的竞赛活动，看一天内谁炼的铁最多，我们的口号是 “放卫星”。整个工地变成了一个大的炼铁炉，山谷中浓烟滚滚，烟雾缭绕。需要燃料时我们就到煤矿去拉，看见什么煤就拉什么。矿工们也在努力夺高产，他们说 “煤是工业的粮食。”

许多妇女也象男人一样在工地劳动，她们帮助粉碎矿石。到了晚上，整个工地都点起了油灯，照亮了整个山村。炼铁的人一下班就去帮助当地的农民干农活，帮他们刨花生时大家都吃个够，大队队长还告诉我们尽管吃。

然而，纪律是严明的，未经允许谁也不许拿任何东西。谁也没有在路边的地里挖过红薯，如果有人挖了，哪怕是一个，大家也会在群众大会上批评他（她）。

工地上只有3、4个人在太原学过柴油机，所以技术人员十分缺乏，为了弥补技术人员的水足，我们就选出一些有能力的年轻人加以培训。这样许多年轻人都学到了技术，学会了开机器、接电线，这些人在后来公社的工业中都成了骨干。到处都需要技术人才，而炼铁运动正好为培训技术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时候，叫人们出来劳动根本不费劲儿，人们不用为自己的生活担心，不用顾虑吃了上顿没下顿，只顾出动好好劳动就行了。我到了店上，我老婆去了史赵，我们把门一锁就走了，不怕丢东西吗？不怕。再说谁想拿别人的东西？那时候没人偷东西。1958年开始人们不再操心自己的财产，被派到哪儿尽管去好了，世界上任何事儿不用担心。

我们把劳动和军训结合了起来，所有民兵每天早晨进行训练。我们都是年轻人，上工时把枪带到了工地，训练的号声一响，我们马上就集合起来了。

那真是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日子！

不久，想数请工地上有多少人就不可能了，所有的人都出来炼铁了，所有的村子都空了。

市里中学、小学、机关的人也乘公共汽车来到工地，学生们用手帕或上袋运矿砂，与他们一起来的厨师在炉边点火支起了大锅。

山西这个地方，不论哪都有煤、有矿。我们具备所需要的一切，所以不为原材料担心，就连耐火砖也是我们自己



烧，我们能自给自足，我们有采煤、采矿、挖土、采石、运输等队。

每天晚上到半夜时，协调人都召开电话会议，他们会通知 明天我们什么地方需要 400 人，第二天就有 400 人到达指定地点。

我刚来的时候心想做做准备工作也得 20 天，但几天以后第一座高炉就修好了，并流出了铁水，我又想我们会逐渐修建和完成整个工程，可哎呀，不久所有的高炉就都点火了，并安排好了负责管理这些高炉的所有人员，我心想工作一段就能休息，可哎呀，这是不可能的。我没有时间休息，也没有时间回家。谁会想到这些？

每当我回忆起那些日子，心里总充满幸福和欢乐。

赵东明带着柴油机去了店上不久，张庄 100 多号男女(包括儿童)就到另一个工地——史赵去炼铁了。王文则、郭真宽、师才元在不同的时间都领导过这支临时组织起来的应急队伍。与此同时，张贵才带着由 90 人组成的第二支队伍到襄垣县西营的新水库工地去劳动了。史赵在张庄以北，离张庄仅 7 公里，可西营离张庄就有 50 公里。

先去史赵的 100 人人数太少，完不成分配的任务，所以又派人回村来叫人。夏天地里的活已干完，秋收的季节还没到，眼下也没什么要紧的农活要干，所有能劳动的人就都去了史赵。那些以前连长治市都没去过的小脚老太太也跟着到山上运矿石，母亲把自己才 5 岁的孩子也带到了工地，那些孩子还太小的母亲把孩子留给了上年纪不能劳动的亲戚家里看管，自己也跟着大伙上了工地，村里留下的只有年迈的老人、孕妇、和喂奶的，还有一些照看村子的基本人员。每个队留了一名干部，另外还有一位仓库保管员、一位会计、公共食堂做饭的几名大师傅，还有几个喂牲口的人也留了下来。留下的人当中管用的只有那 6 名干部、老人来洪顺死了，这 6 位为他抬棺材。一般一口重棺材要 16 个人才能抬动，可这次，他们六人竟然完成了这项大任务。

每个生产队派一个小组出动炼铁，每个小组要自带粮食，锅灶和炊事人员。每个小组一找到合适的宿营地马上就修一个大的泥火灶。开始时，队员们先垒起一圈砖，在砖上加上木板，然后用泥把苇席和木板糊在一起，修成四墙墙，他们就睡在这四堵墙围起来的没有顶的露天的地上。可后来天下雨了，公社给了一些蓬布，他们就把蓬布搭在顶上，造成了临时帐篷。虽然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灶房，但无论你走进哪个厨房都可以吃那儿准备好的饭菜，没有人安排早、午、晚饭，只要你饿了，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都可以到离你最近的厨房去吃个饱，从南到北，沿路都是厨房，人们可以随便吃哪锅饭，没有人登记，公社保证所有人的粮食供应，公社后面还有长治市，这是“全民动员大炼钢铁”的物质基础。

开始，每个村的应急队伍都建立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生产体系，领导可以了解和比较每个生产单位完成任务的情况。炼铁的人们修的炉很低，高约 1.8 米，他们在炉底铺上耐火砖，最底层架上干柴，上面盖上一层煤，再上面盖上一层矿砂，一层煤一层矿砂，一层煤一层矿砂，直到装满为止，然后从下面点火，由于没有足够的动力设备，大部分靠簸箕煽火，大约 3 天就可以开炉了。铁水一流出来他们就通知公社的人来检查。在史赵，炼铁的效果不总是好的；当时定的指标是每一炉出 2 吨铁，可他们常常只能出 1 吨半，铁的质量也太低，不能直接使用，必须送到长钢去回炉。另外，象我们大家能想象的一样，还有许多意外事故，有一座高炉靠电动鼓风机提供动力，结果有一天鼓风机坏了，不能提供动力了，火就灭了，已经融化的一炉铁又凝固了，光把炉里的金属掏出来就用了 20 天时间，另一座高炉，负责看炉的人睡着了，这就几乎又毁了这一炉。

“正值‘大跃进’，又家都在卖力劳动，可他却睡了觉”，真宽说，12 年后的今天他们显得非常气愤，“因为他是党员，那就更不应该了。我们在工地上开会狠狠批评了他，人们要求开除他的党籍，可他做了自我批评，他说对不起大家，并请求大家的原谅，最后人们认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次会议既教育了犯错误的人，又教育了群众，所以不再要求开除他了。”

从这次劳动的节奏上讲，怎么能让人不瞌睡呢？很难使人理解当时能不打瞌睡的。“一到炉旁工作就没有昼夜之分了。”王文则说，“开始我们是倒班干，可不久就不倒了，一直干，一干就是 2—3 天不睡觉。”

所有的情况都表明工作是不间断的，那么什么给了人们这么大的动力？

各村各队自采自炼的规定很快就废除了，部分原因是炼出质量较高的铁，运动的领导者们组织了这项工作，他们要求每个大队重点完成一项任务。因为史赵的矿砂资源相对短缺，所以他们放弃了这个工地，把重点放在了店上，他们在这儿重修了能产生更高效率，更大热量的高炉。之后，张庄来的人负责采运矿砂，其他大队的人负责冶炼。从来矿工作业到高炉工地有约 1 公里的路程，他们用平车、扁担，有些人用手搬运矿石，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用手搬或靠背背，如果矿石太大一个人背不动就两个抬。

第一次大突击战打完了，工作重新安排了，许多人返回了村上，最开始的 100 人一直在工地待到 11 月，不过有许多人也回家收玉米去了。但是即使在收割季节也还有几十人在工地上，他们继续炼铁，炼了一年多。这些人中还有几个再也没回到村上。店上重新安装了设备，修整了高炉，建起了一个“东风公社钢铁厂”，这几个人就成了厂里的工人。85

在总结整个运动，谈到技术方面时，东明说 “我们东风的铁并不坏，不象其它地方，我们的炼铁炉出的铁是合格的。炼了多少？这个我们的确不知道，我们只管劳动，公社领导知道数据。当然，那时有些机器坏了，可后来我们不是修好了送回去，就是付给了钱。”

张庄人参加修大坝

---

<sup>85</sup> 到 1961 年东风公社又分成了四个公社，张庄们属马厂公社时，这个钢铁厂关闭了，当地的主管人把它变成了一个农具修理站。后来，这些小型企业大部分都关了门。市里和县里的领导砍掉了许多小型工业，其中有一些是人们认为应该继续保留下去的，但一被砍掉就再也没有恢复起来。“那时刮的是单干风”。赵东明说，“工业都下了马。‘收缩风’一来各行各业都开始收缩了。”1970 年代，人们把这个归罪于刘少奇。

陆晋中和才元带着一帮人到大坝上去劳动的时候，贵才他们一伙 90 人已经在西营干了 2 个多月，他们要干到春节，总共 5 个月的任务。

贵才满怀激情地给我们讲道

起初我们都住在山顶上的一个小村子里，暂时住在老乡的窑洞里，这些窑比张庄的房子好。

墙壁上画满了画儿，这里哪儿的习惯，每间空白后都要花五担谷子，请画匠来画画儿，整个墙壁画的满满的，有古老的民间传说，有古代神话的坏人、怪物、“三国”中的英雄人物，也有现在故事中的著名人物，如小二黑结婚。以前我们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墙壁。”

“我们住在他们最好的窑里，同时抓紧时间挖自己的窑洞。我们挖的窑洞很大，每间足能睡 20 个人。几天以后，窑洞挖成了，我们便搬了进去。”

“潞城县，包括张庄，总共去了那里 500 人，因为大坝上的工作 3—4 天还没开始，我们就主动帮助当地的农民采棉花，所有的棉花一天就采完了。500 人我们组织了三个食堂，西营人看见食堂成立起来了，就送给每个食堂一只大羊，让大伙‘改善生活’。”

在工地上，我们尽量奖励干得最快的工人和最快的队，奖品就是粮食。我们的基本定量是每人每天 1.2 斤，粮是从张庄带来的，每多运一方土就可有 3 斤粮的奖励(三斤粮中 40%是白面)，外加 4.5 毛钱用来购买盐、醋、酱油等调味品。由于我们干得很快，挣的钱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需要，由于我们帮当地农民收棉花，一有机会他们就给我们送吃的。有一天，一个大队的干部领我去看窑洞，好家伙，里面满满的全是南瓜。他说‘我们不能白送给你们这些南瓜，给五块钱，吃多少就拿多少。’当我们再需要羊肉改善生活时，他们 8 块钱就卖给我们一只。休息的那天，我们把这只羊杀了，总共 30 斤肉，我们把羊肉、南瓜、葱剁在一起做了好多馅，美美地吃了一顿饺子。”

人们讲的最生动的情节又是吃，不过吃的好补偿了后来秋天和冬天的艰苦。封冻的大地使工作变得十分艰难，人们在一起商量如何才能破开冻层，用炸药当然可以，但炸药太贵。点上一堆火才化开一小块冻土，从化开的地方继续挖下去就可以挖到冻层以下，只要挖到了冻层以下就可以用重锤往下敲，这样就可以挖出土来，然后运走。但这个工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再停下来，因为半小时就会重新结冻。所以工作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一班接一班不停地干，万一人要离开了就得把被子盖在土上，好几层被子，这样再挖的时候土才不会结冻。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运土速度肯定要减慢，所以有些人失去了信心。有个名叫程金龙的富农散布谣言说，象这样的进度几年才能完成工程。妄图使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他还说不完成最后一方土谁也别想回家。他的话影响了张庄人的情绪，他们一个班只能运约 1 立方的土，而其它大队每班能运两立方。吃饭的时候，贵才发现有几个妇女在哭，男人们都低着头。

“怎么了？”他问，“你们怎么都垂头丧气的？”

“因为我们都不能回家，过年也不能回。”

“谁说的？”

“程金龙，”杨忠盛咕哝着说。

“这是谣言！”贵才说，“不要听那个富农分子的，我们过年都回家。”

贵才召开了一个会议驳斥了程金龙的谣言，程不得不站在大伙面前低着头，听着大家对他的指责，汗从他的前额流了下来。

贵才说“他说这儿的活要干几年？这是破坏大坝，破坏社会主义！”

“对，”人们马上响应，“他是这样说的，”

“他还说了许多别的。”

“贫农和地主富农想的就是不一样。”

杨忠盛非常气愤，他脱下鞋跑上去要打程金龙，但贵才制止了他，他说大家说的难听话已经够他受的了。那天的会议开到了深夜，大家恢复了信心和勇气，决心不顾一切困难朝前走。

一两天的时间他们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别的大队，这时在山顶指挥部的门前贴出了一张大红纸，表扬张庄人干的不错。这使每个张庄人都在深思，他们又骂开了程金龙。

他们说“张庄人以前从没丢过脸，要不是这个富农分子，我们开始也不会落后。”

这一周每个大队的运土任务是 190 立方，这次是要挖山北侧的冻土，张庄人 6 天半就完成了任务，他们是第一名，富村是第二名，有的大队 8 天还没有完成任务。张庄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富村和张公社没有张庄挣得多，可因为这三个大队在一起用一口大锅做饭，这就出了问题。张庄人得到了超出定量的奖励，而别的两个大队没有，于是他们就开始争吵，张庄人吃的多，而其它人不够吃，最后富村和张公社为了把生活拉平只好向张庄借钱 700 元，不过他们再也没还这笔钱。

“当然，这笔钱不必再还了，”贵才说，“我们已把它从帐本上划掉了。”

当时贵才挨着窑洞征求大伙的意见，大部分分人都说“我们觉得这儿很好，现在就是送我们回去，我们也不愿回。”

“我们的工作干的很好，生活也很好，所以地区总指挥郭 邀我去讲我们的经验。”贵才说，“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区的 8000 人，还有几百名生产队长，真让我为难。我有什么好讲的？最后我说我们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就是揪出了坏人，我就给他们讲了我们是如何揭露和批判程金龙的，队长们都向我们学习，各队也揪出了一些坏人，他们在坏分子的脸上涂上黑圈，给他们戴上高帽，让他们在工地上游街示众。长治有一个大队在他们中间揪出了两个坏人，给

他们戴上用草席做的足有 8、9 尺高的帽子，还给他们画了大花脸。”

“政治斗争唤醒了群众，并鼓舞大家去努力工作。如果你想把工作做好，就得抓阶级斗争。”

揪出了“坏人”，振奋了精神，劳动竞赛则进一步巩固了胜利的成果。除了能显出每个大队生产能力的生产记录以外，队与队之间为了得到奖励而进行的一些竞赛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内容。比如，每个队选出 5 名最有力气的年轻人参加挖 1 立方土的竞赛，先划出 1 平方米的指定范围，参赛者都脱掉外衣只穿背心或半袖，每个人背上都有一个号，上级领导监督，检查员在旁边测量坑的深度。信号发出后，参赛队员就开始挖，尽可能快地挖，他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有的出力过大吐了血，有的劳累过度得了病。工地所有的公告牌上就贴了挖土的纪录，某队某人 1 小时 10 分挖土 1 立方。贵才能记起来的最高纪录是 50 分钟 1 立方土。

### 张庄人参加治理水库

贵才在讲西营大坝的事，才元也迫不急待地讲起了他们在重新治理漳泽水库工地上的故事，漳泽水库属浊漳河的南源，在张庄村的正西面。

我们的供应组织的很好，上夜班时厨房要送两次热汤，大伙都能喝饱，他们用平车沿我们运土的路线送汤，我们是三班倒，整个工程组织的就象打仗一样，分旅、团、连。

各处的喇叭及时广播各个点的新闻，领导们也用喇叭指挥工作，向各旅、团、连发布命令。

其余的时间，他们把工地上向坏人坏事做斗争的事编成短剧或顺口溜在喇叭上播给大家听，如果说喇叭还不够，工地上到处都有黑板报和大字报。

这只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几乎每天都有市里送来的新电影或戏剧，另外我们还在工地上自编自演民间戏剧和滑稽短剧。每个团都有自己的演出队，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编演表现人们生活 and 工地新闻的节目上。不幸的是，大公社解散后，当地的行政机构也解散了，当时编写的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不是丢失，失散，就是放错了地方，有的甚至给烧掉了，真是太遗憾了。

十万人住在大坝附近的村子里，我们住在帐篷里，住在席棚里，住在各种各样的临时建筑里，离开了工地 10 里远的村子都是宿舍，村子里的许多人搬了出来，腾出房子让修大坝的人住。当时我们的办法是在大坝上干一个月，回家住 15 天，然后再去干 1 个月，两头儿干两个月，中间休息半个。但从市里来的干部的时间安排就不同了，他们三、四周来大坝干一周，这样不影响他们完成单位里的工作。

人们的干劲如此高昂，大家都忘记了寒冷，有一次我见两个人盖着被子躺在结冻的地上就问“你们冷吗？”他们说“一点也不冷！”可怎么能不冷呢？

有如此高的干劲原因之一就是劳动竞赛。年轻妇女们有刘胡兰队，年轻的小伙有飞车队，平车冲下 100 米高的大坝就象闪电，他们把车推上坡顶，然后一松手，由于向下的惯性，平车就向野马一样冲向坝底，有一个人站在车后尾磨住地起刹车的作用。上年纪的妇女有余太君队，上年纪的男人有老黄忠队。尽管年纪大了，可他们不服老，他们的口号是

挡住漳河水，浇灌上党田。

他们把这句口号写在席子上，两张席子写一个字。每张草席宽约 4.5 尺，长约 6.5 尺，然后把他们放在大坝的坡面上。

这件事鼓舞人们搞了许多新发明。开始他们是用手把平车推上坡，后来大家安装了绞车和绳索，这样装满的平车下来了，空车就顺着绳索上去了。打夯最初规定每次把三寸厚的土夯成两寸，后来人们学会了用水把土浇湿后再夯，这样就比原来夯得要结实的多，因此整个大坝就更坚固了、更安全了。

我们是冬天去修大坝的，回来已是第二年秋天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刚回来马上又跟王文则到铁路上去劳动了。这次，工地离家很近，从村口向东穿过公路就是，工程指挥部就在张庄，设在原来的育婴堂，也就是现在的卫生学校院内。

新的铁路要把黄河谷中的大型煤矿焦作煤矿的旧铁路延伸到上党盆地。这项工程要用 3 年时间。张庄人一帮一帮地轮着到工地上干活。王文则由于负责来自马厂公社各个大队的铁路建设队伍，所以一直在工地上坚持了 3 年，他指挥着 500 多名民工，他们在铁路路堤上劳动，分段完成任务，从长治西站一路北上一直到五阳。五阳是襄垣县的一个村，1971 年这儿是这条铁路最北边的终点站，后来这条铁路修到了晋中平原的太谷，并在此与省城过来的铁路汇合。一直延伸到山西西南角的风陵渡。

新的铁路颠倒了早在 40 年代初由阎锡山修建的铁路的顺序，由于有坡度和弯度的新标准，旧路全部拆除了，不过新路大部分还在阎锡山的旧路基上修。

1971 年的王文则象 1948 年一样悲观、刻板，不易采访。在大家的批判指责声中，在整风运动中，甚至在暂时不能“过关”的时候，他也只是很简单地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只答一两句，从不多说。然而，说到“大跃进”就不同了，显然这场运动是他生活的最高峰。我们一谈起修铁路，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下午，而且绘声绘色、手舞足蹈。

他说“当时，接受这项大的任务时我拿不定主意，因为这意味着要负起 500 号人的责任。可公社领导说他们就选中了我，所以我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坚持了 3 年。在工地上干了 3 年的所有的人甚至阳矿区建成后都分配了正式工作，也可以在铁路上当工人，或到钢铁厂当工人，可我不愿离开家，我还是回到了张庄，在村上当了一名大队干部。”

“在铁路上劳动时是按计件发给我们工资的，按人数的多少划分路段，按每人一天运土 2 立方计算划分路段的距离。一个组运够了规定的土方就把它夯实。工资按完成的总土方计算，发给我们的是钱，不是粮食或粮票，并实行男

女同工同酬。实际上铁路管理部门是按队或按夯的总土方数一块发给全队的工资，然后每队按每人挣工分的多少发给队员。”

“为什么那会儿的事那么好办？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如果干部不带头干，只是发号施令，命令群众这样干，那样干，当然不行。在铁路上，我们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大伙商量，让每个人都做到心中有数。”

“在有些地方挖起土来说比别的地方困难得多，在这种地方干活的队就会落后。完不成任务。而在好挖的地方干活的队总要超过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开会讨论，为难挖的地方规定新的定额。因为每件事都处理的公平合理，大伙都满意，工作也就干得更好了。就是过年我们也没回家，大伙只休息了一天接着就又干起来了，真是‘开门红’啊！”

“那几年我还积累了许多使用炸药的经验。我们在二岗山上炸石头就必须使用炸药，所以我们学会了打眼儿，一个人拿钻子，两个抡锤打下去，我们的炮眼打得有两米深，有时甚至 3 米，然后放一些炸药进去把口炸得大些，这样就准备好了放炸药的洞，这里把炸药装进去，然后起爆，一次就可以炸下 500 立方石头。我们经常碰头，汇报已运走了多少石头，并交流爆炸经验。因此从来没有出现干活好坏悬殊过大的情况。”

“有一次我们遇上了一条沟必须填起来，完成这一段路是任务的期限已经到了，大家都很着急，沟的侧边有一个小山包，只有把这个小山包填到沟里去才能尽快解决问题。最后我们决定使用炸药，我们在小山包上挖了一个大洞，往里面填上炸药，一声爆炸过后，沟就给填平了。”

### 张庄的人民公社

在“大跃进”时期成立的“东风公社”有分配劳力、牲畜和设备的权力。它包括了大半个潞城县。公社作为一个核算单位负责按月分配每个社员的收入。这种新型的集体权力机构的成立，使大炼钢铁，修造人坝，修建铁路等工程成为可能，这些工程的上马打破了死守在家，互不信任和山头主义的传统习俗，这种打破了村庄界限的大规模的集体活动为村庄内部的集体在做了试验，创造了经验。

村里通过各种渠道为发展这些新事物积累资金。张庄的农民到水泥厂和马路对面的火车调度厂及修火车的机务段干合同工，所挣的工资不是给了一个人而是给了公社，合同工只挣工分不挣钱，他们挣的钱算入了公社的总收入工分的收入总要低于工资的收入，正是这个差额才使公社积累了投资资金。

铁路和水泥厂建设占地要付给公社一笔钱，他们不把这种交易称为买卖，而是简单地称为“变成工业用地”。土地的赔偿费相当于所占土地三年产量的总值，这样公社虽然失去了一些土地，却得了一笔流动资金。

新的资金的积累和 58 年的丰收能够提供 7 项保证 保证食品、燃料、教育、医疗、住房、结婚和丧葬的服务收费。东风公社没有保证这么多，只保证了食品和教育两项。这些保证，两项也好七项也好，都给了人们一种史无前例的安全感，许多人不再为看病，年迈和丧葬攒钱了，而是花钱买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过去的人们常说

小的时候攒钱盖房子，  
长大以后攒钱说媳妇，  
上了年纪攒钱买棺材。

现在人们攒钱的目的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更多地考虑需要的和喜欢的东西了，不再过多的忧虑会有什么大灾难发生了。因此，一个活跃的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起来了。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尽管公社化运动没有保证这些运动的保证，而且大部分在一两年内都被取消，但他在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却留下了永远不灭的痕迹。

跨越大半个潞城县，曾一度有权安排 40 个村庄大部分劳力、农具和资金的东风公社于 1959 年分成了 4 个规模较小的公社，之后不久张庄的托儿所就关了门，公共食堂继续办了两年，1961 年由于粮食短缺没法再办下去了，于是也停办了。公社核算取消后，以村为单位的合作形式即后来的大队接管了所有的帐目，大队接受了集体菜园、水泵、加工厂，每户的电灯都保留了下来并有所发展。<sup>86</sup>

### 张庄的妇女解放：食堂和托儿所

公共食堂和公共托儿所解放了妇女生产力，使她们走出了家门，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撑起半边天”的能力。村里开办了 3—7 岁儿童的托儿所，大多数儿童都可以入托，这样大大解放了妇女生产力。

为了给公共食堂提供蔬菜，各生产队把各家各户保留的自留地合并起来做了队里的菜园，这样就把几百个劳动日从个人生产移到了集体生产，使蔬菜生产合理化，并进一步把妇女从家庭琐事中解放了出来。有了 1957 年 1 月购置的柴油机和 6 月购置的小型蒸汽机，才有了 1958 年蔬菜的大规模生产，用这些机器泵水可以灌溉几十亩菜园，因此激发了各个生产队在“大跃进”到来之前开发蔬菜生产的积极性。象我们看到的一样，在“大跃进”时期炼铁调走了机械，但那个时候张庄已经从公路对面的新水泥厂接上了电，已用电动机代替了小型柴油机和蒸汽机。1958 年以前，没人敢要求从水泥厂接电，因为水泥厂和张庄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机构，根本不属于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再说电被认为是高技术，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只有电工才能对付得了，一般普遍的村庄不敢瞎摆弄。是“大跃进”打破了行政管理的界限，冲破了人们的思想障碍。张庄人从公社指挥部申请到了电线，越过公路，接到了水泥厂的电机上，这样全村各家各户都通了电。电灯亮了，小型电动机也可以使用了，人们可以到加工厂来磨面，再也不用绕着石头碾子、石头磨转圈圈了。这更进一步解放了妇女。

张庄的托儿所受到了全村妇女的欢迎。胡雪贞热情洋溢地讲道：

“我们加入公社后成立了托儿所，公社负担全部费用，孩子们免费入托。实际上我们村成立了两个托儿所，村南

<sup>86</sup> 后来在 1963 年，公社批评大队核算过分集中，是早产儿，所以包括 60-100 户的生产小队又成了结算单位，负责一切收入和消费。

村北各一个。村南的托儿所占的是金宝贝的房子，北边占的是张贵才的老院，现在归了陆和仁。每个托儿所有两名妇女负责，贾金顺的老婆和李小妹负责村南托儿所，孙全英协助她俩工作。每个托儿所有70—80个孩子入托，不过季节不同，入托的孩子数也水同，地里的活越忙，到托儿所的孩子就越多，即使这样，也有许多家长从来不住那儿送孩子，而是留给姥姥、奶奶、或是姨姨、婶婶照看。”

“大多数家长是早饭后把孩子送到托儿所，然后去上工，中午下工时把孩子接回去，下午上工时再送过来，孩子们在家里吃饭。不过托儿所为孩子们准备得有吃的，公共食堂给准备的有疙瘩，孩子们把这当做饭间零食。”

“托儿所办的很好，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做游戏，还有许多人到我们这里来取经学习，我们也到别处去参观学习。那时候晋东南各地都有托儿所，为了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幼儿教师和家和共经常互相参观，相互比较，看看哪儿的托儿所办的最好。”

我问张庄的托儿所为什么最后停办了，胡雪贞说：“冬天到了，天气冷了，许多家长都不愿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去。我们的托儿所是个季节性的机构，只办了两个季度，最后就停办了。”

张庄的托儿所办了大约1年(1958—1959年冬天)，后来由于东风公社解散，不再提供给资金，所以也就停办了。

和托儿所一起办起来的村里的公共食堂办的时间稍长一些，直到1962年7月。开始张庄6个生产队每个队开了一个食堂，后来两两合并变成了三个，这三个都坚持了很久。起初，不管怎么开会动员，解释集体食堂的好处，来公共食堂吃饭的人总是少数，如果家里有人做饭就在家吃，但后来伙食和服务改善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来了。

厨师们按计划尽量变换饭菜的花样。他们想办法粗粮细作、粗细搭配，吃几天玉米高粱就吃一顿白面，逢年过节吃好饭，食堂间相互比赛，看谁做的好吃的多、饭菜花样多。他们还组织相互参观学习、现场表演、并讨论改进的办法。长治市接管了马厂公社后还安排了一名市委副书记负责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包括吃饭问题。

张庄的3个食堂，北边的设在大队部的院里，南边的在申天鹏的院里，另一个在南庙。每个食堂都建有10间房子，不包括厨师们住的(每个食堂有2—3名厨师)。每个食堂有一个大火炉，一口大锅，一台加大火势用的电动鼓风机，另外还有小火炉和2—3口小锅供特殊情况使用。每个食堂都有蒸馒头用的大笼，还有动力切菜机，每个食堂还指定了一名供给主任，负责食堂的管理和采购工作。只要供给主任计划安排得好，一切就会很顺利。

公共食堂一成立起来就大得人心，主要原因第一是方便，第二是免费，尤其在农忙季节，必须在地里吃饭时，最能体现它方便的优越性。这时厨师可为6个生产队的社员提供热的饭菜，社员们只要派人去食堂拿就行了。如果没有这样的集体食堂，队里就得派一个人挑着扁担一路摇着铃铛到各家去收饭，因为那么多户人家同时把饭做好是不可能的，派去拿饭的人总要等着还没做好的人家做成才行，这样等他把饭挑到地里时，先做好的饭肯定就凉了。大家的饭一起做，不仅省了时间，节省了劳力，而且大伙都能吃上拿到地里都是热的饭菜。

即使在农闲季节许多家也还是觉得公共食堂方便，他们可以派一个人去食堂把饭拿回家来吃，对单身汉和人口多的家户这尤其方便。不过，那些强调饭菜花样、强调个人口味、强调病号饭、强调随时可吃到饭菜，或还有其它特殊要求的人就不易满足了。

农民拥护公共食堂，实际在1958—1959的食堂的供应是半免费的，另一半还得各家各户自己付给，也就是说集体(开始是公社，后来是大队)从分配资金中扣除足够的粮食资金(资金占总收入的20%)，供给食堂半年使用，然后各户再从每年分配的粮食中拿出一部分粮食和钱供给食堂另半年使用。从1960—1962年，大队扣除了足够的粮食和资金支持公共食堂全年运转，每人每天有1.5斤粮食。显然，这不是任何一般意义上的免费供应。张庄人吃的不是别人劳动所生产的现成的粮食，而他们自己劳动所得的粮食，买调味品和买菜的钱是他们自己挣的。

供给食堂的粮食和资金越多，每户分到的粮和现金就越少。这种特殊意义上的免费供应意思是不管哪种食都按人头供应，大家都一样，不考虑挣工分的多少，也就是说按需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关于粮食，张庄起初是部分的后来是全部地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这实际上是一种平均的形式，张庄大队的每个人都分到同样数量的粮食，不考虑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力气等其它因素。当然有些人非常欢迎这种分配形式，更欢迎粮食大丰收的年，因为这时粮食不成问题，不象在灾荒年，粮食成了严重的问题，收得的粮不能维持生活。遇上灾荒年，那些勤劳的人们，贡献大的人，对缺少劳力的家庭和个人等他们共享劳动果实就不满，也就懒得劳动了。

平均分配，免费供应还带来一些浪费。因为有的家庭即使根本吃不了也要把分配给他的全部拿回家。

在“大跃进”后的重新调整、紧缩、节约运动中，长治市的领导不止一次到张庄了解粮食供给和公共食堂的问题。他们召开群众会议收集意见，听到了许多抱怨，有的人抱怨说公共食堂吃饭时间和饭菜安排的不够灵活，不给做病号饭，还浪费粮食。有了这些批评意见后，有的群众退出了食堂，但大多数没退。公共食堂最后在反对“五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平调风、命令风、共产风的运动中停办了，张庄的公共食堂是在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60条)发表后停办的。

显然，1958年公共食堂的建立，确实满足了一些实际的需要，许多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新事物比公共食堂更早地消失了。张庄的公共食堂比别的地方要维持的更长，不过在长治管辖的地方内至少有一个大队的公共食堂一直没有停办，1971年小宋大队的公共食堂仍为全体社员免费供应饭菜，不管工分挣的多少，一律平均供给。

### 全国农民在跃进

显然，仅仅张庄的例子是不够的。实际上，在大跃进时期，全国的农村都进入了战天斗地的建设高潮。

陕西的一位普通农民留下这样这样的笔墨“今年，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人人都在大跃进，个个都在破常规。社里的工作随着大跃进的形势越来越紧，任务越来越多，对我来说，真是快马还要加鞭，响鼓还要重捶敲，白天急急



忙忙回来吃个饭，什么家务活也顾不得干，就又急急忙走了，真是一天想干完 20 年的活儿。”，<sup>87</sup>激情澎湃！

安徽桐城县的大跃进中，群众干劲“青年勇气赛赵云，壮年力量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年干活似黄忠，干部赛过诸葛亮，妇女赛过穆桂英”，农村情况是“五大”“五少”：“群众发动面大，干劲大，钻劲大，肥堆大，各项工作跃进大。”“叫苦的少，进城的少，完不成任务的少，闲人少，说闲话的少”。新建和整修水利工程八千一百九十二处，治好了三条大河；全县积肥二十四亿多担，每亩肥料达到了三千担；由于热情的提高，还提出了许多改进耕作技术的经验。<sup>88</sup>

中国人民的友好朋友寒春，曾在 1980 年深情地回忆起大跃进时期的生活。当时，寒春所在畜牧场的群众满怀热情，根据畜牧场的特点，提出了全年不坏一斤奶的口号，为使这个口号得以实现，大家在很差的工作条件下克服了许多困难。那时在荒草滩上建场还没几年，没有电，一切都是手工操作；没有汽车，靠骡子每晚把奶拉到城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八月上旬连续下雨，通往城里的桥都被冲断了。好奶出不去，不仅城里的孩子们吃不上奶，还会造成大量坏奶的严重损失。大家都很着急，终于有人灵机一动，把空汽油桶和木板扎在一起浮在水上，两头拴两根绳子，两岸各一根，然后把奶桶放在木板上，于是一个小伙子跳进河流，把绳子带过河去，就这样才终于把奶桶也运了过去。<sup>89</sup>

许多人诟病大跃进造成了大饥荒，人祸的因素我们后面会谈及，但大跃进修建的水利设施，却大大降低了随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正是由于大、中、小水库拦蓄洪水，大大削减了水库下游的洪峰。不少中小河流由于修建了中小水库，消除了洪水灾害。以河北省唐山市附近的陡河水库为例，今年入库洪峰流量为一千六百七十秒立米，经水库拦蓄后，下泄流量一百二十秒立米，水不出河槽，确保了唐山市的安全，还蓄水七千三百万立米，可以供给唐山市的工业用水。1949 年陡河洪峰流量一千一百六十五秒立米，洪水侵入唐山市区，工矿停止生产，损失七百一十万元。由于近年来工业产值上升，如今年再遇 1949 年洪水，估计损失将达一千三百万元，陡河水库今年免除的损失已抵偿了它的造价。河北省徐水县瀑河水库和新乐县红领巾水库将瀑河和曲河的洪水全部拦蓄；河北省易县漕河上的龙门水库洪峰流量达五百秒立米，下泄流量仅五十秒立米，这些水库不仅保证了下游农田村庄的安全，也保证了铁路交通的安全。<sup>90</sup>1959 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 4463 万公顷，但实际成灾面积（收成减产 80%以上为成灾）1373 万公顷<sup>91</sup>（《灾情报告》第 378 页），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 30.8%，与历年比并不高。这个比例，正说明了大跃进的成绩。<sup>92</sup>

## 2、工人在跃进

大跃进更是中国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时代！中国无产阶级，在经历了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公私合营、整风反右之后，开始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伟大实践。

在城市工业发展方面，大跃进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很多现在很有名的工厂都是从大跃进期间开始建厂，近年因为工人事件而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的保定依棉集团和吉林通钢，都是大跃进时期靠群众背扛肩挑建起来的。

大跃进对生产关系变革、技术革命更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大跃进期间，首创精神大大发扬，鞍钢等厂坚持政治挂帅，放手发动群众，工人中也解放思想，破除对权威的迷信，广泛参加技术革新运动，短期内出现了不少新技术。如东北机器制造厂创造了“蚂蚁啃豆腐”的办法，使用小机床加工大机器，并大范围推广，成为生产力水平较低条件下加速发展机械工业的一把钥匙<sup>93</sup>。上海联华带钢厂，依靠手工操作，全厂干部职工奋战七天七夜，实现了机械化和半自动化，劳动生产率提高 2 倍；上海先锋手套厂用自己创造的电动机代替了手摇机，并向全行业推广，在不增加一个工人的条件下，全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3 倍<sup>94</sup>。以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为基础，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主要内容的鞍钢宪法正式形成<sup>95</sup>。这里我们以大连工厂的例子为麻雀，来剖析一个工厂在大跃进中的变化。

### 大连造船厂在跃进——大连工厂集锦之一<sup>96</sup>

#### 干部作风大转变

去年 10 月里，这个厂贴出大字报十三万张，其中有 30%是批评各级领导干部作风的；今年双反运动又贴出大字报七十六万张，其中有 35%左右也是批评领导干部作风的。

过去工长都在楼上办公，命令主义多，群众路线少，重视政治也很少。现在工长搬在工人一起住，遇事大家同商量，和工人共同劳动。工人们把这称做工长下乡了。有一张大字报是修船船体车间工人表扬一个工段长转变作风的，写得很生动：

态度蛮横又粗暴，  
不深入检查和指导，  
指手划脚乱批评，  
吹胡子瞪眼把毛病挑；

<sup>87</sup> 侯永禄《农民日记》

<sup>88</sup> 《人民日报》1958-06-02

<sup>89</sup> 国际主义战士寒春：幸福何在？——与青年们谈心

<sup>90</sup> 《人民日报》1959-09-06

<sup>91</sup> 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5 年版

<sup>92</sup> 但因为集中在主要产粮区，例如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所以实际影响仍然较大。

<sup>93</sup> 孙烈。“大跃进”时期“蚂蚁啃骨头”的机械加工方法的兴起。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sup>94</sup> “大跃进”时期的上海工业史料选登。档案与史学，2004（5）

<sup>95</sup> 戴茂林。鞍钢宪法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9（6）

<sup>96</sup> 《人民日报》1958-07-12

弄得工人垂头丧气心烦躁，  
情绪低落生产劲头那能高？  
如今作风转变了，  
既能深入检查又具体指导，  
工人心眼痛快了，  
决心参加生产新高潮。

再举一张表扬领导干部的，是锻工车间写的：

锻工车间小又小，领导干部来不到；  
有些意见无处提，提了意见数不着；  
工人干部有一招，就把意见留着了。  
现在过去大不同，车间内部变了风。  
整风运动真伟大，领导上把车间下，  
每天见到李厂长，书记一天走一趟，  
工会主席不少到，团委书记也看见，  
谈到工作有问题，又给解决又指导，  
这种作风实在好，有事我们主动找。群众思想大改观

经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干部自我批评，作风转变，和工人中的大字报、大辩论、大对比，工人的觉悟普遍提高了。

造船轮机车间有个工人叫杨成信，是工厂里的刘介梅。他原是一个乞儿，解放后当了工人，每月工资一百元。但在去年右派向党进攻时，他也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后来工厂把他的事迹组织了一个展览后，有些落后工人很快就认错了，感觉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造船船体车间四个工段共有三十八名落后工人，现在已有二十九人转变，其中有十四人已成了先进工人；比较普遍的树立起：“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思想和风格。工人们说：“过去见面是讲吃讲穿；现在是讲干讲钻了。”修船船体车间工人刘喜功平时不好好干活，下班就回家，他在家里养了一百多只鸡，还雇了一个在家休养的工人替他看鸡，这两个工人每月除照领国家发给他们的工资外，刘喜功还额外收入一百八十多元。在大辩论会上刘喜功作了检讨后，把鸡都卖掉，并且把休养的工人也动员上班干活了。

工人间的团结协作，大大加强了。电工车间和交船工段工人，过去被人称为“少爷兵”，没有事就看书、看小说，认为干多少都是给那些钱。为谁劳动的辩论后，早晨七点钟就上班干活，工人刘建堂看见船舶电气的工人很忙，冒着危险，主动爬到大桅杆上去帮助完成任务。

工人的主人翁感提高了，很重视产品质量和材料节约，并能互相监督。

不少工程技术人员的立场得到了改造，政治思想上的变化很大。交心、辩论后，社会主义占了上风，又红又专的口号很响亮，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有了比较系统的暴露，中间分子纷纷向左转。技术科的一百六十多名技术人员都自愿下车间去和工人结合了。一个技术人员陆钻忠把自己经过整风的进步画成了九幅连环画，上面写着：

- 一、上班钟声响，大驾还未到；工作压不少，我却自逍遥。
- 二、人忙我不管，反把冷话讲，何以不开窍，不必累坏了。
- 三、杂事最讨厌，我可顾不了；管它大清扫，骑上“龙车”跑。
- 四、开会更烦恼，找个暗角靠；扇摇烟缭绕，混混会就了。
- 五、整风锣鼓响，交心如梦醒；认真深挖掘，决心来改造。
- 六、赶早又贪黑，埋头又苦干；一批挖砂船，节约十五万。
- 七、过去请也难，而今跑的欢；亲自到车间，来把问题钻。
- 八、政治是统帅，思想翻一翻；发言真热烈，决心红与专。
- 九、业务工作干劲足，社会工作也不差；搬到工人一起住，决心兴无和灭资。

#### 规章制度大改革

这个工厂有许多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整风鸣放以来，做了比较大胆的整改。如过去生产准备集中在厂部技术科，修船生产准备周期大修船都在四个月到六个月左右：从订货到验收的手续有七十六道。现在检修、配套、部分工艺下放到车间，订货手续简化，准备工作缩短到两个月。过去领取材料要经过十六道手续，每月材料票四万多张，现在简化为三道手续，最多的五道，人人称快，材料票也简为二万多张。过去会计科财权独揽，领一分钱都要到科里去，每日接待五百人次左右，全科一百多个工作人员还忙不过来；现在权力下放，不仅人称简便，全科人数精简为二十五人，而且增强了车间的经济观念，成本大为降低，1月到5月比1957年实际降低21%（可比产品成本）。过去是：签字手续繁多，一张图纸八个人签字，老工人批评为“三七二十八，领导马大哈，图纸桌上放，签字不检查……”，但是差错仍然百出。现在三个人签字，差错大大减少。

工人干劲高，3月完成六百六十万，4月完成七百七十万，5月完成八百五十万，6月份就可能达到九百四十万，步步高升。船台周期大缩短

修船的主要设备之一是船坞。1956年大修船平均占坞周期是六十八天，1957年是五十二天；今年提出缩短为四十二天，可是听说江南造船厂大修船由过去的二百零七天到二百一十天一下要缩短到七十五天以后，劲又来了，第一坞一只大修船二十八天就干完了，和前年秋天比较，工作量多了30%多，时间却缩短了37%多。小修理的坞期，过去最

快是六天，一般要七、八天，今年4月一跃而为两天，跃进了三倍。

占坞期缩短的原因是由于各方面的改革：继续扩大坞外作业的工作量；工人陈福祥创造了船底钻眼机，节省劳动力二名，提高效率一倍；过去舱做完了，再装水试验，一个舱过去是七、八天才能交工，今年四、五天交一个，4月份铲捻工人集体创造了循环试水交舱法，一天就交一个。

造一千二百马力远洋拖船的船台周期由于工人改进了老的工艺方法，由第一艘的七十五天缩短三十五天。

电工在三百马力客艇上安装电线，过去先拉总线，后拉分线，一个小组十二个人，每月只能安装两条船的电线；现在打开了脑筋，5月下旬到6月份以来，改变了工艺方法，先拉分线，再拉总线，同样的人数，每月能干到五条船。

### 技术革新热火朝天

平时工人每月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有四百件左右，5月突然增至二千二百五十四件，总路线宣传以后，铜工车间78%的人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锅炉车间的一个哑吧张仁政，向来不参加活动，他看到大家都在革新、创造，也提了革新建议：围锅炉火室改长了炉子，效率增一倍，焦炭节省一半。

中央试验室技师苏伯阳发明了测厚仪，现在这个东西各国都在研究，可是还没有成功，这个厂已经投入生产了。

技术人员沈惠栋、工人杨世华，把只能平焊的自动电焊机改造成了能够横焊，这是一个大创造。

电工车间有一个工人郭心田，一夜整理了一百三十二件革新建议，其中自己想的占六十七件，号称革新大王。

这样的人各车间都有一两个。

锻工车间的工人和干部、技术人员一起创造胎具，使锻轴承套效率，由四百个提高到二千四百个；打曲拐轴日打一根跃到四根；又提出了车间九化的技术革新方向：运料、送活机械化；装炉、出炉机械化；锻锤墩子万能化；开锤自动化；计、调、工艺简明化；胎模普遍化；加工简单化；技术文化学习普及化；技术革新经常化。

电工车间钳工工段，提出苦战两个月普遍胎具化。

现在全体职工是思想解放，干劲十足，一定要在今年自己设计和试制成二千五百马力的重型柴油机，明年上半年设计和试制八千马力的重型柴油机。

### **整掉的和换来的——大连工厂集锦之二<sup>97</sup>**

大连造船厂的锻工车间，自整风以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评比和大跃进，干部思想作风有了大转变，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有了显著的提高。目前，这个车间的群众情绪异常高涨，心情舒畅，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技术革新像雨后春笋，生产定额日新月异。

### 经历了一番思想革命

这个车间的工人过去经常吵架，一个星期总有几次工人在为争着使用工具和大炉而吵架。过去在使用工具的时候，谁都不愿借给别人，下班后就把它锁在自己的“小仓库”里，有时有人急着用，就得砸開箱子偷用，工人之间常常为这些事吵架。使用大炉也是这样，谁也不准侵占谁的一点地方，有时候谁要多用了一点地方，双方就会吵个不休。为什么呢？问题很简单，因为这样会影响个人的收入。现在可大不相同了，好久以来听不到这个车间的工人在为使用工具和大炉而吵架。现在工人的“小仓库”不锁了，有的人还主动把工具拿出来借给有关的人使用。如6月初李道文去向过去最不愿出借工具的张玉金借打铁用的摔子，张玉金想，用“摔子”，必须用“槽”和“肯子”，于是他就主动又把这两种工具找出来借给了李道文。

浪费材料的人被人看为最可耻的人。过去把浪费材料看做是习以为常的事，许多人过去在使用材料时不是考虑如何节约材料，而是考虑如何方便、省劲、顺手，所以，就造成原材料的浪费。工人孙少坤说：“过去是就料下活，现在是按活下料”，所以过去料头多，现在料头少。谁要出了不该出料头的活，就被人看做是最可耻的事。工人梁祚祥说：现在要出了料头不用别人说，自己也觉得脸上热乎乎的。

这种改变，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每个人在整风中都经历了一番思想革命的过程。老工人阎通达的思想转变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6月13日晚上，当检查组找老工人阎通达了解这个车间整风情况时，他沉痛地向检查组的同志叙说了他的转变过程。他开头就说：“我对不起党，要不是整风我不一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说：我过去很落后，经常吵工资，争定额，发牢骚，说怪话，一遇到不满的事情，就骂大街，这样一来，我干活也吊儿郎当。我过去干活是‘买鱼不管卖虾的’，‘烧火不管打锤的’，干一天凑付一天。”他说：那时候我是“站在花中不知香”，忘记了旧社会的苦处，自从“双反”运动开始，通过“为谁劳动”的辩论，又看到造船轮机车间杨成信的忘本展览会，这时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真对不起党。整风中，领导上又主动地检查自己的三风五气，使我很感动。“我现在心里像开了花似的，不知那来的这么大的劲”。当人的思想解决了，干劲也就来了。锻工车间第一天晚上发动工人进行群众性的检查整风和生产时，会后阎通达找到车间党支部书记车汝琦同志说：“车同志，我现在心里真痛快，我干的锚链心，现在一天干二千，明天我想法干三千”。当时车同志说：“好啊，你要干到三千个，我给你送喜报。”第二天，阎通达果然干了三千。并且说还能提高，要求车间领导上给他压缩定额。锻工车间虽然只有一个阎通达，可是过去像阎通达这样的人物还不只是一个。通过整风，这些人都有了转变。从锻工车间几件具体事看出，通过整风职工思想是起了极大的变化。

领导上有些什么变化呢？

### 领导作风和群众鉴定

下边这首快板诗，是锻工车间群众给这个车间领导干部通过整风作的鉴定。

整风运动有成绩，三风五气绝了迹。

<sup>97</sup> 《人民日报》1958-07-12

---

干部作风大转变，工人群众都满意。

× × × ×

过去执行一长制，干部肿了下眼皮。

群众力量看不到，坐在屋里发官气。

工作作风不深入，命令、公文成风气。

屁股专坐转圈椅，关在屋里出主意。

有些工作作不好，听了风来就是雨。

困难帮助解决少，有如雷霆发脾气。

× × × ×

整风运动是霹雳，三风五气碰了壁。

问题大家出主意，工人干部连一气。

群众力量大无比，群众路线数第一。

放下架子当学生，群众当中去学习。

走出小小办公室，离开软软转圈椅。

去给工人做徒弟，深入生产摸底细。

干部种了试验田，工人看了更起劲。

干部挨家访工人，干群变成一家人。

情况掌握真全面，问题大家来合计。

干部作风大转变，工人个个笑嘻嘻。

干部带头前头跑，工人后面不松气。

万马奔腾大跃进，生产敢跟火箭比。

这个车间的职工群众在这次整风生产大检查中，对领导作风的改进和规章制度的改革表示非常满意。对领导作风有三满意：遇事和群众商量；带头做样板；打掉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人说，现在不管什么事，领导上都是事先和我们商量而后再做，这才真正叫工人当家做主人呢！孙少坤说：“过去分奖金是领导上说了算，他们说给谁多少就给谁多少，每次分完奖金工人不满意，因为有的不该分的分了，该分的没分。现在就不那样了，要工人自己讨论。这样分法工人就没有意见了”。

这个车间过去修改工时定额是领导上先提出压缩系数，再按照压缩系数一律往下割，而后交给群众讨论。这次把工票和图纸全交给了工人，要工人一件一件讨论应该压缩多少，开始时车间有些人耽心用这种作法完不成任务。但是，工人讨论的结果，不仅完成，而且能压缩工时 30% 以上。

车间领导干部，在参加劳动中起了模范作用，在下去时听从工段和小组的分配，在劳动时挑工人不愿干的活自己干。如有一次党支部书记到王德福小组参加劳动这天，这个组干法蓝盘，用的料有两种，一种大的（一百多斤），一种小的，支书去搬大的，工人叫他搬小的，他一定要大的，工人先是担心，后是感动，许多工人普遍称赞现在干部没有架子了。有的工人说：过去有了事你找都找不到，就是找到了干部还有三个法宝——推、拖、压。老工人宋殿卿说：过去是槽里有料饿不死驴，现在是领导转变好比及时雨。打掉架子表现在另一个方面是干部和群众同娱乐，过去娱乐时干部在一起，工人在一起，现在是不分彼此。

对新事物给予热情的支持，这也是这个车间工人很满意的一件事。他们在整风过程中，对各种新事物给予极大的支持。如老工人张富财提出八角加热炉如果改为双层的，可为国家节约大量燃料，这个车间就根据这一建议，把八角炉改成了双层的，效果良好。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这个车间对一些不合理的陈规旧制也进行改革，群众表示极大的满意。

#### 初获经济战果

人们的心情舒畅了，干劲就来了。这个车间自整风运动以来，新人新事不断出现。给瓦房店承制的滚珠套，开始时每天只能生产一百八十个，经过工人反复研究，现在可达到日产二千五百个，但他们还在研究提高。曲拐轴是这个车间的主要产品，解放前是二十五天锻一个，解放初期也还要十五天干一个，直到整风前还只能一天干一个。但在整风过程中，把这个关键交给了群众，工人反复研究，由过去十火改为七火，进而改为五火，目前只要二火就可锻成一根曲拐轴，日产达到四根半。这个车间各项指标的完成得很好。生产指标今年月月超额完成。出勤率去年平均达 88.5%，今年 1 至 5 月达 95%，废品率去年是 0.368%，今年 1 至 5 月平均是 0.08%，而 5 月份一件废品也没出。上述情况仅是锻工车间初获的战果。最近，这个车间又在修改他们的跃进计划，他们信心百倍的要争取更大的成绩。

#### 破除顾虑，知识分子思想大跃进——大连工厂集锦之三<sup>98</sup>

大连机车车辆厂是近万人的大工厂。这个工厂在生产大跃进中不仅领导上改进工作作风做得好，工人群众为谁劳动的大鸣大放大辩论进行得好；而且在知识分子中破除顾虑向党交心的思想大跃进也做得好。这就是说，这个工厂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把各种关系都整了一次，而且都整得好，这是这个工厂生产大跃进的基本动力之一。

这个工厂参加交心运动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非党知识分子三百五十七名，其中从二十岁到三十岁的青年占 89%。但有不少人却长期背着“有工会会员证，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包袱，否认自己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的各种各样观点

---

<sup>98</sup> 《人民日报》1958-08-01

在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有许多知识分子在许多观点上和右派共鸣，有一百四十三名技职人员散布了右派言论。经过反右派斗争，斗臭了右派分子，端正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方向；但是，那些属于中间派的知识分子的反动言论还没有来得及深挖。反右派斗争以后，有许多反动观点却开始隐蔽下去。

从总的方面来说，这些中间派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拥护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但资产阶级的立场基本上没有改变，因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则表现摇摆不定。在历次运动中表现对党组织的关系不正常，他们大致有如下的几种情况：

- 1、把自己置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之外，“明哲保身”。说“凭良心作事”“少说话免得惹祸”。主张“中庸之道”。
- 2、历史上有些问题，对党组织不信任，想接近党又不敢接近，有问题想谈又不敢谈，疑神疑鬼，神经过敏。
- 3、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时“明朗”，有时糊涂，态度变化无常，对一些问题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 4、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当触犯到个人利益的时候，表现消极沉默，情绪不定，时冷时热。

在左派知识分子中也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其中主要是：

1、有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当党组织经常和他们商量问题采纳了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就表现积极主动，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或有些工作没有找他们参加研究的时候，就表现消极被动。

- 2、脱离群众，骄傲自满。
- 3、在对待红与专的问题上，对“专”下的功夫较大，不注意红。
- 4、大鸣大放期间，在一些非根本性的问题上，有的也和右派有共鸣。

#### 向党交心，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这次交心运动是从4月16日大连市召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万人向党交心誓师大会开始，至6月10日结束的。

经过近两个月的交心、批判、辩论、小结，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交心运动。非党知识分子的动摇状态不可能继续下去，其中有不少人已在改变他们原来的政治面貌；而这次交心运动就更加促进了这种改变，进一步承认了自己的反动的错误的政治思想观点，基本上明确了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表示决心加速自我改造，争取当左派，当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成为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在交心运动中知识分子政治面貌的改变主要表现在：左派的队伍不断的提高和扩大，中间分子大量地向左转，右派进一步地孤立和分化瓦解。左派在交心运动中，对自己的思想作风有了比较深刻的检查批判，这就更加有力地带动和影响了中间分子，中间分子也感到满意。

中间分子在“形势逼人”的情况下，检查批判了自己反动的错误的政治思想观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这次交心运动中非党知识分子全面地系统地大量地暴露出了他们的反动的错误的政治思想观点，这主要是：

1、对党的领导有反感，口服心不服，有的甚至抱敌视态度，虽然在原则问题上承认党的领导，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否定他们的公式就是：“共产党上级好，下级一团糟”；“党的组织好，党员、积极分子一团糟”，“社会主义必须由党领导，但对科学文化事业领导不了”。

- 2、否认工人阶级的先进性，瞧不起工人出身的干部。
- 3、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宣扬西方民主。
- 4、对各种政治运动有反感，否认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
- 5、追求极端民主，反对民主集中，追求所谓个性自由，反对统一的纪律。
- 6、追求名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灰色的人生观。

经过交心运动，非党知识分子的变化很大。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运动中都进行了激烈的反复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这正如工程师彭大充、冯翰湘所说的，向党交心运动是“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个人思想大革命”，是“处于前所未有的紧张的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在这斗争过程中，要检查分析自己思想中的丑恶的肮脏的东西，要承认这些东西是出于自己的，要否定自己过去的丑恶思想，又要追查这些丑恶思想的来源，这一切确是很痛苦的”。

#### 思想斗争的丰硕果实

思想斗争的结果，使过去一贯对党对群众不讲真心话的人，成了滔滔不绝的讲真心话的人了。基建科一个工程师说：“反右派斗争以后我认为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更加难了，因为反右派斗争以后知识分子更不谈心里话了，我自己也抱着不谈心里话的态度。这样党就无法来进行改造。没想到又来一个向党交心运动，这一交，不但交出今天的心里话，连过去的心里话也都交出来了。”

思想斗争的结果，揭开了“中间道路”、“中庸之道”的实质。设计科一个工程师检查批判了自己在会上虽然批判了右派分子黄与宏的反党言论，但会后就对右派分子黄与宏讲：“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讲这些话”的两面派手法。

思想斗争的结果，使长期惶惶不安的人卸下了包袱，铸造车间的工程师薛纫秋在鸣放期间有右派言论，反右派斗争期间态度就有些反常，在斗争其他右派分子的时候，群众揭发了他在科内曾讲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弥衡焉敢击鼓骂曹乎”之后，薛的态度很不自然，不敢承认，反而说“我说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科员”。自此以后，薛工作更不大胆，总是想：不知哪一天就该斗争到我的头上。这次交心运动他感到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彻底交了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现在心情很舒畅。

长期背着有“工会会员证”包袱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次交心运动中，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说明了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设计科工程师冯翰湘说：“通过具体材料的分析，我承认了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开始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时候，我思想上反感很大，觉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党的不断教育却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觉得这种提法是党故意贬低知识分子进步的一面，打击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由于我有这种反感，就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起了障碍的作用。但是经过交心，自我批判，集中批判，阅读文件，分析具体思想活动，我觉得我的所作所为无一不



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以资产阶级观点分析问题，而其后果也无一不损害革命的利益”。

在这次交心运动中，基本上是搞臭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是“万恶之源”“百病之门”。

总之，交心运动对每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有深刻的触动，思想斗争又是反复的、激烈的。如在自我批判中有许多人总是三次四次地批判，最后才批判得比较彻底比较深刻。从批判深刻程度来看，也基本上达到了真、深、透的要求。

#### 出现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的局面

交心运动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出现了心情舒畅，精神振奋，工作积极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改善了与党组织和党员之间的关系，现在他们是主动的取得党组织和党员的帮助，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同党支部的领导同志和党员同志经常的谈心。

2、知识分子中间更加团结。交心运动解开了相互的怀疑，打破了情面，展开了互相帮助和互相批评。

3、放下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架子，和工人的关系改变了，积极支持工人合理化建议，在设计工艺工作中吸收工人的意见，在技术工作上出现了技术人员和工人紧密结合的新风气，并且积极地参加了群众性活动，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总路线宣传中许多老年工程师和青年技术员同群众一起扭秧歌。

4、工作积极主动，干劲上升。

大连机车车辆厂的交心运动自始至终地贯彻执行了党的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针。交心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在批判和辩论中可以坚持自己意见保留自己意见，别人的意见不能强加于人。

在交心运动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四怕思想：一怕当现行右派；二怕当典型批判“受不了”，有人说“交心交的透，将来批判不好受”；三怕领导不信任；四怕群众另眼相看，瞧不起。有许多人反复考虑过是坚持旧立场呢？还是忍痛丢掉呢？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忍痛丢掉旧观点，领导在此期间不断地交代党的政策，解除顾虑，坚决反对强迫命令的办法。

有批评，有鼓励，有斗争，有诱导。这就是既要有正面教育和启发诱导，又要有群众性的批评和“斗争”（指向坏思想，坏态度作斗争，而不是斗争人）。鼓励诱导，主要是领导正面教育和拿“样板”，树立先进思想和先进人物的标兵，这是主要的，但光有正面的还不够，还必须有群众性的批评效果才会更大。如在交心过程中，大部分人经过正面教育，受了标兵的启发，解除了顾虑，积极交心，但也有部分人，态度仍不老实，想滑过去，这就不是认识问题，顾虑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这就要通过群众性的批判来推动才行，用群众对照评比的办法，实际上就是群众性的批评。

#### 实践教育了干部——大连工厂集锦之四<sup>99</sup>

大连机车车辆厂的基层领导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去掉了三风五气，贯彻执行了政治挂帅和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人一道参加了生产劳动，收效很好。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促进了今年生产加一番的局面。

大鸣、大放、大辩论中，群众所揭发出的大量问题，是：领导思想作风上的三风五气，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过去多数干部对办好企业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工人阶级的认识不明确，长期以来受“一长制”的影响极深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正常。具体的表现是：（一）把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许多干部认为：“我是做行政工作的，政治工作主要是党、工、团的事情”。因此，群众有思想问题，从来不主动去解决，甚至埋怨党、工会、共青团没把群众教育好。有的干部说：“生产任务完成了，说什么都好；完不成任务，什么政治不政治都没用”。（二）只见物不见人。许多干部对于人是我们的事业的决定因素认识很差，对于群众的落后方面看得多，积极方面看得少，不做群众工作，以重赏重罚刺激生产。（三）以行政命令代替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车辆车间王炳善工段长说：“我过去布置生产任务是强调行政就是命令，不干不行，叫你干你就得干”。像这种工作作风，在行政领导干部中带有普遍性。（四）不关心群众疾苦。这些思想作风压制群众积极性和影响生产力的发展。

整风运动的经验教育了这个厂的全体干部，再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工作方法的指示是十分正确的。不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生产运动的巨大发展是不可能的。

经过整风运动，在各级领导人员中，比较深刻透彻地解决了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条是政治挂帅，以虚带实。一条是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更好的贯彻执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政治挂帅、以虚带实

整风运动以来，大家深刻地体会到任何工作都必须政治挂帅，车辆车间工段长王炳善改变了过去的态度，他说：“现在体会到不做政治工作，一切问题难解决。比如油工用油量，过去使用命令方法，总是超过了指标；现在向工人做了动员，大家一辩论，问题就解决了，用油量由九十二公斤降为七十二公斤”。过去对待落后群众一般是歧视的，常常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不分析原因，不作具体帮助，现在懂得要善于等待，耐心的诱导群众，逐步提高群众觉悟。落后分子转变的事实，使干部认识到许多落后者原来并不是甘心落后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工作做的如何。为了做到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教育群众，车辆机车等车间建立了党员同群众交朋友的制度。车辆车间目前发动了二百一十三名党员同四百二十七名职工交朋友，互相访问、谈心，好多家属深受感动。

#### 抓住先进思想，带动一切工作前进

今年年初国家规定这个厂的机车任务第一本账是一百六十台，车辆二千九百辆。经过群众讨论最后确定机车为二百五十台，车辆四千至四千五百辆。在双反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职工贴出大字报：“一百六十台是不是保守？”

<sup>99</sup> 《人民日报》1958-08-03

“二百二十台能不能跃进上来？”经过党委研究决定以全厂生产关键环节机械车间为主，提出了由年产机车一百六十台跃进到二百二十台的先进指标，于是带动了全厂各个环节展开了大跃进的辩论，向保守思想大开火，经过辩论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订下了“二百二十（机车）、三千二百（货车）、一万八千（吨铸件）”的跃进指标，职工们并以实际行动实现月度跃进计划。保守思想不攻自破了，思想解放了的工人同志，目前又提出突破“二百二十、三千二百、一万八千，为二百五十、四千五百、二万二千，‘十一’试制成功内燃机车，明年生产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实践教育了干部，并且使干部初步懂得了在企业工作中要很好地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纲，树立鲜明的旗帜，以先进带动落后，坚持以虚带实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在抛纲抓先进当中，干部也运用了今年看明年、上步看下步的办法，这样使各个方面都动起来了。一切工作都要为达到实现下一步的要求积极起来了，薄弱环节也要急起直追，全部工作活跃了。不仅今年看明年、上步看下步是必要的，而且明年还可以带动今年、下步还可以带动上步，为了将来完全可促进现在工作的进步。

#### 困难千万条，交给群众解决了

大跃进中必然遇到困难，我们事业的大跃进就必须包括战胜困难在内。遇到困难怎么办？整风运动实际教育了干部，依靠工人群众，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比如：双反运动中职工贴出七十万张大字报，共计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三十八条意见，属于工厂内部可以解决的有五十三万一千六百八十条，开始干部被这么多的意见吓住了。但是，在党委提出“大字报回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领导和群众一块抱西瓜拣芝麻”以后，职工群众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解决了三十三万一千零三十二条意见，经过辩论解决了三百五十六个大西瓜，深刻地教育了干部。从此，干部也就学会了遇事就找群众商量的办法。

长期以来干部迷恋于一长制的作风，生硬、简单、粗暴，因而在不少地方伤害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正常的同志式的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这次整风运动坚持了干部引火烧身，当众检讨，表示决心在群众监督下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少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反复的检查自己，有的还演出活报剧和用漫画揭露自己的缺点给群众看，效果十分良好。车辆车间副主任谭广仁同志和调度主任雷布增同志合演“扯不完的皮”活报剧以后，对工人启示很大。原来比较落后、劳动纪律松弛的孙兆德被感动地说：“干部作风真变了”，跟着自己也订出十一条改正缺点力争先进的决心书，现在生产积极了。

这种作法的显著作用在于解开整风前长期积下的疙瘩，通过当众检查，少数人座谈，个别谈话等方法把话说开了，错的检讨，不是错的解释清楚，这样打开了密切领导和被领导之间关系的第一关。

#### 搞“试验田”，参加劳动

自从3月19日开始到现在，全厂工长以上的干部都分别参加了劳动，由于干部以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工人群众中间，对职工的影响很大。第一、过去干部和工人只有生产工作上的接触，没有思想上的相互帮助，参加劳动以后，对工人生产、生活、思想情况有了具体了解，感情融洽了，工人向干部说了心里话。第二、发现了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改进了工作，推动了生产，克服了领导上官僚主义作风。比如铸造车间电炉过去因为用电量限制两个炉不能同时生产，影响出钢量，阻碍跃进。通过搞“试验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就地研究解决了它，结果电炉熔化量，由十五炉提高到十六炉。工人反映说，领导下来真解决问题。第三、由于领导干部参加生产搞“试验田”。大大地激发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比如车辆车间台车工部加工侧架一天只加工出四、五个，完不成定额，他们的思想是定额不下来就等他三个月，但在总支书记孙天福去参加劳动后，工人自觉地进行了检查，提高了认识，由五个提高到十六个。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政治和技术相统一，又红又专的道路。

#### 工人思想大跃进——大连工厂集锦之五<sup>100</sup>

大连机车车辆厂在整风运动中，全体工人经过了“为谁劳动”的大辩论，明确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劳动观点。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特别关于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的指示的广泛传达和讨论，破除了工人的自卑感，敢想敢说敢做的独创精神已发芽成长，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日常管理工作的试点，该厂出现了新气象。

#### 整风前的不健康现象

整风前在工人中比较普遍突出的问题是个人主义思想。

个人主义的表现大致是：

1、干“计件”和干“计时”两种态度，两种干劲。有人说：“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付酬，干“计件”是多劳多得，按劳付酬，干“计时”挣钱少，就应该少干”。因此，过去他们是“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干计件的时候可以连干两个班，或到点不下班不回家。为了赶点多弄钱，只顾数量不顾质量，甚至有的糊弄欺骗，弄虚作假。铸造车间洗砂工人长时间少干活多报账，“修改工时定额由你（指领导），每日记工算账在我”。

2、对损害国家财产不在乎，个人少弄了几个钱很心痛，机车上部一个工人打了价值二元三角的钻头不心痛，但扣了他五角钱他却难过两天，以后干活的时候到点还差二、三十分钟，一算干的差不多够本了，就不再干了。

3、一部分工人不关心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他们说：“八小时之内是工厂的，八小时之外是我的”。有的徒工说：开会也是二十八元，不开会也是二十八元，开会给钱就参加。”

4、运搬工人、吊车工人、辅助工人认为没有前途，没出息。有的运搬工人说：“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人家开那么多钱，咱们开这么几个钱”。

#### 整风、交心，出现了全面跃进的新局面

经过“为谁劳动”的群众性的大辩论，全体工人经受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被搞臭

<sup>100</sup> 《人民日报》1958-08-11

了，白旗被拔掉了。许多工人狠狠地批判了“一切为我，一切为了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例如，在整风前，机车车间电焊小组是一个比较突出的落后小组，他们共有三十七个工人，在整风中都作了比较深刻的检查：谭有敏把自己来厂前后做了一个对比的说明，他说：“刚来厂的时候，计件计时一样干，好让别人说上几句好话，升级有保证；当铁饭碗保住了，就不这样了，干计件拼命干，干计时留点劲到干计件的时候再使用。说老实话，我从来厂的那一天起，就是为了钱，整天琢磨的就是钱。开工资时到处打听别人开多少，比别人少开一角钱也不高兴，总认为有钱可以买得鬼推磨，穿得好，兜里有钱就是走在街上精神也足，可以装大爷。为谁劳动我从来就没有想过。”

通过大辩论，突出的解决了工人中个人主义思想。明确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思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增长起来了，劳动态度也起了根本变化。

从机车、金属结构、机械、锻造四个车间三千二百五十一名工人的统计中可以看出，整风大辩论前后变化很显著：进步的由原来的 22.6% 上升为 41.1%，中间的由 61.2% 变为 52.1%，落后的由 16.2% 下降为 6.7%。

以上变化说明落后面大大地缩小了，这个变化，促进了生产面貌的改变，工人团结的增强。工人说得好：“整了风我们国家没有增加设备，没有增加人，又多了个机车车辆厂，（去年年产九十七台机车，今年年产二百五十台机车）”这就是巨大深刻变化的标志。

### 破除迷信、思想解放、大闹技术革命

工人为谁劳动的大辩论取得胜利后，接着向工人传达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讨论的过程中，工人中暴露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自卑心理。首先是认为自己没有文化，搞发明创造是工程师、技术员的事；其次是怕搞不成丢人；怕领导干部不支持；怕违犯工艺规程，特别是老技工这种顾虑更大些。经过大辩论，这种自卑心理逐步地被克服了。机械车间老工人韩贵甲，绰号叫“老保守”，但是总路线使这棵铁树开了花，他过去曾因对个别干部有意见，借口愿意使用旧床子而不使用新床子，怕使用新床子出了毛病坐牢，由于思想落后生产也不大胆。因此，在前一段鸣放中，他一条意见也没提，这个思想他一直没谈。这次他的儿子韩玉江（旅大市劳动模范）揭发了他的错误思想，再加上党的教育，他思想解放了，过去刨轴箱是一次把七个活，他开动了脑筋学习了多种把活法后，一次把了十四个，提高效率一倍，并且回家连夜画图改进工具，从 6 月 1 日到 7 月初提出六件革新建议，提高效率一至六倍。徒工思想也解放了，如金属结构车间徒工李家琪碰到剪铁板的困难想研究改进，可是他又想师傅有多少年的经验都是这样干法，徒弟还能把师傅的干法改了吗？当学习了总路线以后，思想解放了，他改了一个胎型来切铁板，提高效率三倍。

× × ×

总之，为谁劳动大辩论，插上了工人阶级的红旗，拔掉了资产阶级白旗。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总路线的宣传和贯彻执行，去掉了工人的自卑心理，解放了思想，开始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另外出现的一种新气象是增强了本组工人之间、组与组之间互相协作配合，增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

经过上述工作，在短期内工人们爱厂如家的思想大大发挥，主人翁责任感更加强了。关怀生产，关怀质量，互相协作，互相批评，已经开始成为风气。

### **思想解放无边无岸——大连工厂集锦之六<sup>101</sup>**

#### 前后大不相同

大连钢厂在 1955 年以前是个落后厂。年年完不成国家计划，经常受到领导上、报纸上和定货单位的批评。工人情绪低落，工厂领导干部也感到苦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情况已经开始改变，多数的重要技术经济指标到 1957 年末已经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今年的情况又有进一步的改变，今年跃进计划经过群众充分的讨论，已经修改过四次，由年产七万吨的指标到保证年产十四万吨，争取十六万吨的指标。在品种和花色上，他们提出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争取扩大到一万五千种。

大连钢厂今年的跃进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跃进的规划，在今年 2 月份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为什么在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呢？主要的原因有下列几条：一曰沿海地区不宜发展；二曰基础不好，设备陈旧，技术力量单薄，不能适应新型机械工业的需要；三曰厂址两面环海，一面靠公路，一面和其他工厂相连，自然条件受到限制，不能发展。这三条就成了领导头上的三个紧箍咒，认为这个厂发展前途不大，只有维持现状，没有什么大干头。自从今年中央破除迷信、思想解放的指示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传达后，全厂就出现了职工思想大解放，生产大发展的新局面。打破了不少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观念。经过大辩论后，认为工厂发展的前途异常广阔，建筑面积不够可以填海（现在我们看到他们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填海工作）；设备陈旧，可以闹技术革命。人人思想生动活泼，个个干劲十足。经过半年来的实践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并且总结出下述各点经验。思想解放无边无岸，群众的潜力无穷无尽

整风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也是生产大跃进的过程。今年 2 月间制订的第一次跃进计划是整风运动深入发展的初期，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实际提高 25%，劳动生产率提高 19%，上交国家利润提高 20%，当时认为已经是先进计划了。经过双反、双比运动，感到还有潜力可挖，又重新修订了第一次的跃进计划。新的跃进计划，有指标，有措施，群众信心很高，但领导干部对实现这个计划的信心并不是那么足。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传达学习以后，立刻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都认为修订了的跃进计划，不仅有保证而且还可能超过，全厂掀起了大闹技术革命的新高潮，生产新纪录有如雨后春笋，生产计划经过四次修订，比去年翻了一番多。

思想解放和潜在能力的发挥，将会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前进。为什么群众和干部的思想解放了，干劲这样大呢？概括起来有这三个原因：（1）整风运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深入人心，是鼓

<sup>101</sup> 《人民日报》1958-08-19

舞和推进前进和敢想敢说敢做的动力；（2）全国大跃进形势的推动，特别是农业丰产的奇迹，十分感动和鼓舞了工业部门的职工；（3）在工业上兄弟厂之间的互相评比、促进，原材料的紧张局面也逼迫着冶金工业必须走到前面。

现在这个厂领导同志认识到思想解放，革命干劲决不会停留在现在这个水平上，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他们现在奋斗的方法是：要为完成今年的跃进计划作出新的贡献，并且为明年更大的跃进做好准备。今年看明年，明年带今年。

#### 上步看下步，下步带上步

在大跃进的形势中，经验证明，对于领导者来说，就要根据群众的要求，经常提出新的口号、新的奋斗目标，在完成今年跃进计划的同时，就要为明年更大的跃进做好准备，要上步看下步，今年看明年，而下步也可带动上步，明年也可带动今年，步步相联，互相推动。

领导干部的思想解放，敢想敢说敢做的原因，是伟大的整风运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大跃进的形势所激发起来的群众的冲天干劲。所谓领导上根据新形势经常提出新的口号、新的奋斗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个厂四次跃进计划的修订，就是在领导和群众互相促进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群众的干劲，促进了领导思想上的解放，领导上提出的新的口号、新的奋斗目标，也组织和鼓舞着群众的干劲。

有了大跃进的思想，有了新的口号、新的奋斗目标，就要再进一步发动群众，采取新的措施，变计划为实际行动。群众的思想，跃进的指标，实现的措施，直至最后的经济效果，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使前一个时期的最高生产水平成为下一个时期的一般水平，就要有一个发动群众和组织实现措施的过程，这个过程所进行的工作，既是为了完成当前的任务，也是为今后工作做了准备。这个厂完成今年跃进计划的严重任务在第四季度，第四季度生产量占全年计划的50%以上。因此，现在的工作就要为第四季度的新的生产水平而努力，今年第四季度的水平达到了，也就基本上接近明年生产规划要求。当群众知道了1959年的奋斗目标和第二个五年奋斗目标的时候，他们的干劲就更加鼓舞起来了。

#### 相互支援，相互促进，全面跃进

企业中的生产大跃进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工厂内部，车间之间，科室之间，工人同工人之间，工人同技术人员之间，生产者和管理者之间，都在跃进，这个跃进是互相促进、互相推动的。在大跃进中要大力提倡互相协作，互相支援。任何一个薄弱环节，都会影响全厂的跃进。要树立“我为人人跃进、人人为我跃进”的整体思想。

这个厂在几次修订跃进计划和执行跃进计划的时候，都曾发生过只顾自己单位跃进，不顾别的单位跃进的现象。这些现象，是会妨害全厂跃进的，但因工厂领导上及时地注意并且很快地得到克服。从钢厂的经验看来，克服这种不健康现象的过程就是一个破本位主义思想，立集体主义思想的过程。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会分散精力，互相扯皮，互相影响工作。这个问题解决的及时，就会互相促进，全面跃进。这个厂有过这样的事实，有些生产车间为了自己的跃进，不顾产品品种，不顾合同交货，不顾下道工序，从本单位来看，好像在数量上有很大的提高，但对整体和下道工序有很大影响。这是这个厂跃进中所遇到的最头疼的一件事，但他们都及时地克服了。为了完成全年跃进计划，最近他们又研究了机修力量不足，技术措施，进行日常备件、备品，以及大、中、小修理任务中间的矛盾，积极组织了全厂机修力量的大协作，发挥了机修人员的特长，大、中、小修理的任务由车间检修的力量相互包干，使机械、动力部门的人员在这个期间内，集中精力制造和改进设备，这样做的实际效果很好。

#### 全国工人在跃进

是的，仅仅大连工厂的例子也是不够的。全国的工厂都进入了战天斗地的建设高潮！

我们再看看北京长辛店的二七车辆厂的边孝正和刘文两个小组的社会主义竞赛<sup>102</sup>。那个时期，工厂内部充满了社会主义竞赛，而且工厂之间的交流也很多。1958年，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接受了一批大锤的任务，要开山用。要得痕迹，可是厂子里以前很少做这个活，即便做，一天也做不了三四十个。打听到济南工厂做得很快后，厂子里派了两个小组的边孝正和刘文两人去学习。他们到了济南工厂，发现这边的汽锤技术就是高就是好，一天能做一百二十个，十分入迷。回到宿舍就开始研究了。边孝正和刘文一边感慨这边速度真快，一边就开始分析怎样才能继续改进工序。边想，一边画图，一边琢磨，想出来之后又在济南当地实际干干。就这样一直到了旧历除夕，两人回到了长辛店，这时候，刘文把改进方法想好了，连年都没过，当天就开始画草图了。

胎模很快就试验成功了，老工人一试比济南的还好，当天刘文一班就打出了64个。这天车间的黑板报上，鲜红夺目的字又大又整齐：刘文组高产大锤头64个！

边孝正是夜班，一进车间就听见广播员大喊：刘文组放高产啦！班产锤头64个！边孝正一听心就沸腾了，接了班就跟大伙说：今天咱们要加油啊！你们看见黑板报上写的没有？

第二天，黑板报上的字换了：边孝正组赶过刘文组，班产锤头72个！

第二天白班的刘文来了一看，立刻就急了，召集小组会：咱们要向边孝正组学习，一定要超过他们！这一班，刘文组班产90个！黑板报上马上换上刘文的记录，总厂广播站把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厂。人们议论开了：刘文就是手快！有名的快手刘嘛！也有人想：边孝正今夜能不能赶过刘文呢？第二天早晨，人们很早就向锻工车间跑去了，人们一看见黑板报，不由得叫了起来，边孝正组又大大超过刘文组了，班产锤头102个！

几天过去了，刘文组一天打了198个，边孝正组一个夜班跨进了204个，大大超过了全国产锤头最先进的工厂。任务完成了！边孝正、刘文两人一块儿给济南工厂写信，感谢那里的老师傅们。

在光辉的1958年，边孝正和刘文组还提前完成了一百四十七吨的锻铁任务。车间支部还不满足，一方面要他们作友谊竞赛，又提醒他们要互相帮助。车间后来又派了刘文到大连机车厂，大连厂的锻工是以快闻名全国的。

<sup>102</sup> 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

刘文走进大连车厂，一看车间的场景，就愣住了。只见标语牌上写着：一翻两翻不算翻，三翻四翻算一般！刘文一看到这个口号，就感到内心激动。再看别人家快速锻造时，就给迷住了，汽锤一刻不停地跳动着，配件就像流水似的一个接连一个地从锤头底下取出来。他想：人家是多么快呀！我在车间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小组差不多了，这……还差多远啦。

刘文回来以后，首先就把老式钳子改进了，接着就实行了“双边”作业，积极学习“快速锻造”，这方法一推广，很开就把产量提高了三倍。

这边，组织是又派边孝正去唐山参加锻工现场会议。边孝正回来以后，就连夜赶画“补偿杠杆”胎具草图，草图画好，让大伙儿一研究，第二天他就做了一套胎模。一试验，上下胎模错齿了，焖出的配件成了废品。边孝正一看试验失败了，急忙过去看了看焖出来的配件，接着就得上胎模上焊了四个挡头。锤头一压焖模，嘎巴一声，焊的挡头又被挤掉了。继续尝试，继续失败，直到失败了七次，终于成功。这下，把原先需要烧十几火的这个活，改变到只烧一次就成了，一下子把效率足足提高了十几倍！刘文和边孝正两个人，就这样互相竞赛，越来越快！

在大跃进中，长辛店车辆厂处处激发着工人的伟大热情。1958年之前，长辛店厂只能修理机车，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接受试制第一台机车车头，有人担心做不出来，工人说：道是人走出来的，咱修的是机车，能修就能造！有人担心困难重重，可工人克服了重重困难，原计划十一献礼，但在六月十五日，仅仅二十五天，工人就成功造出了蒸汽机车车辆头，变成了向七一献礼！两年以前，厂里还是这些人，修理一台机车也需要二十五天，现在，硬造出了一台机车！工人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写道：打破陈规和保守，鼓足干劲争上游；咱们多年的修理厂，现在制造新车头。前后仅仅廿五天，造出特号大铁牛；浑身上下全是劲，翻山越岭满自由；拉的多来跑的快，满不在乎山坡陡……六月十九日，在庆祝造出蒸汽机车的大会上，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发出新的号召：十一前试制成功内燃机车！工人们多么爱听这个消息呀！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无法停歇。工人的热情哪，燃烧着沸腾着。全厂投入了新的这场大跃进的运动中。跃进、跃进、再跃进。九月六日，一台崭新的“北京建设”牌六百匹马力的内燃机车从工厂飞奔而出，一声“呜”的欢叫，是经历了八十八天紧张战斗的工人的欢欣鼓舞！九天后，这辆机车正如投入铁路运输，第一批客人就是彭真和中央机关的同志。听！嘹亮的风笛声同级车的马达声合奏起凯歌：天上的星星再多，比不上我们的奇迹多；谁见过：六十年的老厂，制造出内燃机车！我们的时代啊，真是唱不完的赞歌！

长辛店车辆厂的一个老工人，叫吴清玉<sup>103</sup>，人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吴，在日本国民党时期，也是“拉屎磨洋工，一拉三分钟，看看不到点，回去再控控”，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就时时刻刻以厂为家，想方设法为厂里节省石棉（保温锅炉用的）。在厂里做了好模范。1957年的时候，工厂里掀起了新的生产高潮，1958年机车任务增加40%，人人都在跃进，老吴就想：我老头子也不能落后啊，像以前那种干法，就要跟不上了，得想办法。老吴就挂上心了，夜里半宿半宿地睡不着觉，闹腾得他老伴也不安起来。可是想了几天几夜，还是想不出门道来。这天，北京京剧团的名角到长辛店来演出，老吴就去了。刚迈进俱乐部门口，就看见一辆食品流动售货车。老吴心里一动，暗暗地想道：我照着这种形式，改进一下，做这么个大铁曹子车装石棉，不久解决了吗？以前用独轮车装，又慢又费劲。他马上退出俱乐部，进了工厂，首先找到一个大铁槽，又撞上了三个铁轱辘，上边还焊了两个大铁环，很快就做成一个大铁槽车。把一台车的石棉全放进去，用吊车吊尾吊就做成一个大铁槽车。把一台车的石棉全放进去，用吊车一吊就运走了。后来，老吴小组的人又继续提出，要在车间和装石棉小屋之间打一扇大门，再修个小铁道儿，这样，顺着铁轨装车到车间，然后用大吊车吊，就又省了一层劲儿。老吴一琢磨，办法好是好，就是太费钱。非二百来块钱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再想个花钱少的办法呢？老吴一抬头，看见了车间和装石棉小屋之间的墙上正开着一扇窗户，老吴就说：这样吧，咱们把窗户支起来，叫车子从窗户走，再安个大铁簸箕，车放在外边，石棉从窗户往外一扔就齐啦。这样一来，果然又快又省劲，还少花钱，连二十块钱也没用了。做成以后，大伙全乐了。老吴常说：咱们走的是群众路线，大伙力量大，困难就不怕。

后来，铁道部机车车辆修理局的局长来了，厂里的黄厂长就把老吴找去说话儿。厂长问：老吴啊，你今年多大咧？老吴笑着说：六十二咧。黄厂长说：我看你这面容不准有那么大。“瞧——莫非我还跟你说瞎话。”厂长说：这么说你到退休的年纪啦。老吴一听这话，马上急着问厂长：退休？你别跟我开玩笑，我这么棒的身子骨儿让我退休？那我不干！厂长笑嘻嘻地说：怎么？离不开家啊？老吴点点头，厂长说：那多干几年吧。厂长这么一说老吴才高兴了：这还像话。这下大家都乐了。这，就是当时老工人热火朝天干社会主义的场景！

长辛店车辆厂在跃进，全国在跃进！

洛阳机械厂在跃进！工人满怀激情，写出《工厂不在大小》(1958.06.09)：

工厂不在大小，机器不在新老，  
资金不在多少，人是宝中之宝，  
只要干劲加钻劲，破常规搞创造，  
立大志，勤用脑，三步并成一步跑，  
就可制造出拖拉机全国跑。

邯钢钢铁厂在跃进！邯钢工人会议起过去：那时候睡的是地铺，办公室是席棚子搭起来的。条件很艰苦，可大家的士气很高，没有一个人抱怨说怪话的。过去建设高炉需要五个月，现在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出铁。两个月前的今天，工地上只有一堆沙子、一堆石子、十把锹、两把釜，其他什么也没有。人，从党支书到工人，满打满算才是八个。生产计划以往按季按月计算，正在紧张施工的邯钢工地是按日按时。机装工人前天还是说月底交筑炉，昨天他们在促

<sup>103</sup> 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厂史编委会。《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年



进会上，就又表示再缩短一天；筑炉三工地的领导提了个计划，工人们一讨论，保证十五天，昨天他们又要缩短一两天。邯钢筹建处的工程师、设计、供应人员搬到工地去了：修改设计就地“划圈”。1958年6月15日，原计划“国庆节”出铁的邯钢第一座高炉提前生产出了第一炉铁水。这座高炉（1号）被命名为“跃进号”。

太原印刷厂在跃进！工人写工人的火热干劲《咱们工人日夜忙》（贾石泽）：春风吹来暖洋洋，咱们工人日夜忙。白天铁锤响叮当，晚上红火射光芒，比比谁的干劲大，看看谁的本领强。工人写干群一家《好徒弟》（邓占斌）车间来了两个好徒弟，干活积极又谦虚。他们的面孔我熟悉，那是厂长和党委书记。工人写技术革命，《破陈规坐火箭》（蓝光斗）：“双反”<sup>104</sup>胜利搞生产，钻研技术齐争先。你抛笨牛骑快马，我破陈规坐火箭。<sup>105</sup>

大庆在跃进！“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这句口号鼓舞了多少人！1958年，地质部和石油部在李四光的地质理论指导下，把石油勘探重点转移到被外国专家判定为“无原油”的东部地区。1959年9月6日，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岩中发现工业性油流。这是中国石油地质工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时值国庆10周年，这块油田因此命名为“大庆”。

1960年5月，全国30多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7万多吨器材设备，来到了茫茫的大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睡觉、过冬成问题，他们自己动手挖土打夯建“干打垒”；每天每天五两粮食，他们自己挖野菜，开荒种地，发展农副业生产；没有运输设备，他们靠人拉肩扛把60多吨的钻井设备搬到井场；没有水无法开钻，他们到河里凿冰取水，用桶拎、用盆端；没有搅拌机，为了提高泥浆比重制服井喷，他们跳进齐腰深的泥浆池用身体搅拌……他们一心要为中国“把石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就这样，仅用3年多时间，就拿下了这个大油田，使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山西钢铁厂在跃进<sup>106</sup>！太原钢铁公司、长治钢铁厂、阳泉钢铁厂的职工最近在“相互促进、共同跃进”的口号下，播起了1959年大跃进的竞赛战鼓。1月初，长治钢铁厂的职工以更大、更好、更全面地提前完成今年跃进计划为条件，向太钢职工挑战。这个工厂的炼铁、轧钢、耐火、炼焦、炼钢等车间和科室部门与食堂等单位，也分别向太钢的同工种单位发出了挑战书。太原钢铁公司各厂、车间职工在接到挑战书以后，纷纷举行座谈，提出新的计划指标和竞赛条件，向对方应战。这个公司的焦化厂炼焦车间，为了搞好厂际竞赛，全车间还开展了班与班、组与组的竞赛。长治钢铁厂的职工接到应战书以后，决定大搞技术革命，挖掘生产潜力，保证完成自己的挑战计划。阳泉钢铁厂的职工也参加了竞赛。他们的口号是：“全厂职工总动员，大干巧干五九年。钢铁产量加三番，全年指标九月完。生产建设样样好，超过长钢和太钢。”为了搞好竞赛，“苦干加巧干，以巧胜对方”。三个厂的许多车间、小组都在大搞技术革命，挖掘生产潜力。长治钢铁厂在提出竞赛挑战以后，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技术革命，全厂工人提出了四千一百零七条合理化建议，并且已有一千八百五十二条应用到生产中。轧钢车间职工用废料制成了正围盘和跑钢的槽架子代替人工喂钢，提高了生产效率10%，这样一年即可多产钢材六千七百五十吨。炼钢车间职工也采取措施，使炼钢的合格率由过去98%提高到百分之百。耐火材料车间的职工，针对炼钢流钢砖极端缺乏的情况，创造了用水玻璃代替烧窑的先进方法，制成了水玻璃火砖，全年可节约一万八千个劳动日和三千吨原煤，更重要的是适应了炼钢生产的需求。炼焦车间的职工制成了炼焦自动化提门机，减轻了工人劳动强度，为增产焦炭创造了条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北京工厂在跃进<sup>107</sup>！北京有一个电器厂，在苏联帮助之下，建成为具有世界第一流最新技术的工厂。大跃进中，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前完成了原计划到一九六二年才能完成的任务，并且已经生产了原计划没有列入的超小型管和半导体。

江苏、沈阳、重庆工厂在跃进<sup>108</sup>。1959年9月20日，江苏省十个较大城市已有四百六十五个工厂提前完成9月份的生产计划。沈阳市已有七十五个工厂提前实现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保证，在9月份都先后提前完成了第三季度的产值和产量计划。重庆市六十万职工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对手竞赛，各行各业的生产水平飞跃上升，捷报频传。9月份前二十天，全市市属工业系统的总产值比8月份同期猛增了45.52%。

武汉化工工业在跃进<sup>109</sup>！

上海工业在跃进<sup>110</sup>！

马鞍上钢铁厂在跃进<sup>111</sup>！

包钢在跃进<sup>112</sup>！

成都量具刀具厂在跃进<sup>113</sup>！

北京市铁路局在跃进<sup>114</sup>！

<sup>104</sup> 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3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保守反浪费的指示》，作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所提的整风的第三个阶段，成为大跃进的出发点之一。

<sup>105</sup> 《人民日报》1958年6月12日

<sup>106</sup> 《人民日报》1959-02-04

<sup>107</sup> 《人民日报》1959-05-08

<sup>108</sup> 《人民日报》1959-09-24

<sup>109</sup> 《人民日报》1959-04-25

<sup>110</sup> 《人民日报》1958-11-14

<sup>111</sup> 《人民日报》1960-04-08

<sup>112</sup> 《人民日报》1959-09-27

<sup>113</sup> 《人民日报》1959-11-01

<sup>114</sup> 《人民日报》1960-04-11

太多太多了！

大跃进极大促进了工厂的技术革新，极大地促进了工人的生产热情，如果有人还不相信这个，那么，请你走到任何一个老工业区，去访谈经历过那个时期的老工人，他们的切身说法，一定让每个人都感慨万千、甚至热泪盈眶！

### 3、市民在跃进

大跃进属于农民，属于工人，也属于广大的市民。从大炼钢铁开始，无论是很少出门的城市妇女、职工家属，还是早已退休的职工，都无法抑制自己的热情，投入这场伟大的运动。

我们来看看 2009 年《新京报》报道的韩玉竹的故事<sup>115</sup>。韩玉竹是一名普通的北京女性，1958 年，韩玉竹 25 岁，但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韩玉竹很少走出家门。丈夫外出工作，她在家照顾孩子，打扫，缝补，洗洗涮涮。

1958 年 8 月 17 日，这一天开始，中央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作为团员的韩玉竹走出了家门，成了一名炼钢的积极分子。同一年，她参加了工作，报了扫盲识字班。

1958 年，对于韩玉竹和她的家庭来说，都是一道分水岭。从此，韩玉竹走出厨房，撑起了这个家的半边天。

#### 扔下吃奶孩子炼钢

1958 年，韩玉竹家里的生活比较艰苦，家里靠老伴每个月赚的 50 多元过活。经常上街拣点菜叶泡饭吃。

大炼钢铁期间，天还没亮，韩玉竹就掀开被窝起床，在简单的洗漱之后，随便吃点东西，便抛下孩子们炼钢铁去了。

韩玉竹的孩子最大的不过 6 岁，最小的才几个月大。妈妈炼钢去了以后，他们就哭。邻居们循着孩子的哭声而来，轮流帮忙照顾起孩子。孩子脏了，张家给换个衣裳；孩子饿了，王家给找来了吃的。

韩玉竹晚上回到家中，经常发现孩子穿着邻居们做的衣裳，“打扮得跟个小洋人似的。”

#### 为争先进砸家里箱锁

“当时我是个团员，怎么也不能落后啊。”韩玉竹回忆，当时炼钢的材料不够，她就跑回家，先把不用的锅、盆捐出去，抡起一块石头，咣的一下就把箱子上的铜锁片给砸了下来，然后拎起来就往铁炉子的地方跑。

丈夫知道了，一点也不生气。“那时候为了炼钢，大家都争先恐后呢。”她把家里的几把锁砸了以后，又打起了炉子用的“拔火罐”的主意，和邻居一商量，便决定两家共用一个拔火罐。她家的拔火罐就进了炼钢炉。

此后，做饭的时候，她就往邻居家跑。“还增加了邻里的感情呢。”

她后来给儿女们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孩子们会问，家里没了锁，东西不丢吗？

“那时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家里没有一把锁，但东西从未丢过。”韩玉竹每次谈起这件事，她的眼睛就会望向远方。

她说，过去嘛，日子过得紧，有时候还吃不饱，但风气好得很呢。

#### 夫妻黑白轮班炼钢

韩玉竹的丈夫蒿永怀，比她大 6 岁，在一家厂子做电工，白天，他外出工作。下班以后，还要赶到单位去炼钢铁，上头给下达了任务。丈夫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每天只睡几个小时。

当时他们采用的是土法炼钢，土高炉的制作较简单。

“在里面搁一些耐火砖，外面搁一些普通砖，再用一些石头，一堆就起来了。一个土高炉往往是 10 个人一拨，轮流炼钢。土高炉外面还设一个大风箱，需要一个人不停的拉，有人往里面扔生铁，还要有人负责燃料。”

每到深夜，许多人已经入睡，负责拉风箱的蒿永怀却没有停歇，他不时的抬头看着被高炉映红了的天空。那段时间，北京城没有夜晚。

蒿大爷说，那时他不觉得累。他们要“超英赶美”，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

妻子白天炼钢铁，丈夫晚上炼钢铁。他们在家一起的时间很短。偶尔，夫妻二人会一比谁炼了多少钢。

我撑起半边天

1958 年，“妇女解放”的口号提出已有时日，但外面还是男人的世界，偶尔有妇女骑着自行车去上班，但街上的人都会投以异样的眼光。

韩玉竹认为，大炼钢铁改变了这一切。男女都去炼钢，都参加劳动，自然没有人互相说了，也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了。

韩玉竹说，炼钢让她走出了家门，不再围着锅台转，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从此以后，家里不再是丈夫一个人担着，我算是撑起了这个家庭的半边天。”

韩玉竹说，她在劳动中体会到了什么叫平等。

#### 为认字租武侠小说

困难，其实没有什么，想要克服，也很容易。

走出家门以后，由于没有文化，韩玉竹感觉到处处碰壁。于是，读书识字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丈夫白天上班，晚上炼钢，自己也要炼钢，三个孩子需要照顾……即使这样，韩玉竹还是决定要认字。

1958 年底，韩玉竹报名参加了一个业余识字班。白天炼完钢，晚上就抱着几个月大的孩子去上夜校。

在这个培训班上，她掌握了大部分常用的汉字。

丈夫蒿永怀喜欢听书，韩玉竹就从外面租来了一堆武侠小说，那时租书便宜，只要几分钱。

一有时间，韩玉竹就给丈夫读武侠小说。这些武侠小说往往都很厚，动辄几十万字，韩玉竹就这样磕磕巴巴的给

<sup>115</sup> 《1958 年大跃进：民众捐出锅盆大炼钢铁》。《新京报》2009 年 08 月 14 日

读下来了。书中有不认识的字，韩玉竹就先顺过去，事后再查字典，久而久之，韩玉竹的阅读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那段时间里，韩玉竹给丈夫读过的武侠书有几十本，如《七侠五义》、《三剑客》、《蜀山剑侠》等等。

现在，韩玉竹要读好些份报纸。她是家里的消息灵通人士。儿孙们学习遇到困难，打退堂鼓的时候，她就给他们讲1958年炼钢、识字的艰辛。

### 能够理解当年炼钢

许多年以后，韩玉竹通过一些文献，知道了当年他们炼的钢铁是不合格的，还必须回到大高炉里面重新炼。或多或少会感到遗憾，他们把家里一些好端端的铁具，比如锅盆，送去炼成了废铁，给自己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我们那一代人能够理解。”韩玉竹说，“我们今天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去否定或者肯定。”韩玉竹说，她常常教育她的儿孙们，今天的幸福是老一辈的人艰难探索和勤奋努力得来的。

如今，韩玉竹和蒿永怀都已经上了年纪，但老两口的身体都很硬朗，蒿永怀还是他们社区的志愿者，天一亮，他就戴着红袖章，顺着胡同巡逻去了。碰到邻居，他一般都会乐呵呵的打个招呼。

有时他们遛弯路过老街道办时，看到当年堆放土高炉炼钢铁的地方，总能想起热火朝天的1958年。

还有一个职工家属的代表例子也很能说明当时的情况。职工家属高凤琴谈到：<sup>116</sup>

在去年大跃进中，职工家属苦干苦钻，参加各种生产，很多人由外行变成内行，给国家创造了二十万元的财富

几年来，我们工厂的家属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党的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方针，在为工厂生产服务，搞好家庭互助和家庭“五好”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在一九五八年全面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厂家属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厂职工大闹技术革命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氮肥设备，在劳动模范尉凤英用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作量等动人事迹的影响和鼓舞下，进一步克服了自卑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干劲冲天，大家决心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积极地参加了工厂大跃进中我们家属可以参加的各项劳动；举办了各种福利事业，使家属从琐碎的家务劳动里解放出来，“由锅台转走上了机器转”。到现在为止我们工厂的家属有一千零九十八名当了工厂的合同工，有七百多名在家属办的工厂里当工人，有九百多名参加了福利行业。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是我们职工家属的一件大喜事。现在把我厂家属工作一年来的变化情况，向大会作个简单的汇报。

当去年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后，我们家属也不落后，也同样的参加了大跃进运动，迅速的行动起来服从组织分配，党要我们到那里我们就到那里，叫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例如：当工厂的某些原材料发生了困难的时候，全厂展开了“五挖运动”。我们家属立刻响应党委的号召，掀起了一个以挖钢铁为主的挖宝运动。大家积极性很高，从六、七岁的儿童到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参加了人人争先、支援生产。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挖出钢铁二百五十四吨半，五金十一吨，耐火砖一千吨，木柴十二万斤，红砖七十万块，还有许多其他物资，仅钢、铁、铜、耐火砖等几项就给国家节约了四万五千四百一十二元的财富。又如：我们为了解决工厂劳动力不足的困难，组织家属帮助卸车，只用了四十分钟就卸完了一车皮砖，没有损坏一块，比男工完成的质量还好，受到领导上的表扬。

党发出全党全民办工业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号召以后，我们在党委领导下，积极的举办了工厂，参加了工业生产劳动。党委为了领导我们把工厂办好，首先召开了工厂和家属干部会议，进行了辩论，明确了不少认识，并且确定了家属办工业必须大工厂帮助小工厂，小工厂为大工厂服务的原则。这就给了我们很大支持和鼓舞，因此，我们干劲很足，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提出要因陋就简，白手起家，不向国家要钱，不向工厂要设备，自力更生的把生产搞起来。厂工会还组织全厂职工家属举行了比思想、比干劲、比办法的比武大会。职工家属干的热火朝天，不分昼夜的张罗，到处找废料、废物资、找活源，不懂的就去请教工人，不会的就请工人帮助。职工们对家属办工业也给了很大支援，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帮助我们学习技术、盖房子、作计划。就这样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职工们的帮助下，用我们自己拣来的旧废料盖起了厂房、食堂和托儿所十六处，共一千一百四十四平方公尺。举办了十一个小工厂（包括纸袋子、五金、铸造、水泥、木箱、纸盒、草袋子、缝纫等工厂）。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学会了木工、铸工、瓦工、车工、水泥工等技术，由外行变成了内行，并且给国家创造了二十万元的财富。职工们说：“家属们真能干，可不能再说家属光会带孩子、搞家务了。”

家属参加社会劳动以后，摆脱家务和小孩的牵累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采取了大家动手，先分散后集中的方法，自办了一百三十四托儿所，十五个食堂，四处服务站，基本上解决了家属参加社会劳动的困难。在办福利事业上，我们反对了“伸手要钱，你办我享”的依赖思想，采取因陋就简，因地制宜，不花钱或少花钱办好事的作法办起来的。例如盖食堂所用的木料，砖瓦和人工，直到吃饭用的家具等，完全是家属自己挖、拣、借、献的。托儿所用的房子都是家属自愿献的，白天做托儿所，晚上做宿舍，房子的女主人就是保育员。这些保育员都是我们根据思想好、热爱孩子的家属里选举出来的。她们耐心的关照孩子，让孩子们能吃好、玩好、睡好，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生活习惯，保证了孩子妈妈安心工作、学习。托儿所用的一切家具也都是孩子的妈妈和家属们拿来的。

服务站给家属解决了洗、缝、拆、补和代买生活日用品等困难。

由于党领导我们妇女从琐碎的家务劳动走上了社会劳动，公社化给我们解决了参加社会劳动的困难，使家属在经济地位上，精神面貌上都起了很大变化。

在家庭生活和经济地位方面，过去被人认为是吃人家饭的，自己在心里总觉得理屈。现在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提高了家庭生活水平。根据八十六名参加社会劳动的家属调查，家庭人口有四百八十人，原来每人每月平均生活费是十三元，现在提高到十七点三五元。工厂救济费的支出也大大的减少了。很多经常困难户也不用救济了。

<sup>116</sup> 《人民日报》1959-04-30

---

共同劳动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

家属的精神面貌也和过去大不相同。在政治上迫切要求进步，不少的人提出争取入党。例如合同工王丽英，过去是第四家属委员会委员，入厂后生产积极，听从组织分配，超额完成任务，并能帮助别人，去年底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她提出不骄不傲，继续锻炼自己，争取达到预备党员的水平。像这样的家属不是个别的。二十二车间一百八十名合同工里就有三十七名是先进生产者和红旗手。在家属办的工厂劳动的家属们干劲很足，以厂为家，早来晚走。在“三八”节大会上她们和工厂的职工比干劲，她们提出一年任务半年完。小五金厂做“铸顶子”，三月份计划指标是一千七百二十七公斤，实际完成了三千七百三十四公斤。过去家属到一起就扯东家长、西家短，因此，闹不团结。现在到一起就谈生产、学习。

在家庭关系方面也有了变化，加强了婆媳之间、夫妻之间以及邻里之间的团结，闹家庭纠纷和闹邻里纠纷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在去年年初全厂婆媳不合的还有五十一户，现在已有四十二户改变了，建立了互相尊敬、互相帮助新的家庭关系。例如孟淑琴参加社会劳动后，主动的和婆婆说话，每月给婆婆几块零花钱，还常给老人买点吃的东西，老人很受感动，主动的带孩子照料家务，变成了和睦家庭。老太太到处说：“参加生产太好了，把我们家庭关系也闹好了，这都是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

长辛店车辆厂退休职工的心也与大跃进共同跳动。工厂里造机车的消息传到了退休老锻工张顺的耳朵里后，老张顺又惊又喜。晚上他兴冲冲地从农业社里的小工厂跑回家去，见到老伴就说：“厂里造火车头啦……”老伴就说：“看你这股唠叨劲儿，当了一辈子工人，没见过火车头？有什么新奇的。”

“哎！你懂得什么！这可不是小事，长辛店工厂开工六十年，还没造出一台机车来，西太后坐的龙车还是外国货改造的呢！”

老张顺自从二十多岁进厂以后，四十年来他一直修着外国牌子的火车头，直到解放后，才听说国内也能造机车了。可是现在自己的工厂能造火车头了，怎么能不叫老张顺兴奋！

自从听见这消息以后，他又像刚退休那些日子一样，听见厂里汽笛响，心里就不安了，总像什么东西拉他的心似的，天天老惦记着厂里的事，总想进厂来看看。可是自从退休以后，他就一直在家乡的农业社里搞工业，这时，农业社里也在大跃进，正在闹深耕密植高产运动，他研究试制的密植小麦播种机还没弄完，一直也抽不出身来。

这天晚上，张顺睡得迷迷糊糊，忽然听见有人叫门：“张师傅，张师傅！”张顺疑惑之际是做梦，翻个身没有作声。老伴被敲门声惊醒了，问：睡呀？

“我！张世荣！”

张世荣是锻工车间的工具员，张顺一听见是他，心想糟糕，莫非是厂里汽锤出了毛病了？猛地坐了起来，披上衣服下了炕，开开门，急忙问道：“什么事这么急，是汽锤出了毛病吧？”

“可不是吗！总是劲不足，昨天夜里打新机车尾梁，可真有点麻烦，着玩意儿跟盖房的房梁似的，没他机车造不成啊，大伙儿都急得不得了。向厂长说了，还是请您明天清早进厂去看看，出点高招儿……”

“哎！真是，为什么不早给我捎个信来，真是……”

他哪能等到天明，连忙回到屋里，穿好了衣服，腿上自行车就出了家门。

东方天上微微有些发白，天还满是星星。他绕过了山坡，就看见工厂里电焊弧光一阵阵闪着蓝光，铆钉枪放出熟悉的“噗！噗！”的响声，就像在那儿招呼他。

到了工厂门口，天已经亮了，只见厂门口挂着两条长虹似的巨大标语，一条是：“破迷信、争上游，厂老干劲足，苦战三十天，制出新车头”，一条是：“大家齐心干，实现总路线，制成新车头，‘七一’把礼献”。横在厂门上边的是一幅工人高举红旗，跨巨龙，赶过英国约翰牛的彩色画，使人看了起心里高兴。

老张顺一进厂，直奔锻工车间。他刚一进门，车间里的工友们齐声向他打招呼：“啊！张师傅来了！”大家像是见了亲人似的，把老张顺围了起来，问长问短，弄得老张顺不知怎样是好。他忙问：“那尾梁打得怎样了？”

带班干活的李伟雄说：“就是汽锤力量太小，打不动活儿，以前咱们最大干过五百公斤的话，这尾梁是一千三百公斤重。我们大家着急了一夜，刚才研究了一个办法，把砧子拆了，换上块垫铁，加大汽锤冲程，试打了一根。”

老张顺一听，说：“好啊！我一路上也正想这么个主意。看！赶我走到，你们倒抢在头里把问题解决了。得！让我帮着你们再打一打看看！”说着就赶忙脱掉制服褂儿，带上老花镜，穿着一件白衬衣，挽起袖口要干活儿。

这时车间党支部书记老高、主任老赵急忙跑上去，拦着张顺：“张师傅，别干了，您出点主意，指点指点就行了。”

“什么？你们也嫌我老了？放心吧，我浑身有的是劲儿，我别的干不了，也得给咱们头一台车出把力呀。”

烧铁炉里喷出熊熊的火焰，第二根尾梁的料烧成了，老张顺又拿起了当年打道夹板的猛劲，亲自和大家一起干起来。

老张顺又圆又胖的脸，一霎时被红铁烤红了，他在厂里干了四十多年，从来没有干过这么大的活呀！乍一干，胳膊真有点发颤，眼睛烤得发干，嗓子里像冒了烟似的，只见那方铁随着哐哐的汽锤声驯服地改变着形状。老张顺身上的汗水直往下淌，白小褂像水洗了一样，贴在身上，但是他一点声色不变。

这时主任老赵走过来感激地说：“张师傅，您辛苦了，早点回家歇歇吧，剩下的活儿留给年青人干吧。”

老张顺不高兴的说：“怎么，新造机车这台戏不让我唱啊！我不累，有了总路线越干越有劲……”

“不是，我是怕您身子吃不消。”赵主任解释着。

“不要紧，铁匠的身子比钢还硬。”他说说着伸出胳膊来，冲大伙挥动着说：“瞧这肉比你们还硬棒，干他三天三夜都不能怯阵，要不怎么称得起是铁匠。”说得大伙都笑了起来。

大家看老张顺这股干劲，个个像打了强心针一样，精神奋发，浑身都是劲。从早晨一直干到深夜十二点了，尾梁的模样才打出来。这时厂长也赶到车间，一眼就看到老张顺，关心地上前催他去睡觉。可是老张顺笑着说：

“不累呀！你放心吧。”等厂长刚走开，他又和小伙子们干起来了。时钟敲过两点，尾梁打成了。老张顺这才擦着头顶上的汗珠微笑了。

#### 全国市民在跃进

十三陵水库工程首都人民在建设上思想上大跃进的标志。工程原来是安排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的，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为了及早免除水患，扩大郊区农田灌溉面积，北京市决定把工期提前。首都人民以冲天的干劲响应了这个号召，用短短一百六十天的时间，完成了一座一百八十万土方的大坝建筑任务，修起了一个库容比颐和园内昆明湖还要大二十倍的十三陵水库。这真是一项空前快速的创举！<sup>117</sup>

大跃进使退休的工人变得年轻起来<sup>118</sup>，上海江南造船厂的一名退休职工和十几位退休的老工人参加了炼钢工作，有的帮助职工家属搞副业生产，有的培训艺徒，做些轻便的工作。

#### 4、妇女地位大解放

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广大妇女就走出家庭，参与到社会劳动中去，妇女地位明显提高。而在大跃进形势下，“妇女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得好”、“人人都生产，户户无闲人”等口号激励着广大妇女大规模地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形成了建国以来妇女第一次全方位参与经济的高潮，是妇女地位的一次大解放！1958年5月，毛主席视察十三陵水库，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全民办工业浪潮兴起，四川妇女豪迈的提出了“到处机器响，工厂遍街巷，家家忙生产，户户无闲人”的口号，全省1958年13个专区统计，仅妇女办的肥料、纤维、饲料加工、水泥、农具修配厂就有42万多个。到1960年四川省女职工达76万，比1957年增加2倍多。工厂女工开展“巧姑娘”竞赛运动，重庆611厂细纱值车女工革新成功细纱接头操作法，威远棉麻绳厂女工试制半机械化放绳成功，提高工效5倍以上<sup>119</sup>。1958年以来，全国女职工人数猛增到700多万，比解放前增加了十倍多。各地也出现了形式多样的妇女商店、妇女工厂、妇女车间、妇女旅社等“妇女号”组织。广大女职工还积极参加技术革新，同男职工一道向半机械化、机械化和自动化进军。在“人人炼钢，钢炼人人”口号鼓舞下，广大城乡妇女积极参加到大炼钢铁的队伍中。许多地方将妇女炼钢炉冠以“穆桂英铁炉”、“赵一曼炉”、“刘胡兰炉”、“花木兰炉”、“卫星炉”、“三八炉”等称号，不分昼夜地生产。1958年9月，湖南省就有150万妇女奋战在钢铁前线，参加了采矿、运输、挖煤、冶炼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截至10月25日，吉林省35个市、县中，有424865名妇女参加了钢铁生产，建成有妇女参加的炉（土、洋炉）4875座。城镇的青壮年妇女被抽出来和农村妇女一起组成炼钢远征军、钢铁运输队。据河南省许昌市和临颖、郾城、西华、鄢陵、扶沟等县的统计，第一批远征军中就有妇女10,000余人。一些基建单位也开始大量招收女工，有的还组建了妇女建筑突击队，甚至出现了井下女子采矿组。钢铁卫星也竞相升天，就连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架起了炼钢炉，号称最多时一天竟也练出155公斤钢。<sup>120</sup>

农村中妇女也获得解放，由于“已经办起了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减少了妇女家务劳动，社员们集体吃饭，平均每人每天比过去节省三个半小时。农村妇女从辅助劳动力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主力军，凡是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几乎都参加了人民公社的各项劳动。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到“夺高产”运动中，承担了劈山引水、修筑大坝、开渠、修建水库、深翻土地、积肥等繁重的劳动任务。河南、湖北、广西、陕西等省调查显示，“大跃进”时期，妇女承担了80%的积肥和麦田管理任务；在兴修水利运动中，妇女占全部劳动力的30—40%。为了实现农作物高产，妇女们还深翻土地、大搞试验田。高产“卫星”也不断升天，如，《妇女工作》登载了一则题为“豆角如南瓜”的消息，又称，湖北谷城县青年创下小麦亩产5466斤的高额丰产奇迹。劳动基础较好的妇女掌握了犁田、配种等比较复杂的农业技术。1958年，据贵州、河北、江西、浙江四省113个县的统计，采用各种办法，训练了女式农具手349,680人。妇女们还积极参加农具改革运动。安徽省霍邱县石店区吴及乡陈瑞明设计的“自动拉力倒土车”，使工作效率比原来的滑车提高了7.2倍<sup>121</sup>。据辽宁省不完全统计，1957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妇女为118.92万人，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35%，1958年为162.25万人，占妇女劳动力总数53.2%，1960年为206万多人，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60.6%；妇女参加劳动的人数占全体参加农业劳动的人数比例，从1957年23.5%提高到1960年的46.5%；妇女的投工量一般占总用工量的30%左右，高的地方达40%，妇女的劳动分约占工分总数的1/4。春耕开始前大部分男劳力抽去搞大中型水利工程，小型水利工程与积肥任务都由妇女担任。曲靖地区的妇女担任了90%的小型水利工程。农村妇女也积极投入“红勤巧俭”竞赛，开展妇女收割能手和练武比巧竞赛。江都县幸福河上的女民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创造革新工具21种，制成工具854种，提高工效4~12倍<sup>122</sup>。1957年冬到1958年春，妇女出勤一般占妇女劳动力的90%以上，许多地区已达100%。

在“大跃进”中妇女也因为一些极“左”的错误付出了一些代价。广大妇女缺乏应有的劳动保护：有的在妇女炼铁炉、炼铁厂等“妇女号”中超负荷地日夜奋战；有的从事着井下挖煤、运煤等繁重的体力劳动；有的妇女孕期仍然在有毒的劳动条件下工作。中央开始纠“左”后，全国妇联也很快于1958年12月21日至23日召开了省、市、自治

<sup>117</sup> 《人民日报》1958-07-02

<sup>118</sup> 《人民日报》1959-05-04

<sup>119</sup> 刘恒. “大跃进”运动中的四川妇女. 四川党史, 1994 (5)

<sup>120</sup> 刘维芳. 中国妇女运动“大跃进”始末.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8年05期

<sup>121</sup> 刘维芳. 中国妇女运动“大跃进”始末.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8年05期

<sup>122</sup> 郭省娟. 大跃进时期农村妇女劳动简述.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7 (5)



区妇联主任会议，贯彻中央精神，解决妇女在参加生产和组织生活中出现的“左”倾偏差。各地妇联相继采取一系列调整、纠“左”的措施：在生产中强调关心妇女健康，合理安排妇女劳动力；加强对妇女的“四期”保护，努力贯彻妇女经期、孕期、哺乳期的“三调三不调”即：调干不调湿、调轻不调重、调近不调远政策。对大炼钢铁运动中的妇女炼铁炉、炼铁厂进行统一安排。调整井下挖煤、运煤女工的工种，使妇女不再从事不适合其生理特点的劳动。虽然出现过一些问题，但与大跃进中妇女地位的提高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正是大跃进促进的妇幼事业的进步。<sup>123</sup>

到1959年3月，全国农村产院已达到十万多所，床位约有四十多万张，其中大部分是1958年8月以后新建的。产院的发展对于推广新法接生和保障妇幼健康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全国农村中基本上普及了新法接生。产院的建立，为推行孕期检查创造了条件，使难产大大减少。陕西省三原县有一个妇女过去怀过两胎，由于没有进行孕期检查，不正的胎位不能及早纠正，因此两胎都是横产，孩子都死了。1958年这个妇女又怀了孕，由于当地设立了产院，她接受了孕期检查，纠正了胎位，顺利地生了一个孩子。人民公社成立后，农村发展了大批农村产院，公社社员自己为产院调整和修建了房屋，公社对产妇住院期间的生活有适当照顾，把细粮和富有营养的副食品优先分配给产妇吃。许多产院都从发展生产和保护母婴健康出发制定了各种规章。例如甘肃省西礼县石峡乡在产院附近举办产院副业加工厂，包括缝纫和饲养鸡、鸭、兔、蜂等，孕妇可以在产前住院参加轻微劳动，既有利于生产，又促进了新法接生的普及和妇女劳动保护政策的贯彻。河南省登封县大冶镇产院规定在产妇出院后接受婴孩日托。一直托到婴儿满五个月。在婴孩寄托期间，母亲可以由生产单位分配在产院附近参加生产劳动，白天按时到产院给孩子喂奶，晚上把婴儿接回家去。

城市产院在原来较好的基础上也有了发展。广州等城市已基本普及了产妇住院生产。好些城市的产院和妇幼保健机构都增设了简易产床，使更多的产妇得到了住院生产的机会。

妇幼卫生事业的另一重要方面——托儿所和幼儿园也有很大发展。据估计，全国农村入托儿童约占学龄前儿童的60%左右。这些托儿所和幼儿园根据有利于生产和便利群众的原则，采取了灵活的方式。大跃进以来，过去一些临时的、简便的托儿组织都转变为常设的托儿机构。

在紧张的生产建设中，有些地区加强了妇女劳动保护工作，因而减少或防止了流产以及妇科病的发生，增进了妇女的健康，提高了妇女出勤率。山西省在开展这项工作的时候，首先利用各种场合，采取各种形式，以活人活事向群众宣传妇女劳动保护的重要意义和妇女劳动卫生知识；同时，在安排劳动力的时候，普遍照顾到妇女的特点实行了妇女在月经期间不做重活，不下冷水；孕期妇女作轻活；哺乳期间的妇女作近处的活，便于给孩子喂乳。山西省晋城县三家店等地还在产院附近设置妇女卫生室，为经期妇女免费供给清洁的月经纸。有的县市在学校和工厂中也设置了妇女卫生室。山西省实行妇女劳动保护的各種措施以后，减少了妇女早产、流产、子宫脱垂和经期出血过多现象，妇女出勤率比过去有显著的提高。山东省有些地方创造了在田间劳动时设置临时女厕所的办法，使妇女在野外劳动中敢于多喝开水，保护妇女健康，提高了劳动力。虽然这是一项简单的措施，却解决了妇女劳动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1962年拍摄的电影《李双双》或许可以作为大跃进时期妇女地位的象征，电影反映了一个爱“管闲事”、口齿伶俐、勇于跟落后现象作斗争的妇女形象，成为当时妇女的一个模范。李双双，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之后的大跃进的时代，才会第一次在中国的舞台上出现。

## 5、科教文卫事业在跃进

大跃进也大大促进了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科学研究方面，大跃进中突出了科学研究必须与生产结合，而跃进的精神克服了原科研人员的暮气，从而促进了一大批科研成果的诞生。湖南大学建筑教研组在1956年科研规划内就选定了“湖南民间建筑调查研究”一题，当时只由少数教师断断续续在宁乡县作了两次调查工作，事经两年，一无结果，直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发动同学，深入到十三个县市进行调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便完成了过去两年多都没有完成的科研任务。这一年内该校共完成科研题目一百四十九个，为过去五年来完成题目总数二十九个的五点一倍，在质量上比过去也有显著的变化。突出的变化是：联系实际，结合祖国的建设事业，一改过去从个人兴趣出发，“为科学而科学”既脱离实际又离开生产的局面。<sup>124</sup>清华大学在大跃进期间师生奋战两个月，用土办法建成了一座二千瓩农村试验性的综合利用电站。这座电站不仅建设速度快（普通同类型电站需要十四个月建成），而且节省了大量投资，一般同类型电站每瓩发电容量需要投资八百到一千元，这个电站仅合三百元。该校动力系汽车拖拉机发动机专业与燃气轮机专业的教师和部分毕业班的学生，接受了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委托，在短短十五天的时间内完成了一台新颖的机车用三千马力自由活塞——燃气轮机机组的设计，师生充分发挥了苦干实干的精神，在炎热的天气，每天汗流浹背地坚持工作十几小时。特别是最后几天，好多学生都是几昼夜不离图桌。<sup>125</sup>

教育事业方面，大跃进提倡思想革命，反对旧教育体制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对立起来，以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辽宁省的康平中学一年内一镐一镐地开垦了一千六百亩荒。开荒之初，地冻得很坚硬，刨一下震得手又疼又麻，但这些并未吓倒青年学生，反而干劲越来越大。计划一个月的活，结果仅用半个月时间就开了一千六百亩地。有的学生说：“过去，我认为向工人，农民没啥可学的，这种想法错了。事实上，工人、农民很多高贵品质，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在劳动中，很多学生向工人农民拜师学艺，而工人农民也非常耐心教导他们帮助他们解决技术上的各种困难。关系非常融洽。同时，教育和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许多地方在学校里搞机械、冶炼、锻造、化工、木工等

<sup>123</sup> 《人民日报》1959-03-03

<sup>124</sup> 《人民日报》1960-04-11

<sup>125</sup> 《人民日报》1958-10-08

等小工厂，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根据辽宁省五十几个学校的了解，过去有的学生学习植物课把它背得很熟，但一接触实际连包米和高粱（二、三寸高的）都分辨不清，甚至韭菜和小麦都分不清，更不用说实际操作了。通过勤工俭学使学生学会了找矿、炼钢、炼铁、炼油、造机器、产化肥、烧砖、晒盐、种田、养蚕、饲养牧畜家禽等多种实际知识和技术。而一旦破除了迷信权威的思想，许多学生开动脑筋搞科研，甚至更有航校还试制出飞机一架。大学里更造出尖端的有国际水平的机械来。另外，学生通过参加生产劳动，还提高了学生的体质，据大连八中两个班的调查，一个班平均体重增九点九斤，另一个班则平均增十二点四斤。等等。<sup>126</sup>

文化事业方面。以美术事业为例，建国十周年的首都十大建筑的美术工作，可以说是美术事业大跃进的一个缩影。这个工作从开始在美术界就掀起了一个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全国的美术家、民间艺人、工人、美术院校的青年学生们都理解十大建筑的美术工作是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有的同志为了完成任务甚至废寝忘餐。有的同志从来没有画过这么大的画，也没有这样大的画笔，就用根棍子绑上画笔来作画。在工作中，美术家和建筑师相结合，工艺美术家和民间艺人相结合，设计师和工人相结合，老师和青年学生相结合，这些方面生动的例子很多。创作过程大都采取了集体讨论研究和个人创造精神相结合的方法，许多设计和作品常常经过反复的讨论，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几乎每一件创作和工艺品，每一项设计没有一个人敢于说是他个人的创作，实际上都是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共产主义协作精神的产物。除了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创作之外，另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方面就是工农兵群众美术创作的飞跃发展。1958年春天，江苏邳县和河北束鹿的农民，以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精神，带头创作了大量的壁画，逐渐形成了全国农村壁画创作的高潮。工人和战士的美术创作，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迅速的发展和提高。参加创作的有农村的老大娘，有小学生，有炼钢工人，有将军和士兵。工农兵群众从此不仅是美术作品的欣赏者，自己也拿起了画笔成为艺术的创造者；这是亘古未有的新鲜事物！广东开平、浙江临海和江苏等地的人民公社农民们还开办了版画训练班，出版了自己的版画选集。<sup>127</sup>美术事业如此，电影事业也是如此，从1949年到大跃进以前的1957年，我国一共只有十个电影制片厂（其中故事片厂六个），摄影棚十九座，到现在，全国已经有三十三个电影制片厂（其中故事片厂十一个），故事片厂的摄影棚二十七座。从放映单位来说，1949年全国只有六百多座电影院，放映队一个也没有，到1957年底，放映单位发展到九千九百六十五个，到1959年底，据初步统计已达到一万四千五百个左右。由于放映网的发展，人民群众看电影的机会就有了很大的增长，1957年全国电影观众十七亿五千万人次，1959年一跃而达到四十亿五千万人次。也就是说，大跃进以来的两年时间，达到了过去用八年时间才能达到的数字。<sup>128</sup>电影事业也贯彻了艺术服务人民群众的方针，上海海电影制片公司摄制了一批反映当前大跃进中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新艺术片，如“钢人铁马”、“爱厂如家”、“巨浪”、“黄宝妹”、“英雄赶派克”、“二十天革个命”、“大跃进中的小主人”等影片，所表现的就都是上海人民所熟知的新人新事。有的影片是工人农民上银幕，自己演自己。如表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纺织女工黄宝妹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影片，就是原班人马上银幕。有的影片部分角色由群众自演，部分角色由演员扮演。如描写华孚金笔厂英雄牌金笔质量二十五天内赶上美国派克金笔的“英雄赶派克”等。还有“钢人铁马”等影片是完全由演员演的。<sup>129</sup>

卫生事业也在跃进，以上海市为例，1959年底大检查的结果，全市无蝇无蚊户已超过总户数的93%，在郊区曾有钉螺的八千五百七十八万平方米面积区域中，几乎一半已达到彻底消灭或者基本消灭的程度，至1959年底为止，已治疗的血吸虫病人为患者总数的93.7%，已治疗的钩虫病人和丝虫病人各为72%，而瘧疾病人则已全部经过治疗。痢疾和其他肠道传染病以及麻疹和其他急性传染病的流行程度远较1958年为小。此外，公共食堂、托儿机构等集体场所的卫生工作均有很大的改进。在医疗预防工作方面，由于贯彻了以医院为中心的预防工作的方针，全市工厂的因病缺勤率在1959年内又进一步地降低。根据五百四十四个厂内六十万职工的普查统计，1959年的发病率比1958年降低9%。大跃进以来，全市医疗机构有了很大发展，据1959年统计，全市已有七百零七所，医院共有病床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五张（包括三千零九十八张简易病床在内），这比1957年的一万八千九百八十张增长了近一万张。门诊机构也从1957年的一千一百四十八个发展到1959年的一千九百一十四个。<sup>130</sup>也正是大跃进中卫生事业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留下了《送瘟神（其二）》的著名诗篇：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sup>126</sup> 《人民日报》1959-04-30

<sup>127</sup> 《人民日报》1960-04-09

<sup>128</sup> 《人民日报》1960-02-02

<sup>129</sup> 《人民日报》1958-10-05

<sup>130</sup> 《人民日报》1960-04-11

## 第七章 “1962年的右倾”与四清运动

编者按：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后来又称“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帐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小四清，在城市中是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也称五反运动），后期统一称法，在城乡一律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的大四清。从1963年5月下发“前十条”到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四清运动持续了两年多，经历了试点、铺开、高潮、转折几个阶段。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有规模、系统性的政治教育运动，也正是在这场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分歧逐渐显现并公开化。“四清”运动是一场没有结束的运动，是文革的开端。

了解四清，必须从毛泽东的一张大字报说起。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这张大字报，揭开了党内的矛盾，鲜明地指向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后文简称毛刘）的分歧，随后中央于1966年8月8日发出《十六条》，揭开了文革的大幕！而在这张大字报中，“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是指什么？什么是1962年的右倾，什么又是1964年的形“左”实右？所有的这些，都与四清运动有关，前者是四清运动的源起，另一个则是毛刘在四清运动中的分歧。

### 一、1962年的右倾

#### 1、1961年的调查研究

在196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但是，二人的调查方法却不大相同，或者说，是大不相同。

刘少奇深入到湖南农村，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1961年4月12日刘少奇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18天，天华大队本是合作化运动的典型，但刘少奇蹲点后，完全推翻了这一结论。刘少奇认定天华大队的成绩是浮夸、是五风还未根除，大队总支书彭梅秀不服，拿出事实跟刘少奇争辩，刘少奇是“青天大老爷”，哪里肯听她的，彭梅秀也比较大胆，直接说“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并要赶刘少奇走。一个原来合作化的典型，经过调查，却成了一个问题大队。

毛和刘的调查方式是不同的。毛泽东强调点面结合，即派工作组直接去调查地点做详细调查，也听各省汇报。但刘少奇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他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比如说，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刘少奇强调长期蹲点固然没有问题，但不管面也不行，怎么能以一个点的情况来作为整体情况的判断？

不同的调查方法得出的形势判断也不同。1961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听江苏省委汇报了工作，听到了一些好消息，工业、农业、财贸等都有起色，使他耳目一新，甚为高兴。他兴奋地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潜力是很大的，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在听山东的汇报时，听到牲口已经停止死亡，毛泽东高兴地说：“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在天津，毛泽东着重谈了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说：今年比去年好，形势已经在向好的方面转。农村在向好的转。工业有了七十条，也在向好的转。商业也搞出了一百条。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而刘少奇对形势的判断则越来越严重。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实事求是地讲，国内的经济形势是有相当大的困难，表现在吃的不够，穿的不够，用的也不那么够。”“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 2、七千人大会的分歧

196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一九五八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妨碍着克服困难，必须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会议来统一思想认识。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七千人大会”。

在小组讨论的情况中，中央发现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不能畅所欲言。为此，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延长会期。这个提议，让大会的气氛变得十分民主，促进了大会讨论的深入，也揭露出党内的分歧，这些分歧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三面红旗，

从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关于当前的形势，讨论中一种意见是对大会的主报告满意，认为报告关于过去几年的工作成绩和错误讲的是适当的。持这种态度的占相当的多数。第二种意见对报告不满意，认为报告把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成绩讲得不够。一些人说：这个报告看起来没有多少好东西。正面的成绩、经验讲得很少，缺点错误讲得多。不要搞成漆黑一团，要多讲发愤图强。还有人说：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没有问题，问题是对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以后怎么办？难道过去完全错了吗？不经过那个道路行吗？我想不通。我看还是要发扬 1958 年以来的那种干劲，快一点建设起来，过去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有人举例说：特别是 1958 年以来的工作，成绩讲得少，缺点讲得多，容易引起错觉。第三种意见则认为不是成绩讲得不够，而是缺点讲得不够。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和错误的责任，彭真说：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邓小平、刘少奇、陶铸等都支持。周恩来立刻发言：过去几年是浮肿，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裁得跟头更大，要中风。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陈伯达后来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关于“三面红旗”究竟怎么讲，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 5 年、10 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周恩来的想法是，报告中有关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要多说几句。刘少奇说，人民公社还是有点一大二公，将来会看出来，现在难讲。柯庆施是充分肯定“三面红旗”的：十条成绩，人民公社讲少了，至少抗灾有作用。总的来看，起草委员会是在坚持维护“三面红旗”，但从中也流露出一些对“三面红旗”的不同认识。

1962 年 1 月 27 日的会上，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做口头报告，提到：一个农民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

1 月 29 日，继续开全体大会。毛泽东主持，林彪讲话：“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刘少奇和林彪的这两段话，更让人闻到了中央对于形势判断的分歧。表面上，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大会通过的报告，报告对一系列带有争议的问题，作出了结论。但是，这种结论实际上更带有某种调和的性质，让持不同观点的两方都不能满意。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最决策高层的思想不但没有统一，而且加大了分歧，这个分歧的核心，依然就是“三面红旗”到底对不对，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选择。

### 3、右倾之中央

七千人大会后，2 月 8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继续做调查。此时，刘少奇认为，一九六二年要抓紧的工作环节是精简简政，增产节约，稳定市场，整顿秩序。但不久，刘少奇发现一九六一年实际上存在着三十多亿的财政赤字，如不采取措施，一九六二年的财政有出现更大赤字的危险。

2 月 21 日至 23 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其一是分两个阶段(调整，发展)，其二是形势估计。刘少奇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3 月 7 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说：对一九六二年计划要进行相当大的调整，把重点放在农业和市场上。计委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和稳定市场方面。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指标，要“伤筋动骨”。

3 月 8 日，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毛泽东此时抓紧修改其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另一方面调查《六十条》的情况，派了田家英打头的 17 人调查组。

3 月 16 日，毛泽东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来武汉讨论。后来，周恩来讲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3 月 27 日至 4 月 16 日召开了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4 月 9 日，毛泽东做了简短发言：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正如好几位朋友所讲的，困难正在被克服中，过一个过程以后看现在的情况，就比现在看现在的情况会要不相同。事物不断地走向它的反面。

4 月 16 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关于陈云近几年文章的摘要等，毛泽东未批复。

4 月 23 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5 月 2 日到 7 月 6 日，毛泽东在外考察工作，处理与苏联、印度、台湾的军事冲突，打退国外反对派的攻击。

5 月 7 日至 5 月 11 日的中央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

会上刘少奇提到：“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周恩来则说：“那时，就是有点革命，不能深思熟虑，不能冷静下来”，“欲速则不达，跌了大跤”。

5月24日，毛泽东对于呈送的文件，批示：“退总理，照办。”没有更多的批复。

中央的分歧愈来愈大，国内的实际情况则发生恶化。

在农村包产到户非但没有绝迹，相反呼声越来越高。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年春夏期间，则受到了来自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支持。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陶铸等均有赞成的表示。一些地方要求把合并的财产退还给个人，归个人所有，退到搞个体生产，财产、土地归个人使用。邓小平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集体还是个人)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把个体企业作为基本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为了解决紧急情况可以暂时使用。现在看来，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当前最主要的是粮食问题。搞个人生产能增加粮食产量，这是件好事情。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

安徽是主张包产到户的主要地区。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sup>131</sup>

当时全国的单干情况如何呢？据刘少奇在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sup>132</sup>田家英湖南调查回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时 also 说道，“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单干风只是一个方面。

外交战线上，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针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大胆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其基本思想是，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不要四面树敌，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后来，这种意见被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

统战部李维汉认为对民主党派“敷衍应付”多，要么是“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受沐于七千人大会的春风，在1962年4、5月间，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会议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

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1962年5月23日，文化部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似乎已经离共产党越来越远。

#### 4、右倾之地方

韩丁的《深翻》一书中，描述了这个右倾的过程在山西的张庄的反映。

张庄的农民用这首打油诗描写了当时的情况：

退还土地——我们的庄稼会丰收，  
退还牲畜——我们养肥了能吃肉，  
退还农具——不再因用坏而发愁，  
退还副业——我们自己会赚“大头”。

当时提倡的“三自一包”，即扩大自留地，扩大自由市场供个人买卖，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农业上有四退还，即退还土地、大牲畜、小牲畜和园林给个人；工业上有五调整，即对集体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改，意思是要把它们中许多变为私人所有。许多人认为这个办法不像是调整、提高、巩固集体的工业和农业，倒象是要清理集体工农业。在晋东南，各地党委开始学习安徽的经验。安徽由于粮食欠收，大批农民出家行乞。那里的大队分了土地，拆了猪圈分了集体的猪，为了重新分配水下的土地甚至毁了大坝和水库，不久安徽的经验就在晋东南生效了。武乡县把集体15000头牲畜中的7000头退还给了原先的主人，地区领导作主解散了全区约3000个公社企业，只有全国劳模李顺达的家乡西沟和陵川县富漳公社的企业幸免。

在鼓励个人搞副业生产的政策下，出现了许多小型企业——个体商店、家庭纺织，还有许多其它特殊的职业和服务，如：修理钟表、手表、修理自行车、修锁等。在张庄有秦来才和吴双喜两家修理手表，他们每家有一套修表工具。

<sup>131</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sup>132</sup> 《毛泽东传》



由于修表的生意做得不错，所以秦来才和吴双喜加上家里帮忙修表的人就都不去上地了。任何时候，只要有庙会和集市，不管远近，他们都要去摆摊修理，他们不光修表，还修手电、钢笔等人们常用的东西。后来，大队要求出去挣钱的手艺人所得的大部分收入应交回大队，然后把这些交回大队的收入换算成工分，以此来保证他们一年两次的粮食分配。每个手艺人每月交大队 40 元现金，挣 20 个劳动日的工分，从表面上看似对大队有利，因为手艺人用 2 元钱才能换一个劳动日的工分，而当时（1959 年）平均每个劳动日才值 1.35 元现金，平常年份一个劳动日才值一元现金。但实际上，这个制度对手艺人有利，因为在外边干活他们大部分人一天能挣 2 元多，每个月要干 20 多天，可他们每月只交大队 40 元，这样他们的收入就远远超过了那些只靠大队分红的人。晋守义靠他的工具和设备赚了大钱，他的收入远远超过了支出，所以他又扩大了生产。如果允许他继续这样干下去，不久他就会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远远超出他自己所能操作折能力范围。这样他就得雇用其它人，他可以轻易地使自己成为一名企业家。

手工艺者如此，商人和投机商就更是受益于“三自一包”了。张庄过去的上中农晋发旺、晋大洪和富农晋忠富、申安龙晚上都推上平车出去搞投机，如果干好，一晚上就能挣 7—8 块。杨子和骑自行车到忻县 5 块钱一斤买回 100 斤萝卜籽，在师庄和附近村子卖 25 块钱一斤，一晚上就挣了几百块。晋宋义到各地去买自行车和平车零件，并利这个机会做投机买卖。他南下郑州、汉口甚至上海，北上邯郸和北京，从这些地方买上自行车坐套回来就能赚三倍的钱。他以每根一毛钱的价格买上自行车辐条，回来每根就卖一块钱，他以 1.2 一块的价格买上农民的银圆，到汉口每块就卖 3 元，这是一桩非法但很赚钱的买卖。

比个体买卖，投机商人更多，对集体的团结危害更大的是个人对垦荒地的占有。这与自由市场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个人地里的产品可以自己卖，收入归个人。这不仅破坏了农村的集体生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城市内部和城市周围的工业生产，干部和工人们受高收入的诱惑，也回家去开垦，种植烟叶、茄子、萝卜等需求量最大，最能赚钱的作物了。在张庄，有些农民开始忽视集体农田，集中精力去开垦那些大田与公路，与水梁相连接处没人种植的小块地，或在路堤和坝堤上种植小块地，谁发现、谁开垦、谁使用、谁受益。这种牺牲集体农田扩大小块耕地的“开垦先锋”到处可见，比比皆是。富农晋忠富居然侵占了灌溉农田用的水渠和干河床，他对晚上推上平车搞投机挣得钱还不满足，于是就到处开荒，最后在水渠中开了一大块地，水渠暂时没有使用是因为张庄的土地平整工作尚未搞完，加上水库的水位太低暂时抽不出来。曾被人们当汉奸斗过的过去的伪街道主任晋一仁说：“我身体不行了，不能为集体干活了。”但却把全家拉到了离公路不完的山上，在那儿开了几块荒地，加起来有 5—6 亩。

一些个人的土地产量高过了集体土地的产量。这些农民起早贪黑，中午也不休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茅房里有了茅粪，猪圈里有了猪粪他们就上到了自己的地里，而不是搞到集体的地里去。当然，他们不是大白天公开这样做，而是等黑夜大部分人睡了才干，他们不是用平车拉，而是慢慢地用扁担挑。夜里在自己的地里这样卖劲地干，等到了白天在集体地里干活时，他们就没劲了。活干得很慢，而且总是找机会躺下睡一大觉。<sup>133</sup>

这些情况，当然不止在张庄存在。当时的毛泽东也已经察觉并在逐步深化认识，并成为重提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从 1963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很鲜明地提出存在如下的阶级斗争情况：

-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
- （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的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
- （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
- （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
- （5）反动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
- （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有些地方，这种活动是很猖狂的。
- （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生了。
- （8）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
-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张庄的情况，在中央所列的 9 条表现，都已有所体现。可见，三自一包、单干风已经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集体经济，尽管时间如此之短，但继续发展下去，一部分首先发家致富的农民，就可以很快地开始购买他人的土地，雇佣他人了，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合作化时期的重要命题，重新摆在中国共产党、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 5、毛泽东的不满

1962 年，田家英受毛泽东的指示第二次去农村做实际调查。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6 月底田家英结束调查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

<sup>133</sup> 为什么在农业合作化时期，组织起来的农民的土地粮食产量超过了单干户，而这时候就不如单干户了？这是因为，这时的农民可以同时参加集体的劳动和自留地的劳动，一部分农民，就会因为集体土地的劳动可以通过磨洋工仍然获得相应的报酬，采取白天省力干集体，晚上使劲干个人的方法。要解决这种错误，必须认真抓好集体的建设，同时反对这种错误倾向。

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由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毛泽东当即提了两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和“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毛泽东约见了陈云。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在1962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sup>134</sup>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在毛泽东批评了包产到户之后的7月17日，邓子恢仍然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

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

这几个月里，毛泽东都在南方视察时，看到形势很乐观，而刚回到北京，则“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些意见，同他在地外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从单干的前景上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泽东于是问：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

## 6、北戴河会议的反击

毛泽东决定抵制单干。后来的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

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就是毛泽东反击的第一步，并从而大大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个反击的核心，是重提阶级斗争。

8月6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毛泽东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现在一片光明的看法没有了，不存在。有些人思想混乱，没有前途，丧失信心，不对。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类。有一种矛盾，对资产阶级的矛盾，实质上敌对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我们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如果承认国内阶级还存在，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阶级的残余是长期的，矛盾也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究竟那一年进入社会主义，进入了社会主义是不是就没有矛盾了？没有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就成了无矛盾论，无冲突论了。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说百分之二十，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说，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要强迫纠正，要做工作。为什么要搞这么多文件？为了巩固集体经济。现在就有闹单

<sup>134</sup> 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

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有阶级就有阶层，地、富残余还存在着，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闹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有些人也是要闹单干的。

8月9日的会上，毛泽东继续提到，语言也越来越犀利：

一九六〇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百分之四十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而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

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

党员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过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对这部分人的民主革命还不彻底，明显的贪污、腐化，这部分人好办。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主义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

社会主义才十年，去年提出对干部重新进行教育，是个重要任务。“六大”只说资产阶级不好，但是对资产阶级加了具体分析，反对的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别的资产阶级就反得不多，三反五反搞了一下。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搞合作社，开始搞社会主义。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发展下来。真正社会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五三年开始的。以后经过多次运动，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展开。一九五八年已有些精神不对，中间有些工作有错误，最主要的是高征购，瞎指挥，共产风，几个大办，安徽“三改”，引黄灌溉（本来是好的，不晓得盐碱化）。因此四个矛盾再加上一个矛盾，正确与错误的矛盾。高指标，高征购，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不是什么两条道路的问题。好人犯错误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不同，与混进来的及封建主义等更不相同。如基本建设多招了二千万人，没看准，农民就没有饭吃，就要浮肿，现在又减人。

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的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的影响。商业部应该改个名字，叫“破坏部”。……财经各部委，从不作报告，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独立王国，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

这些讲话，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重提阶级斗争，是党的路线的一次重大调整。

随后，邓子恢等人开始做检讨。关于形势问题，刘少奇也说：“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个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

## 7、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重提阶级斗争

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则正式通过了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也正因为此，八届十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次转折之一。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八届十中全会。中央委员82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再一次批判了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肯定了自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所取得的显著成效，决定进一步进行切实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并讨论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等文件。

全会的公报中基本形成了后来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sup>135</sup>

<sup>135</sup> 在“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一些人将毛泽东的话作了整理，归纳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线路。

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第一步，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即四清运动。

## 二、四清运动的发动

尽管八届十中决定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1962年东道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考察，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和河北省滔滔不绝地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为此，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陆续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反映了当前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社教运动的经验。不过有些地方重视了，有些地方重视不够，在中央也如此。4月25日在同周恩来、邓小平等讨论对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稿时，特地提请他们注意这几个报告。但当时大家的心思都不在这里，没有怎么讨论。一方面是些有好的经验，一方面是有些人重视不够，所以毛泽东觉得，开展社教运动需要来个中央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这便是“前十条”的由来。

### 1、“双十条”的制定

1963年5月20日，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前十条”的核心内容为：一、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斗争，社教运动不是关系前进快慢的问题而是关系到要不要社会主义的问题；二、依靠贫下中农，重新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重要性；三、强调了认识论的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强调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重要性，“放下架子”，深入基层，吃在基层，住在基层。

《前十条》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形势问题。除去一部分严重灾荒地区和办得不好的社队以外，整个农村的形势已经大大好转，农业生产逐步上升；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还有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的问题。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

（四）我们的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是否认识清楚了的问题。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

（五）依靠谁的问题。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

（六）目前农村中正确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同时使犯有轻重不同、多少不同的毛病的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三步走：训练一批干部；训练更多的干部和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全面铺开。

（七）怎样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的问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建立贫下中农的组织，是完全必要的。贫下中农的代表、委员会和主任，都应当由贫农、下中农选举产生。

（八）“四清”问题。清帐目、仓库、财物、工分，与在城市中的“五反”运动一起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九）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说来，是带根本性的一片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的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

（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在这点上，对于某些同志，确实还有大喊一声的必要。

“前十条”颁布后，各地开始进行“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鉴于历次运动的教训，毛泽东最担心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对此三令五申，中心思想是：“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7月4日向党中央写了《有关当前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如实反映了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措施。各地也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如运动有急躁情绪，出现了打人现象；贫农与中农矛盾紧张，关于如何对待中农各地认识不一致等。为此，邓小平、谭震林代表中央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于1963年11月下发。

其实，“后十条”刚出来时，党内有些人说是右了。文件报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没有表态，也没有打开看，而是即刻离京南下，向各地负责人征求对于这个文件的意见并在讨论过程中采纳了各地负责人关于点面结合的意见。随后于1963年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需要特别重视的是，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这是社教运动的群众路线，以团结干部为前提更是保证了群众路线的真正可实现性。只是后来刘少奇在《“后十条”修订案》中对此进行了修改，改为团结群众是团结干部为前提，打击了一大片干部，是四清运动走偏的一个原因。

## 2、“双十条”的宣讲与“四清”的铺开

“前十条”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而在《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中则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通知发出后，各地先后开展了“双十条”的宣讲活动，要使“双十条”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毛泽东十分重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找到这样一个推进社教运动的方法，他感到高兴。这是一件这件在他看来关系到反修防修的大事，抓住不放。1964年3月22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要求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3月27日，毛泽东离京南下视察工作时，也继续在继续关注农村社教情况，途经每个地方都会了解该地区社教运动的具体开展情况，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等。

在经过“四清”试点，特别是普遍宣讲“双十条”之后，农村各地陆续铺开了运动。

据统计，截至1964年4月，面上的运动已基本结束。系统进行四清运动的社会，已经结束的和正在进行的，共15.33万个大队，占全国大队总数的19.85%。其中，华北占12.17%，东北占10.24%，华东占15.6%，中南占21.59%，西南占50.5%，西北占23.34%。<sup>136</sup>

和试点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运动具有明显点面结合的特点。点上派出了强有力的工作组，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面上则主要是宣讲“双十条”，干部和群众洗手洗澡等。山西省文水县是个面上“四清”典型。1963年11月21日至12月22日，山西省文水县召开了四级干部会。会议分四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七天时间学习了《前十条》，做动员报告。第二阶段，揭盖子，开展诉苦。第三阶段，学习《后十条》，洗手洗澡，放包袱。第四阶段，挖思想根源，做到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明确奋斗目标。1月20日，华北局做出重要批示，“文水县的四级干部会方法对，效果好”。此后，华北各地以及其他地区大都采用召开三级或四级干部会的方式开展面上“四清”，成为开展面上“四清”的一个主要方法。

对四清运动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个点上，也是作为“四清”的典型，则是桃园经验。

## 三、四清运动的高潮

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集中工作队，“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1964年9月1日，“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之后，四清运动迎来了另一个高潮，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四清”运动部分。

### 1、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将刘少奇所主张的各种运动方法，如领导蹲点、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保守秘密、大兵团作战、掌握群众运动火候等等，都集之于大成。《桃园经验》共分五大部分，按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讲述：（一）扎根串连；（二）清经济，包括查帐、揭发，要干部放包袱交代问题等等；（三）清政治，即重新登记成份、揭露地主富农等；（四）组织建设，即村干部撤职、改选等；（五）四清成效和总结。桃园大队有217户人家，桃园工作组有20多人。桃园大队干部共46名，其中被赶上楼检查过关的43名，被批斗的39人。有的干部只是私分了两斤挂面，有的干部只是吃了几顿伙饭就长时间不能下楼，有些给队里烧火、做饭、卖菜、赶车的社员也被列为“四不清”对象，统统靠边站。

桃园经验的一个背景，是农村学大寨的运动。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的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据说王光美曾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sup>137</sup>为此，不惜投入许多国家的钱在桃园先后修了两个电力扬水站，两个电力扬水点，三眼机井；同时，架设了通向桃园的高压输电线四十二里，低压配电线三十四里，开挖了一条六里长的灌溉干渠；国家调拨的化肥，除了在县里分配时就已经特殊照顾外，还从省里直接调拨；桃园要耕地，按合同正在给邻队耕地的拖拉机也要调来；桃园要打麦子，邻队正在使用的打麦机也要抽来；桃园要灭虫，邻队正在使用的喷雾器也要调来“支援”。

在王光美搞四清以前，桃园大队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

1、被推翻的地富反坏分子不甘心失败，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进行反攻倒算，破坏集体生产。例如：富农分子岳某攻击人民公社不如单干好，故意赶大车压坏队里庄稼；赵某借口工分少，暗中煽动群众罢工；郭某擅自拆卖了土改时已被没收的房屋。2、一些富裕农民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自发资本主义倾向抬头，热心于小开荒小自由，有的还羡慕单干，议论包产到户好。3、一九六一年公社体制下放，关景东及其堂兄回到桃园，钻进党支部委员会（关景东任支部委员、大队治保主任兼民兵连长），继续进行贪污盗窃等活动，并且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支部书记吴臣、副支部书记赵树椿等为核心的桃园大队党支部，则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1、大讲人民公社好，大讲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讲热爱国家、热爱集体。在三年困难时期，克服困难，胜利度过了灾荒，顶住了单干风，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2、发动群众，通过辩论会和斗争会，对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斗争。追回了富农分子反攻倒算的财产，加强了对他们的管制。3、在党内，一九六二年七月、一九六三年五月，专门召开会议，集中地对关景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进行了揭发、批判和斗争。一九六三年三月，通过选举罢免了关景

<sup>136</sup> 《四清运动实录》

<sup>137</sup> 1967年9月6日《解放军报》：《揭开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阴谋》



东堂兄的大队长职务，并在党内撤销了他的副支部书记职务。

在生产方面，党支部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广大社员群众，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积极发展生产，集体经济日益巩固。1、农业生产不断上升：粮食亩产量，一九六三年比一九五七年高级社时提高百分之二十左右，比解放初期提高一倍以上。2、连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三年共超额七万六千多斤。同时，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还超额完成国家当时规定的蔬菜交售任务，是抚宁地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比较突出的几个大队之一。3、大牲畜饲养好、繁殖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繁殖三十一头马、骡、牛。到一九六一年，集体和社员养猪达到每户平均一头半。4、公共积累相应增加。其中公积金一九六一年三千八百零九元，一九六二年六千六百八十四元，一九六三年六千三百四十二元。

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生活不断改善。特别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社员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桃园大队党支部从一九五九年成立到一九六三年“四清”前，一直是抚宁地区先进的支部之一，曾获得地（市）、县、区、公社的多次表扬和奖励，出席过地（市）先进单位的代表会议。

但是，党支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斗争观念不够强，对关景东斗争不力；对隐蔽较深的漏划地主富农分子，未能及早发现；有些党员干部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存在着小量贪污、多吃多占、打人骂人等缺点和错误。

因此，对于桃园这样的地方，重要的就是依靠贫下中农，立刻公布工作队的来意及工作步骤，开始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让干部洗手洗澡，在群众面前自我批评，从而批判单干风，加强集体建设。

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则恰恰相反，首先，它把社会主义农村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刘少奇在给王光美的信中却说：“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基本上是反革命两面政权”。王光美也说：“桃园这个支部……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

其次，桃园经验凭主观确定依靠对象。王光美到桃园依靠的是“五风干部”关景东，关景东在大跃进时期任抚宁县东方红高级社主任，浮夸高粱亩产双千斤而成为“英雄”，并与刘少奇夫妇结识，关景东还专门到北京看望过刘少奇和王光美，1958年9月，王光美送桃园大队一台电影放映机作为其全家入社的股金<sup>138</sup>。关景东还有殴打社员、贪污粮食、侵吞现款和耕地等很多劣迹。王光美1963年到桃园大队后，秘密接见关景东，保证“保你下楼，从轻处理”。关景东当上大队长以后，又经王光美批准，把因犯了错误，在“四清”前夕已被撤职的他的堂兄重新拉上台，当上了大队治保主任。又把岳绍田提拔为大队治保副主任。从此，关景东等在工作组的支撑之下，把持了桃园的党政大权。王光美把干部分为几类，一类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还有一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出有些慌张，越到后来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事实上，吴臣在群众中威信是比较高的，这一点连王光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委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王光美将吴臣打为地富反坏，但却没有任何依据，桃园经验甚至这样定性：“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

第三是使用逼供信，打击一大片。王光美这样定性，不搞逼供信是不可能使吴臣等人“招供认罪”的。工作组甚至拿手枪威胁，把吴臣看管起来，其中二队工作组还发生了武斗。工作组内部有些干部对这种搞法有意见，王光美大为不满，说：“人家武斗不好，你做出几个说服教育的样子来！”运动一开始，王光美实行钱粮挂帅，抓“粮、款、物、斤、元、尺”。为了追钱追粮，把干部通通赶上楼，“有枣没枣打三竿，有鱼没鱼淘干了看。”群众则反映：“挂点‘衔’的都得挨整”，“过了粗罗过细罗，过了大筛过小筛”。王光美还“估产”，主观估计每个干部的贪污数字。例如，估计一亩地种多少棵茄秧，一棵茄秧结多少茄子，总共能产多少斤，卖多少钱。这样，一个管理五亩菜地的生产队副队长，三年就被估计贪污上万元。为了完成既定指标，王光美亲自督战，给工作队员“加压”，给被斗对象“加温”。对干部：“先打外围，后打攻坚”，“大会剥皮，小会攻心”，“慢火煎鱼，车轮战术”，“敲山震虎，顺藤摸瓜”，罚站罚跪，低头弯腰，“燕飞”，拘留，搞逼、供、信。在逼供的过程中，王光美还宣称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人生哲学，她动员干部退赔时说：“退赔了几个钱，经济上吃点小亏，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信任，还选你当干部，到头来占个大便宜。”

王光美根据刘少奇“对干部得有压力”的指示，把广大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都当作打击对象。她说：“干部的四不清是普遍存在的，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有问题，不可相信。”“不论干部好坏先斗他几次再说。”桃园大队原有大小队干部四十七人（包括“四清”前下台的在内），在“四清”中挨批斗的共四十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在整干部的同时，借“群众洗澡”之名也整了社员。全大队有一百五十五人作了检查，搞得桃园大队人人自危。这样搞基层干部，群众不可能满意。王光美离开不到半年，留下坐镇的巩固组就招架不住了，电报王光美告急，这时桃园经验已经传遍全国。王光美于1964年9月赶回桃园进行第二次四清。

第四是搞神秘主义，脱离群众。背靠背、扎根串连所选根子不超过总人数10%。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这次运动要有坚强的领导，要依靠贫下中农组织，要在群众中做好调查研究，要放手发动群众。”此时，刘少奇则认为“贫下中农不向我们说真话”，“用开调查会的办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行了。……调查会调查不出问题来。”还说：“工作队进村以后，要进行一些秘密工

<sup>138</sup> 罗平汉. 桃园大队“四清”前后. 百年潮, 2006年第03期

作，只有扎根串连，他们不怕了，才能讲话。”因此，王光美一进桃园，就象到了“敌占区”一样，化名董朴，乔装打扮，捂个大口罩，包个大头巾，保卫人员暗中随从，私查暗访，鬼鬼祟祟，进行扎根串连，搞秘密活动。有时屋里开会，屋外还放“暗哨”。谁要去见王光美，还得由警卫人员通报。“选根”、“审根”、“定根”、“用根”，都由其一人独断。因此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神乎其神。桃园有些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把我们桃园看成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王光美还操纵几个“根子”替她当打手。无论大会小会，都是预先布置好的少数人发言。实行工作组专政，包办代替，运动群众，包打天下。

杨尚昆在西安牛角一队参加四清，牛角村的根子占总人数7%。工作队进村后冷冷清清，多数人不说话。原支部介绍5个积极分子，工作队认为4个都有问题，自己另找了10个，几天以后又发现自己找到的根子也有问题。在进行阶段总结时，工作队不得不承认遇到了“冷场”的局面。只能反过来埋怨群众“对和平演变危险认识不够，对新剥削分子恨不起来”<sup>139</sup>。

第五是对主要矛盾认识错误。按照刘和桃园经验的搞法，将新生政权的蜕变问题归咎于地富反坏的拉拢，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处理，并且大大高估敌我矛盾的比重。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刘少奇则认为：“四清运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王光美到桃园也说：“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连结在一起。”她说到桃园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在动员干部交代问题时也说：“你是忠于四清，还是忠于四不清？”

桃园的结果如何呢？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的三年中，虽然国家大量投资，水电设备样样俱全，但生产很不稳定。一九六六年产量大幅度下降，比一九六五年减产三成。“四清”前，桃园大队年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而在“四清”后的三年中，有两年没有完成国家征购任务。王光美“蹲点”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四清”前是个余粮队，一九六四年因粮食减产，口粮下降，把已经征购入库的粮食又退回了一万八千斤。国家投资设备的折旧费无力按比例逐年扣除，国家贷款还逐年增加，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钱拿来分红了。

## 2、《后十条》修订

刘少奇对“四清”运动的主导从“后十条”的修订起。

1964年6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修改“后十条”。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6月28日到7月24日，刘少奇南下视察四清，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刘少奇视察回京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8月5日，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同时，刘少奇开始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1964年9月1日，“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之后桃园经验成为四清工作队的必读材料，成了全国“四清”运动的指导纲领。韩丁在深翻里描述道，“第一天，（大寨）工作队队长张子义（地委组织部的一个科长）就把人们叫在一起让他们学习一本叫“桃园经验”的小册子”。

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在讲话中，刘少奇开始对《后十条》提出批评。他说，“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刘少奇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也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8月5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

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撤开。

后十条修正草案于1964年9月18日印发，连同桃园经验一起成为社教运动的指导文件。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基层干部面临的不再是洗手洗澡的问题，而是类似于“白色恐怖”了。

此时的刘少奇，也达到了他个人权力和威望的最高峰。高华认为，“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标志着他在50年代初中

<sup>139</sup> 《杨尚昆日记（下）》，437页

期受挫后，开始了权力复苏和扩张的过程”。

### 3、大寨的四清

山西昔阳大寨大队的四清<sup>140</sup>就是在后十条修正草案指导下的一个典型案例。

“后十条”修正案提出，要派大工作队，集中搞几个点。

“可了不得。”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一下来了几千人，他们嚣张着哩！”昔阳县的工作队员总共有 5000 人，派到大寨的就有 300，这个大队的总人口不足 400，因此，几乎是一对一。

工作队进入大寨是在桃园经验之后，基本按照桃园经验来搞。“第一天，工作队队长张子义（地委组织部的一个科长）就把人们叫在一起让他们学习一本叫“桃园经验”的小册子。”在具体做法上也可以体现，首先认定先进大队问题多、干部都是有问题的，其次搞逼供搞背靠背，再次没有让当地的干部群众充分参与进来，只是依靠工作队搞四清。没有团结 95%的干部，而是所谓地团结 95%的群众来团结干部。

首先工作队攻击大队干部。

工作队的干部们来不及放下铺盖卷就接到通知去找旗杆杆上的虫虫（大队掌权的坏人）。他们答应团结给大队干部提意见的人，谁反对工作队谁就被定成反革命。……他们攻击陈永贵，说他和他所有的亲戚都红得发紫，他们停了陈永贵儿子陈明柱的大寨共青团领导的职，说陈永贵在公社供销社当会计的女婿侵占了公款，因此关了供销社的门，说陈永贵的妻子在她工作的大队猪场偷过猪饲料。

工作队也试图通过背靠背的方式让大寨干部相互揭发。可这一招也不顶事儿。

陈永贵说，“在其他地方，工作队可以把支书搁在一边，告诉支书说他们已经从其它同志那儿听到了所有的罪行证据，那么支书反映常常是‘这狗娘养的，在背后捅刀子。我也要指控他。’可他们在大寨使用这个花招，党员们却不会上当，他们说‘没有人会这样说我。’所以他们拒绝在人家背后捅刀子。在我们当中，让一个人在背后反对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

攻击大队干部个人不成，工作队开始攻击大寨大队，试图搞坏它的先进声誉。

开始他们盯住了粮食产量问题，那年大寨的粮食高产是 600 多斤，在河北平原没有一个村收那么多粮食，工作队的队长们对产量问题提出了疑问并开始找毛病，他们首先认为大寨隐瞒了土地面积，说大寨人种的地一定比报的面积多，因为报的亩数少了，所以亩产量就高。“800 亩？”他们嘲笑道，“你们这儿的地两个 800 亩也不止。”工作队员们不相信大寨农民的话，他们到周围——金石堡、高家岭、吴家坪等村去问那儿的人们大寨的村界在哪儿，然后又逐场逐块的进行测量，从与邻村的交界处量到虎头山顶，最后他们得出的数字远不足 800 亩。这个数字被县委驳回，说如果加上新开垦的土地肯定会超过 800 亩，于是，他们又进行了测量，这次连在最高的山脊上的最小的地块也没拉下，结果总数也只有 796 亩，比大寨人告诉他们的 802 亩少 6 亩。

找不出多余的地，工作队又以为粮食数被扩大了。他们把各家各户，大队仓库里的粮食都称了一遍，然后又检查了所有卖给国家的粮食单据，检查非常得细，没有拉下一斤粮食，结果发现大寨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上账。

后来又有人想起了粮食含水量的问题。因为未完全干的玉米含有 15.5%以上的水份，所以称重时扣去 1.25%的斤数，这是一项大寨人从未听说过的国家规定。告诉他们这个规定以后大寨人拒绝接受，因为大寨的粮食是在春节以后才称重分配，到这时，玉米是干透了，肯定不会含 15.5%以上的水分，再说国家粮食局已检验过大寨卖给国家的粮食，并没有说含水量高。

但工作队却以含水量压大寨，他们把这个规定告诉了群众，“你们的干部有他们自己的‘中央’，他们对含水量制定自己的政策，你们认为自己分的粮食是公平的，可实际上你们分得的粮食必须扣除 20%，30%甚至 40%的重量，因为粮食里含有水分。他们在欺骗你们。”

有些干部害怕了，但大多数干部仍一点也不动摇，“我们不用扣除水分，因为我们的粮食干透了。光说我们干部比以前分的粮食多了。但这是大伙都比以前分的多了。他们一方面告诉大家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太少，另一方面又告诉大家我们干部们多占了粮食，说如果把我们多占的粮食分给大伙就比在土改时还分得多，大家想想，能有多吗？”

尽管大寨大队党支部一班人团结一致，但有一些大队干部却屈服于工作队的压力，对他们的领导提出了指控，大队受监督的地主和富农也提出了许多不满。工作队把这些不满和指挥收集起来，汇报给了省委的陶鲁笏和卫恒，他们又直接汇报给了刘少奇。看了汇报材料刘少奇认为大寨没有王光美整理过材料的桃园大队好。于是指示传了下来，要加大压力，把所有的贪污及违法乱纪行为全部揭露出来，把“四清”运动进行到底。

陈永贵在人大会议上参加了毛主席的生日宴会，很受鼓舞，满怀激情地回家，结果也遇到了麻烦。

“我到家的第一天，社员们都不敢接近我，干部们聚在我家哭了一下午。他们摆着手，扒在我肩膀上说：‘我们没有死，唯一的原因就是要等你回来。如果不是为了这个，我们早去见阎王了。现在看到你了，我们就可以放心地去了。’”

听到老同志说要自杀，陈永贵赶到头晕目眩。

吃完晚饭他象旋风一样闯进了工作队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人大吃一惊，猝不及防，他要求给大寨大队的干部恢复名誉。

之后，他又把老同志们领到了社员们正在劳动的山顶上，向社员大声喊道，

“大寨的干部们都在这儿，”陈说，“你们说他们犯了死罪吗？”，“往这儿看！看着我！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都不至于是死罪，可工作队要把他们推上绝路，要逼他们去死。”

<sup>140</sup> 本节所有引用全部来自《深翻》

这样，陈永贵召集齐了他的群众。到这时，工作队的干部们也动了心，有些积极分子背叛了他们的领导，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开始攻击工作队的工作。

之后，陈永贵团结大寨人民开始对工作队进行反击。第一仗是针对扫雪记工分的问题展开的。从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就有成百上千的参观者到大寨的虎头山、七沟八岭来参观。冬天，如果农民们不清除积雪，来参观的人就几乎无法出门，有时他们甚至无法从昔阳县城到达大寨大队。有一次，工作队接到通知说有一个 5000 人的重要参观团第二天要到大寨来，上面的领导要求工作队保证参观顺利进行。但是之前，工作队指出大寨的工分计算有问题，认为不该对扫雪计工分，坚持把扫雪的公分取消了。所以工作队没法调动大寨人去扫雪。大寨人说，

“我们不干了。计划上又没有安排清扫道路，是你们坚持让我们把扫雪的工分砍掉的，你们自己去扫吧。”大寨的社员们坐着不去扫雪，工作队只好推翻了以前的规定，恢复了扫雪的工分。

陈永贵在下面动员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党中央有些人也开始提出疑问。

周恩来看了“还乡团”送去的“黑材料”以后认为昔阳县有些做法是错误的，于是他派了一个小组由李雪峰带领到昔阳来进行现场调查。几天以后，北京命令工作队撤走，但又派了一个新的工作队来。新的工作队带着以《二十三条》为原则的新的指示来到了大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工作队依靠当地的党支部，并和他们一起把先进大队管理好，因此，基层干部不再由于工作队长的猜疑被搁在一边了。

“新工作队来了以后，队员们并没有按他们答应去做。”陈永贵说，“他们到先进大队去，又开始把那儿搞得一团糟。他们还是说：‘先进大队问题多。’他们又搬出了王的‘桃园经验’。虽然在会上他们说‘不要学’王光美的‘经验’，但他们一来就开始搬用这个‘经验’，他们在洪洞县也是这样做的，在那儿他们打了第二次歼灭战。后来我经常抱怨大寨的苦衷，可洪洞县的人总是说‘我们那儿更糟’”。

昔阳县是农业搞得较好的县，大寨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表扬。那为什么这儿会成为四清运动的重打击区呢？不排除有些人是非要扳倒大寨这面红旗，好按他们的做法来搞农业的可能。

#### 4、张庄的四清

张庄的四清<sup>141</sup>没有大寨那么特殊，不过张庄的四清也可以体现“四清”运动没有深入、浮在表面，以及“四清”工作队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问题。

张庄的四清是分“小四清”、“大四清”两步走的。“小四清”是在 1964 年冬天，市里派到了张庄一个 3 人工作队。“大四清”是在 1965 年 8 月，由 15 名市里的干部组成的工作队。每个小队都派去两名工作队员，这样张庄每个生产队都由一个三人委员会领导。“大四清”是在“二十三条”之后。和大寨一样，新的工作队带着新的指示来到张庄，声明他们不只是为了找贪污分子，更重要的是要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上执行的仍然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政策。

“小四清”和“大四清”的做法大同小异。“小四清”分三步进行：全村动员大会；背对背揭发；“放下包袱”会议检讨。

张庄的“四清”工作队召开了一个全村动员大会，给群众解释了即将开展的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然后把全村人分成了几个小组，背对背开会揭发干部的错误和违法行为。“背对背”意思是揭发人和被揭发人不对面。被揭发的人、全体党员和全体干部分别在“放下包袱”会上见面，会上他们可以听取别人对他的指控。可以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也可以揭发其它人，如果揭发得好，就可以成为运动后期的积极分子。

干部的错误和罪行一旦通过“背对背”会议被揭露了出来，就得在“放下包袱”会议上作检讨，作自我批评，就得直接面对群众，群众就是“澡盆”。在张庄有两个“澡盆”，村南村北各一个，每个“澡盆”由一个市里来的干部监督，由这一片儿的贫下中农负责管理，负责审查住在这一片儿的干部。

白天群众、干部都象往常一样工作、劳动，会议都在晚上开，气氛很紧张，问题很尖锐。工作队的张根虎和薄国祥根本不作任何无罪的设想，他们怀疑每个干部都有不正当行为，即使没有贪污和盗用，至少也白吃过公家一顿饭，多分过公家的一件物。他们说，每个人脸上都有污点，所有的污点都应该揭露出来。

张庄“小四清”的成果是抓出了肖福来、郭云龙、李锁子和大队支书郭富书。

肖福来：

“我从你的脸上就能看出来你有问题。”张根虎对第四生产队的保管肖福来说。

肖福来脸红了。

“看，看，我说什么来？”张说。

肖开始出汗。

“你最好都讲出来，你的问题少不了！”张喊着，给肖施加压力。

在他的强烈攻势下，肖垮了，一五一十地承认了他所做的一些不诚实的事儿。

对肖福来的主要指控是他在自己管理的仓库里盗用了生产队的几斗麦子，他承认这件事还牵扯到郭元龙。

郭元龙是贫农，天主教徒，1948 年他保护过张庄的党员，说他们是“好人”，并因此当选了第一届村人代会的代表。

郭云龙：

……郭元龙后来当了第三生产队的干部，开始负责民事工作，因为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又当了第三生产队的会计。当了会计不久，他又出了问题了，成了出名的“多吃、多占”干部，总在人家结婚、新屋落成典礼上吃个够、喝

<sup>141</sup> 本节所有引用全部来自深翻

个足。一次，他管的账出了问题。他说他锁在抽屉里的现金给丢了，许多人怀疑是他自己花了。另一点，在“四清”运动中又查出他分了肖福来从第四生产队仓库盗出来的麦子，鉴于以上罪行，队里的社员撤了他的职，他又一次变成了普通老百姓。

李锁子：

工分帐目很乱，他给自己的朋友随便多记工分，自己不上工也记工分，一年时间就给自己多记了80个劳动日，除此之外，还给他的朋友多分粮食。他的一位朋友的妻子刚怀孕，他就给尚未出生的婴儿分了粮，但却没有记在生产队的帐本上。

大队会计郭富书：

他干这个工作已经快20年了，所以人们怀疑他贪污的数目一定很大。可查帐后发现他的帐目上只短600元，人们指控说在这600元中他贪污了100元，虽然数目不大，但这就足够了，他也被撤了职。当然撤他的职不是因为100元的数目大，而是因为这钱是被一个曾在抗日战争中当过伪村警头的人贪污了，他的被撤是因为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加上小小的不能让人信任的贪污行为造成的。

令人吃惊的是，郭福书被撤销了大队会计后，申继财接了他的班……几乎同时，另一个年轻人申大力接任了副业队的会计。在“小四清”结束，“大四清”开始间的七个月的时间里，这两个在一起工作的年轻人贪污了怀疑郭福书在20年时间里贪污的钱数。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工作队在张庄执行的 policy 不象省委工作队在昔阳执行的 policy 那么残酷。但他们仍然怀疑那里所有的干部，他们的怀疑导致一些案例的揭露。但同时，由于他们没有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没有给群众讲清楚运动的根本目的，所以运动不能深入下去，调查也只是了解表面现象。“在各大队的工作队之间存在着竞争，”王京和继续说，“一个工作队说，‘我们挖出了三个1000元的贪污犯。’另一个工作队就会因为没有挖出一个贪污犯而感到羞愧。”

“大四清”是在公社所在地马厂进行的。马厂召开了20天的“洗脸、洗手、放下包袱”会议，或简称为“三级干部”会议：

工作队把每个大队的干部分成了两组。第一轮试验性的自我批评以后，问题不大的人就成了组长。小组对组员的生活和安全集体负责。

工作队就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案件。白天，工作队员与可疑分子单独谈话，晚上可疑分子到大组或联组会上交待问题，“加温”。

工作队让每个干部回忆一下自己的过去，记住是党把他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通过忆苦思甜，他们哭了。一旦工作队的干部们满意了，他们就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决定是从宽还是从严处理。在“大四清”时，工作队仍然只抓贪污问题。“正象老八路王京和说的一样，工作队死盯着贪污问题不放，大的问题就容易被忽视，同样，小问题也很容易被夸大为大问题”。

张庄“大四清”的两个成果为：

张兴发：

马厂的三级干部会揭发出了他所有的房产交易和从三个生产队借粮的问题，他们说兴发和三个生产队长是一个“贪污团伙”，并把他们当成了教育全体干部的典型。兴发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十几次自批评，听取其它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向工作队作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被群众讨论以后，兴发自己又和工作队的干部们谈完后再到群众大会上去讲，群众再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提出新的问题，就这样，对兴发的批评反反复复一直搞。

在批评教育的过程中，他成了张庄有名的“走资派”，成了“四清”运动的重点对象。……为了更确切地证实这件事，后来工作队又派人详细调查了兴发的过去和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但不管他们怎样渲染，夸大这件事儿，也很难把兴发定成一个罪大恶极的顽固的反动分子，因为他占用的公款数字太小，只有180元，因为坦白诚恳，后悔他占用公款欺骗了人民，他们把他欠大队的钱减掉了80元，卖了自行车和收音机他就赔了一切。

工作队没有把他的案件上交法院，党的领导也没有给他任何党纪处分，最后，大家都认为他得到了从宽处理。但一个张庄的领导干部、一个当了20年村干部的人、一个领导张庄经过了土改、互助、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的人，最后就由于180元钱被说成了“走资派”，羞辱中生活了许多年的事实却是存在的。

申天喜：

张庄的工作队把大个子民兵、1961年以后一直担任大队保管的申天喜树成了主要的靶子。在“背对背”会上，吴树林说他和天喜从仓库拿过8袋麦子……天喜也承认这些麦子是搬进了他家院子，不过只放了一晚上，那是因为白天装袋装得晚了，不能往其它地方放了，他坚持说第二天早晨就到了粮食局，陆玉生可以作证，因为是他把粮食拉走的。但由于好几桩别的事情，人们认为陆玉生不诚实，所以，没人相信他的话……他们要天喜至少赔6袋粮食。他们本来计划要他赔8袋的，但由于当时天喜喂养的两头大队的骡子长得又肥又壮，他们认为这些骡子吃了偷来的粮食，因为骡子是大队的，所以让他少赔两袋。

天喜坚持自己是清白的，并把工作队的决定上诉到了公社，但公社的领导仍坚持原判。到1965年“大四清”运动开始时，毕敏又把注意力放在了申天喜和那八袋粮食上。在毕敏的诱使下，会议就这样开了一整天，最后天喜觉得受够了，站起来说：“是，是我干的，我贪污了这些麦子。”

“你吃了多少？喂了牲口多少？”

“天喜看了看周围说：“大部分浪费了，我吃了我想吃的那么多，喂了牲口许多。这就是骡子那么肥的原因。”



“还剩多少?”

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拿公家的粮食，怎么能说出还剩多少?他得想想，编一个数字出来。

因为天喜说不清，那天的会就暂时散了，毕敏要天喜好好想想。因为后来也没有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所以毕敏说天喜贪污了八袋麦子，并象以前一样，决定让他赔六袋。

因为天喜没有执行这个决定，这件事儿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他自行退了党，党支部重新建立时，他拒绝登记，直到1971年他仍在党外。

#### 四、四清运动的转折

##### 1、《二十三条》的制定

“大四清”运动是在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后十条修正草案发动反攻以后开始的，毛泽东对“四清”运动被用来打击大多数干部群众感到痛惜。1964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在针对华北局对刘少奇做法的不同意见，委婉地说：“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1964年12月15日至28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正式爆发。后来毛泽东自己曾说，正是在制定二十三条的过程中，决定了要拿掉刘少奇。毛主席已经对刘少奇接近失望了，经过二十年的帮助，扶不起来。<sup>142</sup>

1964年12月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而这些冲突，后来在《二十三条》中都明确提及。

刘少奇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

“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

显然，毛泽东的注意力，已经完全放到了党内，放到了当权派身上。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sup>143</sup>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立即表示：“赞成。”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事情并没有完。

12月26日这一天，毛主席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了生日。毛主席让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跟他坐在一桌。毛泽东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12月28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这一天开会前，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要去两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带到了会场。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他提到，“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影射了刘少奇的独断的作风。发表完意见后，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

<sup>142</sup> 周总理。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八日

<sup>143</sup> 毛泽东对“四清”概念的改变，是采纳了王任重的意见。他在1964年11月26日看到王任重11月15日在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的一个讲话节录。王任重提出，县、区、社各级机关的运动，与农村一样都叫“四清”，不再叫“五反”，中心内容都是搞“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12月28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但到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忽然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1965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1月5日，毛泽东又说：“……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1964年12月31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

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而“二十三条”所提出的，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进一步演化，成为发动文革的前奏。

## 2、毛泽东对刘少奇认识的变化

1967年9月18日，周恩来在广州驻军干部会议上，详细介绍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认识变化的过程。

周恩来说：一个人犯了错误，如果不改，总是积少成多的。不会是一下子从犯错误那天起，就把他的错误定下性质。凡是犯政治错误的，都是逐渐发展的。如果改了他就好了，把错误变成反面教员了。

遵义会议以后到“七大”以前，十年之间，就用了三年功夫整风。当时在高级干部中，能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不算多，当时看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在历史上犯错误较少，相反地，当时把刘少奇看是白区工作的代表，邓小平当时又成为江西执行“左”倾路线中受打击的人物，所以在那个时候当然要给予信任。

1945年重庆谈判时期，毛主席明确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而刘少奇却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相信民主可以实现，和平也可以实现；

1949年5月，刘少奇到天津，未经请示，就和资本家（就是他亲戚和其他资本家）谈话，说中国资本家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欢迎资本家来剥削，来开新工厂，这样就可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剥削的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是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劳资两利”两利的方针是不同的，“劳资两利”是保持现状，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

1951年春夏之际，在土地改革以后，山西因为是老区，很快就想搞合作社。刘少奇不赞成农村搞合作社，认为需要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个认识，在当时是滞后于实践的发展的，毛泽东很快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且推动了合作化的进行。

1956年的“八大”，是刘少奇作的政治报告，邓小平作的组织报告。当时我国三大改造成功以后，刘少奇错误地认为，生产关系进步了，生产力落后了。把这个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就忘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矛盾。<sup>144</sup>

1962年国内经济困难时期，苏联撤退专家，毁弃了条约，还遇到三年灾荒，引起了一股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出现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刘少奇在这时候，纵容了这种做法。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大声疾呼地把它揭露了，特别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所讲的社会主义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1963年，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十条，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进行阶级斗争，怎样来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可是刘少奇领导的四清运动，搞形“左”实“右”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撇开广大群众，叫所有干部靠边站，不加以信任，靠人海战术，扎根串连冷冷清清地搞四清运动。刘少奇推行王光美桃园大队的四清经验，要把它广为传播。在四清运动中间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积极尖锐的批评。

从上面的过程可以看出，重庆谈判以后，在涉及到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时，刘少奇总是站在资本主义道路一边。而当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教育，直接针对路线问题的时候，刘少奇就必然采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从而起到保护自己的作用。

## 五、资产阶级法权、官僚主义、群众运动这与走资派辨析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在运动方法上发生了明显的分歧。毛泽东强调群众运动，刘少奇强调运动群众；在运动的主要对象上，毛泽东认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是四不清的干部；而二者又似乎都反对官僚主义者。那么群众运动与走资派是怎样的关系？如何更好地理解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为什么说这样的分歧是两条路线的分歧？

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党内并没有完全解决。实际上，这是直到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重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并在1975年的《红旗》杂志上深入论述后，才得以解决。

### 1、资产阶级法权

最早重视资产阶级法权，是在大跃进时期，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大跃进的主要理论基础。这也成为毛泽东从1958年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为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提供了依据。<sup>145</sup>

1958年8月17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就不分等级了。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整风以来，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差不多破坏完了，领导干部不靠威风，不靠官架子，而是靠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福利，靠说服。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人活着只搞点饭吃，不是和狗搞点屎吃一样吗？不搞点帮助别人，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没有薪水制，一条有饭吃，不死人，一条身体健康。

1958年8月30日上午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总之，我国商品不发达，进入社会主义，一要破除老爷态度、三风五气，一要保留工资差别。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并加了毛泽东亲自写的编者按。编者按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目。从此，全国各地的主要报刊都开展了关于

<sup>144</sup> 这个问题，应该说毛泽东本人当时也未完全认识清楚，但是毛泽东很快就纠正这个错误，并推动全党统一了思想。

<sup>145</sup> 高远戎。“大跃进”期间的资产阶级法权讨论及影响——试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构想。《中共党史研究》第3期

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肯定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的作用为标志，这场讨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8年10月至11月。以《人民日报》为例，讨论涉及的主要观点如下。

1. 解放以后应采取供给制还是工资制。这是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解放以后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势在必行，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物质财富还不是极其丰富，人们还缺乏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不能从绝对平均主义出发把工资制诋毁为等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是倒退了一步，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妥协和让步。这压抑了革命队伍中共产主义精神的发扬，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应该不断地扩大供给制的范围，逐步替代工资制。还有一种折中的观点，以人民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给和部分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为例，认为工资部分是以劳动作为分配的尺度，即按劳取酬；供给部分是以需要作为分配的尺度，属于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范畴。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

2. 要不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采取何种分配制度实际上涉及是否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问题。在讨论中普遍认为既要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残存着资产阶级法权，但要创造条件使这种残余消失。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情况下，利用某些资产阶级法权，正是为了创造条件逐步削弱资产阶级法权，以至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时期，完全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3. 按劳分配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讨论中大部分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废除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消灭了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有人进一步分析指出按劳分配具有两重性，它既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又存在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既要肯定按劳取酬具有革命性，又要认识到它实际上承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原则。因为按劳取酬所依据的原则还是“等价交换”的“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讨论中的一些文章，并对个别文章作了具体的批注。但讨论并没有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愿而展开。讨论中对按劳分配的否定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11月6日，毛泽东在发言中继续对张春桥的文章表示欣赏。同时毛泽东也对讨论中对按劳分配的否定表示失望，12月6日，他在另一次谈话中说，张春桥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毛泽东不再笼统地讲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而是采取了分析的态度。

他说：“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我们要恢复供给制，但要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还是必要的。

在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有用”和“无用”两种。他认为对“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总有一天我们要陷入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毛泽东在阐释资产阶级法权上的思想变化，直接影响到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讨论第二阶段从1958年11月中下旬到1959年4月中旬。针对前一阶段讨论对按劳分配的否定，这一阶段的讨论进一步阐述按劳分配原则的两面性，充分肯定按劳分配在当时的积极意义。讨论澄清了对按劳分配的否定。

后来，在纠“左”时期，毛泽东所阐述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继续肯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变革生产关系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

在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坚持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民在劳动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他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文章。要领导者采取平等态度待人；一年、两年整一次风；进行大协作；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

毛泽东仍然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作为不断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而且这种变革主要是通过整风运动等政治方式、思想教育方式调整干部与群众、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整风使干部去掉“官气”。但他在强调这种关系时，往往片面地强调政治挂帅、思想觉悟等主观因素，而忽视物质基础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变革中的作用。

第二，对无用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破除，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整顿党的作风的一种延续。

毛泽东所说的无用的、要被破除的资产阶级法权大部分属于官僚主义范畴，将马克思所指的资产阶级法权内涵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政治领域。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就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党风建设的切入点，开展了多次涉及清除党内官僚主义的运动，如1950年的整风运动、1951年的“三反”运动、1952年在“三反”运动基础上的整党运动、1953年的“新三反”运动。这种注重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一方面抵制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遗留的恶习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腐败分子，教育、挽救了一些干部，纯洁了干部队伍；另一方面只承认有官僚主义作风问题，而忽略了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问题，使建国以来的整党整风运动偏重于从思想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因此，出现

了毛泽东所说的现象：“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两三年，他都忘记了，那个官僚主义又来了，所以过了一个时候就要整整风”。早在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十分注重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矛盾，他强调“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26）。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使毛泽东具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在急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的时候，资产阶级法权被作为产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蜕化变质行为并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提了出来。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虽然毛泽东没有明确提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但整顿党的作风的政治运动并未间断过。

第三，针对由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引起的废除商品和货币的思潮，毛泽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认识。

一是批评了取消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要忌讳“商品”这两个字，并指出消灭商品生产的观点是违反客观规律的，“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论断。他认为“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对商品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毛泽东仍把这一问题作为武昌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目的在于纠正党内不少人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以纠正由此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

毛泽东在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应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提出“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正确论断，为纠正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奠定了基础。以这种正确的认识为指导，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更多地是从实践的层面上强调等价交换、价值法则和按劳分配问题，找出了当时国家与农民之间关系紧张、农村普遍存在的瞒产私分现象的症结所在，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了以生产队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这在纠“左”的问题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大跃进结束后的几年，毛泽东的思想不受重视，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也很少提起。直到四清运动和中苏论战的过程中，毛泽东对这一概念又开始重视起来。

在中苏论战中，1964 年 7 月，《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指出，斯大林实行高薪制使一部分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特权阶层”实行物质利益原则而把人们引向个人主义，因此，必须限制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九评”还把资产阶级法权与资产阶级活动及其腐蚀作用、城乡小生产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并列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贪污盗窃分子的根源。“九评”指出既然社会主义内部可产生资产阶级，那么“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息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复杂的”。这既为阶级斗争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也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埋下了伏笔。“九评”提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还没有完全取消，还存在着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还存在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我们在国内的任务除了消灭剥削阶级和发展经济之外，还要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

有了这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认识，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呼之欲出，而且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进一步设想也浮出水面。1966 年 5 月 7 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即《五七指示》），提出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大学学校里工、农、学、兵俱全，惟独排除了商业。不难看出，毛泽东要建立的未来社会是要逐步消灭分工和商品的社会，其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在各方面的平等，根绝产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这种设想是“大跃进”时期对未来社会设想的进一步发展，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没再明确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虽然他设想的理想社会是逐步取消商品货币，取消工资，但他没有提出怎么取消；同时也吸取了“大跃进”时期盲目提出恢复供给制给社会生产造成混乱的教训。但他始终都没消除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忧虑。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 年 10 月 20 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又重提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这次谈话，可以认为是毛泽东对建国后全部历史的一次总结。虽然谈话的内容不多，但都深刻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毛泽东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法权还不能完全取消，但是应当加以限制。对资产阶级法权抱什么态度，是赞成加以限制，还是主张不断扩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要不要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

可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毛泽东的一个理论总结。不是 1958 年强调的“破除”，更不是刘少奇、林彪的“扩大”，而是限制。

毛泽东指定张春桥写这类文章，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张春桥和姚文元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经毛泽东圈阅，于 1975 年 2 月 18 日发出。这一《通知》，向全党公布了上述的《毛主席指示》。



随后，1975 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署名夏力之的《货币交换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并组织撰写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从此，报刊上再次出现了大量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

在 1976 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毛泽东再次提及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邓小平提出整顿、“三项指示为纲”，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出现这类问题，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时候，他看重的是资产阶级法权是阶级斗争存在特别是党内走资派存在的主要根据。“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是他因此得出的结论。

## 2、《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红旗》杂志上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可以认为是对资产阶级法权概念的总结性的论述。这里详细介绍一下。

毛泽东早在 1958 年就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认为，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分配形式三个方面。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中，更深入分析了资产阶级法权。文章认为：

首先，所有制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另一方面，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sup>146</sup>

同时，所有制问题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实际内容，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一方面应该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

其次，在商品制度方面，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

在此基础上，文章引用了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文章强调，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因此，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在一切领域、一切阶段的专政。

文章还注意了“左”的倾向，反对共产风。认为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而这些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带来的危害，则通过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

这篇文章虽然解答了部分疑问，但可以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总结还是非常有限的。譬如，在不同的阶级力量对比下，如何能够始终团结大多数的人，应该在哪些领域、多大的范畴内去限制在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都没能做出清晰的回答，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许多混乱局面、无法抓住主要矛盾、找准主要敌人的理论根源。也鉴于此，关心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该研究中，而不是侧重派别之间斗争或经济数据成就的研究探索。这项任务，是未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而浩大的理论任务。

## 3、官僚主义、走资派与资产阶级法权

有了上述的分析，理解官僚主义的概念就容易许多了。

毛泽东在强调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之前，经常采用官僚主义的概念，这当然有其历史的原因。而在开始强调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并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后，则越来越少地采用官僚主义的概念。<sup>147</sup>

既然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么必须反对那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最大的代言人，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看看列宁对阶级的定义，“所谓阶级，

<sup>146</sup> 因此，改革开放的过程是从农村首先展开的。

<sup>147</sup> 1965 年 1 月，毛泽东再次采用了一次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他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大概是因为这个批示是针对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的缘故。信中说，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sup>148</sup>。中国国内的党内特权阶级，不正是符合这样的情况吗？毛泽东给这种人下了一个定义，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走资派。也正因为这些人已经形成了阶级的利益，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就会强烈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革命。“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sup>149</sup>

因此，走资派，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其阶级基础，就是巩固并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在理论上，他们认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才能促进生产发展，在实践上，他们疯狂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

前面已经提到，资产阶级法权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一个大的领域，生产关系又分为所有制关系、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分配关系<sup>150</sup>。对于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在农村，所有制关系尚未完全解决；在工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解决；在全国，分配关系、上层建筑领域尚未完全解决。因此，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表现为在农村反对集体化，搞分田单干、破坏公有制的基础；在工厂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sup>151</sup>，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使工人的注意力盯着钱，而不是盯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搞一长制（厂长负责制）、扩大干部权力、强化工人纪律，反对群众运动搞生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强调学习西方，主张个性解放丑化集体主义，否认群众可以发扬主人翁精神建设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会大锅饭养懒汉。只有强化这些，才能保障其资产阶级法权，并最终扩大成为资产阶级的正式的权力，像后来在苏联所看到的，这些中苏论战中被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的代言人，在农村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在工厂搞国企的私有化大捞一笔，而广大的苏联民众，却并没有从中获得利益。

那么，何谓官僚主义？如何看待官僚主义者与走资派、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法权的关系？

官僚主义本身并非科学的概念，马恩的原著中很少提及官僚主义。但这个概念又是很容易被群众所理解的，因此，又经常被人采用。当人们提及官僚主义的时候，一般是指管理人员不密切联系群众，脱离群众，而管理者本身又掌握着许多公共权力，因此，实际上就造成了一些公权私用。一般的，官僚主义具有如下的特点：等级制（特权，不一定是资本的权利，也可能是打击资本的权利），不做实事，化公为私，欺上瞒下，明哲保身等。

为什么官僚主义与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容易混淆？这是因为，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中，生产关系的第二部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干群关系非常类似，也因此与官僚主义的关系很密切。但用官僚主义来概括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全面的。

官僚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所指出的，“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sup>152</sup>；在四清运动的最重要的文献《二十三条》中，在列举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支持者之后，明确指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不清，用人不当，对工作检查不力，犯官僚主义错误。”由此可见，官僚主义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由于认识问题或工作方法问题，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而走资派则完全属于敌我矛盾，必须去打倒。文化大革命中间，有相当一部分造反派的错误，正是在于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凡是带“长”（局长、处长等）的一律作为敌我矛盾处理，造成打击面严重扩大，在毛泽东和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再三教育下<sup>153</sup>，才稍有改善。可见，理论上认识到官僚主义者与走资派的区别，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找准革命对象，团结最多数的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官僚主义的概念使一些人误以为干群关系是不可调和的，从而产生近似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宣传最多的大寨、大庆，绝非无政府主义的，恰恰都是有集中的领导、又有很好的干群关系。大寨的陈永贵，坚定地团结大寨人走集体化的道路，愿意舍弃自己利益促进集体事业的进步。陈永贵和他领导的大寨党支部没有官僚主义吗？肯定也是有的，官僚主义并不可怕，只要干部能够带领群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农村搞好集体事业，在工厂反对物质刺激、一长制、发扬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在全国反对资产阶级的学说，这样的人，路线上对头，身上哪怕带有官僚主义的一些不足，也依然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如果因噎废食，有官僚主义就不用，那么建设事业谁来领导？

<sup>148</sup>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7卷，13页，人民出版社，1986版

<sup>149</sup> 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信（1966）

<sup>150</sup> 这种分类方法是斯大林提出的。孙冶方曾提出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所有制只是一种财产形式，是法律范畴内的一种生产关系的表述，不应该以所有制来概括生产关系。而应该采用恩格斯所提出的生产关系应包括生产、交换和分配三个方面。具体参见孙冶方《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本文的分析沿用斯大林的观点。

<sup>151</sup> 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这种方式有利于工人对工厂的管理。毛泽东把“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称之为“鞍钢宪法”，使之与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相对立。（一九六〇年十月四日）

<sup>152</sup> 在文革期间，写于1957年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往往被认为是文革的重要文献，经常被提及和引用，九大的报告更是明确这篇文章为孕育文革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这篇文章的思路是符合后来毛泽东的思路的。

<sup>153</sup> 张春桥：在上海，当我们问到造反派组织怎么样时，他们总是说：我们组织很好，连一个科长也没有。中央有一个机关连副科长都不要，还自以为纯洁。简直没有一点阶级分析。最近，国务院向我们反映了一个材料，一个市委机关造反总部向国务院发了一个通令，要求取消一切“长”。里面不少话是错误的。如“历来是处长管科长，科长管科员”。我看将来也还是要这样。“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林彪同志是国防部长，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这是反动的。毛主席毫不含糊地讲：“连副科长都不要的，呆不了几天。”（张春桥：上海文化革命广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誓师大会”上的讲话。1967.2.24）

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官僚主义的内容。正像梁思成所说的，凡是有政府、有组织、有机构的地方，就可能有官僚主义<sup>154</sup>。在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不官僚主义的就是清官，而清官恰恰是封建社会最好的统治者，这个后文会写到，当地主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再腐败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使社会后退到奴隶社会，而开明的封建社会的君王也会反对官僚主义以维护其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的官僚主义，尤其在落后的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很严重的官僚主义，当资本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再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使社会后退到封建社会，而开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统也会反对官僚主义以维护其统治；同样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当无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官僚主义也不会使社会主义社会退回到资本主义。因此，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是不是取得决定性胜利，这又取决于资产阶级法权是否受到了限制。因此，官僚主义应该反，但最重要的不是官僚主义，而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喜欢强调官僚主义，强调反对贪官，使人认为清官是好的。这就使人忽视了重要的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及由此产生的官与民的脱离，把注意力放到结果上，而不是从基础上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土壤。1964年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会上，陈伯达发言说：“‘四清’与‘四不清’不能说明问题的性质，封建社会就有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清，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阶级内容，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毛泽东插话说：“清朝刘鹗的《老残游记》中说，清官害人比贪官害人还厉害。后来一查，南北朝史中的魏史就有此说。”陈伯达讲：“内部矛盾哪个时代没有？党内外矛盾交叉，党外有党，国民党也有这个问题。说‘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叉’，这也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要把矛盾的性质说清楚，不然就要迷失方向。要概括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才能说明矛盾的性质，就有了纲啦。”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还讲：“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后来的文章更深入地阐明了这一点，提出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如果说反官僚主义就是要用所谓的清官思路，用类似彭德怀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来反，那么最终的结果，却恰恰是群众的集体事业被破坏，最终成为一个也许官僚主义很少，但是群众却沦为资本的奴隶。<sup>155</sup>这一点上，上面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所谓清官，那些清官都是大财阀”的论述是非常深刻的。苏联的解体，正是所谓反对官僚主义，却最终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苏联人民现在迎来了清官，但生活水平却从此一落千丈。

或许也可以用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也有助于理解此事。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其中的厂长、车间主任则类似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不同级别的职业经理人，在带领全厂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都可能会产生官僚主义的错误，譬如，工作懒散，推卸责任，等等。这个时候，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通过整风运动，可以有效地减少官僚主义的错误。但是，走资派则一心想着增加自己的特权，工作忘我却反复强调加强工人纪律，做事干练却独揽人权财权事权，积极推行一长制，这些人可能很少官僚主义的作风，却恰恰是最大的敌人。对比后来的改制过程，步鑫生、陈卖光不都是忘我而干练、极少官僚主义吗？这应该是发人深省的。

因此，官僚主义并不科学，应该更多地采用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走资派的概念。

#### 4、群众运动与资产阶级法权

为什么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群众路线上的分歧最终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分歧呢？

这是因为，在农村，首先要继续改变所有制的方面的问题。从农村集体化的章节可以看到，要使得集体事业从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高级社直至人民公社，都需要贫下中农的支持，而富裕的中农，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对其有利，是热衷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所以参与集体事业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为了缩小资产阶级法权，就必须动员广大的贫下中农团结起来，贫下中农团结了，集体的事业就有了力量、有了保障。在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有了干部的坚强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发动群众运动，群众一旦发动，一切集体的事业就很容易前进，这也是为什么集体化的过程中，总之一波的群众运动就会引起集体事业的一阵前进。而压制群众运动，搞少数人冷冷清清，最终就是集体事业的涣散。

在工厂，首要的是改善工厂管理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跃进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许多基层干部发动群众大搞生产革新，群众以高涨的热情积极参与，干群关系大大改善，群众热情大大激发。从此，群众运动一发动，工人当了工厂的主人，一长制、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见踪影。反之，在刘少奇的四清运动中，工厂里冷冷清清，少数人搞社会主义教育，反而助长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善。

在1961年编《工业七十条》的过程中，就强化了工人的纪律和厂长的权利<sup>156</sup>，当时就有人认为条例对“大跃进”的正面经验总结得不够，肯定得太少：大搞群众问题不突出；对政治是统帅、是灵魂阐述得不够彻底；对专业管理写得过多，控制得严，而对鼓励企业千方百计地发挥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写的不够；只提到尊重科学，没有提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等等。也有人说：我们办工业有两个时期的经验：“一五”时期，少数人办工业，我们自己没有经验，照抄苏联，规章制度太多，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大跃进”时期，虽然管理上有些混乱，应该改正，但这个时期放手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了许多好经验。条例草案稿，对第一个时期的经验吸收得多，对第二个时期的经验吸收得少。还有人认为，对第二个时期的经验，从消极方面吸收得多，从积极方面吸收得少。在讨论时，有些企业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有的还很尖锐。如北京市12个厂矿的党委书记、厂长和工人代表在座谈时讲到：“看到这个条例，感到有点反冒进的味道，似乎把‘大跃进’的东西都吹了。”“对‘大跃进’的经

<sup>154</sup> 梁思成. 整风一个月的体会. 人民日报 1957-06-08

<sup>155</sup>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人民日报. 1965年11月10日

<sup>156</sup> 实际上七十条内并非一长制，而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上的厂长负责制，但这种制度也并非群众所乐见的。

---

验肯定得少，看后使人泄气。”有的还统计了条例草案中“不许”、“不准”、“禁止”之类的字眼有多少处。有的人还认为：写责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众运动方面则不突出；写按劳分配、给钱方面很突出，而对政治思想方面则不突出。还有的认为：写厂长负责制方面是连贯的，一气呵成的，写政治挂帅方面则是点滴的、不连贯的；写强调尊重科学方面很突出，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则不突出，等等。

可见，在工厂不搞群众运动，就会搞物质刺激、搞一长制，就会助长资产阶级法权。

这也是为什么，刘少奇一搞群众运动，就必然是运动群众，形左实右，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每一步，都指向资产阶级法权，指向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的特权。

因此，可以总结，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中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群众运动。只有群众运动，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保证社会主义事业。也只有在资产阶级法权的意义上，去理解群众运动，才能深刻理解群众运动的方向，避免无政府主义的错误。

## 第八章 中苏论战及其历史意义

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壮大，到 19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修正主义，即以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在工人政党内部展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sup>157</sup>列宁揭示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社会根源是工人贵族阶层。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由于有比较高的垄断利润，垄断资产阶级可以拿出一小部分利润“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sup>158</sup>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内部又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sup>159</sup>。那么现代修正主义的特点是什么，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有什么不同，其阶级根源是哪些社会集团，这些重要的时代问题正是中苏论战所要解决的。

### 一、中苏论战过程

中苏论战始于 1956 年苏共二十大。在两党没有分裂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反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到 1958 年，赫鲁晓夫地位巩固，开始和中国发生摩擦。先是通过尤金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7 月进一步提出要搞联合舰队。中国的海军只能做沿海防御，没有任何实力参加联合舰队，苏联是想借联合之名，行控制之实。7 月 31 日赫鲁晓夫来中国，同毛泽东等人大吵一通，并威胁“苏联准备把在中国的顾问全部撤回去”，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赫鲁晓夫回国以后，从 1958 年底开始不断影射、攻击中国。1959 年 9 月赫鲁晓夫访美，这时他还处在跟美国“和平共处”瓜分世界的美梦中。访美前，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送了两件贡礼：一是 59 年 6 月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二是 9 月 9 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偏袒印方的声明。9 月 15 日～28 日，赫鲁晓夫在美国访问，之后就访问中国，10 月 2 日在中南海宣讲“戴维营精神”，鼓吹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的很好、生活水平很高，说社会主义跟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来“试试它的稳定性”。然后批评中国炮击金门、偏袒印度等，毛泽东、陈毅、周恩来等人先后同赫鲁晓夫激烈辩论。赫鲁晓夫就影射中国是“好斗的公鸡”，说我们“冒险主义”、热衷战争。毛泽东于是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sup>160</sup>

从 59 年年底，赫鲁晓夫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对表”，要向莫斯科看齐。1960 年 2 月，在莫斯科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对中国进行猛烈攻击。针对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同时也为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60 年 4 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指出虽然核武器等新技术的发明有重大意义，但时代并没有变，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并阐述和平共处的政策与和平过渡的区别等问题。5 月 1 日，美国 U-2 飞机入侵苏联，赫鲁晓夫到巴黎要求美国公开道歉，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很没面子只好愤然回国，四国首脑会议流产。6 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给各国党发《通告书》，说社会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今天已经不是帝国主义时代，和平过渡成为可能，批评中国没跟苏联“对表”，采取了“独特的立场”。到 60 年 7 月，苏联全面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经济援助、国防工业援助的协议，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当时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围攻中国，面对越来越大的反华声势和压力，毛主席反而讲我们不孤立，孤立的是赫鲁晓夫。8 月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说：“什么叫孤立呢？讲不清道理就叫孤立。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在 60 年 11 月召开的 81 党莫斯科会议上，除荷兰、朝鲜、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少数国家，大部分都随着苏联批判中国，77 个党发言 51 个党站在苏联一边，15 个党和稀泥，除去中国还有 10 个党基本反对赫鲁晓夫。面对这样强大的压力，中国党代表团以斗争促团结，最终迫使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结束争论，希望中苏两党恢复到 1957 年那个时候的良好关系<sup>161</sup>。

61 年经过短暂的缓和期，从 61 年 10 月苏共 22 大，赫鲁晓夫大搞四反，就是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周恩来发言批评和劝告赫鲁晓夫，被拒绝。此后，双方走向公开分裂。62 年 4～5 月，苏联在新疆伊犁地区搞颠覆活动，煽动几万人跑到苏联那边去。10 月加勒比海危机，赫鲁晓夫全面屈服，此后调转枪口，批评中国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各国攻击调门越来越高，于是在 62 年底～63 年初中国共产党连发《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三篇社论，其中对陶里亚蒂这篇，是因为意共在四大报告中点名攻击，正如毛主席所说“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陶里亚蒂是紧跟赫鲁晓夫的，意共鼓吹核武器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原理已经失效，核武器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毁灭一切，一旦发生世界冲突，就是全人类的“集体自杀”；还提出了“结构改革论”，强调“武装起义和内战必须视为灾难而加以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庸俗的”，在帝国主义统治

<sup>157</sup> 列宁，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

<sup>158</sup>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选 2 卷，1916 年 1-6 月

<sup>159</sup> 列选 2 卷，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sup>160</sup> 十年论战，第 4 章 苏美戴维营会谈前后

<sup>161</sup> 十年论战，第 7 章 斗争与妥协



下，只要扩大民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对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逐步的改革，就可导致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质变”，从而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sup>162</sup>。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中国共产党共发表7篇答辩文章，这是第一轮论战，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指名道姓的批判，以留有余地。

63年1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只让他自己说话。于是《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揭露赫鲁晓夫假团结、真分裂的阴谋。此后，又发表了《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文章，系统回答时代主题、国际共运中的重大理论问题。7月14日，苏共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全面批驳。既然赫鲁晓夫扯开面子，那中国共产党也可以放手答复了。从63年7月到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九篇社论，评价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统称“九评”。其间，1963年9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当时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中国不利，毛主席讲：“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此外，毛主席还提出谁怕谁的问题，“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同日，赫鲁晓夫被勃列日涅夫搞掉。人们都争相传言，是我们的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台了。当时，毛泽东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中国共产党多次说寄希望于苏联人民，95%的苏联工农知识分子会认清修正主义真面目，事实上这一希望没有实现。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邀请中共访问莫斯科，中共派周恩来组队前往。中共是希望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政策会向好的方面转变，这一希望也很快落空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挑衅，对中方人员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苏联后来把这一事件解释成酒后失言，周恩来说这是酒后吐真言<sup>163</sup>。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苏共二十大以来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勃列日涅夫执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苏联党仍在修正主义路线上滑行下去。赫鲁晓夫下台以前，中国还打算发《十评》的，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这篇文章经过修改，于11月21日在《红旗》杂志发表，名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 二、中苏论战的历史意义

联系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与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现实，重新回顾中苏论战，可以发现这段历史具有重大意义，为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重要的启示。

第一，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相比，现代修正主义理论的特征是“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党、全民国家。《九评》中系统批判了这些理论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完全成熟了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指出，社会主义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个“传统或痕迹”主要指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贫富不同，还存在三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实现共产主义的角度看，仍然是不平等，仍是阶级重新产生的根源。<sup>164</sup>

在这里，列宁是主张三阶段的划分方法，“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生理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sup>165</sup>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是两种社会形态，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就是社会主义。《九评》的《驳所谓“全民国家”》一节指出，列宁这样总结：“第Ⅰ个时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资产阶级需要国家；第Ⅱ个时期，过渡（无产阶级专政）：过渡型的国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第Ⅲ个时期，共产主义社会，不需要国家，国家消亡”<sup>166</sup>。在社会主义仍存在着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sup>167</sup>，必须在巩

<sup>162</sup> 崔奇. 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9. [http://read.dangdang.com/book\\_3599](http://read.dangdang.com/book_3599)

<sup>163</sup> 阚和庆. 影响世界历史的中苏大论战的前前后后[J]. 党史博采, 2010(8). 31-34

<sup>164</sup> 国家与革命,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3、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sup>165</sup> 列选4卷,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sup>166</sup> 列宁全集31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61页,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 哥达纲领批判的笔记

<sup>167</sup> 列选3卷,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限制并促使资产阶级法权消亡，促进国家和阶级的消亡，最终进入共产主义。马克思也是基本持同样观点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讲：“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而赫鲁晓夫是主张四阶段论的，即资本主义、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过渡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到了第一阶段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只存在三大差别，因此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只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消灭三大差别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了。赫鲁晓夫讲，马列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而不是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家消亡之前就不再是必要的了。”赫鲁晓夫在四阶段论基础上，把苏联定位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上去，“在我国，列宁在这个判断中指出的以前两个时期已经成为历史。在苏联，产生了全民国家——共产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国家制度，并正在不断发展。”赫鲁晓夫认为只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阶段才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既然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阶级和国家都消亡了，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结束，苏联过渡到了“全民国家”的阶段。列宁很鲜明的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既然赫鲁晓夫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已经结束，那为什么苏联不取消警察、军队等国家机器呢？赫鲁晓夫不能解释这一问题，只好歪曲《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说这就是苏联实行的、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组织”。其实看看《哥达纲领批判》的前后文就知道，马克思说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句前面就是广为引用的那句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合格的，真正需要注意的是斯大林的解释。斯大林认为巨大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存在，在外部原因是“武装保护国家以防外来侵犯的职能则完全保存着，因此红军、海军以及为逮捕和惩罚外国间谍机关派到我国来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所必需的惩罚机关和侦察机关，也都保存着”；在内部原因上，“代替镇压职能的，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财产免受盗贼和人民财富盗窃者损害的职能。”<sup>168</sup>也即，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是因小偷存在而存在，这是主张社会主义阶级消亡论的修正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依据。

第二，社会主义仍然存在阶级。斯大林过早宣布苏联“已经不存在彼此对抗的阶级”，“没有阶级冲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的，“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是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例子，这里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同生产过程的社会性完全适合”，在消灭剥削阶级后，“在苏联社会中再也没有对抗的敌对阶级了……构成苏联社会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生活和工作的。整个社会不存在任何社会矛盾，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人们精神上 and 道义上的团结一致”<sup>169</sup>。但事实上，苏联的社会是存在矛盾的，斯大林把这些社会矛盾仅同国际帝国主义相联系，也就是认为国内是没矛盾的，要是工农闹事了，那一定是帝国主义挑动的。这种思想典型的话语就是“同海外、国外反动势力相勾结”、“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是一伙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刻骨仇恨的反动分子”。在这种思维下，当发生罢工等群体性事件，外电一报道，马上就可以给工人代表扣上“同境外反动势力相勾结”这项大帽子然后判罪。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不是全部都否定，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错误，而否定了斯大林正确的理论。在理论上，赫鲁晓夫是从全体人民和谐一致、都接受马列主义，并且苏联党代表全体人民出发，推导出了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

《九评》中讲：“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共产党内部来。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懂得，要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要使共产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新的和旧的资产阶级分子，新的和旧的富农，以及形形色色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都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因此这部分群体也是建国以后毛主席历次整风和群众运动的主要对象，“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同那些已经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彻底消灭的旧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结合起来，向社会主义进攻。尤其是那些窃据领导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他们支持和庇护基层单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危害性特别大。”

《九评》中列举了很多苏联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例子，说明在修正主义掌权条件下，资产阶级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一是在国营企业中，厂长动用国营工厂设备建立“地下车间”，进行私人生产大发横财。这同 80 年代推行一长制后，很多国企经理在大厂中设立小厂，支出走大厂、收入进小厂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二是集体农庄中，主席“俨然以一个有封邑的小公爵自居”，“什么事都独断专行”。三是城乡还存在很多私人企业，有的组织私人包工队，有的开设私营旅馆，有的进行商业投机活动，低收高卖，牟取暴利。列宁格勒一位“苏联女资本家”雇用工人生产和销售尼龙女上衣，“每天收入七百新卢布”。中国从 80 年代开始培育农村资本主义，这一现象在也广泛存在。

第三，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仍在彼此斗争，因此要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是修正主义上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九评》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机会主义、主要是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修正主义的特点，就是在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向无产阶级进攻，把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创造阶级消亡和国家消亡的条件，“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考茨基同伯恩斯坦不同的地方，考茨基是承认阶级斗争的，但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解决阶级冲突的武装斗争不

<sup>168</sup> 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序言

<sup>169</sup> 张有军。斯大林“社会和谐”思想及其思考。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再有存在的余地”，“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驾于政府之上的主宰。”如果仍然主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他也是这样来攻击十月革命的。现代修正主义与考茨基一脉相承，赫鲁晓夫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选举“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在国内有强大革命运动的条件下，把议会变成人民政权机关，就意味着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议会形成的、新的即无产阶级的人民国家体制”，无产阶级只要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就等于取得政权，就等于粉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工人阶级只要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sup>170</sup>。

第四，现代修正主义的阶级基础是取得政权后形成的特权阶层。列宁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归结于工人贵族，毛主席将现代修正主义归结于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由党政机关和企业、农庄的领导干部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同苏联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相对立的”。苏联早期实行新经济政策，对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高薪制度，这是特权阶层产生的重要基础，列宁早就指出，这种政策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限制特权阶层的产生？列宁非常强调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还非常强调，在工资政策中必须坚持巴黎公社的原则，即一切公务人员都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只对资产阶级专家付给高额的薪金。在十月革命后直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苏联基本上是实行列宁的指示，党政机关的负责人、企业负责人和专家中的共产党员薪金大体上同工人的工资相当。

二战以后，苏联的特权制度快速发展起来，1945年4月，苏联对在机关、企业、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具有高深学识的和经验丰富的人实行了特定工资制，后来这个特定工资额又有增加，出现了“钱袋”制度。莫洛托夫同苏联作家丘耶夫在1969~1986年期间作了多次谈话，莫洛托夫说：“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在战后配给制废除以后，“特权很快地重新开始扩大。有各种形式：几乎是免费占有别墅，有专用汽车，免费早餐，免费午餐(或者象征性地交点费)，假日去休养所、疗养院的大量路费补贴，‘医疗费’(休假日月薪照发)。但是，在斯大林时期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所谓‘钱袋’，即领导人员的工资附加款。这个附加款可以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给，不上税，甚至交纳党费也不包括它。例如，一个部长当时除工资外可得到两万多卢布，相当于1960年改革后2000多卢布。”<sup>171</sup>而1953年苏联勤杂工的月工资仅为260—360旧卢布，工业企业职工收入400—700卢布左右<sup>172</sup>，差距几十倍。高薪制度与按劳分配根本不同，高薪不再是工资收入，而是大量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使社会主义管理者退化为资产阶级的成员。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又扩大到工会领导、享有特权待遇的科学家、高级知识分子，人员总数为50万~70万人，加上家属，大约为300万人，即占当时苏联全国人口的1.5%<sup>173</sup>。

第五，大搞物质刺激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范畴，既不能马上消灭，又不能任其发展，需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予以限制。韩丁《深翻》中写了一段关于高级合作社时期实行按劳分配的情况，有两种方向，如果以工分挂帅，必然加深干部和群众、农民之间的矛盾，“工分挂帅最主要的问题是，人是消极的，被动的”，工分制把群众变成了对立面，干部只能管卡压，张庄短短十年内9次更换支书。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张庄没有走任物质刺激发展的道路，而是在“政治挂帅”原则下实行工分制，以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因此，按劳分配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方向，在按劳分配下，实行物质刺激原则、还是政治挂帅原则，是两种相反的道路。赫鲁晓夫说共产主义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工人阶级争取共产主义，不是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斗争，而是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赫鲁晓夫将按劳分配偷换成物质刺激，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极小部分人同工人、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加剧苏联社会的阶级分化。80年代中国国企工资制度改革，也是以物质刺激为导向，扩大奖金比重，以天津为例，1993年大中型企业职工收入中，奖金、津贴、补贴比重从1978年的14%上升到44%，工人中也广泛出现了“上班拿工资，干活要奖金，工资管饭，奖金管干”的现象<sup>174</sup>。官方号称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工人的积极性，实际上使工人阶级只关注拿多少奖金，而忽视了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利，通过加剧工人之间的不平等来分裂工人阶级。这一退步有利于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加强在经济、行政机构和党内都占据领导岗位的管理者阶层<sup>175</sup>。

第六，修正主义者必然将共产党歪曲为全民党。赫鲁晓夫为全民党找的理由如下：一是苏联共产党代表着全民的利益；二是全体人民接受了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建成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全民的目标；三是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苏共在自己的队伍里联合着全国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的代表；四是党的活动的民主方法也符合党的全民性质。这几条细分析都很可笑，《九评》针锋相对逐条批判。对第一条，因为共产党表达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就成为“全民党”，那共产党岂本来不就是“全民党”吗，为啥列宁还要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呢？对第二条，关于工厂、集体农庄的各种事实都表明，苏联正发生着激烈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怎么能说所有

<sup>170</sup>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3月31日

<sup>171</sup> 格·阿·阿尔巴托夫. 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sup>172</sup> 杨正良. 苏联企业工资制度的特点. 企业活力，1990（7）

<sup>173</sup> 刘克明. 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3）

<sup>174</sup> 舒衡，吕作红，童隽. 工资制度改革的成效、问题及对策——天津市部分大中型企业工资制度改革调查报告. 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3）

<sup>175</sup>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p80-83

的人都接受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呢？对第三条，说苏共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组成的，所以是全民党，那列宁时期共产党的出身也有各个阶级的，为什么列宁说是无产阶级政党呢？对第四条，共产党的活动方法是民主集中制，从成立第一天就这样活动了，那岂不是第一天就是全民党了吗？修正主义者对这些批驳根本无法回答，所以苏联报纸从来只登批判中国党的，不敢登中国共产党的批判文章，而我国是把苏联的文章和九评同时发在报纸上的。政党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中枢，只有将政党改造成为当权派控制的全民党，减弱工人阶级的影响，才能创造发展资本主义的土壤，并进而把党改造成资本家可以加入的“大熔炉”，建立符合资产阶级统治的上层建筑。

### 三、中苏论战对中国的影响

中苏论战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反修防修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十年论战的过程中，毛主席的视线逐渐从国外转向国内 1963 年 2 月，毛提出：“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前奏。毛泽东一手抓论战，全面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一手抓社教，采取措施主动防修。两者互相交织，进一步深化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1963 年 5 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是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如果不进行社教，“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同样，文革也是在反修防修思想指导下的必然产物。毛主席在文革中指出：“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sup>176</sup>《九评》提出“特权阶层”和“官僚资产阶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毛泽东提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重要观点，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sup>177</sup>。文革中进一步提出，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份注意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sup>178</sup>。

---

<sup>176</sup> 毛泽东同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杨力谈话，1966 年 12 月 21 日

<sup>177</sup> 戴朝霞. 中苏论战与五六十年代党的指导思想的两种发展趋向[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7 (1) . 11-14

<sup>178</sup> 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社论，1967 年 11 月 6 日



## 第九章 波澜壮阔的文革运动

文革是为了反修防修、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而发动的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文革主要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阶段从1966-1968年，大规模群众运动兴起，原有政权体系解体；第二阶段从1969-1971年，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军队力量达到顶峰后，林彪集团最终走向覆灭；第三阶段1972-1976年，老干部复出，重建党政体系，以“四人帮”为代表的造反派受到排挤，反对文革的社会力量逐渐形成。联系其后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文革尽管失败了，但仍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通过文革和改革正反两方面的现实教育，提高了群众的组织能力和觉悟，普及了反修防修的思想，为未来共产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理论基础。

### 一、1966-1968年的群众运动

这一阶段群众发动起来了，充分使用了“大民主”等手段，斗争极为复杂，各种反复不断，从中央文革到地方党政军，从群众保守派到造反派等各种势力都进行了充分的表演。毛泽东的战略部署不断被群众运动的自发性和社会固有矛盾所打断，但总的来说部分达到了毛泽东“斗批改”的目标。文革前制度的弊病充分显现出来，而群众经过运动受到了教育，增长了经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1966年初开始酝酿文革，5月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开始只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发动运动，对象主要是文化和教育系统的领导和知识分子。5月29日开始，以高干子弟为主，清华附中为首的一批中学的学生开始秘密组织红卫兵（后被称为“老红卫兵”）。这时候的老红卫兵由于自身的优势，并不把党委、校领导甚至后来的工作组放在眼内，不服从组织领导，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他们，因此运动初期的革命力量。6月1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刘邓开始派工作组进学校“领导”运动，主要是斗争学校里的“黑帮”老师和学生（多是出身不好和与领导关系不好的），试图控制学生运动。

以北京师大一附中为例，该校学生刘平平是刘少奇的女儿，她经常向刘少奇汇报情况，也将刘少奇的指示传达给工作组。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工作组进校，这个新的工作组和刘少奇保持着直接的联系。新工作组进校不到十小时就宣布：师大一附中属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两天后，由刘少奇亲自向工作组下达命令，将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说：敌人占百分之五是指全国，具体到你们学校和党支部，那就不行了！于是，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学生党员陈永康、何方方起来造反，贴出题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认为工作组盗用党的名义，利用职权，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象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当天，刘少奇接见了该校工作组，指出：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刘少奇的女儿在日记中写到：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学生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另一方面，是对群众闹事的可能场景的厌恶和防范：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了对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三次大规模的斗争会。三次斗争会后，全校一千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一百五十名之多。有一个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sup>179</sup>

在6-7月，各地当权派领导文革，按照刘少奇“引蛇出洞”的思路，将其作为另一场反右运动。湖北第一省委书记王任重说：“1957年挖出了55万右派，这个运动会发现更多的右派。（每单位右派）的百分比可能不低于百分之三，也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五。”<sup>180</sup>尽管有部分党员干部和群众勇敢的站出来，指出工作组和单位领导犯了路线错误，但大部分群众都没有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革的意图，认为当地党员干部是没有错误的。

如果中央的形势不发生变化，当权派领导的文革将重新以领导压制群众而结束。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开了若干会议，明确指出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当晚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明确指出：“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sup>181</sup>7月25日跟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指出工作组要撤，“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sup>182</sup>

在毛泽东的压力下，1966年7月28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宣布工作组从北京市中小学校撤出，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sup>183</sup>。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回信，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

<sup>179</sup> 萧喜东. 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

<sup>180</sup> 王绍光. 超凡领袖的挫败，第3章 旧游戏与新牺牲者，1966年6-7月

<sup>181</sup>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关于工作组问题汇报后的谈话

<sup>182</sup> 1966年7月2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的谈话

<sup>183</sup> 1966年 毛泽东指示撤销高校工作组（7月2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28/content\\_8785694.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07/28/content_8785694.htm)



热烈的支持……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的出路。”<sup>184</sup>之后召开 8 届 11 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党内矛盾正式公开。会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运动的斗争对象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还要求革命派严格区别各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文斗、不用武斗。<sup>185</sup>《十六条》明确阐述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斗争对象和采取的方式，标志着文革正式开始。

老红卫兵出身都是“根正苗红”，很多高干子弟最早起来进行造反。随着文革运动深入开展，老红卫兵逐渐开始走向保守、甚至反动。7 月 29 日北航附中老红卫兵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开始宣扬血统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在运动中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8 月 1 日毛泽东写信提到要接见红卫兵，此消息在高级干部中传播，大量知情的高干子弟纷纷组织红卫兵。8 月 18 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大量红卫兵组织产生。这些红卫兵分为两派：一派是保守派，成员主要为党员团员，与党委领导关系好，得到支持的；另一派是造反派，成员的成分很多是不好的，因此坚决反对血统论，他们把矛头指向党委领导，因此实际上受到仇视和压制。

很快老红卫兵发现运动的矛头开始触及自己的父亲母亲，因此出现了“保爹保妈派”。他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资本家，提出了“破四旧”（过程中大量的打砸抢）。工作组在撤出校园之前，组织干部子弟和拥护工作组的党团员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会（即文革筹委会），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群众组织相对立。8 月 24 日，贺鹏飞在清华大学临时筹委会支持下，组织其他 12 个学校红卫兵冲散正在大礼堂开会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撕毁校内反筹委会的大字报，严密封锁礼堂大字报区，实行戒严，勒令那些贴中央首长大字报的人撕掉大字报，派专人抄录大字报内容及作者姓名。12 院校红卫兵砸烂了清华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二校门。晚上，12 院校红卫兵高呼“只准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举行了“镇压右派”的示威游行，大搞所谓“红色恐怖”。他们强迫清华中上层干部拆卸、搬运二校门的砖石，对所谓“黑帮分子”进行了抄家，把大批中上层干部从家中拉到西阶，用带铜头的军用皮带<sup>186</sup>进行毒打，尔后将这些中上层干部关押起来进行了长达两周的折磨。<sup>187</sup>文革初期，许多知识分子自杀都发生在所谓“红 8 月”。老舍在 8 月 23 日被挂上反动文人的牌子，押至孔庙大成门前遭到残酷殴打，24 日清晨在太平湖自杀。从 1966 年 8 月下旬到 9 月 5 日止，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有 1772 人<sup>188</sup>。

这样的事情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把矛头由党内转移到党外、由当权者转移到群众。这种做法也很符合各层党委和领导的欢迎，因此得到他们支持和“领导”的保守派基本走这条路线。造反派坚持了正确的斗争路线，因而受到了党委、领导、保守派红卫兵的反动，出现了派别之间的斗争。兰州、陕西等一些地方当权派使用部队武装、警察对付造反派，纵容保守派群众打死人，中央在 8 月 21、22 日发出《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禁止这种做法，要求“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12 月 5 日北京市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其成员多数是父母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陈毅之子陈小鲁回忆说：“文化革命搞得国家已经面目全非啦，斗来斗去，父亲也受冲击了。我更加迷惘了。我们这边，‘西纠’也解散啦，八中有的同学成了‘西纠造反派’，就是‘哪里摔倒了，哪里爬起来’那种。中央文革认可了，还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然后呢，另一部分人转而对抗，就参与了‘联动’。此后，我更觉得没意思，就主动下工厂劳动。”<sup>189</sup>1967 年初，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老红卫兵最终退出文革舞台。

1966 年 8 月 31 日，毛泽东等接见了来自各个地方的红卫兵，并公开支持他们来北京，大串联从此开始。红卫兵串联打破了地方干部一手遮天的政治格局，即便在 8 月底 9 月初只有出身好的学生可以出去串联，到外地以后广泛宣传毛泽东思想，北京的保守派也变成了造反派。那时当地信息严格封锁，工农群众大部分都认为本地党委没有错，外出串联的学生问他们：“为什么苏联出了赫鲁晓夫，中国就不能出赫鲁晓夫？”为很多后来的造反派做了启蒙工作。当 9 月中旬串联的规模扩大时，当地干部对毛主席指示的封锁瓦解了；到 9 月底、10 月初，大批本地学生陆续从外地串联归来，群众开始明白，“炮轰”当地权威部门不是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一个学校里可以有不止一个的红卫兵组织，出身不好或早先被工作组孤立的学生应当与其他学生一样，拥有成立自己组织的权利<sup>190</sup>。

在北京红卫兵的影响下，各地的学生纷纷组织起来，开展辩论、游行、请愿等活动，而当权派则组织工农围攻学生。9 月 7 日，毛泽东做出指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sup>191</sup>。周恩来和《人民日报》社论都开始强调“用文斗，不用武斗”，并要求造反派分清敌我，学会团结。9 月 17 日，《红旗》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

<sup>184</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卷. 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

<sup>185</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 年 8 月 8 日）. 人民日报，1967-8-9

<sup>186</sup> 这种带铜头的军用皮带不是商品，当时是干部子弟的特别标志之一。

<sup>187</sup> 沈如槐. 清华大学文革纪事——一个红卫兵领袖的自述. 香港：时代艺术出版社，2004

<sup>188</sup> 章立凡. 四十年前的“红八月”[J]. 文史精华，2006（7）. 45-49

<sup>189</sup>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 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

<sup>190</sup> 王绍光. 超凡领袖的挫败，第 4 章 新游戏与新玩家，1966 年 8-12 月

<sup>191</sup> 毛泽东对青岛、长沙、西安问题的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

大方向，……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绝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但是这些都被地方党委领导以各种方式歪曲了。李井泉在重庆就工厂是否成立红卫兵做出指示：工厂不成立红卫兵，而依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sup>192</sup>。重庆市委要求基层党委选拔老工人及先进模范人物、政工干部，在厂矿企业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工纠穿着整齐的新工作服，头戴钢盔，脚穿长统胶靴，列队整齐上街游行，他们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从9月底开始，各地工人纷纷成立造反派组织，但受到当权派及保守组织的压制。9月30日，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成立，随后举行了国庆游行，在大街小巷里做了两天的宣传，重庆市当权派下令各工矿企事业单位疯狂地打击参加造反军的工人和干部，造反派被开除、扣工资、游街批斗、甚至逼疯<sup>193</sup>。起来批评当权者的造反工人回不了单位，生活无着，同时一项项反革命帽子压下来，举行游行抗议、印发传单、找当权派理论都无济于事，于是纷纷到北京来上访。中央对各地的革命行动予以肯定，使造反派坚定了斗争信念。在不断抗争和串联的过程中，国企、机关等基层单位职工造反派进一步理解中央的指示，力量逐步壮大。

1966年10月1日《红旗》杂志社论指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刘邓路线发起了总攻。社论指出，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十六条”。10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旨的工作会议，继续克服来自各级领导的阻力。毛泽东对各大区领导谈话说：“大家在工作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执行的人有各种情况，要区别对待。”<sup>194</sup>陈伯达在会上作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点名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指出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此后，刘邓在会议上公开检讨。<sup>195</sup>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实际上改变了运动的形势，大批地方干部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态度，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检讨，向造反和串联的学生认错。本地学生和工人开始活跃起来，群众组织的数量和规模激增。但工人跨行业成立全市性组织仍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十六条》明确说“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上海市委在9月仍继续向工厂中派工作组，试图把自己说成党的化身，压制造反派制造白色恐怖气氛。到11月初，上海工人造反派和学生开串联会，控诉刘邓路线迫害工人，并于9日正式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工人游行到上海市委，要求市委承认工总司的合法地位，但市委回复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于是，工人游行去火车站，准备去北京见毛主席。部分工人被上海市委有预谋的分割在安亭小站，市委组织保守派工人和干部进行围攻，工人卧轨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31个小时。<sup>196</sup>这就提出两个大问题：一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组织起来搞“革命造反”；二是工人怎么搞造反，能不能像红卫兵“停课闹革命”一样搞“停产闹革命”？中央此时的态度，不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sup>197</sup>。中央文革小组派出副组长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了解到上海市委的做法后，表示承认“工总司”，并在“工总司”的5点要求<sup>198</sup>上签了字。14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工人终于获得了组织权。

造反派纷纷按照中央精神斗争地方党委的“刘邓”路线，并公开要求打倒刘邓。但地方党委利用保守派保自己，并转移斗争大方向，斗争那些“黑五类”和知识分子，并整理群众的“黑材料”，试图在运动后期打击群众。两派围绕争夺“黑材料”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造反派把工作队整群众的黑材料抢出来，给每个人看后当众销毁，极大的发动起群众，即便保守派群众，也深刻认识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必要性<sup>199</sup>。

12月6日毛泽东提出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要进行全面的批判。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宣布“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同时必须“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在工作之余进行文化大革命。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要求采用四大手段，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开展文革，“向领导上提意见、贴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不许打击报复，不许扣工分”。从此工厂和农村的文革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开始发动，工人和市民逐步成为城市群众运动的主力。

<sup>192</sup> 李尔森. 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 第三章 从造反到砸革联会

<sup>193</sup> 黄廉. 重庆文革口述史. 四、在北京的经历

<sup>194</sup>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与各大区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

<sup>195</sup> 穆欣. 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来龙去脉. 中国网, 2009-09-01.

参见: [http://news.qq.com/a/20090901/003216\\_1.htm](http://news.qq.com/a/20090901/003216_1.htm)

<sup>196</sup> 中国文革研究网.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至二月夺权）. 出自《一月风暴》丛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纪要》

<sup>197</sup> “安亭事件”——张春桥的一场政治赌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0-11-09.

参见: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1/09/c\\_12753267.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1/09/c_12753267.htm)

<sup>198</sup> 1966年11月13日下午3:30，张春桥同志在文化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同意工人群众提出的五项革命要求，即：（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十一月九日大会以及工人被迫去北京控告是革命的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该派少数代表）；（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sup>199</sup> 钟逸.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吴焱金口述史）. 抢黑材料是最好的发动群众



在工人和农民广泛动员起来以后，上海市走资派明白单纯政治上对造反派围剿已经失败，于是转而采用经济主义的手法——任意挥霍国家钱财，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以经济收买的方法扰乱群众视线。上海市委还唆使大批保守派工人上北京“控告”，造成停水、停电、停交通，向中央施压。12月底，上海工总司发表了紧急通令，命令造反工人不许离开生产岗位，并教育保守派“赤卫队”成员回来抓革命、促生产。形势所迫，上海玻璃机械厂工人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逐渐把生产的大权接管过来。随后1月初，工总司先后接管《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发布《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海港、银行、铁路、邮电、航运等部门职工先后夺权，并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上钢三厂、杨浦树电厂、汽车运输修理厂等多个工厂纷纷夺权接管生产，不仅粉碎了经济主义“妖风”，而且也自下而上的夺取了政权。上海工人夺权并向全市发布公告，是建国以来群众组织的第一次，表明群众组织可以取代党委发命令，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

此后各省造反派纷纷开始夺权，文革从文化批判、群众造反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夺权激化了造反派内部的矛盾，部分地区造反派为争权而分裂。重庆市学生组织“八一五”和工人造反军联合成立“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很快左右了重庆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为分化造反派，市委给“八一五”送了3个简报，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在夺权前夕，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sup>200</sup>带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把指挥部公章一劈两半，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从此以后，重庆工人造反军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并埋下了武斗的种子。<sup>201</sup>

期间，中央还取缔了全国性的群众组织<sup>202</sup>，不允许群众组织全面代替国家和党的作用，允许造反派冲击国家机器的意图是要“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露我们的阴暗面”，并建立新的革命政权<sup>203</sup>。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也是希望在教育后继续任用，而非简单的“打倒”。

然而毛泽东和中央的部署并未得到顺利实现。从全国来看，各地造反派的势力远不如有地方党委领导和国家机器支持的保守派强大，各省军分区和地方党委联合起来对付造反派，压制群众运动。很多当权派被打倒后，被军队保护起来，因此造反派把军队视为走资派的最后避难所，到军分区司令部静坐请愿，军队则罗织罪名进行抓捕。1967年1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即“军委8条”），本意是要军队支持造反派，但实际上地方利用此《决定》转而对付造反派，使得造反派受重创。“二月逆流”后各地保守派在地方党委和军队势力支持下大肆打击造反派，被称为“二月黑风”或“三月黑风”。2月18日，成都军区用飞机撒叶剑英签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同志们的一封信》<sup>204</sup>，开始打压造反派。<sup>205</sup>在这段时期内，四川全省取缔造反组织1100多个，抓了12万人，连同情造反派的老干部李大章、龙天宝都抓了，《红岩》作者罗广斌被迫害致死。2月23日，西宁全城戒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制造了“二二三”事件，当天打死打伤革命群众340人，逮捕、拘禁10157人，次日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12人，同时对革命群众采用各种刑罚实行逼、供、信，大搞跪倒“请罪”<sup>206</sup>。

针对这种情况，4月2日中央台播送了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指出：“如果否定革命小将，便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打击革命小将，便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央在4月6日又发布了《军委10条》，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军队都不能打击群众组织，不准开枪、不准随意捕人、不准任意取缔群众组织，只能进行政治工作，并要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要防止赵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主持支左工作<sup>207</sup>。《军委10条》发布后，造反派重新活跃起来，在更大范围上建立起新的组织。地方在不能公开使用军队警察对付造反派后，转而设法将武器交到保守派手上，挑起武斗。为了自卫，造反派于是也设法抢夺武器，武斗逐步扩大。在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8201部队的指导下，保守派组织红武兵于5月16日改组为百万雄师，开始有步骤的镇压和屠杀造反派。6月17日在汉口六渡桥、6月24日在汉阳轧钢厂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先后发生大型武斗。据不完全统计，从6

<sup>200</sup> 熊代富，文革前团支部委员。在7—8月，批郑思群时期，冶金系69届炼钢二班的熊代富等同学首先成立“铁扫把”战斗小组，搞集团作战。“八一五”的实际领袖，67年2月任革联会副主任，68年6月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熊搞武斗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都很积极。黄廉说：“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有人说他是市文革委派进来的”。六五事件之后，被反到底俘获致残，退出派别。1973年6月—1979年3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当选书记，四川省第五次团代会副书记。现在重庆安吉尔科技有限公司老板。

<sup>201</sup> 黄廉. 重庆文革口述史. 五、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sup>202</sup> 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取缔全国性群众组织的通告。通告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一、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它们的成员应该立即从北京等地回去，到原单位参加运动。二、这些组织以各种名义冒领的公款，应一律如数追回。三、这些组织，如发现有反革命活动，其成员必须向公安部门揭发报告，由公安部门负责审查处理。”

<sup>203</sup> 霞飞.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联合. 党史纵览, 2004(8). 20-27

<sup>204</sup> 1967年2月11日，成都军区逮捕军内造反派50余人。造反派“八二六”战斗团发表声明，指出2·11事件是全省反革命的大反扑，要求军区立即释放非法逮捕的同志，并同程度工人革命造反团游行到军区静坐示威，要求军区副司令员韦杰接见群众。静坐坚持了六天七夜。2月17日，经叶剑英批发的《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的信》指出：“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18日凌晨，成都军区广播了这封信。下午，成都军区派出直升飞机在成都地区、其后又在全川散发了这封信。中央军委的公开信广播后，围困军区的造反派开始撤离。

<sup>205</sup> 李秉铎. 经历“二月黑风”——文革记事. 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4a68e90100o0wz.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4a68e90100o0wz.html)

<sup>206</sup> 水陆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论，第七章第二十节 赵永夫事件及青海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参见：

<http://www.wyzsx.com/Article/Class14/200710/25756.html>

<sup>207</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 对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十条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1967年4月4日、6日）

月4日至30日，武汉市在武斗中死108人、伤2774人<sup>208</sup>，死者皆为造反派。到6月底，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汉口大部分地区，造反派伤亡惨重，退缩到武昌造反派占绝对优势的少数院校里。<sup>209</sup>江西、四川等地当权派挑动农民发动武斗，中央下发《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禁止各地挑动农民进城、禁止武斗、禁止抢夺军队武器弹药。<sup>210</sup>部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后由于权力斗争发生分裂，一部分成为温和派，加入到“革委会”中，一部分较激进的对“革委会”不满，两派因此也发生武斗。7月11日，复课闹革命代替了停课闹革命，学校秩序开始恢复正常。但派系斗争并未停止。

7月中旬，毛主席亲赴武汉试图化解两派群众矛盾，促成大联合，但遭到保守派顽强抵抗，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抓走王力，酿成震惊全国的“720事件”。武汉“720事件”后，陈再道被撤职、到北京接受批判，周总理先后批评新疆军区、江西军分区，指出：“过去军区错误，就是对军分区武装部发枪给农民，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就是策划，放纵！军区要负这个责任”。借处理武汉事件，新华社报道了各地一系列造反派，中央希望通过解决武汉问题推动周边，却低估了军队干部和保守组织，许多地方矛盾反而激化，部队甚至公开挑起冲突。江西有的地方和组织，公开抵制中央处理江西问题的决定，认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至出现严重武斗和新成立的省革筹认为的“军事叛乱”。造反派也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大联合，一些省形势失控，全国掀起乱揪“军内一小撮”和抢枪恶风。<sup>211</sup>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起草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社论提出：“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解放军，冲击解放军军营，殴打部队干部战士，浙江省军区、湖南省邵阳军分区武器弹药库先后被抢。<sup>212</sup>8月中旬毛泽东批示《红旗》杂志这篇社论是“大毒草”，从而避免了军队的混乱。8月7日，王力又发表了“王八七”讲话，煽动群众组织夺外交部的权，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带领群众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王力和新外交部长姚登山还向全世界的中国大使呼吁“将中国的革命带到其他国家”，几天后被周恩来制止，姚登山下台<sup>213</sup>。8月2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生活会，中央极左势力（王关戚）遭到批判，随即被隔离审查<sup>214</sup>。同时，社会上的极左势力（以“五一六兵团”为代表）也要求打倒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旧政府”，后来还要求彻底否定文革前的官僚体系，按照“巴黎公社”模式自下而上的重建国家机器。这些极左思潮被认为是“形左实右”，遭到批判。

从8月起，中央开始着手处理各个地方抢夺武器、武斗等问题，但是各个地方的武斗仍然相当严重。9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军用物资的命令》，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sup>215</sup>，造反派向军队归还了不易隐藏的重型武器和部分轻武器，情况出现一定好转。此后中央发布了很多稳定局面、确保生产的通知。

当外部形势越来越有利时，造反派内部的派性日益凸现出来。9月中旬，毛泽东第一次告诫造反派：“告诉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泽东要求红卫兵多作自我批评，迅速实现大联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9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十四期社论《在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再次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1967年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明确指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10月17日，中央下发《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要求各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系统、行业、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实际上开始解散跨行业群众组织，要求“一切跨行业的组织，都应该在自愿的原则下，按行业进行必要的调整”<sup>216</sup>。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大联合要坚持“三结合”的原则，“要扩大教育面”，将愿意接受教育的老干部解放出来，“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sup>217</sup>“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sup>218</sup>很多造反派并未理解毛主席的意图，将目标定位于争得更多、更有利的革委会席位，而不是推动变革社会关系。各派造反组织高喊“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的口号，在革委会筹备委员会里为权力分配明争暗斗、互不相让。同时，许多造反派不把老干部结合进去，仍按照打倒一切的思路，拒不解放和起用老干部，或者一派起用老干部，另一派就起来又把这个老干部打倒。大联合陷入僵局。

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系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时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殖斗争正在高涨。尤其是1968年在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也发生了革命运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学生运动；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学生、工人运动，都受到了中国文革群众运动和毛泽东一系列思

<sup>208</sup> “七二〇”后，据湖北省委统计，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sup>209</sup> 起轩。腥风血雨的武汉“7.20事件”前夜：百万雄师和武汉三镇的大规模武斗。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c2d000100062r.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c2d000100062r.html)

<sup>210</sup> 肖健卿，李近川。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在南昌记者组

<sup>211</sup> 徐海亮。周恩来处理武汉“7.20”事件，选自《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银河出版社，2005

<sup>212</sup> 闫志峰。“揪军内一小撮”风波始末[J]。党史纵横，2005（9）.37-40

<sup>213</sup> Dao-yuan Chou. Silage Choppers and Snake Spirits. IBON Books,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339-382

<sup>214</sup> 霞飞。“王、关、戚事件”始末[J]。党史博采，2005（1）.10-16

<sup>215</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对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命令稿的批语（1967年9月5日）

<sup>216</sup>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参见：<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6084.html>

<sup>217</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sup>218</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卷。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



想的影响。中国一时间成为世界革命的思想中心。

毛泽东曾设想到 1968 年初完成“大联合”，“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sup>219</sup>，但到 1967 年年底，全国只有青海、内蒙古、天津等少部分省份成立了革委会。毛泽东对此很恼火，1968 年初将约束造反派作为很重要的任务。1968 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1968 年的战略目标之一是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各个群众组织“都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整顿，提高觉悟，纯洁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加强无产阶级党性，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能不能自觉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势下愿不愿做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1 月中旬，运动达到高潮，所有中央和地方报纸都连篇刊登批判派性的文章。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编者按语提出“要打倒派性，还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历数派性罪状，大揭派性危害，人人批判，个个抑制，使它在群众中象‘过街老鼠’，无处藏身”。同时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各省造反派时，都不失时机地批判派性。1968 年 2 月 25 日，《人民日报》发表《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指出：“无政府主义已经成为当前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疯狂反扑的主要手段。如果不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就必然会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政府主义思潮“是阶级敌人进行垂死挣扎的阴谋伎俩；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的恶性发作。同时，也是对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sup>220</sup>从 1967 年底，中央开始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一些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帮助造反派开展“斗私批修”，以解决这些问题，促使其早日成立省革委会。从群众组织到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农村、家庭都掀起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热潮。以福建省为例，1967 年 12 月 5 日-1968 年 8 月 15 日，中央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福建班。学员分三批先后入学，学习分三步：一是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二是联系本单位、本地区“文革”实际，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三是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革命大批判和组织重点斗争。同时，省军管会举办第 1 期、第 2 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省各市、地、县、社、队都不同程度地办班。经过学习班批判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造反派逐步改变派性观点。1968 年 3 月福州市 127 个单位实现大联合；5 月福州地区 75 家工厂实现大联合；7 月福州地区 44 个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8 月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sup>221</sup>

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实现“大联合”，但部分造反派出于派系利益，1968 年 2、3 月间重新恢复跨行业组织，局部地区开始大打派仗，武斗事件仍经常发生。1968 年 2 月 3 日，就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当天，保定市两派群众组织就发生冲突，开枪对射，死伤数人。“二三武斗”拉开了武斗的序幕，保定市此后大半年时间内枪声不断<sup>222</sup>。1968 年 3 月，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下发“315 指示”，批评 54 军仍是支一派、打一派，没有一碗水端平。“315 指示”传达后，军队支持的“八一五”组织几乎瓦解，反到底<sup>223</sup>开始骄傲，武斗苗头重现。54 军各个机构都给中央打电报，梁兴初找中央摊牌，说军队想不通、群众想不通，“315 指示”可能造成更严重武斗。4 月 27 日，周恩来又传达了毛主席的“427”指示，“叫反到底不要翘尾巴”。3-8 月，重庆发生数十次武斗，双方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榴弹炮、火箭筒等武器<sup>224</sup>。在 6 月 2 日重庆市革委会成立之后，武斗却愈发如火如荼，“八一五”开展大规模“剿匪”运动，“反到底”派无还手之力，步步后退。武斗从重庆市区向周边专县扩散，群众伤亡惨重，数十万“反到底”成员逃往成都等地<sup>225</sup>。陕西也是同样，1968 年 5 月 1 日成立革委会同时，汉中、西安等地就相继发生武斗，两派抢走泾阳 302 武器库各种战备武器万余件和大量弹药，陕西境内的陇海、宝成铁路系统和沿线地区铁路交通多次中断，面粉厂、米厂机器、粮库被炸毁，城内交通中断，粮菜供应困难<sup>226</sup>。

一些造反派认为，如果能在武斗中取得胜利，消灭另一派组织，就可以以自己为核心组织大联合<sup>227</sup>。在这一思想指导下，4 月 23 日，清华大学团派和“四一四”之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百日大武斗”。以往较好执行中央政策的北京高校陷入动荡之中。

为了准备召开“九大”以及中国安全形势的急剧恶化，中央必须彻底结束各地武斗。广西两派武斗过程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部队武器弹药，援越物资受阻。<sup>228</sup>1968 年 7 月 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七·三布告”，针对近两个月来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连续发生的一系列武斗事件，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惩。“七三”布告后，武斗仍屡禁不止。7 月 7-9 日，重庆两派在大坪地区大规模武斗，动用了轻重机枪、高射机枪、三七炮、炸药等；7 月 19 日，西安数千群众攻打白家口地区，动用了航空机关枪、土坦克等武器，打死 21 人；陕西省其他地区还不断发生武装攻打革命委员会、杀害革委会成员的事件。<sup>229</sup>7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针对武斗不断升级等一系列严重事件，颁布了“七·二四布告”，重申：“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

<sup>219</sup> 毛泽东同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20 日

<sup>220</sup> 任立新。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参见：<http://rmrbw.net/read.php?tid=374231>

<sup>221</sup> 叶青。“文革”时期福建群众组织研究[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2002：196-217

<sup>222</sup> 清园居士。风云突变——保定市文革期间武斗情况全记录。2007-8-23。参见：[http://blog.stnn.cc/duojianhua/Efp\\_BI\\_1001933486.aspx](http://blog.stnn.cc/duojianhua/Efp_BI_1001933486.aspx)

<sup>223</sup> 反到底是 1967 年 4 月成立的造反组织，前身为工人造反军。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6943430100kvoji.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6943430100kvoji.html)

<sup>224</sup> 何蜀。“文革”中重庆的“一号专案”[J]。文史精华，2002（4）. 32-39

<sup>225</sup> 胡志金。重庆武斗与全国唯一的“文革公墓”[J]。文史精华，2008（7）. 31-34

<sup>226</sup> 夏兰秋菊。[口述历史]陕西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2006-9-16。参见：<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2025966>

<sup>227</sup> 米鹤都，张琦。岁月流沙——蒯大富口述。团派和四一四的分野

<sup>228</sup> 焦红光。“文革”中周恩来处理广西问题等有关情况[J]。党的文献，1996（3）. 14-17

<sup>229</sup> 白磊。从夺权到军管：1967-1968 年陕西省武斗略述。《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6 年 7 月号（总第 52 期）。参见：

<http://www.cuhk.edu.hk/ics/21c/supplem/essay/0607064g.htm>



底、认真地执行“七·三布告”，不得违抗”，“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产，中断交通通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依法惩办。还要求必须立即恢复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要求无条件结束武斗，但随后不少地方的保守派乘机一举打垮甚至消灭了造反派。广西军区韦国清趁机指使保守组织“联指”发动对造反派“四二二”的武装围剿，酿成骇人听闻的大血案<sup>230</sup>。宾阳县从7月26日到8月6日，打死所谓“阶级敌人”3681人，灵山县打死3200多人，上林县打死1906人，白色地区打死1073人，河池地区打死7000多人<sup>231</sup>。军区和“联指”共同攻打“四二二”控制的南宁解放路、百货大楼、展览馆，到8月5日夷平南宁闹市区，打死反对派1470人，抓获俘虏近9000人。<sup>232</sup>更令人发指的是，“四二二”几千人为躲避围剿，躲进地下人防工程，联指在军区的默许下，竟打开邕江上游左江水电站拦河大坝的大闸，水淹南宁，溺死人防工程中的最后一批反对派，尸体漂到港澳地区，震动世界<sup>233</sup>。

对动荡的高校，毛泽东看到光是批无政府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决定派一些优秀的产业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让工人收缴学生手中的武器。7月27日开始派“工宣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目的是制止学校内的武斗，促进两派大联合。蒯大富为首的团派抵抗工宣队，在十多个小时里，打死5名工人，打伤多名工人和解放军，这一事件直接震动了中央。毛泽东于7月28日凌晨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批评了激进学生的武斗及抵抗，高校文革运动从此转变方向。<sup>234</sup>毛泽东对蒯大富讲：“你们不是抓‘黑手’吗？‘黑手’就是我。你现在很不好办，我看你毫无办法。布告明明宣传了好多天，你们仍然要打，你们要打到哪一年？”“北京多数学校没有打，少数学校在打，一打不可开交，影响工人、军队，也影响内部统一。”但总体上，毛泽东对高校学生仍是保护的，“这个天派、地派我也搞不清，学校那么多。总而言之，你们五员大将，我是保护你们的，你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还有其它学校的头头，但著名的还是你们五个。你们做了许多工作，工作也很困难。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没经历过，不管你们有多少缺点错误，我们还是保护你们的。”<sup>235</sup>毛泽东不同意中央文革将五大领袖打倒，而是希望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教育和到基层单位劳动锻炼促进造反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身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1968年8月25日，《红旗》1968年第2期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出“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上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工人阶级的领导“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最可靠的保证”。工人、解放军“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工人阶级不但要到学校，而且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sup>236</sup>从8月底起，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9月份，66、67、68三年的毕业生都毕业了（俗称“老三届”），这些毕业生开始上山下乡做知青。因此红卫兵的运动停息下来。

1968年夏，中央通过下发两个布告、派工宣队和军宣队等方式，很快控制局势。部分地方的武斗一直持续到1969年“九大”以后，但全国总体已经安定下来，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1968年9月3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地方成立革委会后，即趋于平静。革命委员会中实行“军干群三结合，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军队掌权，其次是原地方党委，造反派实力并不大，还经常被排挤迫害，经常由于出身不好、站错队等问题而被整。

为了给九大做准备，从1968年秋开始，各地全面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直持续到1969年底。各地由“军管会”、“军宣队”以及由军人控制的“革委会”主持“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既打击了一批“不听话”的造反派头目，也对一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迫害，并利用历史问题“抓叛徒”，制造了不少冤案<sup>237</sup>。1968年10月，8届12中全会上，利用伪证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

## 二、1969—1971 林彪集团的兴衰

在这一阶段，激进造反派多数已被镇压，或者被结合进革委会，成为温和派。地方上的群众运动已比较平静，斗争主要表现在中央高层。以林彪为代表的军队当权派势力在九大后达到顶峰，但很快因为林彪集团的抢班夺权而走向毁灭。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秘密召开，林彪作政治报告。九大修改了党章，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中，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成员占大多数。特别是以林彪为首的军队当权派势力达到顶峰，九大政治局委员中军人超过半数。这一方面与国内形势有关，地方各级党委多被群众运动冲垮，军队实际上掌握了地方的权力。另一方面也与国际形势有关。1969年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3月份爆发了珍宝岛事件，6、7月间苏军又在中苏边境蓄意制造了多起挑衅行为。国内也积极备战，10月份开始疏散在京老干部。

九大时，林彪集团主要成员均进入政治局，并且把持了军委办事组，在事实上控制了军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对军

<sup>230</sup> 张雄飞. 一部掩盖韦国清等文革罪恶的官史. 2010-06-19. 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9a8a10100j7pi.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9a8a10100j7pi.html)

<sup>231</sup> 徐勇. 韦国清和广西 422. 参见: [http://dingkings.blog.hexun.com/29543450\\_d.html](http://dingkings.blog.hexun.com/29543450_d.html)

<sup>232</sup> 揭秘韦国清与广西文革 4·22 事件. 参见: [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30/34/15/3\\_1.html](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730/34/15/3_1.html)

<sup>233</sup> 1968, 血与火的南宁城. 参见: <http://tieba.baidu.com/f?kz=65473294>

<sup>234</sup> 李玉琦. 清华园 1968 “百日武斗” 纪实[J]. 中国青年研究, 1993 (6) . 39-41

<sup>235</sup> 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1968年7月8日）

<sup>236</sup> 姚文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红旗, 1968 (2) . 1968-8-25

<sup>237</sup> 刘国凯. 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 2001-10-21

队中业已形成山头主义非常警惕，在九大期间就提出了“军队要谨慎”的告诫<sup>238</sup>。林彪在九大上提出，中央文革小组应继续行使其职能，而中央文革小组自成立3年来就一直由陈伯达领导。实际上，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结束，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应让位给新的党组织。最终林彪的提议未获通过，1969年12月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被解散<sup>239</sup>。

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斗、批、改”运动“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sup>240</sup>作为“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sup>241</sup>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毛泽东提出建党50字方针：“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sup>242</sup>毛泽东要求要进行“吐故纳新”，重点吸收两方面新鲜血液：一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二是选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sup>243</sup>。1969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编辑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拉开全面整党建党序幕。社论要求，要在彻底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基础上，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抓好领导班子整顿和建设，开展“开门整党”。1969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北京新华印刷厂整党建党调查报告》，指出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主要是三条：一是从思想整顿入手，普遍提高党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二是在“清除废料”的同时，加强对犯错误党员的教育；三是积极慎重吸收新鲜血液，健全党的组织，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份报告树起了全国厂矿企业整党的典型。

按照列宁主义建党，意味着军队要退出地方政坛，由党指挥枪。林彪反对按照列宁主义原则重建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则要求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公开赞成许多老干部复职，并为一些文革期间打倒的干部恢复名誉。<sup>244</sup>1971年，毛泽东在巡视各省的旅途中再次明确地指出，党应该指挥枪。他告诫军队干部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么？”<sup>245</sup>

根据六厂二校和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从1970年4月到1971年初，部分省市广泛吸收群众参加整党，采取“一学二批三吐四纳”的方式产生了新的党委。到1971年8月，全国各省都完成了整党，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sup>246</sup>在整党过程中，清理了不合标准的党员。如甘肃省强调常委会的组成“新生力量要占优势”，到1971年底，全省参加整党的党员42.06万人，党员“吐故”8476人，发展新党员41997名<sup>247</sup>。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重新建立，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

随着党的重建，党在革委会的力量不断增强，军队的政治影响不断下降，为了扭转这种形势，林彪集团必须在新政府中赢得明确的重要职位。利用即将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林彪加快了抢班夺权的过程。1970年3月17-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毛泽东认为革委会已经取代了各地政府，相应的国家体制也需要改变，不应再设国家主席，不要因人设事。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sup>248</sup>林彪看准了毛泽东不肯再当国家主席的意思，却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则自己想当。毛泽东也看穿了林彪的意图，在此后半年内先后6次讲了对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林彪却始终坚持。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陈伯达被停职反省，叶群和“四大金刚”<sup>249</sup>等被要求检讨，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开始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这些办法毛泽东后来概括为：“甩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甩石头”就是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发动政治攻势，紧紧揪住叶群和“四大金刚”。1970年10月，毛泽东先后在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上面批示。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12月16日，毛泽东对38军党委报告《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出批示，提议北京军区开会揭发批判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7日，华北会议召开，会议学习了毛泽东对38军的报告

<sup>238</sup> 周敬青. 毛泽东对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和废黜(中)[J]. 党史纵览, 2004(1): 33-38

<sup>239</sup> 沈传宝. 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J]. 中共党史研究, 2007(1)

<sup>240</sup> 指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sup>241</sup> 胡绳.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sup>242</sup> 1967年10月27日毛主席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的批示

<sup>243</sup> 《红旗》杂志社论. 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民日报》1968年10月16日转载

<sup>244</sup> 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第五部 文化大革命及其灾难性后果(1966—1976年) 第21章 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与毛泽东时代的结束(1969—1976年)

<sup>245</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1971年8-9月)

<sup>246</sup> 柳建辉. “文革”中整党建党运动述析[J]. 党的文献, 1998(3): 70-75

<sup>247</sup> 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 《中共甘肃省组织工作历史概况》整党整风之八. 2009-11-27. 参见:

[http://www.gs.xinhuanet.com/dfpd/2009-11/27/content\\_18350885.htm](http://www.gs.xinhuanet.com/dfpd/2009-11/27/content_18350885.htm)

<sup>248</sup> 汪东兴. 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J]. 领导科学, 2004(17): 46-50

<sup>249</sup>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的批示等文件。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掺沙子”就是重新布局中央组织，特别是改组林彪集团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sup>250</sup>。1970年11月6日，毛泽东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统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等，权限很大，组员由康生、江青、张春桥、纪登奎等非林彪集团的人担任。1970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评叶群：“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4月，毛泽东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毛泽东把调查陈伯达历史和家庭情况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接着又让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sup>251</sup>“挖墙脚”就是改组林彪集团势力范围的北京军区。1971年1月24日，北京军区改组，李德生为司令员，谢富治、纪登奎为第一、第二政委，尤太忠为内蒙前指司令员，郑维山、李雪峰被撤换。<sup>252</sup>1971年1月，毛泽东以对付苏联威胁为名，把林彪直接指挥的部队从北京调到黑龙江。

毛泽东还不失时机的批评军队作风不正。1971年1月，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中批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sup>253</sup>1971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一月八日重要批示的通知指出：“这一批示对于加强我党、我军思想作风建设，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这对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妨碍极大。”“我们的军队、地方和中央机关，都要以毛主席的批示为纲，利用当前极好时机，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林彪事件后，军队干部逐步从政治舞台退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流行口号变成了“解放军向全国人民学习”。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措施，打乱了林彪集团的阵脚，也促使林彪集团决心铤而走险，策动武装政变。1971年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并同沿途各地负责人作重要讲话，尖锐的提出了林彪的问题。9月5日，林彪、叶群从党羽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于11日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9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林彪集团的主要权力机构军委办事组，同日发出成立“林陈反党集团中央专案组”的通知。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

传达林彪事件，引起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九大上党的接班人会这么快的篡党夺权，进而怀疑毛泽东是为了个人权势而一个个打倒身边的人。怀疑、否定文革的社会思潮逐步形成。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纪登奎等人劝主席不要下发《“五七一工程”纪要》，毛泽东指示：“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sup>254</sup>毛泽东还主张，对外国人也无需隐瞒林彪的问题：“谁人问都应直告，不应躲躲闪闪。”<sup>255</sup>12月11日，中共中央印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并发出组织传达和讨论的《通知》。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道：在九届二中全会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军队受压”，“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枪杆子方向发展”。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积累了不满情绪。“B-52”把党内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滥用中国人民的信任，“实际上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五七一工程”纪要》系统总结了各方面反对文革的社会力量：一是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二是农民生活缺吃少穿；三是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四是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五是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六是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sup>256</sup>文革运动矛盾复杂，不同社会群体都受到冲击，很多人看到《“五七一工程”纪要》，都认为纪要是对的、毛泽东是暴君，反文革的社会基础逐步形成，进而到80年代演化成反毛、反社会主义潮流。无论从谴责文革的方式，还是从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上看，《“五七一工程”纪要》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都是要用物质刺激诱导社会各阶层，开启经济改革的航程，正如毛主席所评价：“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sup>257</sup>。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如果当时毛主席不下发《“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么改革派也不会公布纪要内容，群众也不会认识清楚林彪集团的社会基础。正如陈小鲁所说：“现在看‘571工程纪要’，

250 1969年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军委办事组名单：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成员包括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251 尹家民. “军委办事组”始末[J]. 党史博览, 2003(11): 16-20

252 曹英. 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J]. 湘潮, 2008(12): 52-56

25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转发济南军区政治部学习贯彻毛泽东“军队要谨慎”指示情况报告的批语(1971年1月8日)

254 吴德.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5(2): 47-62

25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 三十九 一九七二年的内政和外交

256 “五七一”工程纪要. 参见: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9864.htm>

2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1974年12月)

越来越明确……‘571 工程纪要’当时是传达到基层每一个人的。‘纪要’提出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指向当时所谓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文革’的那些弊病。它用的论据，当时讲都是‘右派’言论，现在看是正确的。后来批判‘四人帮’，用的无非也是这么一套东西。所以，现在‘571 工程纪要’反而变成‘绝密文件’，不能外传了。”<sup>258</sup>

这一时期，党所控制的一些群众组织也恢复了活动，重新组建的共青团取代了被解散的红卫兵，新改组的工会取代了工人代表大会。地方造反派势力继续受到打击。1970 年开始的“一打三反”和 1971 年的“深挖五一六”使不少在九大后被放出来的造反派头目又被抓进去。知识分子中开始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挨不完的毒打，流不完的泪。”

### 三、1972-1976 四人帮的兴衰

在这一阶段，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势力开始逐渐复出，并与以江青、张春桥等代表的文人极“左”势力开始斗争。主要的政治势力是四人帮极“左”集团和周恩来、邓小平老干部集团，毛泽东则居中掌握最后的决断。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紧密配合，老干部开始逐渐复出。军队势力逐步退出，但对地方政府的影响力仍很大。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亲自参加了为陈毅举行的追悼会。4 月 24 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从而为老干部的复出做了舆论准备。8 月 1 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 45 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8 月 14 日，毛泽东对邓小平 8 月 3 日的来信作出批语，指出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历史上是有功的。8 月 15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批语，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活动。

周恩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也在寻找新的“接班人”。他先是选择了王洪文——一个在文革中兴起的造反派头目，具有工农兵经历，代表年轻一代。1972 年他进入政治局工作。但是毛泽东很快发现王不思进取，政治素质差，和江青等人拉帮结派。另一方面，毛在邓小平“永不翻案”的保证下允许他重新进入最高权力范围，希望他能接受文革的路线，继续考察他。1973 年 4 月邓小平正式复出，辅佐周恩来搞“整顿”。1973 年 8 月的十大上，由王洪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委员。十大建立起新的中央委员会，各地工会、共青团、妇联也都陆续重建。毛泽东认为抓“五一六”打击面太宽，“动不动就说人家‘三反分子’、‘五一六’。甚至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我看了相当好呵，有人说那里头有刺，就是要有刺呢！”<sup>259</sup>在毛主席的关心下，解除了对部分造反派的审查，很多被地方定为“五一六”的造反派重获自由。

对于周恩来，毛泽东既信任又不满意。在 1972 年关于批林彪极左还是极右的问题上，两人发生了分歧。这一方面表明周恩来实际上并为看清林的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周试图在可能的范围内恢复文革前的秩序。他借批左也否定了文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生事物”，引起四人帮的极大不满。1972 年 12 月毛明确表态林是极右后，周恩来就不再明说批极左了，但实际上照做不误，并且抓紧解放老干部。毛泽东认为周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的意图，对文革只是紧跟。毛泽东对四人帮坚持文革理论比较满意，但对他们的宗派作风和实际工作能力无法放心。毛泽东还是希望两派能够团结起来，搞好工作。

从 1973 年 7 月开始，毛泽东多次批评周恩来的工作，1973 年底中美会谈中的一次事件导致了毛泽东的不满，11 月 21 日起到 12 月初，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 10 多天的“帮周会”。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叶剑英进行围攻，认为这次会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声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的要代替毛泽东。<sup>260</sup>会上包括邓小平都发言告诫周恩来要谨慎，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政治局会后，12 月 9 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才是迫不及待。”<sup>261</sup>毛并不想打倒周，只是要教育一下。如邓榕所讲：“‘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sup>262</sup>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没有野心，有野心的是江青，并否决了江青、姚文元增补进政治局常委的要求，这使江青非常无奈。四人帮还想利用历史问题倒周，但毛泽东对“伍豪事件”是很清楚的。

1973 年 12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实现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互调。毛泽东意在削弱军队对地方政治的控制。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毛泽东还批评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这实际上是批评周恩来的。因为林彪倒台后一直是周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后来虽然王洪文也加入了，但主要是周总理在主持。他提议让邓小平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参与党政军工作。由于膀胱癌开始恶化，周恩来 1974 年之后逐渐把工作交给邓小平。

<sup>258</sup> 陈毅之子痛说“革命家史”（陈小鲁口述）。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我眼中的领导人

<sup>259</sup> 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1973 年 12 月 15 日

<sup>260</sup> 卢荻。江青炮制“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阴谋的破产[J]。福建党史月刊，2003（7）。45-47

<sup>261</sup> 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七）。2000-7-8。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12/204260.html>

<sup>262</sup>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毛泽东希望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让群众明白文革尽管给社会各群体带来了冲击，但仍然建立了新制度、是重大的社会进步，逐步消除社会各群体对文革的不满情绪。毛泽东同江青谈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毛泽东看到现实当中种种否定文革的苗头，针对留恋文革前做法的认识，希望通过开展批林批孔，教育群众不要开历史倒车，去恢复旧秩序。<sup>263</sup>1974年1月18日，中央下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林批孔”运动全面展开。

毛希望借批孔来将批林深入下去，核心思想是“反复辟”。但四人帮却借机干扰工作，甚至将矛头直指周。江青集团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大量的“批孔”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污蔑周恩来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是“修正主义的黑线回潮”。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宗派做法引起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多次批判江青，甚至严厉警告。由于江青等人仍是文革的支持者，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只能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求见。毛泽东阅后批示：“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sup>264</sup>到文革后期，很多老干部们的子女都在部队接受锻炼，一些人借助父母关系被当做未来接班人培养。江青借此发挥，将运动转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向叶剑英等老干部施压，一时之间大报小报都是批判走后门的报道，各机关开始排查走后门现象，各大军区也开始清退“后门兵”，老干部人人自危。<sup>265</sup>2月15日，毛泽东针对大批“走后门”一事指出：“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sup>266</sup>在毛泽东批评下，江青向毛泽东写出检讨：“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同时，江青又多次请求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再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sup>267</sup>6月中旬，江青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点转向“评法批儒”，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在的儒”，煽动“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并借用外国电讯上的说法，暗示周恩来即“现代大儒”<sup>268</sup>。7月17日，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准备赴南方易地休养，临行前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还指着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由于江青常自称代表毛泽东说话，许多人也误以为江青所有言论和行动都是秉承毛泽东的意旨去做的，所以，毛泽东在那些谈话中两次声明：“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sup>269</sup>

江青还暗示要搞第二次文革，各地的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平反，重新进入权力机关。1974年上半年，浙江、河北等地造反派再度兴起，重新拉起山头。事实上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已经大大萎缩：最激进的大学生、高中生造反派都已下放农村，初中生太小已经跟原学生造反派有了“代沟”；教育、文化和科研机构里面的知识分子经历过军宣队、工宣队的高压政策，不愿意再牵涉其中；工商业造反派职工有些也被清队、一打三反等整怕了，有些厌倦政治漠不关心，还有些造反派在自己单位里占主导，已经成为革委会干部，没有必要再出来冒险。只有那些根红苗正、又屡次挨整的造反派才积极主动参加运动，他们要求当地政权承认军队掌权期间整造反派是错误的，为自己平反并吸收进各级革委会。保守派以前就压制过造反派，在军队整顿期间还多次揭发过造反派，保守派干部群众怕造反派上台之后受打击，也组织起来进行对抗，两派甚至发生武斗<sup>270</sup>。一些领导机关受冲击，许多干部被批斗，各级党政工作陷入半瘫痪，很多企业陷入停产、半停产，铁路阻塞、港口压船，无政府主义再现。<sup>271</sup>这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主席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再次看到社会出现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4月10日，经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批林批孔”运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的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5月18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就“批林批孔”运动中几个政策问题作出规定，要求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95%的干部和群众；清查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上；解放军军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坚持正面教育。7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了“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同时强调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sup>272</sup>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少数造反派如愿以偿，成功“补台”，进入工会、团委等边缘部门<sup>273</sup>。但大多数干部群众都抵制新的运动。干部们怕今天积极地批，以后自己再受批判，“就像翻饼一样，今天翻过来，明天翻过去，没有个头”。

<sup>263</sup> 安建设. 毛泽东与“批林批孔”若干问题考述[J]. 党的文献, 2000(4): 55-63

<sup>264</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给江青的信和批语(1974年2月—11月)

<sup>265</sup> 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批林批孔批走后门. 2010-09-01. 参见: [http://www.china.com.cn/culture/book/2010-09/01/content\\_20840296.htm](http://www.china.com.cn/culture/book/2010-09/01/content_20840296.htm)

<sup>266</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给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sup>267</sup> 金冲及. 毛泽东对江青从信任到不满的内情.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参见: <http://www.ptjyw.cn/new/ShowArticle.asp?ArticleID=7679>

<sup>268</sup> 叶匡政. 周恩来与江青“组阁”的权力争夺. 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 参见: [http://culture2.ycwb.com/2011-11/17/content\\_3629437.htm](http://culture2.ycwb.com/2011-11/17/content_3629437.htm)

<sup>269</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对“四人帮”的几次批评(1974年—1975年)

<sup>270</sup> 王绍光. 超凡领袖的挫败, 第11章 1974-1976年间的派别斗争

<sup>271</sup> 王海光. “古为今用”的荒唐一幕——“批林批孔”运动(续)[J]. 党史天地, 1994(7): 20-23

<sup>272</sup> 武健华. “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江青[J]. 党史博览, 2004(11): 30-33

<sup>273</sup> 老田. 文革中造反派与当权派政治博弈的七个回合. 乌有之乡, 参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812/63574.html>



一些干部听到有运动，就马上托病逃避，甚至不请假就不辞而别。基层干部都有顾虑，“今天我整你，明天就轮到你整我了，谁也不愿意沾上”。普通群众经历了大规模武斗的动荡，对文革的理论和实践产生怀疑和动摇，面对批林批孔运动，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甚至反感，更多的人只是应付上面的要求，运动中走走样子。一些社队群众认为，“搞理论是念书人的事，咱们庄稼人种好地，多打粮食，为国家多做贡献就行了，批不批无所谓。”<sup>274</sup>毛泽东早已看到，基层干部、大学生、部分军队干部和工农群众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厌倦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并产生了普遍的反抗情绪。1974年8月，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sup>275</sup>毛泽东后来又说要搞国民经济上去，江青等人第二次文革的设想也失败了。

1974年10-12月，周派和四人帮围绕四届人大的权力分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江青等人除了利用“风庆轮”等事件直接攻击、影射周恩来，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之间进行挑拨，企图获取毛泽东对他们的政治支持，彻底获得四届人大的“组阁”权力。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飞抵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邓小平的状，同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声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王洪文本想借毛泽东之手，阻挠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和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便由其组阁执政。结果适得其反，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告诫其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sup>276</sup>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最后毛还是接受了周的意见，四人帮失败。

1975年，江青等人又想掀起批判经验主义<sup>277</sup>的风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邓小平。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经验主义”的必要性。同日，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在《红旗》杂志1975年第三期上发表，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说这是几十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的意见。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全国的反映都没讲这个问题，党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sup>278</sup>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4月23日批示精神。会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在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其他宗派活动的问题，提出尖锐质问。5月3日，毛泽东就“反经验主义”说：“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指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活动，明确要求“三要三不要”：“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但毛泽东同时也讲：“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在会上被迫作检讨。<sup>279</sup>

1975年8月毛又发表了“评《水浒》”的讲话。他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晁盖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找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全国报刊杂志开始大量发表批判投降派的文章。<sup>280</sup>“评《水浒》”也被四人帮当作政治武器，说党内出了投降派，要在各地层层揪“当代的宋江”。毛泽东既要肯定文革的路线，又要全国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但江青等人再次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批示转化为一场宗派活动，以宋江影射邓小平，希望再搞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江青出来讲话：“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都占据了领导岗位。”<sup>281</sup>1975年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昔阳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由邓小平主持。江青在会上大谈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讲：“《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接受招安。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现在我们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有投降派。”江青要求邓小平在全党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讲话稿，邓小平于是在1975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黎笋的时候请示主席，毛泽东听后说：“放屁！文不对题。那

<sup>274</sup> 李先明。“文化大革命”后期曲阜的“批林批孔”运动及其影响——兼论当地民众的思想态度[J]. 中共党史研究, 2010(6): 102-110

<sup>275</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以安定团结为好(1974年、1975年)

<sup>276</sup> 李慧勇. 周恩来与“文革”后期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D]. 天津: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2010: 79-111

<sup>277</sup> 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文章是专批“经验主义”的，点了周恩来的名，指其为“经验宗派的代表”。

<sup>278</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卷. 对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请示报告的批语(1975年4月23日)

<sup>279</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传(1949-1976). 四十二、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sup>280</sup> 汪澍白.“文革”后期的毛泽东——批孔扬秦与评《水浒》[J]. 同舟共进, 2000(3): 20-23

<sup>281</sup> 毛泽东评《水浒传》的前前后后——芦荻访谈录[J]. 文艺理论与批评, 1998(3): 21-23, 17

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不久，华国锋在一次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时，也向毛泽东谈到了江青要求在全党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讲稿的问题。毛泽东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sup>282</sup>尽管江青批投降派的运动并非毛的本意，但他的评论本身是深刻的。

1975年是邓全面整顿的一年，本来毛泽东很满意邓的工作，但由于邓拒不接受毛的文革理论，这使毛非常失望，毛泽东认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1975年11月开始批邓，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毛泽东并不想打倒邓小平，“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毛泽东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是让邓继续掌权，所以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仍要由邓小平主持。

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政治运动已失去兴趣，而对物质生活又不满。文革中不加工资，取消了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尤其年轻工人生活困难很多。“上山下乡”波及千家万户，知识青年在农村生活也很苦，城市居民都想尽快把子女调回来。同时，很多人仍背负着牛鬼蛇神、走资派、反革命、叛徒等多种政治枷锁，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成为替罪羊。城市里的社会矛盾在增长。四人帮的作为显然丧失了民心，四五运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毛泽东对邓的判断发生了改变，从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4月7日，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时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不过还是保留了邓的党籍。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蓉等人的谈话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的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文革晚期，群众普遍存在对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江青集团已经相当孤立。而老干部在复出的过程中重掌权力，并从各方面为彻底否定文革做积极准备。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正义的人们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黄知真对我说：‘如果四人帮上台，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再次发动群众，再次上山打游击闹革命。’”“在得知毛泽东不再接见外宾后，黄知真果断下令，让江西省公安厅厅长周克用以拉练为掩护，命令全省武装警察向南昌靠拢。这样，如果一旦形势发展需要，就可以在一个晚上，把在江西紧跟“四人帮”的那些人一网打尽。”“1975年以来，随着国家前途命运面临严峻考验，那些老一辈革命家不管在野在朝，都自觉地把国家的生死存亡责任肩负起来。叶飞夫人王于畊阿姨有一次对我说：‘如果我们国家出现打内战的情况，我们家跟定叶帅了。’罗瑞卿在福州养病，皮定钧找到罗瑞卿说：‘罗总长，到时候你就给我们出主意，我们背你上山，一定保护好你。’”<sup>283</sup>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做了几件事。一是让王洪文秘书给各省打电话，让各省有事情和王洪文办公室直接联系，想要把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渠道垄断住，结果，被华国锋发现，及时纠正过来。二是借保存毛泽东文件之机，江青大闹，要求把毛泽东的文件都归她和毛远新保管。结果，又被华国锋顶了回去。三是江青向中央提出，让毛远新留在中央工作，也被华国锋顶了回去。四是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问题上，为难华国锋。他们提出，不必出第五卷，只出单篇就可以。他们是想用出单篇的办法，由他们把持出版工作，只出对他们有利的毛泽东文稿。这一条，又被华国锋顶了回去。五是王洪文回上海，搞民兵武装，发放7万多支枪、300门迫击炮和1000多万发弹药，拉起了所谓的“第二武装”，并组织训练。姚文元声称要用民兵武装“同党内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叶剑英立即调动南京军区部队三个师，向上海外围出动，控制上海外围险要地带。<sup>284</sup>

由于四人帮太不会团结人，对华国锋步步紧逼，而叶剑英、邓小平等老干部则表示坚决支持华国锋，最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合将四人帮逮捕了。文革最终结束。

#### 四、文革的历史意义

文革是毛主席依靠个人威信而发动的群众运动。与土地革命等群众运动相比，文革的历史条件存在很大局限性。一是大部分工农群众并未认识到文革的必要性。建国以后，普通群众、尤其是工厂工人和国家机关职工生存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部分工农群众都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当地的党政干部。因此，文革初期北京学生来传播革命思想，底层群众都反对学生的观点，甚至响应地方当权派的号召参加围攻。总体上看，工农中的造反派只占少数，保守派占大多数。到了文革后期，群众或者支持邓小平复出，或者作壁上观、远离政治，基本上都不支持四人帮。正如毛主席所说，对于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二是指导文革的理论仍不完善。直到今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如何进行阶级分析，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往运动都能从生产关系中明确划分哪些是剥削阶级和斗争对象，但文革中没有准确走资派的阶级标准，只能从思想观点、工资收入，甚至家庭出身来寻找对立面，“地富反坏”、知识分子屡次遭受运动冲击。群众在实践中很难搞清到底领导该不该斗、该斗到什么程度，经过武斗等反复之后最终走向政治冷淡<sup>285</sup>。三是军队是最保守的力量，但文革中只能依靠军队实现大联合。文革初期军队保护老干部、镇压造反派，后来在制止武斗过程中军队解散、甚至消灭了造反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以后，军阀作风、命令主义、残酷斗争也盛极一时，军队整顿了大部分造反派和很多老干部，军代表主持下开展的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等都制造了很多

<sup>282</sup> 霞飞. 1975年评《水浒》始末[J]. 党史纵览, 2005(4): 4-9

<sup>283</sup> 陈小津. 我的“文革”岁月[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sup>284</sup> 霞飞.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J]. 党史天地, 2007(6): 43-51

<sup>285</sup>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M].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009. 中文版序言

冤假错案。四是造反派是发动文革的重要依靠力量，但造反派存在严重的派性。同以往群众运动不同，文革没有经过长期的斗争发动，涌现出来的造反派也没有经历过考验，相当多数无法领导群众继续前进。纵观文革，造反派只是在文革初期较好的贯彻了毛主席的意图，随后很快被运动所抛弃。造反派追求的往往是小集团权力，较少考虑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诉求，目光没有放到推动社会关系变革、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上，而是紧盯着革委会中的权位，派性成为大联合的严重阻碍。实现反修防修的目标，必须建立稳固的群众组织，而在文革中，只要保留群众组织，就存在武斗的威胁，军队既消灭了派性，也同时消灭了群众组织。群众组织瓦解，保守势力清除四人帮是迟早的事。

正因为存在这些突出的局限性，反思文革所取得的历史成就，才能明确其伟大历史意义。

第一，限制干部特权，捍卫了社会主义方向。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跟江西省委副书记王卓凡等人谈官僚主义的问题：“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1965年6月，毛泽东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亲属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所忧虑的并非仅仅针对中央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所思考的仍是针对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sup>286</sup>文革前，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运动试图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都没有成功，但都没有解决问题，在文革中，毛泽东找到了解决办法，群众起来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党的黑暗面。文革期间中国很多特权现象被批判、被消灭，干部要到工农中参加劳动，子女跟普通人一样上学、入伍。文革前，很多单位干部独揽大权，工人只能享受福利，而没有管理工厂的权利。企业干部长期不按中央要求执行鞍钢宪法，大部分工厂都是文革以后才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革委会建立以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都广泛参加到工厂管理中，工厂制定生产计划、改革规章制度、开展技术革新都要开会征求工人的意见。文革前是工人怕厂长，文革后是厂长怕工人，如果干部独断专行或有其他不良作风，工人马上就可以贴大字报批判。文革后，尽管屡经反复，但社会制度仍取得很大进步，劳动群众参加到工厂、学校和机关单位的管理当中，真正当家作主。文革期间有效遏制了中国滑向资本主义的趋势，捍卫了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纯洁党组织，初步实现了反修防修的目的。文革之前，党是神圣的化身，是不能批评的。积极分子没有入党时，要努力表现，争取获得党支部的认可；一旦入党，就可以高高在上评价群众先进和落后，群众不能到党支部中监督评论党员。党的干部更厉害，批评干部甚至有可能成为“反党”。毛泽东讲：“共产党打了天下，工人地位有了改善，农民得了土地，都拥护共产党。这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他们说什么，就叫党的领导，相信党就要相信他个人。他们提倡不讲原则，提出无条件服从。不是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而是无条件服从直接上级。提倡盲从，提倡奴隶主义。”<sup>287</sup>大联合后，全国范围按照“建党50字方针”整党建党，党员面向群众开展评议，群众也可以批评党的干部，得不到群众认可的人被清洗出党。以前提倡“宁犯路线错误、不犯组织错误”，这种奴隶主义思想被打破，普通党员重视思考方向和路线问题，重新去跟群众打成一片。以北京市针织总厂为例，整党建党由民主讨论、意见集中和与群众再讨论等几个阶段组成，即“四讨论三集中”，人民群众来决定党委的组成人数和确定候选人名单，工人们通过深入的讨论，确定了最称职的27人组成新党委。根据上海市1119个工厂的不完全调查，经过选举后，原领导人只占新党委委员中的37%。<sup>288</sup>

第三，工农进入革委会，有效改善了政权结构。文革前号称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实际上普通工农连参与政权都不可能。上海是一个工业城市，文革前历届党委和人大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到1965年市第五届人代会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1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但文革以后，工人进入了政权机构，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中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sup>289</sup>1968年3月南京革委会成立，79人中25人是革命干部，9人解放军，45名群众代表（20名工人，10名农民，10名红卫兵，5个文艺界、知识分子的代表）<sup>290</sup>。这些进入政权机构的工农并没有像以前那样成为专职的党政干部，就连副总理陈永贵、吴桂贤都执行“三三制”<sup>291</sup>，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陕西国棉一厂工作，工资也在原来单位拿。文革前，干部和机关职工属于“干部”身份，普通工人属于“工人”身份，两者之间差别明显，工农很难成为“干部”，也更不可能参加社会管理。文革打破了这一界限，有445万工人以

<sup>286</sup> 马社香. 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sup>287</sup> 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的谈话（1967年12月26日）. 王力回忆录

<sup>288</sup> 夏尔·贝特兰.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M]. 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 一、针织总厂

<sup>289</sup> 李逊.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工人阶级的实际地位. 参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607/8166.html>

<sup>290</sup> 海伦·福斯特·斯诺. 重返中国[M].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

<sup>291</sup> 即每年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时间到外地，三分之一时间回本单位工作。



工代干，被调到干部岗位工作，仍然领取工人工资；几百万农民以农代干，做干部工作，仍然作为社员计算工分<sup>292</sup>。不仅如此，按照毛主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指示，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都是实职、掌握实权。

第四，探索自下而上重建了群众组织。文革前，工青妇等各类群众组织名存实亡，都在当地党政干部领导下工作，作用只能到“吹拉弹唱”、发福礼品的程度，对各级党政机关无法发挥监督职能。文革后，群众获得了组织起来的权利。经过大联合，尽管造反组织被取缔，但工厂里重新组建了职工代表大会、工人管理小组等多种组织。北京市针织总厂从工厂、车间和班组三个层面组建了工人管理小组，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工人管理小组从劳动安全、财务等方面，对革委会正常行使职能进行监督，充当群众和干部之间的桥梁，通过召开车间、班组会议，征集工人对生产计划、产品质量、投资项目等方面的意见，实现工人对工厂的管理。工人管理小组还参加党支部会，从党群关系、政治方向以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对基层党员干部进行批评和监督。其他工厂也建立了类似的组织，有的接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文革前群众组织由政府领导，地方干部任免由党垄断，干部好坏群众组织没有发言权。文革后发生了变化。在派性斗争很弱、较好实现大联合的上海市，群众组织不仅没有取消，而且对各级革委会、党组织都有重大影响。1972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更名为上海市工代会，1973年以工代会骨干为主组建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在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输送工人新干部进入党政机构，还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派出工人干部。

第五，实现妇女解放，增强了群众力量。毛泽东高度重视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解放，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文革前，很多工人的妻子没有工作，困于家务之中。文革后，采取多方面措施解放妇女，促进了社会进步。一是突破资本逻辑，广泛动员家属依靠劳动投入建立大集体（由国企管理）、小集体（由街道、公社管理）企业，使妇女广泛参加社会劳动，既补贴家庭收入，又改变社会地位。家属工厂迅速发展，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基本都参加了生产。1949年全国只有女职工60余万人，占职工总数的7.5%；而1978年为3128万人，占职工总数的32.6%。在农村，妇女出工率达90%以上。以南京光华东路第4无线电配件厂为例，开始女工们只能用手绕电容器线圈，后来改用机器，到1971年已经能生产22种类型、150种规格产品，电容器产量从1966年的150万只增加到1971年的800万只。二是改善妇女福利，减轻家庭负担。文革中，托幼儿园和妇女保健大发展，妇女生育有56天产假，工资照发，生病可以领取正常工资。文革期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较快，城乡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很快，南京市1972年城区生育率下降到0.8%。文革继续推进妇女教育事业，文革后期女童的入学率达到90%以上，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三是动员妇女广泛参与政治。文革前，妇女领导干部比例很低，很多妇女对入党也漠不关心。文革后，大批妇女积极学习阶级斗争力量，很多担当了基层干部职务，妇女参政出现了第二次高峰期。大联合以后，江苏省各级革委会都有20%的妇女。到文革中后期，妇女干部比例达到了顶峰，高达30%左右。这不仅是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各国当时也纷纷学习中国妇女解放的成功经验。<sup>293</sup>

第六，锻炼群众，极大的提高了群众觉悟。尽管文革中后期，大部分工农群众都充当了保守力量，但文革普及了马列主义理论，造反有理等毛式语录深入人心。工农群众在文革中接受如何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教育，到改革开放又经历分田到户、改制分流的资本主义教育，通过亲身对比，对资本主义道路有了清晰认识。在走资派的表演中，群众再次理解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这也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精神遗产。文革前群众不敢给干部提意见，文革运动教育了群众，不能迷信党员干部。例如“4050”国企职工的意识特点尤为明显，在上世纪末的下岗运动中，国企职工自己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敢于同领导干部辩论、争取权利。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变成了拥毛派，甚至原来的百万雄师成员也认识到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为了“使劳动人民免受二茬罪，免吃二遍苦”<sup>294</sup>。文革指明了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告诉群众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性，这一点的影响也会在未来的社会运动中表现出来。

<sup>292</sup> 李毅.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M].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sup>293</sup> 雨夹雪. 共和国60年妇女地位的变迁. 网文, 参见: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615/15/36227\\_33230334.shtml](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615/15/36227_33230334.shtml)

<sup>294</sup> 荣根. “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 网文, 2007-07-19. 参见: <http://www.wy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1/127412.html>

### 一、分歧的根源，1949-1966 年

1950 年，武昌、汉阳、汉口三个城市合并成武汉市。1954 年，武汉成为湖北省的首府，省政府设在武昌，市政府设在汉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十七年间，武汉建设了几十个大型企业和几百个中小型工厂。1966 年，武汉的人口增长到 250 万。

武汉市的居民类型在各区都不相同：硚口、汉阳和青山区主要居住着产业工人；江汉区主要居住着非无产阶级劳动者、非知识分子（中等阶级）和从前的资本家；武昌区主要居住着知识分子和在省政府、武汉军区工作的文职及军队人员；江岸区则各类人等杂居。

文化大革命前的武汉像其它中国城市一样，也呈现着三种社会分歧。

#### 干部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分歧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私有制虽然在中国已被取消，但国有制并没有赋予所有公民享有和处理财产的平等权利。劳动分工的等级结构仍然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劳动的经济分工中，一些人担负了计划和指挥他人工作的创造性任务，而多数人则不得不去干知识要求更低、更加平凡的活。

1957 年，北京航空学院助教周大觉独立地提出了新阶级理论。周认为，生产资料国有制在中国只存在于名义上。实际上，生产资料却掌握在少数个人手里。这些人不直接从事生产活动，却在生产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地位，成为生产资料的管理者。正因为他们控制了生产过程，于是就获得了经济优势。周的结论是，这些人构成了脱离人民大众的领导者阶级，领导者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就是一种阶级斗争。

就那些当权派所占据的地位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普通工人相距存在的差距而言，在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里的确出现了两个基本阶级：干部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他们处在社会生产的不同地位，因此这两个阶级之间产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国，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被干部阶级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的冲突所掩盖。

#### 干部阶级内部的分歧

干部阶级由三类具有不同特点的干部组成：党政干部、行政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党政干部包括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和妇联官员；各单位的政工、宣传、人事管理和保卫人员。他们履行至至关重要的思想、政治、组织和镇压职能。行政管理干部从事生产和再生产的管理工作，比如各级经理，负责会计、账目、供应和分配和福利等事务的负责人。技术干部拥有知识和技能，对于促进政府目标的实现能够起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凭借自己的知识，能够影响甚至否定其它两类干部作出的决定。这类干部包括企业里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教育和科研机关里的教师和科学家，以及医生、记者、艺术家等等。

在这些各不相同的干部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内在区别。党政干部，特别是那些中下级干部一般出身于工人阶级或贫农，很少受过正规教育；而多数专业干部则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受过较好的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包含了高低两种出身的人。不同的社会出身和经历必然容易引发矛盾。

中国共产党掌握政权时面临着一种两难境地：多数革命干部没有受过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训练，而受过这些训练的人却往往出身于中等或上等级家庭。人们认为后者对新政权的目标、价值观和纲领并不完全赞同。由于兼备政治可靠和技术内行的人很少，所以中国不得不在按照政治可靠性标准提拔一批干部的同时，又任用具备技术专长的另外一些人。

人民共和国真诚地努力提高人民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从受压迫者转变为统治者。1949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解放武汉以后，派了大约 6000-8000 名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其它革命积极分子来接管城市，他们的头衔叫作“军代表”。差不多每一个企业和政府机关都派了军代表。他们在每个单位都担当了领导的角色。以后当政治形势稳定时，大多数军代表都被正式任命为相应单位的党委书记或主要负责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很多单位的领导干部仍然是从前的军代表。

老资格的共产党干部数量毕竟有限，单靠他们显然不足以填满所有权力空位。因此，大批工农积极分子被放到一些政府和企业的岗位上。特别是在 1952 年大规模工业建设计划实施后，体力劳动工人向管理岗位转移的步伐大大加快。到 1957 年为止，1949 年前入党的老干部只占当时武汉干部总数的 11%；另外 89%是新干部。大规模的提拔促成了一种高度而长期的社会地位变动，使许多出身卑微的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同时，由于党要求迅速发展经济、实现科技现代化，因此专家的技能更显得重要。党不得不向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人作些让步。

建国初期，鉴于稳定社会和维持基本运转的迫切需要，新政权不得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要依赖国民党政府的前行政管理和技术人员。解放一年后，有一个调查显示，超过 50%的武汉干部是留用的国民党官员。

新政府也极其重视从前的资本家的管理技能在有些行业里，管理层内从前资本家的人数超过了革命干部。例如，在武汉的四个主要行业（建筑机械、纺织、轻工业和手工业）的 374 个企业的 638 名经理、副经理中，有 444 人是从前的资本家，占总数的 69.6%。其它 194 个管理职位由共产党的老干部和新提拔的工人担任，但他们只占总数的 30.4%。随着更多任务人被提拔到管理岗位上，从前资本家在管理层所占的百分比开始下降。但是，1956 年走上管理岗位的多数前资本家在 1966 年仍然担任这种职务。

上面的讨论应能使大家清楚地看到，在 1960 年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干部阶级是由两种类型的精英组成：新的政治精英和老的专业精英。这两个集团在社会出身、受正规教育程度及功能上都大相径庭。由于他们是从阶级背景迥异的人中选拔出来的，又天天都在权力、地位和收入等方面的分配上进行竞争，所以紧张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工人阶级的内部分歧



工人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不论是在国营部门还是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人势力大体上都可以分为三类：积极分子、落后分子和中间分子。

### 非对称的不平等

人民共和国在政治权力分配、经济报酬和社会特权等方面并不是完全平等。这一节要从两个方面来量度主要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当前的生活机会和向上社会流动的机遇。在生活机会方面的不平等往往是政治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潜在根源。社会流动的政治意义也是明显的。向上的流动可以为非特权阶级中最能干、最有雄心的成员提供一条出路，从而可以缓解一些由不平等造成的紧张关系。相反，向下流动则使人沮丧，纵使他们当前生活的机会仍然比其它人要好。

有些评论家认为，干部阶级和群众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事实上，经济不平等并不像许多人所想的那么严重。1949年共产党革命胜利后，新政权推行了激进的平等主义收入政策。一般来说，中国的收入分配与西方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带有高度的平等主义色彩。

通过对当时的多种社会不平等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三个结论。第一，并不存在有产阶级。虽然有些人的收入比平均水平高得多，但他们的收入是固定的，而且不能再扩大。第二，经济报酬的总体差别很小。第三，仅仅在政治意义上看，党政干部才可以被称为中国社会最有特权的集团。从物质生活方面看，老精英的生活远远超过新精英。

## 二、旧游戏与新牺牲者，1966年6-7月

1966年6月1日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发了由聂元梓和其它六位北大教师与研究生写的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竭力“保护资产阶级权威”。毛泽东希望通过播发这张大字报向千百万中国人传达一个重要信息：攻击当地党的领导并不一定是不合法的。

1966年6-7月所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从北京的中央到基层的各级领导人都把新的运动看作另一场反右运动。<sup>4</sup>按照这种理解，任何未经批准而对党支部或党的高级官员的攻击，都被看作是对党本身的进攻，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允许对基层个别党的官员进行善意的批评。

对官僚们来说，毛泽东还从来没有否定整个国家体制。所以，游戏规则没有发生多少变化，人们仍然会扮演他们以前扮演过的那种角色。因此，权力关系基本完好，政治机会结构仍然未变，潜在反叛者的风险如同以前一样大。为了阻止可能打破权力平衡的行为，在维持现状方面具有既得利益的地方领导和社会力量，严厉惩处那些在行动上没有完全遵循旧的游戏规则的人，对他们的大胆举动予以重拳打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人们即使对政权不满也不敢攻击领导。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月里，尽管中国社会的某些部门（特别是学校）搞得轰轰烈烈，但毛泽东发现，由于政治仍然基本上按旧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展，所以整体形势像一潭死水。毛泽东后来断言，在这“白色恐怖的五十多天”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盛行。

### “新的反右运动”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4月。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3月杭州会议。他回到武汉就宣布，文化大革命要打击的主要社会集团，是文化名人或资产阶级权威。<sup>5</sup>在湖北省委4月25日举行的会议上，王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了文教领域。他预测说，文化大革命会挖出百分之五至十的知识分子新右派。

聂的大字报刚一公布，武汉的一些学生就贴大字报批评他们所在学校的党委，说他们缺少支持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运动的热情。6月2日，大字报首先在武汉测绘学院出现。

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武汉各学院和大学党组织去“统一学生的思想”。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在各个校园召开大会。武汉测绘学院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对学生们说：“有的同学惶惑了。当前北京市委、北大党委出了问题。共产党是否还值得相信？毛主席是否还值得相信？彼此之间是否还值得相信？”<sup>12</sup>

6月5日，第十四中学的一个高中生贴出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质问党支部》。这所学校的党支部曾要求毕业班学生集中精力准备高考，而允许其余学生减少课程，参加运动。大字报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因为“现在是我们投身于阶级斗争伟大战斗的时刻，而不是进行平静的书呆子学习的时间”。

6月9日，第三中学校园出现了一张大字报。它以《炮轰（学校）党支部》为题，使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大为震惊。

6月11日发生了两个似乎更危险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一群学生贴出了一张点名攻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大字报；在另一所中学里，发现一些学生成立了叫做革命行动小组的秘密组织。同一天，宋侃夫愤怒地赶到张贴攻击他的大字报的那个学校，部署对“牛鬼蛇神”的反攻。湖北省委派遣了160人的特大工作组，来到发现“反革命集团”的学校。

到6月中旬为止，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已经完成了派遣工作组进驻教育机构的工作。实际上每所学校都派去了工作组，参加工作组的人员超过了一万名。

王任重湖北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估计说：“1957年挖出了55万右派，这个运动会发现更多的右派。（每单位右派）的百分比可能不低于百分之三，也可能会达到百分之五。”他还更具体地宣布，大约百分之一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将被定为右派。

6月23日，湖北省委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许道琦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告诫与会者不要急躁：“有些学校反击了，不要反击过早，反击过早，坏人就会跑掉……先让他们放。”

7月，当权者组织反攻，大体上只打击学生右派。总共有来自13所学院的254名武汉大学生被定为“假左派、真

右派”，<sup>25</sup> 比起北京的一万名学生右派来，这个数字似乎微不足道。在武汉，公开对抗党委或工作组的事件的确很少出现。

### 打乱仗（中学、大学、其它部门）

王任重的儿子王三宝是位初中生，6月6日，他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他所在中学的一些教师，并暗示其父已经审阅过大字报稿。

几个月后，人们对学校党委和工作组展开批判，说他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把斗争矛头向下对准群众”。

多数情况下，中学生在这一期间没有受到批判。但是，6月16日至7月24日，按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命令，在39所中学逮捕了159名所谓“流氓学生”<sup>39</sup>

教育改革是分化学生团体的另一个问题。6月中，北京发布了关于高中和大学招生的两个指示。指示批判现行招生制度有利于非无产阶级子女而不利于家庭出身好的孩子。

7月，市政府改革了高中招生程序。入学考试被取消，录取新生是根据学生的阶级出身和政治表现。

中学和大学招生改革使每一位学生都强烈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并对政治气候的变化敏感起来。不同出身的学生之间以前存在的小裂痕变成了巨大的鸿沟。虽然公开的冲突仍然很少，但潜在的紧张正在增加。

大学里的形势与中学的形势并无太大区别，只是在以下两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个方面，五个大学的党委被认为已经“腐烂”，因为它们已经被“阶级异己分子”掌握了。工作组一到校，就开始动员学生造学院当局的反。第二个方面，与中学里的学生不同，大学生的年纪已大到可以成为合法的斗争目标。例如，到7月底为止，在华中师范学院有300多名学生受到大字报的攻击，占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其它学院的形势也大同小异。

在学院里，选择造反对象也主要是由学生自己决定，而不是由党组织或工作组来决定。原因是在选择斗争目标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所以学院里的批斗目标多种多样。教师或者是学生、党的干部或者是普通群众，以及出身好的或者是出身不好的人，统统可能成为这种“打乱仗”的受害者。文化革命初期高等教育机构的运动特点，也许对于理解后来在大学造反派与保守派间出现的组织成分相对模糊的特征，是大有帮助的。党组织和工作组鼓励学生和教师互相攻击，因为他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牛鬼蛇神”会暴露出来。对他们来说，整错一些清白的人正是任何政治运动都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1966年）在武汉还没有结束，还有社教工作队。在武汉。<sup>51</sup> 工作组和党委一般有工作分工：前者要指导政治运动，而后者负责其它方面的一切事情。二者间的关系在各单位都不同。在多数情况下，他们互相合作得很好；但在有些单位，他们则互相对抗。<sup>52</sup>

在医院、科研院所和文化机构，由于那里很大一批职工是知识分子，所以“资产阶级权威”和“孝子贤孙”就成为主要的斗争目标，正像在学校里那样。在那些单位里，通常有很大比例的人员受到批判。<sup>53</sup>

在工厂里，由于没有多少人可以被划为“资产阶级权威”，所以斗争矛头就指向了那些表现不好的人和坏分子。通常在一个单位里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职工受到大字报的批判。<sup>55</sup> 武汉电信局是一个极端的情况，那儿有约80%的职工受到大字报的批判。因为自我防御的最佳策略，就是攻击别人。攻击别人不仅显示你愿意积极参加运动，而且可以借此机会报复那些向你发起攻击的人。这种规则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打乱仗”。

当这种斗争在一个单位里展开时，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曾指示工作组准备一个秘密名单。这个名单把单位的人划分为五类：左派、中左派、中间分子、中右派、右派。<sup>56</sup> 当名单弄好以后，工作组就会让积极分子知道下阶段作为运动目标的人的名字和作为争取对象的人的名字。

在工作组与以前的领导层互相对立的单位里，形势就更加复杂了。在这种形势下，一般是以前的领导层受到攻击。由于不信任从前的积极分子，工作组就努力培养自己的积极分子。在运动最初阶段，内部权力结构上的这种重新组合，可能与以后阶段里的标准模式有所偏离。如果工作组从以往中间和落后分子中选择新的积极分子（通过指责前领导错误地对待了这些出身好的人），并依靠他们攻击以前的领导和以前的积极分子，老积极分子就可能成为造反派，而新积极分子成为保守派。<sup>59</sup> 如果工作组引入外来干部来取代原来的当权派，以后就可能有至少两个互相分离的造反组织，其中在旧领导时受到压制的那些人主要攻击以前的领导，而以前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则攻击工作组和新领导人。<sup>60</sup> 如果工作组成功地把大批以前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争取过来，那些被排斥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就可能参加造反组织。<sup>61</sup>

但是，在这一时期，并非每个单位都深深地卷入到运动中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工厂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个月里几乎没有被这场风暴所触及。那些单位通常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结束或者那里的绝大多数职工都出身很好。由于这些单位十分干净或者刚被清理干净，所以当地政权允许他们至少暂时不开展横扫牛鬼蛇神运动。<sup>62</sup> 那些单位也就躲过了这个引起大量分歧的多事时期。因此，它们以后也比其它单位派性更少。<sup>63</sup>

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两月里，大批个人在6月和7月里成为受害者。他们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藐视工作组或党的权力机构。无论如何，1966年6-7月份的文化大革命显然偏离了毛泽东期望它运行的方向，即整顿这个党。当权者的地位同以前一样安全。

### 三、新游戏与新玩家，1966年8-12月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不久，于7月18日斥责工作组，使武汉的领导人莫名其妙。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文化大革命前两个月由工作组实施的有控制的动员，妨碍了运动的健康发展。他推行的第一项变革，就是宣布“放手发动群众”的原则。新原则其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它剥夺了党组织限制群众动员的权力。第二，公民个人第一次获得做出他或她自己判断的权利。第三，如果发现党组织犯了企图扼杀群众革命积极性、压制不同于自己的意见或对于群众运动设置障碍等错误，人们就可能运用放手发动群众这个武器反对党组织。

## 红卫兵的兴起

8月初，工作组开始从学校撤出。在所有大中学校都建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工作组的位置。只有阶级出身好的学生和教师才有资格成为这种委员会的成员。非教育部门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

在文化革命委员会巩固其权力之前，一种新式群众组织在北京出现，并迅速扩及全国，这就是红卫兵。毛泽东于8月18日在天安门接见了一百万名青年，游行队伍中出现大量身着绿军装、自称“红卫兵”的学生，毛泽东本人也带上了红卫兵袖章。这使武汉人第一次注意到红卫兵。<sup>6</sup>

第二天上午，武汉第一支自我命名的红卫兵已经在这个城市的街上游行。对这种异乎寻常的事态发展，当地权力部门颇为吃惊。<sup>7</sup>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以来，还没有出现过像红卫兵这样的自发群众组织。如果毛泽东没有表示他对北京红卫兵的支持，当地政府会将这些未经批准而建立政治团体的人逮捕入狱，不管他们的纲领是什么。但北京发出的信号似乎是准确无误的。纵使他们仍然对毛泽东宽容乃至鼓励这种自发群众组织感到迷惑不解，也只能采取响应毛泽东指示的稳妥行动方针。8月19日，省当权者视察11所大中学校，表示对“青年革命闯将”的支持。由于当红卫兵便马上得到荣誉、尊敬和名望，而且也没有什么风险或代价，因而每个人都想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随后几天，红卫兵组织像雨后春笋，在这个城市里到处出现。当地政权只得从一所学校到另一所学校去祝贺新的红卫兵组织的诞生。同时，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又召开各校红卫兵“经验交流”大会。这些会议的真正目的，就是把红卫兵拉到与当地党的领导一致的路线上去。然而，魔鬼一旦被释放出来，就很难再把它装回潘多拉盒子之中。

8月2日，北京红卫兵开始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消息传到武汉。破四旧运动迅速席卷全市。正如克兰·布尔顿（CaneBnton）所指出的那样，没有什么比用外表的变革来预示所谓革命的来临更简单易行，更引人注目。<sup>10</sup>学生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使城市面貌革命化，特别是使不革命的街名和商店名革命化。<sup>11</sup>例如，任何名称中包含“福”、“寿”、“禄”、“和”、“裕”或“泰”等字的街道或商店，都要重新命名，用“东方红”、“红旗”、“工农兵”、“东风”、“红卫兵”等取而代之。

学生们并不只是忙于改名字。从1964年开始，紧身裤、尖头皮鞋、高跟鞋、西服领带和长头发等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象征。现在这些全都遭到禁止。学生们勒令理发店、裁缝店和照相馆不得做任何有违无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工作。此外，全市遍设检查站。当检查站发现谁的打扮不符合学生理解的无产阶级风格，就强迫其符合（例如，把长头发剪短、把妇女鞋子上的高跟去掉）。

几天之内，街上所有四旧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学生于是开始搜查旧精英的家，没收或销毁任何他们认为需要这样做的东西。出身不良阶级家庭的学生，希望显示他们与其过去的阶级决裂，甚至请同学去搜查他们自己的家。受害者常常告诉来抄家的人，还有哪些人的家可以抄，他们的名字和地址是什么，特别是个人对手的名字与地址。有些剥削阶级家庭在学生面前先自己销毁这些四旧。没收的贵重物品通常是金条、钻石、古董和善本书等，不太贵重的东西便就地销毁。由于价值的判断是由十几岁孩子作出的，以至很多真正的宝贝被摧毁。当工人和低级干部子女发现，许多“吸血鬼”（他们起的名字）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得多，就产生强烈的嫉妒心理，使他们常常把一切物质享受的东西都与四旧联系起来，并当场销毁而后快。<sup>12</sup>

针对老精英的暴力在1949年以来的其它时期也发生过。过去的暴力总是由当地政府发动和组织，而1966年8月的暴力则不同，它是由自发的学生们进行的，结果就更加肆无忌惮、更加野蛮。武汉总共有21000个住宅被抄，没收了17845两黄金、28936两白银、267000个银元和4.4亿现金。<sup>13</sup>学生还开会批斗“牛鬼蛇神”，带他们游街，甚至强迫他们离开城市。体罚成为一件常事。在武汉，有32人被殴打致死，还有112人企图自杀，其中62人死亡。<sup>14</sup>

为什么武汉学生那么热心参加破四旧运动？第一，这里没有什么风险。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赞扬了北京红卫兵的破四旧行动，<sup>15</sup>武汉党的领导没有别的选择，对学生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态度。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同其它领导人讨论混乱形势时说：

放手搞大革命，放手搞大民主，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你要成立红卫兵就成立；你要上街就上街；你要干什么可以。要到长沙、北京去，可以的。你要打庙，支持他去打。不采取这个精神，我们就被动了。<sup>16</sup>

红卫兵的过激行动毕竟没有对当地政权造成直接威胁。中央和地方政权对红卫兵初期的过分行径的纵容，使学生们更加肆无忌惮。

第二，除了时间外，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学生有足够的时间，因为学校已经告诉他们停课半年，以使他们能够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他们的问题不是时间的缺乏，相反是时间的过度供给。

第三，还有收益。与成年人不同，学生可能会轻易地受表现性收益（ex, essvebenefits）的驱动而参加政治行动。对多数学生来说，参与破四旧的集体行动的确又刺激又有趣，在一起行动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巨大快乐。此外，许多学生还期望能从他们的积极行动中得到回报。8月底，虽然在多数学校都有自称的红卫兵，但红卫兵组织还没开始正式征收学生。非红卫兵学生认为，他们参加破四旧就是表明其决定做文化大革命先锋的方式。他们希望，当学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扩充队伍时，会考虑他们在这个革命行动的表现。所以，非红卫兵学生正像红卫兵一样急于走出去破四旧。<sup>17</sup>总之，表面上疯狂的破四旧运动，尽管是下意识的行动，但也有学生理性的基础。

红卫兵的过激行动危害了公共秩序，却放过了毛泽东心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8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个声明中，北京的一些红卫兵制定了标准：

我们凭什么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凭我们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的子弟。……非红五类子弟，你要革命吗？你就要背叛自己的家庭，你就要革自己的命，你就要和红卫兵站在一起。要革命就站出来，过来我们就欢迎，就团结。<sup>19</sup>红五类原则当然受到阶级出身好的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被武汉采纳为红卫兵标准。这

样一来，红卫兵变成一个排他性组织，只有红五类学生有资格加入。

红卫兵的兴起和破四旧运动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红卫兵开了这样一个先例，即利益相同的人可以自己组成团体反对其它人。虽然在 1966 年 8-9 月里只允许出身好的学生这样做，而且每个学校只许一个红卫兵组织存在，但红卫兵是自 1949 年以后，中国不受政治等级制度直接控制的第一个真正的群众组织。工会、共青团和妇联并不独立于同级党委，而红卫兵则不同，它从开始起就是独立的。它的建立、吸收成员、组成、纲领、策略和行动都由成员自行决定。由于它们的独立自主性，就使其更可能与政权相对抗而不是合作。第二，跨单位行动开始出现。在过去，社会力量受到垂直分割，一切政治活动都在各个单位内进行。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通过其等级网络体系动员跨单位行动。红卫兵则开了一个先例，使其有相同利益的人形成跨单位联合，以便追求他们的共同目标。

红卫兵在 8 月的行动，只是对那些在过去十七年里各种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头两月的打击对象所进行的又一次打击。但是，他们没有像毛泽东期望的那样去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汹涌的造反浪潮

破四旧运动掩盖了 8 月的另一个重要事件北京和各省市之间串联学生数量的增长。有关毛主席要接见更多红卫兵的传言，吸引了各省市大批学生来到北京。与此同时，北京学生想要去点燃停滞省份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还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就奔向了全国其它地方。

8 月底，一群北京学生到达武汉。在当地政权采取行动之前，北京学生已开始直接攻击湖北省委。

8 月 29 日，湖北省委宣布，已经查办了省委宣传部部长曾淳。一周后，又公开批判副省长陈一新。这两人都是湖北省委常委。这是中国人所说的“弃车保帅”之计。通过牺牲这两人，省委领导人希望表明，湖北省委内部“隐藏的敌人”已全部被识别出来，并得到处理。

此外，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还秘密地动员力量发动对北京造反派的反攻。8 月 30 日，湖北省委起草了一封呼吁书，以“湖北大学学生”的名义发表。呼吁书说，北京学生代表了一股“逆流”，妨碍了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信中还声称，对湖北省委的任何攻击，都是对毛主席和党的领导的间接攻击。第二天，武汉市委发出了另一封紧急呼吁书，也假借别人的名义，号召抵制“南下一小撮”。王任重凭借作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地位，把他精心挑选的几组北京红卫兵派到武汉去。这些人由两个当时全国有名的红卫兵卜大华和宋要武率领，<sup>31</sup>以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为使命。他们以“真正的”北京红卫兵自居，谴责那些攻击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人。

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努力至少暂时收到了效果。当地居民（包括当地红卫兵）从一开始就把对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攻击视为一种狂妄行为。他们现在对北京学生发起了反攻，使后者很快发现自己在武汉不受欢迎。

8 月 31 日，毛泽东在北京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在武汉的北京学生因此也要求与省长座谈，但张体学拒绝了这个要求，并说他不让人感到他受学生的摆布。这样一来，双方就面临一场冲突。9 月 2 日晚，40 名北京学生在湖北省委大楼前面静坐示威，在第二天增加到 200 多人，他们决定绝食。

此时，各省市的地方政权都面临着串联学生的挑战。在有些地方，紧张局势导致串联学生与当地居民间发生武斗。相比之下，武汉的形势相对稳定，这也使张体学能够得意地宣称，“我们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sup>36</sup>

9 月 7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一些地方领导人煽动工人农民反对造反学生。9 月 12 日，那些 9 月 4 日返回北京的学生回到武汉，他们于 9 月 8 日见到了党中央第四号领导人陶铸。刚回武汉，大字报就贴遍全市，声称陶已经指示张体学作自我批评。串联学生也提出了一个挑衅性的口号：“打倒湖北省委”。这个口号震动了全市。武汉市民非常焦急，在随后几天，约百万人众集在街上，争论湖北省委是否犯了错误。主导性的意见是，省委没有犯错误，支持湖北省委的人喊出了“捍卫湖北省委”的口号。

9 月 15 日，湖北省委邀请串联学生和当地学生代表召开所谓的协商会。张体学在讲话中说，“我代表我和湖北省三千多万人民控诉赵桂林（来自人民大学的学生，是当时北京在武汉学生的领袖）”此会不欢而散。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无数群众集会谴责北京学生。同时出现了大量支持湖北省委的大字报和传单。

串联打破了现存政治的平衡，促成了有利造反的形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串联能把保守派转变为造反派。第二，串联有助于促进地方反对势力的产生。第三，串联有助于改变大学和中学里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平衡，到了 10 月份，也允许出身中等甚至不好的学生出去串联，当他们于 11 月和 12 月带着新思想返回学校时，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被彻底批倒，他们就大批地加入了造反组织。

### 地方政权的瓦解和学校造反派的出现

1966 年 10 月，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地方当局为所有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的人平反，公开销毁所有存档的“黑材料”。当时还按毛泽东的提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省市领导人受到批评，说他们在对待造反学生时很被动，并维护自己，压制学生。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就让王离开北京到海南岛，这标志着他的倒台。

由于可以随心所欲地组团结社，1966 年 10 月，在每个学校都出现了无数的组织。为了与老红卫兵组织竞争，新团体一般更愿意互相合作，建立松散的联盟。到了 10 月中旬，多数学校的学生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老红卫兵组织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称思想兵）。鉴于前者在 9 月中旬已经建立了一个协调各个学校分支的全市性行动的司令部（第一司令部），<sup>63</sup>后者很快提议建立自己的全市组织系统。<sup>64</sup>在 10 月末，思想兵进行了迅速的扩张。武汉思想兵司令部（它自称第二司令部，或简称“二司”）于 10 月 26 日正式成立，武汉测绘学院的学生杨道远被选为领袖。华中工学院和湖北大学的思想兵认为杨道远不具备领导大组织的才能，撤出组织，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司令部“新华工”和“新潮大”。未能组成统一的组织之所以没有立即导致思想兵的公开内部冲突，是由于他们还面对强大的敌人——本地政权和保守派。

二司的成立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省里的一些领导人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会。这一姿态表明，地方政权首次不得不承认反对派存在的权利。11月1日，当思想兵冲击湖北省委的一个重要会议时，省当权者感到几乎无能为力。他们不再敢约束本地反对派，因为任何这种企图都会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批为“镇压革命群众”。地方政权所能做的，就是在平等基础上同造反学生谈判。

### 群众组织的激增

1966年后两个月最重要的事态发展，就是运动超出了文化教育机构，实际上进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有些工厂工人很羡慕学生。这些工人在6-7月间曾被打成“右派”、“三家村分店”和“反革命”等。当看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学生得到了平反，他们也想恢复名誉。9月，湖北大学被指定为接待站，成为武汉接待串联学生的大本营。许多心怀不满的工人下班后到那里静静地收集信息，并在相互间迅速传递。各种秘密联络网就这样发展起来，成为未来激进工人组织的胚芽。这里面的很多人将成为未来十年里的著名人物。<sup>74</sup>

1966年10月少数派学生的胜利激励了受排挤的工人，一些造反派学生同工人频繁接触，鼓励他们寻找更多的同志，组织集体活动对当权者施加压力。从这个意义上看，这些学生发挥了政治企业家的作用。工人积极分子和造反学生之间逐渐形成了众多的联络网，其中最大的联络网出现在武昌。

10月28日，武昌的联络网举行了第一次独立集会，批判湖北省委执行的反动路线。一周后，它同二司和其它一些激进学生组织共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提出了“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sup>76</sup>11月9日，一个叫做工人总部的工人造反组织宣告成立。就在同一天，著名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上海正式成立。

11月13日，中央开始承认自发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工人总部建立不久，权力就逐渐集中到来自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和武昌造船厂等几间大型工厂的青年人手里。工总在武昌成立之际，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造总司”）于12月8日在汉口“武汉电子组件厂”诞生。12月12日，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这两个巨型企业在青山区工人成立了九·一三兵团（简称“九·一三兵团”）。从此以后，工人总部、工造总司和九·一三兵团成为武汉无数工人造反组织的领头羊。以后，工人总部设法渗透了武汉六个区的许多企业，而工造总司和九一三兵团在汉口或青山以外影响很小。九一三兵团主要从武汉钢铁公司和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吸收成员，工造总司则主要从汉口的中小型工厂吸收力量。

### 保守派与造反派

激进工人在12月崭露头角，但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在每个单位里仍然是极少数。

11月9日，三司和其它激进组织占领了湖北省委的喉舌《湖北日报》办公室，一周后，这个报纸被迫关闭。11月18日，张体学发表了一个声明，承认造反派行动是革命行动。这个报纸的编辑部和湖北省委都公开做了自我批评，承认报纸在最近几个月里犯了“错误”。湖北省委的支持者对此大失所望，他们抗议省委的“投降主义”，并认为到了成立他们自己组织的时候了。由武汉机床厂一群工人发起，革命职工联合会（简称“联合会”）于12月2日宣告成立。它很快扩展成拥有40万成员的组织。

联合会从性质上讲是一个保守组织，在行动上温和的。受到造反派和保守派两面夹击的湖北省委，却宁肯讨好前者而不是后者。而造反派却由此而更加嚣张，他们于12月18、19日进攻了老红卫兵和联合会。

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的定义，“黑材料”是工作组和党委在1966年5月16日至8月8日（发表十六条那一天）期间整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命令，受害者写的自我批评必须发还本人，各种形式的黑材料都必须公开销毁。一边想要公布更多的材料，而另一边拒绝交出材料，很多单位的造反派干脆用武力抢夺一切个人档案。这种行动常常引起暴力冲突。此类冲突终于导致了一位女档案员的死亡，而死者碰巧是联合会的一个成员。联合会抓住这个事件对造反派发动了反攻。在12月25日，全市的工人聚集在新华路体育场（武汉最大的体育场），为这个女档案员开追悼会，随后举行了一个盛大游行。

北京对全国的保守力量日益持反对态度。在1966年的最后一天，造反派关闭了武汉市委的机关报《武汉晚报》。12月25日，王任重被一伙造反派从广州带回武汉。两天后，十九个造反组织成立了一个“批王联合指挥部”。在1967年的头几天，他们举行了三次群众大会批判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由于这个城市从前的头号人物声名扫地，造反派在攻击本单位当权者时就再也无所顾忌了。几乎所有党的干部都“靠边站”了。造反派对他们举行批斗会，还污辱他们，带其游街。造反派还向保守派发动了猛烈进攻。他们于12月29日进攻了老红卫兵司令部。1月5日，工总甚至开始逮捕联合会的领导人。结果，有3,100人被监禁。<sup>96</sup>武汉落到了造反派手里。

## 四、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年1-4月

### 夺权、派别重组和混乱

在武汉，工总是响应北京向所谓走资派夺权号召的第一个造反组织。1月14日，它邀集13个团体来讨论如何在这个城市夺权。它们很快就《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达成一致，但讨论到如何进行夺权和怎样分配权力等具体计划时，却顿时陷入僵局。协商无果而终，公开信也无法公布。

1月20日，经工总和二司提议，14个组织在武昌重新进行协商。在经过三天的事吵之后，它们于1月23日宣布已经就大联合达成一致。新的最高机构称为武汉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以工总为主。

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协商中的争吵达到白热化。与会者在三个问题上互不相让。第一个问题是，是否夺权的条件已经具备。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及其它驻红楼的所谓红楼联盟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因为它们对自己主持夺权的能力非常有信心。此时工造总司已经完成接管市级政权的安排，并知道它作为武汉第二大的工人造反组织，谁也不能剥夺其参与夺取省级政权的合法资格。所以，它也同意时机成熟的说法。然而，那些还需要更多时间来提高其讨价还价地位的组织，如三司、新华工和新湖大却认为，夺权行动应当推迟。



第二个问题是，哪些组织将成为总司令部的常委会成员。二司提议，常委会应由五个成员组成——四个工人组织加上一个学生组织，而那个学生组织就是二司自己。当然，这个建议遭到其它学生团体的反对。经过激烈的争论，四个工人组织（工总、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和红色工人造反兵团）和三个学生组织（二司、三司和新华工）被选为常委会委员。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武昌总司令部与汉口那个总司令部的关系。以前，工总与工造总司就势力范围的划分曾经达成过默契：武昌是前者的势力范围，汉口是后者的势力范围。由于这个缘故，工总对工造总司在江北夺权的企图不便于表示反对。所以，由二司牵头批判工造总司，试图迫使后者立即解散这个伪总司令部。而工造总司明确表示拒绝。1月25日，总司令部决定，对省级政府的夺权行动将于次日下午三点正式开始。但是，二司关于汉口总司令部必须解散的要求激怒了工造总司，它宣布撤出大联合。

为了避免夺权计划的流产，总司令部敦促工造总司回到大联合中去。后者却主张，如果不把二司从常委会中清除出去，它就不参与夺权行动。二司单一学生组织计划所得罪的其它学生组织，也支持这个提议。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仍然保留二司在常委会中的席位，但撤掉了二司在常委会中的主要代表。因此，当1月26日省级权力易手之时，二司并没有它的代表在场。

湖北电台立即播送了造反派接管省级权力的新闻。前省长张体学要求省里各市、地、县的前领导人都要与新政权合作。

然而，前当权派的合作并不能防止新领导层的内部分歧。红楼联盟意识到，缺少二司的参与就会极大地削弱其在常委会中的势力，所以它们在权力转移四小时之后就发出一个联合声明，宣布这次夺权行动无效。随后，武汉造反派分裂成两个阵营。

双方都没有放弃夺取权力的打算，但它们再也无法合作了。1月30日，工总及其同盟者举行了一个批判张体学和宋侃夫的群众大会。两天后，张体学又成为主总对于组织的群众大会的批判对象。2月2日，工总及其它十三个组织成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产革命造反司令部次日，工造总司及其它的个组织建立了湖北抓革命促生产红色造反司令部2月5日，革命造反司令部在《长江日报》上发出了一个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知。次日，在《湖北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内容几乎相同的另一个紧急通知，署名红色造反司令部。8这一类竞争导致两大阵营之间的关系持续恶化。

2月8日，工总、二司及其它十个组织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指名攻击工造总司及其同盟者是托派、分裂主义集权和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这个声明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在此月余下的日子里，所谓二人声明成为武汉的焦点问题。反对者咒骂这个声明是一株毒草。他们每天都闖攻《长江日报》的办公室，指责这份报纸挑动群众斗群众支一派压一派。而声明的拥护者则称赞它是一朵美丽的香花，因为革命者必须把托派分子从革命队伍中清除出去。这个话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全市上下都围绕声明展开了大辩论。

自此以后，造反组织的两个派别又接受了新名称：“香花派”和毒草派。虽然两派也许偶尔会形成针对保守派的策略联盟，但它们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也没有真正消除。

### 秩序的恢复:二月逆流

1月21日，中央命令军队介入运动支持左派。为保证军队具备有效对付对立派别的威望和统一，毛泽东1月28日亲自批准颁发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这个命令严禁民众擅入军事设施或攻击军事人员。不久，军队的权力得到扩张，从被动地履行支持左派的使命，扩大到维护法律和秩序，管理经济以及重建权力结构。但问题是，在如何区分真左派还是假左派方面并没有给予明确指示。这样一来，支持左派的任务就使军队有权支持它所认定的革命派。

攻击工造总司的二人声明发表并激起武汉大乱之时，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军委的一个会议。毛泽东劝告军队在受到攻击时，对攻击者要退避三舍，以避免冲突。

2月11日，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十天前才设立)受到造反派中香花派的攻击。到此时为止，在中央军委的支持下，成都、福州和广州军区都对攻击军队的人发起了反攻。武汉军区效法其它军区，于2月18日发布了一个严正声明，批评二八声明和香花派。第二天，武汉部队在市中心举行了空前的阅兵式，以显示军威。同时，军营门前安放警戒线，以震情侵犯者。

武汉军区的声明自然受到毒草派的欢迎。虽然这一派并不特别喜欢军队，其中一些人还批评过军队，但他们乐于看到军队站在自己一边反对势力强大的香花派。权力斗争游戏的实质就是，要使合法的参与者数量越少越好。毒草派相信，同地方军队当局站在一边，会有助于把香花派逐出游戏圈。因此，毒草派在2月下旬热情支持武汉军区的立场，他们以声明、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等形式来反对香花派。此时，武汉军区和毒草派似乎有了共同利益。隶属香花派的许多组织的成员，因受不了两面夹击而脱离这些团体。所以，香花派很快就失去了对于毒草派的优势地位。

大约在2月底，陈再道和钟汉华回到武汉。离开北京之前，周恩来私下里会见了他们，劝告他们要特别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抓工业生产；第二，学校要复课，第三，要按行业、部门或单位实现联合。周的指示使这两位军事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恢复秩序是他们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对二八声明的批评，也消除了他们对于造反派，特别是香花派可能会阻挠的担忧。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对二司北京联络站代表指示说，二八声明是错误的。他还对武汉造反派警告说，不要把进攻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中央文革小组指责二八声明的消息一传到武汉，香花派就意识到，他们同毒草派和军队的战斗已经失败，而且唯一的选择就是放低姿态，等待命运中下一个转机的到来。2月27日，工总的头头到军区请求得到宽恕。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香花派成员在武汉大街上川流不息地游行，举着表示低头认错的标语牌。

为了切断本地造反派与北京以及与其它省市造反派的联系，军队于3月1日对电信局实行军事管制。不事先得到电信局军管会的批准，群众组织就不能向北京发电报。对本地造反派与外地造反派之间的通讯联络也实施了秘密审查。

军区关闭了《长江日报》，使香花派影响民众舆论的能力受到极大削弱。封锁了香花派的通讯管道之后，军队又开始进攻其大本营。从3月2日至11日，部队占领了香花派自1966年末以来盘踞的五座大楼。在陈再道的指挥下，当地报纸发表了批判二八声明的文章，当地广播电台则播发了批判二八声明的节目。为进一步搞臭造反派，还组织人们参观部队夺回的那几栋楼，以向大家展示造反派的流氓面目。成千上万人参观后感到，造反组织只不过是一帮匪徒。

武汉军区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并调用武汉公安局刑警队对工总头头进行侦察。虽然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肯定武汉军区的建议，但它也没有予以反对，而武汉军区把北京的暧昧态度当成是默许。3月17日凌晨，武汉军区逮捕了工总的头目和骨干分子共485人。3月21日，它发布了关于工总反革命分子所犯罪行的公告。武汉军区把工总斥为反革命集团在幕后操纵的组织，勒令它立即解散。

受“十六条”的限制，军队无法解散学生组织，所以他们声称二司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还宣称二司的领导层有反革命分子渗透进去了。通过公布这些指控，军队希望二司的群众会下决心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并批判其犯错误的领导人，以此来搞垮二司。来自军队的巨大压力使二司的领导人极为恐慌。他们在街上游行，乞求军队对他们过去所做的坏事予以宽大处理。一些分支组织的头头声称自己受到蒙蔽，于是建立整顿办公室，接管了司令部。在许多学校里，他们召开批判会，批斗二司在学校分支组织的头头。由于各级领导都处于瘫痪状态，加上普通群众纷纷退出，二司在1967年3月底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香花派的其它群众组织如九·一三兵团、红教工等，在压力下也差不多处于瓦解状态。

最初，毒草派造反组织支持军队镇压香花派。他们希望这些行动能在未完成的夺权过程中消灭其竞争对手。当军队收集打击工总的证据时，毒草派造反组织予以配合，提供材料。然而不久，他们就认识到，保守派正在利用批判二八声明和香花派发起反攻。他们在3月4日的《湖北日报》(由毒草派控制)上发表了一篇社论，警告保守派不要企图恢复旧秩序。

但军队指责这篇社论与二八声明一样有毒。3月9日，该报发表了一篇为那篇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社论而作的长篇自我批评。此后，军队从该报编辑部清除了所有造反派分子，并恢复了原总编的职务。3月4日社论事件标志着毒草派造反组织与武汉军区之间短暂蜜月的结束，毒草派很快开始衰落。到了3月底，造反派内的一些组织已经瓦解，另一些组织也在为生而垂死挣扎。<sup>39</sup>

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负责人说：这次运动就是要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跳出笼来登台表演，你们现在表演够了，该我们表演了。如果你们不老老实实，就杀了你们的头肥田，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现在是专你们政的时候了。<sup>40</sup>

保守派和干部们都同意军队的观点。他们曾经对文革开始以来的种种乱象迷惑不解，而现在开始明白了，并且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陷阱。在他们看来，3毛泽东鼓励人们造反，实际上是鼓励隐藏的牛鬼蛇神现出原形。

随着造反派在军队压力之下势力日衰，保守派开始恢复元气。在命运不济时，他们曾经采取了两种策略来保存力量。第一种策略是成立新组织。例如，红武兵主要由以前的民兵骨干组成，成立于1967年1月26日。1月至3月间，类似组织出现了十几个。其中造反大军主要由以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队员组成，红城公社成员主要来自居委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组织带有旧体制框架的强烈痕迹，所以就使它们得以顺利而高效地展开工作。另一个策略就是集体加入他们单位里最弱的造反组织。例如，大批保守派工人加入工造总司，以继续与工总斗争；而大批保守派学生则加入三司，以保持他们对二司的独立。起初，工造总司和三司热烈欢迎来自保守团体的这些“反戈一击者”，因为在他们与另一造反组织为权力展开竞争时，新力量显得至关重要。但是，他们又逐渐认识到，从前保守派分子的大量涌入，会产生把他们的一些分支组织转变成这些反戈一击者的可利用工具的危险。

武汉军区对左派和右派概念的重新界定，也促使保守派重新振作起来。武汉军区的一位负责人作了这样的解释：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按党的政策办事，就是左派；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就是右派。

有了军队为自己撑腰，保守派组织得以重新振作起来，并迅速向造反派发起报复性反攻。在很多单位里，造反团体的头头甚至普通群众都被迫作自我批评。按照军队的指示，工厂建立了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学校建立了复课委员会，但不让造反派特别是香花派成员参加这些委员会。一夜之间，造反派在武汉成为贬义词。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应当以三结合原则为基础建立。“但是，军队在各地都控制了这种办公室。49群众组织的代表即使没有完全被排斥在外，也顶多让他们参加其中，以摆摆样子。而党的干部在办公室里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拥有恢复社会和经济秩序所需要的技能的唯一群体。军队宣布，从前的单位负责人恢复权力，群众应当服从他们的领导。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从前的干部都官复原职。

到3月底为止，旧的权力结构似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恢复。干部们官复原职，工人们回到生产岗位上，学生们恢复上课。原来停滞的经济形势现在开始好转。

### 造反派的反攻与僵持

3月19日，北京红代会受中央文革小组委托，向武汉派出一个代表团，收集有关当地造反派状况的材料。《人民日报》于4月2日发表了一个题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社论认为，这场逆流的主要特征是：抓住革命小将的某些缺点、错误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革命小将的大方向，甚至操纵已垮台的保守派组织进行翻案活动，把一些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里指的是谁？看看北京关于安徽、四川、内蒙古、福建和河南形势的判断就清楚了。这些地区军事当局的行动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批评。4月6日，中央军委发出一个十条命令，严格限制了军队处理群众组织的权力。这一命令规定，严禁军队宣布群众组织为反动组织、不准解散这些组织、不准报复曾经攻击战士的人，除非所涉及的人的确犯罪，否则不准实行逮捕。

4月1日，新华工、新湖大和新华农(又称三新)以及二司分别举行群众集会和游行。当这几支游行队伍在街上相会时，他们就合并为一股，还相互赞扬对方的革命造反精神。从那天起，打倒武老谭成为联合所有武汉造反派的口号。为了摆脱军队对自己的控制，造反派学生发动了一场将军区派出的军训队驱逐出去的运动(3月以后军训队一直驻靠在学校里)。在造反派的压力下，武汉军区被迫于4月9日撤出军训队。

在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办公室外面，一帮造反派公然打起写着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一小撮混蛋挑战的大字标语牌。这一行动在武汉市激起轩然大波。

尽管工总领导人还关押在监狱里，但有迹象表明被解散了的工总正计划制造动乱。4月8日，以前工总的几十名成员举行了火炬游行。第二天，在武汉两间最大的工厂里，工人造反派宣布恢复工总的分支组织。几天后3又成立了工总联络中心，并且宣布，它的目标是促使为工总平反和释放工总领导人。

4月11日，来自第一中学的一群造反派向市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提出了过分要求。当他们的要求被拒绝后3这些学生就进行了四天的绝食。在绝食结束的那一天，一帮学生造反派占领了红旗大楼。这是《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的办公楼。<sup>63</sup>

应陈再道的请求，中央文革小组于4月19日召开了一个会议，专门听取武汉军区对武汉形势的报告。陈在会上说，只有300多名(而不是传说中的5万多名)学生参加了绝食示威活动，而且这个行动现在已经过去了。会议做出四个结论：第一，应当允许老红卫兵存在。第二，工总不应当恢复，因为在4月6日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之前已将其解散了。第三，武汉军区在3月逮捕500多人并非错误行动，但对这些逮捕需要逐一复查，确定无罪的应当释放。最后，武汉军区没有犯方向或者路线错误。此外，会议还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再将在4月21日会见武汉造反派代表，并将劝告他们不要攻击武汉军区。<sup>64</sup>

他们虽然在会上曾表示要保守秘密，但是很快这些消息就传遍整个武汉。第二天，即4月20日，保守组织开动全部宣传机器宣传和欢呼来自北京的特大喜讯；与此同时，造反派却茫然不知所措。

那天下午，江青从中央文革小组特派联络员的报告里获悉了这一情况后，对陈和钟十分愤怒。她认为，陈和钟正打着中央文革小组的旗号欺压造反派，因此命令陈和钟上交4月19日会议记录的复制件，并警告他们以后不许再提这桩事。原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与武汉造反派代表会见的计划也被取消。江青甚至威胁说，要取消中央文革小组承诺在未来给予武汉军区的所有帮助。

这一事件的更直接的结果，就是北京4月19日指示的神秘性。保守派坚定地认为，信息来源很可靠，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假的；而造反派则声称，所谓指示是由军队和保守派编造出来的。加上官方对此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就使冲突各方都可以尽情表演，从而更容易导致全面内战。

## 五、保守派与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7年5-7月

### 保守派大联合的形成

当陈再道和钟汉华于4月28日回到武汉时，1城里正在形成两个大联合：一个是包括所有保守派组织的大联合，另一个是包括所有造反派团体的大联合。

二月逆流使保守派在过去三个月里重新获得力量，建立了很多新组织，并快速扩展实力。红武兵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1967年1月中旬成立时，它只有几百个成员。而到4月20日为止，它的成员已经达到24万人，成为武汉最大的群众组织之一。比其快速扩张更加引人注目的是3它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红武兵以过去存在的官方民兵为基础，像一个准军事组织，其领导人多为以前的民兵指挥员，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年间已经建立了广泛的机构和人员关系网。所以，红武兵远远地胜过组织散漫的造反派团体。

联合会和老红卫兵瓦解后，成员分散在几十个新组织以及一些相对温和的造反派团体之中。到了1967年4月，他们退出造反派组织，重新加入到保守派队伍中去。

保守派联盟的联络中心于5月16日创立。因为联盟所包含的五十三个组织的成员总数据说超过了一百万人，所以就在这个包括众多组织的联合体称为百万雄师。起初，百万雄师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参与其中的各个组织依然相当独立自主。6月3日，53个参与组织同意建立彻底统一的组织。与此相适应，总部代替了联络中心。

大家认真地选择总部领导人，他们首先排除了能力不强的候选人。相当一部分新领导人是党的基层干部而非普通工人。其次，他们仔细考察候选人的政治背景。总部的核心是常委会。在常委会之下，有一个处理日常事务的办公室，还设有七个部，分别负责内部安全、联络、后勤保障、宣传、组织工作、战略规划和行动协调(作战)。

参与组织的联合力量现在接受总部指派的工作任务。为了有效地管理百万成员，总部在十个行政区(包括郊区)里建立了次级指挥部，并任命了每个次级指挥部的领导人。次级指挥部的内部结构仿照总部，所以总部的每个部门都可以轻易地找到下级同类部门，并让它们执行自己的命令。

### 造反派大联合的形成

经过2、3月份的打击后，大多数造反派仍然心有余悸。虽然在4月里有了工总复活的初步迹象，但只有少数从前的造反派敢于加入重新建立起来的分支组织。在大多数单位里3直到5月末、6月初，工总的分支组织才正式再次宣布它们的存在，而在某些单位里的工总分支机构直到7月底的武汉事件时才这样做。所谓的第八司令部于5月在武汉出现，八司并不是一个组织，相反，这个词是指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热情支持造反事业的个人，八司主要由工总以前的成员组成。

保守分子分裂出去后，工造总司就没法恢复实力。在一些大企业里，造反派建立了新的独立组织，其中最有力的有长江流域办公室的长办联司、中原机械厂的新中原、武昌造船厂的新武船。甚至在造反派势力比较弱的政府部门，一些造反派的同情者也首次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如机关红司以及公安联司。此外，一些心怀不满的高级干部也成立了

“革干联”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造反派。

尽管非正式的联络管道早已开遍，但各种造反组织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松散。而面对日益强大的保守派势力，造反派开始以实际行动来建立自己的大联合。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解除监禁，释放夏帮银。夏作为工总在汉阳车 L 钢厂分支组织的领导人，是 3 月 17 日被捕的 485 人之一。与工总其它很多领导人不同的是，夏的历史非常清白，他出身于城市贫民家庭，是个党员，而且在文化大革命前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4 月 22 日，三新和二司在武汉公安局汉阳分局门前组织静坐示威，因为他们认为夏就被关押在此。很快，全市成千上万造反派加入到静坐队伍中去，以支持这种革命行动。军队于 5 月 14 日将夏释放。

5 月 10 日，公安学校的造反派学生与武汉公安局江汉分局的保守派民警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受伤者。学生们坚持要公安局军管会为此事件负责，并要求军管会惩罚其凶手。5 月 13 日，造反派学生在公安局门口绝食示威，以迫使军管会答应他们的要求。几天之内，武汉军区就发现，在全市几乎每一个区里，特别是在闹市区里以及在权力机关所在地外，包括自己的司令部大院外，人们都在举行绝食示威。

在这两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造反派之间的联系。5 月 6 日，六大学生组织联合成立了武汉革命造反学生总司令部。两天后，15 个工人组织建立了与之类似的武汉革命造反工人总司令部。最后，6 月 1 日武汉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正式成立，希望成为武汉所有造反力量的最高指挥中心。

然而，那些庞大组织实际上对其所统辖团体并没有真正的权力，都是空架子，它们至多是一些半正规的联络系统，藉此来协调造反派各团体的策略和行动。

### 导致保守派和造反派发生意见分歧的问题

在 1967 年 4 月至 7 月期间，有两个主要问题使武汉保守派和造反派发生分歧。一个问题是，工总之案应当不应当予以平反，另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武汉军区支左的功过。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当然，武汉军区本身坚持，它关于解散工总的决定是正确的。由于 4 月 19 日中央文革小组采取了反对恢复工总的鲜明立场，所以陈再道和钟汉华认为北京对青海、安徽、四川、内蒙古和福建军队的批评不适用于武汉。6 月 4 日，武汉军区发布一个声明，重申其一贯立场：工总不能翻案。

军队在工总问题上的立场越强硬，保守派对它就越尊重。他们确信工总主要由三类人组成：出身不好的人、坏分子和机会主义野心家。为防止这种组织得到平反，他们支持武汉军区，宣布自己是拥军派。

所有造反派组织都在推动武汉军区为工总的案子平反，但它们的目却各不相同。以前的香花派要求将这个被解散了的组织彻底恢复。显然只有恢复了工总，这派组织自己的名誉也才能得到恢复。然而，彻底恢复工总并不符合前毒草派的利益。工总之案所以有用，就在于它可以使所有的造反派联合起来。但是，前毒草派无意让强大的对手重新出现。所以，当香花派赞美工总是革命组织时，毒草派仅仅愿意否定它是一个反革命组织。换句话说，有必要为这个组织去掉反革命的称号，而没必要恢复这个组织。香花派要求释放所有被捕的人，而毒草派只要求释放那些经过逐个调查证明无辜的被捕者。

造反派与军队和保守派之间的对抗，暂时掩盖了造反派阵营内部的分歧。不管造反派之间的立场是多么的不一致，但在军队和保守派的强大抵抗面前，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共同对敌。由于他们攻击的是地方军队，所以他们被视为反军派。

### 无政府与暴力

保守派与造反派在工总和军队问题上的观点具有巨大差异，使它们之间的紧张逐渐加剧。4 月 29 日，一个小型纺织厂的保守派与造反派在一场争执中发生武斗。这一事件标志着武汉大规模暴力冲突的开始。

5 月底出现了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初步迹象。5 月 21 日，百万雄师在城市各处进行示威游行时。八司对游行队伍进行扰乱，于是发生双方互相混战。这是两派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全市性武斗事件，并引发了随后数天暴力冲突的浪潮。5 月 27 日，在第二十中学发生的冲突中导致二司方面有一人死亡，并且是武汉派性斗争导致死亡的第一例。这个十七岁死者的同伴们在全市抬尸游行，以争取人们的同情和支持。造反派被激怒，并扬言要为烈士报仇。形势于是变得更加紧张，大规模的武斗一触即发。

为准备最坏的情况出现，双方都开始加紧调兵遣将。造反派已经在汉口繁华地段占据了许多公共建筑和学校。他们现在调动更多的力量进驻这些据点，以控制重要的交通线。保守派过去没有着意建立任何据点，现在意识到武装自身的重要性。6 月 3 日，百万雄师进行重组，加强了保守派的战斗力。第二天，百万雄师就占领了武汉市委大楼，并将指挥部设在这里。不久后，百万雄师完全控制了江岸、福口、汉阳三个区的大多数工厂，把这些工厂里的造反派赶到他们在市中心的据点。同时，还成立了不少突击队。这些突击队仿照军队一样组织，每一队由二三十个青年人组成，其中很多曾经在部队当过兵。27

6 月 6 日，北京向各省发出命令：严禁在派性争执中动用武力。6 月 8 日，保守派在市中心游行，声称要促进学校复课并宣传禁止武斗的重要性。而在这些冠冕堂皇的号召背后却计划教训造反派一下。它是这样设想的：当避行队伍经过闹市时，造反派就会捣乱接下来就以其捣乱为由来冲击造反派。事实上，在行动开始前，百万雄师就已经在市中心周围设下埋伏。他们计划当造反派露面时进行伏击。造反派如期落入圈套，精心组织的保守派没费多少功夫就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这一惨败使造反派大为震动。在接下来的数天里，他们加紧修筑堡垒，准备武器。有些人甚至要装备爆炸用品。经过这些准备，造反派又恢复了信心。他们头戴安全帽，身负自制武器，在全市举行武装示威游行，以显示自己的力量。

百万雄师的策略是稳扎稳打。6月9日，百万雄师占领了居仁门中学，三天后突袭了武汉汽车配件厂。这两个单位是造反派在稿口区的最后据点。接下来，他们又集中力量要把所有造反派从汉口赶出去。6月17日，百万雄师发动了解放汉口繁华地区的总攻。成千上万身背长矛大刀的队伍投入战斗。他们不仅数量上占优势，而且组织性也很强。这一战斗的指挥官自豪地说：“我们的人装备很好。在6月12日的战斗中，我们发现造反派手持长矛，于是我们就决定也用长矛来保护自己。由于大多数工厂都掌握在我们手裏，所以我们制造这些东西很容易。几天之内，我们就装备上比造反派要好的武器。我们的人也有高度的机动能力。武汉的六个汽车运输公司和五个公共交通公司都掌握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可以随意调用它们。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自己控制的其它单位调用卡车。不管什么时候进行战斗，总部头头只需要几个电话，就可以调集足够的队伍和车辆。每一次战斗之后，我们都可以弄到大量好的食品来慰劳参战者。正因为有这么一个高效的组织，所以我们在6、7月间与造反派的历次战斗中没有死掉一个人。”

而造反派则处于混乱的被动挨打状态之中。6月17日的战斗极为激烈，从当天中午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造反派称他们有将近100人死亡，约千人受伤。而百万雄师否认这一指控，只承认他们打死了一个人。不容置疑的是至少有12人在这一事件中死亡。

6月23日，百万雄师开始进攻所谓的“敌占区”——武昌。第一个目标是两个造反派堡垒：险峰大楼和第四铁路设计院。这两个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后确定的。前者坐落在从汉口和汉阳进入武昌的唯一入口处，后者处于控制武昌和青山之间战略信道的关键位置上。百万雄师企图通过占领这两个关键地点，以便于调动兵力，为攻克武昌创造条件。

就在围攻这两个堡垒之际，武汉水利学院的造反派偶然捉住百万雄师的七名分支头头。他们以这几人为人质，要求百万雄师立即撤围。保守派予以拒绝。相反，在占领险峰大楼和第四铁路设计院后，百万雄师又攻占了水利学院。

6月24日，百万雄师敲响了武汉造反派的丧钟。在汉口，它对工造总司发动猛攻。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二十五人。工造总司的陷落，使造反派惊恐万分。第二天，他们放弃了在汉口的所有据点和武昌的很多据点。一些人退到造反派仍然控制的武昌的学院里；另外一些人退出组织；还有一些人离开武汉，以避免再次遭难。

6月26日，中央文革小组和解放军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共同向武汉军区发出电报。电报全文如下：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危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6月27日，百万雄师将驻扎在武汉市委大楼里的总部搬到一个军需工厂，并解散了作战部。

6月26日的电报使造反派免于灭亡。从6月27日至7月15日，这个城市变得相对平静，没有严重冲突的消息。抖保守派和造反派都在等待即将进行的北京会谈。

在为中央领导准备的一个报告里，武汉军区指责造反派向解放军挑衅。在1月6日至6月30日之间，据估计有342名战士受到攻击，其中有226人受伤，38人受重伤。武汉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由造反派挑起的。它还把造反组织描绘成牛鬼蛇神的大杂烩。它还新华工是由一伙教师操纵的，而这些教师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家庭。

武汉军区断言，武汉绝大多数居民同情百万雄师，百万雄师的成员政治背景纯洁。据估计，全市85%的党员参加了这个组织。尽管6月8日以后的事件很残酷，但军区认为这些战斗对于恢复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武汉军区认为，造反派应对大多数暴力负责。

造反派对暴力行动的解释与武汉军区的说法大相径庭。据造反派统计，从4月29日至6月26日期间，共发生174起暴力冲突。这些事件涉及70,000人；有158人死亡，1,060人受重伤。他们指责保守派挑起了这些冲突。“而三司报告说，在上述时期内，共发生107起暴力事件，只有6起由百万雄师挑起。约说到谁开的第一枪，三司的说法可能更接近事实真相。无组织无纪律的造反派，特别是所谓八司战士要比组织严密的保守派更加好战。甚至造反派自身也承认，八司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但没有什么真正的战斗力。然而，说到大多数伤亡是由哪一方造成的问题时，造反派的说法也许是合乎情理的。

## 武汉事件

7月11日，周恩来通知陈再道说，武汉谈判就在武汉进行。

7月13日，毛泽东到达武汉。他的随行人员有周恩来、谢富治(公安部长)和王力(中央文革小组要人之一)，只让后二人在公开场合露面。

大约在7月13日午夜时分，谢和王身穿便衣到造反派的一个据点湖北大学去收集情况。但是，他们被学生们认了出来，于是北京派代表团来到武汉的消息马上在造反派组织中传阅。第二天，造反派举行了盛大游行示威表示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而保守派则不知所措。他们不理解，为何没人通知中央代表团到达的消息。这正是造反派希望达到的效果，也就是要制造一种表示他们与北京有特殊关系的象征，来压一压保守派。造反派故意在百万雄师控制的地区游行，向后者示威。他们高喊：取缔百匪！H 百万雄师则用高音喇叭高呼：打倒黑工总，镇压反革命！H 踏平三新二司！对骂很快引发了一场冲突。而百万雄师对突然袭击早有准备，其高度灵活机动的突击队对任何攻击随时待命，所以造反派又被彻底打败。结果10人丧命，37人受重伤，80人受轻伤。

7月15、16日，毛泽东两次召见周、谢、王讨论如何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应该给工总平反，释放被捕的造反派领袖；第二，应当允许百万雄师存在，即使它是一个保守组织；第三，应当停止对造反派的歧视。从7月15日至18日，周、谢、王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武汉军队高级干部会议，三位中央领导人迫使陈再道承认武汉军区在前几个月犯了错误，陈拒绝接受。

7月17日晚，谢和王访问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王指责百万雄师的领导人组织武斗，并强烈要求百万雄师交出武器、撤出据点。百万雄师的领导人回答说，如果造反派也在同时放下武器的话，那么他们的组织就愿意放下武器。王接着



批评他们说：“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别人嘛！”他的严厉指责激怒了百万雄师的领导人，他们反驳说：“叫我们单方面回去，就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这次会见不欢而散。

离开百万雄师总部以后，谢和王又去了武汉测绘学院，即二司总部所在地。他们对造反派说，毛主席最近说，不当抛弃大型群众组织，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抛弃。

7月18日，周恩来对参加会议的军队干部宣布了北京的决定：(1)武汉军区在过去几个月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陈再道和钟汉华应当做自我批评；解散工总是错误的；要为工总平反，释放所有在押的造反派领袖。(2)二司、三新、九一三兵团和工总是真正的革命组织，它们应当形成将来大联合的核心。(3)不当取缔或解散任何群众组织，包括保守组织。(4)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恢复后，其成员可能会报复百万雄师的人；应当努力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做。(5)三司是一个有保守倾向的组织。(6)武汉军区应当劝告农民不要进城帮助保守派打造反派。(7)武汉军区应当鼓励其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8)所有群众组织都要加强整顿，改变自己对解放军的看法。

陈再道和钟汉华仍然不服。周恩来不得已只好带他们去见毛泽东。到了此时，陈和钟才意识到，正是毛泽东在幕后作出了所有的决定。陈也许敢于同谢、王甚至周对着干，但他不敢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所以，陈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做公开的自我批评。

武汉驻军8201部队有一大批干部战士在各个工业、交通、商业和政府单位担任军代表。在百万雄师成立后，8201部队与这个保守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关系。7月18日晚，8201部队师长和政委向官兵传达了周恩来的讲话，并随即被传播到保守派那里。

7月19日凌晨，谢和王在武汉水电工程学院向一些造反派公布了毛泽东的决定。那些造反派得到好消息后根本沉不住气，他们开动了手中掌握的一切宣传机器。造反派在宣传时故意强调毛泽东做出的四条决定，而不提其余各条。那四条是：武汉军区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必须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真正的左派；百万雄师是一个保守组织。

7月19日早晨，陈再道和钟汉华起草了他们的自我批评。下午，武汉军区召开了军队干部会议，谢富治和王力应邀与会，以帮助那些干部清理他们的糊涂思想。王力借机向思想简单的军队干部大谈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他从下午4点一直讲到晚上11点。

正式将百万雄师定为保守派的消息激怒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如果想避免其它省份保守派那样的悲惨结局，百万雄师就必须做出不寻常的事，以便向北京表明，它的群众基础非常深厚，人民对王力在武汉的独断专行是多么强烈的不满。

7月19日，全市陷入一片狂潮之中。8201和8199两支部队的士兵点燃了抗争的烈火。傍晚时分，大约60名士兵聚集在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门口，要求王力解释提出四点指示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但是，中央的钦差大臣与武汉军区领导对他们的请求不予理睬。于是他们决定寻求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对王施加更大的压力。晚上八点左右，几十名官兵出去联络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由武汉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职工构成的保守组织)。四小时后，几百辆满载愤怒的保守派和公安干警的大卡车和消防车冲到武汉军区司令部，要寻找谢和王。而谢和王已经离开这里，去他们下榻的东湖宾馆。

武汉军区领导人立即向王汇报了军区大院发生的事情，建议他见一见这些保守派代表，以免事态失控。但王认为事情并不那么严重。当晚，他和谢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缓和紧张的形势。

20日拂晓，约二百名保守派进入东湖宾馆，遇到谢富治和陈再道。由于谢与王不同，是个老干部，并且极少公开批评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所以他同保守派间的谈判进行得相当顺利。他们同意，谢和王力将会见保守派团体，而保守派将撤出宾馆。但当王力从房间走出来时，正好遇到又有好几百人(其中大多数是8201部队和8199部队的士兵)冲进宾馆，局面再次失控。这群人把王力拖到武汉军区大院，那里有几千名百万雄师的人在等待。

就在武昌局势失控之际，振奋人心的新闻开始在全市流传，其中有：毛主席的四大天才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的1月风暴；四、百万雄师。毛主席对百万雄师的批示：大、好、纯，要爱护它。中央军委的电报(7月20日凌晨4点收到)：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益，中央不知道；二、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谣言迅速鼓舞了保守派的士气。

数十万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和大刀的保守派成员，或乘车、或步行，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据估计，示威所征用的卡车在1,000—1,500辆之间。许多8201和8199部队战士身背步枪加入了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示威大军之中。在那天发出的一份十万火急呼吁书中，8201部队的官兵宣布：“黑工总是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要踏平工总，为民除害。百万雄师是真正的、不折不扣的、浩浩荡荡的、硬邦邦的、响当啥的革命左派组织。”

应毛泽东的要求，武汉军区领导人设法营救出王力，并把他安排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在林彪的劝告下，毛泽东于7月21日清晨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在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周恩来飞回武汉。

7月21日，保守派继续进行示威游行，全市仍然动荡不安。百万雄师游行所到之处，造反派迅速逃走。游行遇到抵挡时，百万雄师辄将其一举粉碎。几十个造反派的据点被拔除。到7月23日为止，全市只剩下四五所大专院校仍被造反派控制。百万雄师受到胜利的鼓舞，开始考虑夺取省市大权。

在保守派欢呼他们在武汉的胜利之时，北京却得出这样结论：武汉正在发生一场反革命叛乱。7月23日，中央广播电台反复播送谢富治和王力安全返回北京的消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北京当局公开指责百万雄师、支持武汉造反

派的消息就越来越明确。全国各地成千上万封声讨电报涌入百万雄师总部。

7月27日，百万雄师最终被解散了。工总的领导人得到释放，并像凯旋归来的将军那样受到欢迎。7月31日，北京任命了武汉军区新的领导人。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武汉空军原副司令员刘丰为武汉军区政委。

造反派赢得了城市，但并没有赢得前保守派的心。虽然保守派组织瓦解了，但保守派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并没有消失。

## 六、造反派之间的衝突，1967年8-12月 天下大乱

由于武汉军区军事领导人和百万雄师的支持者都无意对抗中央领导，所以武汉事件很快得到控制。但是，武汉事件却触发了一场全国性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运动。

在与军内一小撮斗争的过程中，造反派意识到需要把自己武装起来。在全国许多地方，首次出现了武斗的群众组织抢夺解放军武器的事件。军委颁布了十条不许使用武力对付民众的限制，令军队因此无法抵抗。在7月底8月初，几乎所有群众组织都企图武装自身。全国范围内，有数千座部队仓库和军营遭到攻击。群众自发的军事化现象惊动了北京，为维持最低程度的公共秩序而采取了双重方针。一方面，奉劝群众不要抢夺部队的武器；另一方面，又答应有序地向左派发放枪支。在武汉，武汉军区新领导于8月中旬开始安排向造反派发放武器。

同其它很多城市相比，8月的武汉还是相对平静的。两方面原因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第一，武汉军区领导层刚经过全盘改组，曾经压制造反派的地方部队也换成了其它部队。第二，造反派近期为同强大的保守派斗争被迫形成了统一战线。而中国的其它地方仍然处于大动乱之中。在几乎所有省份里，都传出装备有重型武器的两派发生武斗的消息。甚至在北京也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暴力活动浪潮。

8月底，北京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来恢复秩序，比如强烈批评造反派在7月底和8月的大方向，终止武装左派计划，并对造反派的行为做出各种限制。更重要的是，命令造反派把武器还给军队。

9月初，武汉造反派开始向军队归还武器。但在多数情况下，造反派还给军队的只是不易隐藏的陈旧的重型武器。

### 不思悔改的保守派

武汉事件后，在政治形势非常不利的环境下，保守派成员主要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个人逃逸，武汉事件后，相当一部分保守派逃到家乡或其它安全的地方。因此造反派发出数千份通缉令，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30名头头是主要的通缉对象。经过大力搜查，他们于8月中旬落入法网，其中多数在监狱里一直被关到1972年3月。

第二种是成为逍遥派。虽然那些从前的保守派不再有自己的组织，但他们仍然公开或秘密地联合起来，互相交换信息和意见。

第三种选择是改换门庭。大批保守派特意参加了造反组织，为的是继续与他们单位里的造反派作斗争。例如，许多保守派加入了九一三兵团。在许多情况下，前保守派会选择加入本单位最弱的造反团体，以图改变那些团体的成分甚至领导层。例如，在一个医院里有两个造反组织：一个附属于工总，主要由临时工组成，另一个附属于红色造反司令部，主要由医务工作者组成。武汉事件后，这两个组织都试图通过吸收前保守派分子来扩充自己的力量。大多数保守派最终加入了工总，后来工总的这个分支尽管领导人没变，但却受到以前保守派的控制。在保守派组织瓦解之后，这种类型的重新组合在很多单位发生。

### 桀骜不驯的造反派

武汉事件后，造反派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害他们单位里的前保守派。从7月末至8月间，每个单位都召开批斗会，给成千上万人戴上高帽游街。这种情形与破四旧期间很相像，只是人们的角色被颠倒过来。以前运动的许多受害者，现在是好战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可以随意惩罚一年前虐待过自己的人。他们惩罚的不仅是百万雄师总部的头头，还有它的分支头头，甚至普通群众。

报复高潮持续了大约两个月。当公共秩序于9月中旬逐渐恢复时，造反派的过分行为开始收敛。

### 权力分配的政治斗争

武汉事件后不久，掌握从省到基层权力的前景，再次按香花派和毒草派（现在分别被称为钢派和新派）的旧阵线将武汉造反派分裂开来。

起初，钢派声称，只有7月27日北京《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点名的七个组织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和三司革联（从三司分化出来的一个激进派别）才有资格参与省市级大联合的组建。其它组织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自行解散，然后加入到这七个组织之一中去。然而，它没有得到这个单子里所包括的三个新派组织的支持。工造总司作为武汉第二大工人造反组织和新派的支柱，更是被这个提议所激怒。8月8日，当一些中央领导人会见武汉主要造反组织负责人时，新派的代表对这个计划表示强烈反感。中央领导人为了安抚新派，就宣布所有现存造反组织都有在大联合的形成中发挥作用的权利。

钢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次它提议，大联合需要一个核心领导，工总就应当是那个核心。事情很快就更清楚了，钢派通过提倡核心理论，希望吞并整个新派。首先，它建议，所有的其它工人组织者应自行解散，其成员加入工总。第二，钢派提倡以武汉道路形成大联合，不仅所有工人组织要合并到工总里面，而且所有的学生组织也应当并入工总中去。（在北京，学生运动超过了工人运动；而在上海，工人运动胜过学生运动。）第三，工总要求成为省市级大联合的核心，而它的分支不顾自己在具体单位里的相对力量状况，在基层也提出类似的要求。

新派反对钢派的计划，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大联合组成模式，即革司联司道路。按照这一模式，每个单位的各种

群众组织首先应当合并，然后再成立一个没有预先规定核心的联合司令部。省市级的大联合应当以成千上万这样的联司为基础，而不是以几个大型全市性组织为基础。这是一个经过精打细算的方案。如上所述，钢派集中于几个大型企业里，而新派的力量却分散于数量巨大的中小企业中。

8月17日，新派的五十七个组织宣布它们正在合并为一个大联盟，即新武汉。新派希望这种合并会极大地增强自己在同钢派的权力斗争中的讨价还价地位。

到了8月底，事情已经很清楚，即钢派和新派在权力分配问题上都不会妥协。为了取得更好的讨价还价地位，双方就加速扩张各自的势力。两大派别看来都不关心其新成员的忠诚，它们所关心的是只是其组织的规模。它们故意夸大在册成员的人数，工总声称它有60、70万成员，九一三兵团说它有10至20万成员，而工造总司说它有36万成员。（工造总司的前负责人后来承认，当时其组织顶多有6、7万人。）

9月初，两大派间的紧张关系更加严重。9月4日，钢派势力联合成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总司令部，这是针对新武汉的对抗行动。幸运的是，北京于9月中旬加紧推动各省的大联合，暂时抵制了派别对抗的发展。

周恩来于10月8日陪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武汉。周恩来一到达就获悉，来欢迎的造反派在机场刚打了一仗，双方均有伤亡。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周每天都会见造反派负责人，迫使他们尽快完成大联合。他对造反派头头们说，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必须在1968年2月之前完成在所有29个省市建立新政府（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武汉不应该成为例外。他还说造反派领导人不会成为未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不管他们过去担当过多么显要的角色，这些职位要留给军队或地方的老干部。他进而宣布，工人的大联合应当采取工人代表大会（工代会）的形式，学生应当采取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的形式，而且在准备过程中不应当排除任何群众组织。

表面上，所有组织都热烈拥护周的讲话。但在背地里，派别斗争依旧激烈。唯一的区别是，战场从街头转移到会议室里。

10月13日，开始商谈在市一级建立工代会和红代会。工代会和红代会商谈的两个关键问题是，哪个组织应当在这两个代表大会中取得领导席位，有多少席位，以及哪个组织的负责人应当担任最高职位。

成立工代会方面，在筹备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就出现了僵局。工总和九一三兵团坚持，筹备委员会只应当包括它们两个组织，再加上工造总司，这三个组织应分别给予七个、五个与三个席位。工造总司断然拒绝了 this 提议，它提出两个建议响应钢派。第一，在筹委会中三大组织应当拥有平等的代表席位。第二，筹委会还应当包括其它工人组织的代表。经过10月13日至15日的激烈争吵，工总和九一三兵团最终接受了第一个要求：三大组织各派三个商谈代表参与筹备工作。但他们断然拒绝考虑让其它组织的代表参与筹备工作。谈判因而出现相持不下的局面。直到10月20日，商谈仍然没有实质性进展。

此时，武汉军区和武汉警备区进行了干预。10月24日工造总司发出声明：经过武汉军区领导的教育，它表示同意工代会筹委会只包括三大工人组织的代表。

10月25日，工代会筹委会正式成立。10月29日，当它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如何办的问题时，一大群人出乎意料地闯进会议室。他们代表着被排除在外的组织，来此要求派代表参与筹委会。主持会议的工总负责人朱鸿霞遭到殴打。由于注意到工造总司的负责人没有到会，钢派就断定这一事件是由新派蓄意挑起的。作为报复，他们立即派人捣毁新派一百五十五个据点，打伤数百人。两派间的谈判再次破裂，已经取得的一切都前功尽弃。

成立红代会方面，周恩来通过指定六个主要学生团体作为成员，使得红代会的筹备委员会于10月14日宣告成立。但它的筹备工作却遇到麻烦。它的麻烦是在如何选出未来红代会领导人问题上，二司与其它五个组织发生分歧。二司建议，要用三个步骤选出领导人。第一步，各校不同的造反组织应当形成大联合；然后，各校派代表参加红代会；最后，由各校代表选出红代会领导人。创造一计划正是新派工人组织所说的革司联司道路。当然，筹委会中的新派成员组织并不想失去其在筹委会中的优势地位。他们坚持主张：筹委会的成员也应是未来红代会的领导层的成员。双方无法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

在武汉建立工代会和红代会的谈判破裂后，钢派与新派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大。例如，钢派指责新派是二八声明发表后陈再道打倒香花派的帮凶，而新派则讥笑钢派在工总3月被取缔时卑躬屈膝地向陈再道请求宽恕。为准备最坏的情况出现，他们开始组织自己的半专业性的武装力量，工总设立了“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团建立了“敢死队”；而工造总司成立了“铁军”。

## **七、造反派之间的冲突，1968年 革委会成立**

1967年9月，毛泽东要求全国二十九个省市都应在1968年春节之前建立革命委员会。但到1967年12月初为止，只有九个省成立了新的权力机关。在依靠群众组织自主性难以实现大联合的情况下，中央决定从上面强制性地向下实施，开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试图加速大联合的形成和革委会的成立。

到了1967年11月，北京显然想要革命委员会变成这样的机构：即军队代表担当监护人的角色，造反派代表起监督的作用，而日常决策权力则主要由干部代表掌握。某一派在革委会中的势力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革委会里有多少它所满意的干部。省级的形势有利于“钢派”。武汉市级两派势均力敌。两派在省级、武汉市级革委会候选人提名上差异很大，总共被提名的63个候选人中，仅有9个是两派都提名的。矛盾双方各自发出大量宣传品，美化自己提名的候选人而贬低对方提名的候选人。

由于“钢派”和“新派”矛盾太大而无法达成协议，武汉军区在几天内直接提出了省、市革委会的最后候选人名单，而且获得了北京的批准。1月20日，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成立；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分别由武汉警备区司令和政委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和第一副主任则由武汉军区司令和政委分别

担任。这两个革委会的其他职位则在两派间均衡地分配。军队在安排省级革委会职位时偏向于“新派”，就基本上实现了两派在省级、市级革委会中人数旗鼓相当。

由于武汉军区占有主导地位，在1968年2月和3月初，派性斗争不得不采取隐蔽的形式，群众组织普遍处于死气沉沉的状态之中。此时北京发动的反对极左思潮运动还在进行。

### 反右倾

3月底，毛泽东认为反对极左思潮运动走得太远，把文化大革命引到了右的方向，中央突然终止了反对极左思潮运动，开始反右倾。

为了激励其成员行动起来，两个造反派别都竭力地鼓吹“百万雄师”正准备复辟。在大多单位里，只有少数死心塌地的造反派响应其头头的号召；而在有些单位里，根本没有人参加新的运动。

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两个对立的派别只得依赖特种力量。其中最强的有工总的“江城前哨”、九·一三兵团的“敢死队”、工造总司的“铁军”。

4月，“钢派”与“新派”之间的争斗重新爆发，两派都坚持认为武汉“必须重新分配权力”。“钢派”指责“新派”造反派为“老右倾机会主义者”，“新派”则咒骂“钢派”团体为“由一批流氓阿飞组成的右倾分裂主义组织”。到了4月底，两派间关系十分紧张，导致工代会和红代会瓦解。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的存在也处于危险边缘。

与此同时，两派又开始收集武器（据林彪讲，就抢劫军火仓库而言，武汉在全国城市中数第一）。5月初到6月上旬，两派发生了数起武斗事件，互有死伤。

### 制止派性武斗、恢复秩序

5月28日，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向武汉两派发来一封电报：“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两派公开表示，愿意全心全意地贯彻北京的指示，但他们归还的只是破损和陈旧的一小部分武器。武汉市形势不断恶化。

北京号召进行反右倾运动所重新引发的武斗决不只是在武汉发生，其它很多省在1968年4月至7月间都变成了战场。

此时，中央只好选择叫停反右倾运动，转而恢复公共秩序，于7月3日发出了一个严厉的布告，要求广西停止武斗，7月24日发布告要求陕西停止武斗。

有了中央的态度，曾思玉在7月13日由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指名批评湖北省革委会的三个副主任朱鸿霞、杨道远和张立国。7月22日晚，武汉部队对118家旅店和招待所进行了彻底搜查，寻找来自外省的武器交易者。随后，湖北省革委会又举行了大型群众集会，敦促造反派交出他们手中仍然保留的所有武器。

8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强烈反对所谓多中心论的社论。8月中旬，湖北省革委会召集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头头们普遍受到谴责。同时，武汉军区的主要军事领导人又被召到北京，得到了中央关于恢复秩序的明确指示。

回到武汉后，军队就着手完成三项任务。第一，派工宣队进驻所有学校。工宣队在学校任务，首先是解除造反派的武装，其次是解散造反派组织。但是，对造反派更毁灭性的打击是工宣队实际上切断了他们与其它学校和其它部门同伴的联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二，逐步解散群众组织。9月6日，在武汉各级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出席的一次会议上，曾思玉宣读了一个由湖北省革委会通过的关于“彻底解散一切群众组织”的决议。工总、工造总司、九·一三兵团以及其它小组织纷纷宣布解散。第三，“捅马蜂窝”。“马蜂窝”是指派性势力强大的单位，实际上，例如胡厚民、彭祖龙等很多造反派个人被当成“马蜂窝”，成为特殊“学习班”的对象，遭到严厉的批判、甚至关押。

10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武汉展开，运动中许多造反派遭到打压，而在文革前两年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开始得到“解放”。武汉军区把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进各个单位，军宣队到了哪里，就对这个单位进行全面的控制，而把革委会抛在一边。和工宣队一样，军宣队倾向于把以前的保守派当成运动的依靠对象，而运动对象首先就是其单位里的造反派头头和造反派骨干。

到1969年初，造反派已经丧失了他们在武汉从基层到省各级革委会中的多数权力。

1968年11月，湖北省革委会召开了一个为期21天的县以上革委会代表会议，批评任爱生（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和杨春亭（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无原则地”支持造反派，说他们是“黑手”和“老牌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较低层革委会中曾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也受到了猛烈批评。这次会议之后，造反派在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委会中的作用一落千丈，顶多只能维持个“三结合”的外观。有些造反派完全被这两个革委会清除出去。工代会和红代会也只在名义上存在。

## 八、1969-1973年间的派别斗争

### 1969年派性的再度复苏

1969年1月下旬和2月初，下乡学生过春节返回武汉。他们当中的死硬造反派很快就和工人造反派设立的秘密组织系统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在街上张贴大字报，这一行动鼓舞了其它部门造反派的士气。

4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是九大的口号。

在中央努力创造稳定局面的同时，一些被削弱的造反派准备再次造反夺权。武汉工代会于4月18日发布了一个声明，它对城里未经工代会批准而声势日益扩大的罢工表示支持，声明进一步指出，“基层工代会必须接受来自同级革委会和上级工代会的双重领导”。4、5月间，武汉造反派活跃起来，《武汉工人》（武汉市工代会的喉舌）在1月1日到4月23日的四个月内仅发行了八期，而在4月23日到5月25日的一个月里却发行了九期。其中4月23日刊载了一篇《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文章总结说，当时的形势是：“造反派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昨日的革命闯将，今日的罪魁祸首”。

首。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老地方。”

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分别是工总、九·一三兵团和工造总司的头头，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号召造反派“反复旧、反倒退、反复辟，彻底粉碎新老二月逆流”。联合声明印成大字报和传单在武汉张贴散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了造反派的总动员令。4月27日，当武汉工代会在汉口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时候，据报导有五十万人参加

红代会虽然有大多数常委已经离开了武汉其组织仍在4月30日召开了一个常委会扩大会议，并发表了一个会议纪要，题目是“反复辟、反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

5月7日，工代会和红代会共同举行集会以庆祝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四周年。同一天，工代会和红代会发表了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措词强硬的公开信。公开信中称，从1968年秋开始，两个权力机构中的“一些主要领导”已经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公开信彻底否定了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在前半年所做的一切。

公开信发布四天后，超过一百辆卡车的造反派冲击了省、市革委会的办公大楼。

造反派的反复旧斗争使武汉再次陷入混乱。但造反派已不再是一支仍在发展壮大力量，它正在走向衰落，因为此时的运动缺乏群众的普遍参与。

尽管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已经萎缩，但他们的成员却更加精干、更加执着、更具有战斗力。因此，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减少了，他们机动能力却提高了，在4月末和5月间，他们仍然能够在武汉兴风作浪。总共有736个造反派组织在城市中再度出现；而且，它们夺取了180个单位革委会的权力。造反派的行动在5月17日达到顶点，当天一个所谓的工人调查团强行进入武汉市革委会大楼。工代会组建了这个代表团，其任务是确定武汉市革委会搞了多少复旧。

然而，1969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批复并同意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指示宣布，反复旧斗争的大方向是错误的。造反派头头被迫在中央领导和地方军队领导面前做出自我批评，反复旧的短暂斗争以失败而告终。

### 镇压造反派

1969年6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日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已不再存在任何区别。这样就剥夺了造反派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当北京在1969年9月27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论坛》（通常被简写为“北决扬”，即每个名称的第一个字）的指示，它最终宣告了武汉造反派的末日。

一周后，湖北省革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与会者包括湖北省革委会与武汉市革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工代会和红代会成员，以及某些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大学的革委会成员。这次会议标志着为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造反派运动的开始。

再一周之后，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北京举办。来自武汉的大约六百个知名造反派被召来参加这个学习班。以武汉警备区政委张昭剑为首的党委领导学习班，他们挑动“钢派”和“新派”成员彼此揭发。正当那些知名的造反派在京受审的时候，他们在武汉的下级也被置于高压之下，武汉的每个单位都设立了项目组对单位的所有嫌疑人进行审查。仅仅一打三反运动就在城市中指控35461人有罪，其中一大批人都是前造反派。此外，33659人要么被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要么被划为“北决扬”成员，而他们都是造反派成员。

1970年6月初，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终于结束。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均被免去职务并被收监，任爱生被软禁。其它参加者被分成两类：那些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人立刻被转到由湖北省革委会在武汉开办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被分派到许多由下级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由湖北省革委会开办的学习班持续了大约一年，其它的学习班为期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直到1971年末，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才宣告结束。

### 旧权力关系的恢复

1969年末到1972年间的政治发展，从内容上改变了中国省级权力结构。大多数造反派从革委会的领导位置上被赶下去。有些造反派幸运的如前工总头头朱鸿霞、前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和新华工头头张立国，保住了位子，但他们丧失了实权。

造反派不仅被剥夺了权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受到歧视。例如，在1970年电信局招入了800个复员军人，同时将相同数目的造反派职工转调到了其它单位。1970年，工厂和军队开始在农村对知青招工、征兵，但对前造反派通常不予考虑。

在1971年初，新的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出现了。到1972年末，武汉大约95%的老党员干部已经得到“平反”，他们当中90%以上的人官复原职。同时期，军代表终于奉命从所有地方机关撤出，地方干部因此又恢复了他们失去已久的威信。

1972年3月，八位“百万雄狮”的领导人被释放出狱，陈再道和钟汉华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并且在别的省担任要职。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批评了曾思玉，说在他的领导下，武汉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错误地迫害了许多无辜者。因此，要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武汉所有关于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嫌疑人的案件进行复查。复查从1972年3月持续到1973年2月，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在33659名嫌疑人当中仅有177人被证实曾经加入过“北决扬”，也就是说，大约有95%的案子是毫无根据的。

## 九、1974-1976年间的派别斗争

### 1974年派性的兴衰

在林彪死后的第一年里，他被当作极左分子加以批判。但是1972年12月，毛泽东得出结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太过火了。因此，林彪罪行被重新定性为极右。于是各省开始接到指示，允许那些原先在当地革委会担任领导职务的



造反派复职，并且任命另外一些人到正在被重新组建的官方群众组织中任职，例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此外，最近被调到中央任职的上海著名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被派到一些省份视察，目的是会见当地的前造反派头头。

5月1日，朱鸿霞及其它一些前造反派头头被邀请参加了官方的劳动节庆祝活动，并把他们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的职务头衔介绍给公众。新成立的湖北省共青团委的六个书记当中，有两个是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

为了重整旗鼓，秘密的造反派系统计划在5月26日举行集会。结果计划外泄了，5月26日那天，街上部署了大约2,000名警察，集会的计划没有实现。虽然如此，但是造反派还是有所收获，武汉在5月31日成立工会委员会时，董明会被任命为工会主席，吴焱金成为六名副主席当中的一个。

湖北省工会委员会于6月28日成立。前造反派领导占据了十位副主席当中的四个席位：他们是董明会、夏帮银、朱鸿霞、平毅。湖北省妇联于7月11日成立，二司前领导人王彩珠被选中，成为九位副主席当中的一个。

总之，在1973年中期，地方当局迫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再次让武汉的一些前造反派头头担任了领导职位。但是，造反派在省市级所取得的胜利还没有蔓延到基层。

基层许多前造反派因为遭受不公正对待，成了湖北省委或武汉市委信访中心的常客。这其中有一个信息交流系统特别值得一提，它的领导者是聂年生、刘汉武、方保林、谢妙福和王华珍。1973年8月28日，几个造反派秘密系统的积极组织者被捕。同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闭幕。整个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口号：“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9月5日，一张题为《为什么我们要重新造反》的大字报出现在汉口街头。这些自诩的“反潮流战士”仍然占少数。当他们在9月中旬发动第一次游行时，只有大约一百人参加。在1973的最后三个月里，包括聂年生在内的更多造反者被逮捕。但是他们继续进行宣传和煽动，希望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支持。武汉每天都有大量的大字报出现。然而，尽管这些“反潮流战士”的影响日渐扩大，但由他们所发动的抵抗活动在1974年之前大部分仍处于秘密状态。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个原因促使政治气氛发生改变。第一，一个新的群众运动批林批孔运动于1973年秋在中国全面展开。1974年1月，中央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动员运动，敦促群众废除所有旧的规章制度。第二，武汉领导层大改组，张体学于1973年9月去世，同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杨得志取代曾思玉成为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则由来自北京的高级干部赵辛初所取代。

面对日益激进的环境，新上任的省领导在1974年新年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释放被捕的“反潮流战士”。

1月末，董明会在北京参加完一个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之后返回武汉。王洪文在会上（党的副主席）强调了两点。首先，王谴责了许多省对造反派的镇压行为。其次，王建议应该有更多的“年轻干部”即那些崭露头角的造反派成员，被提拔到更重要的职位上去。

就在前造反派领袖们决定转而支持“反潮流战士”们的时候，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命令他们停止对造反派的迫害。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迫使湖北省委对造反派作出了一些让步。在1974年春节长假期间，湖北省委邀请了许多造反派要人参加一个座谈会，并请他们就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看法。

此时，前造反派的目标是要改变在过去四年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权力关系。他们的最小目标是要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近年来所有加诸于他们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要全面否认双清运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对于前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在清查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分子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言，造反派的这些目标他们一个都不能接受。前造反派和前保守派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结果，在前造反派开始恢复力量不久之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前造反派自称是“革命群众”，前保守派则自称为“工农兵”。两派之间的冲突使武汉陷入新的混乱之中。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贴满再次出现的大字报，每天都有喧闹的群众集会，城市的公共秩序变得岌岌可危。

1974年2月中旬，“革命群众”组织了一次游行，并且在武汉市公安局办公楼前静坐示威，要求从监狱中释放胡厚民、李想玉、杨道远和任爱生。3月2日，胡厚民和李想玉获得释放。3月4日，湖北省委发布了“七条”，其中湖北省委第一次正式承认双清运动确实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罪魁祸首是刘丰。造反派认为，“七条”是“一株大毒草”，他们不同意让刘丰一人承担责任，而坚持所有那些曾经迫害过造反派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

在对造反派有利的政治大气候中，3月的前半月，当地政府对“革命群众”作出了更多的让步。政府在人事安排中，任命了更多的造反派担任政府官员。胡厚民、李想玉等曾经被罢免了的造反派官复原职。

3月16日，湖北省委修改了“七条”，而代之以“六条”，删掉的就是免除那些在双清运动中案件处理人的责任这一条款，进一步助长了造反派的气焰。

基层的主要问题也是权力。当时的一个流行口号是，“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在很多基层单位里，造反派新成立了“批林批孔办公室”，这些“办公室”几乎取代了党委的领导。

释放胡厚民和李想玉已经在前保守派当中引起极大的敌意和怨恨。“七条”、“六条”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在他们看来，双清运动没什么错误，他们觉得自己也应得到类似造反派的待遇。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省领导和“工农兵”进行了谈判，结果保守派除了得到严厉批评之外一无所获。3月19日，保守派绑架了省领导赵辛初和赵修。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宣布：“绑架赵辛初和赵修同志是错误的，不许为1967年7月武汉事件翻案。”

3月26日，革命群众袭击了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查抄了大量对造反派不利的黑材料，其中有一份关于省领导曾经计划将84个造反派头头判处死刑的名单。同时期，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被造反派控制，刊载了敌视省市政府的报导，并且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文章攻击“工农兵”。

在3月的最后几天里，省和市政府几乎各个部委都天天举行群众集会引但主导这些集会的是造反派的头头而不是这些机构的领导人。

4月5日，造反派绑架了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和五个法官，要求释放所有在押造反派，其中包括那些犯

有谋杀、纵火、抢劫、强奸和其它罪行的造反派。

到4月初为止，同样的动荡状态在浙江、河北、河南、江苏、四川、江西、广东、山西和山东等省普遍存在。

4月7日，湖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过去两周内，几乎造反派所做的和所支持的每一件事都遭到了批评。4月11日，中央十二号文件指出“批林批孔运动的贯彻执行在一些省影响了工业生产。”，并指示“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

“工农兵”和保守派群众热烈欢呼十二号文件，都松了口气。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张贴了无数的大字报表示拥护这个文件。4月中旬，为了尝试影响北京对武汉的决定，朱鸿霞、胡厚民和其它一些造反派头头离开武汉前往北京。但是，4月末，在中央和湖北的领导人讨论武汉未来的时候，并没有允许任何派别的代表参加。

5月24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人从首都返回武汉。中央作出了对造反派极为不利的决定：“1、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2、曾思玉与其他省级主要领导可能确实犯过某些小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好干部。3、可能有必要补充领导，但不能在牺牲老干部的前途下进行。而且，不能过于草率地处理这件事。4、所有非正式的群众组织必须立即解散。”

5月26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和政委王六生都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他们警告说，不应该把旧的怨恨带到目前的运动中。换句话说，不容许反对双清运动。

但是，那些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造反派们害怕一旦形势恢复正常，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使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了。6月中旬，狂热的气氛在武汉又开始形成，到了6月底，城市再次陷入混乱。繁华市区又建立了宣传站，宣传车重新出现在街头。对立派别又开始张贴大字报彼此进行攻击。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游行和集会。更糟的是，“革命群众”和“工农兵”开始诉诸暴力。例如，6月的最后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流血冲突事件。

国家计委于6月18日提交给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与1973年同期相比，二十九个省市中有十一个省在1974年前五个月的工业产值大幅度下降。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号召广大群众结束派性动乱，专心生产，遵守纪律。通知特别强调，凡是不遵循北京指示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

在北京发出通知的同一天，谢妙福带领三十多个造反派冲击了湖北省委办公大楼。袭击者当即被逮捕。

7月13日，“工农兵”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宣布该组织解散，集会的主席团包括几乎所有前“百万雄师”的市、区和部门各级头头。“革命群众”从未正式宣布其组织解散，因为它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没有统一的领导。不过，到了7月末，武汉的派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10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发布了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除了发生极少数的派性冲突事件以外，城市又恢复了正常秩序。被任命了官方职务的造反派要人们仍然保有他们的职位。但是，他们目前在决策过程中不仅没有实际的影响力，而且还必须想方设法保住至少是名义上的官衔。在1974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武汉的批林批孔也悄悄地划上了句号。

1974年的派别斗争与从前的派别斗争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了在1966-1969年动乱岁月里锻炼出来的动员和组织才能，1974年间派性斗士在政治技巧上普遍地更加成熟。但与从前相比，新派别斗争的群众基础大幅缩水、更加世俗化并且支离破碎。例如，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革命群众”充其量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环境比较有利时，这种形式可能会使他们显得很强大，但是当政治气候改变时，要想度过难关就没那么容易了。

### 1975年镇压派系斗争

1974年7月之后，虽然武汉的派性暴力冲突逐渐消失，但“革命群众”和“工农兵”行动派的街头队伍仍随时可见。

1月13日，一个自称“革造民兵”的组织在武汉成立，成员不超过一百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谢妙福的嫡系，后来据他们自己交待，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犯罪记录或者被处分过。2月13日，他们占领了位于一个交叉路口的中南旅馆，建成立宣传站，并把一个废弃卡车堵在旅馆前面的十字路口长达11天，结果汉口三分之一的主要道路堵塞。在交通阻塞的十一天里，省市府再三命令“革造民兵”清除路障，但他们却置若罔闻。

2月26日，北京下发了一道指示，命令湖北省委“严厉处置堵塞汉口重要交通枢纽的肇事者”。随后几天，几乎所有“革造民兵”的积极分子都被逮捕。这一事件之后，派别斗争在武汉销声匿迹了。6月，谢被判七年监禁，他的许多“革造民兵”同伙被判五年监禁到一年劳改不等。审判公开进行，市里每个单位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观看。

较之1969-1971年的同类运动，1975年的反派性运动在范围和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确实，一些造反派（例如谢妙福）被收监，另一些（如朱鸿霞）被调到其它地方；但运动没有对所有的造反派积极分子搞人人过关。

### 造反派最后的斗争

1975年11月，“四人帮”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到1976年2月，又演变成“批邓”运动。然而，所有的人都对运动只表示口头上的拥护，而不采取实际行动响应官方号召。大多数前造反派的普通成员现在都变得对政治毫不关心，四人帮惟一可以倚重的人，大多是前造反派头头。

由于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逝世，而毛泽东也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因此1976年北京激进的文革领导人和稳健派领导人间的权力斗争，通常被看成是最后的决战。如果中央的激进派领导人最终失败，那么武汉的前造反派头头也将最终被清出政治舞台。出于这些原因，尽管造反派的力量已严重萎缩，他们还是准备背水一战。

2月23日，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后，十七位在湖北省革委会或在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名人发表了一封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公开信。公开信批评了武汉从省到基层的各级党委，指责他们未能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称那些干部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并且号召将所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赶下台。

随后，造反派建立“核心小组”来领导武汉造反派，小组的七名成员夏帮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顾建棠

（原“长办联司”头目）、李想玉和吴焱金实际上都是武汉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

3月2日，江青和王洪文在北京会见了包括湖北省在内的12个省的军政领导人，江青在会上申斥了赵辛初和杨得志，指责他们对造反派施行暴政，赵和杨被责令回到武汉后向造反派道歉。

就在第二天，武汉市的造反派要人发表了另外一封公开信，催促省市两级政府调整领导班子。几天后，当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时，一群造反派在朱鸿霞和吴焱金的带领下对会议进行了两次干扰。正在参加会议的夏帮银则与干扰者里应外合。3月19日，同一伙人袭击了湖北省委办公厅和组织部，在场的几个干部受到了人身攻击。第二天，这批人强行占领了湖北省委的第一招待所并且发布了一个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省市两级政府不作出让步，就将制造更多的暴力事件。

用胡厚民的话说，胜败攸关的问题是权力。他宣称：“从政治上讲，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从组织上而盲，这个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现在必须解决组织问题。”总之，造反派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领导机构中获得更多的实际权力。

然而，尽管造反派极具攻击性，但力量并不太强大。1976年春，武汉顶多有几千名造反派仍在积极活动，许多前造反派积极分子现在都倾向于退出派别政治争夺。

4月初，一场群众运动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包括武汉的全国各地，并在北京天安门事件时达到顶峰。然而，群众运动的目标所指不是邓小平而是四人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本人。

4月8日，湖北省委勉强组织了一个群众集会来做出谴责天安门事件的姿态。集会结束前，一群造反派在朱鸿霞和吴焱金的带领下冲进会场，并绑架了几个省领导。北京第二天就谴责了他们的这一行为，造反派领导很快了解到，他们之所以被批评不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合理，而是因为他们行动方式与当前四人帮提倡的策略不协调。四人帮更愿意选择一个“内紧外松”的策略，因为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只要国家由于激进运动而陷入混乱，毛就会让稳健派领导人来收拾烂摊子。

1976年4月中旬，武汉的造反派开始运用这一策略。此后，街头行动大大减少。但是造反派暗中加强了他们对当地政府施加的压力，以期得到更多的权力。面对来自北京和武汉的双重压力，省市两级政府在5月末对造反派做出让步：胡厚民和其它四个造反派成为湖北省革委会或武汉市革委会的专职官员，成为脱产干部。

6月初，在一个湖北省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王洪文宣布，按照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所占的名额来看，湖北省在29个省当中排名最后。在王洪文亲自干预武汉事务的激励下，造反派认为，现在应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其做出更多妥协。造反派在省级和市级层面提出了四点要求：“1、湖北的所有中央委员（指夏帮银、董明会和谢望春）必须被任命为省委书记。2、另外一大批造反派必须被安置到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中去，或是担任书记，或是担任常委。3、省委和市委下属的组织部、宣传部和办公厅必须由造反派负责。4、省委和市委中的工作人员必须包括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分子。”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造反派对省市主要领导软硬兼施。在较低级层面，造反派的行为比他们在省市级的同伙更加激进。

但是，无论在哪个单位，造反派试图夺权的企图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抵制。占绝对多数的广大群众对造反派感到非常厌恶，不仅省市领导讨厌他们，基层干部也对他们极度不满。据说一个造反派哀叹道，“看来现在至少有80%的人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由于造反派失去了群众的普遍支持，他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不合作者进行威胁。这样做确实吓到了一些人，但是也使更多的人感到愤怒。6月中旬，保守派的力量再次集结起来，这次是打着“革命工人”的旗号，人员由1974-1975年的“工农兵”组织的同一批人构成。其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工人”对省市政府的批评一点都不比造反派少。造反派批评这两级政府一直不让造反派掌握权力，而“革命工人”则谴责他们对造反派谄媚拍马。“革命工人”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对他们的造反派对手作出更多的让步。他们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使得武汉的生产在夏天又陷入停顿。

“革命工人”在6月26日冲进了《长江日报》的办公大楼，并且要求武汉市委立刻对其编辑部进行改组。结果还是造反派在政治斗争中技高一筹，夏帮银通过电话向王洪文汇报了这个事件。北京干预了此事，“革命工人”的五名积极分子被拘留了十五天。

7月22日，为了庆祝1967年武汉事件九周年，《长江日报》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重印了造反派于1967年写作并流传的“抗暴诗篇”。这种煽动性的“抗暴诗篇”再次激起了保守派群众对《长江日报》和整个造反派的愤怒。不久，抗议该报纸派性倾向的大字报再次出现在全市。然而，《长江日报》却对群众的愤怒视若无睹。8月，它继续刊载了更多的由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所写的煽动性文章。

7月和8月间，湖北省委举行了两次会议。会议原本计划讨论工业生产问题，但夏帮银、董明会、朱鸿霞和其它造反派与会者不断提出权力再分配问题。他们抗议说，出席会议的造反派人数太少。

## 文革结束

然而，在国家动荡不定的氛围里，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不到一个月，四人帮被逮捕。一夜之间，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成千上万张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激动和不满，像愤怒的火山一样迸发出来。

11月初，朱鸿霞、夏帮银、胡厚民和其它造反派头头被勒令参加一个学习班。从12月起，作为全国批判“四人帮在各省帮派体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成了群众的批判对象。1977年末，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李湘玉、吴焱金及其它一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正式逮捕，并且被判处两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977年8月12日，华国锋宣布，“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8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推翻了关于1967年7月武汉事件的“不公正判决”。

## 第十一章 1976-1978 的转折年代

随着毛泽东的逝世，他所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场被毛泽东认为是其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之一的运动，在政治上被宣布为是“内乱”，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升上来的干部遭到清洗，文化大革命前的种种政策似乎又被重新拾起来。然而刚刚站稳脚跟的凡是派转眼就遭到了失败，老左派和实践派的联合体在 1978 年掌握了中国发展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正如马克思在《1848 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的那样，“革命的进展…是在产生一个敌对势力的过程中为自己开拓道路的，只是通过和这个敌对势力的斗争，主张变革的党才走向成熟，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党。”

### 一、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结束

狭义的文化大革命在 1969 年就以“九大”的胜利召开作为结束的标志，大会公报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宣布“九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在此之前，各地已经纷纷成立了革委会，以整合或者说清理了 1966 年以来出现的大量群众性组织。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全国性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群众性运动。然而，相当广泛含义上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延续到了 1976 年，一直延续到作为文化大革命发起者和领导象征的毛泽东的肉体消逝。这种政治上的结束，通常是以 1976 年王、张、江、姚及其追随者的被捕和下台作为标志的：

9 月 11 日，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华国锋对李先念表示说，“四人帮”问题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同日，华国锋找汪东兴商量此事，得到汪东兴的支持；

9 月 13 日，李先念向叶剑英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指出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叶剑英表示同意；

9 月 16 日，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纪登奎和陈永贵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华国锋讲了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9 月 26 日，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在国务院小礼堂讨论解决方案，决定采用隔离审查而不是召开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办法。

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主持，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部队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毛远新予以抓捕，宣布对其隔离审查。吴德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抓捕了迟群、谢静宜、金祖敏。耿飚率北京卫戍区部队，控制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迟浩田接管《人民日报》。随后，华国锋在北京西郊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对“四人帮”隔离审查的决议，决定华为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10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

随着“四人帮”的下台和被捕，全国从 1976 年 12 月开始全面揭批和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党政军各级领导班子和骨干成员，根据夏尔·贝特兰的估计，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干部遭到了清洗。

然而，对王、张、江、姚及其追随者的逮捕，与其说是一篇绚丽的历史华章，不如说只是一个大大的句号。事实上，四人所极力代表的群众性政治力量在 1969 年之后就没有占据过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位置，只是在个别地区短暂掌握了权力，1976 年“四人帮”的逮捕，只不过是当时中国政治力量对比的一种反映。在 1969 年各地成立的“军干群”三结合革委会中，群众性组织一开始就处于边缘地位。而在中央部门，周恩来始终掌握国务院的领导权，1973 年又得到了邓小平复出老干部的有力支持。尽管张春桥做了第二副总理，部长当中也有几个与江青等人关系密切，但在政府中始终处于边缘，29 个部长中绝大多数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军队方面，尽管王洪文、张春桥在 1975 年 1 月成为军委常委，张春桥还是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的政委，但除了弄套军装穿穿外，对军队的影响力极小。江青不得不承认：“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则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由此而言，1976 年对王、张、江、姚及其追随者的逮捕，确实是在当时力量对比下的一次水到渠成的事情。

政治上的转折，总有其背后社会根源。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马的五月十八日》中所言，“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运动在 1969 年后就基本结束。夏尔·贝特兰分析了群众运动失败的原因为：

没能正确处理好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问题。…更倾向于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和除掉他们的对手，而不是贯彻一条具有充分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者们却显示出他们能够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各种不同形式的联盟（特别是不同形式的“三结合”小组）。

以个人冲突来代替改造社会关系的斗争，而这些冲突的发展会使小资产阶级分子突出出来，而那些对于“追求地位”不感兴趣的工人阶级积极分子反而被埋没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有时不得不试图从小资产阶级分子中间去寻找支持（这些人必然是不稳定的），有时为了避免由小资产阶级的干扰而引起的混乱，他们又转而依靠解放军干部或地方干部，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投修正主义分子所好，从而削弱了革命路线。

斗争带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这种斗争的个人化最后达到了名副其实的“对毛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也许在短期内起过某种积极作用，但从全面考虑，它是一种深刻的消极现象：它使一些聪明的修正主义领导人能够躲在据称名向他们表示过的信任后面，“以他的名义”说话，或者宣布说他们是他的“继承者”。

### 二、工业新政

#### 1、利润、管理与物质刺激

工业整顿以“工业学大庆”为切入点，强调加强企业管理和提高利润，重点是整顿领导班子和恢复规章制度。1977 年 8 月 14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绝对不应废除规章制度。相反，随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须严格规章制度，而工人们必须一丝不苟地遵守这些规章制度。”1977 年第八期《红旗》杂志强调企业必须增加利润，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的思想，“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以这种方式生产的利润越多（即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

为社会主义创造的财富就越多”。1977年11月1日，邓小平指出“工厂要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研究所里是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要恢复各种制度，恢复总工程师、总设计师、总工艺师等岗位责任制。”。然而，即使是在当时，这种做法就引起了质疑，“有人怀疑强化生产指挥系统，建立指挥调度的权威，会走‘一长制’的老路。”<sup>318</sup>。对此，《人民日报》不得不在1977年8月27日以社论的形式宣称“努力为国家增加积累、增加盈利是社会主义企业的光荣职责。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的利润与资本主义利润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是工人群众自觉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创造物质财富，提供消费基金和积累资金的表现。这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根本不同的。……改进企业管理，增加盈利，同修正主义的利润挂帅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而这种加强管理的背后，则是对工人当家作主权利的践踏，1978年就有工人向人民日报写信反映，“不少单位的工人意见基本上得不到采纳，领导对他们的好想法，也往往只是‘研究研究’，终无所用”<sup>319</sup>。直到1980年，针对“整顿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领导干部岗位责任制，建立强有力的、有权威的生产指挥系统，加强劳动纪律，克服无人负责、不敢负责的混乱现象。”还有质疑的声音<sup>320</sup>，认为“社会主义企业如果不实行民主管理，就违背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特征和客观要求”，“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民主生活越发展，就越能调动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越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生产秩序，加强劳动纪律，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应有权威，从而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和经营效果。”。

在整顿的过程中，提倡“计件工资”制度，用物质刺激的方式激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1977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与洪学智等的谈话中指出，“搞计时工资，也搞计件工资。”。1977年11月22日，赵履宽<sup>321</sup>以《驳“四人帮”在劳动报酬形式问题上的谬论》为题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鼓励实行计件工资：计件工资“作为实现按劳分配的一种补充形式，在特定的范围和一定的限度之内实行必要的物质奖励，可以弥补基本劳动报酬形式的不足之处，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尽管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为了在短时间内给工人以实际的好处，1977、1978年调整了部分职工的工资，恢复了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平均工资比1976年提高了7.7%，工资总额提高了14.5%<sup>322</sup>。

## 2、发展速度？

1977年9月，华国锋提出了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1978年的元旦社论，更是将加快发展速度与揭批“四人帮”联系到了一起：“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为什么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呢？归根到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一句话，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各级党委都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来考虑速度问题，部署自己的工作，并把它宣传到广大群众中去，动员大家发挥自己的才干，为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贡献力量。”<sup>323</sup>。很显然，这种高速度发展在生产关系上就是要让“各级党委”为代表的干部专家再次凌驾于工人之上，工人只需要发挥自己的才干，更努力的干活就可以了。因此，它也就意味着工人服从于利润的要求，也就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利润挂帅）往前走，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实际限度，而这必将导致经济危机。

国家计委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基础上制定了《国家计委关于1976-1985年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于12月由华国锋批准下达。《十年规划纲要》的主要指标包括：

1985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亿斤（1978年为6095亿斤，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272亿斤，“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78亿斤）

1980年，全国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而1977年农业机械化率还不到10%；

1985年，石油产量达到2.5亿吨（1978年石油产量只有1.04亿吨，在没有地质勘探的条件下提出了“建设十个大庆”的口号）。

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1978年为3178万吨，要求以后平均每年增产403万吨，“四五”平均每年增产122万吨）。

从1978年到1985年，要新建和续建120个工业大项目，包括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根据规划，这8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

初步估计，把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大约需要600亿人民币，其中光宝钢一项就200亿。然而1977年，中国的全部财政收入874亿元人民币，整个出口的外汇收入76亿美元，基本建设总投资382亿人民币。很显然，依靠国内积累是不可能实现这个投资目标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外国借钱，也就是引进外资。为了实现《十年规划纲要》的目标，国务院制定了八年引进计划，共需外汇65亿美元。1978年3月，中央又批准了一批追加的项目，从65亿美元扩大到180亿美元。1978年7月至9月，邓小平在国务院召开的务虚会上提出应该在几年内引进800亿美元的资金。“人有多大胆，

<sup>318</sup> 生产指挥要有权威，人民日报，1977年11月9日

<sup>319</sup> 对企业管理的意见，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

<sup>320</sup> 企业民主管理的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1月14日

<sup>321</sup> 赵履宽，1949年6月毕业于解放区华北大学，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后任部门经济学的教师。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被解散，去了江西五七干校。1972年，参加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建议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牵头成立的工资理论研究组。1975年，参加邓小平牵头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7年底1978年初，参加于光远的建议下成立的中国劳动工资研究会，任总干事。1983年，组建由劳动人事部 and 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sup>322</sup> 马泉山. 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66-1978（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第228页

<sup>323</sup> 光明的中国，人民日报，1978年1月1日第1版



地有多大产”这句描写大跃进空想的话，变成了“人有多大胆，就借多少款”。为了多开采多出口石油，石油行业在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驱动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1975 年大港油田原油产量是 468 万吨，到 1979 年下降到 290 万吨。这 4 年平均每年下降 29.5%。杀鸡取卵的开采方法，使地层遭到破坏。在开采石油时为了控制生产压差，求得稳产高产，每口自喷油井都装有油嘴，油嘴的大小由地质参数决定的。随意放大油嘴，石油产量可以暂时提高。但地下能量释放太快，地下资源就遭到了破坏。当时大港油田为了追求高产，就命令工人随意放大油嘴。工程技术人员愤怒的说：“这是掠夺性开采！”

大规模的设施引进加上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使得国家财政压力迅速增大。1978 年国家预算节余 10.1 亿元，1979 年赤字猛增至 170.7 亿元，这些赤字，只能通过增发货币和对外借债来解决。于是，货币信贷政策方面也采取了扩张性的政策。现金（M0）供给增长从 1978 年的 9.7%急剧上升到 1979 年的 24.4%和 1980 年的 25.5%；银行信贷余额增长率从 1979 年的 10.2%迅速提高到 1980 年的 18.3%。在这样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尽管当时大部分商品价格仍处于行政管制之下，但物价仍然开始攀升。零售物价指数从 1978 年的 0.7%上升到 1979 年的 2.0%，进而上升到 1980 年的 6.0%。

### 三、农村集体农业的瓦解

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活动在 1977 年秋季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得到了肯定。会议指出，应给予家庭和个人副业生产活动以更大的余地，并且说这些活动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会议还指出，不应批判这种活动，把它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农村自发的集市贸易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必要补充，它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sup>324</sup>。在 1978 年 2 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牧区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的条目被明确写入宪法第七条。在 1978 年 4 月 21 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特约评论员公开支持家庭副业的发展<sup>325</sup>。这篇文章表示“要积极地支持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各级组织应当“组织社员搞好家庭副业生产，……帮助解决家庭副业生产中的问题和困难”，因为“即使经营项目多一点，也不能说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当时个体和家庭副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全国商业部门收购的农副产品中，家庭副业产品约占四分之一；有些产品如猪、禽、蛋等的比重还要大些；野生药材和一些小土特产品，绝大部分来自社员家庭副业。”，因此只有大规模发展家庭副业，才能实现“新的跃进”，至于个体和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矛盾的一方面，文章中只是强调要“坚持不懈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而某些同志认为“农业生产发展了，群众觉悟已经提高了，过去关于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的政策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除了公开支持发展个体和家庭副业，保留和扩大自留地，许多地方还开始了分田到户的尝试。

1977 年 10 月，四川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一些生产队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并得到了四川省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的支持下，试行“定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尽管“定产到组”还没有彻底将土地分到农户，尽管还有意识地避开“包”字，而把他的办法说成是“定”产，但是依然在县委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不少公社干部质问他：“定就是包，包就是定，说法不同，实质一样！”。常光南的做法得到了四川省委杨万选书记的支持，而且他也认为当时领导干部不会再挨批斗了。1978 年，常光南在金鱼公社的做法得到了省委的肯定，认为“从方向道路上讲没有问题，想搞的可以推广”，“金鱼公社建立明确的生产责任制和奖励制的经验，是运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具体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使社员的劳动同自己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看来，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各地、县委可以选择有条件的社队，参照金鱼公社的办法，进行试点，摸索经验，不要一哄而起，以免出现混乱现象。”，并刊登在省委的《工作简报》上发到全省范围。1978 年 2 月，中共四川省委顶着压力，制定下达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开展多种经营，并对四川农村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加以肯定。1978 年 5 月，常光南将广汉县的向阳公社的社队企业改为“工业公司”，采用股份制的方式，设立董事长，同时还成立了类似的“农业公司”和“商业公司”，公社管委会，只负责计划生育、社会治安、文教卫生等行政工作。这样改革，“政社合一”、“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便不复存在。常光南的试点改革，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支持，1978 年底，四川省委派工作组到广汉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帮助广汉县委继续深入地开展农村改革。四川广汉的做法，得到了《人民日报》的肯定，在 1978 年 12 月 16 日的第 3 版专栏上，刊登了《广汉县对干部社员实行奖惩制度》的文章。

1977 年 11 月，安徽省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制定《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下发全省农村执行。《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农活的不一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不急于搞“过渡”；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等等。197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介绍安徽经验的长篇通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1978 年 9 月，安徽省委经过激烈讨论，作出了“借地度荒”的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可以借给社员种麦种油菜，超过计划扩种的小麦，收获时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行分配，并鼓励农民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分配统购任务。1978 年秋，肥西县山南地区区委提出要搞 1961 年的包产到户，在黄花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全奖全赔”的办法。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出现以后，各级领导的态度各不相同，总的来说是反对的意见多，赞成的意见少（有的心里赞成，也不敢明说）。区委是支持的，他们采取了很多办法来解决包产到户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县委是反对的，但也没有马上制止；省委的态度是，让他们试试。万里在 1978 年 2 月 6 日的省委常委会上说：“我主张应当让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尽管他在 1978 年 3 月 17 日的《人

<sup>324</sup> 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人民日报，1978 年 1 月 31 日，第三版

<sup>325</sup> 怎样看待正当的家庭副业？，人民日报，1978 年 4 月 21 日，第三版

民日报》上还宣称“包产到户”是右的错误<sup>326</sup>。

#### 四、教育再革命

高校招收学生再次将考试放在首位，考试又成为体面的事情，使有学院式书本知识的人处于有利地位。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明确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9月19日，邓小平再次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高校招生的具体条件是“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977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一方面承认有些有实践经验的体力劳动者有可能进入大学，另一方面又强调有必要挑选同级中的高材生和“必须择优录取”，并提出要按比例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这就意味着部分地恢复了文化革命前的制度。这一恢复不再要求未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必须先在农村锻炼两、三年，放弃了由各单位群众推荐上大学的做法。1977年8月8日，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不再搞群众推荐。在此路线指导下，在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4000-1000人，占当年计划招生数的2%。1977年10月又将此比例大幅提高到20%-30%，同时废除“群众推荐”，改由地市组织评卷，按成绩提出政审和体检名单，省区教委再对初选名单进行审查。到了1978年，则完全废除了要求“实践经验”的做法，不划定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同时要求为各地基层的知识青年报考提供便利，鼓励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通过高考离开工作的岗位。

由于实际进行高等教育的条件有限，资源按照“择优录取”的要求集中到最能考试的人群中，而录取的权力则集中到了各级领导干部手中，这就必然导致大批在岗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势必执行精英主义办学的方针。1977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说：“由于入学人数的限制，参加考试的大多数人不可能被录取。只要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将来还有机会再参加考试。……他们也可以参加其他七·二一工人大学<sup>327</sup>和半日制大学”。这样，“最优秀”的分子直接进入大学受高等教育，而其他则被用来壮大熟练技术工人的队伍。这个方针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表述为：“充分发挥现有高等学校的潜力，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等学校，认真办好高等的、中等的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1976年，七·二一工人大学总数为33374所，在校148.5万人。经过这期间的整顿后，1978年，七·二一工人大学留存3477所，在校10.3万人。与精英主义办学方针指引下，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批转《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统治》，开始恢复开办重点高校，确定重点高校88所，占高校总数的月20%，5月又提出把抓好一批大中小重点学校作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战略措施”，随后又提出了办重点班。到1981年，全国有重点中学4016所，占中学总数的3.8%，重点小学5271所。这种精英主义的做法极端表现在开办少年班上。1977年，中国科技大学从全国招收了21名平均年龄14岁的“神通”，编成第一期少年班，第二期招收61人，其中工农子弟只有25%，随后一些重点大学也开办了少年班，不少中学开始针对大学少年班开办超前班，专门培养所谓的“神童”。受教育权利日益向精英集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出现了大量“走后门”的现象。如人民日报报道的山西省招生舞弊<sup>328</sup>、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招生舞弊<sup>329</sup>、驻马店地区文教局长招生舞弊<sup>330</sup>等。导致国务院不得不下发通知，要求各个高校不得接受所谓的“代培生”，也就是“地方和部队的干部，违反招生规定，以‘工作需要’为名，将子女、亲友送到大学或中等专业学校‘代培’”，“广大群众对这种做法早就很有意见。许多同志指出，这实际上是‘走后门’的一种花样。”<sup>331</sup>。

这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一些人的严重不满，“地富反坏右”的子女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上大学，这是十几年来所没有的事，让这些“坏份子”获得足够的社会地位，那咱们贫下中农的子女怎么办？中国到底还要不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在1978年5月的全国招生会议上，这种情绪迸发了出来，一些省区教育局代表认为这样搞是“丢掉‘四人帮’的一套，又拣起刘少奇一套”、“现在搞的一系列改革，不是教育革命，而是复旧。”，认为新制度中的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是“违背了阶级路线”，是“忘了‘有成分论’是前提，然后才‘不唯成分论’”，结果造成“剥削家庭出身倒成了优越条件”，“排斥了工农子女”。他们认为新制度中的“择优录取”是复活“高考指挥棒”，复活“智育第一”和“分数挂帅”，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择优，不光是分数择优，政治上也要择优”。他们认为1977年招生工作是“卡了贫下中农”，“丢了多数劳动人民”，“工农成分降低了”，“屁股没有坐在劳动人民一边”。对于这些省区代表的提出的诘难，各方都无法予以正面回应，只能从组织上进行清算。安徽省省委三次召开常委会，对教育局负责人以及省革委会分管教育的副主任进行批判，将其定性为“反动社会思潮”、“同中央唱对台戏”<sup>332</sup>。1978年3月-5月，全国再次掀起了清肃“两个估计”<sup>333</sup>余毒的运动，从组织上清理坚持原有教育思想体系、抵触新政策的人，清理“文革”中的教育

<sup>326</sup> 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人民日报，1978年3月17日第一版

<sup>327</sup>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为贯彻“七二一指示”，创办了“七二一大学”。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招收本厂52名工人入学，学制2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学校根据本厂需要设置了磨床专业，开设了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以及各专业课程。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

<sup>328</sup> 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最近发出通报 严肃处理刘铎等人的营私舞弊行为，人民日报，1978年1月21日，第三版

<sup>329</sup> 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最近决定 严肃处理违法舞弊的招生人员，人民日报，1978年12月12日，第四版

<sup>330</sup> 严明党纪国法 维护新的招生制度，人民日报，1978年7月28日，第四版

<sup>331</sup> 国务院通知各高校不得在计划外接受“代培生”，人民日报，1978年8月24日，第三版

<sup>332</sup> 批判反对招生制度改革错误观点，回击反动的社会思潮，人民日报，1978年7月11日，第三版

<sup>333</sup>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

口号、典型和经验。例如“文革”中有名的“辛店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学校的经验”<sup>334</sup>，在1978年9月受到省教育局的批判，重组了领导班子。

- [1] 夏尔·贝特兰：大跃进
- [2] 莫里斯·迈纳斯：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 [3] 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 [4] 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5]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 [6] 王均伟，李建军：争锋——从大跃进、洋跃进到软着陆（北京：金城出版社，1998）
- [7] 王佳宁：第一：中国经济改革源头探秘（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 [8] 广汉包产到组与公社摘牌溯源，常光南口述 张继禄、马善思、江红英整理，原载《当代史资料》2003年第1期

---

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sup>334</sup> 1968年12月，河北邢台威县辛店三个大队党支部遵照毛泽东主席于当年8月25日发出的在农村则应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指示，联合选派7名贫下中农代表，组成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简称，“贫管会”）进驻辛店小学。后因陆续增办初中、高中班有学生近600名，分13个教学班，有教师21人（其中民办教师11人）。在条件艰苦、经费短缺的情况下，贫管会大搞“勤俭办学”，组织学生开展“兼学”活动，组织高年级学生打苇箔，为生产队和学校增加收入，还开荒种地，同时，不放松文化课学习。这些活动，均受到当地群众的赞扬。1970年该校被威县列为先进典型。